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 1917 年十月革命至 1991 年底 70 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 8 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 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 34 卷（包括总目录卷 1 卷），收入自 80 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 10000 余件，文献上限为 1917 年初，下限至 90 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本卷前言

本卷收入的苏联历史档案分为7个专题，即“各界人士为被捕者申诉的信函”（1918年6月至1940年8月）、“苏德战争爆发（二）”（1941年6~8月）、“关于斯摩棱斯克战役”（1941年7~9月）、“苏联国防委员会内的分工”（1942年2月）、“苏联进军波兰与卡廷事件”（1939年9月至1944年1月）、“苏联与战后波兰（一）”（1944年1月至1949年8月）和“1944和1945年的饥荒”（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共191份档案文件。

在“各界人士为被捕者申诉的信函”专题中，收录了从1918年6月到1940年8月各界人士写给苏俄和苏联专政机关的16封信函。信函绝大部分写于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信函的发寄者有普通的职员、学生、教师，也有当时知名的艺术家、学者，以及功勋卓著的苏联英雄。所有信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个：为他们身边被关押的同事、亲人和熟人向专政机关申诉和做证。像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女儿、著名地质学家莱温松-莱辛院士、语言学家谢尔巴院士、苏联著名火箭和航天科学家谢·巴·科罗廖夫等，都是信函中提到的被逮捕的人；而后来享誉世界的著名导演和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钦柯和两位苏联英雄格里佐杜博娃、格罗莫夫，在不同的信函都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苏德战争爆发（二）”专题中的7份档案，集中反映了苏德战

争爆发后最初两个月中苏联不同地区的情况。专题里包括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决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给联共（布）中央的建议和工作总结、斯大林的批复和普通党员群众给斯大林的揭发信。其中立陶宛的一名党员和斯大林州的一名集体农庄庄员写给斯大林的信，反映了战争初期接近前线地区的混乱状态，以及当地领导机关和某些领导人惊慌失措和不负责任的表现。像这样由目击者提供的第一手材料，显得尤为珍贵。

在“关于斯摩棱斯克战役”中，13份档案都与斯摩棱斯克战役有关，它包括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的命令，斯大林、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等苏军领导人与指挥斯摩棱斯克战役的主要指挥员、参战部队司令员的直通电报记录，以及前线部队发回的报告和作战总结。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斯大林等苏军领导人对此次战役给予了极大关注。同时人们也可以从中管窥苏联战争初期军事失利的原因。

“苏联国防委员会内的分工”专题里的3份档案，都是关于国防委员会中人事安排的，而且后两份文件又都是对第一份文件内容的调整和修改。人事安排的调整主要涉及的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两人。在这次调整中，贝利亚失去了原来与马林科夫共同负责监督飞机、发动机生产和空军工作的权限。

“苏联进军波兰与卡廷事件”由89份档案组成，主要反映了苏联管理和处理波兰战俘情况。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兰战俘问题，特别是“卡廷事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所谓的历史“空白点”。1985年后，苏联和俄罗斯出版了一批有关档案文件和著述，开始涉及到这一在当时具有相当敏感性的问题。本专题的档案是从大量有关档案材料中选取的。这当中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下达的各种指令、各战俘营给上级机关的报告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等等。其中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

委员会政治局第 13 次会议，对波兰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这次会议做出的决议，决定了他们中 4 万多人的悲剧命运。

“苏联与战后波兰（一）”专题中包含的档案，其时间跨度达 5 年半，但有将近一半的档案是 1944 年一年的。众所周知，在人民民主波兰诞生过程中，1944 年是最关键的一年。苏联对新波兰的影响作用，在这段时间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专题的 58 份档案文件包括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和波兰爱国者联盟领导人给苏联领导人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的报告及信函、国际情报部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等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就处理波兰事务的请示报告，以及苏联派驻波兰军队、波兰国家安全部门和其他政府工作部门的代表、驻波苏军情报部门和记者的报告。这些报告把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大量有关波兰国内和各政党内部的情况，源源不断地提交给上级相关部门的领导，客观上成为苏联领导人决策的依据。

“1944 和 1945 年的饥荒”中的 5 份档案文件集中反映了卫国战争后期苏联不同地区出现食品供应短缺的情况。哈萨克、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鞑靼自治共和国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在半年中相继出现食品供应短缺，说明这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其中的 4 份是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给斯大林等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报告，可见食品供应短缺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吴 伟

2000 年 1 月

目 录

本卷前言 19-1

各界人士为被捕者申诉的信函

(1918年6月至1940年8月)

专题说明..... 19-1

№06778 涅米罗维奇-丹钦柯就为卡卢日斯基
担保给肃反委员会的信
(1918年6月6日) 19-2

№06789 莫斯科大学历史哲学系班长联合会就保释
基泽韦捷尔教授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
(不早于1918年9月29日) 19-3

№06790 莫斯科女子学校班长联合会就释放基泽韦捷尔
教授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
(1918年10月9日) 19-5

№06775 切尔特科夫就请求释放托尔斯塔娅给
捷尔任斯基的信(1919年7月15日) 19-6

№06783 罗日科夫就释放谢尔巴教授致肃反委员会的信
(1919年9月2日) 19-8

- №06781** 季·阿·温格罗娃、克·米·日哈列娃、阿·尼·切博塔廖夫
斯卡娅、费·库·索洛古勃就释放杰尼索娃-米洛舍维奇给
季诺维也夫的信（不早于1919年9月6日）…… 19-9
- №06784** 弗·安·斯切克洛夫就释放莱温松-莱辛院士致
肃反委员会的信（1919年10月21日）…… 19-10
- №06785** 机电学院教授、教师、学生和普通职员就
保释奥萨德奇教授给巴卡耶夫的信
（不早于1919年9月）…… 19-11
- №06782** 彼得格勒市一些共产党员就请求释放
普拉托诺夫牧师给肃反委员会的信
（不晚于1919年10月16日）…… 19-12
- №06776** 托尔斯泰协会就请求释放托尔斯塔娅给
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信
（1920年4月20日）…… 19-13
- №06779** 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代表就释放科米萨罗夫致
莫斯科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1920年5月18日）…… 19-14
- №06780** 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代表就请求加快审理
科米萨罗夫案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的信
（1920年6月17日）…… 19-15
- №06777** 哥尔布诺夫-波萨多夫、比留科夫、切尔特科夫就
布尔加科夫被驱逐出国给捷尔任斯基的信
（1923年3月4日）…… 19-16
- №06786** 格里佐杜博娃就请求重新审理科罗廖夫案给
乌尔里希的信（1939年4月17日）…… 19-18
- №06787** 格里佐杜博娃就请求重新审理科罗廖夫案给
贝利亚的信（1940年8月13日）…… 19-19

- No06788** 格罗莫夫就请求重新审理科罗廖夫案给
贝利亚的信 (1940年8月14日) 19-20

苏德战争爆发 (二)

(1941年6~8月)

- 专题说明** 19-21
- No06820**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4号记录摘要
(1941年6月27日) 19-22
- No06818** 国防委员会“关于动员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
劳动者自愿加入民兵师”的决定
(1941年7月4日) 19-24
- No06821** 立陶宛一党员就立陶宛政府和立陶宛共产党
(布)中央委员会可耻地临阵逃脱给
斯大林的信 (1941年7月7日) 19-27
- No06815** 赫鲁晓夫就销毁机器拖拉机站及无法转移的
其他设备给联共(布)中央的建议
(1941年7月9日) 19-34
- No06816** 斯大林致赫鲁晓夫 (1941年7月10日) 19-36
- No06814** 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白俄罗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疏散工作的总结
(1941年8月18日) 19-38
- No06817** 斯大林州一集体农庄庄员就敖德萨州的
领导人的惊慌失措给斯大林的信
(1941年8月18日) 19-42

关于斯摩棱斯克战役

(1941年7~9月)

- 专题说明** 19-45
- №06840** 国防委员会关于组织斯摩棱斯克市保卫战的
第二号命令(1941年7月16日) 19-47
- №06841** 斯大林就斯摩棱斯克地区实行反击的
准备工作与铁木辛哥的直通电报记录
(1941年7月20日) 19-49
- №06842** 朱可夫就出动骑兵袭击敌后问题与戈罗多维科夫
的直通电报记录(1941年7月21日) 19-50
- №06843** 斯大林就西方面军情况与沙波什尼科夫的
直通电报记录(1941年7月26日) 19-53
- №06844** 国防委员会关于改组方面军和调整工农红军
指挥人员的决定(1941年7月29日) 19-57
- №06845** 斯大林就西方面军部队的防御准备工作与
铁木辛哥的直通电报记录
(1941年8月2日) 19-59
- №06846** 沙波什尼科夫就预备队方面军形势与朱可夫的
直通电报记录(1941年8月4日) 19-62
- №06847** 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就补充部队兵员问题给
斯大林的密码电报(1941年8月15日) 19-66

- №06819** 沃罗诺夫就第 24 集团军在叶利尼亚市地区的作战经验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1 年 8 月 15 日) 19-68
- №06848** 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就加强勒热夫方向的部队问题给沙波什尼科夫的密码电报
(1941 年 8 月 31 日) 19-74
- №06849** 西方面军司令部就第 22 集团军战败原因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1 年 9 月 3 日) 19-76
- №06850** 骑兵集群司令部就多瓦托尔骑兵集群的行动给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报告
(不早于 1941 年 9 月 2 日) 19-82
- №06851** 国防委员会驻斯摩棱斯克州特派员霍赫洛夫就获得解放的地区和第 30 集团军部队的情况给国防委员会的报告 (1941 年 9 月 9 日) 19-89

、 苏联国防委员会内的分工

、 (1942 年 2 月)

- 专题说明** 19-94
- №06811** 国防委员会关于各委员分工的第 1241 /C 号决定
(1942 年 2 月 4 日) 19-95
- №06812** 国防委员会关于对各委员分工进行部分调整的第 1271 /C 号决定 (1942 年 2 月 12 日) 19-97
- №06813** 国防委员会关于对各委员分工进行部分调整的第 1289 /C 号决定 (1942 年 2 月 16 日) 19-98

苏联进军波兰与卡廷事件

(1939年9月至1944年1月)

- 专题说明** 19 - 99
- №08013** 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给白俄罗斯特别军区
军事委员会的第16633号训令
(1939年9月14日) 19 - 101
- №08014** 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给基辅特别军区
军事委员会的第16634号训令
(1939年9月14日) 19 - 105
- №08015** 白俄罗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就红军进入西白俄罗斯
领土的目的给方面军各部队的第005号命令
(1939年9月16日) 19 - 109
- №08016** 波将金与波兰大使格日博夫斯基的谈话摘录
(1939年9月17日) 19 - 111
- №08017** 贝利亚就国防委员会关于白俄罗斯特别军区、
基辅特别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里的苏联内务
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并在三个
军区开设战俘接收站的决议草案给
莫洛托夫的便函(1939年9月17日) 19 - 114
- №0801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在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和
基辅特别军区、列宁格勒军区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
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并将战俘接收站的
守卫交给其负责的决议
(1939年9月18日) 19 - 116

- №08019** 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就国防人民委员关于战俘运输和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移交战俘给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的命令 (1939年9月19日) 19-117
- №08020** 贝利亚关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组建战俘事务管理局、批准它的编制并组建战俘营的命令 (1939年9月19日) 19-119
- №08021**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条例” (不早于1939年9月19日) 19-124
- №08022** 内务人民委员部就对战俘进行作战登记给战俘营特别科的指示 (1939年9月19日) ... 19-126
- №08023** 乌克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就关闭兹布鲁奇河口及其以西国境线给基辅军区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司令员奥索金的训令 (1939年9月19日) 19-129
- №08024** 《战俘条例》草案 (1939年9月19日) 19-131
- №08025** 库利克关于红军部队和兵团在西乌克兰的作战行动及该地区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报告 (1939年9月21日) 19-137
- №08026** 《战俘营条例》 (1939年9月23日) 19-140
- №08027**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关于在战俘营组织战俘登记工作的训令 (1939年9月25日) 19-144
- №08028**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关押营内部规章 (1939年9月28日) 19-146
- №08029**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关于各战俘营对接收战俘准备情况的通报 (不早于1939年9月28日) 19-150

- №08030**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关于战俘登记问题给各战俘营主任的训令
(1939年10月1日) 19-155
- №08031** 贝利亚和梅赫利斯就战俘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
(1939年10月3日) 19-157
- №08032** 贝利亚关于释放出生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捷克、白俄罗斯、乌克兰族士兵战俘和其他种类战俘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关押办法的命令
(1939年10月3日) 19-159
- №08033** 贝利亚就把出生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士兵战俘遣送回原籍及其他种类战俘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关押办法给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有关州的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和各战俘营主任的训令(1939年10月3日) 19-162
- №08034**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关于批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军事法庭判决办法决议》
(1939年10月3日) 19-165
- №08035**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高级检查员布纳科夫大尉就旧别尔斯克战俘营状况给索普鲁年科和战俘事务管理局作战处处长季什科夫的报告(1939年10月3日) 19-166
- №08036** 乌克兰方面军首长就1939年9月1日至10月5日期间波军与德军的行动情况给沙波什尼科夫的报告(不早于1939年10月5日) 19-168
- №08037** 贝利亚关于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中的战俘开展肃反工作的训令
(1939年10月8日) 19-173

- No08038** 贝利亚就把家住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士兵战俘遣送回乡并把家住并入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波兰战俘转交德国当局给莫洛托夫的公函（1939年10月11日） 19-177
- No08039**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与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之间关于在该部企业使用战俘的协议书（1939年10月14日） 19-179
- No08040** 博奇科夫就奥斯塔什科夫和奥兰战俘营接收战俘的准备工作情况给贝利亚的报告（1939年10月14日） 19-182
- No08041** 西科尔斯基给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的申辩信（1939年10月20日） 19-186
- No08042** 切尔内绍夫和索普鲁年科就战俘营的情况给贝利亚的报告（1939年10月23日） 19-188
- No08043** 科泽尔斯科战俘营政治委员阿列克谢耶夫就战俘看管人员从战俘手里买东西的情况给涅霍罗舍夫的紧急报告（1939年10月24日） 19-191
- No08044**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战俘拒绝从战俘营和收容所被遣返回并入德国的波兰领土上去给贝利亚的情况汇报（1939年10月28日） 19-194
- No08045** 切尔内绍夫就向德国当局移交战俘的措施给伏罗希洛夫的报告（1939年10月29日） 19-195
- No08046** 博奇科夫和特别处第11科科长罗尔基什给切尔内绍夫的报告（1939年10月29日） 19-197

- №08047** 医生和药剂师战俘就把他们当俘虏关押属于非法
向伏罗希洛夫的申述
(1939年10月30日) 19-199
- №08048**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填写特别
登记卡的程序给鲍里索韦茨的命令
(1939年11月2日) 19-200
- №08049** 几个出生于西白俄罗斯的战俘给斯大林的请愿书
(1939年11月4日) 19-202
- №08050** 费久科夫就利用战俘修筑道路及已完成的工作量
给贝利亚的电报(1939年11月6日) 19-204
- №08051** 马克利亚尔斯基就奥斯塔什科夫、旧别尔斯克和
科泽尔斯基三个战俘营在战俘登记工作组织方面
存在的问题和派遣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
局工作人员去各战俘营给索普鲁年科的汇报
(不晚于1939年11月14日) 19-207
- №08052** 季什科夫就组织列车运送移交德国的前波兰军队
战俘给索普鲁年科和涅霍罗舍夫的报告
(1939年11月24日) 19-209
- №08053** 马克利亚尔斯基给前往旧别尔斯克、奥斯塔什
科夫和科泽尔斯基战俘营整顿战俘登记工作的
工作人员的任务指令
(1939年11月14日) 19-213
- №08796**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移交给德国当局和
从德国当局接收的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战俘数量的
报告(1939年11月15日) 19-216
- №08054**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关于战俘营情况的
报告(不早于1939年11月15日) 19-217

- №08055** 罗曼诺夫和安东诺夫就检查科泽尔斯科战俘营
结果和对该战俘营领导人进行帮助给索普鲁年科和
涅霍罗舍夫的报告 (1939年11月19日) 19-230
- №08056** 马卡罗夫就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战俘登记
工作情况给马克利亚尔斯基的报告
(1939年11月21日) 19-238
- №08057** 季什科夫就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及其特别科领导人
工作不力给索普鲁年科和涅霍罗舍夫的报告
(1939年11月25日) 19-240
- №08058** 派往旧别尔斯科战俘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
行动小组就该战俘营政委基尔申工作不能令人
满意给贝利亚的报告
(1939年11月25日) 19-244
- №08798** 卡巴诺夫就科泽尔斯科战俘营的登记工作给
马克利亚尔斯基的报告
(1939年11月28日) 19-246
- №03464** 扎鲁宾就科泽尔斯科战俘营的现状给索普鲁年科
的信 (1939年11月28日) 19-247
- №03465**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指示罗曼诺夫
同志前往莫斯科并在12月1日前结束战俘营战俘
登记工作 (1939年11月29日) 19-249
- №08059**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把西白俄罗斯和
西乌克兰出生的士兵战俘转为雇用人员和
分化瓦解战俘中的军官以进一步利用他们向
贝利亚提交的建议 (1939年11月) 19-250
- №08060** 贝利亚关于组织接收站和战俘营的命令
(第001445号) (1939年12月1日) 19-252

- №08061** 卡巴诺夫就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战俘登记工作提供实际帮助给马克利亚尔斯基的报告
(不早于1939年12月1日) 19-255
- №08062**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情况给切尔内绍夫的报告(不早于1939年12月1日) 19-258
- №08063** 梅尔库洛夫和切尔内绍夫就该部门企业使用战俘办法给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托拉斯经理、矿物局局长、总局局长和战俘营的指示
(不晚于1939年12月2日) 19-264
- №08064** 旧别尔斯克战俘营领导人就该战俘营1939年11月的政治思想情况给涅霍罗舍夫的汇报
(1939年12月3日) 19-267
- №08065** 马卡洛夫就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战俘登记工作给马克利亚尔斯基的报告
(不晚于1939年12月4日) 19-279
- №08066**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对警察战俘和宪兵战俘加强监视给鲍里索韦茨的指示(1939年12月7日) 19-282
- №08067** 季什科夫就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情况给索普鲁年科和涅霍罗舍夫的报告
(1939年12月9日) 19-284
- №08068** 谢洛夫就逮捕西乌克兰各州原波兰军队骨干军官行动结果给贝利亚的报告
(1939年12月14日) 19-294
- №08069** 索普鲁年科就将军官战俘送往科泽尔斯克集中营和将籍贯在归属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战俘移交德国当局给乌克兰兹韦列夫的电话指示
(1939年12月15日) 19-296

- №08070** 谢洛夫就加强战俘工作、追究反苏人员刑事责任
给扎波罗热战俘营主任彼得鲁申的指示
(1939年12月21日) 19-297
- №08071** 贝利亚就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组赴奥斯塔什科夫
战俘营完成对警察战俘侦查一事给索普鲁年科的
命令(1939年12月31日) 19-299
- №08072**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把有反苏情绪的
战俘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给伊利英和
列维亚金的指示(1939年12月31日) 19-302
- №08073** 贝利亚给季什科夫的命令
(1939年12月31日) 19-303
- №08074** 旧别尔斯克战俘营就战俘营政治思想情况给
涅霍罗舍夫的报告(1939年12月31日) 19-305
- №08075**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关于1939年
12月1日至12月31日各战俘营政治思想状况的
反面实例和非常事件”的通报
(不早于1939年12月31日) 19-315
- №08076**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按所附格式
填写补充调查表给各战俘营首长的指示
(1940年1月5日) 19-323
- №08077** 波兰战俘要求确定他们的地位和遵照公认的
国际准则对待战俘的声明
(1940年1月7日) 19-325
- №08078** 霍赫洛夫关于“尼科波尔锰矿”和“十月矿务局”
两托拉斯中战俘罢工与绝食的报告
(不早于1940年1月3日) 19-328
- №08079** 阿列克谢耶夫就战俘绝食给涅霍罗舍夫的
紧急报告(1940年1月22日) 19-330

- №08080** 马卡罗夫就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侦讯工作进程给
马克利亚尔斯基的信
(1940年1月29日) 19-332
- №08081** 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队就战俘营工作检查结果
给旧别尔斯克战俘营领导的指示
(1940年1月31日) 19-334
- №08082** 阿列克谢耶夫就科泽尔斯克战俘营所做工作给
涅霍罗舍夫的报告(1940年2月4日) 19-340
- №08083** 内务人民委员部与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
关于在黑色冶金工业企业使用战俘的协定
(1940年2月7日) 19-348
- №08084** 旧别尔斯克战俘营领导就在战俘中组织政治教育
工作给涅霍罗舍夫的报告
(1940年2月8日) 19-351
- №08085** 洛尔基什关于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战俘准备逃跑的
专门报告(1940年2月19日) 19-361
- №08086**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释放旧别尔斯克
和科泽尔斯克战俘营部分战俘给贝利亚的报告
(1940年2月20日) 19-363
- №08087** 1939年10、11、12月份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战俘营
疾病和死亡情况分析
(1940年2月21日) 19-365
- №08088** 鲍里索韦茨和尤拉索夫就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总的
情况与内部秩序给索普鲁年科的报告
(1940年2月22日) 19-372

- №08089**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执行贝利亚关于将关押在战俘营的狱吏、情报人员、奸细、民团分子等转移到监狱的命令给各战俘营主任的指示（1940年2月23日） 19-378
- №08090**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整顿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企业战俘工作措施的命令（1940年2月26日） 19-380
- №08091**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纠正队列表填写错误和发去新报表给鲍里索韦茨的指示（1940年3月2日） 19-382
- №08092** 联（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警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国界”的决定（1940年3月2日） 19-384
- №08093** 科雷托夫就遣送战俘的组织工作给帕夫洛夫的报告（不晚于1940年3月4日） 19-387
- №08094** 贝利亚就枪毙3个专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宪兵、警察和民团分子等给斯大林的报告（不早于1940年3月5日） 19-390
- №08095** 联（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号会议记录摘录（114项）（1940年3月5日） 19-393
- №06809** 沙胡林就利用战俘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1941年12月13日） 19-395
- №02547** 贝利亚就卡廷事件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4年1月20日） 19-397

苏联与战后波兰（一）

（1944年1月至1949年8月）

- 专题说明**..... 19 - 399
- №01764** 波兰共产党员发起小组就必须建立在苏波兰
共产党人组织问题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1月10日）..... 19 - 401
- №01765** 哥穆尔卡就波兰政治形势写给马努伊尔斯基的
报告摘要（1944年1月12日）..... 19 - 405
- №01766** 季米特洛夫就拟议中的波兰共产党中央局的组成
问题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1月18日）..... 19 - 409
- №01767** 季米特洛夫就组建波兰共产党中央局的必要性给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1月24日）..... 19 - 411
- №01768** 菲京就有关波兰工人党某些领导人的消息给
季米特洛夫的报告（1944年2月9日）..... 19 - 413
- №01769** 别洛夫关于“韦斯瓦夫”和“马尔塔”的情况给
季米特洛夫的报告（1944年2月14日）..... 19 - 414
- №01770** 马努伊尔斯基就向卡斯曼询问波兰工人党对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态度的必要性给季米特洛夫的
报告（1944年2月24日）..... 19 - 415
- №01771** 在波兰境内组织游击运动和党的工作计划措施
（1944年2月28日）..... 19 - 416
- №01772** 莫罗佐夫关于“波兰特别小组”的情况报告
（1944年2月29日）..... 19 - 418

- №01773** 季米特洛夫、马努伊尔斯基和巴拉诺夫就建立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1944年3月7日） 19-422
- №01774** 菲京就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致电博·德罗布涅尔建议他加入该党一事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1944年3月11~12日） 19-426
- №01775** 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就在苏波兰爱国者联盟总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草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4年4月3日） 19-427
- №01776** 菲京就波兰工人党中央和卡斯曼的相互关系问题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1944年4月6日） 19-429
- №01777** 菲京就卡斯曼小组问题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1944年4月15日） 19-430
- №01778** 菲京就得到的有关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成员情况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1944年5月8~9日） ... 19-431
- №01779** 巴拉诺夫就波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4年5月18日） 19-432
- №01780** 贝鲁特就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情况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44年6月10日） 19-435
- №01781** 索科洛夫斯基就波兰第一集团军政治教育部情况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44年6月13日） 19-437
- №01782** 马努伊尔斯基就乌西耶维奇报告的结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4年6月14日） 19-445
- №01783** 马列克关于卡斯曼与莫恰尔上校相互关系的报告（1944年6月20日） 19-447

- №01784** 马努伊尔斯基就与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团谈话情况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1944年6月26日) 19-451
- №01785** 就前来莫斯科的必要性给斯·维梁诺夫斯基、奥·朗格及哥穆尔卡的电报(1944年7月17日) ... 19-454
- №01786** 巴拉诺夫就从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获得有关波兰局势的情报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1944年8月3日) 19-456
- №01787**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就向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提供资金问题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4年8月4日) 19-458
- №01788** 季米特洛夫和巴拉诺夫就给予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财政与技术援助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9月15日) 19-459
- №01789** 芬克尔施坦因就波兰社会党在波兰解放区的活动给普赫洛夫的报告
(1944年10月10日) 19-461
- №01790** 捷尔任斯卡娅就卢布林的报刊及广播情况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1944年10月20日) 19-468
- №01791** 普里特茨基就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1944年5~9月的活动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944年11月20日) 19-475
- №01792**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关于加入民主联盟的波兰各政党相互关系的报告摘录
(不迟于1945年4月) 19-478
- №01793** 哥穆尔卡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谈波兰形势(1945年5月10日) 19-491

- №01794** 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就党内状况给斯大林的信
(1945年5月15日) 19-514
- №01795** 北军队集群政治部就波兰首席主教赫隆德红衣主教在
波兹南逗留情况的报告
(不晚于1945年8月23日) 19-522
- №01796** 乌克兰共产党(布)利沃夫州委书记格鲁舍茨基就
波兰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格拉布斯基在
利沃夫逗留情况写给马林科夫的情况通报
(1945年8月31日) 19-525
- №01797** 苏联国家安全部关于波兰社会党政治活动的报告
(1946年7月2~3日) 19-532
- №01798** 加布洛夫就农民党最高委员会委员科瓦尔斯基的
文章给普赫洛夫的报告
(1946年8月13日) 19-535
- №01799** 北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会就波兰工人党与
波兰社会党之间的摩擦及其对波兰政局的
影响给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的
报告(1946年9月10日) 19-537
- №01800**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就波兰社会党与
波兰工人党在全民公决后相互间关系恶化的
报告(1946年10月12日) 19-553
- №01801** 北军队集群政治部关于德罗布涅尔评价波兰政治
局势的报告(1946年10月25日) 19-565
- №01802**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波兰立法议会选举
准备工作的通报(1947年1月16日) 19-571
- №01803** 北军队集群政治部关于波兰国内对与苏联经济关系
不满情绪的报告(1947年3月19日) 19-577

- №01804** 希金就在波兰军队中限制发行《自由报》给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7年3月29日） 19-579
- №01805** 萨波日尼科夫就波兰社会党内情况给苏斯洛夫的
报告（1947年4月12日） 19-581
- №01806**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就波兰社会党同
波兰工人党相互关系问题的斗争给苏斯洛夫的通报
（1947年7月5日） 19-584
- №01807** 塔斯社记者关于计划在波兰成立天主教党的报道：
关于在波兰建立天主教党的谈判
（1947年9月） 19-597
- №01808** 切尔诺夫和捷尔仁斯基就在波兰创建天主教党计划给
巴拉诺夫的报告（1947年10月10日） 19-605
- №01809**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就波兰工人党领导中的
民族主义观点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8年4月5日） 19-607
- №01810** 北军队集群政治部关于英国和美国在波兰
进行宣传的组织、形式和方法的报告
（1948年7月22日） 19-625
- №01811** 北军队集群政治部关于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工作人员对《自由》报和波苏友好协会持不友好
态度事例的报告（1948年8月30日） 19-637
- №01812** 罗马尼亚驻华沙领事馆关于波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
报告（不晚于1948年10月25日） 19-639
- №01813** 哥穆尔卡就拒绝选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一事给斯大林的信
（1948年12月14日） 19-647

- №01814** 塔斯社驻华沙记者潘丘欣关于同维德-维尔斯基和
马图舍夫斯基谈话的报告
(1949年3月5日) 19-654
- №01815** 塔斯社驻华沙记者潘丘欣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同
教会关系的报告(1949年4月9日) 19-657
- №01816** 索科洛夫斯基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出版部工作缺点的报告 19-665
- №01817** 《真理报》驻波兰记者马卡连科关于同
扎姆勃罗夫斯基就波兰统一工人党农村政策的
谈话报告(1949年5月26日) 19-677
- №01818** 纳塔松就波兰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情况给波诺马
廖夫的报告(1949年6月10日) 19-680
- №01819**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关于农民党党内斗争
情况的报告(不晚于1949年6月25日) 19-697
- №01820**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编写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
代表大会后波兰国内形势的概况
(1949年7月14日) 19-705
- №01821**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就所谓“卢布林显圣”事件的
调查(1949年8月) 19-719

1944 和 1945 年的饥荒

(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

- 专题说明** 19-726
- №06854**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
波格丹诺夫就食品短缺及引发的社会问题给
贝利亚的报告(1944年4月8日) 19-728

- №06853** 贝利亚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食品供应短缺给
斯大林等人的报告（1944年4月21日） 19-731
- №06855** 贝利亚就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食品
供应短缺给斯大林等人的报告
（不晚于1944年7月27日） 19-733
- №06857** 贝利亚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食品供应短缺给
斯大林等人的报告（1944年10月14日） 19-735
- №06856** 贝利亚就乌兹别克和其他地区食品供应短缺的报告
（1945年4月17日） 19-738

【专题说明】

各界人士为被捕者申诉的信函

(1918年6月至1940年8月)

苏联历史上的大规模镇压和政治迫害，人们并不陌生。在专政机关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之下，任何个人的抗争都显得非常软弱无力，冤假错案更是层出不穷。然而，只要有冤屈与不公，就会有不平的呼声。本专题汇集的这些文件，反映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20年代初以及30年代末、40年代初等不同时期，人们为自己身边被逮捕的人向专政机关作证，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正当申诉的情景。这里有著名艺术家为剧院演职人员提供的证明，有学生为自己的教授提出的保释请求，有苏维埃代表、苏联英雄为令人尊敬的科学家的正直写下的书面证明。尽管仅从这些文件中无法断定他们的呼吁与申诉在改变被捕者命运上起了多大作用，但是，这种敢于为正义和真理而呼吁的精神，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一笔在探查人们精神境界时极具价值的社会遗产。

(本专题文件由吴伟编辑和校注，

赵国顺翻译)

№06778

涅米罗维奇—丹钦柯^①
就为卡卢日斯基担保给肃反委员会的信
(1918年6月6日)

致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员会

兹证明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协会愿意为在押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卡卢日斯基^②担保，此人系剧院演员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卢日斯基（卡卢日斯基）之子，协会对他非常了解。

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协会理事会主席
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柯
1918年6月6日/5月24日^③

-
- ① 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柯，苏联人民艺术家，著名导演，莫斯科艺术剧院奠基者之一。
② 亚·瓦·卡卢日斯基，当时为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生。1918年夏，因涉嫌立宪民主党一案被捕。
③ 斜杠后为俄历。

№06789

**莫斯科大学历史哲学系班长联合会
就保释基泽韦捷尔教授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
(不早于1918年9月29日)

致全俄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员会

莫斯科大学历史哲学系班长联合会申请书

9月29日夜晚，我系教授亚·亚·基泽韦捷尔^①在他的住宅中
被捕。班长联合会议成员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基泽
韦捷尔教授在上一学年里完全置身政治生活之外，埋头从事教学工
作。同时，班长联合会注意到，当所有过去在某种程度上从事过政
治活动的人都四下出走或东躲西藏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仍坦然地住在他的住宅里，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

因此，全体学生对他被捕感到非常难过和吃惊。此外，班长联
合会作为经选举产生的莫斯科大学学生机构和大学生利益的代表谨
向委员会报告：由于我们的教授被捕，下一学年的课将受到严重影
响，而学生们则失去了一位令人尊敬的、有经验的学术导师。

鉴于以上所述，班长会议请求委员会采取措施使基泽韦捷尔教
授能够继续在学校中讲课并指导实习；如果不能将亚·亚·基泽韦捷

① 亚·亚·基泽韦捷尔，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成员。
1918~1920年期间，三次被捕，又被释放。1922年被驱逐出苏联。

尔直接释放，班长联合会恳求，由全系学生出面保释。

主席 伊·维特韦尔

成员 E.基费尔

(签名难以辨认)

(签名难以辨认)

别·卡芬豪斯

(签名难以辨认)

№06790

**莫斯科女子学校班长联合会
就释放基泽韦捷尔教授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
(1918年10月9日)

**莫斯科高等女子学校班长联合会
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申请书**

莫斯科高等女子学校班长联合会请求全俄肃反委员会考虑在押的我校教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基泽韦捷尔恶劣的健康状况，将他从希特尔监狱释放出来，改为软禁，因为继续呆在监狱里会给他健康和生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现附上诊断书，同时恳请考虑在押者——他早已脱离政治活动而专心从事学术工作——的学术功绩。鉴于他身患重病，呆在监狱里会使科学界永远失去他，我们请求对他改为软禁。

莫斯科高等女子学校班长联合会副主席 E. 鲁勉采娃

秘书 Л. 费金娜

1918年10月9日于莫斯科

№06775

切尔特科夫就请求释放托尔斯塔娅 给捷尔任斯基的信

(1919年7月15日)

尊敬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①：

昨天夜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李沃夫娜·托尔斯塔娅^②被逮捕并被带往卢比扬卡街^③。在搜查她的住所时抄走了她的私人信件。她被告知，逮捕她是因为有人告密。

我知道，亚·李·托尔斯塔娅未参与任何政治阴谋并且正全身心地为出版她父亲尚未发表的手稿作准备，依我看，此事要么是有人蓄意诬陷，要么就是一场误会。亚·李·托尔斯塔娅绝对不是那种对政权机关隐瞒情况的人，看来不对她进行关押也可以搞清她的案子，况且她身体虚弱，关押可能会给她造成不良后果。

我想，您会认为这些意见是正当的，所以我才决定向您提出请求：您能不能下令先将亚·李·托尔斯塔娅释放，然后再搞清此案是否确因某种错误或误会而造成。

① 费·埃·捷尔任斯基，苏联著名党和国务活动家。生于波兰，是十月革命的组织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至1926年逝世，先后任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主席、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人。

② 亚·李·托尔斯塔娅，列·尼·托尔斯泰的次女，托尔斯泰全集编辑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红十字会护士。

③ 莫斯科的一条街道，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即“契卡”所在地。

各界人士为被捕者申诉的信函

如果您能费心让人将您的答复告诉我（打上面所写的两个电话均可），我将对您不胜感激。

真心诚意地尊敬您的 弗·切尔特科夫^①

^① 弗·格·切尔特科夫，从事出版工作，是托尔斯泰的多年密友，也是他的全集的编辑。

№06783

罗日科夫就释放谢尔巴教授

致肃反委员会的信

(1919年9月2日)

致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

8月31日凌晨4时，彼得格勒第二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人文系主任列夫·弗拉基米罗维奇·谢尔巴^①在他的住宅——瓦西里耶夫岛11街44号5宅中逮捕，逮捕证是肃反委员会签发的。由于现在学院已经开学，而谢尔巴教授，尤其是他作为系主任，在这所为改革后的中学培养师资的苏维埃高等学府中是一名难以替代的工作人员，第二师范学院院委会和院务办公室恳请告知逮捕他的原因和能否早日将他释放，并请求尽快为他定案。

院长 尼·罗日科夫

院办公室主任（签名难以辨认）

^① 列·弗·谢尔巴，院士，语言学家。1919年8月因立宪民主党一案被捕，同年9月被释放。

№ 06781

季·阿·温格罗娃、克·米·日哈列娃、
阿·尼·切博塔廖夫斯卡娅、费·库·索洛古勃就
释放杰尼索娃—米洛舍维奇给季诺维也夫的信

(不早于 1919 年 9 月 6 日)

致彼得格勒工农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季诺维也夫同志

全俄职业文学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会请求释放因纯粹名义上加入立宪民主党而于 9 月 6 日被捕的协会及其所属劳动委员会成员莉迪娅·彼得罗夫娜·杰尼索娃—米洛舍维奇^①。据熟悉她的情况的协会会员证明，莉·彼·杰尼索娃由于患有严重疾病（心脏病和肝病）并且工作极为繁忙（在动物博物馆上班，还为世界文学出版社做翻译工作），很少参加立宪民主党的活动，近两年主要忙于工作和家务。翻译工作者协会与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社一直有业务往来，常为其提供翻译并尽力协助其开展公益工作，但愿彼得格勒苏维埃不会对协会的这一请求置之不理。

协会主席 季·温格罗娃

代理秘书 克·日哈列娃

劳动委员会委员、主席 阿·切博塔廖夫斯卡娅

费多尔·索洛古勃

^① 莉·彼·杰尼索娃—米洛舍维奇，女翻译工作者，1918 年因加入立宪民主党而被捕，1919 年再次被捕后被解往莫斯科关人伊万诺夫斯克集中营。

№06784

弗·安·斯切克洛夫就释放莱温松-莱辛院士

致肃反委员会的信

(1919年10月21日)

致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

肩负着保护和发展俄国科学责任的俄罗斯科学院不能不坚决请求肃反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尽快释放在押的弗·尤·莱温松-莱辛^①，他是一位声望极高的学者，在欧洲和美国的学术界都享有盛名。鉴于他作为党派活动家所起的作用只是偶然的和暂时的，科学院认为有必要提醒委员会：弗·尤·莱温松-莱辛年事已高，将他长期关押会严重影响他的健康并会使世界科学界失去一位大公无私的、完全献身科学的工作者。

科学院知道弗·尤·莱温松-莱辛近一时期从不抛头露面，相信将来俄国会看到他只是一位不问政治的大学者。

代理常务书记 弗·斯切克洛夫院士
院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签名难以辨认)

^① 弗·尤·莱温松-莱辛，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1919年因立宪民主党一案被捕，后被无罪释放。

№06785

**机电学院教授、教师、学生和普通职员就
保释奥萨德奇教授给巴卡耶夫的信**

(不早于 1919 年 9 月)

致彼得格勒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主席巴卡耶夫同志

我们，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机电学院的教授、教师、学生和普通职员，联名向您请求：由我们个人负责保释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机电学院院长、教授彼得·谢苗诺维奇·奥萨德奇^①，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很糟。

我们担保，彼·谢·奥萨德奇绝对不会逃离彼得格勒，而且只要肃反委员会因侦讯或审判的需要要求他到场时，保证他随传随到。

(24 人签名)

在本请求书上签名者均系机电学院师生员工。

代理院长 瓦·科瓦连科夫

代理办公室主任 (签名难以辨认)

(未注明日期)

^① 彼·谢·奥萨德奇，机电工程师，列宁格勒机电学院教授，院长，1919年9月因立宪民主党案被捕，很快被释放。1921~1931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06782

**彼得格勒市一些共产党员就请求释放
普拉托诺夫牧师给肃反委员会的信**

(不晚于1919年10月16日)

致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

我们特此联名请求释放在押公民尼古拉·费多罗维奇·普拉托诺夫^①。我们保证，一旦当局需要，他会立即到场提供口供。

此外还要补充一点，据我们所知，公民普拉托诺夫未从事过任何反对现政权的宣传活动，相反，他尽自己的牧师职责，劝导他所供职的安德列耶夫教堂的教民。我们同样可以保证，他今后也不会从事政治活动。

党证：

第二戈罗德区党组织第1689号——共产党员（签名难以辨认），

瓦西里耶夫岛区党组织第1139号——共产党员（签名难以辨认），

第二戈罗德区第1337号——共产党员（签名难以辨认）

第二戈罗德区第2092号——共产党员（签名难以辨认）

(未注明日期)

^① 尼·费·普拉托诺夫，彼得格勒市瓦西里耶夫岛区安德列耶夫教堂的牧师。1919年8月因立宪民主党一案被捕。同年10月获得释放。

№06776

托尔斯泰协会就请求释放托尔斯塔娅 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信

(1920年4月20日)

致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

据悉，列·尼·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李沃夫娜·托尔斯塔娅被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并且已被关押近两周，莫斯科托尔斯泰协会恳请您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使俄国伟大作家的爱女和遗嘱执行人尽快获释。

托尔斯泰协会请求在审判前（如果进行审判的话）先由协会理事会作保，将亚历山德拉·李沃夫娜·托尔斯塔娅释放。

托尔斯泰协会深信，亚历山德拉·李沃夫娜·托尔斯塔娅决不会逃避审判和调查。因此，协会希望全俄肃反委员会满足它的请求，——这样做也是对受到每一个有思想、有文化的人敬仰和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伟大托尔斯泰表示尊敬。

主席 尼·达维多夫

秘书 瓦·布尔加科夫^①

^① 尼·瓦·达维多夫，大学教授，自1911年起任托尔斯泰协会主席。瓦·费·布尔加科夫，列·托尔斯泰的秘书，也是托尔斯泰协会的秘书。1923年3月被驱逐出国。

№06779

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代表就释放
科米萨罗夫致莫斯科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1920年5月18日)

致莫斯科肃反委员会主席团

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恳请将在押的剧院助理会计师米哈伊尔·格拉西莫维奇·科米萨罗夫^①交保释放，因为目前正值演出季节结束，必须编制上一演出季节的财务报表并立即着手制订即将到来的1920~1921年演出季节的预算以便及时上报戏剧中心批准。米·格·科米萨罗夫是剧院惟一的助理会计师，是一名绝对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

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特此呈请尽快对科米萨罗夫一案进行侦查，如果情况允许，请在该案结案前先将他释放，——交保释放也行。

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代表 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柯

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②

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协会理事会主席 鲁缅采夫

莫斯科艺术剧院基层工作者委员会主席

(签名难以辨认)

① 米·格·科米萨罗夫，1906年起为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成员。1918年因立宪民主党一案被捕，但几天后被无罪释放。1920年4月再次因所谓的“战略中心”案被捕。

② 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苏联人民艺术家、著名导演和戏剧大师，创立了以他的姓命名的表演体系。他也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之一。

№06780

**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代表就请求加快
审理科米萨罗夫案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的信**

(1920年6月17日)

莫斯科

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

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代表声明

艺术剧院已经请求加快审理米哈伊尔·格拉西莫维奇·科米萨罗夫案件，目前剧院非常需要他进行工作（会计工作）。同时我们声明：剧院可以担保（1）米·格·科米萨罗夫不会离开莫斯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随时准确地得知他的住址；（2）他不会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活动。

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代表 弗·涅米罗维奇-丹钦柯

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伊·莫斯科涅

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协会理事会主席 鲁缅采夫

莫斯科艺术剧院基层工作者委员会主席

(签名难以辨认)

№06777

哥尔布诺夫—波萨多夫、
比留科夫^①、切尔特科夫就布尔加科夫被
驱逐出国给捷尔任斯基的信

(1923年3月4日)

尊敬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

我们三位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老朋友和志同道合者，得悉他过去的秘书和助手瓦连延·费奥多罗维奇·布尔加科夫受到驱逐出国的行政处罚，我们觉得不能对这件令我们痛心的事袖手旁观。我们当然不是认为这件事比政府其他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还要突出，我们之所以给您写信是因为与托尔斯泰的共同关系把我们同布尔加科夫联系在一起。为了托尔斯泰，我们请求不要将布尔加科夫驱逐出莫斯科。

同时我们认为无需让您劳神倾听我们说明提出请求的动机，因为您肯定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与托尔斯泰的整个人生观密不可分的原则——信仰完全自由，这是当今时代全体进步人类意识的共同财富。

伊·哥尔布诺夫—波萨多夫

帕·比留科夫

弗·切尔特科夫

① 伊·伊·哥尔布诺夫—波萨多夫，从事翻译和出版工作，1925年前任“媒介”出版社社长。帕·伊·比留科夫，《列夫·托尔斯泰传》的作者。

各界人士为被捕者申诉的信函

我们认为也无需指出有许多人赞同我们在此所谈的意见，无需劝您相信我们在这封信中表达了他们的呼声。

1923年3月4日

№06786

格里佐杜博娃就请求
重新审理科罗廖夫案给乌尔里希的信

(1939年4月17日)

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庭长乌尔里希同志

请您重新审理已判决的谢·巴·科罗廖夫^①一案。

随信附上科罗廖夫的母亲巴拉尼娜公民给苏联最高法院院长的申诉书。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瓦·格里佐杜博娃^②

1939年4月17日

① 谢·巴·科罗廖夫，苏联航天学的奠基人之一，火箭和航天器设计师，科学院院士。1938年9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指控他参加反苏恐怖活动和间谍破坏组织，判处有期徒刑10年。

② 瓦·斯·格里佐杜博娃，苏联英雄，女飞行员，1938年完成了莫斯科—远东的不着陆飞行。

№06787

格里佐杜博娃就请求重新审理
科罗廖夫案给贝利亚的信

(1940年8月13日)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巴·贝利亚同志^①

请重新审理已判决的谢·巴·科罗廖夫一案。

我在1927~1928年间就认识他，他是一名优秀的滑翔机驾驶员、一个正直的人。后来听说他成为一个有才能的设计师。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格里佐杜博娃

1940年8月13日

^① 拉·巴·贝利亚，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1938~1945年起历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4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并晋升为苏联元帅。

№06788

**格罗莫夫就请求重新
审理科罗廖夫案给贝利亚的信**

(1940年8月14日)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巴·贝利亚同志

我通过苏维埃代表的渠道收到 M.H. 巴拉尼娜公民（在押犯谢·巴·科罗廖夫的母亲）关于重新审理科罗廖夫一案的申诉书。

现呈上 M.H. 巴拉尼娜公民的申诉书和在押犯谢·巴·科罗廖夫的申诉书，请您下令重新审理谢·巴·科罗廖夫一案。我认识谢·巴·科罗廖夫，他是个正直的、有才能、有热情的航空工程师。

请将您就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告诉我。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英雄 米·格罗莫夫^①

1940年8月14日

^① 米·米·格罗莫夫，苏联英雄，飞行员。1934年创长距离飞行的世界纪录，1937年完成了莫斯科—北极—美国的不着陆飞行。

【专题说明】

苏德战争爆发（二）

（1941年6~8月）

在纳粹德国突然发动侵苏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苏联的境遇是相当严重的。前线部队的溃败，更加重了本已危机的局势。苏联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力图扭转不利局面，然而，一些混乱和无序现象还是发生了……本专题的几份文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卫国战争初期苏联情况。这里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国防委员会的紧急决定，有靠近西部边界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疏散和转移工作的情况，还有一些基层党员和群众写给斯大林的信，反映当地领导和部分人在国家危难之际的种种丑行。其中，当时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斯大林对此的答复，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诺马连科关于疏散工作的报告，以及立陶宛一名普通党员的来信，尤其令人关注，可以说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幅战争初期苏联上上下下真实情景的速写。

（本专题文件由吴伟编辑积校注，
任建华翻译）

№06820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4号记录摘要

(1941年6月27日)

绝密

№. П134 / 144

1941年6月27日决定

144.——关于将苏联贵金属、宝石、钻石等国家储备以及克里姆林宫兵器陈列馆的贵重物品从莫斯科运走的决定。

批准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下列决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决定：

1. 同意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克里姆林宫管理局把收藏在国家珍品库的苏联贵金属、宝石、钻石以及克里姆林宫兵器陈列馆的贵重物品从莫斯科运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及车里雅宾斯克。

2. 命令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立即将现有的贵金属和宝石储备，包括贵金属制品、宝石制品、贵金属锭、散碎贵金属及金银币（用于销售的部分除外）交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

3. 命令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紧急调拨必要数量的车皮供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本决定第1条规定的贵重物品使用。

4. 责成俄罗斯联邦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立即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贵重物品保管局提供必要数量的包装材料（包装箱）。

5. 命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抽调必要数量的工作人员及警卫队护送和保卫贵重品的转移。

6. 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 3 天内完成贵重物品的运出工作。

7. 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收藏在各博物馆和埃尔米塔日博物馆^① 内的贵金属制品和宝石制品，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贵重物品保管局。”

中央委员会书记

^① 设在列宁格勒的国立美术历史文化博物馆。

No06818

国防委员会“关于动员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 劳动者自愿加入民兵师”的决定

(1941年7月4日)

No.10

1941年7月4日 勿公开发表

根据劳动者的意愿和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苏维埃、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建议，国防委员会^①决定：

1. 动员20万莫斯科市民和7万莫斯科州居民加入民兵师。

动员和组建工作由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捷米耶夫^②中将领导。

为了配合莫斯科军区司令部进行动员工作，成立一个非常委员会，其成员有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书记索科洛夫、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员会书记雅科夫列夫、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州及莫斯科市委员会书记别哥夫、市商业局食品管理处处长菲利波夫、旅长奥努普里延科和普罗斯托夫中校。

2. 以区为单位动员莫斯科市的工人、职员和学生参加民兵，组建25个师。

① 苏联国防委员会是1941年6月30日成立的拥有全权的特设最高国家机构，在卫国战争期间负责领导国家一切部门及机构的活动，其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国防委员会主席为斯大林，副主席为莫洛托夫。

② 帕·阿·阿尔捷米耶夫，1938年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独立师师长。1941年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队指挥部部长。同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

7月7日前首先组建12个师。

动员组建的民兵师将冠以区的名称和番号，如：索科利尼基区第1师。

莫斯科州各区组建独立的分队和部队，按照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指示将其合编入莫斯科市民兵师。

3. 为了领导动员劳动者参加民兵师的工作并向他们提供物资保障，各区应成立非常三人小组，组长为联共（布）区委第一书记，组员为区军事委员和区内务局局长。

4. 非常三人小组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领导下开展动员工作，随后办理动员手续的工作由区兵役委员会负责。

5. 动员17~55岁的劳动者组建民兵师。符合应征年龄但持有动员令的一等预备役军人，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兵器人民委员部、弹药人民委员部所属工厂和机床制造厂的职工及区三人小组认定完成特别重要的国防订货任务的某些企业的工人不在动员之列。

各区组建的民兵师的士兵、班长、50%的排级指挥员、40%的连级指挥员、医务人员和所有政工人员由本区的工人、职员及学生担任，其他指挥人员由工农红军干部担任。

6. 部队的军事训练按照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专门计划进行。

7. 征用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房舍（学校、俱乐部及其他房舍）作为民兵部队的营房，部队医院占用的房舍除外。

8. 利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各区资源，通过征用和各区企业自行加工制造的途径向民兵师供应汽车运输工具、摩托车和自行车、挖掘工具（锹、镐）、军用饭盒和饭锅等。

莫斯科军区司令部保证向民兵师供应武器、弹药及被服。

弹药和武器由军事供应系统提供。

9. 被动员者在参加民兵部队期间，其工资予以保留：参加民兵部队的工人领取其平均工资，职员领取其原有工资，大学生照拿

奖学金，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41 年 6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战时为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家属规定和发放补助金的办法”的命令发给集体农庄庄员家属补助金。

被动员人员如伤残或死亡，其本人及其家属同应征参加红军的人员一样享有领取抚恤金的权利。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No 06821

**立陶宛一党员就立陶宛政府和立陶宛
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可耻地临阵逃脱
给斯大林的信**

（1941年7月7日）

**关于立陶宛政府和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可耻地临阵逃脱及他们的叛卖作用**

在法西斯德国对我们的祖国进行背信弃义的军事入侵的那一天，即1941年6月22日，立陶宛政府和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不考虑疏散国家机关，也没有销毁国家最重要的文件，却可耻地、诡秘地逃出考纳斯，不知去向。

6月22日上午9时，我们考纳斯市的共产党员被召集到市委，在那里一直呆到午夜23时20分。6月22日，我们没有从市委领导和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领导那里得到任何消息。12时30分，我们从广播中听到了维·米·莫洛托夫^①的讲话，这时大家才知道，希特勒这条豺狼已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期待立陶宛政府和立陶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采取如下坚决措施：

1. 立陶宛政府和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应考虑到立

① 维·米·莫洛托夫，1930年至1941年5月6日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之后至195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后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41~1945年兼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起长时间任外交人民委员。

陶宛靠近前线，立即向立陶宛人民发表紧急呼吁书，根据维·米·莫洛托夫的讲话精神解释当前的局势。

2. 立陶宛政府和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既知道立陶宛后方不牢靠、有很多敌人（民族党人、绍利分子、民粹派分子、沃尔德马拉斯分子、阿特伊京尼克分子、“铁狼”及所有第五纵队^①的人），同时也掌握这方面的情况，就应立即采取一系列坚决有力的措施来加强和巩固革命秩序，以对付强加给我们的战争。

3. 顺便提一下，战争前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人员和政府就对人民的敌人实行腐朽的民族主义政策。他们把绍利分子视为不伤害人的、温顺的小羊羔。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立陶宛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收到的报告（见给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负责人事工作的书记格里金的报告和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格拉德科同志的报告）一概不理不睬，却对我们这些联共（布）中央派来的共产党员说：“安静点”、“慎重些”。

今年6月14日在立陶宛进行的强制迁出和逮捕社会危险分子的战役太迟了，搞得糟透了。因为这场战役没有准备，组织不力，抓的多是次要人物，实际上第五纵队的反革命骨干分子一个也没有碰。

4. 立陶宛政府和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党、共青团和苏维埃社会的积极分子，把他们安排在最重要的目标上和重要的地段上，要善于用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领导他们。

5. 立陶宛政府和党的领导人面对危险的形势，应当把儿童、妇女及老年人转移到安全的后方，以解除那些能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恶棍及共和国内部的第五纵队作斗争的人的后顾之忧。然而根本没

^① 在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对潜伏在后方、反对合法的人民阵线政府的叛徒、奸细和破坏分子的称谓。当时组织进攻首都马德里的叛军将领称他们有4支纵队正向马德里进发，而“第五纵队”已在城内接应，“第五纵队”之名由此产生，后以此专指反对合法政府的叛徒和内奸。

有采取这样的措施。立陶宛政府和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在战争的第一天便走上了可耻的叛卖之路，从此越滑越远。各地和各县的共产党员无法同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取得电话联系。人们也许认为，他们在忙于把自己的家属悄悄从考纳斯送到莫斯科，而把对党、对人民、对整个国家所负的责任和义务置于脑后。6月22日15时，立陶宛政府和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编组了一列客车撤离自己的家属。

考纳斯城市不大，警觉的居民看到一串政府汽车以最快的速度朝车站方向驶去，车上有妇女、孩子、老人及行李箱。这使居民人心涣散，他们也开始自发地向车站缓缓走去。

6月22日16时，车站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以中央委员会各位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与苏联人民委员会特派员波兹尼亚科夫为首的所有政府官员、中央委员、立陶宛中央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都站在考纳斯车站的站台上，送自己的家属去莫斯科，就像送他们去疗养，就差没有给出发者献花。所有这一切聚集在车站上的人都看在眼里。

6月22日19时，立陶宛政府和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领导人同他们的亲信乘坐自己的汽车卑鄙无耻地逃离了考纳斯，向德文斯克方向驶去。关于这次逃跑，除了我们这些在市委坐等的共产党员外，考纳斯的所有居民都知道。

一小时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也离开了考纳斯，民警全部撤离岗位。他们把所有家具，甚至把床和床垫都装上汽车，步政府的后尘，离开考纳斯市，朝乌强方^①向驶去。这一令人发指的场面在居民中引起极大的混乱和恐慌。

6月22日23时20分，考纳斯市委第一书记格里戈拉维丘斯

^① 今乌泰纳。

向我们下达命令（用立陶宛语）：立即从考纳斯向乌强方向出发，健康者步行，病人和体弱者坐汽车和公共汽车。

在接到这个命令之前，我们已经配备了步枪，组建了保卫最重要的目标和维护革命秩序的小组。向乌强转移的命令对我们来说既感到意外又不理解，再说我们在市委等候，不知道真实情况和向乌强进发的目的，因为市委领导和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领导没有向我们透露消息。我们还认为是去突击建立革命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市委领导继承了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和政府的可耻的卖国政策，例如：

1. 市委领导没有明确解释向乌强转移的原因，没有下达明确的任务。

2. 市委领导没有带领共产党员向乌强进行，而是强制他们步行，自己却乘车追赶政府去了。

3. 无耻地欺骗共产党员，让我们步行，答应到市郊用车把我们捎上。

4. 把基层党的积极分子（基层党组织书记、党的组织工作者、共青团积极分子）全部留在市内，没有给他们下达任何任务和规定任何目标，显然，把他们留下，无人领导，只能让德国法西斯消灭掉。

就这样，在战争的第一天，无能的立陶宛政府领导人和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没有发射一颗炮弹，没有闻到敌人的火药味便像惊弓之鸟一样可耻地逃跑了，向德国法西斯出卖了党、出卖了人民。结果他们比臭名昭著的前波兰倒霉的统治者或现在的罗马尼亚执政者还要坏百倍。即使需要撤退，也应该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撤退，像列宁教导我们的那样，像你，斯大林同志，孜孜不倦教导我们的那样，像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教导我们的那样，实行有组织的撤退，而这些既可怜又可耻的胆小鬼、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叛徒只求自己逃命。

5. 没有进行任何组织工作来疏散国家机关、财产、儿童、妇女及老人。惊恐不安的和平居民得知政府和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领导人的叛卖行为后，各自逃奔他乡，以保全自己的性命。附近居民区及城市的居民看到考纳斯的居民张皇失措和无组织撤离的情景，也自发地跟他们一起涌向拉脱维亚的领土，给拉脱维亚人造成不必要的惊慌。

6. 立陶宛领导人不是同作战部队一起有组织、有秩序地撤退，而是首先乘车匆匆逃命，紧随其后的是民警机关，这样就给立陶宛的反革命匪帮和以空投伞兵为主的整个第五纵队提供了行动自由。同时，考纳斯和整个立陶宛接连几天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6月23~24日，反革命分子组织了战斗队，吸收5年级的中学生参加，担任巡逻和阻截外逃居民的任务。

7. 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应当派共产党员从事地下工作，在法西斯占领区制造混乱并破坏其后方。当然，我们这些受联共（布）中央指派的共产党员语言不通，做地下工作会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熟悉当地的环境和居民，我们认为，打败敌人，破坏法西斯后方是光荣的。

8. 我们的领导人在狼狈逃跑时，把所有一切都留给了德国人：发电站、电台、枢纽站、牲畜，等等，等等。此外，这些领导者在逃走时还丢下了高频通讯工具——直达电报（根据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德米特洛维奇同志的举报）。大多数立陶宛领导人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推行腐朽的政策。至于联共（布）中央派来的某些领导人，如：格里金、尼基京、舒皮科夫、祖博夫等人则喜好阿谀奉承并且胆小如鼠。他们的错误不仅在于没有及时制止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人怯懦惊慌的行为，而且还当了他们的尾巴，可耻地同他们一起逃跑了。

当然，这一逃跑事件的首要责任者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特派员波兹尼亚科夫。此人在立陶宛做了六七年的领导工作，过着自由自在养尊处优的生活，处世圆滑，心宽体胖，丧失了布尔什维克的嗅觉和革命警惕性。他把他原有的共产主义信仰丢得一干二净。他领导了这次可耻的、罪恶的临阵脱逃行动。

现在，这些可耻的领导人已经在苏联的领土上躲藏起来，他们害怕莫斯科，害怕党。是的，他们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们应当对党、对苏联人民作出交待。

立陶宛战线出现这样大的缺口，主要应归罪于立陶宛政府和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领导人的可耻逃跑。

联共（布）党员（1925年入党）

党证号：0038302

C. 博洛茨基

1941年7月7日

住址：高尔基大街14楼32室

上述事实立陶宛工作的苏共党员可以证实，他们是：丹尼林、M.И. 塔拉索夫、H.A. 皮谢耶夫、A.A. 库斯科夫、季亚科诺夫、П.Ф. 皮谢尔克、德米特洛维奇、迈斯基等人。

C. 博洛茨基

同时我请求派我上前线，保卫亲爱的祖国。过去，我是一个放牧人和雇农，当过红军志愿兵，曾是政工人员。现在，我是电气工程师，身体健康，1902年生人。苏维埃政权把我培育成人，共青团教育了我，布尔什维克党锻炼了我的坚强性、坚定性和对社会主

义祖国的无限忠诚。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我将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来到莫斯科后，我现在还没有同党的基层组织取得联系，因此我向您请求，请求您满足我的愿望。

C. 博洛茨基

№06815

赫鲁晓夫^① 就销毁机器
拖拉机站及无法转移的其他设备
给联共（布）中央的建议

（1941年7月9日）

基辅市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马林科夫^② 同志

我认为，必须更准确地规定何时销毁机器拖拉机站的财产及无法转移的其他设备。现提出如下建议：

1. 距敌军 100~150 公里地区的地方组织应当立即着手销毁所有的联合收割机、转臂收割机、扬谷机等农业机械。拖拉机应照常转移到内地，红军后撤部队用不上的、以及因某种原因不能转移的拖拉机应立即销毁。

2. 在该地区应立即向集体农庄庄员发放保险金、集体农庄所有剩余的粮食储备和其他储备。

3. 应立即将该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犍牛、马驹等所有牲畜转移。红军后撤部队需要的役马在距敌军 10~30 公里时再转

① 尼·谢·赫鲁晓夫，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1938年1月至1947年3月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41年6月起历任西南方面军、西南方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将军衔。

② 格·马·马林科夫，1939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1941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41年6月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主管研制新武器工作。

移。坚决禁止沿着有过往部队的路转移牲畜，而应沿着庄稼地、甜菜地以及红军不走的路转移。

4. 该地区集体农庄养畜场和国营农场的猪应当宰杀掉。肉和油送给部队、集体农庄庄员、城市里的工人、军队医院、医院、工厂学校的学生等。留一定数量的生猪供过往的红军部队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饲养的禽类屠宰后分给部队、集体农庄庄员和工人。

5. 距敌军 100~150 公里地区的地方政权机关经与军队指挥机关协商可自行作出决定，将那些已装上车皮但不能运走的贵重设备连车带货一同销毁。之所以要向军事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下达这样的指示，是因为我们发生过这种情况，如：部分在利沃夫装上贵重货物的军用列车落到了敌军手里，因为敌军切断了这些军用列车的道路。

6. 在距敌军 100~150 公里的地区应当销毁红军部队被迫撤退时未能转移的工厂的全部重要设备、仓库里的粮食、商品等。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赫鲁晓夫

№06816

斯大林致赫鲁晓夫

(1941年7月10日)

下午2时

基辅 赫鲁晓夫

(1) 您关于销毁所有财产的建议违背了斯大林同志讲话^①的指示精神，斯大林同志在讲话中说的是在红军部队被迫撤退时销毁所有贵重财产、您的建议则要求在距敌军100~150公里的地区内，不管前线事态如何，立即销毁所有贵重财产、粮食及牲畜。

这样的措施有可能涣散民心，引起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使红军后方陷入混乱状态，在军队和居民中制造必须撤退的情绪，而不是给敌人以反击的决心。

(2) 国防委员会责成您在部队打算撤退时，而且必须是在部队撤退的情况下，在距前线70俄里的地区转移所有的成年男性居民、役畜、粮食、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照常向东部进行疏散。无法转移的东西应全部销毁，但不包括留下的居民所必需的禽类、羊及粮食等。至于说把所有这些财产分给部队，我们坚决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有可能使部队变为趁火打劫的强盗。

^① 指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发表的广播演说。在演说中，斯大林提出：“当红军部队不得不撤退时，必须运走铁路上的全部车辆，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升燃料。……凡是不能运走的一切贵重物资，其中包括有色金属、粮食和燃料等，都应当绝对销毁”。（《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266页，人民出版社，1962。）

（3）发电站不要炸毁，为使发电站长期不能使用，应把所有重要部件卸下来，没有这些部件发电站就不能运转。

（4）自来水管道不要炸毁。

（5）工厂不要炸毁，但应把设备上的重要零部件、机床等卸下来，以便使工厂长期不能恢复生产。

（6）我军向第聂伯河左岸撤退后，应将所有桥梁炸毁。

（7）仓库，尤其是炮兵仓库必须转移，无法转移的，炸掉。

（8）至于 70 俄里以外、敌军暂时还构不成直接威胁的地区，工厂转移应提前进行，主要是将机床和其他最重要的设备运出。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06814

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白俄罗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疏散工作的总结

（1941年8月18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约·维·斯大林同志

83个最重要的企业已全部从白俄罗斯疏散。大型企业的设备、物资、人员全部疏散并已在苏联的其他城市恢复生产。这些企业包括：机床制造厂、戈梅利农机制造厂、眼镜厂、机车修理厂、胶合板厂。459莫吉廖夫航空工厂疏散到古比雪夫；运出400多台机床、全部金属、工具、电动机、电缆。熟练工人及工程技术人员全部撤离。奥尔沙亚麻联合企业、克里切夫水泥厂、船舶修理厂、铸管厂等也全部转移。

此外，大量中小企业（酒清厂、亚麻加工厂、砖厂），工业合作社设备及物资也进行了疏散。

其中重要工艺设备有：

1. 金属加工机床：	3201 台
2. 生产技术设备（机床和机器 - 9957 台）其中：	
(1) 纺织机	975 台
(2) 缝纫机	2650 台
(3) 制革制鞋机	568 台
(4) 木材加工、火柴、造纸工业机器	486 台
(5) 针织机	4740 台

(6) 其他机器	538 台
3. 3.2 万千瓦涡轮发电机	18 台
4. 电动机（不带发动机及单机传动装置）	3664 台
5. 5.8 万千瓦变压器	69 台
6. 电力电缆	44 千米
7. 有色金属	842 吨

在复杂的环境下，经过巨大的努力终于将米卡舍维奇胶合板厂的压力机运出。这些机器和设备已经在其他地方安装好并投入使用。

粮食

1.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曾有粮食	151475 吨
其中面粉	67913 吨
2. 运往雅罗斯拉夫尔、莫斯科等州	44765 吨
3. 销毁	42500 吨
4. 转给部队	10350 吨
5. 供给州及区中心	26115 吨
6. 留在敌后（尚未收到销毁报告）	2745 吨

疏散的牲畜、拖拉机及联合收割机

7. 疏散各种牲畜共	60 万头
其中牛	34 万头
8. 疏散拖拉机	4000 台
此外转交工农红军	300 台
9. 疏散康拜因	400 台
10. 疏散脱谷机	150 台

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及粮食的转移工作仍在进行。

档案和有价证券

在明斯克的国家银行白俄罗斯分行和9个州银行的货币及有价证券已全部转移（布列斯特情况不明）。储蓄所的情况也是如此。

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党务档案已全部转移到乌法。秘密档案以及党的干部登记卷宗也已全部运走。

在白俄罗斯共产党（布）的212个市委和区委中，有201个市委和区委的党员登记卡及其他保密材料已经转移并通过联共（布）中央运往某地保存。1个区委将文件就地销毁，3个区委的文件尚未转移，7个区委情况不明。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①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也已全部转移。

许多人民委员部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将秘密档案销毁。

明斯克的企业未能转移出去，因为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下，交通被切断，整座城市被炸毁，已成为一片火海。

基洛夫机床制造厂在战争初期遭到彻底破坏并被烧毁。伏罗希洛夫工厂的设备被损坏。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许多人民委员部的档案仍在明斯克，没有销毁。这是由于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主席表现出不能容忍的张皇失措造成的。相互委托转移或销毁这批档案，但没有监督检查。现在案件正在调查。我于1941年6月27日派一支部队前往销毁这批档案，但已无法进入明斯克。

疏散工作甚至在德军占领的各州也在继续进行。集体农庄庄员

^① 最早称“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即“契卡”。20年代曾先后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34年改为国家安全总局。1941年2月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同年7月又改回原称国家安全总局。

正在通过波列西耶把牲畜赶到我们这里。

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波诺马连科^①

编号 447/Φ

1941 年 8 月 18 日

① 潘·康·波诺马连科，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1938 年 6 月起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39 年 9 月为西部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41 年 7 月先后任西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是苏联游击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人之一，1942 年 5 月起任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游击运动中央参谋部参谋长，中将军衔。

№06817

斯大林州一集体农庄庄员就敖德萨州的 领导人的惊慌失措给斯大林的信

(1941年8月18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①：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德国法西斯的威胁之中，背信弃义的德国法西斯已经入侵我们的祖国。对法西斯应毫不留情！我们，苏联爱国者，要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为我们的妻子儿女向德国法西斯讨还血债。德国法西斯将在我们苏维埃钢铁般的拳头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当我们面临入侵我们祖国的背信弃义的侵略者威胁时，我们只好暂时舍弃属于我们国家的城市和乡村，我们党及非党布尔什维克不应惊慌失措，我们应当振奋起民族精神，打败德国法西斯豺狼。

我们应当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保卫我们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但是有许多党和苏维埃组织没有考虑到目前形势的重要性，却在国内制造恐慌。

敖德萨州的领导人不仅在敖德萨市，而且在整个州制造了恐慌。早在1941年7月22日便开始将几乎是全体居民疏散，田里留下了几千公顷尚未收割的庄稼，这是从未有过的大丰收。敌军入侵的地区距离敖德萨州还有几百公里，完全可以把庄稼收割完毕并把粮食运到大后方。但是，许多党员没有振奋起民族精神，却带着国

^① 即斯大林。

家和集体农庄的钱，开车去内地了。

敖德萨市的许多商业、金融和银行机构的工作人员没有向本单位报告，也没有得到外出许可证，洗劫了商店和其他机关后，首先驱车逃往马里乌波尔。在马里乌波尔的敖德萨逃难者中携带二万以上卢布的人不在少数。靠诚实劳动是挣不到这么多钱的。

从敖德萨州集体农庄赶出的牲畜不加清点。任其乱跑，一窝蜂似地被赶到马里乌波尔。没有想到为奶牛带上路上所用的必要的设备及器皿，以便挤牛奶、制作黄油和奶酪，并在途中将这些奶制品交给居民区的收购站或商业机构。这些事都没有做。奶牛在路上也大伤元气，而我们国家却需要食品。

许多从敖萨萨跑出来的人不去登记到处游荡。

还有许多地痞捞足了钱，带上他的家人和财产，有的甚至还带上他的室内犬乘车离去，路上还打着伞，而工厂学校、技工学校及铁路学校几千名 14 岁的学生却排队步行，由于天气炎热浑身是汗，泪水直流。

因此，老百姓怨声载道，时而听人说：“谁兜里有钱，谁就可以乘车走，而孩子们——学生们只能步行。”

许多攫取到商品和钞票的敖德萨居民到达马里乌波尔后，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是受难者，我们是难民。与此同时，他们却以投机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商品。对这些没有被本单位解雇，又没有向本单位报到的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应当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

现在，我们的兄弟在卫国战争的前线上流血牺牲，而危言惑众和临阵脱逃的人却在制造恐慌和分裂。应当同这种人进行无情的斗争。

就谈这些，我想说的是，由于我的文化低，有可能说得不对，也可能我犯了大错误，但我是苏联公民，如果需要，我将为苏维埃

祖国献出我的生命，因此我决定给我的政府写信，反映亟待解决的问题。

知道这封信的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您收到这封信，那么就还有您，还有我在其中写信的这间屋子。如果这封信有政治错误，那么让苏维埃法律严惩我好了。

伊·科瓦廖夫

1941年8月18日

我的地址：斯大林州马里乌波尔市别尔达农庄86号信箱，马·高尔基集体农庄。伊万·伊万诺维奇·科瓦廖夫。

【专题说明】

关于斯摩棱斯克战役

(1941年7~9月)

斯摩棱斯克战役，是苏德战争初期的一次大规模交战。1941年7月中旬，德军以中央集团军群近63个师的兵力，向莫斯科以西360公里的斯摩棱斯克发动钳形攻势。苏军先后以数个方面军投入防御并伺机组织反击，由苏联元帅铁木辛哥指挥的西方面军，在整个战役中承受了德军的巨大压力。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苏军虽然顽强防御并进行反攻，但终究未能完全阻止住兵力占优势的德军的进攻。此次交战，苏军付出重大人员伤亡，首都莫斯科也暴露于德军进攻正面；但长达两个月的抵抗使苏军指挥部获得了组织莫斯科防御的时间，并为取得稍后的莫斯科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本专题汇集的文件涵盖了斯摩棱斯克战役的全过程。这些文件包括苏联国防委员会主要成员斯大林、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副国防人民委员朱可夫等人与前线部队指挥员的直通电报记录，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命令，作战部队的作战总结等等。对这次交战，苏联国防委员会相当重视，斯大林不仅亲自过问战役情况，而且直接干预部队的调动和部署，他要求铁木辛哥“从小打小闹转向大兵团作战”，下令骑兵在24小时内越过战线，深入敌后，甚至对在什么地方、在哪条公路布雷，也给予详细的指示。另一方面，由于备战不力，加之德军兵

力占优势，前线部队的情况相当混乱：联络中断，指挥系统失灵；部队严重缺员，情绪低落，后备部队士兵由于平时生活待遇很差，又没有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派上前线后，临阵逃跑、主动投降的情况时有发生；对前线部队的必要的军用物资的供应跟不上，新补充给铁木辛哥的步兵师，甚至找不到一份可用的军用地图。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都是导致苏军此次战役失利的重要因素。另外，文件中对敌占区居民情绪和状况的记述，也为读者提供了难得的了解战争年代苏联普通居民心态的材料。

(本专题文件由吴伟编辑并校注，
任建华、解建群翻译)

№06840

国防委员会关于组织斯摩棱斯克市 保卫战的第二号命令

(1941年7月16日)

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国防委员会^①获悉，西方面军各部队指挥人员中弥漫着撤退情绪，在有关我军撤出斯摩棱斯克和放弃该市给敌人的问题上，态度轻率。如果上述情报属实，则国防委员会认为，指挥人员中的这种情绪，不啻是一种公开背叛祖国的犯罪行为。

国防委员会责成你们，以钢铁般的手段清除这种有辱于红军战旗的情绪，并传令保卫斯摩棱斯克的各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将斯摩棱斯克让给敌人。

国防委员会命令你们：

(1) 立即组织对斯摩棱斯克的强有力的防御，使之能够击退无耻敌人的任何进攻；

(2) 为保卫斯摩棱斯克战斗到最后一息，决不把斯摩棱斯克让给敌人；未经大本营^②特别许可，不准从斯摩棱斯克调出部队；

① 苏联国防委员会是1941年6月30日成立的拥有全权的特设最高国家机构，在卫国战争期间负责领导国家一切部门及机构的活动，其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副主席为莫洛托夫。

② 1941年6月23日组建的苏联最高战略领导和指挥机构。最初称统帅部大本营，由当时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任主席；同年7月改称为总统帅部大本营，斯大林任主席；8月8日，又改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3) 西方面军的所有部队都要以积极行动来支援斯摩棱斯克保卫战。

国防委员会命令西方方向总司令铁木辛哥^①同志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加宁^②同志亲自负责斯摩棱斯克的防御。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① 谢·康·铁木辛哥，苏军著名将领。1938年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次年9月率部队进入波兰；1940年调任西北方面军司令员，指挥部队取得苏芬战争胜利，同年晋升苏联元帅，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苏德战争爆发后，曾任统帅部大本营主席，但很快被斯大林取代；1941年7月至9月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西方方向总司令和西方面军司令员，后历任西南方向总司令、西南方面军司令员、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西北方面军司令员。

② 尼·阿·布尔加宁，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1938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西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1944年5月获上将军衔。

№06841

斯大林就斯摩棱斯克地区实行反击 的准备工作与铁木辛哥的直通电报记录

(1941年7月20日)

绝密

斯大林：你好！迄今为止，你们每次调两、三个师增援前线的通常做法，并未取得任何实效。如今该放弃这种战术了，并开始在两侧翼集中七、八个师及骑兵，从而形成拳头。要选择作战方向，并迫使敌人按照我们的指挥意图改变其兵力部署。譬如说，是否可抽调霍缅科的3个师，奥廖尔的3个师，1个坦克师（该师已在亚尔采沃市郊作战）和1个摩托化师，或许再从预备集团军中抽调出两、三个师，还要加上骑兵，把这组兵力全部投到斯摩棱斯克地区，以粉碎和赶走敌人，把敌人从这一地区赶到奥尔沙那边。我想，我们应该从小打小闹转向大兵团作战了。我说完了。

铁木辛哥：我认为，实现您所阐述的意图，是正确的。最新的资料也表明，敌人的坦克部队和摩托化师正在全力从亚尔采沃西北面向斯摩棱斯克方向运动，其坦克群的主体部分依然集结在叶利尼亚，用坦克和机械化步兵直接封锁着斯摩棱斯克。自然，这首先对斯摩棱斯克构成威胁，同时也在一条狭窄的战线上直接威胁着亚尔采沃。您建议实行打击，即对斯摩棱斯克敌人进行强有力的打击，无需长途迂回就会产生有利于我们的决定性影响。我的话完了。

No06842

朱可夫^①就出动骑兵袭击敌后 问题与戈罗多维科夫^②的直通电报记录

(1941年7月21日)

绝密

朱可夫大将：你好，戈罗多维科夫同志！

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命令我向你传达以下事项：

(1) 出动骑兵部队赴敌后行动，其路线另下达指令规定。对于派骑兵到博布鲁伊斯克以东的地方去，我们极为担心，因为据所有材料分析在博布鲁伊斯克、普罗波伊斯克一线，有敌人的密集兵力在活动。

(2) 如果你们不能在1941年7月22日让骑兵部队穿越前线，那么必须让部队在7月23日拂晓前越过前线。

(3) 目前，对骑兵部队不提供任何特别的空中保障，这是为了不致引起敌人对骑兵部队的行动区域的注意。敌人如果出动空军来打击我骑兵部队，那时就必须向我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为此，骑兵部队要熟练掌握呼叫歼击航空兵救援的方法，即通过梯次配置至第

① 格·康·朱可夫，苏联著名将领。1939年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1941年1~7月底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兼苏军总参谋长。同年8月调任后备队方面军司令员，并率领部队参加斯摩棱斯克战役，在叶列尼亚地区对德军实施了成功的反击。

② 奥·伊·戈罗多维科夫，1938年任苏军骑兵监察员，1941年6月任苏军骑兵总监和骑兵司令员，并作为大本营的代表任驻西南方面军骑兵代表。

21 集团军司令部的通讯中继站进行联络。

(4) 骑兵部队不要携带任何多余和笨重的物件，要把这些东西留在列奇察或者戈梅利地区。为了能够在没有道路的森林或沼泽中行进，骑兵部队必须轻装。

(5) 我将命令给你们使用的联络飞机于今天傍晚或者 7 月 22 日清晨降落在戈梅利机场。我说完了。

戈罗多维科夫上将：你好！

我根本就没打算让骑兵部队到博布鲁伊斯克以东的地方去，我主张让部队按照指令规定的路线行动。但是第 21 集团军的战报称，敌人的一股重兵——3 万步兵和骑兵正在博布鲁伊斯克西南面、特别是格卢斯克地区集结，在南面至科舍维奇一线还有一个步兵团。因此，我曾请求对博布鲁伊斯克和格卢斯克地区的敌人进行轰炸，以支援我们。我已经采取了减轻骑兵部队多余装备的措施。由于第 32 骑兵师的 11 个梯队尚未到达，也许清晨才能到达，所以 7 月 23 日拂晓让骑兵部队出发，困难很大。我将采取一切措施，于 7 月 23 日拂晓先派出一支骑兵，而后最迟不晚于 7 月 23 日傍晚，尽全力争取让骑兵部队出发。

关于指令中所说的让骑兵部队向斯摩棱斯克西南面进发的问题，此刻我很难向您报告什么，因为只有根据战斗的进程和那时前线的形势才能判断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派出骑兵部队。我认为，骑兵部队的基本任务在于占据莫吉廖夫、奥尔沙一带的交通线。请您在骑兵部队出发时命令第 21 集团军向博布鲁伊斯克和格卢斯克方向发起进攻。我说完了。

朱可夫：你对任务的理解是正确的。关于让库兹涅佐夫^①发起进攻问题，您与他亲自商谈好了，转告他：大本营要求他采取特别积极的行动，尤其是在骑兵部队穿越敌阵之际。穿越时间，我建议夜间至拂晓以前。骑兵部队出发时，要找好向导，从当地党员居民中或经过严格审查的非党人士中挑选，他们必须熟悉所有的林中路径，最好从狩猎者中挑选向导。

我再说一遍，我将于今天傍晚或明天清晨派去联络飞机。联络飞机的任务是：与转战各阵地和各地区的骑兵部队保持联络。在联络中获取情报，希望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为了与骑兵部队联络，请编制专门的密码表，并发给他们；还请你们绘制出带坐标的地图。应通过这一特定的密码和带坐标的地图保持联络和进行对话。

请你们检查一下，让骑兵部队获得压缩食品的供应。要警告巴茨凯列维奇^②和各师师长，切勿与敌人打旷日持久的仗。如果遇到敌人的重兵，可以避开它，还是要按照指令规定的目标及任务行动。都清楚了吗？

戈罗多维科夫：我都明白、都清楚了。我将采取一切措施。关于密码表，我在莫斯科时就与邮电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将其编制出来了，米雅切夫上校应该飞到我这里来，但至今还未到。现在供应骑兵的，不是压缩食品，而是香肠和罐头，但完全可以满足轻装和营养的要求。我请求让米雅切夫快点来。我的话完了。再见！

朱可夫：好吧！我立即派米雅切夫去。再见，祝您成功！

① 费·伊·库兹涅佐夫，1938年7月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员，1941年6月先后任西北方面军司令、第21集团军司令、西方面军副司令员等，1941年获上将军衔。

② 应为А.И.巴茨卡列维奇，当时任第32骑兵师师长。

No 06843

斯大林就西方面军情况与 沙波什尼科夫^①的直通电报记录

(1941年7月26日)

绝密

斯大林：西方面军各集团军有什么新情况？

沙波什尼科夫：您好，斯大林同志。向您报告：尚未收到所有集团军的汇报，但可以报告一些最主要情况。

杜霍夫希纳，亚尔采沃集群，霍缅科同志部队集群，今天，7月26日，主要是第107坦克师在列捷姆尼察、科雷特尼亚、列利莫沃地区进行了战斗。第166步兵师从两翼给予了配合。第107坦克师遭到敌摩托化师从西南方向发起的攻击。大概是在20日，敌摩托化师一部和大约一个坦克团从西面向埃尔霍夫村进攻。在敌人的攻击下，我坦克师缓缓后撤，停留在叶森纳亚、列利莫沃、科雷特尼亚一线。霍缅科同志的部队。今天，26日^②，并未参加战斗，只有第250步兵师在南面的杰梅希村介入了战斗。

斯大林：请简要地谈谈各集团军的主要情况。

沙波什尼科夫：是！

① 鲍·米·沙波什尼科夫，苏联著名将领。1937年5月任苏军总参谋长，1940年获苏联元帅军衔。同年8月调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1941年成为总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并复任总参谋长。当时他被派往西方面军，以加强对该方面军的领导。

② 原文如此。

为了协调霍缅科部队集群的作战行动，并激励其作战，已派叶廖缅科^①同志前往该集群。加里宁^②部队集群的第91、89步兵师在沃皮河西岸展开进攻，并向西推进了15公里，但在遭到敌人坦克和机械化步兵的反冲击之后，被迫撤至沃皮河东岸，在那里设防固守，击毁坦克约25辆。敌军多次试图偷渡沃皮河，罗科索夫斯基的^③部队情况无变化。第16和第20集团军的战报尚未收到。根据今晨的战报，从北面掩护斯摩棱斯克的第5机械化军，应当向沃布尼村进发，以便包围德军第5师的左翼。现在谈谈卡恰洛夫^④部队集群。

今天一整天，该部队集群都在法捷耶夫、布德和尼古利诺一线，即在沃西柯沃和德米特里耶夫卡车站一带。敌军凭借强大的迫击炮炮火和隐蔽在地面以下的坦克发射的炮火，阻止我部队向前推进。在尼古利诺村的北面，发现了大约一个营。已命令卡恰洛夫不要正面进攻，而要迂回到敌人的侧翼去。在叶利尼亚，德国人在波格丹诺夫^⑤防御前沿撕开的口子尚未堵上，因为敌军在亚尔采沃和杜霍夫希纳一带集结的兵力，大约有两个坦克师和两个或许是三个摩托化师，鉴于敌人一直向杜霍夫希纳调集兵力，敌人的意图可能是要对亚尔采沃发起攻击，进而向东南方向进犯。因此，总司令部决定，7月26~27日，把辖有第108师和第64师的新编第44

① 安·伊·叶廖缅科，1938年任骑兵军军长，1940年12月任远东第一集团军司令员。1941年6月任西方面军副司令员，指挥部队参加了斯摩棱斯克战役。

② С.А. 加里宁，1941年7月任预备集团军司令员。他与著名的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米·伊·加里宁不是同一个人。

③ 康·康·罗科索夫斯基，苏军将领，出生于波兰。三十年代曾任骑兵师长和军长。1940年任机械化第9军军长。自1941年7月起任第16集团军司令员。

④ 弗·雅·卡恰洛夫，1941年6月任第28集团军司令员，在斯摩棱斯克方向作战，8月4日阵亡。

⑤ И.А. 波格丹诺夫，当时任第37集团军司令员。

军加以调动：第 64 步兵师调至斯维谢沃车站及以南一带；第 108 师则渡过第聂伯河，部署在波德罗谢、菲亚利科维奇、扎博里耶一带。第 13 集团军、第 21 集团军的战报尚未收到。令人不安的是，第 15 集团军参谋长拒绝今夜给莫吉廖夫军供应炮弹，至于第 22 集团军，其第 55 军尚未冲出包围圈。在集团军的左翼，即洛瓦季河对岸的新阵地，敌军以近百辆装甲车突破了第 186 师的防线，并深入达五六公里。我眼下能报告的就是这些。其他各集团军的战报，我想很快就会收到。

斯大林：方面军和总司令部与一些集团军联系不上，与另一些集团军联系很差和不够经常，这是很糟糕的。甚至中国军队和波斯军队都懂得保持联系是治军的要务，难道我们连波斯人和中国人都不如吗？联系不上怎么指挥部队？各集团军应在 20 点之前送来战报。现在，已是（凌晨）3 点，战报尚未收到。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胡闹、这种耻辱了！我谨责成您本人和总司令部，命令各集团军和各师尊重通讯工作，与方面军保持经常联系，按时提交战报。要么是消灭通讯工作中的马虎作风，要么是大本营被迫采取断然措施。我说完了。

沙波什尼科夫：是，知道了。将尽全力执行您的指示。向您报告：战报迟迟报不上来的主要原因是，各师从团里收集材料，各集团军从师里收集材料都要很长时间。当然，这不是理由。总司令部将采取硬性措施。我的话完了。

斯大林：请回答一个问题：亚尔采沃和斯摩棱斯克现在是在谁的手里？

沙波什尼科夫：根据早晨的战报看，斯摩棱斯克的北部和西北部，直到第聂伯河，仍在我们掌握之中；至于东部，我们正从北面向那里发动进攻；南部和西南部则被敌人占领。亚尔采沃也有一部分被敌人占领。

斯大林：正在进攻的是哪支部队？

沙波什尼科夫：向您报告：是第129步兵师。此外，第46步兵师一部也从北面加入了进攻。关于亚尔采沃，其南部现为中间地带，北部则被小股敌人占据，不过，他们正受到罗科索夫斯基同志的部队依托建筑物进行的阻击。

斯大林：您说的是亚尔采沃市还是亚尔采沃车站？那么，亚尔采沃车站又如何呢？完了。

沙波什尼科夫：我刚才报告的是亚尔采沃市的情况。亚尔采沃车站不在我们手里。我们的部队驻在沃皮河的东岸。

请允许我再补充一点。今天，敌军从韦利日出发，经伊利伊诺，沿公路向托罗佩茨进发，企图渡过西德维纳河。马斯连尼科夫^①同志决定派出一个加强营，但鉴于这一方向的重要性，总司令下令向这里派出一个步兵师，还打算把马斯连尼科夫的一个师派上去，留下一个师从西面护卫托罗佩茨，以使用两个师向南向杰米多夫展开进攻。这一计划已报大本营审批。此外，总司令指示我向您报告：希望能从组建好的部队中抽调两个骑兵师，派往托罗佩茨方向，用于加强第22集团军已暴露的左翼。我说完了。

斯大林：将马上对你们的建议作出答复。完了。

沙波什尼科夫：是！报告完毕。

^① 伊·伊·马斯连尼科夫，1941~1942年间，先后任第29集团军和第39集团军司令员。在斯摩棱斯克防御战中指挥有方。

№06844

国防委员会关于改组方面军和 调整工农红军指挥人员的决定

(1941年7月29日)

绝密

第 ГКО-325 /CC 号

一

国防委员会决定：

1. 将西方面军部队和西方向总司令部所属部队合并成西方面军，苏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谢·康·铁木辛哥同志既是西方向总司令，同时又是西方面军司令员。
2. 任命安·伊·叶廖缅科中将为西方面军副司令，协助铁木辛哥同志。

二

中央方面军直属最高统帅部。

三

1. 对维亚泽姆斯基-勒热夫一线的预备集团军实行统一指挥，任命副国防人民委员格·康·朱可夫大将为这些集团军的司令员，同时撤消原有的南、北两个战区，这一线配置的所有集团军都直接隶

属于司令员。

2. 解除帕·阿·阿尔捷米耶夫^① 中将同志的预备集团军南战区司令职务，任命他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兼任莫扎伊斯克防线预备集群司令员。

3. 解除 И. А. 波格丹诺夫中将同志的预备集团军北战区司令职务，任命他为维亚泽姆斯基 - 勒热夫防线预备集团军副司令员。

4. 鉴于朱可夫大将同志已被任命为维亚泽姆斯基 - 勒热夫防线预备集团军司令员，解除朱可夫同志的总参谋长职务。

5. 任命苏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波·米·沙波什尼科夫同志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6. 鉴于西方向和西方面军已实行统一指挥，将西方向司令部的多余人员和通讯工具移交给朱可夫同志，以便组建预备集团军的司令部。

7. 任命克鲁格洛夫同志^② 和波波夫同志^③ 为维亚泽姆斯基 - 勒热夫防线预备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8. 今后，维亚泽姆斯基 - 勒热夫防线预备集团军改名为预备队方面军，这些预备集团军的司令员改称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直属大本营。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① 帕·阿·阿尔捷米耶夫，1938年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独立师师长。1941年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队指挥部部长。同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

② С. И. 克鲁格洛夫，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1941年6~10月任预备队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

③ 德·米·波波夫，1940~1948年任联共（布）斯摩棱斯克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1941年7月任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后任斯摩棱斯克游击运动司令员。

№06845

斯大林就西方面军部队的防御准备工作与 铁木辛哥的直通电报记录

(1941年8月2日)

绝密

斯大林：我们感到关切的是，你们在奥尔沙-明斯克汽车公路干线上是否已布雷了？是否找到了第53师，该师现在何处？你们的部队是否已进入阵地？哪几个师落在后面？阵地上的各项工作进展如何？还有，你们是否知道，巴甫洛夫^①的一部已开往你们部队占据的阵地，他们的情况如何？上述问题，需要你们及时地通报。

铁木辛哥：设障所需的材料即将运到。一部分炸药于昨天已运到布雷区。汽车公路干线尚未布雷，因为西方面军的部队和后勤机关正在通过这条干线。

第二，第53师在第聂伯河沿岸已控制了从什克洛夫（包括什克洛夫）到莫吉廖夫（不包括莫吉廖夫）的地区。第172步兵师现已开始在莫吉廖夫地区集中，昨天傍晚已有6列运送部队的军用列车到达。昨天，第18师的先头部队已向奥尔沙-什克洛夫地区进发。第1摩托化师的先头部队已进驻托洛钦的阵地。刚才，第73师的先遣列车和第69军的指挥机关抵达斯摩棱斯克。我决定将第

^① 德·格·巴甫洛夫，1940年6月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司令员，1941年任西方面军司令员，后因指挥不力被撤职法办。

73师运到奥尔沙、克拉斯诺耶、古希诺地区。今天夜间，三列装甲车已开往斯摩棱斯克，供列梅佐夫^①调遣。列宁格勒特种兵营已到达维诺格拉多夫^②部队集中的地区。

目前，柴油奇缺。此外，急需给炮兵补充穿甲炮弹：145^③毫米口径的1.2万发，76毫米口径的7千发。

昨天，我亲自去了列梅佐夫那里，发现列梅佐夫还没有下决心布防前沿阵地。我已命令他们马上派炮兵人员和工程师对整个阵地进行勘察。现在我准备再去一趟列梅佐夫那里，直接到他们的阵地上去。

极其需要侦察机和歼击机。现在我们无法进行空中侦察，也无法对部队和重要目标集中的地方进行掩护。我请求尽快让集群空军司令来一下。

到昨天傍晚为止，没有任何巴甫洛夫的部队来到我们的阵地。

我想就通讯工作再说几句。28日夜里，敌人对斯摩棱斯克进行了数小时的轰炸，炸毁了通讯枢纽。集群司令部与集团军和莫斯科失去了联系。现在，城里的大火还在燃烧，没有人指挥救火。我手下的那个拼起来的通讯营正在紧张地工作，试图建立环绕斯摩棱斯克的通讯线路。

在通讯工作方面，需要得到您的帮助：首先，需要组建可满足集团军需要的通讯营，哪怕是一个营也好；我请求立即下令从布良斯克派来一个通讯团，供列梅佐夫调遣，他此刻只能靠汽车来回跑保持与部队的联系。

① 费·尼·列梅佐夫，1941年6月任西方面军第20集团军司令员，7月起任第13集团军司令员。

② 瓦·伊·维诺格拉多夫，1940年6月至1941年8月任机械化第7军军长，后任第30集团军副司令员。

③ 原文如此，此处应为45毫米口径。

最后一点，是地图问题。这方面太不像话了，列梅佐夫总共只有几套地图；现在第73师来了，也没有地图。您清楚了吗？

斯大林：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们将采取相应措施。我命令您：汽车公路干线必须布雷，马上从明斯克开始向奥尔沙方向布雷。明白吗？

铁木辛哥：那么，明斯克至莫吉廖夫的公路呢？是否也要布雷？

斯大林：这条路也要布雷。选定几个地方布雷，以使以后需要时按照命令引爆。明白吗？

铁木辛哥：明白。我马上布置此事，然后亲自到列梅佐夫的阵地去。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您命令特鲁别茨科依^①送给我们一份我们集群部队的运送计划，以便军用列车在各个车站都能通行无阻。

斯大林：好。我们说完了，再见！

铁木辛哥：好，一切照办，再见。

^① 尼·伊·特鲁别茨科依，当时任红军事交通局局长，总参谋部军事交通局局长。

№06846

沙波什尼科夫就预备队方面军形势与 朱可夫的直通电报记录

(1941年8月4日)

绝密

朱可夫：第一，鉴于第222步兵师已在莫斯科公路两侧展开，现将该师划归第43集团军管辖；将命令第43集团军司令将第222步兵师留在奥斯特列茨河和奥斯乔尔一带，防止敌军切断卡恰洛夫部队撤退的通道。

第二，鉴于霍缅科、加里宁和罗科索夫斯基军队集群的进攻受挫，第20和第16集团军的行动不顺利，我认为卡恰洛夫部队继续向斯摩棱斯克方向行动已无意义；由于敌人已占领了罗斯拉夫利，卡恰洛夫的处境极为不利，其部队可能会被包围。我认为，卡恰洛夫部队的左翼和主力必须立即向东转移，在别列佐夫卡、博罗克、布德、奥斯特列茨河一线构筑防线，同时与右翼的第222步兵师相呼应。卡恰洛夫部队和第222步兵师这样部署是必要的，因为第53步兵师的防线长达55公里，实际谈不上什么防线，而是徒有其名。

第三，我认为，从现在起有组织地将卡恰洛夫集群和第222步兵师的后勤机关以及炮兵用军用列车转移到第53步兵师的防线后方，是适当的。

第四，第109坦克师到达后，我决定将该师集中在库兹米尼

契-舒亚地区待命。

第五，我请求速划定西北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各自的范围。从我们这方面看，我认为第 28 集团军应当全部隶属于西北方面军，因为第 11 集团军已经靠近他们，第 27 集团军也在向他们靠拢，在这种情况下西北方面军司令部可以转移到博罗文卡车站去。这是因为，预备队方面军缺少先进的通讯手段，不可能指挥这么远的侧翼部队。

第六，我请求为我们和西方面军的每一个兵团制订出在西方面军各兵团被迫退出战斗时的准确撤退路线。否则，西方面军各兵团有可能把预备队方面军的防线搞得一塌糊涂。同时我认为，西方面军没有征得大本营同意而擅自从霍缅科、加里宁集群收编的全部炮兵部队，包括反坦克炮兵和其他炮兵部队，应当立即归还给预备队方面军，以便将这些部队在发射阵地上展开。被收编的部队清单，明日一早传给您。擅自收编的部队真不少。

我请求大本营对上述问题和意见给予答复。说完了。

沙波什尼科夫：第一，关于卡恰洛夫的处境及其下一步的任务，我将在报告大本营之后给予答复。但我认为，现在当然不能弄到被包围的境地，而且，虽然昨天位于该部右翼的第 104 坦克师稍向后撤，但这些集群的西面防线昨天都守住了。卡恰洛夫的后勤机关现在就应从罗斯拉夫利方向向东转移。

第二，我明白您关于把普罗宁的第 34 集团军划归预备队方面军的想法，您的意思是预备队方面军不仅要扩充，而且要加强，给您的指示中谈到了这一点。

第三，鉴于罗斯拉夫利被敌军占领，叶利尼亚突出部又掌握在敌军手中，从而形成了惟一的战场，大本营决定把指挥卡恰洛夫集群和第 222 步兵师作战的权力交给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这方面的指示已发出。

第四，大本营没有收到您关于叶利尼亚战斗过程的详细报告，因此请您在我们的谈话中简单通报一下，详细情况另外电告我们。

第六，^① 马林科夫同志要求向他通报火箭弹的使用情况。

关于西方面军穿越您的防线向东运动的具体路线，我将在向大本营汇报后另行通知你们。

第七，只有在大本营决定把第34集团军划归西北方面军时，才能划清西北方面军和您管辖的范围。因此，我只能在向大本营汇报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说完了。

朱可夫：第一，关于在叶利尼亚的作战情况，已于8月3日20时向您发出密码电报，此刻我手头没有地图，因此很难向您汇报。请您下令立即把密码电报译出来，呈报给您。

第二，火箭弹发射情况非常好，令人惊奇，但问题是火箭炮的数量不多。

第三，关于卡恰洛夫集群和第222步兵师的隶属问题，我已接到指示；所以我刚才汇报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已经向您表明了你对这一决定的看法，我不想扩充方面军。可是我不明白，已经派部队进入第34集团军的驻地，而且看样子还将派第27集团军去那里的西北方面军怎么办呢？我也不明白，如何指挥远在旧鲁萨、瓦尔代的侧翼部队呢？更何况在维亚济马、叶利尼亚战线正酝酿着大的事件。此外，我请您注意，第34集团军根本无法指挥，因为该集团军迄今为止还没有通讯设备，总共只有40公里的电话线。在这种情况下，请大本营对刚才所提的六个问题一并作出决定。我现在就将卡恰洛夫的后勤机关向东撤，我将命令左翼部队后撤，以免被包围。我说完了。

沙波什尼科夫：第一，您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将向大本营报

^① 原文如此，缺第五。

告，然后给您详尽的答复。

第二，现在您作出的有关卡恰洛夫的决定，我认为正确的。至于该部总的去向问题，我向大本营报告后再答复。

第三，您认为需要多少排火箭弹？

第四，现通报一下情况：第 27 骑兵师驻扎在克拉斯诺波利耶，第 52 骑兵师在波日尔、费多罗夫卡一带。我说完了。

朱可夫：向您报告：火箭弹至少需要 20 排，才够两天作战用；而现在给得太少了。如果能够多给一些，我保证仅用火箭弹就能摧毁敌军。顺便说一句，火箭弹也给我们的部队留下了神奇的印象，当第一梯队看到火箭弹爆炸时，由于惊讶直往后退。我说完了。

№06847

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就补充部队兵员问题 给斯大林的密码电报

(1941年8月15日)

绝密 (加急)

1941年8月15日发自叶利尼亚市

斯大林同志：

我们亲自检查了叶利尼亚地区的所有部队的情况。在第19、102、103、105、106、107、120师的所有部队里，都存在着严重缺员问题。

平均每师有1500~2000人；每营只有40~100人。

各级指挥机构的缺员尤为严重。一般是由中尉和少尉充任营的指挥员，由少尉和初级指挥人员充任连的指挥员。

机枪手、迫击炮手和反坦克炮手严重短缺。补充总局未做任何部队补充工作。

叶利尼亚地区的部队经受了真正的战斗考验；如果这些部队能获得补充，哪怕是达到编制的75~80%，就能成为突击部队。

我们的部队在进攻敌军经过加固的防御阵地时，使德国人遭到重创。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7月9~13日，我们在攻占的地区内埋葬被击毙的德国人尸体2500多具，俘虏105人，缴获16门火炮，击毁25门火炮、29门迫击炮、39挺重机枪、40挺轻机枪、11辆装甲车、21辆坦克、36架飞机和许多其他物资。

据俘虏供述，德军第 15 步兵师和党卫军特别师此次死伤惨重，损失巨大。

请命令补充总局优先给战斗在叶利尼亚地区的各部队补充下列人员和物资：

(1) 30000 名战士，其中包括 1000 名重机枪手、500 名迫击炮手；

(2) 5000 名初级指挥人员；

(3) 3000 名中级指挥人员；

(4) 100 名高级指挥人员，其中包括 15 名团长；

(5) 300 挺轻机枪和 200 挺重机枪，200 门迫击炮，75 门 45 毫米口径的火炮，50 门供团属炮兵用的火炮；

(6) 300 公里电话线和 50 部电话机，主要供炮兵部队使用。

朱可夫

克鲁格洛夫

电报上有斯大林的批示：

转马林科夫、夏坚科^① 同志。应尽可能给予满足。

① 叶·阿·夏坚科，1941～1943 年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兼苏军部队组建和补充总部部长。

№06819

沃罗诺夫就第24集团军在叶利尼亚市地区的 作战经验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1年8月15日)

关于第24集团军各部队1941年7月20日
至8月5日在叶利尼亚市地区的作战经验

秘密

国防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同志：

第24集团军各部队1941年7月20日至8月5日在叶利尼亚地区的作战经验，明显暴露了我军在训练上存在的主要缺点，现报告如下：

1. 步兵 各部队有很大一部分战士和初级指挥员的战术及射击训练很差；很多部队班、排、连尚未组建好。行进中射击还不得要领。在敌人的火力下跃进和匍匐前进的能力很差，前进时规定的散兵队形很快变成了一帮一伙，有时聚集成群，从而使自己处于敌人火力的攻击之下。对步兵没有进行必须相信自己手中武器威力的教育。由于无知和不熟练，常常一气把弹药全部打光，结果使步枪、机枪、手榴弹和迫击炮的命中率很低，因此产生了靠炮兵、坦克兵及航空兵完成主要战斗任务的想法。

步兵指战员不善于利用己方的火炮和迫击炮（坦克及战斗机）对敌人的火力控制去接近敌人、突破敌人防线，以便实施和投入进

攻。进攻速度仍然很慢，有时因为害怕头顶上己方炮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过早要求将炮火转向纵深发射。同时不善于运用自己的兵器，使敌人在一段时间内处于火力控制之外并得以“复活”，不时地用保全下来的自动步枪或机关枪阻碍我军的进攻。

经验表明，德军害怕我们的火炮和迫击炮，时常隐蔽在战壕里，此时他们的自动武器也停止了射击。而我们的步兵却不会利用这一时机，以最小的损失接近攻击并占领指定的目标。我们的步兵在进攻顺利的情況下不太注意巩固已占领的阵地，火力的配置极其缓慢，指战员不能很快适应地形，挖战壕和隐蔽速度慢。

连最简单的对营、连、排的指挥都组织不好。同友临部队不能保持良好的联络。一些部队习惯在没有接到命令、甚至在敌人没有进攻的情况下退回原来出发时的战壕中，因此，经常是经过一天战斗消耗了大量弹药占领的阵地，晚上或夜里又轻易地落入敌人手中。这是我们的敌人始料不及的，因为我们的步兵丢下的一个又一个阵地竟然长时间无人把守。

我们的步兵对敌机的出现、对敌火炮和迫击炮的射击及炮弹的爆炸，即使数量很小，反应也十分敏感。他们习惯于认为，我们可以开枪放炮，而敌人无权向我们开枪放炮。敌军拥有大量的自动化武器和迫击炮，我军的火炮、迫击炮和战斗机在炮击时当然不可能把它们全部摧毁，对于火力点，应由步兵火力加以控制。由于步兵对敌军的侦察工作组织得不好，进行得不力，诸如敌军换防、重新部署兵力等情况通常都是从死者身上的文件和俘虏口中偶然获得的。如果不是当地居民帮助侦察，许多敌情是根本无法得到的。我们的步兵常采取正面进攻，放弃了包围和迂回战术，似乎不愿意利用一切机会来攻击漏洞百出的敌军阵地。

步兵根本没有对付敌空军的能力。

连队的人员及武器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常常夸大损失的程

度。

胆小鬼和意志薄弱者随意溜回后方，丢下武器，设法快速逃离战场。死伤人数统计不准确。伤员撤离战场的工作组织得不好，撤退时伤员没有撤走的情况很多。

连队缺少真正的苏军上士，我们的连司务长只能起一个蹩脚的总务管理人员的作用。

所有这些不足应尽快通过组织学习、提高纪律性以及在前、后方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加以克服。

2. 炮兵 大部分士兵和初级指挥员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接受了作战训练，他们知道自己的职责，但还缺乏足够的实际经验。部分没有经过训练的士兵，从事的是辅助性工作，不会对炮兵部队的行动产生质的影响。炮兵占有远距离的发射阵地和观察所，但几乎没有在步兵先遣部队中设前沿观察所。许多师属炮兵部队的通讯工具（在以往的战斗中丧失）极为缺乏，使炮兵营和炮兵群的火力制定受到威胁，不得不使用状态不好的步兵通讯工具。总想坐在掩蔽部和掩体里不利于积极指挥。炮兵连许多指挥员，包括不久前任命的指挥员，射击训练不够。观测工作组织得不好，因而有关敌军、敌火力点、工事等情报提供得不多。炮兵连根据“步兵想当然的报告”，根据步兵、诸兵种合成部队和上级炮兵指挥员的命令开炮，虽消耗了大量的炮弹，却往往不能奏效，只不过是稳定一下神经。尽管对敌阵地进行了炮击，但没有取得应有的战果。每天重复同一种炮击方式，没有采用火力假转移，使得敌人对我们的老一套战术应付自如。

炮弹消耗缺少准确的统计，没有组织炮弹前送工作，结果许多炮兵营已没有炮弹，射击后的弹筒和弹箱不能容忍地散落一地，没有运往后方。所有这些缺点在强大的压力下已得到克服，火炮和迫击炮的射击效果有了明显提高。

在许多正面地段炮兵开始直接清除敌人的单独目标，为步兵顺利占领这些目标创造条件。为了改进同步兵的协同动作和提高射击效果，炮兵连和炮兵营的指挥员们身先士卒，部分火炮被推上暴露阵地，以便直接瞄准射击。

根据俘虏提供的情况和敌空军加强了对我炮兵战斗队形的空袭判断，敌军在我炮火攻击下遭受了严重损失。团属小口径炮兵在向前推进时极不愿意跟在步兵后面，因为他们不相信步兵能保持稳定的战斗队形。

无论是向前推进，还是撤退，步兵很少帮助炮兵拖拉火炮，人数不多的炮手为拖拉火炮常常不得不付出超人的努力。

到达叶利尼亚地区的两个火箭炮连已投入战斗，并取得了预期的战果。如果这两个火箭炮连能采用更加密集的战斗队形，战果会更大。为了取得更佳战果，应当使步兵的训练更进一步。最后一次齐射后应立即向目标发起进攻。进攻稍有迟疑就会使运用这种新型兵器作战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效应化为乌有。

3. 坦克 投入的坦克数量少，而且集中在狭窄的正面。坦克部队在同步兵和炮兵协同动作方面缺乏训练。坦克往往同步兵分离，根本不把敌军的反坦克兵器放在眼里，一味进行正面攻击。

投入进攻的坦克数量少，坦克进攻的方向又被敌人摸透，这就使敌人能够集中反坦克炮的火力，击毁我们的坦克。叶利尼亚战役的经验表明，我们投入少量的 KB 坦克和 T-34 坦克去摧毁敌军有组织的防御是完全不合适的。

4. 空军 在整个作战期间，敌空军明显掌握了制空权，也造成了损失，而主要是在精神上压倒了地面部队，我们的空军只是在最近 3 天才稍有加强，表现出了主动性。由于各机场距离很远，各师缺少空军联络员，同各机场联系不畅，而使掩护自己部队的问题、强击和轰炸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能完全保证我地面部

队的行动。

敌军 敌步兵行动谨慎，在许多地段处于消极防御状态。敌整个火力配系的基础是大量的突击步枪和迫击炮。没有中等口径火炮，2、3个重炮连以稀疏射击、等速射击方式炮击我军驻地，显然是为了节省炮弹。敌军积极利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主要攻击我步兵和炮兵。敌军集中若干迫击炮的火力对我军集结的兵力和密集配置的战斗队形进行面积射击。敌军知道我步兵没有高射机枪和37毫米口径的火炮，于是凶猛地、无耻地动用空军进行轰炸、扫射，用机枪低位射击我战斗队形。敌军企图利用空军的主动出击一举消除我军取得的一点点战绩，阻止我军向前推进。敌空军就近有降落场，完全可以快速飞抵目标和进行多次起飞，给我军造成损失，在精神上对我军形成压力。敌军频繁采用侦察机和校射飞机，校正炮兵火力，为轰炸航空兵指示轰炸目标。

当我们进攻时，敌军曾一度企图以兵步协同少量坦克进行反攻，但未能得逞。他们试图在个别方向由小股步兵进行侦察，在其余战线保持消极防御的态势。在许多地方我步兵发现在敌人防御前沿有隐蔽的坦克。我炮兵将其摧毁后确认，这些目标不过是一些土木工事。参加过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人认为，“凯撒式的德国人”在战斗中比“希特勒式的德国人”要顽强得多、坚韧得多。敌快速部队毫无疑问已疲惫不堪、萎靡不振，人员和技术装备均遭到重大损失。据我看，敌坦克部队经常原地不动不仅是因为缺少燃料，还因为灰尘和沙土使发动机提前报废。

敌军在防御战中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指望我们无力把这场战役进行到底。

结论

1. 到1941年8月5日，叶利尼亚地区的敌军精神上受到相当

大的震动，人员和战斗技术装备均遭到重大损失。我军充分的火力准备和齐心协力的进攻能够粉碎敌人的抵抗并取得胜利。

2. 我军各部队战斗素养不高、协同行动差、纪律性不强，因而在进攻中未能取得预期的战绩。

3. 从上到下管理不善、一些指挥员素质低、司令部工作不力、张皇失措和对胜利丧失信心，因而无法确保这一胜利。

4. 侦察工作不力，即使十分了解敌军的兵力、兵器及部署情况，也不能采取行动。

5. 进攻部队缺乏必要的纪律性、组织性及应有的有效方法，因而不能确保胜利。

红军炮兵主任、炮兵上将 沃罗诺夫^①

^① 尼·尼·沃罗诺夫，1937～1940年任红军炮兵主任，1940年起先后任苏军总军械部副部长、国土防空军总部部长。1941年7月，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苏军炮兵主任。1943年3月起为苏联武装力量炮兵司令。

№06848

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就加强勒热夫方向的 部队问题给沙波什尼科夫的密码电报

(1941年8月31日)

绝密

1941年8月31日发自格扎茨克市

沙波什尼科夫同志：

鉴于敌第57坦克军攻占了托罗佩茨，并且正在向东挺进，我们必须尽快加强勒热夫方向。第31集团军现在总共只有3个步兵师，其中2个师是刚刚组建的，所属炮兵部队很单薄。拉开一字防线，平均每个师的防线长达50~60公里。

第49集团军从左侧卫护格扎茨克，除了有一个民兵师，没有任何后备部队。

我谨提出以下请求：

1. 调3个步兵师和1个反坦克师来加强第31集团军，其中1个步兵师集中在依扎罗沃村以东的地区，另1个步兵师则集中在罗德瓦涅沃、贝科沃、聂恰耶沃一带。把坦克师部署在勒热夫地区。整个集群的使命是：在第19和第247步兵师的战斗打响后，向敌人的第57坦克军发起反击。

为第31集团军配备1个装备伊尔-2型飞机的飞行团、1个装备佩-2型飞机的飞行团、1个歼击机飞行团。

2. 调1个步兵师来加强第49集团军，将该师布置在瑟乔夫卡

地区，以保障第 31 和 49 集团军接合部无虞。

3. 将第 299 步兵师划归我们作为后备部队，以保障第 43 集团军的行动，因为该集团军没有任何后备部队。

朱可夫
克鲁格洛夫

电报上有约·维·斯大林的批示：

沙波什尼科夫同志：请与铁木辛哥同志就阻止敌人在托罗佩茨地区推进的措施问题谈一谈。斯。

电报上还有鲍·米·沙波什尼科夫作的标记：

已办。沙，9.5.。

№06849

西方面军司令部就第22集团军战败原因

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1年9月3日)

绝密

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约·维·斯大林同志：

第22集团军于今年8月21日转入进攻，目的是破坏敌人正在准备的突击攻势。

第22集团军的进攻开始很顺利，但由于该集团军司令叶尔沙科夫不可容忍的疏忽大意，最后遭到了失败。8月22日，敌人在该集团军左翼的第186步兵师防区进行反扑，并且在当天就以其机动部队插入第22集团军的作战后方。

第22集团军司令叶尔沙科夫在左翼防线被突破后，急调第98步兵师去左翼抵挡进攻之敌，但未奏效。

8月23日傍晚，敌第19和第20坦克师部队进入大卢基地区。在这两个坦克师后面，敌人的第40步兵军（由第102、第255、第256步兵师组成）随之跟进，并占领了库尼亚河畔的阵地，从而切断了第22集团军部队东去的退路。敌人以小股摩托机械化部队的东进来掩护自己的行动。

现已查明，叶尔沙科夫将军从截获的敌人进攻计划和地图中早已知道其侧翼正面临威胁，但是他不仅没有预先采取抵御敌人进攻的措施，而且也没有及时地将此情况报告给方面军司令部。

由于未采取应有的措施，第 22 集团军于 8 月 23 日晚陷入包围圈。

鉴于敌步兵与突前的坦克群已拉开距离，方面军向第 22 集团军司令叶尔沙科夫下达了任务：集团军主力向东实施突击，切断敌坦克与步兵的联系，将敌坦克包围并消灭。

集团军司令为完成这一任务组织的突击，开始时频频得手：敌军损失惨重，并被赶出乌什察国营农场地区。但后来第 22 集团军的突击部队遭到敌军强大机械化部队的攻击，被迫西撤。这次突击未获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叶尔沙科夫为完成这项行动调集的兵力不足。

进攻乌什察受挫后，第 22 集团军的部队开始向东北方向转移，以期通过惟一畅通的林中道路到达奥泽列茨。

可以说从这时起，即从 8 月 26 日开始，集团军司令叶尔沙科夫、他的参谋部以及部分兵团的指挥人员已经完全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撤退变成了无组织的、仓猝的撤出战斗行为。撤退时，各个师相互混杂，部队的组织被打乱，结果，到达奥泽列茨地区的仅有一些失去辎重的分散的部队，并与各部队和兵团的指挥人员失去了联系。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和第 29 集团军的代表赶到奥泽列茨地区，把第 22 集团军撤到那里的零散部队收集起来，并按原部队番号编成队伍，并把它们立即派往奥泽列茨、斯克沃尔佐沃车站和科多斯诺湖地区，构筑防御阵地，以便掩护托罗佩茨和旧托罗帕方向。

第 22 集团军在发起进攻时，辖有 9 个步兵师和 2 个军级炮兵团，没有坦克。

突围后，该集团军已经丧失绝大部分兵力和武器装备。

按部队番号计，所有的师均已突围起来。直到今天，仍有携带

各种器材的小股队伍和零散指战员陆续走出包围圈。到8月3日^①为止突围出来的各师的情况如下：

第186师——据8月20日统计，拥有兵员7900人，汽车386辆，步枪6950支，重机枪52挺，轻机枪75挺，各种口径的火炮23门，迫击炮24门。

截止到9月3日，该师一共突围出来2778人，带有步枪2256支，轻机枪3挺，冲锋枪4支，迫击炮1门，76毫米火炮4门，汽车36辆。

第174步兵师——据8月20日统计，拥有兵员9360人，汽车145辆，步枪8053支，重机枪36挺，轻机枪116挺，各种口径的火炮79门，迫击炮36门。

截止到9月3日，该师一共突围出来2363人，带有步枪1722支，重机枪2挺，轻机枪7挺，冲锋枪13支，火炮2门，汽车85辆。

第179步兵——战斗前拥有兵员8903人，汽车96辆，步枪6426支，重机枪68挺，各种口径的火炮22门，迫击炮50门。

截止到9月3日，该师一共突围出来1617人，携带出步枪1022支，自动步枪15支，冲锋枪3支，汽车41辆。

第214步兵师——据8月20日统计，拥有兵员6194人，汽车22辆，步枪5693支，重机枪35挺，轻机枪49挺，各种口径火炮41门，迫击炮39门。

截止到9月3日，该师剩下1860人，步枪561支，自动步枪74支，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冲锋枪3支，迫击炮2门，汽车24辆。

第126步兵师——原有兵员8764人，汽车62辆，步枪7362

^① 原文如此，疑为9月3日误。

支，重机枪 45 挺，轻机枪 76 挺，各种口径火炮 17 门，迫击炮 35 门。

截止到 9 月 3 日，该师一共突围出来 4455 人，携出步枪 4144 支，自动步枪 9 支，重机枪 5 挺，轻机枪 5 挺，冲锋枪 49 支，迫击炮 5 门，汽车 22 辆。

第 48 坦克师——战斗前拥有 6574 人，汽车 318 辆，步枪 6324 支，重机枪 42 挺，轻机枪 53 挺，各种口径火炮 11 门，迫击炮 15 门。

截止到 9 月 1 日，该师剩下 2775 人，步枪 2214 支，重机枪 2 挺，轻机枪 3 挺，自动步枪，41 支，汽车 72 辆。

上述各师截止到 9 月 3 日的兵员统计数字中，包括第 98、第 170、第 112 步兵师全部移交给第 174、第 186、第 214、第 126 步兵师的兵员和武器装备具体数量如下：

第 98 步兵师——突围前拥有兵员 7129 人，汽车 26 辆，步枪 4649 支，重机枪 2 挺，轻机枪 4 挺，各种口径火炮 5 门。

突围后，剩下兵员 508 人和步枪 310 支，全部补充到其他师。

第 170 步兵师——原有兵员 7824 人，步枪 6967 支，重机枪 39 挺，轻机枪 41 挺，各种口径火炮 28 门，迫击炮 24 门。突围后，剩下 751 人和步枪 327 支，全部补充到其他师。

第 112 步兵师——系正在组建的部队，8 月 20 日实有兵员 3097 人，步枪 2586 支，重机枪 18 挺，轻机枪 9 挺，各种口径火炮 3 门，迫击炮 9 门。

突围后，剩下兵员 362 人，步枪 244 支，全部补充到其他师。

至今尚未突围出来的有：第 22 集团军司令叶尔沙科夫中将，（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委列昂诺夫和第 174 步兵师师长济金。已采取了救援措施。

现在，仍有小股队伍和分队携器材突围出来。将对各师兵员数

量和损失情况进行核实，然后另行汇报。方面军司令部在第22集团军活动的地区没有从东面对突破之敌进行打击的机动力量 and 手段，因而为了帮助第22集团军突围，便将方面军的空军全部投入支援该集团军。空军的成功行动给敌人以重创，从而减少了该集团军部队突围的困难。

此外，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为了防备敌人向托罗佩茨突进，同时为了保证第22集团军迅速撤回到我方面军的防区，命令第29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动用该集团军的所有机动力量，在奥泽列茨、斯克沃尔佐沃车站和科多斯诺湖构筑防御阵地。紧急组建了混成支队，该支队包括两个团、1个坦克营和1个有10000颗地雷的工兵营，该支队交第29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调遣。对第22集团军突围出来的部队，已下令立即进行整顿，然后派往指定的防御阵地。

为了帮助第2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以及后来被临时任命为第22集团军司令的尤什克维奇少将，以方面军副司令博尔金为首的方面军司令部一批负责指挥员被派往该集团军。

随着对第22集团军突围出来的部队的情况日渐了解，已为该集团军紧急调去了23门火炮、第509反坦克团和6个补充营。但上述人力物力直到8月30日傍晚才到位，而当时在奥泽列茨、斯克沃尔佐沃车站和科多斯诺湖防御阵地上的部队，由于装备差已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开始向托罗佩茨地区撤退。

在以后的托罗佩茨保卫战和向东到西德维纳河一线的战斗中，第22集团军的部队由于补充了炮兵，对敌军占优势的摩托机械化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第22集团军撤退到托罗佩茨、旧托罗帕一线，也迫使第29集团军的部队后撤到西德维纳河—韦列萨一线。

至9月3日傍晚，第22和第29集团军已在西德维纳河的阵地上站住了脚，从而使敌军打消了突入河东岸的企图。

结论：

1. 敌军能迅速突入第 22 集团军，是因为集团军司令叶尔沙科夫对自己左翼的极大危险漫不经心，这是不可容忍的。

2. 叶尔沙科夫司令及其参谋部甚至在从缴获的敌军计划中获悉敌人的突击方向后，仍未采取措施消除敌军对其左翼的威胁，这种不能容忍的失职行为，使敌军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突破。

3. 集团军司令叶尔沙科夫没有完成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交付的任务——打乱敌人的战斗序列，进而置敌军于我军的包围之中，是因为第 22 集团军司令叶尔沙科夫没有组建一支能够完全战胜敌军抵抗的部队。

4. 第 22 集团军毫无组织和匆促的后撤，是由于该集团军司令及其参谋部和个别兵团指挥员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

5. 第 22 集团军没有坦克部队，因而第 22 集团军司令无法部署能与敌摩托机械化部队相抗衡的兵力和装备，以便阻止敌摩托机械化部队快速推进。

西方面军司令、苏联元帅 谢·铁木辛哥

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尼·布尔加宁

№06850

骑兵集群司令部就多瓦托尔^① 骑兵集群的行动给 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报告

(不早于1941年9月2日)

关于多瓦托尔上校领导的骑兵集群在 1941年8月14日至9月2日期间的行动情况

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

1. 从1941年8月14日起，骑兵集群开始行动。你们布置的敌后行动任务是，在杜霍夫希纳——杰米多夫，杜霍夫希纳——别雷，鲁萨诺沃——鲁德尼亚地段切断敌军的交通线，查明敌后方的后备力量，破坏敌仓库、机场、指挥机关，了解敌占区的居民状况。

行动时间预计为10~15天。

2. 准备工作完成后，集群从叶姆连湖地区出发，在森林沼泽地带行军40公里，穿过人迹罕至的沼泽，最后在费利诺夫、博亚尔希诺、科尔皮特地区集中。

8月16日至23日，集群在博尔基至罗蒙诺索沃车站、乌斯季耶、罗日诺、奇恰塔一线进行侦察，寻找敌人防线的薄弱地段，并于8月22日占领了罗蒙诺索沃车站东南3公里一片森林的南端作

① Л.М. 多瓦托尔，当时领导过骑兵集群，后任过骑兵第3、第2军军长。

为出发位置，确定在波德维亚济耶、乌斯季耶地段突破敌人防线并进入敌后。

3. 为此次敌后行动，由第 50 和第 53 骑兵师组成骑兵集群，全部为骑兵，不配备炮兵和后勤人员。

集群装备有：3460 把马刀，36 挺重机枪，108 挺轻机枪，190 支冲锋枪，2830 支步枪。每个战士除射击武器外，还配备了手榴弹和两瓶可燃液体。

马驮子还装了 300 公斤炸药。

集群的通讯设备仅有 3 部便携式无线电台。

4. 敌后战斗的经过：

(1) 经过 6 小时的战斗，集群歼灭了装备有迫击炮和火炮的敌 9/430 加强步兵团，粉碎了敌军在北图尔纳耶沃森林中的顽抗，而后在扎博洛特纳亚地区的森林里集中。敌人狼狈逃窜，放弃了从乌斯季耶至里溪的居民点。

8 月 24 日至 26 日，两个师没有遭遇敌军的任何抵抗，始终在公路上行进。据当地居民和俘虏证实，敌人在放弃居民点逃跑时曾说：“有大约 18000 名哥萨克骑兵闯到我们后方，正形成对我们的包围”。军官们带头逃跑了。敌占区的居民们在此期间热烈地欢迎我们，为红军的到来而高兴得流泪，给我们指战员送来各种慰问品。

(2) 进入里舍沃西南方的森林后，在 8 月 26~30 日期间，对里舍沃地区的敌军指挥机关进行了多次夜袭，通过在公路上设埋伏消灭了敌军许多运输工具，切断了敌军通讯联系，消灭了一些留守基地和仓库的小股敌军。与此同时，还查实和处决了一批德国人安插在农庄中的傀儡，他们按照德军司令部的命令，突击收割庄稼，并对当地居民使用恐怖手段。

(3) 1941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一个骑兵师与敌人专为对

付我骑兵集群而组建的几个支队进行了一场战斗，而后在尼古利诺西边的森林中集中。9月1日傍晚，我骑兵集群在图尔纳耶夫森林中设置鹿砦伏击敌军，消灭了敌人约1个营，之后撤出乌斯季耶地区的敌后方。

5. 在敌后的所有战斗，都是在鲁德尼亚—魏尔金诺—科托夫希纳—舍佩列沃地段上进行的。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战斗中共消灭和摧毁：

①军官	19人
士兵和士官	约2500人
迫击炮	14门
各种火炮	10门
步枪	约1500支
无线电台	12台
自行车	27辆
摩托车	23辆
各种汽车	150辆
汽油油罐	5个
重机枪	27挺
轻机枪	65挺
大口径机关枪	4挺
冲锋枪	15支
装甲汽车	4辆
坦克	2辆
烧毁古卡赫和热利亚博沃的两个军火库，计有：	
子弹	4800发
炮弹	350发
手榴弹	27枚

电话机	21 部
平板车	21 辆

②从敌人包围圈中解救出我军指战员约 1000 人，并用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了他们。

③夺得 63 匹马。

④尼基塔老爹指挥的一支 1500 人的游击队在我们护送下进入德国人的后方。

在整个战役中，我军的损失如下：

牺牲——50 人。

受伤——240 人。所有伤员均已撤回。

有 108 匹马被打死和遗弃在沼泽中。

6. 敌占区居民状况

骑兵集群在作战期间弄清了很多事实和收集了许多文件，这些事实和文件说明了德国人占领区内的居民状况和德国人在占领区实行的政策。

德国人急于收获粮食和赶走牲畜。他们用武力赶走居民，改变铁路的铁轨宽度。他们一手拿蜜糖，一手执皮鞭，试图让居民顺从他们。德国人还企图欺骗居民。在季米特罗沃村和其他一些村里，他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庆祝攻陷莫斯科”的活动。他们在居民中散发各种各样的俄文传单。有一份以地图作背景的传单，上面画着铁木辛哥元帅在逃跑，而德国人在追打他。我方的俄文传单很少，显然不够用。

德国人勒索居民不择手段。在一个村庄里，他们从一个农民那里枪走了 8 块肥皂，然后用这 8 块肥皂向其他农民换取食品。接着，其他德国兵也如法炮制，抢走肥皂再去换其他食品。就这样，从 8 块肥皂开始，洗劫了全村。

德国人在村子里用枪打猪、鸡，甚至朝蜂房开枪。

德国人还因村民不顺从而纵火烧了一些村庄。从乌斯季耶到罗日诺的一大片村庄，几乎已被烧光。相当一部分居民为躲避德国人而藏到森林中。

在许多地方，德国人借口要打仗而把居民赶走。

牧师又回到了一些村庄。由德国人指定的村长们，忠实地为德国人效劳。

在骑兵集群经过的地区，游击队的活动还很活跃。骑兵集群的征战，使游击队员们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武器和德国制服。

7. 敌军及其实力。骑兵集群的突袭，无疑弄清了以下情况：

敌人只是在前线有防守力量，而在其后方则没有像样的后备队。德国人的后方，只有个别的休整部队和正在改编的部队。敌人防线的纵深，被突破的地方只有3公里。在其后方腹地，敌军没有构筑防御阵地。他们的坦克数量不足。显然他们缺乏汽油，要不他们就不会从居民那里收集煤油了。

敌军的力量在于他们善于灵活地运动，善于把部队从一个地段调到另一个地段。

德国人害怕进入森林深处，近来他们还不愿在居民点中驻扎过夜，而宁愿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或树林的边缘地带。

夜间，德国人在村庄上空施放照明弹，使村庄亮如白昼。

德国人的迫击炮手很棒，他们有许多仓库存放炮弹，但他们打得并不准。

德国步兵打起仗来很胆怯，极易张皇失措。

德国骑兵遇到我们，逃得飞快，赶也赶不上。

8. 其他几种情况。

在战斗过程中，一次在突出包围圈时，有一个支队的队长、政委和参谋长一下子都受了伤。显然，在骑兵集群的这个分队里混入了敌人。已采取措施调查此事。

据骑兵集群掌握的情报，德国人对其开小差逃向乌斯季耶地区的士兵，实行五人抽一枪毙法。在杰米多沃的红军俘虏营里，由一个来自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德国中尉管理，他竟然拷打我们的被俘人员。

红军俘虏 1500 人沿公路从杜霍夫希纳被押往维捷布斯克，押解的德国兵只有 15 人。

结论和建议

1. 骑兵集群完成了你们规定的任务。集群的战绩可以看做整个方面军的战果，是同方面军各集团军协同作战、密切配合的结果。

2. 经验表明，骑兵集群进入敌后行动，最好配备反坦克武器（反坦克枪、可用马驮的小炮等）。每个骑兵连必须配备 4 门迫击炮。最好为骑兵集群配备摩托化步兵和坦克。在敌后活动的骑兵集群还必须与空军协同作战。

3. 骑兵集群司令为作战的需要，手下应有 10~12 名可率队作战的指挥人员。平常的那种参谋部是不需要的。

4. 下述敌后斗争方式效果尤为明显：以小分队为单位进行伏击；组织夜间偷袭；在公路上设障和埋雷。

在敌后，如没有其他配合手段，大兵团很难隐蔽和运动。

5. 敌人后方没有后备力量。一些大的目标都由小部队保护，这些部队一有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安。

敌人通常害怕在林中作战，也不愿在夜间行动。由于我部队在敌后出现，敌人被迫从前线抽调部分兵力来守卫交通线、指挥机关和重要的军事目标。

由于汽油缺乏，敌军大部分汽车不能派上用场，敌人不得不挨村收集煤油。

6. 敌占区的居民遭受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压迫和蹂躏，他们

受到公开的、无耻的掠夺。

必须加强对敌占区居民的宣传工作，可采取散发和传送传单、报纸等方式。

德国人正在居民中起劲地造谣说，红军已被消灭，莫斯科已经陷落，可同时他们却在加紧收割庄稼和掠夺牲畜。

7. 许多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在农村定居下来，蓄起了大胡子，在集体农庄中劳动，不想再返回前线。

8. 骑兵随身带的装有可燃液体的瓶子没有派上用场，因为骑马行动，瓶子颠簸易碎。

骑兵集群司令 多瓦托尔上校
骑兵集群政治委员、团政委 图利科夫

№06851

国防委员会驻斯摩棱斯克州特派员霍赫洛夫 就获得解放的地区和第 30 集团军部队的情况 给国防委员会的报告

(1941 年 9 月 9 日)

近几天我一直在别利斯克区。该区的一部分不久前被德国人占领，现已获得解放。据 9 月 4 日统计，该区庄稼收割进度大大落后。9 月上旬，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该区的收割和播种工作将在 9 月 15 日前完成。

获得解放的村苏维埃情况。

我亲自去过奇恰塔村和红山村，了解了村苏维埃的情况。这两个村苏维埃所属的几个村庄被全部烧光，有几个村庄破坏严重，只有奇恰塔村因长时间驻有德国部队的指挥机关，得以保全。在巴图林区，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的村庄，也有一些被烧毁。这些村庄现在成了不毛之地。原来住在这里的居民在武力威胁下，连同牲畜一起被赶往德国人的后方。我只同一位女集体农庄庄员谈过话。她是在她的村庄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前几天，和另外两位女集体农庄庄员一起逃出德国人魔爪的。她说，德国兵把居民的财物劫掠一空，而凡是他们认为没有用处的东西，都被毁掉。他们夺走牲畜并宰杀掉，他们对居民进行镇压。但在我们的部队攻占这个地方以前，大部分庄稼还未收割，只有一小部分已经收割，打成捆放在地里。敌人尽管进行镇压，但也未能强迫集体农庄庄员们把庄稼收割

完。现在，那些以前跑到大后方的居民已开始返回，并着手收割庄稼。他们得到了邻近集体农庄和红军部队的帮助。至于其他居民，只知道他们被法西斯赶往其后方，从事土方工程。

修防御工事的红军战士的情况

在斯摩棱斯克州的霍尔姆-日尔科夫地区，有大约 12000 名红军战士在从事防御工程的建设工作。这些红军战士是在 1941 年 7 月 7 日分别从切尔尼戈夫州、库尔斯克州、波利斯克州、戈梅利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其他州征召入伍的。他们修工事已经有两个多月，并被调来调去。他们大部分人都被编入预备队方面军（例如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防御工程野外建设管理局第 5 区，在那里工作的红军战士都被编入第 49 预备集团军的第 248 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州境内，这样的红军战士有数万人，他们也是预备部队，用来补充在前线作战的师。时至今日，没有人负责这些红军战士的政治教育和食品、被服的保障工作。红军战士们依然穿自己的衣服，经过这段时间，他们的衣服都破损得不成样子；大部分红军战士都没有鞋穿，光着脚走路，一小部分人穿着草鞋。看到他们这副惨样，还以为他们是囚犯。（实际上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建设单位里劳动的囚犯都有衣穿，有鞋穿）。他们的伙食也很糟，大多只有面包和素菜汤。这些战士隶属的战斗部队，不愿给他们调拨食品，尤其是含油脂食品。当你读到这些从事建设工程的红军战士写的信时，就会对上述情形深有感触。一旦这些红军战士被编为作战部队开上前线后，作战师的指挥员们就会大伤脑筋。我在位于前线的第 162 步兵师第 120 团 1 连 3 排的驻地，同一批刚刚从预备部队补充到第 162 步兵师的战士谈过话。这都是些什么人哪！纪律松弛，红军战士竟然不知道如何从肩章分辨出指挥员甚至将军的差别。与将军谈话毫无礼貌，还同指挥员们吵架。从他们入伍时起，就没有对

他们做过政治工作，他们看不到报纸，甚至初级指挥人员也很少接触他们（他们告诉我：在战斗中我们从未见过自己的指挥员）。这个部队的伙食很差，尽管完全有条件改善伙食。他们抱怨缺乏肉制品，特别是汤给的很少（两个人才给半个军用饭盒的汤）。不满情绪溢于言表。结果怎样呢？补充到第30集团军的红军战士，在第一次战斗中就有3伙人（共约30人）跑到德国人那边去了。寒冬即将到来，不能让红军战士们这样过冬。我请求苏联国防委员会责成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立即：

(1) 给所有目前从事建设工程的红军战士发制服；

(2) 保障他们的标准伙食供应；

(3) 在上述红军战士中开展政治工作，通过不懈的努力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红军战士。

(我还没有就上述问题与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联系。)

在我去过的战斗部队里，其指挥机关均表示，现有的缺点与不足将迅速得到克服。

第30集团军（司令是霍缅科少将同志）指挥员们的想法

1941年9月8日，我去了第30集团军司令部。集团军司令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会上，指挥员们谈了一些想法，并请我转报国防委员会。

1. 集团军司令部完全得不到有关苏联其他方面军的情况通报，有关西方面军的情况通报也很少（其他集团军的指挥员和军委委员也向我反映过这种情况）。

2. 他们很欣赏 ДС 型重机枪，认为如能改进一个缺陷，这种机枪就会变得非常棒，具体地说，就是用金属子弹带代替现有的亚麻布子弹带（有一些枪机手捡到了德国的金属子弹带，装到我们的机枪上，用起来非常好）。

3. 希望组织生产汽车防滑链，以便在道路泥泞时期使用。

4. 他们抱怨我们的反坦克地雷有几个重大缺陷：①装药量小，故在对付重型坦克时威力不大（连履带都炸不坏）；②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装地雷的木箱埋入地下后发生变形，地雷也会失效。由于这一问题专业性强，我请指挥员经过认真考虑后向国防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指挥员答应这样做。

对前线的情况作了一番考察后，我向指挥员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请他们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炮弹的包装

大家知道，德国人炮弹的包装箱是使用柳条编成的，既简易又轻便。我军可否也使用这种包装呢？指挥员们认为122毫米以上口径的炮弹可以使用，至于包装小口径炮弹，他们说还得研究。我们的包装需要进行复杂的加工和特别贵重的地道的材料。我认为，应建议工农红军炮兵总部迅速研究炮弹包装的简化和降低成本问题，并向工业部门订做包装箱（制造德国那种柳条箱，我们只要一家工业合作社就足以满足红军的全部需求）。

关于整顿集团军的通讯工作

在我们各集团军中，各部队与集团军指挥机关之间的通讯工作通常是很糟的。集团军、师甚至团的指挥机关在下达了进行某个战役的任务后，很长时间内都得不到战役完成结果的报告，更不用说关于任务完成过程的情况了（9月7日，第30集团军某部进行了一次战役，到9月8日12时许，集团军参谋部还不知道该战役的进展情况）。通常，人们都以电线短缺为理由，为上述情形辩解。实际情况是：第一，在向上级指挥机关报告所需情况方面，各级指挥员纪律观念十分淡薄；第二，没有一个人认真考虑过如何改进通

讯工作，例如，作为通讯工具之一的无线电台，就根本没有得到利用。你若问这是为什么，他会说，缺少配套仪器；若是有一种仪器，他又会说，没有操作仪器的人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应当要求红军部队的各级指挥员，更加认真地组织他所负责的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工作，更加负责地向上级指挥机关报告情况。（应当给予各集团军司令利用缴获来的物资组织通讯工作的权利。他们抱怨说，方面军司令部把一切缴获品都拿走了。）

在我向第 30 集团军的指挥员们提出这个问题后，他们都认为上述评价是正确的，所提任务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在前线驻地收集金属问题

在靠近前线地带收集金属的工作，近来已有起色，但现在仍有可收集的东西。我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亲眼看到了几辆我们的和德国的重型坦克、几辆轻型坦克，很多炮弹壳，都还没有收集起来，也有很多已收集到一起但尚未运走的金属。对此问题，我向第 30 集团军司令霍缅科少将谈过，他已向集团军后勤部主任维诺格拉多夫将军下达了相应的指示。

关于在摆脱法西斯魔爪获得解放的村庄中收割庄稼的问题，关于红军部队帮助收割庄稼的问题，关于从靠近前线的地带运走亚麻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已经与集团军司令部共同解决了。

霍赫洛夫

【专题说明】

苏联国防委员会内的分工

(1942年2月)

苏联国防委员会自1941年6月30日成立后，便成为战时拥有全权的特设最高国家机构，负责领导国家一切部门及其机构的活动。在卫国战争期间，它的成员时有变化，每一次变化又都与当时的战争进程、最高领导层内的人事变动联系在一起。本专题三份文件记载的1942年2月的这次国防委员会内部的分工，是一次比较大的人事调整。它发生在苏军在莫斯科城下成功地击退了德军的进攻、初步扭转了苏德战争开始以来的被动局面之际，不单单是偶然的巧合。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的分工在不到两周之内进行了两次补充和修正，其中的考虑和原因，有待人们去深入探究。

(本专题文件由吴伟编辑和校注，

任建华翻译)

№06811

国防委员会关于各委员分工的第 1241/ C 号决定

(1942 年 2 月 4 日)

秘密

1. 国防委员会各委员分工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坦克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和准备有关问题。

格·马·马林科夫和拉·巴·贝利亚同志；①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飞机和发动机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和准备有关问题；②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红空军工作（组建空军团、按时把空军团调往前线、组织问题、工资问题）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和准备有关问题。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迫击炮部队司令部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和准备有关问题。

拉·巴·贝利亚同志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武器、迫击炮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和准备有关问题。

尼·阿·沃兹涅先斯基^①：①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弹药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和准备有关问题；②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黑色冶金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和准备有关问题。

① 尼·阿·沃兹涅先斯基，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1938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9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年2月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阿·伊·米高扬^①同志负责供给红军被服、粮食、燃料、货币和军械等事务并准备有关问题。

国防人民委员部各供给机关的所有供应、运输工作都应服从国防委员会委员米高扬同志的监督。

批准雅科夫列夫^②同志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米高扬同志的副手，负责军械供应。

2. 每位国防委员会委员应有一名副手负责监督人民委员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其分管的工作决定的情况。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① 阿·伊·米高扬，1937～1946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46～1955年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② 尼·德·雅科夫列夫，苏联军事活动家，1941年6月起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军械部部长，1944年晋升为炮兵元帅。

№06812

**国防委员会关于对各委员分工进行
部分调整的第 1271/C 号决定**

(1942 年 2 月 12 日)

1. 作为对国防委员会 1942 年 2 月 4 日决定的部分修改，现责成：尼·阿·沃兹涅先斯基同志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黑色和有色金属、石油、煤炭、化学制品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准备有关问题。

拉·巴·贝利亚同志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武器、弹药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准备有关问题。

2. 批准米·格·别尔乌辛^①同志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尼·阿·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副手，负责化学和燃料工业。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① 米·格·别尔乌辛，1938 年起先后任苏联重工业副人民委员、第一副人民委员，1940 年任电站和电机工业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2 年初，任苏联化学工业人民委员。

№06813

**国防委员会关于对各委员分工进行
部分调整的第1289/C号决定**

(1942年2月16日)

作为对国防委员会于2月4日作出的《国防委员会关于各委员分工》决定的修改，现委托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①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飞机、发动机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准备有关问题；

②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红空军（组建空军团、按时把空军团调往前线、组织问题及工资问题）工作决定的执行情况和准备有关问题。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专题说明】

苏联进军波兰与卡廷事件

(1939年9月至1944年1月)

在20世纪的苏波关系史上，最令人痛心以至于难以忘记的，恐怕就是卡廷事件了。姑且不说一万多名波兰军官在苏联关押了一年以后被集体枪杀这一事件本身具有的震撼力有多大，单就苏联对此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并以遭受恶意诬陷的身份为自己洗刷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承认了这幕悲剧完全是其一手制造的“戏剧性”突变，就足以让人们记住“卡廷”了。

尽管早在1952年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就卡廷事件的事实与证据发表了七卷本的听证材料，但它和以后西方对卡廷事件的大多数研究论著一样，基本上是判定谁——苏联还是德国——应对这一悲剧事件负责，而对承担责任的一方为什么要制造卡廷悲剧，也就是其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缺少以确凿有力的材料为依据的论证。没有来自苏联本身的第一手材料，是让这些论著留有缺憾的主要原因。自1988年苏联首次正式承认由贝利亚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后，一批与此有关的绝密档案陆续公布，人们对卡廷事件的台前幕后的真相，终于清晰明了了。

本专题汇集的文件是从俄罗斯公布的有关档案中选出的。绝大多数文件是1939年9月苏军侵入波兰，至1940年冬最后决定处决被俘

的波兰军官和其他反动分子这段时间的。个别文件涉及到以后对战俘劳力的使用和对卡廷事件的调查。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到苏军统帅部制订的进攻波兰的详细计划，作战部队关于在波兰遇到的情况的报告。特别是如何处理大批战俘的文件、建立新的集中营和关押站的决定、新建战俘集中营内部的实际情况，以及来自战俘的反应等方面的材料，首次披露了战俘集中营的真实情况和战俘们的境遇，披露了主管战俘工作的各级机关和部门处理战俘的政策、方法及其运作机制，具体管理者的态度和工作失误，战俘的不满情绪以及反抗行动。

（本专题文件由吴伟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杨世招、刘舒春、徐锦栋、
吕允连、周俊英、毛子成、赵国顺）

№08013

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给白俄罗斯特别
军区军事委员会的第 16633 号训令

(1939 年 9 月 14 日)

绝密
特别重要
第 2 份

1939 年 9 月 14 日

给白俄罗斯特别军区的^①第 16633 号训令

兹命令：

1. 在 1939 年 9 月 16 日日终前隐蔽集结并做好发动决定性进攻的准备，以进行闪电般突击粉碎敌人当面部队：

(一) 波洛茨克集群（集群司令为维捷布斯克集团军群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军长^②同志），由第 50 和第 5 步兵师、第 27 步兵师、第 24 骑兵师、第 25 和第 22 坦克旅、第 205 和第 207 军炮兵团组成，分两个群集结：(1) 在奥列霍夫诺、韦特里诺地域；(2) 在别

① 白俄罗斯特别军区于 1938 年 7 月在白俄罗斯军区基础上改建。同年 9 月由它建立了白俄罗斯方面军；1940 年 7 月改为西部特别军区。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当时下辖 4 个集团军群，后分成若干个集团军。

② 瓦·伊·库兹涅佐夫，自 1938 年起任维捷布斯克集团军群司令员。1943 年晋升中将军衔，1945 年为苏联元帅。本文及以后文中的军长、师长等都是指级别不是指职务。师长级别可以当军长、集团军司令、内务部副部长等。

列津诺、列佩尔地域。

任务：从拉脱维亚边境击退敌人当面部队，总的作战方向是斯文采尼车站一线，到9月17日日终前前出到沙尔科夫希兹纳、杜尼洛维奇、库列涅茨的正面；到9月18日日终前夺取斯文采尼、米哈利什基地域。保证自己的右翼直至集团军预备队出动之时为止。以后伺机夺取维尔诺。

（二）明斯克集群（集群司令为第3骑兵军军长切列维琴科师长^①同志）由第2和第100步兵师、第7和第36骑兵师、第6坦克旅、第73和第152军炮兵团组成。在伊贾斯拉夫利、戈罗多克地域集结。

任务：以强大突击突破敌防线并向奥什米亚内、利达方向进攻，到9月17日日终前前出到莫洛杰奇诺、沃洛仁正面。到9月18日日终前夺取奥什米亚内、伊夫耶地域，以后准备对波洛茨克集群攻占维尔诺市给予协助，而其余兵力则进攻格罗德诺市。

（三）捷尔任斯基集群（集群司令为加里宁军区司令员博尔金军长^②同志）由第13和第4步兵师、第6、第4和第11骑兵师、第15坦克军、第130和第156军炮兵团组成，在凯达诺夫、乌兹达、法尼波尔车站地域集结。

任务：以强大突击粉碎敌人部队并向诺沃格鲁多克、沃尔科维斯克方向进攻，到9月17日日终前前出到杰利亚季奇、图列茨正面，到9月18日日终前前出到莫尔恰季河的河口至莫尔恰奇镇地段，随后准备进攻沃尔科维斯克，并对巴拉诺维奇市进行屏蔽。

（四）斯卢茨克集群（集群司令为博布鲁伊斯克集团军群司令

① 雅·吉·切列维琴科，自1938年任第3骑兵军军长。1941年晋升中将军衔。

② 伊·瓦·博尔金，1938年任加里宁军区司令员，1939年9月任捷尔任斯基骑兵机械化兵集群司令员，10月任奥得萨军区司令员。1944年晋升中将军衔。

员崔可夫师长^①同志)由第8步兵师和第29和第32坦克旅组成,在格罗佐夫、季姆科维奇、格列斯克地域集结。

任务:在巴拉诺维奇市方向作战,到9月17日日终前前出到斯诺夫、日利奇正面。

2.各集群行动必须快速勇猛,因此它们不应该在敌人筑垒阵地前卷入正面战斗,而是留下正面掩蔽部队,从侧翼迂回进入敌人后方,继续执行受领的任务。

3.与基辅特别军区部队的分界线:斯洛韦奇纳河河口、栋布罗维查、符沃达瓦、科茨克,以后沿韦普尔什河至河口所有白俄罗斯特别军区范围内的地域。

4.我们行动纵深的界线定在德里萨镇、随后沿与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东普鲁士边界至皮萨河、沿皮萨河到它注入纳雷夫河、从皮萨河口沿纳雷夫河左岸直至它注入布格河、从纳雷夫河口沿布格河右岸直至它的河口、从布格河口沿维斯瓦河右岸至韦普尔什河河口。

5.各集群的部队应于9月17日黎明越过国境线开始进攻。

6.军区的航空兵部队应做好充分战斗准备分散到各战役机场。航空兵的任务由军区指挥机关下达。

7.各集群的集结应受到强大歼击航空兵和高射炮兵的掩护。由歼击航空兵与轰炸航空兵、强击航空兵协同掩护进攻,应避免轰炸没驻有大量敌军的不设防城镇。

8.组织对白俄罗斯各集群所有给养的不间断供应。不容许在被攻占地域进行征用和擅自采购粮食和饲料。

^① 瓦·伊·崔可夫,1938年任博布鲁伊斯克炮兵集群司令员,1940~1942年驻中国武官。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率领第62集团军顶住了德军进攻。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1955年为苏联元帅。

9. 收到本训令后请给收据，并在9月17日晨之前呈报作战计划。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苏联元帅 克·伏罗希洛夫（签名）
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一级集团军级 鲍·沙波什尼科夫
核对无误
总参一处处长
旅长级 弗·伊万诺夫^①
总参谋长 Б. 沙波什尼科夫

第一份已于1939年9月14日17时由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司令员亲自签收。科瓦廖夫^②同志在总参工作日志上签字。

总参谋长 鲍·沙波什尼科夫
1939年9月14日于莫斯科

① 弗·德·伊万诺夫，当时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第一处处长，军长。1941年获少将军衔。

② 米·普·科瓦廖夫，1939年4月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9月起为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员。1943年晋升中将军衔。

№08014

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给基辅特别
军区军事委员会的第 16634 号训令

(1939 年 9 月 14 日)

绝密
特别重要
亲收
第 2 份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1939 年 9 月 14 日

给基辅特别军区^① 军事委员会的第 16634 号训令

兹命令：

1. 在 9 月 16 日日终前隐蔽集结并做好展开决定性进攻的准备，以便以闪电般突击粉碎敌人当面部队。

(一) 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集群（集群司令为 2 级集团军级秋列涅夫^② 同志）由第 16、第 9、第 32 和第 34 骑兵师，第 72 和第 99 步兵师、第 25 坦克军、第 26 和 23 坦克旅、第 283 和第 274

① 基辅特别军区于 1938 年 7 月在基辅军区基础上成立，9 月由其组建了乌克兰方面军。军区当时下辖 3 个集团军群。

② 伊·弗·秋列涅夫，1931～1938 年任红军骑兵副监察，1938 年任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39 年任现职。1940 年晋升大将军衔。

军炮兵团组成，在古夏金、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亚尔莫林齐地域集结。

任务：对波兰部队实施强大的闪电般突击，可靠掩护自己的左翼，并切断波兰部队窜往罗马尼亚边境的道路，果敢迅速地向乔尔特科夫、斯坦尼斯拉沃夫方向进攻，到9月17日日终前前出至斯特雷帕河，9月18日日终前攻占斯坦尼斯拉沃夫地域，后续任务是在斯特雷、德罗戈贝奇方向作战。

(二) 沃洛奇斯克集群（集群司令为文尼察集团军群司令员戈利科夫军长^①同志）由第3、第5和第14骑兵师、第96和第97步兵师、第24和第38坦克旅、第269军炮兵团组成。在沃洛奇斯克、索洛姆纳、黑岛地域集结。

任务：对波兰军队实施强大果敢突击，并迅速向特列姆博夫利亚镇、塔尔诺波尔市、利沃夫市进攻，到9月17日日终前前出至叶泽尔纳地域；到9月18日日终前夺取布斯克、佩列梅什利亚内、博布尔卡地域，后续任务是攻占利沃夫市。

(三) 舍佩托夫斯克集群（集群司令为日托米尔集团军司令索韦特尼科夫师长^②同志）由第44、第45第81步兵师、第36坦克旅、第236和第237军炮兵团组成。在诺沃格勒—沃佛斯克、斯拉武塔、舍佩托夫卡地域集结。

任务：向罗夫诺，卢茨克方向进攻，到9月17日日终前夺取罗夫诺、杜布诺地域，到9月18日日终前攻占卢茨克地域，准备往弗拉基米尔—沃佛斯克继续进攻。

(四) 为保证右翼，在奥列夫斯克、戈罗德尼察、别洛科罗维

① 费·伊·戈利科夫，自1938年9月起任现职，1940年7月任副总参谋长，总侦察局局长。

② 伊·格·索韦特尼科夫，1936~1939年参加西班牙内战，1939年7月任舍佩托夫斯克（原称日托米尔集团军群）军队集群司令员。1941年晋升少将军衔。

奇地域集结由第 60 和第 87 步兵师组成的第 15 步兵军，并向萨尔内进行积极行动。

2. 各集群的行动应迅速果敢，因此它们不应在敌筑垒阵地前卷入正面战斗，而是留下从正面掩护的部队，从侧翼迂回进入敌后，继续完成受领的任务。

3. 与白俄罗斯特别军区的分界线是：斯洛韦奇纳河河口、栋布罗维查、弗沃达瓦、科茨克，往后沿韦普尔什河直至它的河口，包括基辅特别军区的所有地域。

4. 我们行动的纵深界线定在维斯瓦河右岸从韦普尔什河口至桑河河口，沿桑河右岸从河口至源头，往后是匈牙利新界（原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边界）、与罗马尼亚的整个边界。我方部队绝对不得越过这条线。

5. 各集群部队越过国境线开始决定性进攻的时间定在 9 月 17 日拂晓。

6. 军区的航空兵部队做好充分战斗准备分散到战役机场。航空兵的作战任务由军区指挥机关下达。

7. 各集群的集结应由强大歼击航空兵和高射炮兵掩护，进攻在歼击航空兵与轰炸航空兵、强击航空兵协同掩护下进行。应避免对不驻守敌人重兵的不设防城镇的轰炸。

8. 将派出统帅部预备队的第 137 炮兵团随沃洛奇斯克集群行动。其任务是在该集群进攻敌筑垒阵地时提供支援。

9. 组织对基辅特别军区各集群所有给养的不间断供应。不容许在被攻占地域进行任何征用和擅自采购粮食和饲料。

10. 收到本训令请给收据，并在 9 月……日（日期原文空缺——原注）凌晨前呈交作战计划。

工农红军总参谋长、1级集团军级 鲍·沙波什尼科夫

克·库利克^①用红笔手书：“给鲍·沙波什尼科夫打印2份。第1份于1939年9月14日18时收到。”

库利克

1939年9月14日于莫斯科”

^① 克·伊·库利克，自1939年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和炮兵总局局长，1940年晋升苏联元帅。

№08015

白俄罗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就红军进入
西白俄罗斯领土的目的给方面军
各部队的第 005 号命令
(1939 年 9 月 16 日)

第 005 号

秘密

白俄罗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

1939 年 9 月 16 日 第 005 号 斯摩棱斯克市

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同志们！

波兰地主和资本家一直奴役着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劳动人民。他们用白色恐怖、战地法庭、讨伐队压制革命运动，进行民族压迫和剥削，使经济破产，民不聊生。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向波兰人民提供了分离出去的权利，但波兰地主和资本家却镇压了工人农民的革命运动，夺取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使这些地区的人民脱离了自己的苏维埃祖国，使他们落入被奴役和受压迫的枷锁之中。

大地主的波兰统治者现在还把我们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弟兄投入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当炮灰。民族压迫和对劳动人民的奴役导致了波兰的军事毁灭。

被压迫的波兰劳动人民正面临彻底破产和被敌人蹂躏的威胁。

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革命运动正蓬勃发展。在波兰的白俄

罗斯和乌克兰农民开始了暴动和起义。波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正团结自己的力量，以拧断吸血鬼压迫者的脖子。白俄罗斯方面军的战士、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同志们，立即向我们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弟兄提供援助和支持，使他们免遭破产和免受敌人折磨，这是我们革命的天职和神圣义务。

我们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时，并不打算违背苏联与德国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我们只是不容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敌人往他们身上戴上新的剥削和贫困的锁链，使他们遭受折磨和侮辱。

我们不是为了去掠夺，我们是为了解放我们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弟兄和波兰劳动人民。

我命令：

1. 白俄罗斯方面军各部队全线转入决定性进攻，坚决前去救援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劳动人民。

2. 以闪电般的毁灭性突击粉碎大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军队，以解放西部白俄罗斯的工人、农民和劳动人民。

我们的口号是为幸福的苏维埃祖国而战，为伟大的斯大林而战，履行军人誓词，履行自己对祖国的职责。

本命令自1939年9月16日16时起，在所有连队、炮兵连、骑兵连、航空兵大队和各班组中宣读。

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员、2级集团军级 科瓦廖夫
白俄罗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军级政治干部 苏赛科夫
师级政治干部 斯莫卡切夫
师长 波诺马连科

№08016

波将金与波兰大使
格日博夫斯基的谈话摘录

(1939年9月17日)

秘密

第2份

摘自波将金^①日记^②

第5483号

接见波兰大使格日博夫斯基^③

1939年9月17日3时15分

大使被我们在夜里2时从床上叫起，当他3时来到外交人民委员部时明显面带惊恐，我向他宣读了莫洛托夫同志致波兰政府的照会，然后将照会交给他。

大使由于激动说话困难。他向我声明，他不能接受交给他的这份照会。他驳斥了照会中对波兰军事和政治局势的评价。大使认为，波兰-德国战争才刚刚开始，不能说波兰国家已经瓦解。波兰军队的主力还保存完好，正在准备对德军实行坚决抗击。在这种条件下，红军越过波兰边界是对波兰共和国无缘无故的侵犯，照会用

① 弗·别·波将金，苏联外交家。1922~1937年期间曾任驻法国、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等国外交官员；1937~1940年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② 波将金的这份摘录送给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欧洲司。

③ 瓦·格日博夫斯基，1936~1939年任波兰驻莫斯科大使，1939~1940年为巴黎德国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波兰代表。

随意编造的事实为这种侵犯辩护，似乎波兰已被德国彻底粉碎，似乎波兰政府已不复存在，所以大使拒绝将苏联照会通知本国政府。

我反驳格日博夫斯基说，他不能拒绝我交给他的照会。这份由苏联政府发出的文件包含着一些特别重要的声明，大使有责任立即将这些声明告知本国政府。如果他拒绝履行自己这一最首要的职责，他对自己国家要承担的责任就太重大了。正在决定波兰的命运时刻，大使无权对自己国家隐瞒包含在苏联政府对波兰共和国照会中的信息。

格日博夫斯基显然对我列举的理由无法反驳。他试图借口说我们的照会应通过我们的全权代表交给波兰政府。对此我回答说，我们在波兰已不再有全权代表处，除了或许为数不多的技术人员之外，代表处全体成员均已回到了苏联。

此时格日博夫斯基声称，他与波兰政府没有经常的电报通信联系。两天之前他被建议经布加勒斯特与政府联系，现在大使尚不清楚，这条线路能否被他所用。

我向大使了解波兰外交部长此时在何处，他回答，看来是在克列梅涅茨。我于是向大使提议，如果他愿意，可以保证他用我们到克列梅涅茨的线路立即转发他的电报通知。

格日博夫斯基重又开始证明他不能接受照会，因为这似乎是与波兰政府的尊严不相容的。

我向大使宣布，照会我已向他宣读，内容他已知道，如果大使不愿把照会带走，我们就将它送到他的大使馆去。

我于是决定将照会送到大使馆，在大使回去之前交给那里的人签字。我请格日博夫斯基等我几分钟，解释说，我打算把他的态度用电话通知莫洛托夫同志。

我出来时吩咐立即用我的汽车把照会送往波兰大使馆，让我的秘书处工作人员把它交给大使馆并让他们签收。

我用电话向莫洛托夫同志报告了大使的立场，然后回到格日博夫斯基处与他继续谈话。大使仍然竭力证明，说波兰根本没被德国打垮，况且英国和法国已经在向它提供实际援助。当谈到我们进入波兰领土时，大使叫道，如果发生此事，就将意味着第4次瓜分和灭亡波兰。

我向大使指出，我们的照会许诺从战争中拯救波兰人民并帮助他们过上和平的生活，格日博夫斯基仍然十分激动，说我们在帮助德国毁灭波兰。在这种条件下，大使不明白我们把关于苏军进入波兰领土的命令通知波兰政府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向大使指出，或许波兰政府收到我们的照会不仅会理解我们决定的理由，而且会同意对我们的进攻进行任何抵抗都是毫无意义的。也许这可以避免武装冲突和无谓的牺牲。

因为我反复向大使警告，如果他拒绝向政府转告我们的照会的话，他有可能对国家承担的责任，格日博夫斯基终于开始投降了。他向我声明，他只向自己的政府通知我国照会的内容，他甚至请我给予可能的协助，以便尽可能快地将他的电报传回波兰。至于作为文件的照会，大使仍然不能接受它。

我向格日博夫斯基重申，照会将送交他的大使馆。

在大使离开时我被告知，当格日博夫斯基还在我这里时，照会已送到大使馆并在那里被签收。

波将金

1939年9月17日于莫斯科

№08017

贝利亚就国防委员会关于白俄罗斯特别军区、
基辅特别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里的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转入战时
状态并在三个军区开设战俘接收站的
决议草案给莫洛托夫的便函

(1939年9月17日)

机密

第4271/B号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莫洛托夫同志

工农红军总参谋部请求在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开设8个战俘接收站^①并在科泽尔斯科(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普季夫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开设2个战俘分配站。

战俘接收站以及战俘分配站的守卫和战俘的押解工作,均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负责。为保证看守和押解战俘,内务人民委员部请求批准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委员会关于转入战时状态

^① 内务人民委员部已有的战俘接收站分别设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日特科维奇、斯托尔布齐、季姆科维齐、奥列霍夫斯克、拉多什科维奇,乌克兰境内的亚尔莫林齐、卡緬涅茨-波多利斯基、舍佩托夫卡、沃洛奇斯克、奥列夫斯克。

并实行动员的决议草案。以便按现行动员计划，动员驻守在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押解部队。

附：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委员会决议草案。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贝利亚

1939年9月17日于莫斯科

№0801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在白俄罗斯特别
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列宁格勒军区里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并
将战俘接收站的守卫交给其负责的决议**

（1939年9月18日）

秘密
特档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7/150款

1939年9月18日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39年……会议第7号记录摘录

1939年9月18日决议

150. 国防委员会

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的问题

批准国防委员会下列决议

1. 从1939年9月20日起，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

2. 押解部队接管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境内所有战俘接收站及科泽尔斯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普季夫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战俘分配站的守卫任务。

中央书记

1939年9月18日于莫斯科

№08019

**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就国防人民委员
关于战俘运输和向内务人民委员部
机构移交战俘给白俄罗斯特别
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的命令**

(1939年9月19日)

绝密
莫斯科

立即用直通线路经作战值班员转达

致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军事委员会

副本致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战俘运送办法如下：

1. 到达国境线之前，战俘按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运送。
2. 为战俘运送划出道路专线，绝不容许在我军主要运动路线上运送战俘。
3. 在划出运送战俘的线路上安排临时饮食供应站，这些饮食供应站不要使用行军炊食车而使用饭锅。
4. 抽调步兵连和步兵师的骑兵连及骑兵师的骑兵连组成专门的战俘押送队。
5. 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移交战俘的工作在交接站进行。
6.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交接站设在：
 - (1) 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奥列霍夫诺、拉多什科维奇、斯托尔

布齐、季姆科维奇、日特科维奇；

(2) 基辅特别军区：奥列夫斯克、舍佩托夫卡（边境上）、沃洛奇斯克、亚尔莫林齐、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

7.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申请，由工农红军军事交通部门首长下达命令，调拨回程空车厢将战俘从内务人民委员部交接站继续后送至科泽尔斯克和普季夫尔。第一批这样的军列发送日期为9月20日晚。

8. 请报告所采取的措施和下达的指示。

沙波什尼科夫

古谢夫^① 核对无误。

工农红军总参谋部

第12处处长 乌特金

^① 尼·伊·古谢夫，1935年在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工作，1938年任总参兵役局军事委员。

№08020

贝利亚关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组建战俘事务管理局、批准它的编制并组建战俘营的命令

(1939年9月19日)

秘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命令

1939年9月19日 第0308号 莫斯科市

1. 依据战俘处置办法，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组建战俘管理局。

2. 批准附件中的战俘管理局编制。

3. 任命 П.К. 索普鲁年科少校同志为战俘管理局局长，上校级政治干部涅霍罗舍夫为该局政委。任命下列同志为该局副局长：

(1) 国家安全中尉 И.И. 霍赫洛夫同志；

(2) И.М. 波卢欣少校同志为负责警卫勤务的副局长。

4. 组建以下 8 个战俘关押营地：

(1) 奥斯塔什科夫营——以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加里宁州斯托洛布诺耶（谢利格尔湖内）（正确的应为斯托洛布内依。——原注）岛上原少年劳教营的房屋为基础组建，容纳 7 千人。到 10 月 1 日前使其能容纳 1 万人。

(2) 尤赫诺夫营——以西部铁路巴贝尼诺站的“帕夫利谢夫针叶林”疗养院房屋为基础组建，容纳 5 千人，至 10 月 1 日前使其容纳 1 万人。

(3) 科泽尔斯克营——以捷尔任斯基铁路的科泽尔斯克车站高尔基休养所房屋为基础组建，容纳7千人，到10月1日前使其能容纳1万人。

(4) 普季夫尔营——以前索夫罗尼耶夫修道院和莫斯科-基辅铁路的捷特金诺站的泥炭开采场房屋为基础组建，容纳7千人，到10月25日前使其能容纳1万人。

(5) 科泽利希纳营——以属于南方铁路科泽利希纳站的前科泽利希纳修道院房屋为基础组建，容纳5千人，到10月1日前使其能容纳1万人。

(6) 旧别尔斯克营——以属于莫斯科-顿巴斯铁路旧别尔斯克站的前旧别尔斯克修道院房屋为基础组建，容纳5千人，到10月1日前使其能容纳8千人。

(7) 尤扎营——以北方铁路维亚济尼基站内务人民委员部少年劳教营房屋为基础组建，容纳3千人，到10月5日前使其能容纳6千人。

(8) 奥兰营——以莫斯科-喀山铁路兹纳缅卡站前奥兰修道院的房屋为基础组建，容纳2千人，到10月1日前使其能容纳4千人。

5. 批准后附的各战俘营标准编制、战俘营工作细则和战俘营规章制度。

6. 批准各营主任和政委的任命：

(1) 奥斯塔什科夫营——

主任——П.Ф. 鲍里索韦茨少校

政委——高级政治指导员 И.В. 尤拉索夫（原文如此，正确的应是 П.А. 尤拉索夫——原注）

(2) 尤赫诺夫营——

主任——Ф.И. 卡德舍夫少校

政委——营级政治干部 E. III. 吉利乔诺克

(3) 科泽尔斯克营——

主任——B. H. 科罗廖夫少校

政委——高级政治指导员 M. M. 阿列克谢耶夫

(4) 普季夫尔营——

主任——H. H. 斯米尔诺夫少校

政委——营级政治干部 C. II. 瓦夏金

(5) 科泽利希纳营——

主任——B. II. 索科洛夫国家安全上尉

政委——Ф. С. 阿库连科大尉

(6) 旧别尔斯克营——

主任——别列日科夫国家安全大尉

政委——营级政治干部 M. M. 基尔申

(7) 尤扎营——

主任——A. Ф. 基伊国家安全少尉

政委——Г. B. 科罗特科夫国家安全上尉

(8) 奥兰营——

主任——索罗金国家安全上尉

政委——B. II. 库兹涅佐夫国家安全中尉

7. 各营中对战俘的肃反业务工作交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及其在当地的机构负责。责成科布洛夫（召集人）、别利亚诺夫、索普鲁连科和科尔尼延科同志在 2 天时间内制订出对各军区特别处的必要指示并报送我批准。

8. 批准各战俘营主任和政委的工资额如下：奥斯塔什科夫、尤赫诺夫、科泽尔斯克、普季夫尔、利泽利希纳、旧别尔斯克：2400 卢布；尤扎和奥兰营：2000 卢布。

规定战俘管理局和战俘营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与劳动改造管理

总局和劳改营现行工资标准水平相同。

9. 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负责编制申请并及时筹集粮食、给养和医疗卫生物资的供应。

对战俘营的供应工作由我的副职切尔内绍夫师长同志具体负责。

10. 战俘事务管理局及各战俘营的财政问题交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财政计划处负责。对战俘营管理局的财政工作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财政计划处处长、师级军需官别林佐恩同志具体负责。

11. 责成我的副职马斯林尼科夫师长同志负责组织战俘接收站的警卫、从接收站到战俘营途中的押送、战俘管理局首长值班和战俘营的警卫等工作，并根据后面所附的部署一览表调配押送部队分队所需的数量。

12. 责成加里宁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托卡列夫上校同志、斯摩棱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库普里亚诺夫国家安全大尉同志、切尔尼戈夫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德米特里耶夫国家安全大尉同志、波尔塔瓦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布赫季亚罗夫国家安全大尉同志、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切列瓦坚科国家安全大尉同志，伊万诺沃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布利诺夫国家安全大尉同志、高尔基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费久科夫国家安全少校同志，会同当地战俘营主任和政委：

(1) 根据劳动改造处的动员计划，保证根据本命令第7点组建的战俘营的展开；

(2) 按照本命令批准的标准编制并根据劳动改造处现行动员计划配齐各战俘营的人员；

(3) 派下列同志出差10天以帮助展开战俘营

劳动改造处副处长波利亚科夫同志——去加里宁州；

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副局长、旅级政治干部瓦西里耶夫同志——去斯摩棱斯克州；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技术检查处处长国家安全上尉雅克采维奇同志——去伊万诺沃州；

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检查处副处长、国家安全中尉洛布杰夫同志——去高尔基州；

责成我的副职、3级国家安全委员克鲁格洛夫同志出差2天，以完全配齐苏联内务人民委会战俘管理局人员。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级国家安全委员 贝利亚

1939年9月19日于莫斯科

№08021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战俘事务管理局条例”**

(不早于1939年9月19日)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

条 例

一、总 则

1. 战俘事务管理局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编制内、享有独立的局级权利的机构。

副内务人民委员切尔内绍夫师长同志对战俘事务管理局实施直接领导。

2. 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实施对局的领导，并根据苏联政府关于战俘的决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现行命令以及根据本条例指导其工作。

3.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直接领导战俘营的组织及对战俘的配置、接收、登记、关押和在工作中使用战俘，制订战俘接收站、战俘营的条例，颁布战俘营关押看管和内部规章制度的细则和指示。

4.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对战俘接收站和战俘营的状况负责，对局和它的地方机构的所有工作实施日常领

导。

二、局的任务

1. 与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协同组织战俘接收站、战俘分配站和转运站；
2. 从工农红军野战指挥机关接收战俘；
3. 及时将战俘从接收站后送；
4. 规定接收站和战俘营的内部规章、战俘关押的规定和制度；
5. 制订对战俘住房、被服、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保障标准，安排上述种类给养的供应办法；
6. 制订战俘在战俘营的津贴标准；
7. 规定战俘在战俘营关押期间手中容许保留现金总额标准；
8. 规定给战俘寄送包裹中可允许的物品标准和种类；
9. 根据《战俘条例》组织在苏联工农业中对战俘劳动的使用；
10. 领导对战俘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并制订相应的制度；
11. 参照工农红军纪律和警卫条令颁布关于施加和执行纪律惩戒的规定和办法。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

(索普鲁年科)

1939年于莫斯科

№08022

内务人民委员部就对战俘进行作战 登记给战俘营特别科的指示

(1939年9月19日)

绝密

关于对战俘进行作战登记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战俘营特别科的指令登记与注册

为组织对战俘作战登记的统一体制，特规定下述程序：

1. 战俘一到战俘营，营的登记注册科就应立即为每个战俘填写问讯表并附照片（附件1）（格式2）呈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科。

2. 特别科根据问讯表为每个战俘填写2张按字母顺序的卡片（附件3）并建立登记档案。

3. 将战俘的登记档案订入注册簿，注册簿的顺序号就是登记档案号（附件8）。

往登记档案内放入问讯表。

4. 将登记档案号填到登记卡上，然后将1张卡片放入特别科卡片箱中，另一张送交战俘营所在地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局相应的第一特别处。

登记档案封面上须作上标记——时间、登记卡送到了何处及发

文号。

每个战俘营应专门抽出一名工作人员来直接从事作战登记工作（大的战俘营设作战登记小组）。

对战俘营的战俘进行谍报工作和侦讯工作的办法

5. 对进行反苏工作的战俘，被怀疑进行特务活动的战俘，与波兰社会党^①、毕苏斯基^②分子、国民民主党^③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及别的反革命政党和组织有联系的战俘，以及所有军官，都要建立履历案卷，这些案卷要登记在一个专门的簿册中（附件6）。

对每一个需要建履历案卷、并要对其进行谍报工作和侦讯工作的战俘都要填写1张卡片（附格式）并寄送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特别处，以便反映到反苏分子的登记中。

6. 办理逮捕手续参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8月11日第00931号命令进行。

办理招募

7. 在战俘营招募战俘做特工工作，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6月28日第00858号命令执行。

战俘登记档案的转交转寄

-
- ① 波兰社会党成立于1892年。从1918年至1939年，在以毕苏斯基为首的右派（又称元老派）把持下，一直是波兰的执政党。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该党宣布解散。之后，原党内右翼组成“自由、平等、独立”秘密组织，与伦敦流亡政府保持联系；1940年9月，在该党基础上又组成了波兰社会主义者组织，后称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
- ② 毕苏斯基·约瑟夫，波兰政治家和军事家，波兰社会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在1918~1922年、1926~1935年充任波兰的实际统治者，是“萨纳齐”制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 ③ 简称“恩代齐”，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波兰资产阶级政党，宗旨是为争取波兰独立而斗争，提出反德、反俄、反犹口号。后成立了“工人国民同盟”的武装组织，对进步工人进行暴力恐怖活动。

8. 当战俘被送到其他战俘营时，登记档案、履历案卷以及间谍（线人）的个人档案，应由特工科转寄到战俘被送达地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对此应在卡片和登记簿中作相应标记。

9. 被从战俘营释放的战俘，其档案转寄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局）的第一特别处，并在卡片箱中作上标记。

对战俘营中战俘的作战登记组织工作的监督，交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战俘营所在军区的特工处处长负责。

10. 每月1日之前，在战俘营中进行业务活动的特别科应将业务报告呈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保密处，并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特别处寄送一份副本，其中应汇报以下问题：

(1) 战俘营中关押战俘数目，其中军官数、宪兵数、国家安全机构人员数各多少；

(2) 建立履历案卷数量、搜集谍报数量、招募间谍（线人）数量、逮捕的数量（指明逮捕原因及供认内容）。

11. 由战俘营所在地相应内务人民委员部或内务人民委员局首长负责供应一切必须的登记材料。

12. 在战俘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科撤消时，所有建立的谍报、业务材料和登记材料按手续转交所在地内务人民委员部（局）第一特别处保存。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特别处处长、国家安全大尉

彼得罗夫

1939年9月19日于莫斯科

№08023

乌克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就关闭兹布鲁
奇河口及其以西国境线给基辅军区
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司令员
奥索金的训令

(1939年9月19日)

绝密

致基辅军区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司令员奥索金^①同志：

军区军事委员会责成您全权负责兹布鲁奇河口及其以西国境线的保卫工作。

任务：立即关闭上述地段国境线，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容许波兰士兵和军官离开波兰前往罗马尼亚。

请南方集群集团军级司令员秋列涅夫同志酌情拨出一定的部队归奥索金同志指挥，使其能够保障所占领土与罗马尼亚之间的边界。

保证所抽调部队的给养、装备、燃料和弹药的供应。

乌克兰方面军一级集团军级司令员 铁木辛哥^②

① 瓦·瓦·奥索金，少将，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任基辅特别军区边防部队管理局局长，后任重新成立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防空总局局长。

② 谢·康·铁木辛哥，苏联军事领导人。1938年任基辅军区司令员，1939年9月任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1940年5月至1941年7月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军事委员会委员军级政治委员 鲍里索夫^①

赫鲁晓夫^②

1939年9月19日于基辅

① 弗·尼·鲍里索夫，政工人员，1939年起先后任基辅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乌克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② 尼·谢·赫鲁晓夫，苏联著名党和国务活动家。1938～1949年任联共（布）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39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1939年为乌克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获中将军衔。

№08024

《战俘条例》草案

(1939年9月19日)

绝密

战俘条例（草案）

一、总 则

1. 在军事行动中被抓获、属于与苏联处于战争状态国家的武装力量编成内的人员，以及在苏联领土上被拘留的这些国家的公民，被认为是战俘。根据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命令，下列人员也可被认为是战俘：

(1) 在军事行动中被擒获，不属于敌对武装力量的武装队伍人员，如果这些队伍是在工农红军没有占领的敌人领土上产生、具有军事组织的标志、公开携带武器并遵守国际法确定的战争常规的话；

(2) 得到相应允许、伴随敌人陆军和海军的非军人，如记者、供应商及其他在军事行动中被擒获的人员。

2. 禁 止

(1) 虐待战俘：对他们进行侮辱、威胁及其他行动；

(2) 对战俘采取强制措施以获得关于他们国家军事及其他方面状况的情报；

(3) 搜缴战俘的军装、衬衣、鞋及其他私人生活用品、私人文件和荣誉奖章。

战俘的贵重物品和现金可以由专门被授权的人出具正式收据缴没保存。

3.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本条例的指令和规则，应在所有战俘均可阅读到的地方张贴，这些指令和规则，以及有关战俘的命令和指示，将用俄语和战俘熟悉的语言向他们宣布。

二、战俘的后送

4. 战俘被俘后应立即送往战俘营。

5. 在俘获时，应根据部队或兵团指挥机构的委托对战俘进行登记。在登记时，每个战俘有义务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父称、年龄、籍贯和在部队花名册的编号。

这些信息将随战俘一起转交他们以后将去的地点。

6. 需要医疗帮助或住院治疗的伤、病战俘，应立即由部队指挥员送往最近医院。

身体康复的战俘由医院当局转交战俘营。

7. 战俘的关押（饮食、警卫、卫生、医疗和政治服务）。

(1) 战俘在到达接收站之前，按军队指挥机关的指示实施。

(2) 以后——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指示实施。

8. 战俘在移交战俘营接收站或这些站（或战俘营）因他们身体康复从医院接收他们之后，即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管理。

三、战俘被关押的条件及其法律地位

9. 战俘接收站在军队后方根据军队指挥机构的命令展开，而战俘营则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命令与国防人民委员部协商在军

事行动区域之外组建。

10. 对所有战俘规定的关押条件相同。

军官战俘与相当军官的战俘，与其他战俘分开单独安置。

11. 战俘享有住房、卧具、衣物、鞋、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规定的标准津贴。

对战俘供应的物品和食物品种的清单连同发放标准，应悬挂在简易宿舍、医院及其他安置战俘的房屋的眼显的地方。

战俘如得到旁人的食品帮助和其他帮助，苏联机构对他们的供应不应因此而减少。

12. 战俘被允许穿戴他们的制式军服，但不得佩戴等级职务标志和荣誉奖章。禁止战俘携带和保存武器。

13. 战俘在医疗卫生方面享有与工农红军后勤部队军人相同的服务。

除战俘营编制内的医务人员外，还可以吸收被苏联武装力量暂时拘留的敌军医务人员对战俘进行卫生医疗服务。

14. 战俘享有的权利：

(1) 一有可能就立即将自己被俘的消息通知祖国；

(2) 自费购买食品、衣物、卧具、鞋及其他个人生活用品和必需品；

(3) 从祖国和从中立国获得食品、衣物及其他必需品包裹而不必缴纳关税、消费税、不须许可证；

(4) 从祖国和从中立国获得汇款。

15. 为维持内部秩序并与战俘联系，管理当局可从战俘中任命组长、室长、宿舍长等等（根据战俘安置条件），战俘可通过他们口头或书面向战俘营管理当局或其他机构投诉、提出要求、发表声明等。

16. 战俘可免费寄发和得到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

理局规定数量内的邮件（秘密和公开信函、汇款和保价信函）。

17. 向战俘寄来的外币汇款，按现行汇率兑换成苏联货币。

战俘可在手中保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规定标准数额内的现金，超过标准的余额由战俘营当局存入国家劳动储蓄所。发还超标准的钱款须得到战俘营管理当局的允许。上述标准不适用于战俘在工业、农业、机关和企业工作得到的工资。

18. 战俘的遗嘱按战时军人遗嘱的形式撰写，确认战俘死亡事实的程序也相同。

19. 埋葬死亡战俘与埋葬军人相同。埋葬地点要以应有方式办理手续。

死亡战俘的现金和文件交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同盟执行委员会的中央问讯处，以寄给死者的继承人。

寄给死亡战俘的食品包裹，交战俘代表或战俘负责人在战俘中分食。

20. 战俘必须服从战俘营管理当局并执行本条例规定的一切规章，以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参照工农红军内务条例颁布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

四、战俘的劳动就业

21. 列兵和士官战俘可依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制订的特别规定，被安置在战俘营外苏联工业和农业部门工作。

军官和相当军官的战俘可依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的特别命令，安排在战俘营外工作。

22. 战俘自其参加战俘营外工作之时起，即取消其从国家获得的一切形式的给养供应。

23. 被安置在战俘营外工作的战俘，享有其工作的企业和组织提供的住房和市政服务的保证。

24. 对营外安置工作的战俘，适用于在该地区工作、该劳动部门工作的苏联公民的劳动保护和工作时间的规定也适用战俘。

25. 参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工作的战俘，可获得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规定数额的劳动报酬。

从战俘的工资收入中，应扣除补偿其生活花费部分（房租、市政服务、饮食，如系集体组织的，则扣除总的伙食费）。

26. 禁止下列场合使用战俘劳动：

(1) 有战斗行动区域的工作；

(2) 为管理机关的私人需要服务，以及为其他战俘的私人需要服务（勤务兵）。

五、战俘的刑事和纪律责任

27. 战俘如果犯罪，将依据苏联和加盟共和国的法律承担刑事责任。

此种情况下，战俘不执行他所服从的人的命令，反抗这些人员或在他们执行公务时以行动侮辱他们，相当于相应的军人犯罪。战俘因此类罪行应受军事法庭审判。

在其余情况下，对战俘的起诉按一般程序进行审理。

28. 对不承担由法庭审理的刑事责任所犯的罪错，战俘应受到纪律惩戒。

这些惩戒的种类、给予办法及申诉、纪律惩戒的执行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依照工农红军纪律条令颁布的规则决定。

29. 正接受侦讯或者被法庭判处某种惩罚，以及正受纪律惩戒的战俘，不得补充遭受某种超出所接受的侦讯或审判状况、以及所受纪律惩戒或法庭判决状况以外的限制。

30. 关于每次作出的有罪判决，自作出该判决之日起至多 20

天内，由作出判决的法庭通知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同盟执行委员会。在作出有罪判决的情况下，此种通知还应附上判决书副本。

判处战俘极刑的判决必须在作出判决后立即通知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同盟执行委员会，并且在作出该判决至少一个月后才能执行。

六、关于咨询和对战俘提供帮助的安排

31. 交换战俘名单及与外国和国际红十字会或咨询机构就战俘事务进行的交涉，由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同盟执行委员会实施。

为此目的，在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同盟执行委员会下设立中央战俘咨询处，该咨询处依据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同盟执行委员会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会协商批准的特别条例行事。

32. 允许外国和国际红十字组织或其他组织来苏联领土为战俘提供帮助，并经外交人民委员会特许了解战俘关押条件。

33. 自宣布战争状态之日起，组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该局职能、结构和编制，由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的该局条例决定。

核对无误。

切尔内绍夫

9月20日

№08025

库利克关于红军部队和兵团在西乌克兰的作战 行动及该地区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报告

(1939年9月21日)

绝密

莫斯科。致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同志

1. 红军转入进攻时，波兰军队士气一落千丈。除边防部队、民团和总司令部领导的撤退部队所进行的零星抵抗外，红军几乎没遭遇任何抵抗。

2. 俘获大量普通士兵和军官。部分俘虏已由铁路从斯坦尼斯拉沃夫送往古夏金，但大部分已跑散回家。因为土路工段^①没建立起来，俘虏没有饭吃。总之，我们对接受如此大量的俘虏尚未准备好。因此正在选调军官。在俘虏中正开展政治工作。我认为，政府必须下一道指示，在登记后遣散乌克兰籍和白俄罗斯籍的俘虏，因为没食物供养他们，押送也需要大量人力。

3. 由于暴雨，道路泥泞，汽车抛锚挡住了去路，所以头两天（9月17、18日）部队前进十分困难。秋列涅夫同志集群中的左翼摩托化军特别艰难。因为他们须在大暴雨后的9月17日渡过兹布鲁奇河，而9月18日又冒着大雨强渡德聂斯特河。但在大家共同努力和我亲自疏通道路的情况下，达到了一昼夜推进50~60公里

^① 为修筑军用土路服务的行政与技术单位。其任务职责是保证和保持运送军需用品的道路畅通。

的速度。就因为下雨，乌克兰方面军下达的推进速度没能达到。步兵所乘的汽车和非军人司机都没受过乘车行动的训练，指挥员不善于维持秩序并排除出现的汽车堵塞局面。

4. 大部分居民情绪高昂地迎接红军。但在大城市中，特别是斯坦尼斯拉沃夫，知识分子和商人对红军的态度比较冷淡。

5. 在与罗马尼亚接壤的扎列希基市缴获了一家银行，其中有没运走的部分贵重物品和纸币。在那里还缴获了一辆准备开往罗马尼亚的装满钱的汽车。鉴于该市位于罗马尼亚边界附近，且留下的守备力量薄弱，所以司令部安排了对银行的保卫并把贵重物品运往斯坦尼斯拉沃夫。

6. 我们所选调的在工农红军占领居民点后组织地方政权的人，大大落后于部队推进速度，大城镇的政权常常在部队到达1~2昼夜后才开始组建。这破坏了我们的威望并降低了居民的热情。必须由联共（布）中央下达指示催促这些人加快前进和组织地方政权的速度。大城市中必须由我们选调的同志加强各级机关。

7. 由于我们推进速度快，所以除几座小桥外，铁路网和桥梁都没被破坏。需要交通部门派一个机构来组织运输，以便为红军运送粮食和供应城市，特别需要加快往城市运送这里奇缺的物品：糖、盐、火柴、茶、煤油。

8. 由于我们推进速度快，后方还未被控制，波兰军队抛下武器逃散到各个村庄，必须往秋列涅夫同志集群活动的地区增派一个强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队，因为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边境地区毫无疑问会有零星匪徒，进行反对红军的挑衅破坏活动并使本地居民情绪颓丧。因为被切断了逃往罗马尼亚的道路，所以在斯坦尼斯拉沃夫聚集了许多逃亡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必须尽快从该市肃清这一群残渣余孽。

9. 还必须解决我们的卢布问题。这里兹罗提比我们的卢布价

值高，以后我们的工业品看来必须以本地价格出售。

10. 必须解决本地警察及其工资问题。

11. 在地主庄园里还留有成垛的没磨成面的粮食以及大量牲畜。地主庄园中还有糖厂和酒厂，其工人已经逃散。有的地方已出现抢劫地主庄园的企图。需要就此问题尽快下达指示。我个人认为，地主的粮食可以用于供应城市和红军。

12. 本地学校用波兰语授课，只有个别地方教授乌克兰语。学校今后如何工作、对此问题也还没有指示。

13. 出版报纸供应居民的问题十分尖锐。居民们只能听政工人员、指战员的口头宣传。必须首先保证乌克兰文报纸的发行，为此需要干部。

14. 波兰政府给逃跑的高官们提前发了7个月薪饷，而工人们已4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只好就地具体了解每个人情况后给工人们发工资。

15. 必须尽可能多地往这里送来乌克兰文、白俄罗斯文和犹太文书籍。

16. 鉴于波兰人对乌克兰人巨大的民族压迫，使乌克兰人已忍无可忍，所以在一些情况下发生了乌克兰人与波兰人的斗殴，甚至砍死了波兰人。政府必须尽快向居民发出呼吁书，因为这有可能变成很大的政治问题。

库利克^①

1939年9月21日于斯坦尼斯拉沃夫

① 格·伊·库利克，早年加入沙俄军队，1918年加入红军，后负责红军炮兵事务和军工生产。1939年1月起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总军械部部长。1940年获苏联元帅衔，后因指挥作战失误被降为少将。

№08026

《战俘营条例》

(1939年9月23日)

绝密

我批准

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师级政治委员（切尔内绍夫）

1939年9月23日

战俘营条例

一、总 则

1. 为关押从工农红军接收的战俘，特组建专门的战俘营。
2. 战俘营的主要任务是：
 - (1) 在与周围居民隔离条件下关押战俘；
 - (2) 建立排除战俘任何逃跑可能性的制度；
 - (3) 在战俘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群众文化工作。

二、战俘营机关的结构、编制和职能

3. 战俘营管理机关包括

- (1) 办公室，
- (2) 特别科，

- (3) 政工科，
- (4) 登记分配科，
- (5) 总务科，
- (6) 财务科，
- (7) 卫生科，
- (8) 内部警卫队，
- (9) 消防队。

战俘营管理机关的编制由内务人民委员批准。

只有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命令才能变更战俘营的结构。

4. 战俘营管理机关的职能

(1) 对战俘营实施领导

战俘营以主任、政委以及主任助理为代表对除特别科以外的营机关实施总的领导。

营的副主任同时是部队和门卫的首长，实施对营的警卫部队的领导。

值班警卫长负责新来战俘的接收和安置，保持营范围内的秩序并领导营出入证发放处的工作。

(2) 营办公室

- ①负责除特别科和小医院以外营所有科室公文的布置和组织；
- ②登记进出文件，包括除特别科文件以外的秘密和机密通信；
- ③对涉及营活动的信件进行保存和装订存档；
- ④对营的各科（特别科除外）及时完成信函和交办的任务实施监督；
- ⑤对营的人员进行登记；
- ⑥为营的工作人员开具出差证明，并对来营出差的人员登

记注册。

(3) 特别科

实施对战俘的肃反业务工作。

(4) 政工科

在战俘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领导俱乐部和图书馆的工作。在营的管理人员中开展政治工作。

(5) 登记分配科

对战俘进行人员登记和统计登记，并对军官和相当军官的人员进行专门登记。

对所有来营的战俘进行注册。准备战俘专列的发送并办理他们离营的手续。宣布对逃跑战俘的通缉。

(6) 总务科

①执行对营的各种供应物品的保证工作（粮食、饲料供应，工作人员的武器，工作人员和战俘的给养，营的燃料供应、运输工具、燃料、设备和家具的保证等）；

②维持营的房屋和营区井然有序和设备完好，执行房屋的改造修理工作；

③组织和领导澡堂、洗衣房的工作；

④组织战俘物品的保管工作；

⑤保持通信设备、电气设备和电子照明设备完好；

⑥组织和领导营的交通工作并保持交通工具正常；

⑦对食品保管登记，对营的所有财物和作坊进行物资登记。

(7) 财务科

①负责营的财政保证，以及对营的钱财账目的组织和制作；

②对营的工作人员工资的抄录和发放；

- ③给战俘发放津贴；
- ④办理战俘的个人账户。

(8) 卫生科

- ①组织对战俘的医疗帮助；
- ②对来营战俘进行卫生处理，并对房间、衣服被褥消毒；
- ③对营的房屋、面包房和厨房的卫生状况实施监督；
- ④采取预防流行病的措施并进行预防接种；
- ⑤保证营医疗卫生机关必须的医疗卫生器材和药品；
- ⑥对医疗卫生器材和药品的进出制造报表，并对到门诊部就医的战俘登记；
- ⑦对生病率和死亡率进行卫生统计登记。

(9) 内部警卫队

- ①根据制订的计划担任营的内部警卫；
- ②维持营区秩序，对战俘执行内部规章情况进行监督；
- ③参加对宿舍和战俘个人的搜查；
- ④配合部队警卫预防和消除战俘逃跑。

(10) 消防队

- ①保证整个营区消防器材应有的状况并做好防火准备；
- ②在营区实施防火措施及消灭火灾。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少校 索普鲁年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团级政委 涅霍罗舍夫

1939年9月23日于莫斯科

№08027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
关于在战俘营组织战俘登记工作的训令

(1939年9月25日)

机密
特急

战俘营第2科^①担负着复杂而责任重大的工作，他们要组织对战俘的各种登记并建立一系列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机构的业务工作将十分有用。

对战俘登记及填写各种文件的工作应在战俘到达营区的头几天中进行，而且应该保证这一工作的高质量，并且在判明问讯表的资料时还须有一定的技巧。

为此，你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战俘营第2科的机关能够一下子配齐业务足够熟练并忠实可靠的工作人员。

为尽快配齐第2科机关所需干部，请立即与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和州党委联系，以得到所需的工作人员。

请考虑在战俘营第2科工作中使用登记在案的后备肃反工作人员。除此之外，必须通过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获得1~2个有经验、熟悉业务的劳改营第2科工作人员，他们必须能按照我们的要求很快组织战俘登记工作。

① 即特别科。

关于第 2 科的设备，必须立即订购 2 个卡片柜和 1 个铁柜，铁柜将用来保管每个战俘的登记档案。

在登记注册室工作的只能是该室的工作人员。

放置档案柜和个人档案的房间，必须绝对禁止非第 2 科工作人员出入。除第 2 科工作人员以外，有权进入这些房间的只有战俘营主任、政委和特别科科长。

所有其余人要得到资料只能通过专门的窗口。

这个房间必须贴上封条。

请在 10 月 5 日前向战俘事务管理局报告关于你们对第 2 科机关人员配备和设备所采取的措施及已到位的工作人员的情况，必须指明他们具备的才能及早先担任的职务。

与此同时，报告中还应详细说明科里工作的打算。

关于战俘登记的指示我们将补充发出。

局长、少校 （索普鲁年科）

政委、团级政治委员 涅霍罗舍夫

1939 年 9 月 25 日于莫斯科

№08028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关押营内部规章

(1939年9月28日)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关押营内部规章

1. 所有来营的战俘都要登记注册。登记时每个战俘有义务正确回答问讯表中提出的问题。

2. 每个战俘入营时都要被收缴禁止保留的东西、超过允许保留数目的现金、贵重物品和文件。

注：私人文件（家信、亲属照片、有关健康状况的文件等）不在收缴之列。

3. 营管理当局有义务向战俘出具关于收缴现金和贵重物品的收据。

4. 所有入营的战俘有义务通过卫生处理（剪发、洗澡、衣物消毒）。

5. 战俘有义务无条件执行营管理当局和警卫的指示。

6. 不应粗暴对待战俘和侮辱其人格。

7. 战俘应珍惜发给他们的物品及营中的设备。

损坏营中财物，战俘应承担物质责任。

允许营管理当局从战俘私人账户上的私人钱款中，扣除被损坏财物的价值。除此之外，故意损坏营内物品或其他财物的战俘还要受到纪律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

8. 战俘可以被义务、无报酬地用于营所需要的服务工作及自我服务工作。

禁止为营管理当局个人的需要或其他战俘的需要而使用战俘劳动。

9. 营区中对没被吸收参加生产或建设的战俘规定如下作息制度：

起床	7:00
早晨盥洗及打扫房间	7:00~8:00
早点名	7:30~8:00
早餐	8:30~9:30
营中工作	9:30~16:30
午餐	16:30~18:30
群众文化活动	18:00~21:00
晚餐	21:00~22:00
晚点名	22:00~22:30
熄灯	23:00

10. 战俘被允许：

- (1) 穿着他们的制式服装；
- (2) 保存和利用食品、穿戴用品及卧具、餐具（勺、杯、碗）、象棋、跳棋及其他非赌博性玩具、书籍、报纸、杂志、香烟、火柴、修补材料（针、线等）、书写材料和洗漱用具。

注：所有被允许保存的物品和用具应放在专门为此指定的地方（橱柜、衣架等）。

- (3) 在营区自由行动和去文化教育及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之余）；
- (4) 做操及从事其他体育活动；
- (5) 使用每月发到手中的 100 卢布以内的个人津贴；

(6) 自费从营中售货亭购买食品、衣服、被单、鞋等个人生活所需物品和必需品。

11. 战俘被禁止：

(1) 打牌及别的赌博性游戏；

(2) 酗酒和使用麻醉品；

(3) 未经允许出营区；

(4) 保存武器、酒精饮料、麻醉品、牌具、军事测绘地图、地形平面图、营所在的区和州地图；

(5) 倒卖属于营的财物；

(6) 熄灯信号后还在营区走动（执行营管理当局委托的战俘除外）。

12. 破坏内部规章、不服从营管理当局和警卫的命令、不服从营主任和政委及其代表的指示的战俘，可被处罚蹲禁闭1个月以内或被监禁20天以内。

13. 被处罚蹲禁闭的战俘，不得在营区自由走动，不得自费在售货亭购物。

蹲禁闭的战俘主要用于干粗重工作。

14. 被监禁的战俘将被锁在室内关押、不参加干活。被监禁的战俘应被收缴皮带、裤吊带、尖锐物品、烟叶和火柴。对此类战俘适用本规章第13款规定的限制。

被监禁时允许读书报杂志。

15. 蹲禁闭和被监禁的战俘不可伴以减少每天口粮的处罚。

16. 战俘的申诉和声明可以递交：

(1) 营主任和营政委——反映营中工作人员的不正确行为；

(2)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反映战俘营管理当局的不正确行为；

(3) 苏联政府机构——可以反映任何问题。

17. 战俘营管理当局有义务在 5 天之内对战俘的声明（申诉）作出回答，或者通知他们，他们的声明（申诉）已反映到什么地方了。

18. 战俘犯罪将根据苏联和加盟共和国法律被追究刑事责任，并且，不执行营管理当局的命令，反抗执行者或在他们执行公务时用行动侮辱他们，将被视为等同军人犯罪，因此战俘为此类罪错应受到军事法庭审判。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少校 索普鲁年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

团级政治委员 涅霍罗舍夫

1939 年 9 月 28 日于莫斯科

№08029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关于
各战俘营对接收战俘准备情况的通报

(不早于1939年9月28日)

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战俘营截止
1939年9月28日状况的汇报

普季夫尔营瓦夏宁同志报告 ^① ：接收战俘	—3461人
其中，军官	—466人
地主	—100人
普通士兵	—2694人
非军人居民	—115人
妇女	—51人
儿童	—35人(8~14岁)

营地离修道院12公里(营部设在修道院)。该营有4个区，相互间隔2~3公里。临时宿舍是夏季用的，没有取暖设备。房屋是用薄木板建的，缝隙没有堵塞，没有天花板和炉子。冬季如果无取暖设备将无法居住。

要安置10000名战俘必须建双层板床并且收拾好教堂。

有一个可供75人洗澡的澡堂，洗一次澡需要20天。泥炭开采

^① 应为瓦夏金。

场还有一个澡堂，但只有这里的一半大。

营内没有消毒室，战俘没有内衣。没有医院，市医院在 20～30 公里之外。捷特基诺车站有个医院，必须得到州卫生处的批准。

没有大澡堂，没有内衣，简易宿舍没有取暖设备，这些可能导致极严重后果。

战俘的正常饮食没安排好，到 9 月 24 日调拨单都还没发下来，地区也无力保证食品供应。

除卫生科和打字员外，营管理机关编制配备已经完成。

所需 3 名医生中，普季夫尔市地区兵役委员会只给了 1 名和一个肺病医助。

药品也没有。理发推子和剃刀也没有。

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派来了 14 名搞文化教育工作的人。

该人民委员部还派来了 7 名工作人员，超过了编制，但必须有这么多的人。

除此之外，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了哈尔科夫市警察训练班的 120 人担任营的保卫工作。他们不占编制。值班警卫队没经过训练而且没有制服。希望留下这些警察并给值班警卫人员发制服和武器。

总务科工作人员太少。

营司令部有打字机，但没有纸张和办公用品。没有在战俘中开展工作的条例。

科泽利希纳营

索科洛夫同志 9 月 21 日电报中说，该营已为所有工作人员准备好了房间，战俘住房只准备好了 500 人的。正着手维修 2500 人的住房。需要简易宿舍、帐篷、木料货运车、锯材（木材还差一半）、设备、锅、开水炉、木桶、碗、灯、消毒室、粮食给养调拨

单，够全部战俘买的货物和科泽利希纳国家银行的现金（详见第337号电报）。

奥斯塔什科夫营

鲍里索韦茨同志就截止1939年9月26日的情况发电称：

1. 如能建3~4层的板床，可以安置9000名战俘。^①
2. 现有板床2808个铺位，其中做好接收准备的1543个。其余的7192个将在1939年10月1日前做好。
3. 差建筑材料、钉子、木板、油毡。
4. 有能住1000人的空房，但需要大修，如果建筑材料能不断供应的话（10月5日前可修好）。
5. 调拨的物资——粮食、给养，不论是莫斯科调拨的还是州调拨的都还未到，暂时用地区组织的资源供应。
6. 没有电话，燃料上不能保证与岛外保持联系，所以物资供应中断。
7. 需要水下电缆4公里，汽油5吨。
8. 供应人员奇缺，没有搬运工。
9. 请提供战俘到达的大致时间。
10. 急需250~300名建筑工人住的帐篷。

沃洛格达营

孔达科夫同志报告：^②格里亚佐韦茨克营（林业工作者工会休养所）可以安置1300人，如能得到帐篷可以安置6000人。

扎奥尼科耶沃^③（幼儿园和学校）

改装后可以安置1500人，如得到帐篷或建简易板房可以安置

① 在这里的文件空白处有一批注：“弗罗洛夫同志，快写一封信，任何4层板床都不能搞，即使3层板床也要有足够的空间才行。1939年9月28日”

② 文件中原文空缺

③ 此处为沃洛格达战俘营所在地。

4000 人（需 1 月时间）。

为开营还需要：

1. 按正送来的战俘数量，还需 2800 人以上的帐篷或简易房。
2. 铁丝网 —15 吨
3. 石油 —4 吨
4. 汽油 —6 吨
5. 电 —1200 吨^①
6. 消毒室 —2 个
7. 钉子 —5 吨
8. 250 人的腰带和靴子
9. 鲜肉和植物油的调拨单

已做了以下工作：

1. 营编制已展开；
2. 召来了附属人员；
3. 腾出了所有房屋；
4. 得到了除肉和植物油外粮食和饲料的调拨单；
5. 得到了木材和砖头的调拨单；
6. 往营中派了 137 名工人进行装修；
7. 正购买营具；
8. 已派人前往列宁格勒和伏尔加建筑公司购买帐篷；
9. 营的交通靠劳改营和内务人民委员局保证（详见 1939 年 9 月 25 日信函）。

斯摩棱斯克

库普里亚诺夫报告：科泽尔斯克营已接收了 7571 名战俘，再接收已不可能。需要造预算的专家。需要 3M/M 的通信电线。

^① 原文如此。

3M/M 的电话线 300 公斤。在斯摩棱斯克有 100 米信号线需要与储备局联系。

尤扎营

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从内务人民委员局报告：

营中没有被褥，有 200 条床垫，从劳动改造营管理处拨了 700 套被褥，350 件绒衣、1700 条床单、3000 个枕芯、3000 套枕套。都是从基涅什马买的。

营具够 1500 人用，粮食够 7000 人食用 7 天。请求了解一下锅和炊事车的情况，为什么还没到。

奥斯塔什科夫营

鲍里索韦茨同志报告交通队的需求：

司务长	1	文牍员	1
队部	1	饲料采购员	1
兽医	1	马具匠	1
制轮匠	1	铁匠	1
木工	1	驭手	15
面包师	30	肺病医助	1
医生	1	办公室主任	1
消毒员	2	消防员	1
干部检查员	2		

请立即送 200 套制服来——大衣等等，内衣——600 套衬衣和长裤。缺乏服装导致运输队人员感冒。

床垫有 1450 条，还需 8000 条。

本地组织缝制这么大数量既不可能也无材料。还需办公用品。

1939 年 9 月 28 日于莫斯科

№ 08030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
关于战俘登记问题给各战俘营主任的训令
(1939年10月1日)

绝密

第 2065679 号

致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战俘营主任

兹将对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战俘营的战俘进行登记的指令发给你们

因为及时和正确地组织登记十分重要，要求各营领导和第 2 科的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对待这一严肃的工作。

战俘登记应从将每个人记入登记册开始，在得到问讯表后即着手填写。

在办理卡片登记时应予特别注意，要考虑到我们将要建一个中央卡片库。这个卡片库应能反映出所有被关押战俘每个人的存在及其调动情况。

正确进行队列统计可保证营领导知道每天在营的人数，走了多少来了多少，这种统计还保证及时发现逃跑，并可立即采取措施消灭逃跑。

队列统计材料必须每天用电报报告莫斯科（加密电报或直通线路便函）。

在印刷厂订购了以下材料，近期将寄给你们：

问讯表（格式1）。

一般登记卡片（格式2）。

特种登记卡片（格式3）。

战俘登记簿。

登记案卷封面。

以下格式纸应就地生产：

连队花名册、押解名册、每日队列登记表。

根据指令进行登记时可能产生的不清楚之处，可立即向我们询问。

在收到登记簿之前，继续按我们1939年9月21日第65686号电报中的格式登记战俘。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
总局局长、少校（索普鲁年科）
政委、团级政治委员（涅霍罗舍夫）

1939年10月1日于莫斯科

№08031

贝利亚和梅赫利斯就战俘问题
给斯大林的报告
(1939年10月3日)

绝密

№4433 / C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现将我们就战俘问题研究后提出的建议呈报您审查：

1. 士兵战俘——其故乡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及其他民族的——遣散回家。

2. 留下 25000 名战俘修筑诺沃格勒—沃伦斯基—科列茨—利沃夫的公路至 12 月底（第一期工程结束）。

3. 单独分出其故乡在波兰德国部分的士兵战俘关押在战俘营中，等与德国人谈判解决了他们的遣送问题后再送其回国。

4. 对军官战俘单独安排营地关押。把中校到将军的军官，以及大的军、政官员，与其余军官分开关押在一个单独的营中。

5. 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单独关押一个营。

6. 对拘留的近 800 名捷克人，以被拘留人员身份关押至英、法与德国的战争结束。军官单独安置。

7. 责成经济委员会给战俘事务管理局拨出 20 部流动电影放映机和 5 部行军印刷所。

8. 对军官战俘规定比士兵战俘稍好的伙食标准。
 9. 责成消费合作社联社在各战俘营开办食品和工业品售货亭。
 10. 所有战俘，不论其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必须将贵重物品和超过战俘事务管理局规定标准的现金交战俘营管理机关保管，由营管理机关出具收据。
 11. 战俘安置在以下营地：
 - (1) 将军至中校、大的军政官员，关押在沃洛格达州的扎奥尼科耶沃营，其余所有军官关押在伊万诺沃州的尤扎战俘营；
 - (2) 间谍、反间谍人员、宪兵、警察和狱吏关押在加里宁州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
 - (3) 故乡在波兰德国部分的士兵战俘，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州科泽尔斯科营和苏密州的普季夫尔营。
 - (4) 被拘留的捷克人关押在伏罗希洛夫州旧别尔斯科营地。
- 这些建议我们也报告了日丹诺夫同志^①。

拉·贝利亚

列·梅赫利斯^②

1939年10月3日于莫斯科

① 安·阿·日丹诺夫 1935年起任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9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② 列·扎·梅赫利斯，1937~1940年任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08032

贝利亚关于释放出生在西白俄罗斯和
西乌克兰的捷克、白俄罗斯、乌克兰族士
兵战俘和其他种类战俘在内务
人民委员部战俘营关押办法的命令

(1939年10月3日)

绝密

1939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命令

1939年10月3日 第001177号 莫斯科

根据政府关于战俘的决议，我命令：

1. 其家乡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领土上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及其他民族的被俘士兵，一律遣散回家。

2. 建设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道路的战俘营内的25000名战俘，留到道路第一期工程结束（1939年12月底）。

3. 释放被拘留的捷克人，并根据我的专门训令给予遣散。

4. 家在波兰德国占领部分的士兵战俘，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州科泽尔斯科营和苏密州的普季夫尔营，直至有专门命令时为至。

5. 被俘的将军、军官、大的军政官员，集中到伏罗希洛夫州的旧别尔斯科营关押。

将军、上校、中校、大的军政官员，与其他军官分别关押。

6. 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集中到加里宁州奥斯塔什科夫营关押。

7. 波尔塔瓦州、苏密州、伏罗希洛夫州、高尔基州、伊万诺沃州、沃洛格达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加里宁州的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应会同各战俘营主任和政委，通过检查战俘所有的文件、亲自问讯战俘及证明材料确定：

(1) 根据本命令第一款应遣散回家的士兵，把他们分成独立的队（按居住地、按省），准备遣送；

(2) 家住波兰并入德国领土上的士兵战俘，准备将其送往科泽尔斯克和普季夫尔战俘营；

(3) 间谍、反间谍、警察和狱吏，准备将其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

(4) 将军、军官、大的军政官员，准备将其送往旧别尔斯克战俘营。

8. 各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和各战俘营主任至迟 10 月 8 日将各类战俘的准确数字及运送他们的申请电报上报战俘事务管理局。

9. 责成白俄罗斯副内务人民委员列舍特尼科夫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各战俘接收站站长根据本命令第 7 款分选和遣送战俘。

10. 责成乌克兰副内务人民委员戈尔林斯基同志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各战俘接收站站长，从接收站现有士兵战俘中，按建筑主任费久科夫同志的申请，配齐送往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道路建筑营的战俘。

在配齐建筑营规定数额——25000 名战俘——之后，按本命令第 7 款分类并遣送新来接收站的战俘。

11. 研究遣送战俘的路线、保证运输和途中饮食的工作，交由我的副职切尔内绍夫师长同志和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少

校同志负责。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一级国家安全委员 拉·贝利亚

1939年10月3日于莫斯科^①

^① 由于情况变化，该命令并未贯彻执行。建筑营的战俘直到1941年6月底才被疏散。到9月初，由于根据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协议将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兰军队，这些战俘才被释放，以让他们加入由安德尔斯将军领导的波兰军队。

№08033

**贝利亚就把出生西白俄罗斯和
西乌克兰的士兵战俘遣送回原籍及其他
种类战俘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关押
办法给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
有关州的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和
各战俘营主任的训令**

(1939年10月3日)

绝密

№4441 / Б

从纸带上取下立即送交在沃洛格达的内务人民委员局孔达科夫同志，北方铁路扎奥尼科耶沃车站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马特韦耶夫同志，北方铁路格里亚佐韦茨车站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菲利波夫同志，加里宁内务人民委员局托卡列夫同志，奥斯塔什科夫市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鲍里索韦茨同志，斯摩棱斯克内务人民委员局库普里亚诺夫同志，尤赫诺夫市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卡德舍夫同志，科泽尔斯克市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科罗廖夫同志，苏密内务人民委员局韦谢尼金同志，普季夫尔市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斯米尔诺夫同志，波尔塔瓦内务人民委员局布赫季亚罗夫同志，科泽利希纳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索科洛夫同志，伏罗希洛夫格勒内务人民委员局切列瓦坚科同志，旧别尔斯克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

别列日科夫同志，高尔基内务人民委员局古宾同志，博戈罗茨克区奥兰基村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索罗金同志，伊万诺夫沃内务人民委员局布利诺夫同志，尤扎市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基伊同志，明斯克内务人民委员部博奇科夫、察纳娃、列舍特尼科夫同志，利沃夫的梅尔库洛夫、谢罗夫同志，基辅内务人民委员部戈尔林斯基同志。

我命令

1. 将家住西乌克兰斯坦尼斯拉夫省、利沃夫省、塔尔诺波尔省、卢茨克省及西白俄罗斯诺沃格鲁茨克省、威廉斯克省、比亚韦斯托克省、波列斯克省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战俘，全部遣散回家。

2. 家住波兰德国占领部分，即并入德国的省份的士兵战俘，集中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州科泽尔斯克战俘营和苏梅州普季夫尔战俘营，直至有专门指示时为至。

3. 将军、军官和大的军政官员战俘，集中到伏罗希洛夫州的旧别尔斯克战俘营关押。

4. 间谍、反间谍、宪兵、狱吏和警察集中到加里宁州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关押。

5. 上述指示以下列方式执行：

各内务局局长、战俘营主任和政委自收到本训令时起，3日之内通过检查每个战俘的文件并补充亲自询问和证明材料后，将每个战俘按下列类别分类：

(1) 家住西乌克兰的斯坦尼斯拉夫省、利沃夫省、塔尔诺波尔省、卢茨克省和西白俄罗斯的诺沃格鲁茨克省、威廉斯克省、比亚韦斯托克省和波列斯克省的士兵战俘，将他们按居住地特征（按省）分队，准备遣送回家。

(2) 家住波兰德国部分即并入德国省份的士兵战俘。这些战俘应运送到科泽尔斯克和普季夫尔战俘营。

所谓波兰德国占领部分，是指卢布林省、华沙省、凯尔茨省、克拉科夫省、罗兹省、波莫瑞省、波兹南省和西里西亚省，以及苏联与德国之间国境线通过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比亚韦斯托克和利沃夫省的某些居民点。

(3) 间谍、反间谍、宪兵、警察、狱吏。这些战俘应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

(4) 将军、军官、大的军政官员，他们应被送往旧别尔斯克战俘营。

(5) 在检查文件并按上述特征对战俘分类时，必须考虑到，战俘中许多人，特别是间谍、反间谍以及军官和大官吏，有可能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有时还有伪造文件的情况。任务是不要让这些人假冒士兵被从战俘营释放。

6. 分类、编队和准备遣俘战俘的所有工作应于10月8日前完成。

在此期限届满之前，有关的内务人民委员局负责人及各战俘营主任应以电报向战俘事务管理局报告上述各类战俘的人数及运送他们的申请单。

上报运输申请时，应考虑到被遣送回家的士兵战俘用军列送达两个点的情况：家住西白俄罗斯的送到巴拉诺维奇，家住西乌克兰的送到塔尔诺波尔车站。

7. 发送遣散战俘的军列根据战俘事务管理局的专门命令进行。发送时必须按居住地特征将被遣散的人编队。

8. 为帮助战俘营主任执行本训令，特派遣 ^① 出差。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1939年10月3日于莫斯科

^① 原文如此，留作随时填写人名用。

№08034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关于批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军事法庭判决办法决议》

（1939年10月3日）

机密
特档

270 ——关于批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军事法庭判决的办法

授予乌克兰方面军和白俄罗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批准法庭因反革命罪判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非军人公民和前波兰军队军人极刑的权利。摘录抄送：

加里宁^①、伏罗希洛夫、乌尔里希^②、梅赫利斯、贝利亚、戈利亚科夫^③、潘克拉季耶夫^④ 同志。

联共（布）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

1939年10月3日于莫斯科

-
- ① 米·伊·加里宁，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自1926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1938年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 ② 瓦·瓦·乌尔里希，1926～1948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
- ③ 伊·捷·戈利亚科夫，1938～1948年任苏联最高法院院长。
- ④ 米·伊·潘克拉季耶夫，1939年任苏联总检查长。

№08035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高级
检查员布纳科夫大尉就旧别尔斯克战俘营
状况给索普鲁年科和战俘事务管理局
作战处处长季什科夫的报告

(1939年10月3日)

秘密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少校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第一处处长季什科夫同志

兹报告，旧别尔斯克战俘营现有战俘 7352 人。

在房间尚未完全装修好之前，不可能再补充接收战俘。

请立即经粮食采购总站（莫斯科）下达指示，使其腾出营中被
粮食采购站用作仓库的教堂。教堂中现存有 2000 吨粮食。

教堂本来应被用来安置战俘的，腾出后可安置 2000~2500 人。

现在战俘们住的房屋已拥挤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没有厨房、
洗衣房、禁闭室和处罚牢房。由于没有房屋，一些战俘只好在室外
露宿。

战俘每天只能吃一顿热饭，这是违背内部规章的。只能给吃一
顿饭的原因是伙房不够用（只有能为 1500 人做饭的 8 个伙房），
急需调 20 部野战炊事车来，或者 15 口大锅也行。

地方组织拒绝在此事上提供帮助。

战俘营感到蔬菜供应不足。地方组织没有得到指示和调拨单，

伏罗希洛夫格勒不给调拨单，营里有可能得不到蔬菜。请立即指示。

营区位于市区内，所以能接触到居民。围墙残缺不全，没有铁丝网。城市照明不能满足警卫需要。室外照明完全没有。篱笆、接近地、死角都没有照明。不可能利用本地资源解决，因为市内没有电线及其他电气设备。

必须尽快调拨一台 50 千瓦的发电机来，而且需要室外和室内电线。

营内没有给养供应。

值班人员没有制服，工作人员得不到被装供应。战俘没有换洗衣，其中一些人没有大衣并需要鞋子，修补衣服的材料也没有。

由于没有内衣和其他被装供应，营内已有虱子流行并有病号，请紧急下发调拨单和被装供应限额。

至 1939 年 10 月 3 日，已对 3500 人进行卫生处理并洗了澡。其余战俘尚没通过卫生处理。市澡堂尚有不大的接受能力，到 10 月 9 日，战俘将都能洗个澡。

营中需要交通工具（现只有一辆车），兵役委员会和其他组织没调派其他汽车来。鉴于营区离车站较远，管理工作又十分需要，所以请给营里补充 3 辆 3 吨的、2 辆 1.5 吨的和 1 辆“帕卡德”牌汽车。此外，小汽车也完全没有。

营内文化教育工作开展很差。没有图书馆，没有书，中央报纸都很少（5 份）。必须下达这方面的相应指示，或者购买或者调拨相当数量的书籍并增加营地订购中央报纸和杂志的限额。

总局第一处高级检查员、大尉 布纳科夫

1939 年 10 月 3 日于莫斯科

№08036

乌克兰方面军首长就 1939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5 日期间波军与德军的行动情况给
沙波什尼科夫的报告

(不早于 1939 年 10 月 5 日)

秘密

致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一级集团军级沙波什尼科夫同志

关于 1939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5 日期间
波军与德军行动的报告

一、波 兰

据大多数被询问的被俘军官供述，波兰在战事开始之前展开了近 45 个步兵师，其展开方式如下：

1. 在奥古斯图夫、沃姆扎、比亚威斯托克地域——姆洛特—菲亚尔科夫斯基将军的战役集群，由 2 个步兵师和 1 个骑兵旅组成（第 18 和第 35 步兵师、“波德拉斯卡”骑兵旅）。

2. 在奥斯特罗文卡、姆瓦瓦、利普诺、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地域——普合舍齐米尔斯基将军的集团军，由第 1、第 2、第 8 步兵师，马佐韦茨克骑兵旅和诺沃格鲁茨克骑兵旅组成。

3. 在格劳登茨、图赫利、比得哥什、托伦地域——博尔特诺

夫斯基将军的集团军，由 5 个步兵师、1 个骑兵旅和 1 个民防旅组成（第 4、第 16、第 9、第 15、第 27 步兵师，波莫瑞骑兵旅）。

4. 在翁格罗韦茨、波兹南、波戈热拉、卡利什、拉得尤夫地域——库特舍巴将军的集团军，由 5 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第 26、第 14、第 17、第 26 步兵师、预备队步兵师和波兹南骑兵旅）组成。

5. 在卡利什（可能是除外——原注）、韦伦、新拉多姆斯克、罗兹地域——隆梅尔将军的集团军，由 5 个步兵师、2 个骑兵旅和 2 个民防旅（第 10、第 2、第 28、第 30 和 1 个不知名步兵师，沃伦斯克骑兵旅和一个由边防守备军组成的骑兵旅）组成。

6. 在琴斯托霍瓦、捷申、日韦茨、克拉科夫地域——希林格将军的集团军，由 4 个步兵师、1 个骑兵旅和 1~2 个民防旅（第 6、第 21、第 23、第 7 步兵师和克拉科夫骑兵旅）组成。

7. 在前线——新塔尔格、格里博沃一线是卢科夫斯基的战役集群，由 3 个步兵师（其中包括第 11 步兵师）组成。

8. 在彼得库夫、凯尔采、拉多姆地域——多姆布-别尔纳茨基将军的预备队集团军，由 6 个步兵师和 1 个骑兵旅（第 19、第 29、第 13、第 3、第 36 步兵师和维连斯克骑兵旅）组成。

其余的师，据预备队集团军参谋长多姆布-别尔纳茨基将军称，由于德国空军在战争的头两天摧毁了所有主要铁路枢纽，没能到达集结点。并且其中许多师在途中就被敌空军打散了。波兰军队在维斯瓦河以西失败后，波兰最高统帅部（雷茨-斯米格里）于 9 月 11 日决定变更部署，将在西部作战的集团军调到维斯瓦河和桑河东岸，把在北部作战的调到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科茨克地域并保证与罗马尼亚的联系，在库特诺地区被包围的库特舍巴将军的集团军受领的任务是往东南的拉多姆、克拉斯尼克方向突围。为防止德国人从东北迂回包围，第 9 军区受命在平斯克、布列斯特-利托夫

斯克一线建立障碍。

同时，往罗夫诺、科瓦尔、卢茨克、杜布诺地域派去了一系列高级军官，他们的任务是在该地域组建新的部队，但乌克兰方面军的部队越过边界使波兰统帅部这一举措破灭了。

波兰统帅部预定的变更部署也由于德军的紧追不舍而未能实现。

9月16日，在拉金以南作战的波兰部队，实际只剩下一些师和骑兵旅的残部，其部署如下：在巴尔切夫地域——第1步兵师；卢布林以东——第39步兵师；

萨文、多罗库斯克地域——第33、第41和第19步兵师；

克拉斯诺斯塔夫地域——维连斯克骑兵旅；

扎莫希奇地域——第21和第6步兵师；

若尔克沃地域——第10骑兵旅；

兰格涅尔在利沃夫的集群由35步兵师、第20、第206、第48步兵团和第24枪骑兵团组成；总兵力为步兵15000人，11个轻型炮连和4个重炮连。

根据当时的资料，直接在东部边境驻守的主要是边防警卫军，仅在切尔特科夫地域就发现近一个团的步兵和一个团的野战骑兵。

波兰人在乌克兰方面军当面的行动

(1939年9月17日至10月4日期间)

据被俘的军官称，波兰人对我军部队越过边界完全出乎意料。

在我军部队的突击下，敌军大量投降，匆忙撤退；在战线的右翼和中部是往西部方向撤退，左翼则往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边境撤退。

波兰人进行的最顽强的抵抗有：“萨尔内”筑垒地域的防御，坚守这一地域的兵力有1万人；9月25日在亚历山德里亚、克列万（罗夫诺以北）第4和第25预备师（据俘虏供称，他们是从斯

沃尼姆调来的) 实施抗抵; 斯特里河地域(索库利以东) 约 3000 名边防军的抵抗; 奥泽尔地域(弗沃达瓦东南) 第 83、第 84、第 79、第 22 步兵团的抵抗, 这个集群 9 月 29 日被粉碎, 残部向西南退却, 然后渡过布格河到西岸的科沙拉附近(弗沃达瓦东南), 以两路纵队继续撤往西北; 塔尔诺波尔第 18、第 2、第 10、第 4、第 28、第 1 和第 22 步兵师的残部进行的抵抗。

9 月 17 日至 10 月 3 日期间被乌克兰方面军部队俘虏缴械的有: 在奥斯特罗格、亚历山德里亚、罗夫诺地域的第 7、第 8、第 18 步兵师残部, 第 4、第 25 枪骑兵团的残部; 在杜布诺、卢茨克地域的近 1 个师的各种部队; 在科瓦尔、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地域的第 29、第 9 和预备役炮兵团残部; 在塔尔诺波尔地域的第 15、第 2、第 10、第 4、第 28、第 1 和第 22 步兵师的残部, 总兵力约 1 个师; 利沃夫市的兰格涅尔将军的集群; 莫斯齐斯卡地域的安德尔斯将军的骑兵群(由第 25、第 26 和第 27 枪骑兵团、马佐韦茨克骑兵旅和沃伦斯基骑兵旅的残部); 别尔戈拉伊地域的济宁斯基上校约 8000 名步兵和 800 名骑兵的集群; 以及在克尔热缅地域(卢布林以南 60 公里) 对卡茨上校由 8 个营组成的“科瓦尔”民防旅的缴械。

据俘虏供称, 安德尔斯将军的骑兵群、泽林斯基上校的集群和卡茨上校的旅都有突围到匈牙利边界的目的。

大量波兰部队得以侥幸越过边界到达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领土。

目前, 乌克兰方面军面前已不再有波兰军队的残余。

二、德 国

据一些被俘的波兰将军供称, 战争开始前德国展开了 100 个师, 其中 70 个师(其中有 10 个轻型坦克师) 展开在东部前线, 30 个师留在西部作统帅部预备队。

乌克兰方面军的战役开始前，在华沙以南作战的德国部队已进到卢巴尔托夫、卢布林、克拉斯诺斯塔夫、扎莫斯季耶、别利兹、戈罗多克、日达乔夫一线。

在这条战线上进攻的有：第4、第7、第14、第17、第18步兵军，可能还有第20步兵军，其中3个南方军（第17、第18和第20军）组成第5集团军群，北方军——第4、第7和第14步兵军组成的可能是第4集团军。

附件^①：波兰军队作战文件供32页。

乌克兰方面军参谋长、师长 瓦图京
乌克兰方面军司令部军事委员、团级政治委员 雷萨诺夫
乌克兰方面军侦察处长、上校 耶达列夫
1939年10月5日于塔尔诺波尔

^① 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

№08037

贝利亚关于对内务人民委员部 战俘营中的战俘开展肃反工作的训令

(1939年10月8日)

绝密

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1939 年 9 月 19 日第 0308 号命令，已成立了奥斯塔什科夫、尤赫诺夫、科泽尔斯克、普季夫尔、科泽利希纳、旧别尔斯克、尤扎、奥兰战俘营的特别科，这些科担负的对战俘开展肃反工作的任务如下。

建立间谍情报网络，以查清战俘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并掌握战俘情绪。

在做这项工作时必须注意建立两种间谍网：

1. 表面上仍继续坚持为“复兴”波兰而斗争的间谍，他们应渗透到战俘一切反苏集团中去。这种间谍主要从前波兰的反革命政党党员、军官和军事官员中招募。

2. 报告战俘政治情绪的间谍——分别从不同团队和不同籍贯的人中招募。

在建立间谍组织活动中应广泛利用战俘来营登记的时机，特别科工作人员在登记过程中应全面了解战俘登记情况，从中发现合适

的招募对象。

二

向间谍下达了解和研究下述人员的任务：

1. 在前波兰间谍机构、警察和保卫机关（国外代理机构、中央侦察局、各省的国家安全处、警察局、在军队的代表机构、军区的处〈军区指挥部〉）服务过的人员、监狱职员和边防警卫军各营的职员；

2. 上述机构的代理人（心腹、侦探）；

3. 前波兰军事法西斯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波兰军事情报局”、波兰社会党、“边境攻防队员”、“射手协会会员”、“青年军团”、“库比纳主教的比斯库平城堡”、“预备役士官联合会”、“预备役军官联合会”、“波兰律师联合会”、“十字保卫委员会”、“白俄罗斯民族委员会”、“犹太人社会主义同盟”）的成员；

4. 法院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

5. 其他外国侦察机构间谍；

6. 国外白色侨民恐怖主义组织（俄罗斯诸兵种合成联盟、俄罗斯真理兄弟会、新一代民族主义劳动同盟、“绿橡树”、“萨温科夫者”、“俄罗斯青年同盟”、“前军人联合会”、“沃伦起义者联合会”、“帮助俄国侨民委员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合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为了俄罗斯委员会”）成员；

7. 前沙皇暗探局的挑拨者和革命前俄国警察-监狱机构的职员；

8. 暗探局在波兰、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的挑拨者；

9. 从苏联逃跑至前波兰的富农分子和反苏分子。

还要向间谍们下达查清和预防战俘从战俘营逃跑企图的任务，

不管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

三

对所有被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进行登记，为他们建立谍报档案并保证破获战俘营内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以及查清被清查对象的国外联系。

四

根据谍报清查的材料对战俘实施逮捕须得到相应军区特别处和军事检察官的批准。

五

对反革命集团和个人——特务、破坏分子、恐怖分子和阴谋分子案件的侦讯，通常由有关军区的特别处进行。

战俘营特别科只对破坏战俘营内部规章规定的案件进行调查，如需要立即立案侦查（如发现从战俘营逃跑的企图、流氓行为、盗窃等），可将案件移交军区军事检查官。

对战俘案件的侦讯应严格遵守现行刑事诉讼规定。

六

各军区特别处的侦讯应着重于查清被逮捕战俘与能被在国外利用的人员的反苏联系。招募适于用于国外的间谍，必须事先得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处长批准方可实施，而将其投放国外则只

有预先得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批准才能实施。

七

为及时查清和防止战俘营管理人员中个别人被战俘为犯罪目的利用（传递消息、信件，为逃跑进行的收买等）的事实发生，除了营管理机关和政工机关下达指令和进行政治工作之外，营特别科应保证对营的看守、押送人员和战俘营周围居民点进行谍报工作。

八

各营特别科科长应将其掌握的全部有关战俘情绪的材料、破坏内部规章规定的事实及已查清的犯罪（包括反革命罪），通告战俘营主任，并与他一起商量对战俘实施的逮捕。

九

各营特别科科长在自己的肃反工作中服从有关军区特别处处长、该地区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及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的领导。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1939年10月8日于莫斯科

№08038

贝利亚就把家住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
的士兵战俘遣送回乡并把家住
并入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波兰战俘
转交德国当局给莫洛托夫的公函

(1939年10月11日)

绝密

№4584 / Б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战俘的决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结束了分类工作，并于10月10日开始把家住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士兵战俘遣送回乡。这一遣返工作将于10月18日结束。

在遣返这批战俘后，战俘营中还剩下近33000名家住并入德国的前波兰领土上的士兵战俘，其中主要是波兰人。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队为，将这些家住前波兰领土德国部分的近33000名士兵战俘在最近全部转交德国当局是适宜的，为此应开始与德国政府谈判。

转交战俘可直接在边境上的以下地点进行：

1. 捷列斯波尔——经日特科维奇、卢尼涅茨至平斯克发送军列。
2. 多罗古斯克——经奥列夫斯克—萨尔内—科瓦尔发送军列。

这两个方向是与交通人民委员部共同选定的，可以避免博布鲁伊斯克和利沃夫两个线路占用率太高的铁路枢纽。

3. 已与交通人民委员部协商好发送战俘军列的时间为10月23日至11月3日。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请您指示。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1939年10月11日于莫斯科

№08039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与
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之间关于
在该部企业使用战俘的协议书

(1939年10月14日)

秘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与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之
间关于安置 10000~11000 名战俘劳动的协议议定书

—

安置该数量的战俘到下列地点：

1. “非金属矿物材料总局”系统——南顿涅茨克铁路叶列诺夫
卡车站，叶列诺夫卡矿务局：——900 人

南顿涅茨克铁路库捷伊尼科沃车站，卡拉库巴矿务局：——
900 人

该战俘营由 2 个分营组成，中心营在卡拉库巴，叶列诺夫卡设
分营。

2. “采矿工业总局”系统——斯大林铁路段德连纳亚车站，
“捷尔任斯基采矿托拉斯”克里沃罗格铁矿区：——1700 人

斯大林铁路卡尔纳瓦特卡车站，“公社社员”矿井和“伊里奇”
矿井：——700 人

斯大林铁路“夜晚角落”车站，“十月”采矿托拉斯基洛夫矿井和南方矿井：——1600人

斯大林铁路卡拉切夫斯克车站，“列宁采矿托拉斯”的“共产国际”、“伏龙芝”、“红色矿工”、“布尔什维克”矿井：——1700人

斯大林铁路马尔加涅茨车站，“尼科波尔-马尔加涅茨托拉斯”的“卡冈诺维奇”、“希尔曼”、“蔷薇”、“红色矿工”矿井：——750人

扎波罗热铁路公司——2000人

1. 由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根据自己的考虑使用战俘工作。
2. 战俘的运输费用由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承担。

二

1. 由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出资保证所有战俘符合全苏中央工会理事会相应质量标准的必要工作服。

2. 如从事有害健康的工作，由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出资保证战俘补充必要的特种工作服和为自由雇用工人规定的特殊饮食标准。

3. 黑色冶金人员委员部有义务安排战俘的饮食，第1个月按附录的标准免费供应，以后按通常办法从战俘工资中扣除伙食费。

4. 所有战俘主要用于计件工资制工作，从第二个月起，按该企业以同等于自由雇用工人的现行工资标准、工资额和单位定价支付工资。

5. 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有义务保证一切必要的安全技术条件。

在工伤致残的情况下，不论是刑事责任还是经济责任，均由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的企业承担。

6. 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应免费保证所有战俘及其看守人员的住宿，由该部出资提供有相应设备和取暖的房间，房间内应有必需数量的卧具。

7. 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出资并以自己的力量保证对战俘进行经常性的卫生处理（10天不少于一次）。

8. 所有与维持警卫和战俘营机关有关的花费，由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按实际价格按月支付。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师长 切尔内绍夫

苏联黑色冶金人民委员 梅尔库洛夫

1939年10月14日于莫斯科

№08040

博奇科夫就奥斯塔什科夫和奥兰战俘营 接收战俘的准备工作情况给贝利亚的报告

(1939年10月14日)

机密

№4 57632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一级国家安全委员贝利亚同志

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掌握的材料，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和奥兰战俘营对接收和安置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够。现将两个战俘营的状况说明如下。

奥斯塔什科夫营（加里宁军区）

战俘营的房屋完全没有修理也没安装任何设备，导致到达的几批战俘住房特别拥挤。

从今年9月28日到10月1日，营地共接收了9193名战俘，而住房只准备了7000人的位置，结果有1500名战俘只好住在走廊上和原来的俱乐部里。

尽管如此，战俘营领导仍没采取足够措施准备其他住房，仅局限于布置极简陋的住房。

比如：由集体农庄庄员和犯人组成的负责修理房屋的200人的建筑队，工作尚未结束，战俘一到便解散了，而又没从战俘中组建建筑队。

营领导妄图用过冬帐篷来解决这个问题，想买 35 顶帐篷，每个帐篷住 50 人。

供应饮食的工作组织得更差。

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在惟一一个食堂就餐，该食堂仅能容纳 300 人。

在发放食物时排起了长达 1000 多人的长队，战俘进食堂和食物的发放毫无组织，也无法控制，规定的战俘给养标准完全达不到，规定发 800 克面包却只给 400 克，有时更少，糖根本不发。

为营地调拨的食品至今没到。

城内现有的面包房不能保证为战俘营烤制面包的需要。

而战俘营本身又没有着手建补充面包房的工作。

对战俘的饮水供应也没有组织（甚至生水都没有）。

除了上述在住房和饮食方面的缺点以外，对战俘的卫生服务也很不好。

由于住人太多，地板不仅从不擦洗，而且从不打扫。

到 10 月 1 日止，营中所有战俘中只有近 1000 人洗过澡。

战俘的衣服也没消毒，没安排理发剃须。

今年 10 月 1 日，战俘开始聚集起大群大群的人群并且向营领导提出改善饮食和生活条件的要求。其中一群战俘会见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国家安全上尉马斯洛夫同志，愤怒地要求让他们吃饱。

这种情绪被战俘中的军官法西斯分子利用来作反苏宣传。

例如，战俘弗拉加大尉就在一大群军官和士兵中对我们的线人讲：

“布尔什维克只是口头上说得好听。而在事实上却做不到。”

后来他又说：“当前的政治形势只是暂时的，它无疑会变得对波兰有利。或者是德国，或者是西欧国家消灭苏联的时候已经不远

了。”

除此之外，战俘中还流传着一些挑拨性言论，说布尔什维克想饿死所有战俘，说已经死了9个人。

营领导不仅不采取措施消除上述缺点，反而在一些情况下，以错误的安排饮食的指示（优待军官）给普通战俘的愤怒情绪火上浇油。

奥兰战俘营（莫斯科军区）

营中共有5313名战俘，奥兰战俘营现有的房屋根本安置不下这么多数量。

战俘睡在地板上和2~3层的板床上，没有卧具，大家都睡在光木板上。

室内没有桌子，洗脸池、衣架、搁架等等都没有。

特别棘手的问题是水的问题。奥兰本地缺水，战俘营所需的水要到3公里以外去运。运水的工作没有组织，仅用3~5个大桶去运，无论如何都不能保证营中对水的需求，战俘不得不排长队等水。

营中伙房的能力很小，在正常情况下它只能为三分之一的战俘做饭。因此一顿饭要拖8~10个小时，因为一顿饭要分3次做。

食品的质量很差，早餐的汤没有肉，午餐的汤虽然有肉，但肉没按比例放。

规定发800克面包，但给战俘只发400克。营中的面包房不能保证面包的需求，又不采取措施从地区的面包房买面包，营主任索罗金同志的借口是没有交通工具。

营地没有澡堂。战俘到达时没进行卫生处理。已滋生了虱子。现在有了淋浴，但最大能力是每天洗100人。

营区房屋、院子里到处是垃圾。

没有清洁工。

内部规章没有张贴，战俘也不知道。

没有处罚监禁室和禁闭室，战俘中间偷盗成风，也没采取措施制止。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处长、

一级少校 博奇科夫^①

1939年10月14日于莫斯科

^① 博奇科夫，当时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处长。

№08041

西科尔斯基给乌克兰方面 军司令员铁木辛哥的申辩信

(1939年10月20日)

利沃夫城防部队司令西科尔斯基准将^①

致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一级集团军级铁木辛哥

我荣幸地告诉您，兰格涅尔将军临去莫斯科之前，曾将他与您的谈话内容转告了我。我由此得知，您完全理解我们所做出的决定有什么实质意义，尽管德军统帅部给我们的书面建议曾许诺给我们最优厚的投降条件，但我们既没有在他们的进攻面前后退一步，也没理会他们要对城市狂轰烂炸、要用4个师的兵力进行最后猛攻的威胁。

您完全清楚，我们之所以毫不犹豫地坚决与贵国政府代表谈判，是因为我们相信贵国与德国相反，定会规定对待人民和个别人士的公正原则，尽管我们并没得到红军统帅的具体建议。您肯定相信，我们彻底履行了我们作为士兵的天职，与德国侵略者进行了斗争，同时，我们也以相应的形式执行了波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没把红军看成是作战对方。

当您批准所缔结的关于我们投降的协定时，您强调了自己的公正评价。

鉴于此原因，我认为我有义务向您报告我们现在的实际处境。

^① 西科尔斯基·弗兰茨什克·尤素福，曾任波军师长，1939年9月指挥了利沃夫保卫战，后向苏军投降，被关押在旧别尔斯克战俘营。1940年被处决。

我现在被关在旧别尔斯克。不仅是在利沃夫，而且在您作为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权力所及的其余领土上，根据波兰最高统帅的命令向红军缴械投诚的所有军官，也都被送到了这里。

我十分明白，当前您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处理，我们的问题也是您要处理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因此，我不想对发生的某些考虑不周有任何微词。

但是我斗胆请您注意以下几点：

1. 推迟释放我们使我们所有人及我们的家属处境极为艰难，尽管苏联当局作了许多努力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

2. 将我们登记和释放的地点向东方挪了 1000 多公里，使我们返回固定居住地的问题变得复杂了。并且彻底破坏了我们与家人直接联系的可能性。

3. 关押在旧别尔斯克，并且在这里对个人自由进行了限制，使我们感到极为痛苦。

鉴于以上原因，而且尽管兰格涅尔将军专门为此去了莫斯科，可我们至今仍没被释放，所以请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我们尽快获得自由。

最后我请您相信，我之所以直接给您写信，是因为投降协定是通过您的全权代表签署的。

弗·西科尔斯基准将

1939 年 10 月 20 日于旧别尔斯克

№08042

切尔内绍夫和索普鲁年科就战俘营的 情况给贝利亚的报告

(1939年10月23日)

第2066472号

莫斯科

绝密

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一级国家安全委员贝利亚同志

由于今年9月25日至10月7日大批战俘的到达，致使各战俘营大大超载，而这些战俘营于今年9月22日才开始启用。

尽管各战俘营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尤其是战俘住房安置问题。由于房间和床板不足，到处显得拥挤不堪。澡堂服务极差。断粮断炊，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适合如此大量人员就餐的面包房、厨房和厨房设备。

在决定释放士兵和下等指挥官返回到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后，战俘营内的情况略有好转。

到今年10月19日，从各战俘营遣返回乡的战俘27257人，从各收容所遣返回乡的13472人。从战俘营派往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各企业工作的战俘5267人。

这样，今年10月20日战俘营内仍然有40759人，还有派去修筑沃伦斯基新城——利沃夫道路的23681人。

各战俘营和收容所的总人数是85074人（已不是原有的

125803 人了)。

战俘总数中应移交给德国当局的是 41819 人。运送这个员额的军列已预订好，并将根据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指示，从今年 10 月 22 日起开始遣送。

遣送任务拟于今年 11 月 3 日结束。

剩余的 43000 战俘分别安置如下：

1. 战俘营内有军官 8470 人：

旧别尔斯克战俘营——4000 人。

科泽尔斯克战俘营——5000 人。

2. 宪兵、警察及其有关人员 4700 人：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

这类战俘在各战俘营内的住房保证尚可。

在科泽尔斯克和旧别尔斯克两个战俘营内，高级军官人员（将官、上校、国家和军政要员以及中校）将关押在设有单人床的单独房间内。其余所有军官人员将安置在集体宿舍，睡车厢式双层木板床。

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宪兵和警察类人员也安置在设有车厢式双层木板床的房间内。

3. 修筑沃伦斯基新城——（利沃夫）道路的战俘营有 18000 人。

4. 在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所属克里沃罗格矿区工作的 10000 人。

其余战俘营和收容所的难民和部分应该释放的士兵，将乘第一批军运列车和单独的车厢遣返回乡。来自划归德国的领土上的难民，将同士兵一起遣返回去。

待一切遣返战俘事务结束后，从今年 11 月 4~15 日，科泽尔斯克、普季夫尔、奥兰、格里亚佐维茨克和沃洛格达各战俘营将暂

行关闭。

尤扎和尤赫诺夫两个战俘营留做备用，以防军事指挥部在战俘交换站从德国当局那里接收来大批新的军官和警察战俘。

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师长 (切尔内绍夫)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

少校 (索普鲁年科)

№08043

科泽尔斯科战俘营政治委员阿列克谢耶夫
就战俘看管人员从战俘手里买东西的
情况给涅霍罗舍夫的紧急报告

(1939年10月24日)

第 122 号
利泽利斯克
绝密

呈：战俘事务管理局政治处处长
团级政治委员涅霍罗舍夫同志：

紧急报告

我报告，尽管在与战俘的关系问题和怎样对待战俘问题方面做了很多解释工作，在战俘营内仍然存在看管人员向战俘购买怀表、剃须刀、烟盒的现象。例如：值班守卫长罗金，工人出身，联共（布）预备党员，用 110 卢布买了一块表。我一发现，马上命令罗金把表归还原主，但是他推托说找不到这个战俘了，表终未归还。他的问题已提交到党委会全体会议，会议给予他警告处分。行政方面免去了罗金值班守卫长的职务。

值班守卫赫罗莫维切夫，集体农庄庄员，非党群众，他在不同的时间买了两块表。最后一块表本应付给 300 卢布，而实际上他只

付了30卢布，剩下的钱显然是想折成实物以白面包、鸡、苹果、直至食堂做的肉饼等食品来抵偿。战俘营特别科已知道此事，并建议他归还怀表，赫罗莫维切夫已照办了，表已归还原主。行政方面打算拘禁赫罗莫维切夫，关禁闭，并把他开除出值班守卫队。

值班守卫沃科夫花50卢布从战俘手里买了一块表，花了3卢布买了买了一个金属烟盒，并把烟盒倒手卖给了仓库管理员、联共（布）党员马斯洛夫，这种行为已在党委会上讨论过，并且向马斯洛夫提出警告。

此外，还有很多值班守卫、2个炊事员、1名理发员和邮政管理员沃尔科耶多娃买了表。共计13块表、2个烟盒和一双高筒靴。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全体人员中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会上讲明了，这种买卖行为将被当做投机倒把看待，并且将坚决予以制止。

从战俘手中买东西的大量丑陋现象产生的原因如下：

1. 由于长时间没有建立起党、团组织，致使不能充分地在看管人员中开展解释工作。

2. 值班守卫队的人员来自当地居民，这就助长了这种买卖行为，因为几乎每天都有提着小包、挎着小篮的妻子来队找某个值班守卫，这种现象没法制止。

3. 战俘营里从来没有说明这种买卖行为不正当并要求立即停止这种行为的正式命令。这就助长了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丑陋现象的发生。

在进行了解释说明工作后，仍然买东西的现象也还有不少。

针对这种不良现象将做如下工作：

1. 召开党委会全体会议，会上听取党委委员艾里曼同志通报一切不良现象，并且通过一项杜绝这些现象的决议。

2. 举行座谈会，就纪律问题和与战俘的关系问题与值班守卫人员和总务科进行座谈。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不许从战俘手中买东西。

3. 召开共青团会议，把整个团组织动员起来与存在的丑陋现象做斗争。

战俘营政治委员、一级政治指导员 阿列克谢耶夫

№08044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战俘拒绝
从战俘营和收容所被遣返回并入德国的
波兰领土上去给贝利亚的情况汇报

(1939年10月28日)

莫斯科

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一级国家安全委员贝利亚同志

据各战俘营和收容所通报，发生了一些战俘拒绝被遣返回已并入德国的波兰领土上去的情况。这些拒绝遣返的人员中很多是犹太人。

拒绝原因：

1. 害怕因为过去有革命活动受德国当局的迫害。
2. 据拒绝被遣返者说，他们属于共产党。
3. 很多人虽然居住地在已并入德国的那片领土上，但是他们的亲人还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他们请求按照他们亲人的居住地把他们留下来。

请您指示。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少校 索普鲁年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治处处长、
团级政治委员 涅霍罗舍夫

№08045

切尔内绍夫就向德国当局移交战俘的
措施给伏罗希洛夫的报告

(1939年10月29日)

莫斯科

第 2066686 号

特急

呈：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苏联元帅

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1939年10月1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遣返应该移交给德国当局的战俘，规定遣返工作从今年10月23日开始，11月3日结束。

根据这一决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现准备有运送这类人员的军运列车26列，并且从10月23~28日已发往多罗古斯克战俘交换站6列，发往切列斯波尔的有5列。

为了腾出军队的营房，首先从舍佩托夫卡站遣送战俘。

据我们现有的最新情报，由于没有负责战俘移交事务的临时机构，根据第5集团军司令部（叶戈洛夫上校）的命令，10月23、24、25日从舍佩托夫卡发出的列车已返回。第5集团军司令部已不能给从内地各战俘营开来的军用列车调拨载人用的窄轨空车皮。

考虑到由于未及时组织移交机构的工作，政府规定的期限已被

打乱，由于这些情况，大量战俘还在途中，所以请您指示乌克兰方面军司令部迅速着手交换战俘。

并将您的指示通知给我们。

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师长 （切尔内绍夫）

№08046

博奇科夫和特别处第 11 科科长
罗尔基什给切尔内绍夫的报告

(1939 年 10 月 29 日)

莫斯科

呈：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师长切尔内绍夫同志：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通知，白俄罗斯特别军区指出科泽尔斯克战俘营有如下问题：

由于关押战俘的房间不够，战俘住得拥挤不堪，很多人没地方睡觉，所以轮流睡觉。

这种情况造成了战俘营内卫生状况极差。营内没有卫生监督人员。消毒间和洗澡间条件极差，多数战俘身上生了虱子。

简易住所里潮湿肮脏，不仅没有开水喝，而且连生水都没有，所以要到铁丝网外面去取水。战俘营内很多人患流行性感冒。

战俘的食品供应不足。分配食品的时间不定。例如：有一天，早饭在早上 6 点供应，而中饭和晚饭合为一顿，在晚上 11 点才供应。或者早饭在上午 11 点供应，中饭和晚饭在晚上 5 点供应。

在第 15 号牢房里，由于没有餐具，发给的粥和汤都放在一个盒里。

10 月 15 日，忘了给第 15 号牢里的战俘发食品，直到晚 6 点连一块面包也没有发给他们。对于做饭和发食品没有任何监督。

厨房和面包房的工作人员（由战俘们组成）没有工作服。他们

穿着这身衣服睡地板，穿着这身脏衣服做饭。厨房和面包房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经过卫生检查。

战俘营的行政管理方面对战俘缺乏监管，在某些简易宿舍里赌博和偷窃盛行。

直到现在，未在战俘中组织文化教育工作。除了电影和报纸（这也不是经常有）没有组织过别的活动。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及战俘营主任从没到这些简易宿舍里去过。

这一切引起战俘们的不满，使他们产生不健康的情绪。

在战俘营中流传着一封要大家签名的写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信中抱怨关押他们的条件无法接受。

报告上述情况，请求采取措施。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处长、

1级国家安全少校 博奇科夫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第11科科长、

国家安全大尉 罗尔基什

№ 08047

**医生和药剂师战俘就把他们当俘虏关押
属于非法向伏罗希洛夫的申述**

(1939年10月30日)

旧别尔斯克

致苏军总司令

伏罗希洛夫元帅公民：

集中在伏罗希洛夫州旧别尔斯克战俘营的波兰军队的医生和药剂师，共130人（104名医生、26名药剂师）斗胆向您、元帅公民申诉如下：

所有的医生和药剂师都是在执行自己的医务职责时，或在医院，或在部队突然遇到苏联军队的。根据日内瓦国际公约规定的战争时期医生和药剂师的权利，我们请求您、元帅公民协助或派人把我们送到一个中立国（北美合众国、瑞典），或者分别把我们送到我们的长久居住地。

1939年10月30日于旧别尔斯克

№08048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
就填写特别登记卡的程序
给鲍里索韦茨的命令

(1939年11月2日)

第2066890号

莫斯科

绝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主任鲍里索韦茨同志

在填写战俘调查表、普通登记卡（格式2）并对你们负责的战俘营内各在押战俘办理各项登记事宜的同时，请你们着手特别登记卡（格式3）的填写工作。

现对登记指令作一些修改，下列战俘人员应填写特别登记卡：

1. 担任警察宪兵职务的全部军官人员；
2. 一切反苏政党、组织的成员，不论其军衔职位一律登记；
3. 监狱行政管理部門的所有任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
4. 所有间谍、反间谍人员和所谓的“便衣警察”人员；
5. 警察局、警察分局的奸细和秘密侦探；
6. 地主、伯爵、公爵，不论其官衔和职称。

关押在你们战俘营的其余战俘人员不填写特别登记卡。

特别登记卡片盒应按上述六类人员分成六个组，每组内严格按字母序排列。

再次请您注意必须特别详细地填写调查表，以便能够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确定出，战俘中谁应该办理特别登记。

请严格遵照登记指令的第三部分办事，那里详细说明了调查表的填写办法。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
少校（索普鲁年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
团级政治干部（涅霍罗舍夫）

№08049

几个出生于西白俄罗斯的战俘给 斯大林的请愿书

(1939年11月4日)

莫斯科

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袖、西白俄罗斯解放者、我们劳动人民的父亲斯大林同志的请愿书

我们是来自西白俄罗斯诺沃格鲁茨克和比亚威斯托克州的战俘，关押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克里沃伊罗格市战俘营第一区。

我们是上述战俘营的战俘，我们请求您，亲爱的解放者和劳动人民的父亲斯大林同志，把我们从战俘营释放出去，放我们回家，到我们的家人和孩子们那里去。因为我们家、妻子和工人阶级的年幼的孩子们留在家中无依无靠，没钱生活，同时请求您，我们伟大的、亲爱的解放者和父亲、斯大林同志，设身处地为我们和远在西白俄罗斯的家人想一想，千万别拒绝我们关于释放我们的请求。为此，我们西白俄罗斯的白俄罗斯人将把我们的一切献给您、伟大的、万能的斯大林同志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体人民。您用您强有力的手把人民从贵族和地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受压迫的人们获得了盼望多年的解放，我们希望，我们的要求将得到满足，这也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等待尽快对释放我们给予肯定的回答。

代表全营战俘营签名的同志：

列昂尼德·米克拉舍维奇

列夫克维奇·安东·马克西姆维奇

列夫克维奇·华西里·费奥多罗维奇

1939年11月4日，于克里沃伊罗格市

№08050

费久科夫就利用战俘修筑道路及已完成的工作量给贝利亚的电报

(1939年11月6日)

第4479号电

自罗夫诺经基辅至莫斯科

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

工作在所有路段均已展开，全路线共集中了约24000人，其中战俘15500人，部队道路营3500人，自由雇用的4500人；汽车368辆，其中包括部队道路营的汽车；双套马车691辆。出工的战俘11000~12000人，其余未能出工的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不能将他们从远处运送到干活路线上来。战俘们分配在20个施工点。近期将增加3个点，以增加出工人数。部队出工2500人。现在主要的工作是：修筑土路基、挖两旁的排水沟和修路基，准备石料和沙料。4个路段已开始修筑石路基。

截止到11月1日共完成的工作如下：

1. 修筑土路基——200公里任务中完成了23公里（有100公里不需要加宽）
2. 备石料24500立方米，已运到路线上3503立方米。
3. 露天采石场现有石料80000立方米。
4. 修筑石路基，260公里任务中已完成6.2公里（主要在第四工段上）。
5. 已运到路线上的沙料6642立方米。

11月15~20日前，可完成土路基的加宽，11月10日可开始全路段的铺设。

第四工段（负责人卡尔波夫）和第五工段（负责人科尔马绍夫）开展的工作优于其他各工段，第四工段已完成土路基95%；石路基2.5公里。第一工段（负责人阿拉洛夫）和第三工段（负责人兹维列夫）大大地落在后面。

当地的石料可保障50%的需求，其余石料将通过科韦利斯克和利沃夫铁路运抵。但上述两条铁路运石料的工作严重受阻。这两条铁路上塞满了缴获的列车，而且没提供必要数量的火车头。

没有交通人民委员部的直接命令很难在地方上办成事。战俘逃跑了1000多人，最近随着条件的改善和警戒的加强，逃跑现象停止了。

遵照您的指示，宣布了第一期工程完成后将遣散战俘。制度加强了。将采取劳动报酬制，并奖励劳动好的人员。建立了售货棚。

各战俘营各段的情况还不能全都令人满意。给完成工作量超过100%的道路营的红军战士发了报酬。

天气很坏，雨雪交加。

利沃夫市中没有工作的人员大部分到了顿巴斯。我们在10天之内招收了1200人，暂时还没有感到干粗活劳力的严重不足。

供货厂商拖延运输车辆和机器的发货。

运输工具已成工地上的瓶颈问题，缺少碎石机、挖土机、重型压路机。分配到我们名下的525台汽车，只收到了346台；分配的44台碎石机中，只发来10台；80台电动压路机中只收到了14台，15台挖土机一台都没收到。

必须补充拨给建筑工地 200 台新的载重汽车，因为从别的工地拨来的汽车都已严重破损。

费久科夫^①

^① 费久科夫，当时负责西乌克兰一号公路建筑工程。

№08051

马克利亚尔斯基就奥斯塔什科夫、
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尔斯克三个战俘营在
战俘登记工作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和
派遣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
工作人员去各战俘营给索普鲁年科的汇报

(不晚于1939年11月14日)

莫斯科

绝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长、少校索普鲁年科同志

汇 报

关押军官和宪兵警察人员的战俘营的调整工作基本结束。奥斯塔什科夫、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尔斯克各战俘营内的战俘数量已接近饱和数字。

然而与此相应的战俘登记工作，在这些战俘营里，情况与我们的要求差得很远。还没有一个地方建立起卡片库。为中央卡片库准备的第二套卡片发送得太慢，而且不是成批发送。

为了组织好登记工作和建立各战俘营的卡片库，我请求允许于1939年11月14日往上述战俘营派出下列工作人员。

派往旧别尔斯克战俘营：

1. 高级监察员柯西金同志；

2. 助理监察员贝科夫同志。

派往科泽尔斯克战俘营：

1. 高级监察员卡巴诺夫同志；

2. 助理监察员罗金同志

派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

1. 第二处处长马克利亚尔斯基；

2. 监察员马卡罗夫同志；

3. 助理监察员胡加科夫同志。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第二处处长、

国家安全中尉 马克利亚尔斯基

№ 08052

季什科夫就组织列车运送移交德国的
前波兰军队战俘给索普鲁年科和
涅霍罗舍夫的报告

(1939年11月24日)

莫斯科

秘密

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少校、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涅霍罗舍夫上校

关于组织列车运送移交德国的
前波兰军队战俘的报告

遵照你们的指示，我同战俘事务管理局的检查员马卡罗夫同志于1939年10月26日抵达奥廖夫斯克市，以组织列车运送移交德国的战俘，并前往萨尔内市解决列车从宽轨改为窄轨和战俘途中的饮食问题。

尽管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师长切尔内绍夫同志的第2066327号电报指示（关于在萨尔内和科维尔组建支援小组和在奥廖夫斯克向过往列车供应食物）已于10月20日发往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但是支援小组仍然没有组建，奥廖夫斯克站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向过往列车供应食物的指示。

由于移交小组没有开始工作，在亚戈金和科维尔集结了3辆列

车（7127人）。根据科维尔军运主任叶戈罗夫上校的命令，科维尔路段已停止接纳列车。

移交小组拖延工作除了导致列车在亚戈金和科维尔集结以外，还导致截止10月31日有2辆列车（4359人）在奥廖夫斯克站滞留，2辆列车（4300人）在别洛科罗维奇站滞留。

在科维尔路段军事运输勤务主任米哈伊洛夫上校采取措施后，截止11月2日这些列车的停靠位置如下：

亚戈金	1 辆	2456 人
科维尔	1 辆	2266 人
萨尔内	1 辆	1891 人
奥廖夫斯克	1 辆	2468 人
别洛科罗维奇	1 辆	2027 人

有2辆列车已于10月30~31日和11月1日移交德国人。

为了组织列车运行中的食物供应已组建2个支援小组：萨尔内——3人，科维尔——2人。萨尔内的支援小组已经有了办公室和电话，科维尔的支援小组使用科维尔站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道路运输处的办公室工作。

同亚戈金、萨尔内和奥廖夫斯克使用电话联系，同莫斯科的联络用经由奥廖夫斯克发送的电报和从科维尔经由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的直通线路。

由于良好的通信组织和不间断地向萨尔内提供车厢，使运送战俘的列车源源不断。每天早晨和晚上各列车停靠点互通消息。

根据向德国人移交战俘的数量，每天有一辆列车驶向有支援小组和食物供应点的下一站。

这样，到11月6日（含6日）保证了在亚戈金的移交小组进行着不间断的工作。11月1日以前存在的某些车站列车滞留和食物供应困难的现象得以消除。

11月7日，在违反我这里的从战俘营发运战俘计划和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一辆装有1249名战俘的列车从捷特基诺驶往奥廖夫斯克，并于当日驶往萨尔内——科维尔一线并抵达亚戈金，于8日移交给了德国人。

这样，到1939年11月9日（含9日），共有8辆列车沿科维尔路段驶达亚戈金并移交德国人，另从谢佩托夫卡移交340名，总共17468名，其中：

始 发 站	计 划	经科维尔实际运送
谢佩托夫卡	7300 人	7586 人
旧别尔斯克	2600 人	2467 人
科泽利希纳	2180 人	2248 人
普季夫尔	3800 人	5167 人

沿途对战俘的食物供应方式如下：

在奥廖夫斯克——依靠战俘接收站的人力物力；

在萨尔内——由道路维护团的食物供应点提供热食，使用道路维护团的面粉做面包，依靠奥廖夫斯克站的一些私人面包房烤制面包。

在科维尔和亚戈金，征得军事指挥机关同意后，使用道路维护团的人力物力。

由于有这些食物供应点，我们可定时提供食物，从奥廖夫斯克开始就不间断地向列车提供热食和干粮。

只是在别洛科罗维奇发生了供应食物中断的现象，因为没有预先通知列车要在那里停靠，这与在亚戈金移交战俘的时间拖延有关。

沿途由押送部队负责对战俘的警卫工作，从谢佩托夫卡开出的—辆列车由民警押送。

副人民委员关于加强警卫的指示没有得到很好执行。10月29日，我抵达科维尔时看到，从停靠在科维尔的2辆列车上下来的战

俘满街都是。由民警负责警卫的列车情况尤为不好。

只好同城防司令、车站军事代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军事运输处商妥，派出巡逻人员阻止战俘下车并把下车的战俘赶回列车。

因此发现沿途有一定数量的战俘逃跑或滞留途中。

例如，据我所掌握的材料，在从谢佩托夫卡开往亚戈金的第一列火车上少了85人，从谢佩托夫卡抵达的第二列火车上少了24人，而在第三列火车上却发现比名单上多出了74人。

应该指出的是，普季夫尔战俘营所编造的战俘花名册粗心大意，错误百出。

一列运载1891名战俘的列车，本应有3份花名册，但却只有一份，而且是用铅笔写的，难以辨认，职位混淆。只好在奥廖夫斯克让这辆列车停下，动员当地一些单位的打字员和车站人员重新编造所有花名册。对于从旧别尔斯克开出的一列火车也不得不如此重新编造花名册。

我除了在科维尔铁路段等待得到普热米什尔战俘交换站开放的消息、并从沃洛奇斯克向那里派发列车以外，于11月6日前往利沃夫，以确保这一列车的运行。

在利沃夫，我同第6集团军军事交通部主任和利沃夫铁路段军事运输勤务部主任商谈了关于拨出车厢转运战俘和在利沃夫的食物供应问题。我还同利沃夫铁路段国家保安总局道路运输处处长奥斯康金商谈了有关对列车运行进行监督的问题。

11月9日，我在离开科维尔之前，再次同利沃夫铁路段军事运输勤务部主任阿尔捷莫夫同志通了电话，提醒他注意列车已从沃洛奇斯克开出。此外，我还通过电话请利沃夫内务局局长克拉斯诺夫同志预先通知在普热米什尔的战俘移交小组注意列车已经开出。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第一处处长 季什科夫

№08053

**马克利亚尔斯基给前往旧别尔斯克、
奥斯塔什科夫和科泽尔斯克战俘营
整顿战俘登记工作的工作人员的任务指令**

(1939年11月14日)

莫斯科

**给前往旧别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
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工作人员的任务指令**

一、应该做什么

1. 所有在押和关在战俘营中的战俘均应登入战俘登记册。对于已经离开的战俘应写明何时离开，前往何处。
2. 对于所有应该关押在战俘营的战俘均应填写：
 - (1) 供统计分配科和特别科使用的调查表；
 - (2) 供战俘营卡片库使用的共用登记卡；
 - (3) 供战俘事务管理局卡片库使用的共用登记卡；
 - (4) 我们1939年11月2日第2066889号指示中指明的那些战俘的特别登记卡。
3. 为每一个战俘建立登记档案，档案中应有根据细则第5部分说明该俘虏情况的所有材料。

4. 战俘营应每天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寄送队列日志。

5. 及时向战俘事务管理局报告战俘营里战俘的减员情况（逃跑，拘留，死亡）。

二、怎样填写登记材料

1. 学习登记细则，特别要学习关于登记材料填写方法的第3、4部分。

2. 必须严格监督调查表和登记卡的填写情况，要求文理通顺、笔迹清楚、对登记材料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要回答。

3. 检查以前填写的所有材料，一旦发现有由于填写不好而无法使用的登记件，应作相应的改正。

如果无法改正，应再次询问有关的战俘，填写新的登记件。

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填写新的登记件。

三、研究战俘的组成情况

1. 填写登记材料的所有工作完成之后，应认真审阅所有的登记档案，以发现不应该关在该战俘营的战俘。

四、应在战俘营中设立

1. 按字母序排列的共用登记卡，以保证今后正确使用登记卡。

2. 按照特别登记类别放置的特别登记卡，每一类别内按字母排列，确保今后正确使用。

五、什么应该寄送战俘事务管理局

1. 已填写的第二份共用登记卡应每天寄送。

2. 所有离开战俘营的战俘名单都要寄送。

3. 高级军官、重要的国家和军事部门官员的名单，并根据我们 1939 年 10 月 31 日第 2066761 号指示检查名单编造的正确程度。

4. 战俘数量（指明称呼，如中尉、中校、司法官员、贸易部官员、军事部门官员等等）的准确材料。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
第 2 处处长 马克利亚尔斯基

№08796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
移交给德国当局和从德国当局接收的
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战俘数量的报告**

(1939年11月15日)

莫斯科

**关于截止1939年11月15日移交德国当局和
从德国当局接收的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战俘数量的报告**

1. 在科维尔铁路段亚戈金站移交点上移交给德国当局的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战俘——17824名。
2. 在科维尔铁路段亚戈金站移交中从德国当局接收战俘——3298名。
3. 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市移交点上向德国当局移交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战俘——19309名。
4. 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市移交点从德国当局接收战俘——10246名。

共向德国当局移交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战俘 37133 名，从德国当局接收战俘 13544 名。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 索普鲁年科少校

№08054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

关于战俘营情况的报告

(不早于 1939 年 11 月 15 日)

莫斯科

“绝密”

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战俘营情况的报告

一、住房设备和战俘的安置

战俘营在战俘抵达之前尚未准备好，因为现有的建筑物就其容纳能力而言与抵达的战俘数量不相适应。由于时间有限和当地没有建筑材料，在战俘营组建的最初日子里另外建造住房（简易住房）是不可能的。

因此，战俘抵达后战俘营的居住十分拥挤，某些战俘营架起了 3 层和 4 层床架。

在普季夫尔战俘营，平均每 20 平方米面积居住 40 人。

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有 728 人完全没有床位。

在尤赫诺夫、科泽利希纳和奥兰战俘营，部分战俘被安置在非居住场所：马厩、猪圈、板棚。在一些战俘营里，战俘被安置在无取暖设备的住房中，冬季来临使条件急剧恶化。室内寒冷，没有生炉子。

普季夫尔战俘营的一些战俘夜间走出板棚到有取暖设备的住处取暖，住在那里的战俘不让他们进去，因此战俘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有的战俘把锅端进板棚，生起篝火，有的安上了没有烟筒的炉子取暖。

经过不长的一段时间，居住在乌克兰西部、白俄罗斯西部和并入德国境内波兰领土的士兵战俘被释放回祖国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此后安置战俘的紧张状况才得以消除。

二、饮食

各战俘营远离主要的食品供应基地 30~40 公里以上，缺乏交通道路（道路无法通行），缺乏足够数量的交通工具，导致一些战俘营热食和面包供应中断。

由于不适应如此大量的人员到来，所有的战俘营不仅缺少供洗濯用水，而且烧开水的水也不足。

奥兰战俘营的水尤为欠缺，那里的战俘们用雪止渴。在普季夫尔战俘营，军官战俘在抵达战俘营的头几天中甚至没有洗澡。

在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由于水管损坏、水泵提供不了足够数量的水，这个战俘营的用水严重不足。

由于面包房不足，面包供应经常发生中断。例如，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每昼夜需要面包 7.5 吨，可是只能烤制 2 吨；在普季夫尔战俘营，每昼夜需求量为 6 吨，但只能满足需求量的 40%。奥兰、科泽利希纳和其他战俘营的面包供应也经常发生中断现象。

由于厨房不够，科泽利希纳战俘营里有些战俘得不到热食。

在普季夫尔战俘营，由于面包迟迟供应不上，每天的早餐要等到 12~13 时，午饭要等到 17、18、19 时。而且午餐给的汤很少，大部分是青豆汤；给的肉只有标准定额的 50%。在普季夫尔战俘营完全没有蔬菜，因此战俘中已出现坏血病。

三、卫生服务

没有一个战俘营进行过检疫，因为战俘大批量抵达，不可能组织检疫。

大批量的战俘抵达使各战俘营的卫生部门陷入困境。战俘抵达后通常 30~40 天没有洗澡和更换内衣。各战俘营的澡堂的容纳能力极其低下，例如在沃洛戈茨克战俘营有 3450 名战俘，而澡堂仅能容纳 15~20 人。普季夫尔战俘营有 2 个澡堂，容纳量为 400~500 人，但是由于缺少水，这 2 个澡堂每天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在旧别尔斯克战俘营有 7000 多名战俘，却完全没有澡堂、洗衣室、自来水管、盥洗室、厕所和污水坑。战俘们在市区一座澡堂进行卫生处理，该澡堂每次只能容纳 25 人，每天接纳 500 人。即便正确组织，10 天中也只能接纳 4000~5000 人。

因此，由于不能及时进行卫生处理和人满为患，战俘中生虱子的人很多。但是，通过对所有战俘的内衣和服装进行消毒和组织去澡堂洗澡后，生虱子的现象被迅速消灭。

在对战俘进行卫生处理的同时开设了卫生站和住院处，战俘的卫生服务工作很快有了改观。例如，科泽尔斯克战俘营开设了有 100 张床位的住院处，在旧别尔斯克战俘营有 21 人住进了市立医院，18 人住进了战俘营的住院处，每天有 300~400 人接受医生治疗；普季夫尔战俘营建立了 4 个地段医疗点，设立了一个有 75 张床位的住院处。病人的数量很多。例如，普季夫尔战俘营有 275 例流行性感冒和咽喉炎患者，这是因为该战俘营有一些没有取暖设备的板棚，板棚内温度很低，而许多战俘没有外衣穿。

在科泽利希纳战俘营，情况也不很好，医生无法组织卫生处理，因为没有澡堂，没有消毒室，许多人长虱子，发病率达每天

27例。已经采取了措施，组建了清洁队、消毒队，动员战俘医生参加并把他们分配到各住处工作。运去了4套淋浴设备，建立了消毒室，建立了一个有40张床位的住院处。

在旧别尔斯克战俘营，从1939年9月28日到10月13日，有30%（2736名）战俘去门诊部治疗，平均每天171人。有122人住院，平均每天30人住院。卫生部门的药品有保障。

为了使重病人得到长期治疗，与当地的一些医院签订了合同。

战俘事务管理局卫生处在就地提供帮助、及时给予相应的指示、以及派出医生组织卫生勤务和就地直接救助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些战俘营的领导人强调指出，各地对战俘事务管理局卫生处的反映不错。

截止今年11月15日，战俘中发生死亡事故34起。其中：普季夫尔战俘营7起，尤赫诺夫战俘营6起，尤扎战俘营6起，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5起，旧别尔斯克战俘营3起，科泽利斯克战俘营3起，奥兰战俘营3起，科泽利希纳战俘营1起。

在解剖尸体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查明，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肺炎——8例，痢疾——6例，穿孔性胃溃疡——5例，肺结核——5例，脑膜炎——2例，血液全面感染——2例。由于其他疾病死亡6人。

通过体检发现29人患性病，其中：奥兰战俘营——16人，旧别尔斯克战俘营——9人，科泽利希纳战俘营——2人，普季夫尔战俘营——1人，格里亚佐维茨克战俘营——1人。性病患者总数中有19人患淋病，10人患梅毒。奥兰战俘营为这些病人派出了专门的医疗队，战俘中的性病学医师在战俘营在编医生的监督下对患者进行治疗。

四、对所有战俘营的战俘进行登记的情况

在战俘营开设之前，战俘登记机构尚未做好准备工作。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战俘营的登记工作没有组织好。

一些战俘营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不称职，例如，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统计登记科科长布赫塔列夫同志，旧别尔斯克战俘营的统计登记科科长奥普列穆哈同志，奥兰战俘营的统计登记科科长祖博夫同志。祖博夫同志对待战俘态度粗暴，对战俘们的提问他不耐烦地回答说：“你们干什么老纠缠我，像一群狗跟着我跑。”

对此该战俘营政委已指示祖博夫不许再发生类似现象。

被动员参加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遇到了诸如不懂波兰语、不了解波兰的行政区划等困难，使准确登记的难度加大。各战俘营都发现了战俘的姓名、出生地和居住地登记错的现象。

有的战俘隐瞒自己的真面目。例如，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前大尉军官哈利科在登记时说自己是列兵。有12名宪兵登记时说自己是列兵。

大部分战俘没有证件，只能通过个人调查和他人证实了解。

一些战俘抱怨某些工农红军的部队在俘虏他们的时候没收了证件，有些甚至没收了物品不给收据、不登记，因此不排除丢失物品和偷盗的可能，引起战俘的不满，也为敌对分子隐藏下来提供了可能。

五、战俘拘押制度

拘押战俘的内部规章和制度在临时细则上已有规定，但是实践表明，大部分战俘营没有执行细则上的规定，因此所有的战俘营都人满为患。

大部分战俘营在接收战俘时没有进行单独搜查，因此有些战俘保留有大笔钱款、珍贵物品、甚至武器。例如，在奥斯塔什科夫战

俘营的一厕所中发现了几枚手榴弹；在旧别尔斯克战俘营，战俘沙布林于1939年10月12日企图把一支斯密特-维桑式转轮手枪和124发子弹卖给战俘营的修炉匠，后者将此事向特别处报告，武器被没收。

旧别尔斯克战俘营发生了3起逃跑事件，战俘阿夫古斯京在追捕时被打死。调查表明，哨兵使用武器是正确的。

普季夫尔战俘营发生2起逃跑事件，2名战俘被捕获。尤赫诺夫战俘营发生一起逃跑事件，逃跑者被哨兵打死。

大部分战俘营的内部警卫人员和值班守卫人员来自工农红军，装备不好，往往没有经过训练。所有战俘营的外部警卫工作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押送部队负责，这些部队训练有素，其状况令人满意。

大部分战俘营的营区用铁丝网围起来，营区的照明不足。

六、在战俘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政治思想情况

各战俘营的领导人在战俘抵达之前指导服务人员如何接待战俘、怎样同战俘打交道。订阅了地方报纸和中央报纸。普季夫尔战俘营除了订阅这些报纸以外还订阅了100份波兰文报纸。各战俘营总共订购报纸2000多份。

所有战俘营都购买了有关党的18大材料、地方苏维埃选举、苏联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政治书籍、斯大林同志在第18次苏维埃特别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在以前疗养院的基础上建立的战俘营和普季夫尔战俘营有藏书和电影放映机。大部分战俘营在当地购买了娱乐品（象棋、跳棋和多米诺骨牌）。沃洛戈茨克战俘营在遣送战俘返回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途中每节车厢都配发了这些娱乐品。

在战俘中开展的政治工作是举行座谈会、阅读报纸和组织集会等。

科泽尔斯科战俘营组织战俘举办题为《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相互帮助问题的广播讲话》的座谈会，阅读《消息报》社论：《和平或战争》，《苏维埃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苏维埃政权给了劳动者什么》，等等。战俘中的士兵对政治交谈的兴趣始终没有减弱，只要战俘营的工作人员在那里，马上就有一群战俘把他围起来，自发地就各式各样的问题进行交谈。他们提出了关于集体农庄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如怎样建设集体农庄？集体农庄中的多子女家庭如何予以保障？我国是否马上要组织集体农庄？据说人们在集体农庄里生活很好，那为什么我们从火车上看到集体农庄的建筑物不好？集体农庄里的劳动工资制度怎么样？人们在集体农庄里怎样就餐，是各家各户单独起伙还是集体伙食？集体农庄里人们有没有自己的牲口、衣服、住房？苏联有没有单干户，苏维埃政权对他们怎么办？集体农庄庄员冬季可以不可以去城里工作？集体农庄里的土地面积是如何测定的？部分家庭富裕的士兵担心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并被迫在集体农庄中干活。

他们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儿童学习，保健，工厂的劳动条件，关于斯达汉诺夫运动^①，关于获得康拜因手、拖拉机手的专业技能。可以不可以留在苏联不去被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希特勒会不会由于我们同他打仗而把我们投入集中营？在苏联，人们怎样结婚和离婚？煤油、火柴、盐、烟叶的价格贵不贵，苏联的商品够不够我们使用（即够不够供应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什么时候能解决用波兰兹罗提兑换苏联货币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往祖国寄信的问题。

旧别尔斯科战俘营的战俘还提出了如下问题：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政权？为什么红军不把波兰从德国占领下

^① 30年代在苏联兴起的一种以提高原有生产定额、增加产量为核心的劳动竞赛形式。

解放出来？为什么要确定界线？为什么苏联不同波兰一道反对德国？

在集会上战俘们自发踊跃发言，表示赞成归并苏联，赞成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建立苏维埃政权，问他们能不能在苏联找工作？学习专业技能要多少学费？当回答他们说，在苏联不但不交学费，还要给学习的人发钱时，他们半信半疑，久久地盘问战俘营的汽车司机。

在科泽尔斯科战俘营，战俘们以沉重和愤怒的心情讲述了自己过去在地主压迫下所过的艰苦生活，讲述了关于苛捐杂税和由于偷偷种一点烟草就被罚款，以及犹太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所受的民族压迫的情况。

在安装无线电广播的第一天就有3000多人收听莫斯科的广播，这次集体收听从19时持续到24时，战俘营（科泽尔斯科战俘营）的主要街道上难以通行。许多士兵说：“我们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莫斯科广播。如果在波兰有人听莫斯科广播，那他就要不经审判被关押6个月。”交谈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两种世界。我们的同志，尤其是普通工作人员，对他们在资本主义和地主压迫下的生活不理解，对失业、剥削和卖淫感到不可思议，而他们却对我国劳动者的生活赞叹不已。

在旧别尔斯科战俘营，战俘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在派别主义和严重的民族主义上，而对犹太人则表现在反犹主义上。例如，一些军官尽量不同士兵来往，警察不与军官和士兵交往，士兵们痛恨军官和警察。一些波兰籍士兵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怀有敌意，一个省的人敌视另一个省的人。无论是波兰军官或者波兰士兵都敌视犹太人，说犹太人“把波兰卖给了德国”。

士兵战俘的政治思想状况良好，大部分士兵，特别是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士兵情绪高涨。他们对苏联的生活有浓厚的兴趣，衷心感谢苏联政府和红军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从波兰地主的压

迫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摆脱战火，得到了建设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幸福自由的新生活的机会。

许多人对把他们称为战俘感到委屈，说：“我们走了 50~100 公里向红军交出自己的武器，这能叫战俘吗？”但是他们在交谈中对对待他们这么好表示满意，例如在普季夫尔，战俘们在营房里交谈说：“来这里 14 天后，我们亲眼看到你们对待战俘很好，工人和农民生活自由。”在遣送回国的集会上，发言人的讲话不时被士兵的口号声打断，他们高呼：“苏维埃乌克兰万岁！”、“苏维埃白俄罗斯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资产阶级该死！”

士兵们积极参加对战俘中的敌人和挑拨离间分子的揭露活动。例如，在沃洛戈茨克战俘营有 15 名警察被揭露；在普季夫尔战俘营有 3 名侦察人员、1 名挑拨离间分子、9 名警察、14 名军官被揭露；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有 12 名宪兵和 54 名军官被揭露。在沃洛戈茨克战俘营有一名士兵报告说，在卢茨克附近挖出了 2 架飞机、6 挺机枪和 15000 发子弹。此事已报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

在旧别尔斯克战俘营，刚刚抵达的战俘中的一名医生企图自杀——用剃刀割喉咙。他被救了过来。

战俘中出现不健康情绪的原因是，居住拥挤，开始几天伙食供应组织不好，饭菜制作不及时，供应中断。

在最初几天，群众性政治思想工作和解释工作也开展得不够。有赌博现象，由此发生偷盗和斗殴。

开展群众性解释工作后没有发现类似的事。

有些战俘表现出自私心理。在格里亚佐维茨克战俘营，有一名战俘带走了 8 个马掌，说要回家给马钉上马掌。另一名战俘在从事副业工作时藏起了一把斧头，说到时带走。

在所有战俘营中，家乡被德国人占领的士兵都表示愿意留在苏

联。许多人直接表示他们不想去德国，因为德国可能把他们派到法国前线去，而他们不想打仗。例如，普季夫尔战俘营的战俘安克利维奇，华沙市人，他在报告中和许多人一样写道：“请把我留在苏联，我愿意为苏联献出自己的一生”；战俘巴尔诺特写道：“我热切请求把我留在苏联，因为我对苏联有好感。”普季夫尔战俘营的战俘们递交了一百份要求留在苏联的报告。

奥兰战俘营战俘斯塔热维奇在交谈中说：“要是把我送往德国，不解决把我留在苏联的问题，我宁肯死在火车轮子底下，也比去德国强。”

在尤赫诺夫战俘营，许多士兵和职位低的军官也要求留在苏联。

不愿意返回德国的理由是害怕德国人可能把他们送上对法战争的前线，而他们不想打仗。另一个理由是害怕由于从事反希特勒活动而遭到迫害。犹太人战俘害怕在德国被当作犹太人迫害。

波兰籍士兵在交谈中说，波兰国家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帮助之下将重新恢复，法英美积极干预了这件事。许多战俘对波兰国家迅速瓦解表示不满，他们说，要是毕苏斯基还活着，波兰不至于会有如此耻辱的结局。一名士兵说，犹太人出卖了波兰，尽管维尔诺（即维尔纽斯）已被红军占领，但那里的犹太人继续遭到杀害。

军官和警察的政治思想状况较差。军官中开始分为基干军官和预备役军官，对战争的观点和对苏联的态度各异。

在科泽尔斯克战俘营，许多军官公开说，领导波兰政府和总司令部的是一些不依靠群众（中级军官）的骗子。

“政府不关心军队的技术装备，只追求外表华丽和关心自己的幸福”，“在将军们洗礼的时候，又是举行阅兵式又是宴会，将军来到驻防区时也举行阅兵式和宴会。总而言之，没完没了的阅兵和宴会。我们的军队只追求外表的豪华”。

大部分军官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说：“我们回到家乡后一定要同希特勒进行斗争，波兰还没有灭亡。”“张伯伦是个饶舌的人。我们期望英国的帮助，而英国飞机飞到德国上空不是扔炸弹，而是撒传单，这就是英国式的‘援助’”。

大部分军官对红军进入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持敌对态度，认为这是侵略。

“原先我们对红军及其武器装备只有表面上概念。现在我们相信红军的机械化程度，到处都是坦克，坦克，这就是红军真正的技术装备。”

军官们还提出一些问题，如“为什么苏联当局要把像图哈切夫斯基^①这样著名的人枪决了？”

在普季夫尔战俘营，军官维日比茨基当着所有战俘的面说出敌视联共（布）的话，他说：“法国取缔了共产党，现在这个传染病源就在我国境内。波兰过去存在，将来也必将存在。”他还说了其他一些类似的话。

军官奥列什凯维奇的妻子说：“对于我们来讲，波兰原先的制度比苏维埃政权更好。”

在普季夫尔战俘营，军官中有如下议论：在苏联，农民被禁止收听广播；所有的士兵战俘都要被从苏联送往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其他国家。

所有这些事实均已报告战俘营特别科科长。

在尤赫诺夫战俘营，军官和警察表面上对苏联的好客表示满意，不公开表示对战俘营生活条件的不满，而私下里却悄悄在战俘

^① 米·尼·图哈切夫斯基，苏联著名军事家。苏联内战时期有名的军事将领，1925年任红军总参谋长；1936年获元帅称号，次年任苏联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枪决。

中散布不满情绪。

例如，一些警察和军官散布谗言说，已经有12名战俘在战俘营中死去，这种下场在等着他们中的许多人。

10月11日，他们又散布谣言说，夜里有2名战俘由于进行反革命宣传将被战俘营指挥部枪决。

一些军官，特别是一些警察把自己很好的铬鞣革皮靴和军大衣换成普通士兵的皮靴和军大衣，其借口是为了过冬御寒。

从下列言论可以看出军官和警察的情绪：

警察瓦尔奇克在士兵中间说：“法国和英国大概会战胜德国，到时苏联会抛弃所占领的波兰领土，因为苏联害怕英国和法国，到那个时候波兰将重获新生。”

一个少尉军官对一名士兵说：“别让布尔什维克太高兴了，波兰还会存在的。”

一名军官在回答波兰的兹罗提会怎样这一问题时说：“波兰被欺压了150年死而复生，现在波兰重获新生，还会发行兹罗提的。”

许多军官说，他们回到波兰以后要像当年毕苏斯基那样为使波兰从德国人和俄国人手中解放出来而进行工作。

县长科曼·济格蒙德说：“苏联报纸上所说的都是谎言。”

上校马林诺夫斯基在交谈中说：“军官的情绪受压抑。我们用20年时间建设的波兰，在20天中丢掉了。我不想去德国，我请求苏联接待我们直至德法战争结束。”

在科泽利希纳战俘营，部分军官在士兵中进行反革命宣传，例如说：“苏联同法西斯勾结，如果英国和法国反对苏联，波兰就会存在，我们应该从后方提供帮助。”还有的军官宣传说：“苏联的工人和农民生活比波兰差。”

这一情况已报告战俘营特别科科长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地区科科长。

预备役军官（工程师、医生、农艺师、教师、会计师）谴责前波兰国家的政府上层人物，谴责英国和法国把他们拖进战争，没有帮助波兰。这些预备役军官表示希望尽快回去工作，其中许多人希望留在苏联。

科泽尔斯克战俘营查明，一些军官从士兵战俘那里购买了老百姓穿的服装，准备逃跑。

由于采取了措施，防止了逃跑事件发生。加强了对军官的监督，并禁止在营区内买卖任何东西。

几乎所有的军官都说，他们被俘时一些个人物品（制服、内衣、手表等）被红军部队没收。现在难以查明何人何处没收了何物。

战俘事务管理局已采取措施就地提供实际帮助。向所有的战俘营派去了各个处的负责人员，就地进行指导，直接参加克服缺点的工作，改善战俘营的状况。在战俘营机关的工作组织、登记、卫生服务、开展政治教育工作、住房建设、伙食供应、副业生产和其他方面提供了帮助。

在一个月中，前往普季夫尔战俘营帮助工作的负责人员有 3 人，前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7 人，前往旧别尔斯克战俘营——4 人，前往尤赫诺夫和科泽利希纳战俘营各两人，前往格里亚佐维茨克、奥兰、沃洛戈茨克战俘营各一人。总共 24 人，每一次去 10 到 15 天。派工作人员的作法对战俘营帮助很大，这项工作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所有战俘营的领导人都是初次干这项工作的，一下子遇到了巨大困难，大量的战俘涌来使情况复杂化。

尽管战俘营的组织工作和供养战俘工作困难重重，所有的战俘营基本上能对付过去。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少校 索普鲁年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 涅霍罗舍夫

№08055

**罗曼诺夫和安东诺夫就检查科泽尔斯克
战俘营结果和对该战俘营领导人进行
帮助给索普鲁年科和涅霍罗舍夫的报告**

(1939年11月19日)

致苏联内务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少校同志和战俘事务
管理局政委涅霍罗舍夫上校

关于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情况报告

从11月1日起该战俘营开始接收军官战俘。

11月1日从奥兰战俘营抵达111人。

11月3日从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抵达112人。

11月3日从尤赫诺夫战俘营抵达321人。

11月3日从尤扎战俘营抵达514人。

11月3日从普季夫尔战俘营抵达1525人。

11月4日从科泽利希纳战俘营抵达1055人。

在11月份的头4天中，该战俘营总共接收3638人，其中11月3日到4日的一昼夜中就接收了2472人，占战俘营接收战俘总数的70%。

截至11月5日，该战俘营共有战俘3876人，其中：军官3809人，士兵57人，初级指挥人员2人，逃兵8人。

从11月6日到16日，又有753人抵达该战俘营。这样，截至

11月19日科泽尔斯克战俘营共有战俘4629人。

战俘营接收军官战俘的准备情况

战俘营没有完全作好接收军官战俘的准备工作。

在第一批军官抵达之前，安装简单板床的工作刚刚开始，后来又不能满足战俘营的需要。

直到现在，两座楼里还住有大约700人。需要把三层的床架改为两层的，但是由于不可能让战俘居住得更宽松一些，这件事拖延至今未能解决。

还需要指出的是，把所有的俘虏安顿在厢式简易木板床上是不可能的，甚至动用所有的住房，其中包括动用需要花费许多时间进行大修的住房，也无法解决全部战俘的居住问题。

战俘营指挥部寄希望于比较有计划地送进战俘，每一批战俘抵达后间隔几天再送进下一批。战俘营指挥部制定了接收安置计划，以保证正确进行卫生处理、登记和安置战俘。为了对战俘进行正确的卫生处理，专门开辟了一块可以容纳1500人的地区，取名叫“隐修院”。

但是在战俘抵达的第二天，由于大量战俘抵达，这一计划被破坏了。仅在11月3日到4日的一昼夜中，就有2472人抵达战俘营，破坏了原定的接收计划。

第一批军官战俘抵达后就尖锐地提出了床上用品的保障问题，要求配备褥子和枕头。战俘营连麦秸都保障不了。

地区执行委员会发出的让地区各集体农庄提供25吨麦秸的通知没有得到完全执行，战俘营指挥部也没有作到这一点，因此有1500名左右的战俘到现在也没有铺的东西。

战俘营没有得到麦秸的新的来源，只是在11月14日，我们同

地区一个集体农庄负责人协商后，麦秸才开始运到战俘营。总共要运来10吨，这才有可能让全体战俘有褥子和枕头。

战俘营的卫生状况

战俘营的卫生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室内肮脏不堪，负责打扫卫生的战俘没有经常打扫。由于没有扫把、缺少抹布和粗席，耽误了打扫。

尽管不止一次提出，但像垃圾箱这样必不可少的用具还是迟迟得不到保障，实在不能容忍。战俘营营区的打扫工作只是在最近几天才进行。

厕所不够。而且没有应有的设备，没有墙和顶盖，没有进行消毒。11月17日，有一个冬季用的带屋顶的厕所交付使用。11月20日开始修建两座这样的厕所。

战俘营的卫生监督人员完全不够用，而且只有一名医生，他又是卫生科科长，无法保障卫生监督。

厨房占用的房间从面积上看完全够用，但是不够干净。在战俘营的“隐修院”，厨房太小，锅不够用，因此部分饭食只好用行军锅制作。最近厨房要扩大，增加一些锅。对厨房的卫生监督几乎没有进行，或者只是定期进行。现在已建立了经常性监督制度。

如果供水有保障，澡堂还能保证全体战俘洗澡使用。

供水问题情况不好。现有的供水系统和抽水设备不能完全保障不间断供水。为了增加水源，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11月18日开始另挖一口井。

战俘营的过冬准备情况

目前战俘们居住的住所完全能保证过冬。所有住所均有取暖设备：大部分使用炉子取暖，有两座楼使用气暖设备，一座楼使用水暖设备。炉子已经检查过。

在12月1日前，两座大约可以容纳350人的楼房将大修完毕，可以缓解目前居住的拥挤情况。我们亲自监督大修的进度，确保在指定日期之前无条件完工。

为了过冬，战俘营购买了4000立方米泥煤，但是运输有困难，因为首先要用马匹运到大路上，然后用汽车装运。为了加快运输，最近我们安装了窄轨，解放了部分劳动力，加快了从沼泽地运出泥煤的速度。

木柴的供应已经中断了好几天。莫斯科从维亚泽姆拉格调拨的90车皮木柴只卸运了20车皮，其余的车皮铁路部门只能在12月1日以后发运。如果在12月1日之前不能发运其余的64车皮木柴，战俘营将重新面临木柴供应中断的困难。

为了节约木柴，中心锅炉、发电站、澡堂、部分厨房和其他住所全部改用泥煤取暖。现在已向战俘营运送的木柴大约够用5天。

战俘营的副业保障情况

战俘营的食品保障不平衡。

目前战俘营的黑麦面粉、通心粉制品储备充足，糖的储备量不多，其他一系列食品面临巨大困难。

例如，已经有好几天完全没有食物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俘营的经营管理机构的过错，没有及时报告这一情况。

蔬菜的保障情况尤为不好。土豆只够吃3~4天，现在没有向战俘营运送土豆，因为地区没有完成订购计划，地区的全部土豆都运往莫斯科。完全没有圆白菜吃，得到圆白菜的前景渺茫。

小麦面粉的供应中断，因此战俘们有好些天没有吃到白面包。

物品的供应也不能完全得到充分保证。被子不够，尽管早就进行过分派。冬季即将来临，战俘营需要棉袄、灯笼裤、鞋，因为许多战俘还穿着夏季服装，而且破旧不堪，穿着破鞋。

应该指出，分配给战俘营的东西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运抵战俘营。因此形成了这种情况，战俘营有许多商品领取单，但却得不到商品。

战俘的登记

截至11月17日，第2登记科已填写1900份调查表和2号卡片。为了在12月1日之前结束整个登记工作，需要加快登记科的工作速度。

应该考虑到，填写调查表是一项严肃的事情，并非每个工作人员都能胜任。目前，填写调查表的工作占用了第2科的4位文化程度最高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科长。为了加快填写调查表的工作速度，11月19日又派出了政治处的4名工作人员。特别科的6名工作人员也将每天参加4小时填写调查表的工作。这些措施可以保证在您规定的期限之前完成登记工作。

从11月21日开始给战俘们照相。这项工作的主要困难是缺乏照相人员。目前正在同科泽尔斯克市的照相馆商量，让照相馆提供2~3位照相人员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这一工作。

在战俘中开展政治工作

作为对 1939 年 11 月 5 日的报告的补充，在战俘中开展政治工作还采取了讲解现行政策中的问题和战俘营制度的方式。在军官中开展政治工作尚无专门的计划。

从 11 月 5 日到 17 日放映了 5 部电影，约 90% 的战俘参加了观看，共放映 15 场。

建立了图书馆。成立了战俘歌咏小组，正在组建弦乐队。所有这些活动都在没有取暖设备的俱乐部进行，已采取措施安装取暖设备。

战俘的政治思想状况

军官战俘中有信教的现象，战俘中下级害怕上级的现象明显增加。一些原先把肩章上的星状标志摘下来的军官现在又开始恢复原状，用普通的白线把星状标志缝在肩章上。

一些战俘极力不参加政治方面的交谈。玩纸牌的人减少了，没有发现偷盗现象。许多战俘递交申请，请求将他们遣返回国或给他们提供工作。

没有人抱怨伙食不好或居住条件差。许多人要求开设出售日用品必需品的货摊。科泽尔斯克商店不经常营业，糖、酒、点心等商品几乎没有。

在值班守卫人员和雇用人员中 开展政治工作的情况

经常按照大纲给值班守卫人员上政治课。已经建议战俘营政委

给雇用人员上政治课，因为副业管理科的大部分在编人员是当地附近集体农庄的居民。

战俘营政治机关对全体人员进行了提高警惕性的教育，禁止人员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同战俘进行交谈，尤其是就政治话题进行交谈。

党组织的工作是旨在改善副业管理科的工作。

1939年11月14日召开党员大会，听取了副业管理科科长作报告。改进副业管理科工作的一系列建议已写进这次党员大会的决定。

在下一次党员大会上将听取战俘营营长作关于准备过冬的报告。

已建立选举当地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委员会。召开了一次选民大会。

组织问题

战俘中存在许多无人负责、不负责任和放任自流的组织混乱现象。

由于组织松散、对执行情况缺乏应有的监督，一系列问题没有彻底研究和完全解决，几天之后再度成为问题。只好采用全体紧急动员和突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事情过后这些问题又被忘记，只是在问题再度尖锐的时候才被想起。例如运送油料、修理工作、麦秸、砖等问题的解决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现象。

在这里，许多不需要特别花费力气就可以马上解决的问题却变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些不良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工作缺乏计划性、经营管理机关和战俘营的领导人没有远见和灵活性。

之所以发生组织混乱现象是由于战俘营领导人对执行情况监督和检查不够。机关工作人员由于无人监督办事拖拉，没有雷厉风行的作风。

因此必须每天进行检查，给战俘营指挥部施加压力，促使其解决面临的问题。

可以得出如下组织结论：如果战俘营在未来几个月内还将存在，就必须配备更为坚强的领导班子；如果战俘营再过一个半月左右就要关闭，就用不着对战俘营的领导人作出组织结论，因为没有人有时间去了解新领导人的档案材料。再说最近总部有几个同志要留在战俘营，他们会对战俘营的工作提供帮助的。

战俘事务管理局第一处副处长 罗曼诺夫

战俘事务管理局政治处指导员、国家安全中尉 安东诺夫

№08056

马卡罗夫就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战俘 登记工作情况给马克利亚尔斯基的报告

(1939年11月21日)

奥斯塔什科夫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第2处处长、国家安全中尉马克利亚尔斯基同志：

兹报告，内务人民委员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战俘登记情况如下：截至1939年11月20日，未填写一份调查表的人有900名，只填有一份2号登记卡片的不超过2000人。第2科的工作不明确，工作人员的职责不清。根据鲍里索韦茨同志的指示，允许战俘在第2科的办公室工作（整理文件）。调查表的登记工作混乱，所进行的大检查没有收到效果，也就是说同一个人的差别很大，于是进行了再次检查。根据鲍里索韦茨同志的指示，没有通知第2科就把战俘派往奥斯塔什科夫工作（为战俘营干经济工作）。

我们已开始摘录登记卡和第二份调查表，明天把登记卡送给您。

请说服鲍里索韦茨同志，今后不要再发生不通知第2科就派出战俘的事。

此外，对所有工种的战俘都进行了登记，因为战俘从一个宿舍搬到另一个宿舍搞乱了整个登记工作。

照相的情况不好，第2科科长莫谢夫必须前往加里宁市把照相

师带到战俘营。但是，鲍里索韦茨不同意他去，说他已经给托卡列夫（内务局局长）写信，托卡列夫回答说，他那里没有照相师。

必须补寄将近 5000 张 2 号登记卡和 3000 份档案封皮。

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从联共（布）监察委员会借调几名工作人员，以加快工作速度。今天索科洛夫同志前往区里。

给第 2 科配备的工作人员能力低下。此外，有 6 名登记员月工资为 225 卢布，而值班守卫人员的月薪为 275 卢布外加定量配给品。登记员的工作量大，他们因此想去当警卫人员。

请解释清楚，战俘递交的申请书由谁负责办理，战俘营主任让第 2 科负责，为此调给了一名工作人员。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统计分配科的工作人员不够用。

我将继续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马卡罗夫^①

1939 年 11 月 21 日

又及：应该给您送去什么，是第二份 2 号登记卡或者是战俘减员名单？

我认为送去战俘减员名单是正确的（1939 年 11 月 6 日第 2067067 号公函）。

马卡罗夫

^① 马卡罗夫，当时任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训练处检查员。

№08057

季什科夫就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及其特别科
领导人工作不力给索普鲁年科和
涅霍罗舍夫的报告

(1939年11月25日)

奥斯塔什科夫

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少校同志，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涅霍罗舍夫上校同志：

报 告

在我离开莫斯科时，您交待我除了调查战俘营的情况以外，还要查明该战俘营特别科科长科雷托夫同志和统计分配科检查员列维茨同志在报告中所叙述的事实。

在核实这些报告和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如下情况：该战俘营主任鲍里索韦茨和特别科科长科雷托夫之间的关系已无法调和，其起因是科雷托夫向莫斯科和加里宁军区特别处寄去了几份报告，抱怨战俘营主任没有为特别科的工作创造条件。

这些私怨有害事业并给国家安全和战俘营的制度造成损失。例如，战俘营主任鲍里索韦茨没有预先征得特别科的同意就把一些战俘（警察、宪兵等）派往奥斯塔什科夫市工作。一些战俘未经特别科审查就被战俘营的管理部门（经营管理科、财务科、建筑小组、

卫生科)使用。一些警察战俘还被允许参加统计分配科的工作。他们只在那里工作了一天,因为根据特别科的要求,不许他们参加这一工作。

该战俘营有数千名警察和宪兵的证件和照片尚未查明和整理。整整一个月中,战俘营主任鲍里索韦茨和特别科科长之间一直在进行无原则的争吵:谁应该查明这些证件。在这段时间里,战俘营管理部门的翻译鲍里索夫同志由于无事可干而发胖。

现在特别科有足够的办公室,条件也不错(一些炉子需要小修)。但是,谁也不可能不被察觉地接近特别科所在地。院子里整天有警察、宪兵、密探在闲聊,这些人本身就是搞秘密活动的行家,他们记住了到过特别科的任何一个人。特别科科长科雷托夫同志要求把一卷纸放在名为“投诉处”的地方,以使特别科的工作人员能把它随同日常的投诉一起交给该交的人。近两周,战俘营主任和特别科科长没能就由谁办此事达成一致。

特别科科长科雷托夫同志没有执行人民委员 1939 年 10 月 8 日的第 4/56190 号指示,没有把一些战俘打算组织反革命集团的情况报告战俘营主任,而且直到最后也没有在揭露建设工作中的怠工组织者方面提供足够的帮助。

在我今年 11 月 20 日离开战俘营的这一天,一辆载有警察和非军人的列车驶出,向德国人移交战俘。

战俘营主任在列车编组过程中(这项工作进行了 10 天),没有对每一名被遣返的战俘进行逐一调查,造成一些不应该遣返的基干警察和看守混在被遣返的战俘中。

由于鲍里索韦茨同志的不良工作作风,整顿战俘营秩序的工作迟迟没有进行。他不是表现出主动热情的工作精神,而是喜欢找各种借口向莫斯科发电报。

例如,为了给战俘们照相,鲍里索韦茨请求从莫斯科给他派一

名照相师，同时没有花费多大力气就从奥斯塔什科夫请来了3名照相师。战俘营的登记工作处于混乱状态，统计分配科的工作人员不能胜任工作。但是，只要战俘营副主任索科洛夫同志前往奥斯塔什科夫，共青团地区委员会就派来了6名有文化的人帮助填写战俘登记卡。

在扩大战俘营住房面积这一问题上，鲍里索韦茨同志令人莫名其妙地固执己见，不愿意修建简易木房。是的，战俘营没有足够的圆木兴建3座简易木房，但是修建一座还是有材料和劳动力的。

只是在战俘事务管理局不止一次提出要求以后才着手修建简易木房。但是，战俘的劳动组织、劳动纪律和劳动效率很差。

战俘营政委尤拉索夫同志名义上是位政委，实际上只是个老的“政治工作者”。

对于政治处的工作我没有进行过调查，可能，他们举办过座谈会，按计划放映了电影，或者甚至超额完成了计划（尽管有人说，政治处的工作人员在上班时看小说），但是事情并非如此。

我认为，政委应该同战俘营共命运。如果战俘营主任做得不对，政委应当予以纠正。政委应当团结集体去完成战俘营各项任务的核心。

但是尤拉索夫同志没有这样做。战俘营的过冬准备工作十分紧张，警察们的工作非常糟糕。存在怠工现象。谁要是好好工作，就会受到公开的威胁。

战俘中的纪律情况极不像话。雇用人员的劳动和工作纪律状况也不好。有同战俘发生联系的情况（向战俘收购贵重物品），有的雇用人员（如食堂负责人维哈列夫）帮战俘非法发送信件。尤拉索夫同志没有领导大家同这些现象进行斗争。在我到这里以后的这段时间中，他没有主动地同怠工行为和破坏劳动的纪律现象进行过任何斗争。反之，对于进行非法通信的战俘列文，本应予以惩罚，却

给商店写了一张纸条让他成为雇用人员。

鲍里索韦茨同志和尤拉索夫同志在工作人员中没有威信，实际上不是他们在领导战俘营，而是战俘营副主任索科洛夫同志。于是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取消另一个的命令等等），危害工作。

我认为：

一、对于没有确保战俘营领导工作的鲍里索韦茨和尤拉索夫同志应予以撤职。

二、由副主任、国家安全大尉索科洛夫同志临时代理战俘营主任职务。

三、向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派一名有经验的党务工作者担任战俘营政委。

四、责成战俘营特别科科长、国家安全少尉科雷托夫同志，向加里宁军区特别处承诺必须准确执行人民委员 1939 年 10 月 8 日的第 8 号指示，以及在工作中必须更密切地同战俘营领导人保持联系。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第一处处长 季什科夫

№08058

派往旧别尔斯克战俘营的内务
人民委员部行动小组就该战俘营政委
基尔申工作不能令人满意给贝利亚的报告

(1939年11月25日)

绝密

莫斯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贝利亚

在今年11月20日的报告中，我们向您报告了关于旧别尔斯克战俘营发现了由前波兰军队军官战俘组成的反苏组织的情况。

军官战俘从事地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以政委基尔申为首的战俘营政治机关，完全没有开展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造成的。

战俘营政委不是通过政治机关组织文化教育活动，对初级军官和预备役军官进行政治教育，而是放任自流，使军官战俘中的反苏积极分子有可能掌握主动权。

在无所事事的战俘中建立文化教育小组的普及性工作，被巧妙地利用于建立地下组织。

在消灭这一地下组织之前，我们向政委作了报告，并建议他采取措施，在战俘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

我们刚要开始逮捕地下组织的参加者，政委就擅自前往战俘居住的简易住房，找一些地下组织的积极分子谈话，“揭露”他们的

活动，说他们的活动是非法的，具有反苏的性质。结果走漏了消息，使地下组织的参加者有所准备。

由于政委的轻率和不正确的活动，我们的行动没有使地下组织的参加者惊慌失措，军官们对此有所准备。

政委除了犯有这样的错误以外，也没有开展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按照原定计划，我们在采取行动的同时，还应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削弱军官积极分子的反苏活动，加强对战俘的政治影响。

我们确信，在这段时间中基尔申政委不在，没有对我们在旧别尔斯克的工作予以保障。此外，基尔申同志在战俘营工作人员中没有威信。一开始就与战俘营的一位医务工作人员姘居。

我们认为最好让一名能够真正开展好旧别尔斯克战俘营政治工作的合适的人取代基尔申。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行动小组

特罗菲莫夫

叶菲莫夫

叶戈莫夫

1939年11月25日于旧别尔斯克市

№08798

卡巴诺夫就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 登记工作给马克利亚尔斯基的报告

(1939年11月28日)

科泽尔斯克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第2处处长、国家安全中尉马克利亚尔斯基同志：

兹报告，科泽尔斯克战俘营军官战俘调查表的填写工作将于1939年11月29日结束（只填一份）。战俘调查表的副本将于今年12月15日之前收回并转交战俘营特别科。2号登记卡已填写3400张，登记卡的填写工作将于今年12月4日之前结束，12月6日之前所有军官的卡片将送往战俘事务管理局，战俘营的共用登记卡和特别登记卡也将在12月6日之前组织填写完毕。从11月29日起我们将组织战俘照相，预计在今年12月20日前结束。

同时我请求对下面问题予以解答：战俘营中尚有其他人员369人，其中包括偷越边境的士兵、各种难民、中下级尉官。

这些人要不要填写调查表。

请速指示。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
第二处检查员 卡巴诺夫

№03464

扎鲁宾就科泽尔斯基战俘营的现状

给索普鲁年科的信

(1939年11月28日)

科泽尔斯基

尊敬的索普鲁年科同志：

有一个月没有给您写信了，我想您是会原谅我的。您大概是会原谅我的，因为我直接参与了罗曼诺夫和安东诺夫给您写的那封信，信中所作的结论我完全同意。

为了不重复，我简单介绍一下给您送去报告以后的每一段时间中发生的新情况。

总的看来缺点在于战俘营的领导人不能胜任工作，经营管理部门尤为不能令人满意。这里的副业生产基地规模大、条件好，本来应该经营得比现在好。还应该指出的是，从总部来的人指导的多，具体帮助的少。罗曼诺夫和安东诺夫同志除外，我同他们一起工作深感满意。我们一起实际解决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具体领导了修理任务、战俘营内部生活的组织，解决一些经营管理中的问题。科罗廖夫同志的缺点还表现在他的工作作风上，他说得太多，粗暴无礼，解决问题不够快，深度不够，对工作的执行情况几乎没有进行检查。他经常是提出了问题，发出了指示，但从来没有得到执行。

由于缺乏经营管理和行政工作经验，他经常代之以喊叫和发号施令，这当然无济于事。大概在我来到以后他的这种工作作风有所

改变，但是没有完全改变。

在我看来，罗曼诺夫和安东诺夫同志在报告中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如果战俘营要长期存在，就必须更换领导人。

我想提出一个具体的、同时我认为是很正确的建议。向人民委员建议任命罗曼诺夫同志担任该战俘营领导人，他情况熟悉，解决问题的能力比科罗廖夫同志强，完全能胜任工作。战俘营的工作很重要，更换领导人是必要的。

要是派去一位新人，他至少要花费两周的时间才能进入角色，没有意义。我会帮助科罗廖夫同志摆脱困境的。

战俘营领导人的缺点还表现在不能正确处理同当地组织的相互关系上。这里的当地人还是很不错的，只要正确地向他们提出事情和问题，他们都乐于帮忙。地区党委、地区执行委员会和地区内务处都是如此。

目前战俘营面临的最尖锐问题是水、麦秸和卫生（长虱子）问题。我觉得我尽了最大努力，用我的经验和知识予以实际帮助，这种帮助有多大效果，最好由别人评说。

今后我会更经常地给您写信介绍战俘营的主要问题，因为我现在不那么忙了。如果需要组织或检查某项工作，请您抽空给我来信。我同大家的关系不错，我觉得人们对我没有什么意见，每当我提出必须马上纠正某项工作时，他们没有抱怨什么。

罗曼诺夫和安东诺夫同志会向你详细报告情况的。

致以同志式敬礼

扎鲁宾

№03465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指示
罗曼诺夫同志前往莫斯科并在 12 月 1 日前
结束战俘营战俘登记工作**

(1939 年 11 月 29 日)

莫斯科

绝密

第 2067987 号

电话记录

斯摩棱斯克州科泽尔斯克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科罗廖夫转交罗曼诺夫

请您于 13 日同卡巴诺夫和安东诺夫一道来莫斯科。由战俘营主任和政委负责整顿战俘登记工作。

我再次提醒，这项工作务必在 12 月 1 日之前结束。

在此之前应该做好登记工作，把你们战俘营所有战俘的登记卡收齐并寄往 2 号卡片管理局。

索普鲁年科、涅霍罗舍夫

№08059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
就把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出生的
士兵战俘转为雇用人员和分化瓦解
战俘中的军官以进一步利用他们
向贝利亚提交的建议**

(1939年11月)

莫斯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一级国家安全委员拉·贝利亚同志：

大部分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原波兰军队士兵已被遣送回国。把士兵遣送到归属德国的领土并与其交换战俘也已结束。

现在有不少从事生产劳动的士兵战俘，其中18000人在一号建设工地上，10396人在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的矿山管理局。

我们所管辖的这些战俘营的前波兰军队士兵，尤其是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士兵，公开表示并恳切请求尽快放他们回家，以便同全体人民一道积极参加组织和建设幸福的新生活。

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因此，继续把他们当作战俘关押可能引起他们发表不正确的言论，通过他们引起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也产生不满情绪，为敌人进行反苏宣传提供枪弹。促使产生这种情况还由于，从普季夫尔战俘营遣返 1470 名战俘时，宣布要把他们送回家，但实际上被送往克里沃伊罗格。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应提出下列建议供您考虑：

一、鉴于苏联最高苏维埃第 5 次非常会议的决议，可将在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矿山管理局劳动的战俘转为雇用工人；预先在他们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使他们愿意作为同苏联所有工人享有同等权利的矿山工人。

二、遣散一号工地的所有战俘，以各战俘营中关押的警察取而代之。这类警察共有 4977 人，其中 3000 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迟早要让他们学会劳动。对于这些警察要加强警卫。

三、目前关押在战俘营的军官共 8980 人，其中 4500 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应着手分化瓦解他们，以解决如何利用他们的问题。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少校 索普鲁年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

涅霍罗舍夫（团政委）

№08060

贝利亚关于组织接收站和战俘营的命令

(第 001445 号)

(1939 年 12 月 1 日)

绝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1939 年命令

内容：关于组织接收站和战俘营

1939 年 12 月 1 日于莫斯科

遵照工农红军关于组织战俘接收站的指示，我命令：

一、组织战俘接收站：

1. 摩尔曼斯克州，在摩尔曼斯克站和坎达拉克沙站。
2. 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站、麦德维热戈拉站、凯姆站和谢格扎站。
3. 列宁格勒州，在谢斯特罗列茨克站、洛捷伊诺耶波列站和瓦斯克洛沃站。

负责组织战俘接收站的人员是：

摩尔曼斯克州内务局局长、国家安全大尉戈里卡同志——摩尔曼斯克和坎达拉克沙；

内务人民委员部白俄罗斯波罗的海联合企业负责人、国家安全少校季莫费耶夫同志——凯姆和麦德维热戈拉；

内务人民委员部谢格扎建筑工地负责人、国家安全大尉博耶

钦——谢格扎；

苏联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国家安全大尉巴斯卡科夫同志——彼得罗扎沃茨克；

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局长、二级国家安全委员戈格利泽同志——谢斯特罗列茨克、洛捷伊诺耶波列和瓦斯克洛沃。

二、派出下列人员就地提供实际帮助：

1. 派遣国家安全少校多布雷宁同志前往摩尔曼斯克和坎达拉克沙；

2. 派遣国家安全上尉斯维什尼科夫前往凯姆；

3. 派遣国家安全上尉康拉多夫同志前往谢格扎；

4. 派遣国家安全上尉菲拉托夫同志前往麦德热戈拉；

5. 派遣大尉布纳科夫同志前往彼得罗扎沃茨克；

6. 派遣民警少尉巴什雷科夫同志前往洛捷伊诺耶波列；

7. 派遣佩特连科同志前往谢斯特罗列茨克；

8. 派遣波卢欣少校前往瓦斯克洛沃。

三、下列战俘营应作好安置战俘的准备工作：

伊万诺沃州尤什基战俘营——5000人；

斯摩棱斯克州尤赫诺夫战俘营——4000人；

苏梅州普季夫尔战俘营——4000人；

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捷姆尼科夫战俘营——6000人；

沃洛格达州格里亚佐维茨克战俘营——2500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卡尔戈尔战俘营——5000人。

四、新组建的战俘营的领导人员的配备工作由我的副职——三级国家安全委员克鲁格洛夫同志负责。

五、押送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长、旅长沙拉波夫同志应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的派单，确保组织接收站的警卫工作，及把战俘从接收站送到战俘营的押送工作，为此应派出必

要数量的押送分队。

六、新组建的战俘营和接收站的物资供应和财政拨款，依照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9月19日第0308号命令进行。

七、各战俘营管理机构的被服和武器的供应工作，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事供应总局局长、旅长武尔加弗特同志负责。

八、责成我的副职、师长切尔内绍夫同志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少校索普鲁年科同志监督本命令准确和及时的执行情况。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一级国家安全委员 拉·贝利亚

№08061

卡巴诺夫就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战俘登记工作 提供实际帮助给马克利亚尔斯基的报告

(不早于 1939 年 12 月 1 日)

利泽尔斯克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第 2 处处长、国家安全中尉马克利亚尔斯基同志：

遵照您的指示，我于今年 9 月 17 日前往科泽尔斯克战俘营，帮助该战俘营第 2 科根据细则搞好战俘登记工作。

第 2 科的编制人数为 13 人（其中 6 人系登记人员），实际上第 2 科只有 7 人在工作，其中 3 人是半文盲，是从值班守卫队里抽调上来的。就是在这些工作人员中也没有分配工作。例如，检查员把编号填入 2 号登记卡和战俘登记档案后由不识字的登记员填写卡片。第 2 科科长马里亚欣同志的注意力没有放在工作上，说这是因为家庭情况造成的，因此战俘调查表的填写工作进展缓慢，笔迹潦草。此外，登记卡填写得不正确，不易辨认。许多 2 号登记卡填写有错误，例如在“最近的官衔”或“军衔”一栏中填上“受过中等教育”；在“具有何种文化程度”一栏中填上“中尉”；在“职业”和“专业”一栏中填上“波兰人”，等等。

战俘登记档案和 2 号登记卡在所有 3 个房间中撒得满桌子都是，因此无法准确统计已填写的调查表有多少。

统计表明，已填写的 1725 份调查表和 1600 张 2 号登记卡中大

部分要重填和改正。

我做了些什么呢？首先召集第2科的工作人员开会，举出一系列不认真填写2号登记卡和调查表的例子。

同时宣读了战俘登记细则。第2科的工作人员说，工作之所以没有做好，是因为没有人给他们讲过，应该怎样填写调查表和2号登记卡；填完后领导也没有给他们提出任何意见。

因此，第2科的工作人员做不到在今年12月1日之前完成战俘调查表的填写工作，因为这个科只能派出3个人填写调查表。

只好求助于战俘营政委帮忙，让他派人帮助第2科填写战俘调查表。

经过长时间交谈后政委派出了3名懂波兰语的政治指导员，但是要想在12月1日之前完成战俘调查表的填写工作，仅有的这些工作人员不够，他们每天只能填35~40份。

于是只好去找国家安全少校扎鲁宾同志，让他从特别科抽几个人帮忙。

此后根据扎鲁宾同志的指示，特别科每天平均填写了120份战俘调查表，这样才有可能在今年11月30日之前填写4412份调查表和282份调查表复本，并送交特别科。

2号登记卡一式两份，共3450张。战俘登记档案3240份，各有编号。所有的战俘登记档案和2号登记卡都有编号，在登记时将编号写上，并记上战俘所住楼的编号。

还有316名士兵和平民战俘的调查表没有填写。

从今年12月1日起给战俘照相，预计在今年12月20日前结束。

截至今年11月30日，第2科有9人在工作。给他们分配了工作，制定了结束战俘登记的工作计划。

第2科的办公室不适于工作。门上没有锁，放置登记卡和登记

档案的地方的锁已毁坏，柜子不适合保存战俘档案。因此，各个房间都撒满了登记档案表。

很快就修好了门，安上了锁和护窗板。有一个窗户（放置战俘登记卡和登记档案的房间）安上了铁栏杆，配备了装登记档案的柜子。

建议：鉴于第2科科长马里亚欣同志没有做好战俘登记的保障工作及他本人不想继续工作，我认为最好解除他的科长职务。

第2处检查员 卡巴诺夫

№08062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
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情况给
切尔内绍夫的报告

(不早于1939年12月1日^①)

机密

呈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师级政治委员切尔内绍夫同志

截至1939年12月1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情况

经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对战俘营调查，查明战俘情况如下：

自今年11月起，到达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军官战俘共4727名，其中：

1. 海军将军——1人
2. 陆军将军——4人
3. 上 校——24人
4. 中 校——79人
5. 少 校——258人
6. 大 尉——654人
7. 海军大尉——17人
8. 其他军官——3420人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内容确定的。

9. 随军神甫——7 人
10. 地主 ——3 人
11. 公爵 ——1 人
12. 国家高级官员——43 人
13. 应遣送的士兵——85 人

最初，由于战俘营要将三层床铺的宿舍改为两层床铺的宿舍，对接收战俘军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况且，战俘是大批大批地到达的。

现在，战俘已经得到令人满意的安置。

战俘营的生活保障情况

战俘营的食品供应时常中断，特别是最近，根本没有蔬菜（白菜、胡萝卜和洋葱），而且从区里得到蔬菜毫无希望。土豆还够几天食用，凭调拨单运送土豆的任务完成得不好，区领导解释说，这是因为土豆首先应当运往莫斯科市。

战俘营的物品供应没有完全保障，被子、床单和枕套不够。许多战俘还着夏装，穿着破旧的靴子。考虑到是冬季，需要有棉背心、灯笼裤和靴子。

战俘住的宿舍完全适合冬季居住，但是有些楼房住得还比较拥挤，因此，建议对两座楼进行大修，使其能够容纳 350 人居住，这样会缓解拥挤状况。

最初，战俘生活服务中的一个缺点是床上用品保障不及时，尤其是填充床垫用的麦秸匮乏。战俘营的燃料有保障，主要是烧泥炭，由于至泥炭开采地的道路不畅，初寒到来之前燃料供应曾经有过中断。由于维亚泽姆斯基基地不能及时完成调拨任务，战俘营的木柴供应时有中断。

战俘营生活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供水状况不好，电动机和水泵已经完全损坏，因此不能正常供水。局里采取措施，立即更换了供水设备。电站差不多也是这种状况，也需更换新设备。

战俘营行政机关工作不力，对工作没有应有的毅力和责任心，战俘营总务机关对完成交办的任务经常要求帮助。战俘营中许多工作组织得混乱，往往造成工作无专人负责、没有责任心和放任自流的现象，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总务机关中，而战俘营的领导对工作缺乏应有的监督，因而不能及时给予帮助。

战俘登记工作

现在，军官战俘的登记工作已经结束。正在进行照相工作。由于选派干部不当，登记科的人员经常变化。

战俘营的卫生状况

直到最近，战俘住的房舍没有经常打扫。

战俘营驻地最近才开始打扫。战俘营中厕所不够，只有一个加顶的冬季厕所，现在已动手建造两个这样的厕所。不经常进行厕所的消毒工作。

战俘营的卫生监督工作不力，用作厨房的房舍不够清洁，其中一个厨房很小，已经采取措施扩大。现在建立了经常的厨房卫生监督制度。

战俘营现有的一个澡堂一昼夜可洗 200~250 人，不能保证战俘营的全体人员 15 天内洗一次澡。战俘营的洗衣房已经装备好，但是洗衣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供水不正常，而且没有准备好烘干机。

从医学角度看，卫生队和医院的房舍完全适用。最近，卫生科完全配齐了医生，其中一部分名额是通过录用战俘中的医生配备的。

住院的病人平均 35~40 人，主要是患感冒、肺部疾病和风湿病。战俘营的药品有充分保障。没有发生瘟疫和流行感冒。据登记，生虱子的人达 2~3%。

战俘的政治思想状况

军官战俘一到战俘营就注意到，他们被集中到一个地方，看来关押的时间会比较长，于是开始提出一些过高的待遇要求，例如给他们发“薪水”钱，发鞋刷、鞋油，等等。

有些军官流露出爱国情绪，公开声称：“波兰还会像过去的波兰一样存在”。

一些军官以前和士兵在一起时，撕下了自己肩章的星状标志，而现在，当战俘营里关押的全是军官时，他们开始恢复上下级的礼节，其中一些军官又缝上了等级符号——肩章上的“星标”。

大部分军官信教，有一次他们企图在一个楼里作祈祷，但是，战俘营的工作人员一到场就制止了这次祈祷，并且当场说明：今后对作祈祷的企图，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而且禁止在住处挂圣像和十字架。

军官中有打牌的现象，已经没收了 15 副纸牌。

战俘对进行的政治谈话态度认真，只有个别人员例外，他们故意不理睬，或者竭力提出一些强词夺理的问题，企图搅乱或者中断谈话。已对这种人进行了监督，并和特别科一起进行审查，以便对他们实行隔离。

战俘对用现金购买诸如食糖、烟草和糖果点心的需求增加了。

战俘有苏联货币是因为珠宝制品贸易总局开设了金银珠宝收购点。

在这方面有些不健康的情绪，例如：“干吗卖贵重物品，因为换来的钱反正什么东西也买不到”。

科泽尔斯克消费合作社联社现在开设的售货亭确实没有上述商品，通过斯摩棱斯克州商业局采取的措施也没有解决问题。售货亭至今没有货物。

军官中没有发现偷窃情况。没有发生集体逃跑、个人逃跑情况以及逃跑的企图。

1939年11月28日，士兵战俘中发生过两个楼的战俘绝食的情况，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查明，从各方面的质量看食品可以食用，之后，战俘食用了这种食品（汤）。绝食的原因是有敌对分子挑动。

1939年12月2日，战俘（少尉）巴济利·安东诺维奇·扎哈尔斯基在科泽尔斯克战俘营自杀身亡（自缢）。扎哈尔斯基1898年出生，1919年前为钳工，自1919年起至今一直在波兰军队服役。扎哈尔斯基的尸体是战俘奥若加在第48号简易仓库（无人使用）中发现的。扎哈尔斯基没有留下任何遗书。通过询问看出，扎哈尔斯基非常想念在格罗德诺市的家人。

扎哈尔斯基自杀一案正在进行调查。

战俘中的政治工作

战俘中的政治工作由政治科的工作人员通过谈话、读报、解释时事政治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方式进行。

战俘的群众文化活动是放映电影，每隔一天放映3~4场，能完全保证全体人员看一遍。

战俘营俱乐部设有弦乐团，还组织学唱苏联歌曲的合唱。

每个楼都设立了广播收听点，俱乐部旁边安装了广播喇叭。

通过现有的图书馆可保证战俘阅读文艺、社会和经济书籍，以及报纸和杂志。安装了中央报纸橱窗；战俘营俱乐部和住地布置了标语和宣传画。

组织措施

为了加强战俘营总务机关的工作，战俘营主任的行政助手换成了身体比较好的同志。

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更换新的供水设备。发运新电动机的通知单也已下达。

在政治工作方面，已经注意教育战俘营的非军职雇员，让他们学习，以提高警惕性和加强与不道德行为的斗争。

已经责成党组织帮助战俘营总务机关工作。

局里已对派去的工作人员在搞好总务机关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一些问题，例如燃料、麦秸、蔬菜、战俘营卫生方面、建筑方面、登记和照相方面的问题，对政治工作、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也给予了帮助。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
少校（索普鲁年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
团级政治委员（涅霍罗舍夫）

1939年12月于莫斯科

№08063

**梅尔库洛夫和切尔内绍夫就
该部门企业使用战俘办法给苏联
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托拉斯经理、
矿物局局长、总局局长和战俘营的指示**

(不晚于1939年12月2日^①)

机密

捷尔任斯基矿业托拉斯、列宁矿业托拉斯、十月革命矿业托拉斯和
尼科波尔锰矿托拉斯经理：

叶列诺矿物局和卡拉库布矿物局局长：

“扎波罗热炼钢厂”联合企业经理：

金属矿业总局、非金属矿业总局和特种钢总局局长：

内务人民委员部克里沃罗格战俘营、叶列诺战俘营和扎波罗热战俘
营主任和政委：

凡有劳动能力的战俘一律在基本工程中使用，同时将他们的工
资改为与非军人雇用工同等的记件工资。

战俘中的不完全劳动力在战俘营内部以及工矿企业的临时性工
作中使用，并根据该工业部门现行的计时工资制确定他们的计时工
资。若部分此类战俘在辅助工作中不能使用，则按普通战俘的伙食
标准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品，直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

^① 该日期为决议日期。

局下达专门指示。

立即开展摸底工作，找出那些因为有生产技能并且政治合格，可以在你们企业安排固定工作的战俘。

创造必要的生产条件（固定的工作地点、系统地指导，等等）、文化生活条件以及居住生活条件。要进行解释工作，这样能保证所有的战俘完成生产定额。

经常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战俘，经专门审查后，将名单报送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以便批准撤消对他们的看管。

居住地在归属德国的领土上的战俘，将在你们那里长期工作。必须根除那种认为很快会遣返战俘的不健康情绪。

摸底之后，将挑选出的、符合在企业长期工作的战俘名单，报送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并附上有企业领导人、战俘营主任和政委签名的详细的生产技能鉴定和政治鉴定。

战俘若因病脱离工作，脱离工作期间向其支付基本补助金，但补助金不应低于最低生活费——每天 5 卢布。生病期间免费提供公用事业服务。

若因管理当局的责任被迫缺勤或者停工，由管理当局支付缺勤或者停工的基本工资，但基本工资不应低于最低生活费——每天 5 卢布。

战俘改为计件工资或计时工资后，停止向其发放免费伙食。

战俘的文化生活服务（俱乐部、电影、报纸、等等），由企业根据战俘的工资总额，使用企业拨给有关矿山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的留成，通过有关的工会组织予以提供。

工作服和工作鞋免费发放。

每人免费发放一套内衣。

(梅尔库洛夫)^①

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师级政治委员

(切尔内绍夫)

1939年12月2日于莫斯科

^① 费·阿·梅尔库洛夫，1939～1940年任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

№08064

旧别尔斯克战俘营领导人就该
战俘营 1939 年 11 月的政治思想情况给
涅霍罗舍夫的汇报

(1939 年 12 月 3 日)

№5 ~ 37

机密

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治处主任、团级政治委员涅霍罗舍夫同志

内务人民委员部旧别尔斯克战俘营 1939 年 11 月的政治思想情况
兹报告，根据您的指示安排了战俘的政治教育工作。

整个政治教育工作采取了以下形式：读书报、座谈、政治时事宣讲、回答战俘的问题，给战俘提供报纸和书籍、放映电影、广泛利用收音机，并对按规定标准向战俘提供各种必需品实行经常性的严格监督。

11 月份做了以下工作：

对 3907 名战俘作了政治工作。

对战俘的政治工作是按计划进行的，在实施计划中，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占有主导地位。按照对战俘的党政工作计划制订的措施，基本上已经全部落实。

一、进行了以下主题的座谈

1.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及其国际意义；

2.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22 周年；
3. 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和苏联的对外政策；
4. 社会主义的胜利给苏联劳动人民带来了什么；
5. 苏联劳动人民丰富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6. 沙皇俄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苏联成了什么样的国家；
7. 就电影《列宁在十月》和战俘进行了座谈。

二、读报纸上的材料并作讲解

1. 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莫洛托夫同志 1939 年 10 月 31 日的报告）。

2. 莫洛托夫同志 1939 年 11 月 6 日在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22 周年大会上的报告。

3. 英国杂志论波兰失败的原因（《真理报》，1939 年 11 月 18 日）。

4. 苏联最高苏维埃第 5 次会议的材料。
5. 每周两次以“苏联国内外新闻”为题进行政治时事宣讲。
6. 组织各楼宣读报纸。

三、落实对战俘的组织指导措施

1. 各楼以“战俘营的内部制度”为题进行了座谈。

2. 就“楼内的内部规章”问题和各楼的看门人和班长进行了座谈。

3. 在战俘中进行了关于允许写信的解释工作：

- ①与 P~H^① 长进行了座谈。
- ②与各楼看门人和班长进行了座谈。

① 原文如此，词义不清。

4. 实行有组织的回答问题的制度，每个楼都设有问题簿。每个战俘在第二天就会亲自收到政治科指导员对他写的问题的回答。

四、为战俘放映了以下电影

1. 《带枪的人》
2. 《深山行军记》
3. 《赢得幸福的故事》
4. 《列宁在十月》
5. 《发生在小车站的故事》
6. 《九月的一夜》
7. 《列宁在 1918 年》
8. 《海上岗位》
9. 《彼得大帝》第一集
10. 《彼得大帝》第二集
11. 《马赛曲》
12. 《仇敌》
13. 《祖国的勇士》

观看电影的战俘达 3 万人次。战俘对每部影片都很满意，并且经常询问下一次放映什么影片。在市电影院为原将军和上校组织了两场电影，他们也很满意，并对关心表示感谢。

五、在战俘营院内布置了以下专题的图片橱窗

1. 我们祖国艰苦的过去。
2. 苏联——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
3. 第 3 个斯大林五年计划。

十月革命 22 周年庆祝日前夕，战俘营楼房的墙上张贴了标语和宣传画。现在正在大张旗鼓地准备装饰工作，迎接地方劳动人民

代表苏维埃选举日。

六、图书馆工作

图书馆有各种图书 3443 册。有各类报纸 805 份、杂志 173 份。图书馆经常为 1280 名读者服务。阅览室每天有 200 名读者。

七、组织战俘收听无线电广播

为战俘建立了 42 个无线电广播收听点，其中 32 个点安装了扬声器，其中有 2 部电动扬声器。战俘每天从早晨 5 点至夜里 12 点都可以收听无线电广播。

战俘以 200~500 人的大组形式收听了以下广播：

1. 莫洛托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 5 次会议上的报告；
2. 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代表委员会成员的报告；
3. 莫洛托夫同志 1939 年 11 月 6 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会上的报告；
4. 莫洛托夫同志 1939 年 11 月 29 日的广播讲话。

战俘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都收听莫斯科的广播新闻。

八、保证文化生活用品

购置并发放给战俘使用的文化生活用品有：

手风琴——3 部

象棋——20 副

跳棋——25 副

多米诺骨牌——14 副

正在筹备按宿舍进行的象棋比赛，然后举行全战俘营的象棋比赛。

对战俘进行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大障碍是俱乐部没有房舍。

座谈、读报和听时事报告都是由政治机关分楼安排，电影露天放映。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正常地进行工作，政治机关无法对全体战俘作系统性的工作。

政治科的工作人员除完成群众宣传鼓动工作计划外，还直接领导了战俘的遣送、接收和安置工作，以及伙食部门和卫生处理的组织工作，还要帮助登记统计科工作。曾经专门抽出指导员卡加纳同志负责两座新简易宿舍的建造。

12月拟采取以下措施对战俘做政治教育工作：

一、政治科的所有工作人员固定到各个宿舍作报告、政治时事宣讲、读报、座谈以及其他形式的战俘群众工作。

拟于12月通过座谈、讲演和作报告向战俘讲解以下问题：

1.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同志1939年11月29日的广播讲话；

2.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宪法、社会制度；

3. 苏联——强盛的工业国家；

4. 苏联——世界首屈一指的社会主义农业国；

5. 苏联——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苏联的国家制度和选举制度；

6. 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苏维埃制度的基础；

7. 苏联各民族的兄弟联盟是实现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的结果、苏联——苏联各民族的大家庭；

8. 弗·伊·列宁的生平；

9. 苏联人民的新知识分子。

二、利用当地的无线电转播站组织全体人员收听以下广播：

1. 斯大林同志在第8次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宪法的报告。

2. 莫洛托夫同志在第8次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 斯大林同志在选举准备大会上的讲话。

三、安装俱乐部设备并开展俱乐部工作。

1. 12月15日以前腾出一座房舍并安装俱乐部设备：

(1) 400个座位的礼堂；(2) 图书馆；(3) 阅览室；(4) 游戏室——象棋、跳棋和多米诺骨牌；(5) 小组活动室。

2. 将收到的流动电影放映机安装好，为战俘放映电影（请局里发一部将220伏电压转换为110伏电压的变压器和一部带电动扬声器的帕捷诺尔型电动机来）。

3. 给战俘作以下专题的讲演：

(1) 苏联人民的新知识分子。

(2) 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团结。

4. 组织以下小组活动：(1) 艺术小组，(2) 音乐小组，(3) 象棋和跳棋小组。

5. 举办全战俘营的象棋比赛。

6. 布置以下图片橱窗：

(1)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生平。

(2)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生平。

(3) 根据斯大林宪法进行的第1次选举。

7. 组织放映以下电影：

《伟大的公民》、《风华正茂》、《孤舟白帆》、《最高奖赏》、《第十三》、《拖拉机手们》、《九月的一夜》、《共青城》、《带枪的人》、《波罗的海舰队的军人》、《朋友们》、《在人间》、《卡尔梅柳克》、《荣誉》，等等。

8. 补充战俘营无线电广播收听系统的设备，保证11个收听点装有扩音器（将有43个无线电广播收听点），在俱乐部安装无线电广播收听设备，设立5个收听点。

9. 就电影《带枪的人》进行座谈和讲解。

战俘的政治思想状况

上一个月政治机关发现战俘中有以下反革命活动：

1. 政治科指导员卡加纳同志查明，波兰军队原大尉战俘梅奇斯拉夫·约瑟福维奇·埃韦特组织了有军官——路德维希·亚诺维奇·多梅尔少校、斯坦尼斯拉夫·亚诺维奇·克沃列格等人参加的小组，以“文化学习活动”（讲卫生课、学习外语、讲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等等）为名，进行反革命活动，实际上，他们就上述问题进行“座谈”时，进行了旨在反对战俘营内部制度和战俘营管理当局的反革命活动：声言“只用波兰语交谈”，“不为战俘营上工”，“战俘营的情况越糟对我们越有利——我们以此让战俘营管理当局和战俘营内的制度，在很快就要到来的国际调查小组面前出丑”，等等。上述事实立即报到特别科，经过搜查发现了参加该小组人员的名单以及小组的活动计划。小组的3名组织者埃韦特、多梅尔和克沃列格已从战俘营除名。

2. 政治科指导员米哈伊林科同志查房时发现，战俘路·亚·多马尔^①在一个楼里向一群战俘宣读一份通过在军官中组织的互助会，发放兹罗提借款的名单。名单上有80个人，其中78人各自签收了100兹罗提，并且有遣返后归还借款的保证“声明”。在调查该事实时查明，互助会是根据带有大量兹罗提的人员“自愿”捐款的原则成立的。互助会由被战俘营除名的路德维希·亚诺维奇·多梅尔（原波兰军队少校）领导。

互助会理事会由5个人组成，监督委员会由3人组成。据不完全统计，互助会理事会已经发放了1万兹罗提以上的借款。

^① 原文有误，应为多梅尔。

现在，不论是第一个小组还是第二个小组都已经解散，以“互助会”和“文化小组”为名的反革命活动也已经停止。

各楼以及各班的政治机构在各楼战俘中都做了相应的工作，防止成立小团体，还加强了监督，不允许战俘以任何借口进行组织活动。

3. 有人企图在波兰全国性的节日时在战俘营内组织祈祷。由于政治机关的努力，这一企图没有得逞，不过，有一个楼还是搞了15分钟的祈祷，然后祈祷活动就停止了。有人企图在房舍内挂十字架和圣像，这种做法被我们坚决禁止了。

4. 个别军官在谈到国际局势时说：“苏联成了红色帝国主义国家”，这种反苏言论被制止了。没有发生自杀身亡事故。十月份企图用剃须刀片割断喉咙的医生战俘已经康复，现在在战俘营。

没有发生流行病。

没有发生集体和个人逃跑事件。

没有集体绝食和个人绝食的情况。

战俘从舍佩托夫卡到来时，曾经发生过一名战俘的靴子被盗和倒卖在当地货摊上买的商品的情况。政治机关采取了应有的措施，现在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没有酗酒现象。

没有发生事故、伤亡和火灾。

战俘营的经济情况

1. 1月份采取了以下措施：

1. 建造了容纳1040人的两座简易宿舍。

2. 挖掘并装备了一口自流水井。

3. 开展了建设战俘营内下水道系统的工作。

4. 建造了供 3000 人使用的厨房，并已交付使用。
5. 修好了卫生队和住院部的用房。现在卫生队已经搬入新舍。
6. 在战俘营院内修建并布置了人行林阴道。
7. 为战俘营工作人员食堂安装了设备并已交付使用。
8. 准备好了洗衣房用房。
9. 建造 1200 人的食堂和厨房的方案已经准备好。必须尽快发运建筑用的钉子（5 吨）和油毡纸。

战俘的卫生服务

11 月份采取了以下措施：

1. 由于从舍佩托夫卡新来了一批战俘，他们长期没有更换服装，战俘身上已经生了虱子。总务科和卫生科采取了紧急措施消除这种不正常现象，现在，到来的战俘身上生虱子的情况已经消除。

2. 经常打扫院落和所有脏的地方并进行消毒。

3. 对 3117 平方米的住房进行了打扫并消过毒。

4. 从战俘营院里运出 614 马车垃圾。

5. 接种了以下疫苗：

①肠伤寒疫苗

第 1 次接种——2432 人

第 2 次接种——1897 人

第 3 次接种——1123 人

②天花疫苗——2345 人

6. 门诊部接诊——4945 人

初诊——1786 人

复诊——3026 人

疾病种类：

- ①外科——875人
- ②呼吸道疾病——438人
- ③肠胃病——425人
- ④皮肤病——646人
- ⑤眼病——448人
- ⑥牙病——538人
- ⑦感冒和咽喉炎——144人
- ⑧性病——65人
- ⑨包扎——446人
- ⑩耳鼻喉病——232人
- ⑪其他各种疾病——611人

门诊接诊中未发现急性胃病。

7. 战俘营住院部治疗住院病人——557人，疾病种类如下：

- ① 呼吸道病——185人
- ② 外科病——31人
- ③ 感冒和咽喉炎——81人
- ④ 肠胃病——101人
- ⑤ 心脏病——3人
- ⑥ 其他各种疾病——134人。

8. 在区医院住院治疗5人。疾病类型：肺炎、肠梗阻和胃炎。

9. 11月份在性病防治所治疗_____①人。

- ① 梅毒病1人
- ② 淋病_____②人

10. 11月份没有战俘死亡。

① 原文未写患者数量。

② 原文未写患者数量。

登记统计科的工作

至 12 月 1 日做了以下工作：

1. 填写调查表——3800 份。
2. 整理人事档案并进行登记——3500 件。
3. 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局发第 2 张照片——3500 张。
4. 还剩下：

(1) 未填写的调查表——107 份。

(2) 准备并向局里发第 2 张照片——407 张。

(3) 12 月 3 日将原军官战俘（将军、上校、中校、地主和其他官员）的名单写好并发往局里。

5. 现有人员卡片和离开人员卡片已经填写完毕。

6. 登记簿已登记了 2000 名现有的人员，离开人员登记簿还未开始登记。

登记统计科的工作将于今年 12 月 8 日前结束。照相工作做得很不好。这方面的主要困难是材料（胶卷和照相纸）缺乏，莫斯科发来的照相材料不能用。

财务科的工作

11 月份给战俘营拨款很晚，妨碍了正常的工作进程。实际上战俘营账上从 11 月 21 日才开始进款，在此之前不得使用商业单位的非法贷款，保证战俘的伙食和其他进货。

截止至 11 月 29 日，已有 35 万卢布的欠款。财务科科长科别列夫同志 11 月 25 日去伏罗希洛夫格勒后和给局里（贝伦宗同志）发了两封电报后，战俘营的账上才进了 30 万卢布，这不能保证支

付35万卢布的欠款。在再次给局里（贝伦宗同志）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内务局发电报后，战俘营的账上12月2日才又进了20万卢布。

根据拨款计划，11月和12月战俘营有130万卢布的拨款，根据这一计划，已收到70万卢布，剩下的60万卢布请最迟于1939年12月12日拨出。请采取措施，在12月份及时、不间断地给战俘营拨款。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主任、国家安全大尉 别列日科夫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政委、营级政治干部 基尔申

1939年12月3日于旧别尔斯克

№ 08065

马卡洛夫就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战俘 登记工作给马克利亚尔斯基的报告

(不晚于 1939 年 12 月 4 日)

机密

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第 2 处处长、国家安全中尉
马克利亚尔斯基同志

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战俘登记工作情
况的报告

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第 2 科按编制有 11 人，其中：

科长 1 人，

主任监察员 1 人，

监察员 1 人，

助理监察员 1 人，

登记员数人。

大多数征用的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低——识字不多，因此，战俘
的登记混乱，没有反映实际情况。

此外，还让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填写战俘调查表，因而填写的调
查表中姓名和出生地有误，调查表背面的栏目根本没有填写。

由于向归属德国的领土上遣返战俘的登记有误，将狱吏和宪兵
也列入了遣返名单，例如爱德华·伊格纳季耶维奇·日拉，他一连干
过 5 年监狱会计助理，又如马克西姆利扬·马丁诺维奇·斯库金，他

是警察军士，当过20年警察（已将他们留在战俘营）。

第2科的个别工作人员过去对自己的工作不负责任，公文和战俘卷宗杂乱无章，有关战俘的文件乱堆在柜子中，柜子也不关。

战俘的人事卷宗不经登记就发送，因此，许多战俘的人事卷宗找不到。

登记员都是征用人员，大都文化水平低，此外，登记员的报酬比值班守卫低，因此他们情绪低落，一部分人要求改作值班守卫。

必须指出，根据战俘营主任、少校鲍里索韦茨同志的指示，竟让战俘到第2科工作。

战俘营领导对第2科人员配备的态度轻率，对人员的审查不够。例如，录用到第2科工作的乌特金娜同志，她的丈夫现在被关押在集中营。

第2科自开始工作以来复员了11人。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联共（布）区委帮忙为第2科分配来了很有文化的工作人员，但是战俘营领导不善于挑选在第2科工作的人员，尽管一部分同志表示同意在战俘营工作。

第2科的办公室有两间。必须指出，工作人员的办公桌和保管战俘人事卷宗和文件的柜子不关，但是办公室经常有战俘出入。

曾经发生过不经第2科同意就将战俘从一个楼调到另一个楼，以及不通知第2科就派战俘到战俘营以外工作的情况。这一切造成了登记混乱，例如，10月底，警卫队未通知第2科就把患病的战俘送到了加里宁市的医院。

今年9月27日接收了一批战俘，共720人，但没有相应的文件，在登记过程中查明只有698人，战俘营至今仍有22人的差额。

在出差期间做了以下工作：

1. 抄写了第2套卡片，共抄卡片10000张；
2. 完成了根据调查表对1000名战俘的登记工作，并在登记簿

中作了登记；

3. 抄写的卡片按字母顺序归入了卡片库；
4. 为特别科抄写了第 2 份调查表，共 2000 份；
5. 按楼列出了战俘名单，以便和战俘个人卷宗和卡片资料核对；
6. 对第 2 科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工作分工；
7. 保管有战俘个人卷宗的办公桌和文件柜安了锁；
8. 接收 3 名在劳教处工作的人到第 2 科担任登记员职务；
9. 制订了改进第 2 科工作的措施；
10. 战俘在战俘营内部的一切调动和送营外干活都通知第 2 科；
11. 禁止任何人不办理有关的手续即发送战俘个人卷宗；
12. 为了填写队列表，为登记员制订了楼内一昼夜战俘人数变化的登记格式。登记员每天汇总后于上午 9 时送第 2 科。
13. 从加里宁市来的 4 名摄影师已经开始为战俘拍照。全部拍照工作已按合同交出，12 月 15 日前应当完成。

我们打算：

将登记员的职务改为助理监察员，挑选有文化的工作人员，最好从业务工作人员中挑选。

严禁非第 2 科的工作人员做战俘登记工作，过去曾发生过由战俘营管理部门指派几乎没有文化的人做登记工作的情况。

监察员 马卡罗夫

助理监察员 胡佳科夫

1939 年 12 月 4 日于奥斯塔什科夫

№08066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
就对警察战俘和宪兵战俘加强
监视给鲍里索韦茨的指示

(1939年12月7日)

机密

急件

№2068318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管理处主任、少校鲍里索韦茨同志：

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组在战俘营工作期间，为防止你们战俘营关押的警察、宪兵和其他战俘可能闹事和有过激行为，兹建议：

1. 认真指示楼长和值班人员，对战俘加强监视；
2. 收缴战俘住房中的斧子、十字镐及其他工具。这些工具只能在战俘营营区（院墙）外上锁的工具仓库内保管。

在主要工具车间布置岗哨。

3. 加强值班部队和战俘营周围的巡逻。
4. 在值班守卫队移往新住处前，采取措施加强对值班守卫队武器的保卫。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少校 索普鲁年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
团级政治委员 涅霍罗舍夫
战俘事务管理局第1处处长 季什科夫
1939年12月7日于莫斯科

№08067

季什科夫就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情况给 索普鲁年科和涅霍罗舍夫的报告

(1939年12月9日)

机密

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少校索普鲁年科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团级政治委员涅霍罗舍夫同志

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情况的报告

一、战俘人员情况

至1939年12月1日，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关押着5963人其中：

基干警察	5033人
宪兵	40人
监狱看守	150人
边防军人员	41人
民团分子	27人
军校学员	8人

各类（包括警察和宪兵）军官	263 人
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	127 人
预备役警察	169 人
非军人	105 人

总数 5963 人中，1919 人的籍贯在划归苏联的领土上，196 人的籍贯在维尔诺州，3848 人的籍贯在归属德国的领土上。

大多数所谓预备役警察为工人和农民，过去从未当过警察，只是由于年龄大或者因身体条件服兵役不合格才在警察局注册。

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中许多人来自边防军和边境守备队。这一类士兵与波兰军队的其他士兵大都毫无差别，但是，初级指挥人员中许多人是在边防军服役 9~15 年的超期服役者。许多军士长和军士曾是警备队的队长，波兰间谍就是在他们的参与下潜入我国领土的。

身份最复杂的是非军人战俘。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律师、大学生、市政府职员，等等。也有人自称是共产党员。

军官中有一大批职业为教师、医生、药剂师等的预备役军官。这些人中等学校毕业后应征服役，在下级准尉学校学习一年后获得预备役下级准尉军衔。

我认为，预备役警察、边防军和边境守备队中的士兵以及劳动知识分子中的预备役军官（籍贯在苏联领土上），不宜作为战俘继续关押。

但是，这几类人员应在对籍贯可疑人员再次进行逐一审问和审查后予以释放，因为他们当中有人隐瞒了曾是警察和边防军骨干的实情。

边防军中超期服役的初级指挥人员，不经认真审查从中发展间谍的工作不应释放。

二、制度和警卫工作

应当说战俘营的制度不能令人满意。战俘营营区有几处没有铁丝网，而且根本没有照明灯。没有值班室（有可以关闭的大门和出入便门的出入口岗楼）。只有3条警犬，战俘营营区大，数量显然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可能通过冰上（湖已经结冰）逃跑。障碍和值班室有可能被战俘的暴力迅速控制，营区的照明完全由管理机关掌握，而这是警卫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因为营区没有了照明，任何障碍都不难跨越。

派战俘到战俘营营区外和到奥斯塔什科夫市干活，但是没有足够押解力量且未经特别科检查的情况，也曾发生过。

10月份曾经让警察到登记统计科工作（应特别科要求现已经离开）。

发生过管理处雇用的职工和战俘联系的情况，例如，食堂主任维哈列夫接收了一名军官战俘的信准备秘密转发；登记员克雷洛娃买过战俘的手表，等等。

战俘中发生过拒绝干活、偷盗、藏匿禁品、斗殴、不执行战俘营管理部门命令以及其他违反战俘营制度的情况。

9月份因各类违规行为共有57名战俘受惩处。

但是这些惩处没有起多大作用，因为战俘营没有建惩戒室，而禁闭室要比战俘住的一般房舍好得多（清洁、宽敞、暖和），还因为按规定禁闭室的伙食和其他战俘一样，所以，因各种过失蹲禁闭室的战俘感受不到任何受惩罚的负担，而且警察和宪兵先生们也不会因问心有愧非常苦恼，因为通过和关押在禁闭室的战俘谈话了解到，他们认为在“同事”看来这差不多是“功劳”（如在食堂为同事偷了一桶稀饭、不去干活，而且说服了其他人也不去干活，等

等)。必须采取关惩戒室的办法，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惩罚措施，惩戒室的生活条件和其他地方相比要差，而且要派在惩戒室关押的人干各种重活。

关禁闭室作为一种极端措施采用，而且被惩处者一般单独关押。

值班警卫住房在营区以内，也不符合警卫要求，因为人员和武器随时会落入战俘手中。武装岗哨在营区以内（例如在禁闭室附近）也不符合规定。

11月20日派遣送队时，发现一名战俘有“波兰TT”式手枪。

因此，11月24日对战俘宿舍进行了搜查。11月对战俘宿舍一共进行了两次搜查。搜查时没收了：

1. 兹罗提纸币	18.7 万
2. 美元	6 美元
3. 苏联货币	245 卢布
4. 波兰银币	454 兹罗提
5. 手电筒	33 个
6. 指南针	31 个
7. 纪念章和其他奖章	180 枚
8. 照相机	1 架
9. 军用望远镜	1 个
10. 扑克牌	30 副
11. 地图	15 张
12. 防毒面具	6 个
13. 军用子弹	28 粒
14. 小刀	43 把
15. 警哨	49 个
16. 放大镜	4 个

17. 军用背包 4个

此外，还没收了大量警察证件、集体照片以及各种废铁和工具（斧子，等等）。

因对来战俘营的战俘未进行过搜查，战俘带有许多军用物品。

战俘宿舍中有大量斧头和其他工具，是因为对这些生产工具的保管缺乏组织。

三、战俘营的越冬准备

至1939年12月1日，战俘营的越冬准备还没有结束。按战俘营首长制订的计划，正在对1364个床位的房舍进行修缮和改建。至12月1日完成了314个床位房舍的工程。

对战俘营的材料供应是满意的（房顶铁皮和水管不够，但这一点不妨碍住房建设），建筑拖延的主要原因是劳动组织不力和劳动纪律差，战俘的劳动生产效率低。

属于劳动组织不力的有：

1. 派工晚，因此，战俘不是工作8小时，而是5小时，甚至只有两个半小时（斯克申季耶沃建筑队）；

2. 将过多的劳动力派到狭窄的工作面上，这样做无疑降低了生产效率；

3. 不是向干活好的人发放加餐（晚餐），而是只要干活就发放，因此，战俘不关心完成任务，只是“出工”而已；

4. 因为施工员自己报施工量，报施工量时有欺骗行为。缺乏工程监督；

5. 在建筑队干活的战俘（粗木工、细木工、锅炉工，等等）分住在不同的楼，不可能同时集合、首先吃饭和及时送往工地。

战俘营没有电话。

这种情况从警卫角度看是不允许的，另外，没有电话也严重影

响工作，因为为了任何一件小事就不得不让领导离开工作，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要长时间地在战俘营各处跑动。

四、战俘的统计

战俘统计工作混乱。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战俘营有多少战俘。

接收的战俘数量与其后的统计数字相差 22 人。但是究竟缺了谁，战俘营是否确实接收了这些人尚不得而知，因为战俘营主任助理波洛维纽克和战俘营政委尤拉索夫同志接收的一列车 720 人的战俘，没有办理手续。

队列统计表与统计卷宗中的数量不符。一定数量的战俘逃避了登记，但是不知道哪些人逃避了登记，因为还没有将现有的实际人员和统计卷宗进行核对。

登记统计科不知道战俘安置在哪个楼，因此，找某个战俘很困难。

使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的是，谁都可以不经过登记统计科，不让登记统计科知道，就将战俘从一个楼调到另一个楼，这样就把统计彻底搞乱了。更有甚者，没有建立卡片资料。

调查表是文化水平低的人（登记员、红军战士）填写的。尽管人民委员有过指示，但是特别科对此置若罔闻，专管登记战俘的政治科监察员伊万诺夫对填写调查表非常马虎，填写的调查表字迹极为潦草，而且有错误，大大增加了其他同志的困难，耽误了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要对这些调查表进行再加工。调查表的背面栏目根本没填写，倘若战俘逃跑，战俘营就不可能报出他的特征。

通过兵役局征用的预备役军人到登记统计科工作时，没有考虑到一个情况：即处理战俘登记材料的人应当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地理知识好，政治上合格。

至少应当录用十年制学校的毕业生从事这项工作，征用的登记员实际上不过是些识字不多的人，不会正确地填写调查表。

在制订编制和工资额时又重犯了这种错误。

登记统计科的登记员收入为 225 卢布，而且没有配给的份饭，而值班守卫人员收入 275 卢布，还有配给的份饭。这样一来，战俘营用 225 卢布的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人员了。

五、人员构成及其工作情况

战俘营主任和政委对干部的研究、选拔和培养问题重视很不够。

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工作人员至今不能保证应有的制度和对战俘的看守。

战俘营共有 250 名雇用的职工（根据名单）。但只有 134 人的人事档案，而且主要不是管理机关中的人员而是生产和服务人员的人事档案。

250 名雇用的职工中有许多“多余的”人员，他们上班不必出战俘营营区，他们的工作完全可以换成战俘干，而且对工作有利。例如木材加工车间，除一名车间主任和一名师傅外，还有 6 个雇用的工人（统计员、车工和烘干工），职工食堂有雇用的服务员、厨师助手和洗碗工；裁缝车间虽然战俘裁缝人数完全够用了，但是除车间主任外，还雇用了 2 名裁缝。其他车间也有类情况。

这些人都住在周围的村镇，其中有些人没有经过充分审查，在政治思想上不够可靠，是战俘中出现各种违犯制度情况的又一渠道。

战俘营职工中有前科的有 7 人，被其他单位解雇和因酗酒、旷工、生活腐化受过处分的有 7 人，被集体农庄开除的 1 人。

其中一部分人已经和警察战俘以及间谍战俘有联系，例如，因

拒绝工作被劳动教养院解雇的Ф.В.克雷洛娃，被录用到战俘营工作后，干起了收购战俘手表的事。

以下数字说明了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情况：

11月被解雇和降级的人数：

因和战俘有联系（帮助非法通信，购买物品）……2人，因擅自将战俘营出入证交给外人……1人，因擅自离岗、旷工和迟到……5人，因对工作敷衍塞责……1人。

应当指出，11月下半月才开始实行处分违犯制度的雇用职工，在此之前，只是将违犯纪律者和玩忽职守者“调离”，交区兵役局安排。

例如，向战俘购买物品的值班员西尼亚科夫就“调”到了区兵役局。

10月和11月以这种方式调离的一共有37人。

没有利用揭发出来的违犯制度和work纪律的事实对职工做任何政治思想工作。

例如食堂主任维哈列夫因帮助一名军官战俘非法通信而被解雇。应当下命令通报全体人员。检查时发现，谁也没向职工宣布这样的命令，也未作说明。

雇用的职工劳动纪律很差。党组织没有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决定直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原订于11月27日召开的劳动纪律问题大会，因职工未到会没有开成。29日召开了大会，只有50%的人到会。

在大会上发言的只有战俘营的领导人员：战俘营主任、政委、战俘营副主任、战俘营主任助理、政治科科长（他是党委书记）、特别科副科长、总务科科长、值班守卫队队长和管委会书记。他们只是对值班员和食堂服务员违犯劳动纪律的行为破口大骂了一通。

他们只字未作任何自我批评，任何人未揭示劳动纪律涣散的真

正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是：缺乏严格的劳动规章，缺乏战俘营领导和科领导的榜样，缺乏政治工作和对员工的指导。

以下情况最能说明后一点：11月29日，值班员谢韦罗夫和叶利谢耶夫在没有通行证和押解人员的情况下放5名战俘出了战俘营。调查这一事实时发现：谢韦罗夫和叶利谢耶夫在来战俘营之前，一个是鞋匠，一个是粉刷工，1919年在军队服过役，在非战斗职位上工作，识字不多，第一次在战俘营大门口值班，没有得到过任何指示。还发现，通行证组的值班员科兹洛夫也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战俘营没有说明警卫目标和每个岗哨特殊职责的岗哨表。

战俘营主任鲍里索韦茨同志招新人员上工时没有进行严格的审查。例如，公民乌特金娜曾被招收到登计统计科工作，据现有的材料，她的丈夫正在劳动教养营接受劳教。

六、采取的措施

为了改进战俘营的工作，从今年11月20日至12月1日通过战俘营首长采取了以下措施：

1. 填写战俘卡片，严格按字母顺序建立卡片资料（因无格式纸没有填写的100张卡片除外）；
2. 发布命令，规定只有通过登计统计科才能将战俘从一个楼调到另一个楼和派到营区外干活的严格制度；
3. 所有战俘按类别和省份分住；
4. 将建筑材料清理出战俘营营区，进行将营完全隔离的工程；
5. 制订内卫岗哨表。夜间实行战俘营营区两组双人巡逻制；制订了值班员训练计划和课程表；
6. 发布了战俘营实行严格劳动规章的命令；
7. 将在建筑工地干活的所有建筑队集中到处住。组织了派工员制和验收施工员的工程监督。加餐只向完成当日任务的人发放；

8. 组织了制鞋车间、缝纫车间和洗衣房（三班工作制，一昼夜洗 900 套衣服）；

9. 制订了进一步加强战俘制度、看守和统计工作的措施（这些措施在 12 月 1 日的战俘营领导人员会议上经过讨论后通过）。

我认为，除了有待战俘营实施的实际行动外，还必须：

鉴于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主任、少校鲍里索韦茨同志和战俘营政委、政治指导员尤拉索夫同志不能保证对战俘营的领导，解除他们的工作，调做职责范围小的工作。

过去未在警察中服过役、现为预备役警察的工人和农民，边防军和边境守备队的士兵，劳动知识分子（医生、农村教师、药剂师等）中的预备役军官、中尉和少尉，凡居住在划归苏联的原波兰领土上者，释放回家。

尽快查明关押在战俘营中的“平民”以及所有意外落入战俘中的人，凡在特别科和居住地无劣迹证明材料者，也释放回家。

首先非常认真地审查自称属于波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者。

在尽短的时间内保证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营区的照明用材料和电话通讯。

就招工、干部登记和考查的程序向各战俘营发指示（对此没有任何指示可适用于战俘营）。

就以下问题起草命令并发给各战俘营：（1）允许战俘在战俘营机构劳动的程序；（2）战俘通告证的格式和发放办法。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第 1 处处长

阿·季什科夫

1939 年 12 月 9 日于莫斯科

№08068

**谢洛夫就逮捕西乌克兰各州原波兰军队骨干
军官行动结果给贝利亚的报告**

(1939年12月14日)

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一级集团军级国家安全政治委员贝利亚同志
兹报告1939年12月10日逮捕西乌克兰各州原波兰军队骨干
军官的行动结果：

捷尔诺波尔州

逮捕143人，其中预备队军官51人，被捕者中上校5人，中校3人，少校14人，大尉65人，上尉56人。

1939年12月10日以前，逮捕了各种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153人。

斯坦尼斯拉沃州

逮捕50人，其中预备队军官7人，被逮者中将军1人，上校2人，少校8人，大尉12人，上尉27人。

1939年12月10日以前，逮捕了各种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140人。

卢茨克州

1939年12月10日逮捕151人，其中预备队军官35人；被捕者中大尉26人，少校2人，上尉32人，中尉91人。

1939年12月10日前逮捕65人。

利沃夫州

1939年12月10日逮捕226人，被捕者中将军5人，上校23

人，少校 42 人，中校 28 人，大尉 61 人，上尉 22 人，中尉 46 人。

1939 年 12 月 10 日以前逮捕 129 人。

1939 年 12 月 10 日西乌克兰各州逮捕 570 人。

1939 年 12 月 10 日以前逮捕各种反革命组织参加者 487 人。

共逮捕原波兰军官 1057 人。

此外，旧别尔斯克战俘营关押着西乌克兰战役期间被俘虏的 3878 名军官。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

三级国家安全政治委员 谢洛夫

1939 年 12 月 14 日于基辅

№08069

**索普鲁年科就将军官战俘送往科泽尔斯克集中营
和将籍贯在归属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战俘移交
德国当局给乌克兰兹韦列夫的电话指示**

(1939年12月15日)

机密

基辅，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管理局兹韦列夫（电话记录）

将康复的原波兰军队军官战俘押送科泽尔斯克战俘营——捷尔任斯克铁路线科泽尔斯克车站。如果这些军官中有警察军官和宪兵军官，应将他们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加里宁铁路线奥斯塔什科夫车站。

可用装运囚犯的车厢运送军官，车厢向押运部队基辅旅索要。

将籍贯在归属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原波兰军队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押送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第4集团军移交站，以便移交给德国当局。把籍贯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原波兰军队的士兵战俘和初级指挥人员战俘遣返原籍。请报告遣送情况。同时，立即电告在医院关押的所有德军士兵和军官的姓名和详细调查情况，并注明现状况和被俘日期。

索普鲁年科 [第] 2068534

1939年12月15莫斯科

№08070

**谢洛夫就加强战俘工作、追究反苏人员刑事责任
给扎波罗热战俘营主任彼得鲁申的指示**

(1939年12月21日)

机密

第 4866 / CH 号

战俘营主任彼得鲁申同志

抄送：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国家安全少校索普鲁年科同志
扎波罗热市和莫斯科市

据我们掌握的扎波罗热州的战俘工作情况，你们的工作非常糟糕。

战俘的劳动纪律差，致使 1601 人中每天只有 1500 人出工，其他人因各种原因（生病、装病、无靴子）根本不出工。大量人员拒绝工作，每次竟达 100 多人。缺乏对战俘的政治教育工作，致使上工的许多战俘不出力、装病，因此他们只能拿到极少的工资（例如 C.O. 穆哈、И.В. 维奇科、A.M. 路德维希等人的日工资为 23 戈比），而与其同时，有些工作突出的战俘每天拿 30~40 卢布。

没有在战俘中宣扬优秀生产成绩，批评差的工作成果。

没有组织争创优秀生产成绩的社会主义竞赛。

你们没有执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看守战俘的指示，使 3 名战俘在今年 12 月 2 日从战俘营逃跑，而且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向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此事，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拘捕这些战

俘。毋庸赘言，你们自己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另外，战俘竟擅自进城，集体酗酒，在居民中进行反苏谈话，等等。

以下情况又助长了这种现象：战俘营没有组织生活日用品销售，没有组织洗衣业务，没有理发室，战俘营的房舍几天不打扫，即根本没有文化和生活服务，毫无疑问，一部分有敌对情绪的反战俘利用了上述情况。

鉴于上述情况，我建议：

立即根除上述不正常的现象。

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州管理局介入你们的全部工作。

严格执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看守战俘的指示，绝对不准酗酒、无目的地逛街和与反苏分子交往。

与以种种借口不上工的装病者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并吸收医务人员参加这项工作。

对有积极反苏表现的战俘，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54~10条追究责任。

1940年1月前就战俘营的状况、你们在战俘中所做的工作以及3名战俘逃跑的情况说明，提交详细的报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

三级国家安全政治委员 谢洛夫

1939年12月21日于基辅

№08071

**贝利亚就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组
赴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完成对警察
战俘侦查一事给索普鲁年科的命令**

(1939年12月31日)

机密

第 5866 / 6 号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少校索普鲁年科同志

抄送：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局局长、上校托卡列夫同志

建议您赴奥斯塔什科夫市做以下工作：

1. 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组对原波兰警察战俘案^① 的准备情况，以便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报告。

采取必要措施调整侦查组的工作，使他们在1月份之内完成所有在押警察战俘侦查案的手续。

2. 从全部警察战俘案中挑选出与特工有关系的人员的案件，就这些案件认真侦查，查清他们在苏联国内和国外的全部联系，以及他们所知道的当时派往苏联的原波兰情报机关的间谍。

^① 指对战俘营中的原波兰警察进行的特别调查。这类战俘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已查明有 2000 余人。

3. 派以下同志和您一起出差做这项工作：

- (1) Н.Ф. 贝科夫——侦查员，国家安全中尉；
- (2) А.М. 马里索夫——侦查员，国家安全中尉；
- (3) Н.К. 克列晓夫——侦查员，国家安全少尉；
- (4) В.И. 辛金——侦查员，国家安全中尉；
- (5) В.А. 马克拉科夫——侦查员，国家安全少尉；
- (6) М.С. 加拉费耶夫——侦查员，国家安全中士；
- (7) А.А. 基谢廖夫——侦查员，国家安全中尉；
- (8) П.Н. 沃尔琴科夫——助理侦查员，国家安全中士；
- (9) А.З. 费多宁——侦查员，国家安全中尉；
- (10) В.П. 希什金——侦查员，国家安全少尉。

他们应当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侦查组组长、国家安全中尉别洛利佩茨基领导下工作。

4. 与此同时，您应与派去的移民管理总局第2处主任侦缉员、国家安全中尉霍利切夫同志和移民管理总局第2处主任侦缉员、国家安全中尉洛贡科夫同志一起，了解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特别科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10月8日第4/56190命令进行的间谍情报工作。检查在警察战俘中的间谍情报保障程度，就地给予实际帮助，搞好间谍情报网工作。

同时，注意现有情报工作的质量和他们全面了解各类战俘情绪的保证程度。

5. 检查战俘营特别科关于调查战俘与营外联系的工作，检查这些联系的性质，服务人员和营外人员中有无间谍。

6. 搞好战俘营登记机关的工作，详细指导工作人员进行警察战俘的登记，保证登记质量好，战俘对调查表中问题的回答准确、清楚，在审讯过程中查明战俘在苏联境内外的所有联系。

7. 检查战俘营的警卫状况和战俘的纪律情况，采取必要的措

苏联进军波兰与卡廷事件

施，杜绝战俘从战俘营逃跑和战俘破坏战俘营规章制度的可能性。

凡蓄意破坏战俘营制度者，应追究责任，凡企图逃跑者，一经发现应予逮捕，并交法庭审判。报告你的工作结果。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一级集团军级国家安全政治委员 拉·贝利亚
1939年12月31日于莫斯科

№08072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把有
反苏情绪的战俘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给
伊利英和列维亚金的指示

(1939年12月31日)

机密

第2069050号

内务人民委员部克里沃罗格战俘营主任伊利英同志：

战俘营政委列维亚金同志：

准许你们将有反苏情绪者、蓄意不出工者和对其他战俘群众有坏影响者清理出战俘营。

与管理局第1处处长季什科夫同志协商后淘汰出上类人员。

你们淘汰出的全部坏分子应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

将战俘的反革命活动或刑事犯罪材料移送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局，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少校 索普鲁年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

团级政治委员 涅霍罗舍夫

1939年12月31日于莫斯科

№08073

贝利亚给季什科夫的命令

(1939年12月31日)

机密

第 5873 号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第 1 处处长季什科夫同志
抄送：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州局局长、国家安全大尉切奇科夫同志

您收到此命令后，即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移民管理总局第 1 处侦缉员、国家安全中尉韦尔季波罗赫同志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移民管理总局第 1 处主任侦缉员、国家安全上尉季莫宁同志一起赴斯大林州叶列诺—卡拉库布战俘营，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州局局长、国家安全大尉切奇科夫同志联系，和他一起做以下工作：

1. 调查在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企业劳动的战俘大量人员不出工的事实。

若经侦查上述事实属实，大量战俘不出工的主谋和领头者，应予逮捕并交法庭审判。

2. 认真侦查所有的战俘逃跑事件。采取彻底措施搜捕逃亡分子。

检查战俘看守状况，制订杜绝任何逃跑可能性的措施。

3. 了解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州局在战俘营战俘中所做的间

谍情报工作的状况。

检查战俘间谍和情报的保证程度，对做好这项工作给予切实的帮助，保证全面了解战俘的情绪，及时揭露一切反苏团伙，查明战俘在周围居民中搞反苏活动的人员。

4. 考察战俘营主任库列绍夫在行政管理和群众教育方面对战俘营的领导工作。考察材料及你们的结论送给我。

5. 查明对战俘物质保障和生活服务中断的原因和具体责任者，将全部材料报送联共（布）斯大林州委员会书记彼·米·柳巴文同志，以便作出实际结论。

报告你们所做的工作。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一级集团军级国家安全政治委员

拉·贝利亚

1939年12月31日于莫斯科

№08074

旧别尔斯克战俘营就战俘营政治思想情况 给涅霍罗舍夫的报告

(1939年12月31日)

机密

第5/43号

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治处主任、团级政治
干部涅霍罗舍夫同志

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旧别尔斯克战俘营 1939年12月政治思想情况的报告

兹报告，遵照您1939年11月26日第2067816号指示，在战俘中做了群众性政治工作。

全部群众文化工作是按所制订的12月份计划进行的。主要工作形式为：放映电影、定期报告报纸上的新闻、回答战俘的问题、检查战俘遵守战俘营内部规章制度和执行战俘营领导命令的情况，保障战俘读书、看报和听无线电广播。对按规定标准保障战俘的各种必要的给养每日进行严格的检查。

12月做了以下工作：

1. 对3916名战俘做了政治工作。
2. 战俘的整个群众政治工作是按计划进行的，在执行计划中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占有主导地位。
3. 按照党对战俘的政治工作计划制订的措施，基本上已经全

部完成。

进行的专题座谈

1. 沙皇俄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苏联变成了什么样的国家。
2. 苏联和芬兰（根据1939年第22期《布尔什维克》半月刊）。

3. 关于斯大林宪法。

4. 关于西欧的局势。

5. 关于苏联知识分子。

6. 苏联和芬兰民主共和国条约。

7. 芬兰的局势。

8. 苏联的国家制度。

9. 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3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阅读报纸并对阅读过的报纸材料作讲解。

1. 每周两次以“苏联国内外新闻”为题讲政治新闻。

2. 分楼组织朗读报纸。

3. 朗读并讲解了以下文章：

① “历史性的条约”——载1939年12月4日《消息报》

② “国际联盟变成了战争工具”——载1939年12月18日《真理报》。

③ “斯大林宪法旗帜下的3年”——载1939年12月15日《消息报》。

在战俘中采取组织和指导性的措施

1. 各楼以“遵守战俘营内部规章”为题进行座谈。

2. 以“楼内规章”为题和组长进行座谈。
3. 分楼向战俘讲解禁止在宿舍作任何报告、祈祷及其他宗教仪式的规定。
4. 以书面形式回答战俘的问题和要求。
5. 对战俘邮寄和接收信件采取了必要的组织措施（向战俘解释允许写信，安装了信箱，对送信和收信作了安排）。

为战俘放映的电影

1. 《海上岗位》
2. 《风华正茂》（3场）
3. 《最高奖赏》
4. 《壮观的火光》
5. 《拖拉机手们》
6. 《九月的一夜》
7. 《带枪的人》
8. 《卡柳日内医生》
9. 《教师》
10. 《孤舟白帆》

观看电影的战俘达 1.2 万人次。战俘尤其赞赏影片《壮观的火光》、《带枪的人》、《风华正茂》。应战俘的请求，影片《风华正茂》又加演了 2 场。

在市电影院为原将军和上校军官组织了 3 场电影。他们很满意并感谢对他们的关心。

在战俘营院内布置的专题图片橱窗展

1. 根据斯大林宪法的第一次选举。

2. 约·维·斯大林的生平。

3. 苏联的体育运动成就。

当地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选举日前夕，战俘营管理大楼张贴了标语和宣传画。

图书馆工作

图书馆有各种书籍 5209 册。收到各种报纸 805 份，杂志 173 种，图书馆经常服务的读者有 1450 人。每天有读者 220 人。

还组织战俘收听无线电广播。

为战俘安装了 45 个无线电广播收听点，45 个点都有扩音器，其中 2 个点安装了电动扩音器。战俘每天从早晨 6 点至夜里 23 点都能收听无线电广播。

战俘分 200~500 人的大组收听了：

斯大林同志向第 8 次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宪法”的报告（旧别尔斯克无线电广播站转播的录音）。

每天早晨和晚上，战俘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

保障文化生活用品

添置了以下文化生活用品并下发给战俘使用：

1. 手风琴——3 台
2. 象棋——50 副
3. 跳棋——143 副
4. 多米诺骨牌——112 副
5. 唱机——4 台
6. 曼达林琴——3 把

7. 吉他——3 把

8. 巴拉莱卡琴——3 把

各宿舍举办了象棋比赛，1 月份将举办全战俘营的象棋比赛。由于迟迟得不到建筑木材，战俘营至今没有俱乐部用房，从而妨碍了对战俘进行政治教育工作。

全部政治教育活动由政治机关在宿舍组织，电影在广场放映。由于天气转冷，自 12 月 25 日起已暂停放映电影。这种状况使得工作很难正常进行，使政治机关无法对全体战俘一起进行系统的工作。

政治科的工作人员除完成群众宣传鼓动工作计划外，还直接领导检查给养仓库和食品仓库、组织伙食部门和卫生处理的工作，协助登记统计科工作。

政治科在工作中特别注意对管理人员和值班员的工作。

1 月份拟采取以下措施，对战俘进行政治教育工作：

1. 政治科的所有工作人员按宿舍分工，负责对战俘进行政治教育工作，组织战俘遵守和执行战俘营的内部规章。

2. 采取座谈和讲课的方法向战俘讲解：

(1) 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2) 苏联各民族的兄弟联盟——实现列宁和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结果。

(3) 列宁逝世后沿着列宁和斯大林指引的道路前进的 16 年。

(4) 知识分子在苏联的作用。

(5) 关于共产主义道德。

(6) 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的中国人民。

(7) 关于芬兰局势。

(8) 关于西欧的局势。

俱乐部工作

1. 利用现有的流动电影放映机，在战俘营内建立为战俘服务的电影院。

2. 按以下专题给战俘讲课和报告：

(1) 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

(2)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对立。

(3) 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的中国人民。

3. 举办全战俘营的象棋比赛。

4. 布置“弗·伊·列宁生平”图片橱窗展。

5. 放映以下影片：

《教师》、《最高状赏》、《米宁和波扎尔斯基》、《伟大的公民》（两集）、《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等等。

6. 为新宿舍安装收音机，再增加8个无线电广播收听点。

7. 为战俘讲解影片《伟大的公民》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

战俘的政治思想状况

12月份政治机关在战俘中发现了以下反革命活动事实：

1. 从舍佩托夫卡来的战俘中有波兰反动保皇党报纸《奥伦多夫尼克》（类似德国的《ШТИРНЕР》^①报）的原编辑，其姓名为埃德蒙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恰普利茨基（中尉，职业为报人）。他在舍佩托夫卡时曾给战俘讲题为“俘虏心理”的课。现在他改变了反革命活动手法，通过他原先在《奥伦多夫尼克》报的助手、上尉

^① 原文如此，可能指德国的《冲锋队员》报。

捷尔列茨基谈论，怎么建全“未来波兰”的外交政策。

战俘恰普林斯基和塔尔列茨基^①的材料已移交特别科作进一步的审理。

2. 1939年12月24日晚，一伙战俘在宿舍开会，共10人：索尔坦（少校，旅参谋长）、斯利津（骑兵大尉）、库钦斯基（骑兵大尉）、贝尔克（少校）、鲁德尼茨基（少校，副团长）、图斯基（骑兵大尉）、斯克拉茨基（骑兵大尉）、亚罗申斯基（上尉）、威尔克（上尉）、巴尔什·格拉修克（上尉）。当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出现时，这些战俘立即停止了谈话。当让他们继续谈话时，战俘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并开始辩解说，因为明天是圣诞节，同一个部队的军官聚会，在议论被击沉的英德两国轮船的事，即“讨论广播中听到的最新公报”。

通过和战俘巴尔什·罗曼诺维奇·格拉秀克谈话查明，他们不过是以圣诞节前夕聚会为借口，而实际上谈的是借助英法复兴波兰。该小组全体成员的材料已移交特别科作进一步审理。在同一天，即12月24日，政治科工作人员发现，战俘列昂·维肯季耶维奇·马切伊斯基（上尉）破坏为战俘放映的一场电影，不让战俘看电影。当政治科工作人员请战俘梅切伊斯基^②到营管理办公室时，马切伊斯基匆匆溜进了宿舍，想混在战俘中藏起来。当天已将战俘马切伊斯基逮捕，关禁闭20昼夜，他的材料已移交特别科作进一步调查。

3. 1939年12月31日至1940年1月1日夜间24时，政治科工作人员库里亚奇同志在一战俘宿舍发现，以原大尉维涅什、兹民辛斯基和谢尔瓦托维奇为首的一伙战俘，在战俘维涅什发言（他说：“我们待在这里，可是我们的士兵在为波兰的独立而拼杀。我们应

① 原文如此，前者应为恰普利茨基；后者应为捷尔列茨基。

② 原文如此，应为马切伊斯基。

当向为波兰独立而战斗的战士致以祝愿，也要向政府和总统致以祝愿”）之后，开始唱“波兰尚未灭亡”。库里亚奇同志制止了唱歌，要求他们遵守根据条例制订的战俘营制度，并且警告说，违犯条例要负责任。

战俘后来停止了唱歌和发言。战俘兹尼辛斯基（宿舍长）因违犯宿舍内部规章被追究了责任，这伙人的全部材料已移交特别科。

12月上半月，战俘陆续提出了口头要求和申请，允许他们组织马列主义研究小组。政治机关在各楼作了解释，说战俘有很充分的条件自学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图书馆有自学用的书籍和小册子。同时，希望得到帮助的人在学习中可以得到帮助，由政治科的教导员进行辅导。政治机关加强了监督，不让战俘以任何借口搞组织活动。

未发生自杀事件。

未发生流行病。

无集体逃跑和个别逃跑记录。

未发生集体绝食和个人绝食的情况。未发生酗酒现象。

未发生事故、伤亡和火灾。

战俘营的经济情况

12月份采取了以下措施：

1. 建造了200人的宿舍，开始将一所房屋（原教堂）改造成战俘宿舍，以便腾出一所房子作电影院。

2. 建造了洗衣房并已交付使用。

3. 组建了鞋靴车间和缝纫车间并已开工。

4. 修建了澡堂并开始使用。

5. 修建了房管办公室。

6. 在以前上校们住的院子里修建了厨房和当仓库用的板房。

因缺乏油毡和建筑用木材，已经动工的建筑（澡堂附属建筑、房管员室、15号营房附属建筑）迟迟没有完工。

战俘的卫生服务

12月份采取了以下措施：

1. 每个战俘平均在战俘营澡堂洗过2次澡。市内澡堂因修理不开业。

2. 院子和所有脏的地方经常打扫和消毒。

3. 接种肠伤寒疫苗：

第一次接种——799人

第二次接种——872人

第三次接种——1278人

4. 接种天花疫苗——767人

5. 门诊接诊——4714人：

初诊——1675人

复诊——3029人

疾病类别：

呼吸道疾病——281

外科疾病——1151

肠胃疾病——204

牙病——769

皮肤病——358

性病——97

眼病——526

感冒和咽峡炎——87

耳鼻喉疾病——385

其他各种疾病——536

门诊接诊中未发现急性胃病。

6. 战俘营住院部治疗 810 个床位。

上个月入院——46 人

出院 ——46 人

至 1940 年 1 月 1 日还剩 25 人，疾病种类：

呼吸道疾病——226

肠胃病——94

外科疾病——68

感冒和咽峡炎——159

其他各种疾病——192

7. 12 月份 3 名战俘死亡：

① M.З. 赫拉涅维奇，1889 年出生，死于肺炎。

② С.Б. 尼德尔，1885 年出生，死于肠扭结。

③ К.Л. 普柳钦斯基，1901 年出生，死于肝炎和肠扭结。

登记统计科工作

1. 根据局的指示，全部工作已经完成。

2. 1940 年 1 月 27 日前全部战俘的照片将拍摄完毕。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主任、国家安全大尉 阿·别列日科夫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临时代理政委、

政治科主任 库托沃伊

1939 年 12 月 31 日于旧别尔斯克

№08075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关于
1939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各战俘营政治
思想状况的反面实例和非常事件”的通报

(不早于1939年12月31日)^①

机密

1939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各战俘营政
治思想状况的反面实例和非常事件的通报

一、反苏情绪和言论

旧别尔斯克战俘营

1. 原波兰军队大尉、战俘梅奇斯拉夫·约瑟福维奇·埃韦特组织了由军官——路德维希·亚诺维奇·多梅尔少校、斯坦尼斯拉夫·亚诺维奇·克沃列格等人参加的小组，以“文化学习活动”（讲卫生课、学习外语、谈论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等）为名，进行反革命活动。实际上，他们就上述问题进行“座谈”时，进行旨在反对战俘营内部制度和战俘营管理当局的反革命活动：“只用波兰语交谈”，“不给战俘营上工”，“战俘营的情况越糟对我们越有利——我们以此让战俘营管理当局和战俘营的制度，在很快就要到来的国际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内容确定的。

调查小组面前出丑”，等等。

对这一事实与特别科一起采取了以下措施：

进行了搜查，经搜查发现了参加该小组的人员名单和小组活动计划。小组组织者埃韦特、多梅尔和克沃列格已从战俘营除名。

2. 在一座战俘楼里，少校路德维希·亚诺维奇·多梅尔向一群战俘宣读一份通过在军官中组织的互助会发放波兰兹罗提借款的名单。名单中有80个人，其中78人各自签收了100兹罗提，并且有遣返后归还借款的保证“声明”。在调查该事实时查明，互助会是根据带有大量兹罗提的人员“自愿”捐款的原则成立的互助会。

大部分军官信教，与旧别尔斯克战俘营的情况一样，他们企图作集体祈祷。

他们在战俘营里总想继续佩戴肩章和勋章、保留上下级礼节。

政治机关正在作解释工作，同时进行反宗教宣传。政治科正在调查组织者。

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

该战俘营关押的大多为原波兰的警察、宪兵和狱吏。这些战俘中的不良现象是：在战俘营内不上工，互相偷盗，保留违禁物品，打架斗殴，不执行战俘营管理当局的命令，以及其他违犯战俘营制度的情况。

11月份共有57名战俘因各种违纪问题受到惩处。

克里沃罗格战俘营和扎波罗热战俘营

战俘成员基本上为原波兰军队的普通士兵，根据与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合同，已送交扎波罗热炼钢厂和克里沃罗格矿业托拉斯劳动。

扎波罗热战俘营

以下战俘公开发表带有反苏情绪的言论：

战俘斯坦尼斯拉夫·梅尔科称：“我宁可在波兰只吃面包也不在这里吃抹黄油的面包”。战俘亨科说：“红军越过波兰边界的目的是抢劫，而不是解放。如果没有苏联，我们会打赢与德国的战争”。

战俘科尔涅伊说：“在波兰毕竟比在苏联过得好，就是最差的工作也能挣1兹罗提和一份伙食，在这里挣得倒多，但是用钱什么东西也买不到”。

战俘胡德说：“我不想苏联的这些财富，让我穿一件衬衣走也

行，我要到德国去，我在那里会有自己的天主教节日，而这里没有宗教，不好”。

战俘、原下级准尉西利亚科夫称：“这场战争爆发遂了犹太人心愿，如果他们不出钱想消灭希特勒，就不会有战争了，排挤犹太人完全合理，因为波兰工人阶级受犹太资本家剥削，因此，波兰人不得不抵制犹太人”。

战俘 Я.С. 米亚诺夫斯基冲着用俄语交谈的一个犹太人说：“你怎么了，已经忘记说波兰话了；你别以为什么事都结束了，咱们还要走着瞧”。

大多数战俘对让他们在矿山劳动表示不满，有时公开要求打发他们回家，先后拒绝出工的达 519 人，装病者尚未计算在内。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有些战俘收到家乡的来信，说他们的战友已经回家；二是战俘中有许多各种各样的煽动者；三是矿山托拉斯和矿山管理局的行政机关在一些问题上不履行它们承担的义务，例如：发生伙食中断，不完全提供工作服，不及时发放工资，而与此同时，矿山管理局不在招募和稳定战俘方面做任何工作。奥尔忠尼启则锰矿管理局^① 局长基里琴科在 1939 年 12 月 20 曾回答说：“我不需要这些工人，别让他们给我添乱了”。“列宁矿业”托拉斯副经理梅德韦杰夫同志说：“战俘对我们来说是个负担，妨碍我这个当工程师的工作”。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已会同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派工作组赴战俘营调查不正常现象的事实并消除这些现象。

已致函乌克兰共产党（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扎

^① 此处指“尼科波尔锰矿”托拉斯，该托拉斯有以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命名的矿井。

季翁琴科同志，请他给有战俘劳动的矿场中的党组织书记下达指示，协助在战俘中做群众政治工作。

二、自杀和自杀企图

科泽尔斯克战俘营

1939年12月2日，战俘巴济利·安东诺维奇·扎哈尔斯基在仓库用细腰带自杀（自缢）身亡。巴·安·扎哈罗夫斯基^①，1898年出生，1919年前为钳工，自1919年起至最近在波兰军队服役，军衔为少尉。

扎哈尔斯基在战俘中孤僻冷漠，没有留下任何说明引起自杀原因的文字。

请阅今年12月7日的第2068210号紧急专门通报。

旧别尔斯克战俘营

一名军官医生战俘企图自杀（用剃须刀割喉管），但是被制止了，后来查明，这是假装自杀。

三、逃跑和逃跑企图

科泽尔斯克战俘营

战俘——中尉尤利扬·马丁诺维奇·米赫涅维奇（1910年出生，立陶宛人）、中尉泽农·伊万诺维奇·马舍夫斯基（1910年出生，波

^① 原文如此，应为扎哈尔斯基。

兰人)，在战俘安东·马特维耶维奇·巴柳利斯（1909年出生，立陶宛人）的协助下，准备从战俘营逃跑，但是一个战俘向战俘营管理当局报告，说上述人员打算逃跑。在审讯中上述人员承认准备逃跑。

战俘营管理当局对3人都作了纪律惩处。

克里沃罗格战俘营

在矿场劳动的战俘中逃跑事件已达7起，其中6名战俘被发现后送回，1名战俘至今在逃。对逃跑未遂的战俘作了纪律惩处，对在逃的战俘下了搜捕令。

扎波罗热战俘营

有3名战俘逃跑，其中1名战俘已经押回，对另2名战俘下达了搜捕令。

该战俘营发现有战俘酗酒，他们在火车站装卸货物时，通过装卸工中的苏联公民搞到伏特加酒，就在那里一块喝起来。

已经采取坚决措施反对酗酒，对酗酒的当事人将追究责任。

四、战俘营的工作人员

1. 未发现有反苏情绪和言论。
2. 战俘营工作人员中的不良实例：

(1) 旧别尔斯克战俘营

值班员斯利佐夫斯基试图在值班员大会上搞值班队长选举。

值班员切尔维亚克表示：“值班员工作过重，一昼夜工作10~14小时，而且没假日”，并且归结说，这是违犯斯大林宪法的。

该战俘营发生过2起玩忽职守的情况：

①仓库管理员波诺马廖夫，夜里未关食品仓库的门。

②值班员杜博沃伊擅离岗位。以上两人都受了纪律处分。

该战俘营的值班员西沃瓦尔、斯利佐夫斯基、韦尔比茨基、沃洛任和潘琴科买过战俘的手表。

鉴于此类事实，已向全战俘营发布命令，严禁向战俘购买任何物品。对购买战俘物品的人员作了从行政处分至辞退的处理。

政治机关经常作解释工作。该战俘营卫生科疫苗接种员舍佩托夫卡竟和战俘发生性关系，因此已被战俘营辞退。

发现了2起战俘营工作人员米哈伊连科和切佩尔喝酒的情况，已经给予他们纪律处分。

(2) 科泽尔斯克也发现有战俘营工作人员向战俘购买物品的情况。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已采取措施（发了专门指示）防止各战俘营发生类似现象。

(3) 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中发现战俘营工作人员中有以下不良事实：

食堂主任维哈列夫接收了一名军官战俘的信，准备通过非法途径发走。

登记员克雷洛娃买了战俘的手表和其他物品。

俩人已被辞退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

(4) 尤赫诺夫战俘营发现2起战俘营消防员 М.Я. 季莫费耶夫和 Г.С. 费季索夫饮酒的情况；电站机器操作员阿法纳西·季莫费耶维奇·别利亚耶夫（1884年出生，钳工，4级文化水平），在与战俘营关押的波兰难民图皮岑和叶尔莫林谈话时说：“你们在波兰好，想要什么就买什么，而在苏联这里即使有钱什么东西也搞不到”。别利亚耶夫解开衣服扣指着衬衣说：“你瞧，我已经穿破了，可是没处买”。

图皮岑和叶尔莫林反驳别利亚耶夫说：“还是在苏联生活好”。

别利亚耶夫回答说：“过个一两年，你们自己就会看到这里过的是什么日子”。

特别科正在对别利亚耶夫进行监视，如果事实得到确认，他将被从战俘营除名。

战俘营政治科教导员 Ф.А. 日利亚耶夫，1931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对党隐瞒了他是富农的儿子，他父母的家产被没收，他父亲烧了自己的房子。

党组织审理了别利亚耶夫的问题，决定将别利亚耶夫一案转交他工作过7年的原供职地审理。别利亚耶夫已被战俘营辞退。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

少校 索普鲁年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

团级政治委员 涅霍罗舍夫

1939年12月31日于莫斯科

№08076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
就按所附格式填写补充调查表给
各战俘营首长的指示

(1940年1月5日)

第 25 / 116 号

机密

内务人民委员部

科泽尔斯克战俘营主任

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主任

尤扎战俘营主任

尤赫诺夫战俘营政委

格里亚佐韦茨战俘营政委

罗夫诺战俘营政委

克里沃罗格战俘营政委

扎波罗热战俘营政委

叶列诺战俘营政委

为了更加全面地查明战俘营在押战俘的情况，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制订了补充调查表，每个战俘的补充调查表都应填写。

所需数量的补充调查表（按所附样式）由你们在当地印刷厂订做，订做时应考虑到：

每个登记卷宗的补充调查表。

送交特别科的补充调查表。

此外，每个战俘营要有1000份备用表格。

表格印好后即着手填写。

填写好的补充调查表一份应装入战俘登记卷宗。另一份补充调查表送交特别科。

为了保证上述文件的填写质量，你们必须挑选一批有足够文化水平的工作人员做这项工作，并向他们指示填写补充调查表的程序。

第1项应填写战俘在原波兰军队中最后所任的职务，而不是军衔，军衔在调查表中已经填写过。

第2项填写战俘掌握外语（母语除外）的情况。

第3项应详细填写战俘在苏联逗留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在苏联逗留期间的工作类别。

第4项填写战俘在苏联生活的所有亲属和熟人的情况。如果战俘现在不了解亲属和熟人的任何情况，应写明战俘最后所知道的有关他们的情况。

第5项应十分详细地填写战俘在国外（原波兰境外）的情况，必须写明具体地点、起止日期，在那里所干的事情。

应特别注意第3、4、5项的填写。

我再次提醒，应当由有足够文化水平的工作人员填写这些材料。

以书面报告形式上报补充调查表填写工作的进展情况。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国家安全中尉 霍赫洛夫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临时代理政委、

国家安全中尉 安东诺夫

1940年1月5日于莫斯科

№08077

波兰战俘要求确定他们的地位和遵照 公认的国际准则对待战俘的声明

(1940年1月7日)

副本

1940年1月7日，旧别尔斯克市基洛夫大街32号
上校组共同的事务

请向我们说明，苏联政府怎么看待我们，即：

一、是否认为我们是战俘？

1. 如果认为是，我们请求根据各国政府公认的对待战俘的准则对待我们，首先：

(1) 使我们有可能自由求见受权驻苏联政府、负责保护波兰公民利益因而也保护战俘利益的大使馆。

(2) 与红十字会建立联系，使我们有可能与在苏联以外的家人通信。

(3) 公布战俘名单，使我们的家人知道我们所在的地方。

(4) 释放没有应征入伍的退役和预备役军人战俘。

(5) 给我们适当发放津贴，以购买我们个人急需的物品，例如，我们的衣服和鞋子已经穿坏，但是我们没有必需的购买钱。

2. 如果我们是被捕者？

那么请通知我们，我们因为什么罪被剥夺自由，请对我们正式提出公诉。

3. 如果我们是被拘捕（拘留）者：

请向我们说明，我们哪些行动导致了限制我们的自由，况且，我们是在波兰领土上被拘捕的。

二、请说明为什么将与最近的一次战争毫无关系的老人和病人关押在战俘营，请释放他们回家。

三、至今还没有解决与家人的通信问题。

人之常情要求，让我们最终能够与我们的家人取得联系，也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下落。

请下达指示：

对寻找家人的通信不加任何限制。

每人有一周至少写一次信或明信片的权利，而不是一个月写一次。

如果信件被扣压，应告之发信人。

给我们的家人向我们邮寄食品、衣服和我们所需其他物品的权利。

给我们发放信纸和信封。

请查明我们的信件是否已经发往德国占领的境内，如果没有，让我们通过红十字会通信。

四、医疗不得力。

实际上，治疗不过是给些最普通的药品。许多军官正在等待对眼病、牙病等的无效的治疗，特别是规定的病号饭，让人感到无法食用。

如果患了较重的病，往往难以迅速将患者送往医院。

拥挤潮湿的一层住房损害着军官的健康，更有甚者，伙食标准对不干体力活的人勉强够用，而我们都是参加繁重劳动的人，而吃的却是日常饭食。

五、我们看电影时，请不要给我们放映侮辱我们民族感情或者我们祖国荣誉的影片和情节。另外还请求，让尤其是低级别的官员善待我们。尽管我们是战俘或者被拘留者，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军

人，而且还保留着我们的军衔。

六、当波兰兹罗提还流通时，既不让我们把自己的钱兑换成卢布，也不让把钱寄给我们的家人，这样一来，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哪种货币都没有了。同时还应说的是，我们的家人靠我们劳动养活，而在战俘营这里，不仅剥夺了我们满足最低需求（修鞋、买黄油、等等）的钱，而且还要求我们用卢布交费。

请求：

把兹罗提兑换成卢布，以向我们预付参战津贴的方式经常发给我们钱。

允许我们从战俘营邮寄和我们的家人向战俘营邮寄兹罗提、卢布以及其他外币。

七、最后，请满足以下要求：

允许我们以小组形式组织外语课，为我们提供购买所需练习本和教材的条件，练习本和教材我们可从利沃夫市订购。

请下令经常定期地送各种文字的读物（小说、科学书籍和军事历史书籍）。

允许我们在天气适宜时到战俘营外散步，至少每周3次。

允许会见亲属和在战俘营以及沃洛达尔斯克大街的战友。

发给我们旧别尔斯克战俘营人员名单，以便寻找亲属。

归还我们被没收的物品和钱。

发给我们体育用品和室内游戏用品。

让我和我的总务长能够与您本人或战俘营总务主任一周至少谈1次话。

无误：管委会书记、

警察少尉 巴什雷科夫

1940年1月7日于旧别尔斯克

№08078

霍赫洛夫关于“尼科波尔锰矿”和
“十月矿务局”两托拉斯中
战俘罢工与绝食的报告

(不早于1940年1月3日)^①

25 / 329 号

绝密

据战俘事务管理局第1处处长季什科夫同志1940年1月3日自克里沃罗格报告称，“尼科波尔锰矿”和“十月矿业”两托拉斯战俘的大规模罢工正在持续中。

“尼科波尔锰矿”托拉斯奥尔忠尼启则矿12月20日罢工的300名战俘直到1月3日还未上工。12月24~28日大部分战俘绝食。

拒绝出工的理由是食堂12月20日没有给战俘提供早餐，而且尼科波尔市“公共饮食”托拉斯经理纽伦堡同志表示，在“尼科波尔锰矿”托拉斯清偿债务之前，决不向战俘提供食物。1月2日，由于改为交费饮食，“尼科波尔锰矿”托拉斯伏罗希洛夫矿战俘拒收预付款、暖短呢衣，并且组织起来不上工。

已查明，矿务局行政管理部门没有为战俘创造必需的生活条件，延发工资，并且发生给老实干活的战俘错算工资的情况。“十

① 时间根据文件内容确定。

月矿业”托拉斯卡尔·李卜克内西矿也出现战俘大规模罢工的情况，该矿战俘要求放他们回家。

无论是“尼科波尔锰矿”托拉斯，还是“十月矿业”托拉斯，大规模不上工的原因还有：从亲人来信中得知大部分士兵战俘都已返回家乡。

在拒不上工的战俘中出现了反对苏维埃和挑拨离间性的言论：“他们欺骗了我们，不去干活，否则永远不放我们回家”；“如果以正式命令形式，向我们战俘宣布还要干多长时间的话，我就上工。”“我不上工，因为看不见尽头”；“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不去上工。给我们讲，解放我们脱离老爷的压迫，实际上是让我们脱离妻儿老小”。

某些拒不上工的战俘有威胁和殴打干活战俘的现象（未查明犯罪者）。

据悉，矿井工作人员在战俘中传播流言蜚语。

李卜克内西矿工长卡达琴科和传达室主任维利科德内在战俘中散布流言说：“好像有一个释放战俘的命令。”（情况正在核实）。

措 施

1. 查出大规模罢工的组织者。
2. 对拒不上工的战俘实施强制性措施，减少食物，剥夺通信权利。
3. 为老实干活的战俘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4. 准备将 250 名破坏生产分子除名，并送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国家安全中尉 霍赫洛夫

№08079

阿列克谢耶夫就战俘绝食给 涅霍罗舍夫的紧急报告

(1940年1月22日)

科泽尔斯克

130号

绝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治处主任、团级政治委员涅霍罗舍夫同志

紧急报告

兹报告，1940年1月21日，10楼和20楼全部战俘，12楼和16楼部分战俘拒绝吃午餐，午餐是酸白菜和欧洲小鱼汤。

战俘绝食的理由是汤苦，鱼有异味。

经战俘中厨房值班医生和战俘营卫生科科长格利尼泽同志品尝，实际上汤完全可以食用。的确，汤有些苦，鱼有点异味。

在这之后，我与国家安全少校扎鲁宾同志、国家安全上尉约尔什同志都尝过这汤，我们确认，汤做得很好，而且完全可以食用。

发生拒绝吃午餐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1940年1月份上级没有及时发来食品（如米、糖等）领货单，又不让以集中方式领肉，所有这一切不仅使战俘伙食变差，而且简直有中断战俘伙食的

危险，到 1939 年 12 月，这里的伙食一直不错。

食品不足导致早餐和午餐食谱单调，不能不引起一些不良后果，起初出现诸如“是想把我们饿死”一类的牢骚话，后来发展到拒绝吃午餐这种恶劣的公开反抗行径，尽管战俘营负责总务的副主任乌尔巴诺维奇和政治机关通过各楼楼长多次解释午餐和早餐质量下降的原因。

就此问题采取了以下措施：国家安全少校扎鲁宾同志 1 月 21 日召开了战俘营工作人员会议，我也出席了会议。决定 1 月 22 日再召开各楼楼长会议，1 月 22 日的会议由我主持。

在楼长会议上详细研究了怎样更好地烹调欧洲小鱼，做成热菜，还是加调料做成冷菜。大部分人建议做成冷菜。

因故意捣乱，10 楼和 20 楼楼长被关禁闭，10 楼楼长关 10 昼夜，20 楼楼长关 15 昼夜，因为他们不仅不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自己反而起劲鼓动战俘拒绝吃午餐。

目前，即从 1 月 23 日起，伙食有些改善，因为运来约 5 吨各种米，这就使午餐能做出两道菜，饭谱也多样化些。

战俘营政委（政治指导员级） 阿列克谢耶夫

№08080

马卡罗夫就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 侦讯工作进程给马克利亚尔斯基的信

(1940年1月29日)

奥斯塔什科夫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①

国家安全中尉马克利亚尔斯基同志

兹报告：截至今日，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战俘登记工作进展情况如下：

1. 正在核对战俘的人事卷宗和侦讯卷宗，以便查清战俘姓名及是否受过审问。

2. 指纹鉴定工作即将结束，大部分战俘卷宗中都收入了指纹卡片和照片。

3. 索引卡片已查过，并严格按字母顺序排列，在卡片上注了楼号和房间号。

4. 进行了医疗检查。

侦讯工作已基本结束，现正在对警察军官进行复审。关于我是否继续留下一事，我已请示过索普鲁年科同志，他答复说：“给马克利亚尔斯基写信——问他想知道什么问题。”

我个人认为，我继续留在奥斯塔什科夫已不适宜，因为还剩下

^① 文件上如此——原文注。

列工作：特别科应当整理好 6000 份人事卷宗，把侦讯卷宗发出去。

我的意见是，考虑到各战俘营情况不尽如人意，目前保留登记统计处为好。在战俘登记方面更好地给战俘营以实际帮助。

第 2 处检查员 马卡罗夫

1940 年 1 月 29 日

№08081

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队就战俘营工作 检查结果给旧别尔斯克战俘营领导的指示

(1940年1月31日)

旧别尔斯克

对旧别尔斯克战俘营领导的指示

一、战俘营的警卫与制度

为了加强战俘营警卫，杜绝战俘可能的逃跑及逃跑企图，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1. 为了更快与卫兵室联系并通报哨所发生的情况，全部哨所必须安装电铃信号设备。

2. 在战俘营主区的8号与9号、9号与10号哨所之间增加照明，在这些哨所间安装辅助照明点。

在32号院的厕所附近和靠第三国际大街一侧安装电灯。

3. 战俘营内围墙东侧凸出部要安装坚固的木栅栏，拉上带刺的铁丝网。

4. 待上级批准扩大门卫小队编制之后，加强32号院（基洛夫街）和19号院（沃洛达夫斯基街）的外部警卫，在其周围设置昼夜值勤哨所。在夜幕来临和黎明之前，至少派3个流动哨警卫战俘营内区，要为这些哨所制定专门的规章。

5. 19 号院（沃洛达尔斯基街）夜间设辅助哨。
6. 战俘营区所有石头障碍物要安上三道带刺铁丝网，铁丝网不得低于 1 米，这一条也适用于将校军官战俘组住所。
7.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的指令，在战俘营内设置警告区（禁区）。将靠近墙边的木板、劈柴、大圆桶及其他物品移至营区中央，今后绝对禁止在墙边堆放物品。
8. 战俘营领导与特别科、警卫连、旧别尔斯克市内务人民委员局和莫斯科-顿巴斯铁路局特种铁路运输处共同制定一个拘捕、搜索集中营逃犯的行动计划。
9. 责成值班警卫及其副手，由值班警卫选择其中一个楼亲自对楼内战俘进行早晚检查。向战俘营领导报告检查结果。
10. 到战俘营营区外干活的战俘名单，一定要征得特别科同意，此事由值班警卫及其副手承办。
11. 对战俘房舍的突然检查每月不得少于一次，目的是没收违禁物品。

二、登记统计科

由于战俘营战俘登记工作搞得质量不高，填写的战俘调查表（格式 1）不符合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的指令，没有完全反映每个战俘的政治和社会工作面貌，因而需要对战俘进行详细的复审。为此成立了一个 8 人工作队，就填写调查表问题召开了一系列指导性会议。工作队着手工作后，在战俘中查出许多原波兰各政党（国家联合阵营、波兰社会党、波兰军事组织等）成员，此外还查出许多边防军人、民团分子、地主、商人等。

截至今年 1 月 31 日，工作队共审问战俘 860 人，调查表完成得令人满意。

建议战俘营领导和登记统计科进行下列工作：

1. 在2个月内全力以赴进行战俘的第2次登记工作。
2. 在此期间，根据第2次登记的情况，更正统计登记科的登记卡片索引（格式2）和战俘的登记卷宗。
3. 2月份结束战俘拍照工作（已拍照3510人，剩415人）。

三、财务科

在战俘营财务科了解保管战俘贵重物品情况时发现，贵重物品无专人负责，没有造册登记，手表、烟盒、戒指、项链等没有记录其品牌、生产厂家、成色。而且，这些贵重物品保管在办公桌抽屉和木柜里。办公桌抽屉里还放着战俘交出保管的钱（波兰和其他国家的货币）。为了防止贵重物品失窃和被偷换，对贵重物品要进行详细登记。

建议战俘营领导：

1. 今后对交进的全部贵重物品编制详细清单。
2. 给财务科配发防火柜，用于保管贵重物品和钱币，今后禁止将战俘的贵重物品存放在办公桌抽屉里。
3. 根据财务科现有的无主贵重物品清单，按战俘手中的收据查明贵重物品的主人，确认后把贵重物品还给个人。自愿将贵重物品放财务科保管的战俘，给其重新办理收据。

四、后勤科

1. 为了更好地安置战俘并腾出5号楼作为俱乐部使用，加快11号楼（原教堂）的建设，以便2月份战俘能搬进新房舍。
2. 对木材和燃料的消耗建立严格监督，不允许无故浪费。
3. 为了防止战俘的食品被盗，指定后勤科有责任心的工作人员装卸食品和把食品运到战俘营。
4. 整顿战俘营看管人员的服装和其他被服的登记发放工作，

杜绝一切可能的舞弊现象。检查战俘营工作人员的个人军需卡，发现超规定物品时，建议将超标准物品上交战俘营仓库，违者追究行政责任。

5. 为了准确统计集中营现有后勤用具和其他物资，成立营具委员会；1940年3月15日前将委员会的报告书送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

6. 把战俘营院内的铁床放入专门房舍或板棚中，以免损坏。

7. 在最短的期限里，在战俘营所有仓库（被服库、日用杂品库、食品库）中实行标准秩序。责成仓库主任对仓库中的食品、营具和被服进行准确登记。

8. 近日解决好植物油包装桶问题，将植物油从食油厂运回战俘营。

9. 办好战俘营看管人员的售货亭，与战俘分开售货。绝对禁止战俘营工作人员在战俘售货亭购买食品和其他物品；发现不遵守这项规定者，追究其责任直至被开除。

10. 定期对战俘营食堂消耗食品情况和支款报销单据进行突击性检查。

五、战俘工作

1. 在战俘中更广泛地开展政治工作，将其分化瓦解成两个对立的阵营。特别要改进对知识分子（医生、工程师、技术员、教师等）战俘的工作。

2. 定期组织小批战俘参观优秀的集体农庄或企业，参观博物馆和展览会，这些活动预先与乌克兰共产党（布）区委员会、集体农庄和企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协商好。

3. 随时注意战俘的各种情绪，及时对此作出反应。对在战俘中开展工作的全部问题，政委和政治科科长应当对工作人员进行专

门指导。

4. 责成政治科指导员经常走访战俘宿舍。政治科每个工作人员 60~70% 以上的工作时间要用于做战俘工作。

5. 给图书馆增加文学、技术、医学书籍，购买大批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如《列宁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6. 5 天内在战俘营院中建好报纸橱窗。

六、党组织工作

战俘营党组织在工作中应更多地注意对看管人员、特别是雇用人员的教育，在加强门卫纪律、军政训练方面给予门卫队以更多的帮助，在门卫队全体人员中更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争创卫兵勤务和各种学习的优秀指标。

党组织应特别注意后勤科的工作和后勤机关工作人员的教育，争取全面改进战俘营后勤工作。

改进党的工作的计划性，优化各工作部门中共产党员的配置，做到每个共产党员都能完成党的任务与委托。党支部的工作计划要及时传达到下层党组织。对共产党员学习联共（布）党史的情况实施日常监督；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方面刻苦用功，同时给予其他同志实际帮助。

按规定，《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要逐章讲课，组织辅导和同志式座谈。

提请党支部和党的会议讨论的问题，应改进其准备的质量。召开党的会议，应提前 3 天通知全体共产党员。

七、干部问题

至迟于今年 3 月 1 日，特别科对全体工作人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除外）的出生地和工作地进行专门调查，开除那些有坏

名声材料的人，此外，对新参加战俘营工作的全体人员进行专门调查。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队 涅霍罗舍夫
罗季昂诺夫
谢尔盖耶夫

№08082

阿列克谢耶夫就科泽尔斯科战俘营所做工作 给涅霍罗舍夫的报告

(1940年2月4日)

科泽尔斯科

绝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治处主任、团级政治委员涅霍罗舍夫同志

兹报告：

1940年1月1~31日期间在战俘营做了以下工作：

根据您1939年11月26日2067816号指示，战俘营政治科政治指导员每天都在战俘中就有关问题进行座谈，宣讲报纸和无线电广播中不清楚的问题。

1月份，战俘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芬兰事件及我党和苏维埃政权在此问题上的政策；国际形势问题，主要是西欧形势问题；西乌克兰与西白俄罗斯劳动人民的状况。

对苏联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集体农庄建设、集体农庄收入分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集体农庄庄员个体经济、手工业合作社、苏维埃法律、法院、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贸易等问题，提问得特别多。

对提出的所有问题都给予了回答。

报纸保障问题

1 月份战俘营的中央报纸保障特别差，尽管我们及时向政治处和斯摩棱斯克苏联报刊发行局提出了此事。

1 月份斯摩棱斯克苏联报刊发行局发送的中央报纸完全不够份数，只是由于与当地组织达成协议，才送了《真理报》和《消息报》各 10 份、《共青团真理报》1 份。1 月份为战俘营总共订购了：10 份《真理报》、10 份《消息报》、30 份《红星报》、30 份《战斗准备报》、1 份《共青团真理报》、70 份《工人道路》。杂志：27 份《鼓动员指南》、29 份《党的建设》、3 份《无神论者》、11 份《布尔什维克》、4 份《青年布尔什维克》、33 份《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辅导》、7 份《鳄鱼》画报、11 份《星火》。

2 月份和 3 月份订购了 23 份《真理报》、23 份《消息报》、10 份《共青团真理报》、80 份波兰文报纸。波兰文报纸是由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帮助申请订购的。

2 月份和 3 月份订购报纸的数量能完全满足工作人员、雇用人员和战俘的需求。

俱乐部工作

1 月份，由于天气寒冷，俱乐部的工作主要是放映电影。按照为犯人放映电影的日程表，斯摩棱斯克电影发行局定时送电影片，即隔 2 天送 1 部新电影。按每晚两场、每场 400~450 人计算，1 月份约有 2.5 万人次的战俘看了电影。第三场为集中营工作人员和雇用人员放映。与战俘座谈我们苏联电影时得知，大部分战俘观看我们的电影时兴趣浓厚，反映也不错。但是少数战俘反映：“苏联

电影充满政治色彩，找不到一部不含政治内容的电影。”

放映电影中存在的问题是电站，由于电站功率不够，负荷过大，供电不足，结果常常出现光线不好（画面不清晰）和声音不响现象，这在有反苏情绪的战俘中常引出一些不健康的言论。

图书馆工作

1月份，图书馆借书2433册次，而且在11个战俘楼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图书轮换，单独给21名战俘借了书。

在图书馆对图书进行了清点。对所有书籍进行了分类。编纂了图书目录。为图书馆拨出房舍并进行了装修，从而改善了图书馆的工作。

1月份，给战俘上了两堂卫生课，题目是个人卫生和流行性感冒。

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俱乐部工作存在的问题是，俱乐部的房舍太冷，夏用玻璃凉台很难保暖，甚至无法保暖。俱乐部没有其他房舍，因此，除放映电影外，没有开展其他工作。其次，俱乐部工作中还反映出文化用品不足。战俘营至今未收到任何唱片、多米诺骨牌、跳棋等。政治科去年11月已经购买了群众性娱乐品，尽管多次书面和口头询问，但上述文化用品还是没有送到。缺少跳棋、国际象棋和其他群众性娱乐用品，导致了战俘用纸牌赌博，现在仍在赌。在这期间没收了约10付纸牌。对赌博者采取了相应的行政措施直到关禁闭。若不算街上的扬声器，集中营到现在还没有装上无线电扬声器，至于战俘楼中，尽管已采取措施，收听点已安排就绪，但由于至今没有扬声器，这些收听点都没有工作。还不知道何时能送来政治处配发的扬声器。

由于楼内没有安装扬声器，战俘中的一些反苏分子歪曲广播中

的新闻，散布污蔑苏联的谣言，因为天冷，并非所有的战俘都在街上听广播。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得到您最直接的帮助，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送来上述扬声器，这样就能更好地看管战俘，杜绝那些不正常的言论。

消极情绪

尽管1月份在战俘中做了大量解释工作，但还是有一些不健康的情绪，这些情绪发展成不良现象。政治指导员在进行座谈（回答问题）时，战俘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比如：“如果你们（即苏联）不奉行侵略政策，那为什么与芬兰打仗？”“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国与芬兰那样一个小国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仗？”而且提这些问题时带有嘲讽口气。

籍贯在归属德国领土上的战俘表现出某种孤僻的性格，态度近似不友好，当把籍贯在划归我国领土上的战俘与他们分开，把前者送往“修道院”，让后者留在休养院时，这种现象尤其引人注目。

当将两者分开之后，籍贯在划归我国领土上的战俘情绪反而明显好转。

目前，正采取措施为籍贯在我国领土上的战俘创造良好条件，改善文化服务。现在情况已明显改善，即能更自由地安置战俘的住处。俱乐部已装修完毕，并采取措施进一步改善文化服务。

战俘营后勤保障

由于缺少食品和食品领货单，1月份曾有抱怨伙食变差的情况。

食物的确单调，不能经常保障卡路里需要量。几乎到1月25日，战俘营只能吃酸白菜和咸鲈鱼、欧洲小鱼。不过，白菜汤和欧洲小鱼或鲱鱼都做得不错。但尽管如此，单调的伙食仍使战俘吃腻了，引起诸如“即便不杀死我们，也会冻死我们”之类的不健康的言论。政治机关对伙食变差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工作，做工作时说明，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不是没有食品，而是由于天气太冷，运输量太大，食品不能及时运到等等。

尽管这样，10楼和20楼全部、12楼和16楼部分战俘还是拒绝接受午餐，实际上汤并不太苦，而鱼也没有什么异味，只是由于汤是酸白菜和欧洲小鱼做的，缺少其他食品。的确，不经煽动是不会发生拒绝午餐现象的，10楼楼长斯卡奇茨基和20楼楼长沃贾尼茨基这些“鼓动员”们，都为这种鼓动受到应有的奖赏^①。

目前，食物问题已经得到改善。食谱多样化了。午餐能做出两道菜。对食物的怨言不复存在。

在严寒时季，4、5、15及其他一些楼的战俘抱怨住房寒冷。

需要指出的是，燃料没有中断过。劈柴确实发得不多，但泥炭数量充足，但因为房舍比较简陋，此外，一些房舍地势太高，加上某些楼里没有空房子，过厅房间和走廊都安置了战俘，这些地方很难保暖，就像没有供暖一样。所有这一切为随便议论寒冷提供了口实。

对这些不怀好意的议论也做了解释工作，并且应当指出，工作卓有成效，因为这些议论已经销声匿迹，没有得到战俘基本群众的支持。

籍贯在归属德国领土上的战俘，对住房拥挤至今还在说三道

^① 此处“奖赏”一词显然带有贬义。因为，对斯卡奇茨基和沃贾尼茨基的“奖赏”分别是关10天和15天禁闭。

四，甚至是在抱怨。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空房间可用。在这方面一切能做的都做了。例如 5 和 21 楼的所有房舍，甚至连木工房和地下室都经过修理，住进了人。现在出路只有一个——造简易房，但这很费时间。需要尽快缓解住房问题，因为过于拥挤可能导致传染病这一类极其严重现象的发生，特别是考虑到科泽尔斯克区当地居民有斑疹伤寒病例，其次，春天正在到来。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现在认真考虑，防止发生这类极其不好的情况。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发生，首先需要缓解战俘居住过于拥挤的问题。尽可能使房舍保持更好的卫生条件，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大多数房舍臭虫肆虐。用消毒的方法杀死臭虫是不可能的，因为消毒时人没地方安置。

此外，如果从集中营转移走 1000 人，战俘的个人卫生情况将大有改观。剩下的战俘就能经常洗澡和换洗衬衣。

此外，集中营的卫生情况也将得到改善。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避免集中营传染病流行，有助于更好地关押和看管战俘。

集中营还存在缺水问题，这常引起战俘们说三道四、发生不良现象。

由于缺水，无法经常保持战俘的个人卫生（洗衬衣、洗澡），导致长虱子。例如，1939 年 12 月卫生科检查时，发现 1452 人有虱子。而且各楼都有长虱子的战俘。1 月份又进行了检查，发现有虱子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十分不快的情况呢？首先是居住拥挤，其次是很少洗澡，因为澡堂只能容纳 35~40 人，每次开 10~12 小时，每天至多可洗近 500 人。假如水塔能保证供水，这种情况已算不错了。但是，因为经常断水，那么一天洗澡人数超不过 300~

350人。到市里去又远又冷。而春天的市澡堂浸满了水，再说，集中营与城市的交通将会中断。

已采取了扩大水源和改进水塔工作的措施。现在又打了一眼井（第三眼井），其每昼夜供水30~35立方米。新井的水样已送去分析。如果井水能用，最近这眼井将投入使用。但这里祸不单行：发动机和水泵都坏了，需要更换。功率更大的发动机以及水泵都已收到，但是安装需要很长时间。移交给战俘营的休养院的房子，处于破旧不堪半损坏状态，休养院院长确认，去年秋天就该维修了，但是这些房屋不仅没有维修，反而超负荷使用，而且超过其实际能力几倍地使用。为了不使房屋完全损坏，只好随时进行维修。

反革命现象

据战俘营第1科科长艾尔曼同志报告，已查明战俘营中战俘出版了非法报纸：《水星报》，出版了4期，目前不再出版；《监视器报》出版了15期。

对《监视器报》一事以侦查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查明了报纸数量和全体编辑人员，之后采取了相应的行政性措施，逮捕了全体编辑人员。

此外还有情报说，在战俘营营区内，战俘私下搞了一个图书馆，该馆的图书是一些战俘个人的书。这个图书馆至今还在活动，因为不对全体人员进行搜查无法没收这些书，书全分散在读者手中。该问题正在调查中。

在个别楼内，如1、5等楼内，每天都传阅着所谓的新报纸，其材料是有反苏情绪的战俘收集的报纸上的新文章、无线电广播中的新消息，以及一些流言蜚语。收集的全部材料都是歪曲的，充满了反苏精神。

在这个问题上，5楼楼长对此放任自流、推波助澜，甚至派人巡风放哨，监视我工作人员，不让我工作人员发现这伙人的行径，为此撤消了其楼长职务，逮捕后关押20昼夜禁闭。

家在我境内的战俘和家在德国境内的少校战俘中流传着“春天应从这里逃走”的话题。为此，他们正制定逃往中立国家，如罗马尼亚等国的计划。

集中营政委（政治指导员级） 阿列克谢耶夫

№08083

内务人民委员部与黑色冶金
工业人民委员部关于在黑色冶金工业
企业使用战俘的协定

(1940年2月7日)

莫斯科

绝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与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关于战俘
劳动力使用的协定

—

将战俘安置在以下各地：

第一类

籍贯在已归属苏联的原波兰领土上的战俘：

采矿工业总局

捷尔任斯基矿业托拉斯	2100 人
十月矿业托拉斯	1100 人
列宁矿业托拉斯	1300 人
尼科波尔锰矿托拉斯	513 人

特种钢总局

扎波罗热炼钢厂	600 人
总计	5613 人

第二类

籍贯在已归属德国和立陶宛的原波兰领土上的战俘

卡拉库布矿务局	1050 人
叶连诺矿务局	1000 人
新特罗伊茨克矿务局	247 人
总计	2297 人

二

在第一类企业中按任何一种（主要按计件工资制）工资制使用战俘。

三

在第二类企业中使用战俘时，要与雇用工人分开，人员分组要密集，通常不少于 100 人，以保障对战俘的押解和监视。

四

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免费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相应的设备和能防寒的成片房舍，以便建立战俘营并对其进行警卫。

五

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战俘临时免费使用的床上用品和衬衣。衬衣和床上用品的加补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实施。

六

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标准，由企业保障每个战俘相应的工作岗位、必需的工具、工作服，提供技术

指导，负责战俘的劳动登记，并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七

若战俘受工伤，无论是刑事责任还是物质责任概由企业承担。

八

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使用战俘劳动，按企业现行的标准、计件工资额和劳动支付方法，将全部战俘的工资支付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但战俘每班次的工资不得少于7卢布。

九

本协定不适用与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企业签订了固定工作合同、享受雇用工人待遇的第一类战俘，即，他们仍享受雇佣工人待遇。

十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与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1939年10月14日关于使用战俘劳动的议定书被认为失去效力。

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 切尔内绍夫

苏联黑色冶金工业副人民委员 叶夫斯特拉托夫

№08084

旧别尔斯克战俘营领导就在战俘中组织 政治教育工作给涅霍罗舍夫的报告

(1940年2月8日)

旧别尔斯克

11~3号

机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团级政治委员涅霍罗舍夫同志

内务人民委员部旧别尔斯克战俘营 1940年1月政治思想状况报告

兹报告，根据您的指示，在战俘中开展了群众性政治工作。

整个群众性政治工作是按1月份制定的计划进行的。主要工作形式是放映电影，定期报道报刊杂志新闻，回答战俘的问题，监督战俘执行战俘营内部规章细则和领导命令的情况。保障战俘读书报和听无线电广播。对按规定标准向战俘提供必需的全部给养品的情况实施日常监督。

1月份进行了下列工作：

1. 对3908名战俘进行了群众性政治工作。
2. 战俘中的整个群众性政治工作已按计划进行，党团组织在执行计划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按计划拟定了党政工作措施，其中做了下列工作：

召集了专题座谈会

1. 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2. 苏联各族人民的兄弟般联盟。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实施。
3. 芬兰事件。
4. 西欧事件。
5. 现代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

阅读报刊杂志并对阅读过的材料进行宣讲

1. 1939年总结和1940年任务。
2. “谢多夫采夫”号漂航的科学意义。
3. 苏日协定。
4. 苏联国家制度。
5. 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国15周年。
6. 苏联完成两个五年计划的总结。
7. 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
8. 中国人民抗日斗争。

在战俘中进行组织指导性活动

1. 与战俘大组组长进行专题座谈：
 - (1) 宿舍卫生措施；
 - (2) 战俘收发信制度。
2. 与战俘小组长就宿舍问题进行专题座谈：
 - (1) 使用与保管国家财产；
 - (2) 宿舍卫生规定；
 - (3) 战俘通信标准与制度；
 - (4) 禁止赌牌。

为战俘放映了下列电影：

1. 彼得大帝——上集。
2. 彼得大帝——下集。

只为原上校和将军战俘在市电影院组织了电影专场。由于战俘

营缺少放映房舍，没有再为其余战俘放映电影。

战俘营院内设置了图片橱窗，题目是：

1. 约·维·斯大林的生活与活动；
2. 苏联体育与全体工作人员^①成就；
3. 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领导下沿列宁的道路前进的 16 年。

图书馆工作

图书馆有各种图书和小册子 6615 册，收到 700 份各种报纸和 62 份杂志，经常不断地为 1470 名读者服务。每天阅览室达 200～250 人。战俘尤其对《宣传员指南》、《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星火》杂志的需求增加了。在 1 月份，杂志的战俘读者为 1000 人次。

对民族问题书籍需求量很大，阅读斯大林同志《列宁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著作的战俘特别多。

对战俘收听无线电广播的组织工作

为战俘设立了 52 个广播点，为 52 个广播点提供了扬声器，其中集中营院中安装了 2 个高音喇叭。

战俘每天从早 6 时至晚 23 时都能收听到无线电广播。

将战俘编成 30～50 人的大组收听：

- (1) 莫斯科新闻；
- (2)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函授课与研究者辅导课和辅导报告；
- (3) 莫斯科和明斯克台转播的歌剧和音乐会。

文化用品保障

- | | |
|---------|-------|
| 1. 国际象棋 | 60 付 |
| 2. 跳棋 | 140 付 |

^① 原文如此，显然应为“运动”——原文注

3. 多米诺骨牌

112 付

此外，战俘自己制作了 15 付跳棋和 20 付多米诺骨牌。

1 月份开始筹备战俘新一轮国际象棋比赛。

目前组织了各宿舍的国际象棋赛，根据比赛结果，将在俱乐部举办全战俘营的国际象棋赛。

已有 114 名战俘报名参加宿舍国际象棋赛。

战俘营到现在没有俱乐部房舍，这是战俘政治教育工作中最大问题之一。

整个战俘的政治教育工作都是政治机关在宿舍进行的。1 月份，政治科的 5 名指导员被派往登记统计科协助战俘复审工作。剩下的 2 名同志开展战俘的政治工作和战俘营工作人员、门卫的党的群众性工作。

2 月份战俘政治教育工作拟进行下列活动：

1. 政治科剩下的全部工作人员深入到宿舍，进行战俘的政治教育工作，动员战俘遵守和执行战俘营内部规章。

2. 通过座谈和讲座拟在战俘中宣讲：

(1) 欧洲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

(2) 苏联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3) 中日帝国主义战争与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3. 座谈报纸的最新报道材料，解答战俘的问题。

俱乐部工作

1. 为战俘放映《红色巡逻队》、《彼得大帝》（两集）、《马克西姆的青年时代》三部曲等电影。

2. 为战俘讲课和作报告，题目是：

(1) “谢多夫采夫”号漂航的科学意义；

(2) 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间的对立；

(3)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

3. 举办“工农红军 22 年”橱窗照片展。
4. 为 11 号宿舍安装无线电广播喇叭。
5. 设立游戏室，提供：
 - (1) 国际象棋 8 付
 - (2) 多米诺骨牌 6 付
6. 装修图书报刊杂志阅览室用房。
7. 办好工农红军 22 年图书橱窗。
8. 组织参观市博物馆
9. 给战俘讲解《彼得大帝》电影。

战俘的政治思想状态

政治机关上月查出了战俘中的下列反革命活动事实：

1. 1940 年 1 月 13 日，原上校战俘组以原上校萨斯基·埃德瓦尔德为首的两人代表团找到战俘营主任、国家安全大尉别列日科夫同志。提出一系列要求（有关要求已于 1940 年 1 月 23 日以紧急报告形式向您报告）。战俘营已满足战俘提出的后勤方面的要求，至于其他要求，战俘营领导无法答复并且已请您指示。

2. 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在与战俘佩雷尔穆特谈话时得知，战俘斯坦尼斯拉夫·弗兰西舍克·柴可夫斯基（1907 年出生，少尉，原波兰黑帮报纸《奥伦多夫尼克报》编辑）及其原编辑部助手、战俘扬·捷奥多西耶维奇·特尔莱茨基（1906 年出生），在战俘营战俘中散布苏联政府首脑莫洛托夫同志辞职、克里木进行战争动员并且准备与土耳其打仗、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原波兰领土进行动员等挑衅性谣言（1 月 23 日紧急政治报告已上报此事）。

上述人员的材料已转交特别科进一步审理。

3. 战俘破坏财物和木材的现象有增无减。战俘雅罗申斯基伙同一群战俘企图将包装桶当柴烧。政治科指导员莫斯卡连科同志发现战俘布罗德尼茨基和巴兰诺夫斯基将建筑材料当作火炉的燃料

(无视战俘有规定的燃料标准)。肇事者已受到行政处分。今年1月3日夜间，政治科科长库托夫同志和后勤科科长穆内金同志发现，一群战俘（11人）按战俘涅韦罗夫斯基的命令企图将建筑材料（9米长的方木）当柴烧。肇事者当即被召进值班警卫室，将所有人记录在案，并讲明这是犯罪行为，最后一次提出警告，若再出现违犯战俘营规章制度的现象，即使是其他战俘，战俘营领导也将严厉追究当场被抓住者的责任。

4. 政治科科长库托夫与战俘斯捷凡-弗拉迪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布良克-韦斯贝格（原华沙农学院教授，中尉）谈话时得知，战俘营战俘中有个约定：

(1) 不与战俘营政工人员谈论政治题目，因为战俘对马克思理论知之甚少，并且很快被政工人员当着战俘众人的面揭露；

(2) 与政工人员谈话时提后勤和日常生活问题：

①扫帚问题，

②拖把问题，

③衬衣问题，

④天气问题，

⑤旧别尔斯克自然条件问题，

⑥信件问题（逼迫批准增加通信次数），

⑦探家问题等。

战俘乐意接受战俘营现行的规章制度，条件是他们通过战俘组长、看门人，而不经战俘营人员（苏联公民）得到食物、衣服和一切必需品，并且少与战俘营领导和政治人员谈话。

战俘布良克讲，战俘中的保皇党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当中流传着一种观点：“我们返回波兰去，赶走德国人和犹太人，然后再打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帝国主义加犹太人干活的劲头——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

5号宿舍处于保皇党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影响之下，宿舍里有个叫彼得罗维奇的副教授战俘，拥护进步资产阶级，有人鼓动他：布尔什维克是敌人，他是“农民党”，是维托斯^①的拥护者。

战俘彼得罗维奇和布兰克在战俘中做工作：他们分别与5~7个人和10个人谈过话。战俘彼得罗维奇就波兰经济问题与战俘座谈过。战俘布兰克称，他与战俘们就各种题目进行座谈：如养蜂学。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他就养蜂学问题，从波兰与罗斯托夫的克里尼茨基教授有过联系。其妻子在原波兰社会保险部门工作过，搞过政治工作。除谈养蜂学问题外，战俘布兰克作为各种知识的专家与战俘们就动物学、生物学、人种学等问题进行过座谈。

战俘营出现过烟草中断供应的情况，引起了某些不满，并导致战俘中投机倒把活动抬头。目前战俘的烟草已有保障，烟草投机倒把活动也停止了。

遵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派的工作队的指示，考虑到战俘营战俘的思想状况，战俘营领导采取了下列措施：

1. 将得到的有关战俘反革命活动的全部材料转交特别科进一步审理。

2. 做好战俘营工作人员的稳定工作，清洗偶尔混入的人员，加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优秀非党员成分，通过专门审查组成工作人员队伍。

3. 加快结束11号宿舍（原教堂）的工程，腾出房舍作俱乐部用，以便在俱乐部放映电影、作报告和上课时容纳更多人。

4. 政治科抽调5人协助统计登记科对战俘进行复审。1月份已审讯860人。

^① 维岑德·维托斯，波兰农民运动著名活动家和波兰政治家。为波兰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终身主席。在两次大战期间曾三次任波兰总理。

5. 政治机关在战俘中做大量工作所采取的措施：召开座谈会，走访宿舍（利用白天各种时间和每天晚上），保障图书和报刊杂志，提供无线电广播服务。安装好战俘营院内的中央报纸橱窗。为了禁止战俘利用各种借口开展有组织的活动，政治机关已加强监督。

无自杀事件。

无传染病。

无集体和个人逃跑事件。

无集体和个人绝食事件。相反，战俘增加体重4~6~8~10公斤不等。

无酗酒现象。

战俘弗拉迪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沃伊特克维奇（原波兰上校）企图在洗脸间自杀（上吊），战俘扬·皮尤罗和梅奇斯拉夫·索科尔-绍辛制止了这次自杀行为，他们将战俘沃伊特克维奇从绳套中解下来。

目前，沃伊特克维奇身体健康，感觉良好，住在战俘宿舍。

集中营后勤状况

1月份做了下列工作：

1. 战俘营安装了自己的电站并投入使用。
2. 19号宿舍建成一半并已使用，另一半接近完工。
3. 11号宿舍（原教堂）已着手装修，以便腾出房舍作俱乐部用。
4. 战俘营领导组建了战俘营被服和全部财产清查委员会。
5. 保障了战俘营2月份白糖、烟草的供应。

后勤科已经全力以赴开展工作，执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派的工作队关于做好战俘营春季准备的指示。

战俘的卫生服务

1月份搞了下列活动：

1. 战俘营澡堂平均为每个战俘服务两次。市澡堂因缺少燃料

没有营业。

对 10811 平方米进行了液体消毒。

2. 经常对院子和所有被污染的地方进行清除和消毒。

3. 全部战俘注射了伤寒和斑疹伤寒预防针。

4. 3854 人次战俘看过门诊，其中初次门诊 1117 人。

疾病种类	门诊人次	初次门诊人数
(1) 肠胃病	272	75
(2) 一期梅毒	41	0
二期梅毒	1	0
(3) 其他性病	39	0
(4) 肺结核	42	15
(5) 皮肤与皮下组织病	390	98
(6) 牙病	901	346
(7) 耳鼻喉病	416	95
(8) 眼病	382	111
(9) 呼吸道病	129	41
(10) 其他各种疾病	400	126

门诊时未发现急性胃炎。

战俘营医院服务情况：

疾病名称	截至 40 年 1 月 1 日 住院人数	1 月住院人数	2 月出院人数	截至 40 年 2 月 1 日 住院人数	床位日
所有疾病	23	47	47	23	766
流行性感冒	1	9	8	2	53
肠胃病	-	1	1	-	6
肺结核	4	1	2	3	99
肺炎	2	1	1	2	47
皮肤病	2	2	4	0	66
内科病	1	5	6	0	42
其他疾病	13	28	25	16	453
总计	23	47	47	23	766

1月份2名战俘死亡：

(1) 叶日·弗洛里安诺维奇·马耶夫斯基，1898年出生，死于肺结核。

(2) 彼得·彼得罗维奇·克尔科夫斯基，1893年出生，死于肺结核。

统计登记科工作

1月份完成：

1. 对860名战俘进行了复审。
2. 给3885名战俘拍摄了照片。
3. 整理了3908份人事卷宗。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主任、国家安全大尉 阿·别列日科夫

内务部人民委员战俘营政委、营级政治委员 基尔申

1940年2月8日

№08085

洛尔基什关于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 战俘准备逃跑的专门报告

(1940年2月19日)

莫斯科

4 / 10909

绝密

专门报告

最近，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战俘中发现了一系列企图逃离战俘营的事实。

为了实现逃跑企图，战俘在很小的范围里讨论逃跑计划和逃跑方法。

战俘、原县警察大队长伊格纳季·斯捷潘诺维奇·明斯基在一组军官中说：“夏天有可能逃出集中营。我们所在的谢利格尔湖到芬兰-拉脱维亚边界有300公里。毋庸置疑，逃往芬兰更好，它正与苏联打仗，如果我们出现在芬兰领土上，何况我们还是军官，芬兰人将不会出卖我们，相反，会接收我们参军，委以军官职务。逃往拉脱维亚则不利，因为拉脱维亚与苏联关系很好，它可能交出我们。”

作为逃跑准备的一部分，某些战俘开始研究苏联西部的地形，即他们从战俘营逃跑时路经的那些地方。

战俘、警察所长卡尔平斯基用20卢布向警察戈利希买了本世界地图集。某些警察（姓名不详）从这本地图集上将苏联的欧洲部分转绘到薄纸上，并将通往原波兰与芬兰边界的所有居民点、公路、铁路作了标记。

某些战俘认为逃跑的最好时间是春天或夏天，在相互交谈中，他们讨论各种逃离战俘营的方法，例如，战俘、警察中士马尔特莱与警察瓦尔涅维奇等人交谈时说：“如果到春天还不放我们走，只得逃走。通过拉脱维亚边界逃回故乡去，最好在战俘营外干活时逃，但不要成群结伙，要三三两两，这样才不会被发现。”有些战俘讨论逃离战俘营计划时认为，需要用卡车逃跑，因为卡车离开战俘营时任何人都不会认真检查。

除实施单人和小组逃跑的企图外，某些战俘还有组织全部战俘大规模逃跑的企图，为此要消灭战俘营警卫队。今年1月18日战俘马尔科夫斯基和彼得·斯利温斯基讲了这一意图。

斯利温斯基说：“要消灭战俘营警卫队，我们6000人全部逃走。”

马尔科夫斯基马上补充说：“要做好救生圈，游过湖去，要让其他战俘做好这种准备。”战俘逃跑的意图已通报战俘营首长。

加里宁军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已采取措施，追查策划逃跑的组织者。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安全总局特别处第2科科长、
国家安全大尉 洛尔基什

№ 08086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
释放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尔斯克战俘营
部分战俘给贝利亚的报告

(1940年2月20日)

莫斯科

绝密

致拉·贝利亚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一级集团军级国家安全政治委员拉·巴·贝利亚同志

为了减轻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压力，请您下令采取下列措施：

1. 将军官中的重病人、完全残废者、结核病患者、60和60岁以上的老人（约300人）全部释放回家。

2. 将家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预备役军官中没有劣迹材料的农艺师、医生、工程师与技术员、教师释放回家。

据初步材料估计，这类人可能释放400~500人。

3. 请您批准将边防军军官、司法人员、地主、“波兰军事组织”和“射手”党派中的积极分子、原波兰总参谋部二处军官、军事新闻官（约400人）的卷宗办理妥当，以便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上审查。

对这类人的调查，最好由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内务人民部进行，

若不可能，则将上述所有人集中到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在那里调查。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
少校 彼·索普鲁年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
团级政治委员 涅霍罗舍夫

№08087

1939年10、11、12月份内务人民委员部 各战俘营疾病和死亡情况分析

(1940年2月21日)

莫斯科

机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团级政治委员涅霍罗舍夫同志

1939年10、11、12月份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战俘营疾病和死亡情况分析

原波兰战线形势迅速发展，大批战俘涌入，使一些战俘营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做好接收大批战俘的准备，因此，这些战俘营出现了人满为患、虱子肆虐的现象，战俘中发现大量各类病人，其中包括痢疾患者、伤员和流行性感冒患者等。

在组建战俘营期间，战俘营的流行病形势极其严峻。

给卫生勤务部门提出的任务是：

1. 不允许战俘营发生流行病。制止和消灭传入的痢疾。
2. 尽快开设医疗机构和卫生公共设施网。
3. 给战俘营补充训练有素的医疗工作者骨干。
4. 制定战俘营卫生勤务的基本规定。
5. 保障战俘营的药品和医疗设备等。
6. 在饮水设施和新到人员卫生养成方面采取措施。

完成下达给卫生勤务部门任务的办法是：

(1) 解决卫生勤务部门的所有基本组织问题(关于预防流行病和采取卫生措施方面的规定、预算、标准、一览表、报告、指示等)；

(2) 组建战俘营期间，挑选富有经验、有亲自指导能力的管理医生，把他们派往每一个战俘营；

(3) 发送医疗卫生设备、药品和其他卫生用具，保障医疗卫生机构不间断地工作。

这些措施可保障完成下达的各项任务，例如制止和消灭传入战俘营的痢疾。

由于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打预防针、消灭虱子、改善饮食和供水），我们预防了急性传染病的发生。

开设的门诊和医院已基本满足了对战俘病人的治疗，但个别战俘营（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和旧别尔斯克战俘营）医院不够用，一些需要住院的病人住在简易病房中，得不到住院医疗救护。

战俘营医务工作者主要靠当地兵役局所属医务人员补充，此外，10名有经验的医生（卫生勤务组织者）已到各战俘营所在地。

战俘营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已完全得到保障。

对卫生勤务部门的必要规定和主要指示，在组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后的第二天就已经下发。

提出任务并迅速完成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战俘营的状况，而且生病率和死亡率相对不高。病人门诊人数3个月期间，各战俘营共有125964门诊人次。其中初次门诊55654人次，各月情况如下：

月 份	总门诊人次	初次门诊人次
10	59939	38818
11	27947	11146
12	38051	12690

10月份门诊数字高是因为所有战俘营都已投入使用，战俘达到最高数额，另一方面，随队运来了大量病人。

11月份初次门诊人次下降到原来的1/3以下，这是因为：一方面关闭了一些战俘营并把大量战俘送回家去，另一方面是1个月的治疗效果明显，特别是对皮肤病与皮下组织病和流行性感冒的治疗效果最明显。

主要疾病是流行性感冒、肠胃病、皮肤与皮下组织病：

流行性感冒

月 份	病人总数	初次病人	占总发病率
10	4332	2125	6.22%
11	1440	1082	9.7%
12	412	276	4.87%

急性肠胃病

10	5828	2836	8.15%
11	2308	1168	19.47%
12	922	464	8.2%

皮肤与皮下组织病

10	9939	3041	8.29%
11	2761	970	8.7%
12	856	257	4.54%

这些疾病发病率高，是因为流行性感冒有季节性（受寒因素）和前几个月住房条件差。

患肠胃病是因为组建战俘营时不能保障饮水质量、食物状况也不尽人意。

患皮肤病则是因为大批转移（擦伤、碰伤、负伤、搔破感染、疖子等）。

战俘营医院

战俘营名称	医院床位		(其中)		
	编制床位	实有床位	内科	外科	传染科
	奥斯塔什科夫	50	45	22	10
尤赫诺夫	81	51	26	5	20
科泽尔斯科	90	90	66	18	6
旧别尔斯科	45	22	22	-	-
格里亚佐韦茨 住院医疗	50	15	-	-	-

3个月共有3359病人住院医疗，23958个床日。病床平均周转率为7.16日/人。

各月情况：

月 份	住院病人	床 日
10	1710	12983
11	1049	5657
12	393	3712

11、12月份住院病人减少的原因是门诊病人减少。

战俘营卫生勤务部门接收病人住院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 (1) 所有发烧和急性肠胃炎病人一定尽快接收住院，
- (2) 传染病人与健康人隔离，
- (3) 全部及时接收病人住院。

在最初几个月里，某些战俘营（奥斯塔什科夫、旧别尔斯科、奥兰战俘营）医院实施这些原则时存在着不足。

在住院病人中，流行性感冒、结核病、急性肠胃病和皮肤与皮下组织病的比例最高。

流行性感冒			
月 份	住院病人	床 日	占总床日比率
10	579	2027	15.7
11	261	965	13.28
12	59	500	17.78
结核病			
10	46	374	2.9
11	43	527	7.25
12	10	356	12.66
急性肠胃病			
10	313	1539	11.63
11	113	698	9.6
12	11	153	5.44
皮肤与皮下组病			
10	105	578	4.4
11	120	466	6.41
12	15	238	8.46

其后是血液循环器官疾病、恶性肿瘤等。

从列举的主要疾病表格中可以看出，疾病的绝对数字下降和床日数字的上升。这些比较性指数一方面说明疾病严重，另一方面说明住院医疗救护覆盖面更大了，医疗工作组织得更好了。第一个月战俘中有许多人患皮肤与皮下组织病、流行性感冒、伤风感冒，需要住院医疗救护。

近来，住院医疗的多是重病人（结核、肠胃失调、流行性感冒等）。最初，医院不能接收所有流行性感冒病人住院，现在大部分流行性感冒病人能够住进医院，而且在医院住到痊愈。

死亡情况

1939年10、11、12月份战俘营共死亡60人，各集中营死亡情况如下：

战俘营	死亡人数
奥斯塔什科夫	16
普季夫利	9
旧别尔斯克	6
尤赫诺夫	7
科泽尔斯克	3
尤扎	15
奥兰	2
科泽利希纳	2
共计	60人

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死人最多。这是由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老人和患各种慢性疾病的病人多等原因造成的。

主要死亡原因如下：

肺炎	肺结核	胃穿孔溃疡	痢疾	脓毒病
14	12	6	8	4
心脏病	癌症	其他		
4	3	9		

哮喘性肺炎死人最多，这是因为一方面10、11月份伤风因素所致，另一方面是死者年龄问题。大部分死者是老年人（成年人患肺炎死亡率总是很高）。

结核病死亡是因为死者战前已患有极严重肺结核病。

8例痢疾病死者是因为病人从押运队直接送进医院，当时病情已极其严重，明显是急性中毒。4例脓毒（血液感染）死者是因为：一例因患蜂窝状咽喉炎并且严重中毒发展为脓毒而死，第二例死于脚部磨伤，第三例死于阑尾炎穿孔等。

造成死亡的各种原因中，还有化脓性脑膜炎、枪伤、运输途中死亡等。

死亡总数中不包括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战俘营死亡情况，因为这些战俘营由卫生人民委员部机关和西乌克兰公路第一建筑工程局机关负责看管，这些单位未送统计资料。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
卫生处处长 索科洛夫

№08088

鲍里索韦茨和尤拉索夫就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 总的情况与内部秩序给索普鲁年科的报告

(1940年2月22日)

奥斯塔什科夫

133号

机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少校同志

报 告

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总的情况

1. 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总的情况令人满意。在斯托洛布诺耶岛周围建立了禁区，禁区沿谢利格尔湖走向，长150~250米。冬季，禁区竖有多块3/4米的木板，上面用大号字写着：“禁区，禁止入内。”禁区已得到区委员会的批准，并将有关情况通告周围居民。

全岛均为禁区，禁区拉上了铁丝网，木桩高2米。木桩间隔约6米，木桩之间拉上铁丝。警戒区设有2.5米的木栅栏，栅栏上装有1.5米的带刺的铁丝。

修建了7个岗楼用作外部警卫。从岗楼上能很清楚地观察地面

情况。岗哨的警卫只有电话通信。内部警卫刚刚开始安装电话。没有信号设备。

2. 大门口设有门卫，可保障对进出人员和交通工具进行必要的监视。

3. 在冬季条件下，战俘营的住房可容纳 6500 人。在原大教堂盖了两幢简易房：正房住 360 人，左厢房住 280 人。以下房舍也改成了宿舍：(1) 原猪舍住 350 人，(2) 地下室住 120 人，(3) 两幢建成的简易木房住 700 人。被烧毁楼的修复、警卫连卫兵室、在奥斯塔什科夫市的运输队办公室正接近完工。建筑物平面图见示意图。

4. 房舍里的设备情况基本令人满意。只给高级指挥官（少校以上）发了床。其余人员安排在双层简易床上。因房间结构所限，简易床都设在一侧，大多睡 10~15 人。给全体战俘发了被褥。此外，军官还发了枕头和床单。战俘营中的战俘无一人缺少床上用品。每一个战俘的居住面积约 2 平方米。

二、战俘总数和分编方法

截至今年 2 月 18 日，集中营共关押战俘 6369 人，其中：

警察与宪兵队、边防军军官	282 人
警察与宪兵队初级军官	784 人
警察与宪兵队士兵	5001 人
监狱看守	114 人
情报人员	6 人
其他	182 人

战俘按官职和职业种类分楼安置。共分 20 个楼。全部军官住一个楼，在楼内按官衔分房间。

三、战俘营内务秩序

战俘营内务秩序是按照您批准的内务秩序规定建立的，即：7时起床，7~8时早检查和洗漱，8时早饭，8、11、12、13、10楼的上工者和其余有派工单的楼先吃。没有派工单的楼最后吃。16时30分前干活，12时至12时30分喝茶休息。16时30分至18时午饭，之后是战俘内务活动。23时睡觉。

对战俘宿舍与物品进行不定期的搜查和检查，视需要而定。每一个战俘一进战俘营时即受到认真搜查。9月30日进战俘营的战俘除外，那一天就进了7000多人。进行登记时才对他们进行搜查，即已经过了10~15天。其余战俘在到达的当天即受到搜查。搜查结果，俘虏携带的多余衬衣和床上用品被没收，当时，没有马上把登记工作摆在应有的高度。此外，还没收了照相机和自行车。

战俘营中的战俘管理结构是：各楼的管理主任从内部警卫的门卫中任命，他们对战俘进行早晚检查，并且负责战俘组的内务秩序。各楼楼长从战俘中任命，协助管理主任工作，负责楼的内部状况和执行作息时间表。除楼长外，各房间还任命了负责人，不分房间的地方任命了百人长。对战俘食堂、澡堂、小作坊工作的监督则由专门挑选的战俘军官实施。为了战俘营服务的需要，由以下专业工人成立了以下常设班组：（1）建筑工人队（木工、石工、锅炉工、油工、水工、电工、清洁工等）；（2）钳工组（钳工、金属车工、洋铁工等）；（3）木工组（家具工、细木工、木车工等）；（4）裁缝组（裁缝）；皮靴组（靴匠）；（6）面包房（面包师）；（7）食堂（厨师、运水工等）；（8）澡堂（消毒工、洗衣工）。多数战俘按自己的专业干活，但战俘营每天还有大量杂活，由那些没有专业的战俘轮流干。这些杂活是：清除营区的垃圾和积雪，平整营区土地，清理被烧毁楼房的垃圾等。每天总计有2500名战俘干活。目

前，正加速斯托尔布内岛与“斯韦特里察”半岛之间堤坝的建设。

每个战俘严格按照规定与家人通信——1个月1封信。信件交给各楼每天专门挑选出来的人。战俘楼长将全楼的信和清单带到战俘营办公室，交给负责收发信件的人员。信件由办公室交特别科政治检查员检查，2~3天后送到邮局。来信也是上述人员收，先交政治检查员检查，再从那里转到办公室，之后交楼长分发给战俘。每个战俘只能随身携带100卢布或者100兹罗提，多余的货币和贵重物品交战俘营财务科保管。当战俘花完手头的100卢布时，经战俘营主任批准，财务科科长负责发钱。如果家中给战俘寄来钱，100卢布以内发给战俘，超出部分留在出纳处，并发给储蓄凭据。

战俘的意见书直接送交营办公室，或投入战俘营营区专门设置的投诉箱内。所有意见书都要及时研究，并向战俘及时作出答复。如果意见书是给上级机关的，那么意见书要发出，并将发出情况通知战俘。送交战俘营首长的所有意见书按规定的程序处理。

四、战俘违犯制度行为，同违犯制度行为作斗争

前一时期，战俘违反制度最突出的事实如下：赌牌15次，拒绝干活13次，小偷行为1次，其他小的违反制度行为41次。对违反内部制度的行为大多采取纪律处罚手段——关禁闭和关惩罚室。在不允许战俘写信的时间里，发生一次企图向家乡寄信的现象。为此，罚这个战俘1个月不准通信。以特别命令的方式，在全战俘营宣读违反制度的事实和对战俘作出的处分，让所有战俘知道。除行政措施外，战俘营政治科和党组织对发生的现象做了解释工作。战俘营内有惩罚室和禁闭室，并且设备齐全。对所有关禁闭或惩罚室的战俘，战俘营主任事先都下达命令，命令中指出这个战俘为什么被关和关多长时间。

五、门卫队状况

门卫队已配备满员。内部警卫队 50% 为应征入伍人员，50% 为复员红军战士。内卫队党团员成分如下：苏联共产党（布）党员和候补党员 7 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10 人。目前，门卫能警惕地执勤。前一时期，门卫违犯勤务记录在案的有 10 次之多。其中：向战俘买手表——门卫亚历山德罗夫，酗酒——门卫库罗夫，擅自进城——门卫格列奇尼科夫。上述门卫都受到行政处分，已将他们作为战俘营不适用人员退回区兵役局。

此外，无论是内部警卫队，还是战俘营全体人员，都多次开会，会上提出了这些问题。

我的副手波洛维扬纽克同志有违犯战俘营制度的行为，未经第 2 科科长和我的同意，擅自给战俘调宿舍，为此，（他）受到处分，宿舍调动已被取消。未发现战俘营工作人员中有其他更突出的违犯制度的情况。

由于对警卫和战俘的制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战俘营的内部制度日益加强。

附：1 月份违反制度和搜查结果一览表和战俘营警卫示意图。
附件：

1 月 1~15 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战俘各类违反制度情况报表

违反制度性质	违反制度数量	惩罚措施			
		警告	关惩罚房	关禁闭	剥夺收发信件与邮包
逃跑 非法通信 与居民联系 保存酒类					

苏联进军波兰与卡廷事件

续上表

违反制度性质	违反制度数量	惩罚措施			
		警告	关惩罚房	关禁闭	剥夺收发信件与邮包
酗酒					
流氓与斗殴	1			1	
小偷行为	1		1		
保存违禁物品	1				1
战俘中离间性传闻	3				3
赌牌	15		7		8
拒绝干活	13		12		1
其他	41		10		31
总计	75		30		45

战俘营主任、少校 鲍里索韦茨
政委、政治指导员级 尤拉索夫

№08089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
执行贝利亚关于将关押在战俘营的狱吏、
情报人员、奸细、民团分子等转移到
监狱的命令给各战俘营主任的指示**

(1940年2月23日)

莫斯科

25 / 1869 号

机密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主任

亲启

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

亲启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下令，将关押在你们战俘营的狱吏、情报人员、奸细、民团分子、司法人员、地主、商人大产业主转移到监狱，上述人员归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负责。

以上人员现有的全部材料要转交内务人民委员局侦查部门，以便进行侦查（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同志1940年2月22日641/6指示）。

实施这一行动时，你们要遵循以下要求：

1. 5天期限内查清战俘营登记的下列人员数量：

(1) 监狱看守和监狱部门官员（不分职位高低）；(2) 情报人员（从事对苏侦察的波兰总参谋部第二处军官和文职人员、军事新闻官、军事书报检查官和边防军骨干军官）；(3) 奸细；(4) 民团

分子；(5) 司法人员；(6) 地主；(7) 商人和大产业主。

2. 与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联系，收到局长指示（将第一条所列人员遣送到哪座监狱）后，把每一类人员的数量和遣送地点报告战俘事务管理局。

3. 收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的通知后，进行向监狱遣送战俘的工作。

4. 将战俘的登记卷宗装入信封封好交押运队队长，与被捕者一起转交监狱。

特别科现有的每个被遣送者的全部材料转交内务人民委员局侦查部门。

5. 继续清查监狱看守、情报人员、奸细、民团分子、司法人员、地主、商人和大产业主，清查情况尽快报告战俘事务管理局，以便把这些人送往监狱。

6. 将转交到监狱的人数尽快报告战俘事务管理局，根据登记和侦查材料写的每个被遣送者的详细证明材料一并送来。

谨提醒：向监狱转送战俘的全部工作，应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
少校 索普鲁年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政委、
团级政治委员 涅霍罗舍夫

№08090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整顿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企业战俘工作措施的命令

(1940年2月26日)

莫斯科
机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命令 (1940年)

内容:

关于整顿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企业战俘工作的措施。

00248号 1940年2月26日 莫斯科市

为了整顿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企业战俘工作，兹命令：

1. 将家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的战俘与其他战俘分开。
2. 将家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的战俘集中到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以下企业干活：捷尔任斯基矿业、十月矿业、列宁矿业、尼科波尔锰矿各托拉斯、扎波罗热炼钢厂，在这些地方设置单独的战俘营。

3. 将家在归属德国和立陶宛领土上的战俘集中到封闭式单独的战俘营，并且在看守下集体劳动。

为此目的设置：

叶列诺战俘营、新特罗伊茨克矿务局集中营区、卡拉库布战俘营。

4. 战俘的食物、被服供应、文化与医疗卫生（门诊）服务由

战俘营管理局负责。服务队（厨房、食堂、值班员、清洁工等）由身体有缺陷的战俘组成。

所有干活的战俘每月发 20 卢布，用于个人花费。战俘完成劳动定额 80~100%，每月补发 30 卢布。

完成劳动定额 100% 以上时，如果战俘的劳动所得超过其生活费和规定的 50 卢布奖励（20 + 30 卢布），给其发全额工资，但要从中扣除其生活费。

6. ① 按所附标准，根据劳动生产率实行有差别的伙食。

7.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与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企业的相互关系，根据所附的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协议（附件 2）进行调节。

8. 中央财政计划处处长、师级军需官别连宗同志应保障向战俘营拨款。

9. 批准所附的叶列诺战俘营和卡拉库布战俘营编制表以及克里沃罗格铁矿区战俘营和扎波罗热战俘营的标准编制。

10. 家在归属德国领土上的战俘的剩余劳动力送往乌克兰 211 号建筑工程工地 ②。

11. 为保证完成本命令规定的全部措施，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少校同志，派遣战俘事务管理局第 1 处处长季什科夫同志带一个工作人员小组到当地去。

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师级政治委员 切尔内绍夫

① 原文缺第 5 条。

② 切尔内绍夫用蓝色铅笔将该段画掉。第 11 条改为 10 条。

№08091

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就
纠正队列表填写错误和发去新报表给
鲍里索韦茨的指示

(1940年3月2日)

莫斯科

25 / 2192 号

机密

内务人民委员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主任鲍里索韦茨少校同志

经检查你们的队列表发现，在“警察与宪兵队军官”一栏中，你们经常填写陆海军军官、医生等人的数字，这种情况绝不允许。

在我们1939年11月14日2067249号指示中明确指出：“其他”一栏指的是其他栏中所不包括的战俘，而且在呈送的队列表中一定要指明，在“其他”一栏中的数字是指哪一类战俘……当然，陆海军军官、医生、边防军军官应填在“其他”一栏中，并注明海军军官多少、陆军军官多少、边防军军官多少等等。

您将这些陆军军官全部填写在“警察与宪兵队军官”一栏中，显然会使登记出现失实。

此外，将你们1940年1月8日第18/c.c号关于警察和宪兵出生地的材料与你们1940年2月10日的队列表材料加以比较，发现出入很大，后者数字大。但是，在1940年1月5日至2月10日的最新队列表中完全没有反映出增加的数字。

我建议：

1. 尽快查清陆海军军官、医生和边防军军官的准确数目，将他们从“警察与宪兵队军官”一栏中删掉。

2. 在队列表的各栏目中只填写与这些栏目完全名副其实的战俘。

3. 为修改原先发给你们的队列表格式，今寄去新的更清楚易懂的格式。

4. 其余所有战俘（新启用的队列表各栏目指明的战俘除外）都填写在“其他”一栏中，一定要严格按我们 1939 年 11 月 14 日 2067249 号指示清楚地填写该栏。

5. 请核查 1940 年 1 月 15 日至 2 月 10 日到达您处的警察和宪兵的准确数字并通知我们，以便查清我们上面所说的差额。

6. 第一份新格式的队列表上报时间不得迟于 1940 年 3 月^①日。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少校 索普鲁年科
第 2 处处长国家安全中尉 马克利亚尔斯基

^① 文件中无日期。

№08092

联（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警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西部地区国界”的决定^①

（1940年3月2日）

莫斯科
机密
特档

114.——关于警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国界的决定

批准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同志的下列建议：

1. 责成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在2个月期限内：

（1）迁走距边界800米以内地带的居民，佩列梅什利、扎列希基、利斯科、乌格努夫、索卡利、乌斯季卢格、德鲁亚、新格鲁德各市除外；

（2）第（1）条中所述各市的居民从边界800米以内地带的迁离，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文件进行。

（3）清除距边界800米以内地带上搬迁居民的所有建筑物。

^① 摘自13号会议记录（特13）——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1940年2月17日至3月17日）。

2. 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1) 从今年4月15日起，用10年时间将被镇压和关押在战俘集中营中的原波兰军队军官、警察、监狱看守、宪兵、情报人员、原地主、工厂主和原波兰国家机关高级官员等的家属，悉数迁移到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各地区，数量为2.2万~2.5万户；

(2) 应迁户中的凶恶成员，若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掌握其过去和现在从事反苏活动的材料，应予逮捕，然后立案，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查；

(3) 迁走曾在原波兰警察局备案并且现在仍从事卖淫活动的娼妓；

(4) 20天内制定出(1)条所指家庭的迁移程序并报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

3. 规定(2)条所述被迁户的不动产和工商企业应予没收，被迁户的其他所有财产，被迁户有权销售或随身带往迁移地，每个家庭成员携带的物品不得超过100公斤。

4. 迁移后空出的住房和经营设施交当地苏维埃机关管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对房舍的妥善保管和正当使用进行监督，首先安置派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工作的工农红军军人、党和苏维埃工作者。

5. 波兰战事(1939年9月)开始后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的人员(难民)，表示愿意留在苏联境内者，5年内禁止其在距边界100公里地带内居住。办理护照时，给这类公民发带有相应标记的护照。

6. 希望离开苏联前往德国占领区但德国政府根据现有协议在1个月期限内没有接收的难民，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这些难民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送往苏联北部地区，以便在木材加工和其他工作中使用他们。

7.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20 天内制定出 5、6 条所述难民的搬迁和遣送程序，并报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

8.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 20 天内向苏联人民委员会上报完成上述工作所需开支预算。

抄送：

贝利亚同志、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赫洛莫夫同志。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08093

科雷托夫就遣送战俘的 组织工作给帕夫洛夫的报告

(不晚于 1940 年 3 月 4 日^①)

奥斯塔什科夫

帕夫洛夫^② 同志

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同志来电召我前往莫斯科一事已经通知您。到莫斯科后，索普鲁年科同志说，他是应第 1 特别处处长要求，召我去研究特别会议作出决定之后遣送战俘的组织问题。

会议是在第 1 特别处举行的，历时 2 天。

除第 1 处领导外，押送部队司令和劳改营局、战俘事务管理局及其他一些单位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主要议题是：

1. 战俘营遣送犯人的准备工作。
2. 在什么地方宣布特别会议的决定。
3. 在什么地方将犯人转交给押送队——在战俘营还是在车站。
4. 途中的押运服务工作。
5. 后勤服务。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内容确定的，该日期也是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枪毙战俘决定的日期。

② 帕夫洛夫，当时任加里宁州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处处长。

会议一开始，首先建议我讲一讲特别科的意见，似乎我们对组织遣送工作经过了深思熟虑。

从战俘的情绪、人数，尤其是这些人是一支活跃的反革命力量这一点出发，我谈了自己的意见：

1. 这次遣送的准备工作要像以往向德国和我国境内地区遣送一样，即按籍贯原则编队，犯人会认为是准备把他们送回家去。

2. 为了避免各种意外和麻烦，在我们这里无论如何不能宣布特别会议的决定，应在即将关押他们的战俘营宣布。如果押送途中战俘提出把他们送往什么地方的问题，那么押送队只能给他们统一的回答：“到另一个战俘营去干活。”

3. 向押送队转交犯人的工作也要像过去一样，在我们战俘营中进行。

4. 关于途中的押运服务问题，由于战俘营特别科编制小，州特别处缺人，每批犯人在途中需要1个多月时间，又是分4批遣送，我已请求会议不要让特别科承担这项职责。

这样一来，我们需要8个或8个以上的押送人员，押运服务工作应由另一业务部门承担。

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我为自己的意见进行了辩护，并作了详细证明。大家最终同意了这一意见，按这一精神起草了遣送组织工作草案，交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同志批准。

押送部队司令承担了途中押运服务这一职责。

我们的负担很快将会减轻。

我们上报的6005份卷宗目前已审查了600份，刑期为3~5~8年（堪察加），现在，人民委员已暂停审查。

但是有这样的说法：3月份我们会基本摆脱负担，准备接收芬兰人。

人民委员有一道关于将几类战俘关押到当地监狱的命令。加里

宁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对此有 25/1869 号指示（1940 年 2 月 9 日^①），我请求看这个指示。

奥斯塔什科夫战俘集中营特别科科长、
国家安全少尉 科雷托夫

① Г.В. 科雷托夫所写日期不准确，正确日期为 2 月 23 日。

№08094

贝利亚就枪毙3个专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宪兵、警察和民团分子等给斯大林的报告

(不早于1940年3月5日)

莫斯科

794 / 6 号

机密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目前关押着大量原波兰军队军官、原波兰警察局和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波兰民族反革命政党成员、公开反革命暴动组织参加者、越境分子等。所有这些人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

战俘营中的军官战俘和警察战俘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他们每一个人都等待着获释，以便有机会积极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部地区的机关，破获了一系列反革命暴动组织。在这些反革命组织中起积极领导作用的是原波兰军队军官、原警察与宪兵。

在拘捕的越境分子和国境线破坏分子中，也查出大量反革命间

谍和暴动组织成员。

战俘营中共关押着（不计士兵和士官）14736名原军官、官员、地主、警察、宪兵、监狱看守、民团分子、情报人员，97%以上是波兰族人。

其中：

将军、上校和中校	295人
少校和上尉	2080人
中尉、少尉和民团少尉	6049人
警察、边防军和宪兵队	
军官和初级指挥员	1030人
普通警察、宪兵、	
监狱看守和情报人员	5138人
官员、地主、天主教	
神甫和民团分子	144人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共关押囚犯18632人（其中10685人为波兰人），其中：

原军官	1207人
原警察、情报人员和宪兵	5141人
间谍和破坏分子	347人
原地主、工厂主和官员	465人
各种反革命和暴动组织	
成员、各类反革命分子	5345人
越境分子	6127人

由于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敌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必须：

1. 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1) 对战俘营中14700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情

报人员、宪兵、民团分子和监狱看守的案情；

(2) 以及对逮捕并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 11000 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组织成员、原地主、工厂主、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情——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取最高惩处措施——枪毙。

2. 审案时，不传唤囚犯，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而采用以下程序：

(1) 对战俘营战俘案，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审理，

(2) 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的囚犯，根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具的案卷中的材料审理。

3. 由贝利亚同志^①、梅尔库洛夫同志^② 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特别处处长）组成的 3 人小组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决定。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③

① 用蓝铅笔删去了贝利亚的名字，显然是约·维·斯大林所删。

② 用蓝铅笔填写了“科布洛夫”，显然是约·维·斯大林所填。

③ 第一页批注：在文件正文和页边有 И. 斯大林、К. 伏罗希洛夫、А. 米高扬用蓝笔写的个人签名，有 В. 莫洛托夫用普通铅笔写的个人签名。边空处有显然是斯大林的秘书写的“加里宁同意。卡冈诺维奇同意。”

№08095

联（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3 号会议记录摘录（114 项）
（1940 年 3 月 5 日）

莫斯科
绝密
特档

关于枪毙 3 个专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宪兵、警察、民团分子及其他人的决定。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П13 / 144

1940 年 3 月 5 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3 号会议记录摘录。1940 年 3 月 5 日决定
114.——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问题

1. 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1) 对战俘营中 14700 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情报人员、宪兵、民团分子和监狱看守的案情；

(2) 以及对逮捕并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
11000 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组织成员、原地主、工厂主、

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情——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取最高惩处措施——枪毙。

2. 审案时，不传唤囚犯、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而采用以下程序：

(1) 对战俘营战俘案，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审理，

(2) 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的囚犯，根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具的案卷中的材料审理。

3. 由梅尔库洛夫同志、拉布洛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特别处处长）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决定。

中央委员会书记

№06809

沙胡林就利用战俘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①

(1941年12月13日)

秘密

第 И-20 / 132 号 第 1 份

最近，位于古比雪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别济米扬斯基劳改营相继释放了近3万名犯有轻微罪（旷工、迟到等）、正在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所属工厂的建设工地上劳动的犯人。

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有专门技能的工人：车工、钳工、电工、装配工、建筑人员以及具有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所需的其他专业技能的人员。

根据杰缅季耶夫^②同志从古比雪夫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得到的材料来看，大部分有专门技能的获释者——18000人——已作为预备役军人移交国防人民委员部，其中近9000人应征入伍，其余9000人组成军事工作队，然后移交各企业。

为了保证第1、18、28工厂有足够的人力完成生产计划和对计划起决定作用的几个在建项目，我请求从获释者中选出15000~18000名有专门技能的人分配给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古比雪夫市的建筑工程和所属各工厂。

① 文献上有斯大林的批语：“交贝利亚同志”。

② 彼·瓦·杰缅季耶夫，1941年任苏联航空工业第一副人民委员，1953年任航空工业部部长。

附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

阿·沙胡林^①

① 阿·伊·沙胡林，1938年起先后任雅罗斯拉夫尔州、高尔基州委第一书记。
1940~1946年任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44年晋升为上将工程师。

№02547

贝利亚就卡廷事件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1月20日)

布尔坚科同志委员会^①审讯了40位证人后，认为他们的供词已足以查明事情真相，因而不再审讯其余证人。

委员会从应当检验的1000具尸体中，检验了近400具。

委员会发现了几份资料，可以证明，所谓“卡廷事件”发生的时间比德国人的说法要晚^②。委员会已着手准备有关通报。

据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司的资料，外国记者中提出要去斯摩棱斯克的有19人。此外，打算和记者一同前往的还有卡特琳·加里曼（美国大使的女儿）和梅尔比（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三等秘书）。

如果决定准许外国记者去斯摩棱斯克，那么，最好让他们在今年1月22日早晨前到达那里。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为这些记者派出专列并保证他们的饮食，但外交人民委员部必须指派一名负责人率领记者们前去，或者可由新闻司副司长彼得罗夫同志担任负责人。

一到那里后，就把记者们送往发掘地点和焚毁的森林中，然后由波将金同志、尼古拉大主教，或许还有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参加和主持下，召开记者招待会。波将金同志将代表委员会发言，介绍委员会的工作职责，然后在隔壁的一间屋中向记者展示有关资料，

① 指“确定和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波兰战俘军官情况特别委员会”。

② 按当时德国宣传机构的说法，这些波兰军官是在1940年春被杀的。

接着是午休和吃饭。

晚上，记者们将出席有8位见证人参加的委员会全体会议。

工作结束后，记者们将被送回莫斯科。

尼古拉大主教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如果外国记者或波兰军方的代表提出举行天主教追悼仪式，他该怎么办。

梅尔库洛夫和科鲁格洛夫同志在现场监督着整个活动。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贝利亚

【专题说明】

苏联与战后波兰（一）

（1944年1月至1949年8月）

苏联在波兰重建一个主权国家地位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新的、人民民主的波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与苏联的关系基础是如何奠定的？领导新波兰的主要政党如何选择波兰战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在波兰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转型与定型的过程中，苏联给予了什么帮助、施加了何种影响？波兰社会对此作出了什么反应？所有这些问题，随着一大批与此相关的历史档案的解密，不能不使人们对它们重新进行审视与思考。

本专题选编的文件，包括苏联派驻波兰党政军各部门人员发回的报告和工作总结，波兰各政党和国务活动家与苏联代表的谈话记录，波兰执政党——先是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波兰农民党，后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提交莫斯科有关部门的汇报材料，等等。在这些第一手材料中，蕴涵着有关波兰党派、国家机关、社会情绪、苏波关系等多方面的大量信息，是进一步研究前面那些问题的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例如，本专题收集的文件显示，至1944年1月，莫斯科对在波兰国内坚持抵抗的各政党，包括波兰工人党的组织及领导人，实际上是一知半解的，然而，当它看到，战争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将把波兰问题的解决提上议事日程，波兰需要有一个新的政权来与苏联的军事

和政治行动相配合，莫斯科立即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波兰政治力量的了解和影响，并一手促成了新波兰第一个政权机关——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此后，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成了专门负责国外共产党、工人党工作的国际情报部，它对新波兰的各方面情况的关注与控制就更加具体和直接了。波兰主要政治力量的领导人与莫斯科的个人接触也日益频繁和密切。收入本专题的就有一份1945年5月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与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的谈话记录，在这份颇有意思的文件中，真实地反映了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对波兰形势的分析，以及在此问题上与季米特洛夫等人的分歧。另外，细心的读者还可以从本专题提供的文件中，发现联共（布）中央有关部门是如何了解其他党的情况，并施加自己的影响的。

（本专题文件由吴伟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曹庆连、张冢海、侯育成）

No01764

波兰共产党员发起小组就必须建立在苏波兰 共产党人组织问题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1月10日）

关于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人组织问题的报告

鉴于解决波兰未来及其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日益迫近，特别是鉴于在苏联境内波兰武装力量的扩编^①和波兰民族委员会^②的建立，根本改变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人工作方式的必要性已经成熟。

至今，波兰共产党人在苏联的波兰居民和波兰军团^③中进行的工作有：

1. 开展了波兰爱国者联盟运动，它本着民族阵线和与苏联合

① 1943年5月在苏联的梁赞地区组建了以波兰民族英雄科希秋什科命名的波兰第一步兵师。此后，到1944年初，又在苏联境内组建了波兰第二、第三步兵师，并由三个师组成波兰第一军，官兵25000人。

② 1943年底，在苏联境内成立并活动的波兰爱国者组织“波兰爱国者联盟”拟议建立波兰民族委员会，以便在苏军解放的波兰地区行使行政权。同年12月25日，波兰爱国者联盟组成筹备委员会，拟定了成立波兰民族委员会的具体纲领和方案。后在与波兰国内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协商此事时，遭到后者的反对。1944年1月1日，以波兰工人党为主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华沙宣告成立，波兰爱国者联盟承认其为波兰人民惟一合法政权，随放弃了组建波兰民族委员会的计划。

③ 指在苏联的波兰第一军。

作的纲领，团结了成千上万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波兰人；

2. 协助在苏联组建波兰军团，并为对士兵进行与红军一起同希特勒分子斗争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培训提供了保证。

军队里和爱国者联盟中的共产党人的工作各自为政，缺乏组织，缺乏协调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大和形势的复杂化，消极现象在增长：

1. 波兰爱国者联盟中的共产党员没能表现出足够的政治主动性，没能克服组织上的混乱和散漫，因此没能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扩大这一运动的范围和突击性的力量。

2. 波兰军团中的共产党员对所出现的反民主的、与对苏联友好不相符的倾向（波兰东部边界^①的态度基本正确），但是对这些倾向未能团结一致地反击。也有过思想不一致（第1师纲领），甚至个别的政治退化的情况。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员缺乏组织和领导核心。

当前正面临建立波兰民族委员会和准备波兰武装力量开进波兰领土的复杂任务，波兰共产党员缺乏组织的情况可能导致苏联境内现有的波兰各种政治组织和军队不能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甚至可能出现更危险的情况，即这些政治组织和武装将被敌视苏联的力量所利用。毫无疑问，这种危险现在就已经存在了。当军团一旦开进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和随后的波兰领土，将会受到在这里活动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这种危险便会急剧增长。在波兰解放区成立的波兰民族委员会的所有机构毫无疑问也将感受

^① 指苏联与波兰之间的边界。1939年9月17日，苏联出兵进占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苏波边界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改变。此后苏联一直坚持这条边界线。对此，波兰人从感情上难以接受。

到这类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团结和最大限度的动员全部党的积极分子力量，加强党对抗德民族解放运动的有力领导，调动波兰各阶层人民群众对其解放者——红军的热情，在民族阵线范围内扩大和巩固群众性反法西斯的民主运动，才能保证当前任务的解决。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确信，建立在苏联的波共产党员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鉴于即将开赴波兰境内和与波兰境内党组织的密切配合行动的必要性，我们想把这一共产党人组织作为苏联境内波兰工人党的国外（波兰以外）组织。

我们认为，首先必须成立由 7 个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任务是：

1. 领导在波兰民族委员会、波兰爱国者联盟、相关组织以及波兰军团中的波兰共产党员的工作。

2. 在所有政治工作中，包括当红军进入波兰国境后在波兰各解放地区内，保证与波兰工人党相互配合。

委员会首先将在莫斯科的波兰民族委员会和波兰爱国者联盟内成立一个范围较小的组织，吸收经过考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在苏联和波兰表现忠诚、积极和政治上经得住考验的同情者参加。

军队中建立的组织必须考虑在苏联的波兰军团的特殊条件。波兰军团中党的领导通过军团中政治部门和指挥员中的共产党员执行自己的任务。

和联共（布）党员的相互配合要进行特别协调。

党组织的工作方式不予公开。

组织委员会的任命和工作将在联共（布）中央的领导下进行。

我们相信，这些措施将使工作得到根本改善，从而有助于完成改变波兰政治结构和建立为争取民主的、对苏联友好的波兰而斗争

的广泛的民族阵线这一极为复杂的任务。

斯韦尔切夫斯基、梅特科夫斯基、明茨、贝尔曼、韦尔布洛夫斯基、斯克舍舍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卡娅。^①

1944年1月10日于莫斯科

① 卡罗利·斯韦尔切夫斯基，波兰军事领导人，少将，当时任波兰第一军团副军长；梅切斯拉夫·梅特科夫斯基，1929年来苏联，当时任波兰第一军团参谋部少校；西拉雷·明茨，波兰爱国者联盟成员，波兰第二步兵师政治教育处主任；雅库布·贝尔曼，波兰爱国者联盟创始人之一，科什秋什科师无线电台工作人员；斯捷凡·韦尔布洛夫斯基，波兰爱国者联盟所办“自由波兰”周刊编辑部成员；斯坦尼斯拉夫·斯克舍舍夫斯基，在苏波兰儿童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波兰爱国者联盟文化教育处领导人；万达·华西列夫斯卡娅，波兰政治活动家和作家，1939年来苏联，波兰爱国者联盟创始人之一及总管理委员会成员。

№01765

哥穆尔卡^① 就波兰政治形势
写给马努伊尔斯基^② 的报告摘要

（1944年1月12日）

国内政治情况概述

国内政治生活中有两个问题占主要地位：1) 占领者大规模残暴的恐怖活动；2) 对苏联的态度。

送呈的材料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这些问题。在观察波兰社会的情绪的时候，可以发现，对苏联的态度有一个向好的方面变化的发展过程。在希特勒令人发指的恐怖活动面前，把布尔什维主义当作吓人的东西对波兰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小。即便是在敌视苏维埃制度的社会阶层中，等待红军的到来，也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大家已不再相信还会有什么别的军队能把波兰人民从希特勒的占领下解放出

① 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波兰著名政治家。1943年11月起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内化名“韦斯瓦夫”。

② 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马努伊尔斯基，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1883年出生，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42～1944年在联共（布）中央和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工作。

来。莫斯科会议^①和德黑兰会议^②对发展对待苏联良好态度这一过程有巨大影响。因为可以发现，在整个波兰独立时期实行的、在德国占领期间又被各种政治派别的地下报刊狂热鼓噪的对苏联的敌对宣传，使波兰社会相当大一部分形成对苏联的坚决敌视，甚至在工人中对苏联不友好的情绪也很强烈。由于缺少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工人政党^③，反动派比较容易掀起反苏浪潮。因此，已经发生的变化和其发展进程，使社会中落后的反动的法西斯萨纳奇^④分子感到恐惧。反动派面临两种可能：与德国人合作，或是长期流亡。前一种可能不现实，因为占领军对人民的恐怖行动使其化为乌有[……]。只剩下第二种可能，对此波兰反动派企图不惜任何代价地争取这种可能。反动派对英美的援助还抱有希望，认为这种援助能够在波兰劳动人民面前保护他们。他们根据自己的政治盘算得出结论，组织反对可能诞生的、有波兰工人党代表参加的、对苏联将持友好态度的政府的武装暴动，可以促使英美进行干涉，这有利于为反动派重新掌权创造条件。因此波兰反动派的反苏活动没有削弱，而是急剧加强了，因此，他们把用一切手段与波兰工人党斗争，摆上了首要位置[……]。

① 指1943年10月下旬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赫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加快对德战争进程及战后欧洲安排问题。

② 指1943年11月底至12月初，苏、美、英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会议。这是三国首脑的第一次会晤，会议讨论了一系列重大军事、政治问题，其中在关于波兰疆界问题上，三国首脑原则同意维持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波兰东部边界，把西部边界向西推移以作补偿的方案。

③ 这里指波兰共产党。波兰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12月，当时称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25年2月改名为波兰共产党。1938年初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解散。

④ 波文原义为健全化，整顿。1926年当时在野的波兰军方实力派人物毕苏斯基提出这一口号，以争取社会支持。1925年5月，毕苏斯基执政后，利用一批军官实行独裁统治，“萨纳奇”随后成为毕苏斯基政权及其支持者的代名词。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①

波兰工人党对建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表现出主动性是出于一系列原因。首先和主要的原因是，那些组成所谓“大四角”的政治集团，即国家民主派、自由平等独立派、劳动党以及农民党中具有反动情绪的领袖，把持了代表人民的权利，并在国内行使着权力，这些党派的联合宣言把所有其他作为将决定祖国和人民命运力量的政治派别，都置于非法地位。在波兰工人党和这些代表们之间达成协议的一切努力失败 [……] 以后，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的呼声形成了普遍的要求。

建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第二个要素是，采取这一步骤的国内外先决条件成熟了。虽然，其他政党的政治领导层不同意建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但是在这些党的基层组织中，考虑到流亡国外中心的垮台，关于在国内建立人民的领导核心的问题却酝酿成熟了。[……] 根据和这些党的高层领导核心的协议，波兰工人党不能提出建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决定建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问题时，波兰工人党是从走在群众运动的前面，而不是做群众尾巴的职责出发的。[……]

波兰工人党在建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考虑的第三个要素是，必须向盟国表明，波兰不同意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② 所代表的政

① 由波兰爱国民主党派组成的代行议会职能的政权机构。1944年1月1日成立，参加的有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左派——波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农民党等。波兰工人党曾争取其他党派，包括资产阶级右翼党派共同促成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但未成功。波兰工人党的鲍·贝鲁特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组成自己的武装力量——人民军。不久，波兰爱国者联盟承认其为波兰人民惟一合法政权。

② 波兰被德国占领后，波兰总统和一部分原政府官员在巴黎组成波兰流亡政府，1940年6月迁往伦敦。苏德战争爆发前奉行反德反苏的“两个敌人”政策；苏德战争爆发后，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但1943年苏联又借故与其断交。

治路线，不承认它是自己的代表。这首先是指对待苏联的政治路线，而在国内问题上是指从与红军合作的角度与占领军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

在建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过程中，波兰工人党的出发点是，涉及到国家的各种问题，只能由在国内建立的机构或由国家指定的机构来解决。因为只有这样的机构能更好地了解群众的真实情绪，并为群众所承认。因此波兰工人党把成立临时政府的问题交由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全权处理。现在很难预测建立该政府的时机，因为现在我们面临许多不明因素。波兰工人党有一点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实现我们提出的任务和目的的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大的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广大群众团结在人民代表会议周围。波兰工人党的政治打算还来自于红军为驱逐德寇，将进入波兰境内，这将极大减轻所有爱好自由的民主进步力量在反对法西斯和波兰国内外反动分子斗争中的困难 [……]

尽管工作条件极为艰难，我们将成长为国内决定性力量。这给我们带来欣慰，也是我们的骄傲！

致以无产阶级的敬礼

韦斯瓦夫

1944年1月12日

№01766

季米特洛夫就拟议中的波兰 共产党中央局的组成问题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1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

在我们对现有的波兰籍干部进行仔细的调查后发现，他们的数量很少，他们中最适合进入中央局的扎瓦茨基和斯韦尔切夫斯基不能调动，不然将会给波兰军团带来很大损失。

以前提过的列维科夫斯基和斯克舍舍夫斯基明显不适合当中央局委员，他们作为候选人的提名没有得到一个波兰同志的支持。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尽管不太强，中央局仍可由下列成员组成：

1. 拉德凯维奇^①，波兰人（书记）
2. 华西列夫斯卡娅；
3. 斯韦尔切夫斯基，波兰人；
4. 扎瓦茨基，波兰人；
5. 贝尔曼，犹太人；
（或明茨，犹太人）。

斯韦尔切夫斯基和扎瓦茨基参加中央局，但保留其在波兰军团中的职务，而要解除拉德凯维奇在波兰第二师中的职务。

华西列夫斯卡娅和其他波兰同志强烈要求中央局成员为7人，

^① 波兰爱国者联盟活动家之一，当时任波兰第二步兵师第2轻炮团主管政治教育工作的副团长。

包括两名犹太人——贝尔曼和明茨。

波兰同志一起提出了出席选举中央局会议的人员名单。名单附上。

为召开会议，应从波兰军团中抽调下列同志：

1. 斯韦尔切夫斯基
2. 拉德凯维奇
3. 维塔舍夫斯基
4. 吉布涅尔
5. 奥哈布^①
6. 扎姆勃罗夫斯基^②
7. 梅特科夫斯基

我们请求茹科夫^③同志迅速尽快把上述同志调来。

季米特洛夫^④

1944年1月18日

① 波兰爱国者联盟和波兰第一师组织者之一，当时任波兰第三师主管政治教育部门的副师长。

② 波兰爱国者联盟活动家，当时任波兰第一师政治教育部主任。

③ 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三级政治委员，负责管理在苏联的外国军事力量事务。

④ 哥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局负责人。

№01767

季米特洛夫就组建波兰共产党中央局的 必要性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1月24日）

斯大林同志，副本给莫洛托夫同志：

为了更好地组织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员的工作及其在印刷、宣传和帮助（波兰）工人党和波兰国内的游击队运动，应建立波兰共产党中央局。

波兰共产党中央局的职责见报告副件。

经过对我们现有波兰干部的认真审查，我们认为由下列人员组成中央局是适宜的：

1. 扎瓦茨基·阿·拉·——波兰人（书记）；
2. 拉德凯维奇·斯·弗·——波兰人（副书记）；
3. 斯韦尔切夫斯基·卡·卡·——波兰人；
4. 华西列夫斯卡娅；
5. 贝尔曼 ——波兰犹太人。

没有更适合的中央局候选人了。

中央局将向各波兰机构中（波兰爱国者联盟、波兰编辑部、波兰军团等）派出自己的代表。

现请联共（布）中央批准：

1. 上述波兰共产党中央局成员名单；
2. 波兰共产党中央局规章方案。

我认为就组建中央局和确定其职责问题召开波兰共产党员专门

会议是不适宜的。

为准备本建议，曾与所有最积极的波兰同志进行过商议。

关于波兰共产党中央局规章方案

组建波兰共产党中央局是为了完成下述任务：

1. 全力帮助波兰工人党及其地方组织进行政治工作和开展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游击运动；

2. 通过相应机构，全力帮助波兰境内的游击运动（派遣人员、运送武器和弹药）；

3. 协助波兰爱国者联盟制订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

4. 通过波兰爱国者联盟对“自由波兰”联盟实行思想领导。

5. 对科什秋什科无线电台波兰文广播编辑部工作进行思想领导。

6. 全力帮助在苏联的波兰部队文化工作人员开展政治工作：确定在波兰部队中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协助出版有关书籍，组织政治活动等。

7. 中央局向波兰各机关（波兰爱国者联盟、波兰编辑部、波兰军团等）委派自己的代表。^①

^① 1944年1月26日，联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一方案和波兰共产党中央局的组成人选。2月2日，波兰共产党中央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01768

**菲京就有关波兰工人党某些
领导人的消息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1944年2月9日）

季米特洛夫同志：

据我谍报人员自华沙报告，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人是“韦斯瓦夫”和“马尔塔”。

韦斯瓦夫于1942年12月被选入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波兰工人党发出的电报均由“韦斯瓦夫”署名。现将上述情况报告给你们，并将你们所知的有关“韦斯瓦夫”和“马尔塔”的情况告诉我们。

菲京^①

1944年2月9日

① П.М. 菲京，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一局负责人。

№01769

别洛夫关于“韦斯瓦夫”和“马尔塔”的情况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1944年2月14日)

季米特洛夫同志：

尚不知道使用“韦斯瓦夫”^①作为姓、名或化名的波兰共产党员。在诺沃特科小组^②中有一位斯克涅茨基·切斯拉夫·埃蒙德维奇同志，他的名字和韦斯瓦夫非常相近，只差一个字母，没有有关他在国内被捕的消息。

由这里回到国内的女共产党员没有使用马尔塔这个姓、名或化名的。我们知道斯哈布·尤素福·斯坦尼斯拉沃夫娜曾用过“马尔塔”这一化名，1937年前她曾在波兰共产党内积极工作，在国际列宁学校^③学习过，曾被选入波兰共产党区和州的委员会，她是波兰人。1939年由于战争的原因没有来苏联而留在波兰。可能她被吸收进入波兰工人党领导层。

别洛夫

1944年2月14日

① 即哥穆尔卡，见前注。

② 指以马尔茨利·诺沃特科为首的波兰工人党发起小组。该小组自1941年底潜入波兰德战区活动。

③ 1925~1938年在苏联开办，主要为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培训干部。

№01770

**马努伊尔斯基就向卡斯曼询问波兰工人党对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态度的必要性给
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1944年2月24日）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哥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

考虑到波兰共产党人的宗派主义，我认为给卡斯曼^①发出这样的问询电报是适合的。如果你同意，请将这封电报送交莫洛托夫同志批准。

我们担心波兰工人党对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宗派主义方针，它表现在突出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对其他党派和组织参加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估计不足，这可能导致政治偏差，造成一种假象，仿佛波兰工人党推行使波兰“苏维埃化”的方针，而事实不是、也不应当是这样的。例如为什么要把人民代表会议采取的措施称作法令？当在国内现在还没有波兰军队时，波兰工人党是否太急于建立司令部了？请答复。

① 列文·卡斯曼，原共产国际干部局工作人员。1943年下半年被派往波兰组织游击运动。

№01771

在波兰境内组织游击运动和党的工作计划措施

(1944年2月28日)

绝密

组建并向波兰派遣专门情报小组的组织计划

为了更加积极开展游击运动、党的工作并及时反映波兰的政治情况，组织5个独立活动的小组，派往波兰、华沙周围有条件组织大规模游击运动的地区，如明斯克-莫佐韦茨克、科泽尼采、维什库夫、卢科夫和加尔沃林。这些地区已有规模不大的队伍，它们需要军事和政治方面的领导。

各小组组成：

- 1) 领导人——1名苏联军官
- 2) 报务员——苏联无线电报务员1名
- 3) 另配备1名负责与波兰工人党联系的人员——1名波兰同志。

各小组独立进行工作。互不联系，互不隶属，只与莫斯科联系，是我们的情报点。

各小组准备好后，经我们在维什库夫和卢布林现有的秘密接头地点，将它们派往上述地区，为使游击队运动活跃起来，随着分队的增多，要为这些小组运送武器弹药。

这些独立小组，除在当地进行军事和政治工作以外，首先是作为收集波兰国内情况的情报站。它应当认真核实这些情报，然后发往莫斯科。以后随着苏联军队向西推进，这些军事和情报小组将从上述地区向西移动，前往经常爆发有组织的反德起义的地区——罗兹、库特诺、普洛茨克。

派往波兰的每个小组配备武器、无线电发报机、密码、至少1000元美元和其他游击运动中必需的物资。

莫罗佐夫^①

1944年2月28日

^① 当时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所属第100研究所所长。

№01772

莫罗佐夫关于“波兰特别小组”的情况报告

(1944年2月29日)

绝密

[……] 1943年6月，为了建立与莫斯科的并行联系，并建立由波兰共产党员（党校毕业生）组成的后备小组，以备不时之需，已经组建了小组并由季米特洛夫同志批准派往波兰（名单附后）。

这个小组受命积极开展游击运动和党的政治工作。经与波诺马连科^①同志商定，小组被临时派至在明斯克的白俄罗斯游击运动司令部所属游击队的活动地区，以便从白俄罗斯游击队中选出必要的经过考查的波兰游击队员，组成若干8至10人的小组。每个小组由上述派遣小组成员担任党的领导人，并把这些小组连同武器送往波兰适于开展大规模游击活动的地区，这些小组将在那里壮大为更大的游击队。

由卡斯曼同志领导的16人游击派遣小组一切顺利，已从1943年8月开始工作。他们挑选了近90名波兰游击队员，领取了武器，越过了布格河，前往卢布林地区。

到达卢布林省游击运动地区后，通过游击队员与波兰工人党领

^① 潘·孔·波诺马连科，当时任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游击运动中央参谋部参谋长，中将。

导同志取得了联系，然而恰在此时芬特尔^①被捕，华沙的波兰工人党组织遭到破坏。因此小组未能与中央联系上。

在留下小组中的7名党的工作人员和随同前来的42名游击队员，继续领导卢布林地区游击运动后，以卡斯曼同志为首的9人基于小组和游击队开赴华沙，但却在这里陷入德国讨伐队的包围圈。小组没有投入战斗，他们与游击队一起突围后，开往帕尔切夫游击区，与游击队在这里建立了联系，并开始领导这些游击队。

现在，这个小组在帕尔切夫的森林里已建立了一个基地，并请求向基地运送游击队所需要的武器。现已和这个小组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每日4次。这个小组至今仍未能与波兰工人党中央建立联系，它在波兰仍是一个独立小组。为了与中央建立联系，最近卡斯曼同志决定前往华沙地区，但被阻止了。决定通过与波兰工人党中央已恢复的无线电联系首先了解一下，那里由谁领导，情况如何，然后派一位下级党的工作人员代替卡斯曼去与波兰工人党中央联系。

这样，现在与波兰工人党在华沙的中央机关已建立了直接的无线电联系，并通过中央的无线台，与维什库夫（华沙以北45公里）的游击队也有了联系，去那里也有了接头地点，但是目前还不了解那里有多少游击队，他们由谁领导。

卡斯曼同志的小组与在帕尔切夫森林、帕尔切夫市和伏沃达瓦之间的地区独立于中央活动的游击队，保持着无线电联系，这些游击队归卡斯曼小组领导。此外，卡斯曼小组通过留在卢布林的7名党的工作人员与在卢布林省的游击队进行联系并领导它们。

^① 帕·芬特尔，波兰工人党著名活动家。1941年受共产国际委托秘密返回波兰组建波兰工人党；1942~1943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1943年11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并遭杀害。

我们现在已有了和游击队的接头地点。在帕尔切夫森林、维什库夫和克拉希尼克（卢布林省南部）地区有货物空投点，在华沙也有人员接头点。

为了把由于敌人逮捕而中断的无线电联系恢复成一个严密的系统，改进收集情报的状况，完善与中央及各游击区独立的领导小组已建立的联系，以及采取措施在波兰境内组织新的并行小组，必须做到：

1. 使通过华沙的无线电发报员与已恢复起来的波兰工人党的联系更积极有效，但在对密码和报务员彻底进行审查以前不再给他任何指示，而只是通过他向中央索取情报；

2. 使卡斯曼同志独立小组保持现有状态，即它与莫斯科保持独立的并行联系；

3. 把留在卢布林在该地区游击队中开展工作的小组变成独立于卡斯曼的小组，并与该小组建立直接的无线电联系；

4. 为了更积极地开展游击运动、党的工作和了解波兰国内军事和政治形势，组织5个独立小组，领导人为苏联公民、联共（布）党员，并把这些小组通过现有接头地点派遣至波兰境内（参见组织方案）。

莫罗佐夫

1944年2月29日

附 件

波兰特别小组名单

1. 维尔瓦斯
2. 维戈达
3. 布列克

4. 卡斯曼——领导人
5. 库尔良德
6. 坎德尔
7. 米哈杜
8. 克拉科夫斯基
9. 马列克
10. 施坦因贝格——无线电报务员
11. 克利亚赫斯巴利特——无线电报务员
12. 米科拉伊奇克
13. 鲁兹加
14. 图尔列斯基——报务员
15. 奥利舍夫斯卡娅

1944年2月29日

№01773

季米特洛夫、马努伊尔斯基和巴拉诺夫
就建立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
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4年3月7日）

波兰共产党中央局请求我们向联共（布）中央递交尽快解决在苏联境内建立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问题的申请。

根据我们经过情报机关证实的情报，在波兰没有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波兰境内各游击队都分散活动，由各队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没有任何一个中心协调它们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来自外部的帮助。然而，正是现在，由于红军已经逼近波兰边界，在波兰境内建立一个由统一的中央领导的大规模游击运动，与前进中的红军相互配合是尤为重要的。

中央司令部一经建立便可以用向国内输送军事干部的方式给游击运动提供重要帮助。我们知道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游击队中有近1000名的波兰人，在这些游击队中有不少著名的波兰指挥员。在红军解放的乌克兰苏维埃联盟共和国罗文斯克和卢茨克一些地区的波兰居民中，便可找到上千的愿意和德国占领军做斗争的波兰人。此外，国家安全人民委员茹科夫现正在苏联境内培训一支近千人的波兰特别空降突击队^①。所有这些人被送往波兰国内，毫无疑问将为大规模开展游击运动服务。在苏联境内的“波兰游击运动司令

^① 该部队于1943年10月组建，1944年3月改称波兰独立特别旅。

部”能够在我们的帮助下安排好对游击队的武器弹药和一切必要的军用品的供应，并还能使波兰游击队的活动与红军的军事行动相互协调。

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建立，它可以依靠波兰国内广泛的情报来源，这有助于消除波兰共产党中央局和波兰爱国者联盟与国内相脱节的状况。目前波兰共产党中央局和波兰爱国者联盟与本国的联系很弱，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很不可靠，因此对我国、对红军都不能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例如，不久以前我们曾试图了解在波兰国内诞生并已实行了若干政治和军事措施的所谓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成员和政治性质，但我们在这方面的一切努力毫无结果。如果当时就有一个其触角伸及波兰各地区的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了。

根据上述种种考虑，我们认为，建立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是出自我们政治和军事利益考虑的。因此，我们支持波兰共产党中央局关于在最短期间内在苏联境内建立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请求。但是，考虑到波兰同志缺乏领导大规模游击斗争的经验，我们认为，为了帮助他们，调去一个受过游击战争训练的苏联军事人员小组是适宜的。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请求联共（布）中央：

1. 同意波兰共产党中央局关于建立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请求，司令部所在地定在莫斯科。

2. 批准普利特茨基^①为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司令员，谢利茨基为作战处长（现为维布斯克州扎斯洛诺夫游击旅旅长和谢尼茨基

^① C.O. 普利特茨基，苏联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工作人员，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1944年8月，任波兰军队总司令部所属敌后游击队物资供应基地主任，军衔上校。

区党委书记)、白俄罗斯游击司令部联络处长布德林同志为联络处长,费多秀克同志(原布列斯特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现任布列斯特州季温斯克地下区委书记)为情报处长,现在敌后工作的察留克同志为行政后勤处长。

3. 责成白俄罗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两周内将在两地游击队中的波兰同志调出组成若干特别分队,给他们配备有经验的坚强的指挥员,按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指示,在波兰境内使用这些分队。

4. 建议茹科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同志从波兰军团中调出一个特别空降突击营交由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指挥。

5. 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设在奥哈布大街3号原政治侨民大楼。

6. 责成炮兵元帅雅科夫列夫同志调拨可供装备3万人的武器,交给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支配,数量如下:

步枪 16500 支

冲锋枪 10000 支

轻机枪 500 支

50 毫米迫击炮 500 门

反坦克枪 300 支

手榴弹 6000 枚

指挥员用手枪 3000 支

芬兰刀 3000 把

反步兵地雷 10000 枚

磁性地雷 5000 枚

炸药 30 吨

并按上述各种武器配备所需的弹药基数。

7. 责成远程航空兵司令空军元帅戈洛瓦诺夫同志为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提供200架次飞机以供投送人员和物资之用。

8. 责成通信兵元帅佩列瑟普金同志为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组建无线电网，并提供 60 部游击队用无线电台。

9. 责成红军卫生局长卫生勤务中将斯米尔诺夫同志给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配备 60 名医生，200 名医士和护士，以及供 60 支游击队使用的药剂。

10. 责成苏联财政人民委员兹韦列夫同志在国家银行在普里特茨基名下开设账户，存入 1 万美元、5 万波兰兹罗提和 40 万在波兰流通的德国马克。

11. 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全部支出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特别补充预算中支付。

季米特洛夫、马努伊尔斯基、巴拉诺夫^①

1944 年 3 月 7 日^②

① Л.С. 巴拉诺夫，1941～1944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副主任。

② 1944 年 4 月 3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建立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决议。

№01774

菲京就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致电博·德罗布涅尔 建议他加入该党一事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1944年3月11—12日)

季米特洛夫同志

我们从我方驻华沙人员那里得到了拍给博列斯拉夫·德罗布涅尔^①博士的电报。

电文如下：

协调

“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②是诺·巴利茨基和基杜瓦在米·涅贾乌科夫斯基^③配合下建立的，由亚达姆·普鲁赫尼克按波兰社会党左派拉多姆代表大会纲领^④进行领导的。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您是侨民中的思想领袖。请告知您的意见。我们告诉您，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全国人民代表会议。”

菲京

1944年3月11—12日

-
- ① 博列斯拉夫·德罗布涅尔，波兰社会民主党党员，波兰爱国者联盟总管理委员会成员。
 - ② 波兰社会党左翼组成的组织，最初称波兰社会党人组织，1943年3月改为现名。
 - ③ 三人均为波兰社会党早期党员、著名活动家，在波兰占领期间被德国人杀害。
 - ④ 此次代表大会于1937年召开，以巴利茨基、普鲁赫尼克等人为首的左派支持在此之前波兰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倡议，但遭到右派的反对。

№01775

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就
在苏波兰爱国者联盟总管理委员会
全体会议决议草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4月3日）

莫洛托夫同志：

在苏波兰爱国者联盟总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944年4月3日举行，会议将讨论由中央理事会为此选出的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决议草案。

我们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将决议草案中提出的无偿没收私人地产权的要求，变为要求土地改革，以满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需求较为适宜。（第5页第2条）

请您注意下一条（同一出处）：“把现在掌握在德国国家、大托拉斯和卡特尔以及少数德国资本家手中的国家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或由国家临时管理。”实际上这里是说对大部分波兰工业实行国有化。

请您就这一问题做出指示。决议对安德尔斯军队^①在意大利境内的行动所做的正面评价值得怀疑。（“在远离波兰数千公里的意大利土地上，英勇的波兰水兵和航空兵、波兰士兵对这场斗争做出

① 瓦·安德尔斯，波兰将军。1939年9月被苏军俘虏。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受命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兰军队。1942年，任波兰第二军团军长的安德尔斯在波兰流亡政府和英国的鼓动下，他率部离开苏联，先后在中东、意大利与西方盟军一起对轴心国作战。

了自己的贡献。”）（第2页）

建议将这一评价从决议草案中删除。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建议，我们可以通过波兰共产党中央局对决议草案做出相应的修改。

季米特洛夫、马努伊尔斯基

1944年4月3日

№01776

菲京就波兰工人党中央和卡斯曼的相互 关系问题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1944年4月6日）

季米特洛夫同志：

我们收到华沙我方人员的电报，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电报中向您提出请求。

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请您使卡斯曼服从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领导，或是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服从卡斯曼领导，他们认为，与卡斯曼也会发生与老诺沃特科^①发生的事情。

菲京

1944年4月6日

① 老诺沃特科即马·诺沃特科，是波兰工人党创始人，中央书记处书记。1942年11月28日，另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鲍·莫沃耶茨，由于与马·诺沃特科不和及出于争权夺利的目的，策划刺杀了马·诺沃特科，使波兰工人党遭到了一次来自内部的严重打击。

№01777

菲京就卡斯曼小组问题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1944年4月15日)

季米特洛夫同志：

我们收到华沙我方人员下述消息：德国军事情报机关得到了有关波兰工人党活动的报告，报告中有消息说，雅诺夫小组^①在卢布林省活动，这一小组反对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指责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推行宗派主义政策。

菲京

1944年4月15日

^① 即卡斯曼小组。

№01778

菲京就得到的有关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 成员情况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1944年5月8~9日）

季米特洛夫同志：

从我们在华沙的人员处收到有关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材料：

1. 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书记，1934~1935年毕业于莫斯科党校^①，化名韦斯瓦夫，1941年5月被吸收为联共（布）党员。

2. 弗兰茨什克·尤兹维耶克——“人民军”^②参谋长，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9~1930年曾在莫斯科。

3. 博列斯拉夫·别鲁特（可能是别尔茨特）——联共（布）党员，化名“伊瓦纽克”。

4. 洛加·伊克纳茨——中央委员，化名“格里高里84”。

5. 雷赫尔霍夫斯基·希尔亚^③——中央委员，农家子弟，1931年起为波兰共产党党员、自建党时起就是波兰工人党党员，未到过莫斯科。

菲京

1944年5月8~9日

① 即著名的列宁国际学校。

② 波兰工人党领导的国内人民武装力量。它的主体是波兰工人党于1942年组建的波兰人民近卫军。人民军由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于1944年1月1日下令建立。

③ 应为赫尔霍夫斯基·希尔亚雷。

№01779

巴拉诺夫就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团 在莫斯科逗留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5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

向您报告与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团会见情况，代表团一行4人，在工农红军情报局的帮助下于5月16日晚抵达莫斯科。

5月17日在工农红军情报局别墅（谢列布里亚松林内）会见了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团。

参加会见的有下列同志：万达·华西列夫斯卡娅、扎瓦茨基、拉德凯维奇、贝尔曼、谢尔斯特涅夫少将和奥夫钦尼科夫上校（工农红军情报局）。

为了避免代表团对我提出意想不到的问题，我比前面提到的同志晚1小时到别墅，并向代表团介绍说我是有关政府机关派来接待代表团并了解代表团来莫斯科目的的。

会谈中我向代表团成员提出了以下问题：

1. 代表团何时何地出发？

答：两个月前从华沙出发。

2. 代表们代表什么组织，有什么目的和有哪些权限？

答：代表团代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它是波兰一切表示准备为争取自由民主波兰而与德国占领者进行斗争的民主力量的联合中心。代表团拥有正式受权与苏联政府和在苏联境内各波兰组织建立联系，以制定反对德国占领者斗争的共同措施。代表团希望获得必

要的帮助，主要是从苏联政府方面得到武器。

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否在波兰进行着实际活动，还是仅仅宣布自己的存在？

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存在并在团结全国一切民主力量方面进行着实际工作，它已举行过两次全体会议，一次在12月，一次在1月，两次会议都在华沙举行。

4. 在代表团由华沙来莫斯科旅途中，是否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过联系，代表团是否了解最近两个月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什么活动？

答：没有联系，但我们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莫斯科有联系。从华沙派我们出来时，告诉过我们这一点。

5. 代表团是否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

答：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部成员，只知道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别人则不知道这一部分成员。大家一起可以说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成员，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密。

6. 代表团打算在苏联逗留多长时间，在这方面代表团是否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指示？

答：我们每一个人全都希望尽快回去，因为我们知道那里需要我们，但我们回国将取决于我们在这里能否尽快完成我们承担的全部任务。

几乎所有问题都是由代表团团长马里扬纳斯·斯彼哈利斯基^①同志回答的，其他的人对他所说的做了某些补充和解释。

会见结束时，我请代表团各位成员告知本人的姓名及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的职务。

^① 应为斯彼哈利斯基·马里安，人民近卫军参谋长。

代表们告诉我，他们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在其中都起着积极作用。

1. 斯彼哈利斯基·马里安（代表团团长）——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人民近卫军总司令部成员。

2. 华西列夫斯基·塔杰乌什^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主席团成员，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

3. 莫拉夫斯基·扬·斯特凡^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员、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

4. 卡齐米尔·西多尔——波兰工人党党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员、卢布林区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和卢布林区人民近卫军参谋长。

代表团情绪很好。对接待很满意。从会谈中我有这样的印象，代表团是带着对苏联真诚的友情和与苏联政府和波兰爱国者联盟就同德国占领者进行共同的斗争的问题建立紧密联系的愿望前来的。

巴拉诺夫

1944年5月18日

① 即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爱德华，波兰社会党左派著名活动家，当时任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副主席，后成为主席。文件中此处有误。

② 应为哈涅曼·扬·斯特凡，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No 01780

贝鲁特^① 就波兰工人党中央 委员会的情况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1944年6月10日）

尊敬的同志：

我认为我有责任让您了解，我们党领导机关中出现的令人忧虑的情况。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缺乏应有的团结和集体性。中央书记^②不称职。他不是团结，而是分裂中央委员会。需要您迅速帮助解决这种危机状态。可是中央书记不履行中央委员会早就做出的派1名中央委员向您汇报的决定，借口是这将使工作很紧张时一个人长期不在。书记早就有独裁的渴望。这恰恰破坏了中央委员会工作中的集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采取的政治方针正确坚定，这还不那么危险。但他却不断地忽左忽右——由宗派主义到极端的机会主义，然后再走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我们的盟友——农民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脱离我们的危险。在此之前，这些动摇都是用领导集体决定的正常方法调整的。然而现在书记利用了一些情况（一位中央委员需要到区里巡视，另一位中央委员去向您报告工作——尽管这次并未成行，却借此进行了某些改组）建立了自己的集团。这个

① 鲍莱斯瓦夫·贝鲁特，波兰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曾在莫斯科列宁国际学校学习；大战爆发后来到苏联，1943年春回国，任波兰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44年1月被选为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化名“伊瓦纽克”“托马什”等。

② 指哥穆尔卡。

三人小组^①的特点是思想上的无原则性。在由6位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里，三人小组能够决定书记——三人小组头儿——想决定的一切。不久以前这个“多数”准备追随支持伦敦政府的反动集团。所幸这一危险被避免了，但在新的情况下它还会以新的形式复发。所有这一切要求与您一起充分讨论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请求尽快派去一位中央委员或是您派一位特别全权代表来我们这里。

我们国内的运动和反对占领者的斗争正顺利发展。随着反动的反苏阵营内部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有了各民主力量进一步团结的前景和条件。但是这种情况要求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毅力和善于分辨事物，灵活提出受群众欢迎的口号及组织、掌握已经形成的良好的政治情绪的方法。同时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绝不可丧失独立的思想和政治面貌。中央委员会新的“多数”正是对这一危险估计不足。在像我们现在这种极其紧张、责任重大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工作中的派别方法无论如何都是极端危险的。

因此，在这种危险还没来得及发展的时候，我们向您发出有关这一危险的信号，请您帮助和配合行动。

致以深深的敬意

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自1943年11月起）

伊瓦纽克（托马什）

1944年6月10日

^① 指哥穆尔卡、阿·科瓦尔斯基、伊·罗加-索维斯基。

№01781

索科洛夫斯基就波兰第一集团军政治教育部情况 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944年6月13日）

在苏联建立的由波兰工人党领导的部队。1943年8月由科什秋什科第一师扩编组成了波兰第一军，后人员继续增加，1944年4月改变番号为波兰第一集团军，列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序列。就波兰第一集团军政治教育部情况

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自1944年4月29日起我以组织监察处监察员的身份，在波兰集团军政治部工作，因此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政治部门领导成员的情况和该部门的缺点，我想就此向党中央递交这份报告。

首先应当指出的一个事实是，无论是在军长贝林格将军^①那里，还是波兰集团军军官和士兵那里，政工干部都没有威信。这不仅是因为在旧波兰军队里不设政治工作部门。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政治教育军官无论是军事素质还是政治道德方面都比战斗军官差得多。在军政治部、师和下一级的政治工作部门中充斥着大量仇视波兰人民的托洛茨基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甚至是一些游手好闲、追求个人名利的人和投机倒把分子，这些人把政工部门看做是

^① 西格蒙特·贝林格，波兰军事领导人，1939年任波军中校团长，后流亡苏联，1941年加入安德尔斯在苏组建的波兰军队，但拒绝离开苏联。1943年任科什秋什科第一师少将师长，后任波兰第一军军长，波兰第一集团军司令员。

安乐窝、混日子和发财的地方。

我举一些事实。在波兰集团军政治部组织监察处有一个监察叫维斯利茨基，他的父亲是一个大工厂主和银行家，战前在波兰议会中代表犹太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反苏集团。维斯利茨基本人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员，善于钻营的人和投机倒把分子。维斯利茨基在任第3炮兵团主管政工的副团长期间，曾倒卖国家财产，利用团里的汽车为私人和机关运输木材和其他物资，结果在团里工作两个月里就挣了几万卢布，给自己缝制了三套毛料西装、三双铬鞣革皮靴，给亲属寄出5个装有脂油和其他食品的包裹。

本应把投机倒把分子维斯利茨基送交法庭并立即撤销他在政工部门的工作，但军政治部主任梅特科夫斯基中校却把维斯利茨基提升为集团军政治部监察员。5月末维斯利茨基到第3步兵师检查政治工作。知道维斯利茨基是一个投机倒把分子的第3步兵师的军官，对派他来检查他们的工作很气愤。我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军政治部主任梅特科夫斯基，他回答说军政治部需要维斯利茨基这样的干部。

像基层政工干部一样，军政治部领导干部中的许多谎言、欺骗、两面派作风，最终极大损害了贝林格将军和波兰军官的威信。根据梅特科夫斯基的指示，所有在政工部门工作的犹太人（在政工部门中犹太人占绝大多数）在填表时都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说成波兰人。有时犹太政工人员甚至到天主教堂去做祈祷和划十字，引起波兰信徒的厌恶和仇恨。事情发展到甚至党的文件里或填写入党表格中，所有犹太人在“民族”一栏中都写“波兰人”。

梅特科夫斯基给上级机关的各种报告中也竭力掩饰政治工作部门中有大量犹太人的事实。实际上，直至1944年6月1日止，波兰集团军政治部政工部门的民族成分是：政治部44名军官（包括军报编辑部和波兰军人之家的领导）中，有34名犹太人、5名来

自苏联的波兰人、5名来自波兰的波兰人，而且几乎所有领导职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各处处长、军报编辑）全由犹太人担任。各师、旅的副职也是犹太人，只有1名加夫龙斯基中校是例外（第2步兵师）。在各师政治部28位负责干部中有17个犹太人，在团一级43名政治工作干部中有31名是犹太人。在一些团的团政治机关中（4个反坦克团、5个步兵团）没有一名波兰人。86名营级副职中有57名犹太人。

军政治部领导干部（扎姆勃罗夫斯基等人）说什么波兰士兵喜欢犹太人，却仇恨派来担任政治工作的苏联籍波兰人。当然，士兵对苏联籍的波兰人存在着某种不信任，然而在工作中士兵一旦发现军官是正直、有军事素养、严格要求、又是关心人，这种不信任就会迅速消失。以下事实说明了波兰士兵对犹太政工人员的态度。

今年5月末我去第8步兵团检查工作看到，年青的波兰士兵脸上带着讽刺的表情走过犹太政工干部身边而不向他敬礼。在第8步兵团射击场上，波兰的青年士兵（其中有1名波兰游击队员）请求把他们调到没有犹太政工干部的部队去，理由是波兰军队中过去从来没有犹太人担任军官。

政工干部中的波兰人则感到自己和犹太人不平等。例如炮兵团政治处组织监察员、人民教师雷萨科夫斯基·留齐安，今年5月27日和我谈话时说，把他留在政工部门只是做做样子，任何机密的事都不跟他讲，政治部里的波兰人被当作传令兵使用，当官的全是犹太人。

人民女教师卡普察鲁夫娜·优素福（第4步兵团）6月3日和我谈话时说，连以上政工干部没有波兰人，因为这些位置都被犹太人占据了。卡普察鲁夫娜说，她不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然而她不能心平气和地地看着由犹太人领导波兰集团军，因为波兰人民对犹太人没有好感，当他们看到我们的军队由犹太人领导，就根本不会把

我们当做波兰军队来尊敬。

波兰士兵和军官对犹太族的政工干部很不信任，把他们看做是密探，不向他们表露自己的情绪。我在第8步兵团检查工作时，士兵中流传着足以产生破坏作用的谣言，说在科维利地区的我军战线对面，好像有一支由德国人组织的人数比我们多一倍的波兰军队在驻守。这些流传着大量这类谣言的连队里的犹太族政工人员，却完全不知道这类谣言。

一方面是波兰士兵对犹太族政工人员避之不及，另一方面政工部门又充斥着游手好闲和追求名利的人，他们不深入士兵的日常生活，不了解士兵的生活和战斗训练，这就造成了畸形的政治工作形式，这种情况下，政工部门游离于部队生活和战斗训练之外。

我在检查第8步兵团工作时发现，没有一位政工干部知道士兵的供应标准，而且对士兵是否得到了应得的一切也不进行监督。在该团野外作业或训练时，各连的政治副连长全都呆在坑洞里。在起床、早操、早饭时，我在士兵中没有见到一位政工干部。在我检查工作这段时间（5月15~20日），第8步兵团没有一个士兵领到给家里的证明书，政治军官没有军人家属的统计，尽管该团在1944年1月就组建了。

我在政治部工作期间，政治部主任、他的副手、各处处长，没有一次下团里、连里视察训练。政治部没人了解部队的战备状况和战斗训练计划，甚至从未谈论过这方面的问题。政治部领导干部中，除5名来自红军的军官外，在军事方面完全是外行，而且也不愿意学习军事。曾打算组织政治部军官学习军事课，但第二天就放弃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来听课。

波兰集团军许多政治军官的虚伪和两面派作风还表现在，他们拼命把自己说成是苏联的朋友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支持者，同时又竭力煽动波兰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敌视。最敌视苏联的人——犹太复国

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等等——常常自称是共产党员，甚至办理材料以“恢复”自己党内身份。

第4步兵团有一个姓泽利格尔斯基做宣传工作的军官，他自称是共产党员。他的全部工作便是收集败坏从红军来的军官名誉的材料，为此把不少有敌对情绪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拉到这件事中来。泽利格尔斯基还专门做了联共（布）党员的统计表，安排监视共产党员的一举一动。他败坏了不少优秀共产党员军官的名誉，其中第3迫击炮连长克鲁佩留克中尉便自杀了。

在第2步兵师政治部有一个担任瓦解敌人部队工作的军官叫古祖夫娜，一个大商人的女儿，以共产主义世界观自我标榜，实际上她极端仇视苏联。3月份当赫鲁晓夫^①的讲话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古祖夫娜召集了第4步兵团一批政治军官，示威式地宣称自己不同意把利沃夫和其他几个波兰城市“让给”苏联。古祖夫娜和泽利格尔斯基共同收集了败坏红军军官名誉的材料。

托洛茨基分子布龙贝格一直在第2步兵师任师政治部主任。这个托洛茨基分子制作了一种专门表格来研究红军军官。在第3步兵团任政治副团长的不断时间里，他在宣传工作中似乎为了赢得士兵的信任，多次特别强调波兰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集中营中的苦难生活^②。现在布龙贝格正在办理“恢复”党籍的材料。他是政治军官

^① 尼·谢·赫鲁晓夫，当时任联共（布）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44年3月1日，他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乌克兰自古以来的领土是根据乌克兰西部各州居民自己的意志而重新合并为统一的乌克兰苏维埃国家的，因此乌克兰人民决不允许把这部分领土从苏维埃乌克兰分离出去。乌克兰人民一定要完成把自己的乌克兰国土重新合并为统一的苏维埃乌克兰国家的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乌克兰人民一定要把历来属于乌克兰的土地——霍姆希纳、赫鲁别休夫、扎莫什奇、托马休夫和亚罗斯瓦夫并入乌克兰苏维埃国家。”

^② 1939年9月，苏联红军进入波兰后，俘虏了大批波军战俘。这些战俘被关押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特别集中营和劳动营。

学校的领导^①。

一个姓韦尔涅尔的集团军报编辑，也自称是共产党员。这个韦尔涅尔1942~1943年在全苏无线电委员会担任对外广播波兰语编辑工作中，曾企图播发有损于苏联和当时伦敦波兰流亡政府所需要的材料。目前这类错误仍然经常出现在军报中。例如5月末，集团军报在头版用蛊惑人心的词句发表文章，介绍安德尔斯军队在反对德国人斗争中的英雄主义。6月7~10日该报以特大消息的形式断言第二战场已经开辟^②，并强调指出索斯恩科夫斯基^③领导的波兰军队在第二战场参加了战斗。

也自称是共产党员的集团军报副主编普隆斯基，憎恶苏联的一切。今年5月末第8近卫坦克军军官代表团访问了该报编辑部，普隆斯基对该代表团团长近卫军少校萨韦利耶夫声称，与欧洲报刊相比，苏联报刊的水平是很低的。普隆斯基说，苏联报刊十分枯燥乏味，没人愿意读。萨韦利耶夫少校反驳了他，并向他指出苏联公民为了买报，有时排队站几个小时。普隆斯基对此回答说，这根本说明不了苏联公民对报刊的兴趣，而只是说明苏联没有包装纸。

政治部领导撒谎习以为常，他们现在甚至还在自我欺骗。例如，这期间根本没有任何一处波兰集团军人之家，也没有人为集团军人之家的的工作，但按规定波兰集团军人之家应有的编制却已占满了。一些和艺术毫无关系的人，在政治部的命令中却被称做是演员、艺术家、音乐家。波兰集团军剧团就这样占满了编制。因此，在这个臆造的剧团存在的整整一年当中，没有排练一场令人满意的

① 此处指第3步兵师的政治教育军官学校。布龙贝格自1944年6~8月任该校校长。

② 实际上，英美军队于1944年6月6日实施的诺曼底登陆，拉开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帷幕。

③ 卡吉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波兰军事领导人，伦敦波兰流亡政府成员，当时任在西方的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

音乐节目，没有演出一个剧目。

曾多次打算清理政治机关，清除机关中明显的敌对分子，并调整其民族成分，调一些从红军来的政工干部到波兰集团军，但都遭到政治部（以前是军政治部）领导的坚决反对。

1943年11月，加夫伦斯基中校曾大胆提拔了一些忠诚的和思想意识与我们相近的波兰族士兵到政治工作岗位上来，以改善第2步兵师政工干部的组成。出于同一目的，他拒绝了梅特科夫斯基派来的作政治副团长的维斯利茨基上任，还把几个犹太族的政工干部打发到军政治部。梅特科夫斯基的回答是大肆进行报复，曾打算撤消加夫伦斯基在第2步兵师政工部门的领导职务。在梅特科夫斯基授意下，加夫伦斯基的部下（阿科斯特尔等）蔑视自己的领导，所有问题都不与加夫伦斯基商量，直接找军政治部，选派政工干部并安排他们工作，结果一些团里（如第5步兵团）挑选的政工干部全是犹太人。

政治部的领导干部怕从红军来的干部成长和提升，因此千方百计阻碍他们发展。给每位新来的政工干部制造舆论，说他们是低级动物，没有教养，不会待人处事等等。例如科尔涅留克中校^①到波兰集团军政治部任职的第一天就传开了，说他不会为人处事，粗暴，一点不懂波兰事务。一个多月里没有给科尔涅留克请波兰语女教师。梅特科夫斯基和扎姆勃罗夫斯基没有向科尔涅留克介绍当前工作，实际上是不让他参与政治部的领导工作。

从红军调来做政治工作的库钦斯基大尉到部队工作的第一天起，便遭到中伤。第4步兵团宣传监察员泽利格爾斯基造谣说，库钦斯基大尉在五一节团里的庆祝大会上说，“共产党将教会波兰人生活。”事实上库钦斯基大尉从未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库钦斯基还是被撤消了副团长职务。

^① 伊万·科尔涅留克，当时任波兰集团军政治教育部副主任，组织处处长。

大部分今年2月从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来波兰集团军做政治工作的同志，都被梅特科夫斯基调回后方工作，说是为了在那里熟悉波兰语和波兰问题。甚至像热利霍夫斯基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有经验的党务工作者，也被作为一个团的后勤副团长派到后方工作，（热利霍夫斯基至今仍作为后勤团长“学习”波兰事务）。

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个人和从红军来的同志在一起工作，不向他们介绍波兰问题。一些呆在后方的同志由于脱离群众，我行我素，便逐渐腐化了（如第2师一个叫彼得奥什卡的军官）。这正好成了波兰集团军政治部一些与我们作对的政工干部的新理由，他们可以继续安稳地坐在他们占据的“打发时光并能发财的安乐窝”里，因为他们完全把持了对波兰士兵进行教育的事业。

在同梅特科夫斯基中校和扎姆勃罗夫斯基少校的多次谈话里，我不止一次地提出必须清理政治部门，清除敌对分子，改善政工干部的民族成分，使政工部门深入士兵生活，深入连队，接近战斗训练。我还提到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波兰人对苏联不友好是有害的，同样不加区别地信任所有的犹太人而对他们不进行认真审查也是有害的。我还希望梅特科夫斯基更大胆地提拔波兰同志做政治工作，也更大胆地使用从红军调来的同志做政治工作的领导。

然而至今我的建议均未被采纳。我相信没有您们的干预，便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①

索科洛夫斯基少校^②

1944年6月13日

^① 1944年6月，梅特科夫斯基中校和波兰集团军政治教育部干部处主任勃伦扬托夫斯基大尉被解除了职务。两人很快被安排了新的工作。

^② 苏军少校，1944年4月任波兰第一集团军政治教育部组织监察处监察员；自1944年6月10日起任波兰第一集团军主管政治教育工作的旅级副政委。

№01782

马努伊尔斯基就乌西耶维奇报告的结论 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6月14日）

莫洛托夫同志

就有关乌西耶维奇^① 报告问题的结论

遵照您的指示，就乌西耶维奇同志的报告问题，报告如下：

乌西耶维奇同志的某些建议过时了。

例如：1) 建筑营中的波兰人或是已从那里调出，或是正从那里调往波兰军队；2) 由于拉姆佩^② 已死，就不存在让他去做管理波兰干部工作的可能性问题了。这项工作现在由波兰共产党中央局在做。

至于乌西耶维奇建议给予波兰某些报刊（“自由波兰”、“新视野”）编辑部讨论波兰外交问题的一定独立性，我同意，但是需说明，这种独立发表的言论定要与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协调一致。否则，在波兰共产党员中存在的思想放纵（如博列伊沙^③）的情况下，这会产生极为消极的后果。

乌西耶维奇对像华西列夫斯卡娅、卡斯曼这样的波兰工作者的

① E.Φ. 乌西耶维奇，波兰爱国者联盟女活动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曾是在苏波兰侨民进步杂志“新视野”的记者和编辑。

② 阿尔弗雷德·拉姆佩，1929~1933年曾任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波兰爱国者联盟组织者之一。

③ 耶日·博列伊沙，曾任“自由波兰”报主编。

评价，我认为是片面的，需要相当大的修正。对年轻的捷尔任斯基^①作为人事干部的评价，我同意。

马努伊尔斯基

1944年6月14日

^① Я.Ф. 捷尔任斯基，当时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办公厅高级科员。

№01783

马列克关于卡斯曼与莫恰尔上校 相互关系的报告

（1944年6月20日）

报 告

正如我通过苏联游击队无线电台向您报告的，出于个人野心和权力欲，卡斯曼把与卢布林省卫戍司令梅捷克^①上校的关系弄到了内部斗争的地步。

我对这位区司令员不甚了解。但是有一点看得很清楚，他是比卡斯曼年轻的党员，是普通工人，他没有经历过腐败的派系斗争，因此他轻易地接受了挑拨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责任，而卡斯曼，他以前口头上教导我们，各种党内摩擦都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但自己却做出了最恶劣的事，因为出自反对梅捷克的个人野心，他把武装波兰人民推迟了大概有两个月，这严重影响到波兰整个事态的发展。

1. 越过布格河后，我和扬诺夫斯基——即卡斯曼——不在一个战区。他留在卢布林地区北部，而我去了南部。因此我无法描述这一斗争发展的详情。但是早在白俄罗斯时，我就认为他是个胆小鬼，他不急于回国，而总是想各种理由继续留在苏联游击队附近的

^① 莫恰尔·米奇斯拉夫，又名梅捷克，人民近卫军和人民军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安全地方。尽管有人从卢布林地区来我们这里报告说那里急需党的干部，他却仍把我们留在板棚里完全无所适事，只派三个人去干一两件事，而我们完全不应该让大家都坐着等待武器，我们本可以和来找我们的那些人一起去做我们现在正做的政治工作。

2. 当卡斯曼听说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被破坏，他去了就是惟一的中央委员时，便同意过布格河了。而当我们越过布格河后，发现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还存在，看到区委书记、从西班牙回来时就认识的维采卡和区司令员梅捷克来接我们，他立刻就摆出一副高于所有人的样子。虽然我们收到了您的电报，说我们应当留在卢布林地区，但是卡斯曼不承认党的权力，虽然我应与他分开行动，去卢布林地区的南部，但他不让我接受党的任何工作，只是在郊区转悠，搞些不确定的“游击袭击”，也不让我接受任何党的职务，即使是中央委员会任命，他卡斯曼也不会批准。对我的如何遵守党的纪律问题，我们的同志都同意卡斯曼意见，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有具体工作，例如米科拉伊奇克在北部战区委员会工作，维采卡是部队的指挥员，瓦采克是政治教育军官，亚涅克在南部战区委员会，这里工作这么缺人手，而我们其余的人必须等到他批准，真让人气愤。

当想让我做战区委员会书记工作时，我立即强调说，我应当等待扬诺夫斯基-卡斯曼的批准，可直至今天也没有批准，而他本人把我作为书记和我会见时，仿佛不记得自己的禁令了。他专注于与梅捷克的激烈斗争，就我看到的，他们在斗争中不择手段，士兵们告诉我，有一次他们差点彼此开枪射击，卡斯曼把轻机枪对准了梅捷克一伙人。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消灭梅捷克，而不是工作。他本来就想拖延运送武器，要知道这里有党，党在领导着应该把武器交给谁的事，我看到缺少武器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巨大的灾难。此外，应当知道，这里存在着疯狂的反犹主义情绪，反动派利用它来反对

我们，就是在这样缺乏武器的时候，卡斯曼为了保卫自己留了 30 支自动步枪不用，是他自己在制造不健康的情绪，因为别人没有自动步枪也在斗争。卡斯曼与梅捷克之间的这些事，在我们战区委员会众所周知，我们的指挥员与战士开始卷了进来，当然他们站在自己了解的指挥员梅捷克上校一边，对那些“不知从哪儿来的”、“碍事”的人开始采取不友好态度。我们在战区内对此立即加以制止，所以我们这里的人没有卷入这场党内斗争。

然而我有个印象，卡斯曼与梅捷克之间的斗争走得很远，彼此不惜任何手段反对对方，例如利奥涅克，从库什纳连科沃^①来的有名的挑拨是非的人，一个月前对我说：“你知道吗，罗拉将军^②在与梅捷克会见后，再也没有回华沙。”我以为这是真的，应当承认，我对这个梅捷克连看都不愿看，过了几天我见到了一位中央委员，是个很不错的同志，我问他，罗拉将军没有回华沙是不是真的，他对此否认，后来我自己也信利奥涅克说了谎，因为他在这里搞了不少阴谋诡计，帮助卡斯曼进行这场争斗。

近来中央委员会考虑到 M.^③，也就是您，对卡斯曼很信任，于是把梅捷克上校从这里调走，另派别人来。可是我希望您能了解真实情况，因为我认为有义务随时向您通报真实情况。我认为卡斯曼有很大过错，他没有认真履行他所承担的职责，其表现总是像个无用的胆小鬼，庸俗的追求个人名利的人，狡猾的玩弄权术的人，对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腐败的勾心斗角有经验的人。而他又把勾心斗角带到新的、团结的、英勇的波兰工人党中来了。

我不能给您描述他们这场争斗的确切情况，因为我当时不在

① 指共产国际设在乌法附近库什纳连科沃的党校。

② 指米哈伊尔·日米尔斯基，化名罗拉，卡季米尔等。1944年起任人民军总司令。

③ 原文如此。从上下文看，是指莫斯科。

场，而有关此事的消息也是后来传到我这里的。可是我看到卡斯曼延期给我们运送武器，阻碍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

瓦茨卡·马（列克）^①

1944年6月20日

我随时可能牺牲，因为大家都认识我（只有普通老百姓让我隐蔽在农村），但是在牺牲之前，我希望我们不要对您派来的人们失望，所以我请求您派些朴实真诚的人来，而不是小资产者。

^① 瓦茨卡·马列克，从1943年起由苏联回波兰参加游击运动，任波兰工人党卢布林战区委员会成员。1944年7月牺牲。

№01784

马努伊尔斯基就与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 代表团谈话情况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1944年6月26日）

关于与波兰民族委员会^①全权代表谈话的

报 告

贝尔曼同志6月24日转告我波兰民族委员会代表团主席莫拉夫斯基^②表示代表团希望会见我。会见于当晚在巴尔维赫进行。

我们会见时莫拉夫斯基向我提出下列问题

1. 在莫拉夫斯基看来，为粉碎波兰反动派需要不是临时的，而是比较长期的四党联盟（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农民党、民主党），该联盟在流亡国外后就已存在了。这样的联盟可以把波兰一切有生力量都团结在自己周围，并促使反动阵营的政党垮台。由此莫拉夫斯基认为，有必要在苏联境内启动四党小组，波兰爱国者联盟可以依靠它。如果在贝林格军队到达波兰之前，在苏联领土上出现四党小组，莫拉夫斯基认为，这也会有助于瓦解伦敦的波兰流亡者。

莫拉夫斯基尤其坚持在苏联境内建立以德罗布涅尔为首的波兰

^① 即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

^② 即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当时为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

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小组及以维托斯^①为首的农民党小组。可以感觉到，在这项建议后面暗含着某种不满：波兰共产党在我国境内有自己的组织，而在民族委员会中有代表的其他政党却没有这种可能。

马留克^②也支持莫拉夫斯基的建议，他扩大了这一建议，说希望能在贝林格的军队里或旅苏波兰侨民中找到既能代表民主派（人民民主党）、同时又亲苏的人。

在答复莫拉夫斯基的建议时，我没有评价他的建议的政治意义，而是以表面原因推托了。我说在苏联境内建立这样的小组未必可能，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波兰侨民。卡季米尔^③支持我的意见，他指出，他认为在苏联境内使小资产阶级政党合法化，未必合适。

最后我答应把莫拉夫斯基的意见报告政府。

2. 莫拉夫斯基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向国外更积极开展宣传波兰民族委员会。我建议莫拉夫斯基就此制定具体措施，我答应我们这方面也准备类似的建议。

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扬^④这个老人朝我这边看了看说：

“是啊，您在宣传这方面很有经验。您可是孜孜不倦地搞了20年的对外宣传。”

其他代表对他的话感到很难堪，于是莫拉夫斯基问扬，这是什么意思。扬满脸通红。为了缓和这一尴尬场面，我插进来直截了当

① 安德烈·维托斯，波兰农民运动活动家，当时是在苏联的波兰社会党党组副主席。

② 指马里安·斯彼哈利斯基。

③ 即卡齐米尔·西多尔。

④ 即哈涅曼·扬·斯特凡。

地说：

“看来扬先生是指我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但我可以向扬证实，共产国际已经彻底解散，今天围绕波兰民族委员会的宣传与共产国际的宣传毫无共同之处。”

然后我转移话题说：

“我想补充说说我所观察的一件小事。谈话时全权代表们多次查看房门是不是关严了。造成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他们在我们这里还习惯于疑神疑鬼，担心有人在偷听他们谈话。”

有关这次谈话我建议：

1. 在苏联境内建立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农民党、人民民主党的小组，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这种组织将在解放后的波兰境内建立。由于谈的是民主波兰，我们没有理由阻挠在波兰境内建立这样的组织。现在就应当通过波兰共产党中央局寻找和我们有过联系并可加入这些组织的人。

2. 最近几天，我们把通过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华沙收集的有关目前波兰民族委员会的决定与工作的情报整理好了。这些情报将转交给科什秋什科电台，然后在苏联报刊转载。现在波兰民族委员会的全权代表们已有可能通过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向华沙的波兰民族委员会发送情报。

马努伊尔斯基

1944年6月26日

№01785

就前来莫斯科的必要性给斯·维梁诺夫斯基、
奥·朗格及哥穆尔卡的电报

(1944年7月17日)

伦敦 维梁诺夫斯基^①、

鉴于事态发展迅速及波兰问题接近解决，我们希望您尽快到莫斯科来。请立即来电告知您是否同意。

华西列夫斯卡娅、莫拉夫斯基

1944年7月17日于莫斯科

奥斯卡尔·朗格教授^②

在扩大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基础上建立波兰民族委员会的问题很紧迫，鉴于我们在莫斯科谈到过您作为对外事务领导人参加该委员会，请电告您对此问题的态度。

华西列夫斯卡娅、莫拉夫斯基

1944年7月17日于莫斯科

人民代表会议 韦斯瓦夫

① 斯特凡·维梁诺夫斯基，伦敦波兰斯拉夫委员会主席。

② 奥斯卡尔·朗格，波兰流亡者中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38~1945年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1945~1948年任波兰驻美大使。

以民族委员会形式成立临时政府问题已非常紧迫。有鉴于此，并为了保存干部，这里决定立即组织下列人员到苏联来，第一，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全会全体委员，第二，所有适于担任部长或副部长的著名活动家，第三，您个人及您认为需要的各政党的工作人员。人数不少于60人。各政党及全国代表会议要留下临时领导。派出人员的家属保证就地安置。请开始执行极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已采取一切措施安排飞机。明天进一步指示。

华西列夫斯卡娅、莫拉夫斯基、扎瓦茨基、罗拉^①

1944年7月17日

^① 即日米尔斯基。

№01786

巴拉诺夫就从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获得有关 波兰局势的情报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1944年8月3日)

情况报告

普里特茨基同志自罗夫诺通过“高频电报”报告：

1. 人民近卫军凯尔采-拉多姆战区司令员瓦采克^①报告，在他的战区内有4000人赤手空拳等待武器。拖延运送武器会使准备与德国人斗争的人们士气涣散。普里特茨基无法运送武器，因为已经有两周没有航空汽油了。此事茹科夫、罗拉同志知道，但暂时无法解决。

2. 瓦采克告诉普里特茨基，在凯尔采-拉多姆战区波兰社会党人已成立“自由、平等、独立”派州委会^②，该委员会选举了主席团，主席团设在“格伦瓦尔德旅”，该旅旅长是索比夏克同志。

“自由、平等、独立”派主席团向司令部致敬，并请求发运去一个印刷厂。

3. 已派谢利茨基带一组同志去赫尔姆接待从波兰来的游击队。

① 雅罗什·尤索福，化名维采克，文中误写作瓦采克，人民近卫军凯尔采战区司令员。在人民近卫军的战区划分中，没有凯尔采-拉多姆战区。

② 这是根据波兰工人党建议成立的凯尔采战区人民委员会。与波兰社会党中右翼的“自由、平等、独立”派不是同一个组织。

有消息说，他被任命为卢布林市的司令员。阿尔斯特尔^① 请求从司令部给他一组人和他们一起去华沙组织自治机关。这种情绪是受司令部干部处处长扎瓦德茨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影响。

我让普里特茨基不要阻挡这些同志，但是他的决定要征得罗拉、茹科夫同志及那里的共产党中央局的同意。

巴拉诺夫

^① 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政治教育处主任。

№01787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就向
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
提供资金问题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8月4日）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1944年6~7月间，向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提供资金的款额如下：

1. 通过克里尼茨基大尉给波兰工人党中央代表伊格纳特·罗布2500美元。

2. 通过彼得罗夫交给韦斯瓦夫的代表2万美元。

3. 通过多列茨基大尉及巴尔塔谢维奇上尉交给波兰工人党中央代表亚涅克65000美元。

已按规定送交共87500美元。

4. 委托穆拉利中校转交的2500美元，由于代表不在，未能交成。

5. 洛伊科大尉跳伞时身亡，委托他转交的1500美元没有找到。

注：附上所交款项的收据。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副部长 巴拉诺夫

指导员 诺罗夫科夫

1944年8月4日

№01788

季米特洛夫和巴拉诺夫就给予波兰工人党中央 委员会财政与技术援助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9月15日）

报 告

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韦斯瓦夫同志请求我们给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提供以下物资：

1. 18 台小汽车、10 台摩托车及 60 辆自行车；
2. 15 台打字机（拉丁字母的）及 5 台手摇油印机；
3. 100 支 TT 型手枪、100 支勃朗宁手枪，供党的积极分子用；
4. 20000 至 25000 美元，供组织中央及州的党的机关及保证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政治工作的需要；
5. 5 台无线电接收机，供与我们及波兰国内州一级党组织联络用。

韦斯瓦夫同志还请求：

1. 为 20 名从苏联领土上派回波兰做党的工作的波兰同志提供必需品；
2. 增加在苏联出版的波文书籍的印数，尤其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群众政治书籍的印数；
3. 年底以前拨给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93 吨纸，以出版 4 版的日报（规格为 46.5×29.5），印数 5 万份（78.4 吨纸），理论刊

物（2吨纸）以及小册子及传单（12.35吨纸）；

4. 1座印刷厂；

5. 允许在苏联为波兰工人党印刷党证及党的登记卡片。

上述第1~4项请求，按照我们商定的，已由国防安全人民委员朱可夫同志按相应的申请供给予以满足。关于建立无线电联络及给回波兰的同志提供必需品的请求，已由100研究所及联共（布）中央事务管理局给予满足。

我们请您，莫洛托夫同志，就关于拨给波兰工人党中委员会一座印刷厂、93吨纸张及批准为波兰工人党制作党证及登记卡片一事给予指示。

季米特洛夫、巴拉诺夫

1944年9月15日

No 01789

芬克尔施坦因就波兰社会党在波兰解放区的 活动给普赫洛夫^①的报告。

（1944年10月10日）

关于波兰社会党在波兰解放区活动的简要情报

在参加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德罗布涅尔、加涅曼^②倡议下建立的波兰社会党组织委员会，于9月10日、11日在解放区举行了波兰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③。同时自9月10日起在卢布林开始出版波兰社会党机关刊物——《自由营垒》周刊。

《自由营垒》前三期发表的材料中，值得注意的是组织委员会在该刊第一期发表的致波兰社会党员的号召书和该刊第二、三期整

-
- ① H.H. 普赫洛夫，1944~1945年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工作人员、副主任。
- ② 应为哈涅曼，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国民经济和财政部领导人。
- ③ 波兰社会党成立于1892年。从1918~1939年，在以毕苏斯基为首的右派（又称元老派）把持下，一直是波兰的执政党。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该党宣布解散。之后，原党内右翼组成“自由、平等、独立”秘密组织，与伦敦流亡政府保持联系；1940年9月，在该党基础上又组成了波兰社会主义者组织，后称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1944年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分裂为左派波兰社会党，另一部分党员与波兰工人党合作，参加了波兰人民代表会议。这次在卢布林举行的波兰社会党代表会议，旨在恢复波兰社会党。后此次代表会议被定为波兰社会党第26次代表会议。

版整版的关于代表会议的详细报道。号召书中声明，恢复波兰社会党的活动，同时评价了它过去的活动：“波兰社会党在萨纳奇专政——丝毫不比希特勒极权主义差——的条件下，与国内法西斯进行了斗争。在悲惨的1939年9月战役中，波兰社会党人拿起枪保卫被希特勒匪帮包围的首都。然后他们转入地下，以人民警察的一员加入人民军队的游击队与敌人斗争。”

完全没有提到、没有评价参加伦敦政府的波兰社会党官方领导人，这种措辞反映出，尽管存在曾导致波兰被占领后波兰社会党分裂——其右翼即所谓的“自由、平等、独立”派，左翼即所谓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它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分歧，仍要把波兰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在新的波兰社会党队伍中的倾向

在号召书中没有更详细地阐述新条件下党的任务。

强调了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农民党、民主党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要团结一致。在边境问题上的措辞是这样的：“明天的波兰不能也不会是奴役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或立陶宛人的国家；我们不要别人的一寸土地，我们要为波兰的每一寸土地而斗争；我们将与我们的邻国——苏联及捷克斯洛伐克兄弟般友好相处。”

号召书以下列口号结束：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万岁！

波兰军队和兄弟的红军万岁！

独立、强大、自主、民主的波兰万岁！

波兰无产阶级的代表波兰社会党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从代表会议的资料中可清楚看出有233名代表出席会议，他们来自卢布林、热舒夫、亚罗斯瓦夫、佩列梅什利、比亚威斯托克、谢德尔采、扎莫希奇等地。

应当强调，大部分代表们不是由正在建立的波兰社会党地方组织选举产生的，而是从1939年以前的波兰社会党老党员中吸收的。

根据各地报告可以看出，波兰社会党已经把一些老党员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首先是加里西亚地区（佩列梅什利、热舒夫、亚罗斯瓦夫等地），同时也在铁路员工及市政公用事业职工中进行吸收。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总政治报告中强调：“革命后的俄罗斯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我们恢复独立……但是波兰的反动政府与这一革命的死敌相勾结，从1920年一直延续到1926年，这期间是我们容忍了反动黑暗的萨纳奇政权的稳定存在。这导致了1935年我们被迫接受仇视人民的宪法^①。然后1939年来临，它的必然后果是我国人民历史上最大的九月悲剧。”

“在所有的民主政党里都有萨纳奇的代理人在活动……由于这些已钻进各民主政党领导机关的萨纳奇分子的活动，这些政党无法找到共同语言。”

“伦敦流亡政府是萨纳奇制度的继承人，1935年宪法是它的基础，它允许萨纳奇分子拉契凯维奇^②及索斯恩科夫斯基的恣意妄为。尽管政府大部分人员是民主党派人士，这些人被削弱得软弱无力，执行反动分子们的一切指示，而反动分子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使苏联与波兰及盟友们不和。”

“波兰社会党在自己再生的时刻，应当明确地与自己队伍中任

① 1935年4月23日通过的这部宪法规定，议会不能行使对政府的不信任权。总统不对任何人负责，也不由国民议会直接选举，他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同时提高了对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龄限制。这部宪法被认为是一部反人民的极权宪法。

② 拉契凯维奇·符拉基斯拉夫，波兰政治和国务活动家，曾三次任波兰内务部部长。1939~1947年为流亡在外的波兰总统。

何萨纳奇残余分子划清界限。在内部民主基础上再生的波兰社会党应当联合所有诚实的波兰社会党人，不论他们曾属于哪个派别。在地下斗争的条件下，我们与波兰工人党之间没有任何误解和矛盾。我们今后也将努力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牢固统一。出于地下斗争的原因，我们将坚持与农民党、民主党的合作。”

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报告的政治决议，完全符合他的结论。

在“关于与其他政党合作”的决议中指出：“民主波兰再生的基础是农民党、波兰社会党、波兰工人党、民主党紧密而忠诚的合作。”决议接着写道：“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是工人阶级中的两个兄弟组织。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共同目标及对社会正义理想的共同追求，要求这两个兄弟党在行动中进行协调与协商。”

关于波兰社会党的统一，决议中强调说：

“政治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路线的正确性。”

鉴于波兰社会党内的分裂过去是，现在也是有害的，而寻求统一是共同的愿望，波兰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号召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及“自由、平等、独立”派全体党员、所有党组织，在已恢复的新的波兰社会党队伍中联合起来。

德罗布涅尔博士在题为“波兰社会党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

“波兰社会党遵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斯大林的论述，始终不渝地坚持波兰独立的立场。”

德罗布涅尔博士把“伦敦的”社会主义者称作取消主义者，指出社会主义者在伦敦被打败了。

德罗布涅尔博士阐述波兰社会党的任务是：支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实现其宣言，他在结束报告时说：“当立宪会议通过新的

宪法，波兰重新恢复秩序后，原来波兰社会党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就将开始。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

应当指出，德罗布涅尔博士在报告中与莫拉夫斯基相反，把波兰社会党历史上的活动说成是一贯社会主义的，把社会党内的分裂解释为“某些波兰社会党人对打败希特勒失去信心。”

会议还听取了加涅曼“论经济问题”的报告和马图舍夫斯基^①“论波兰社会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

会议通过了给斯大林、邱吉尔、罗斯福、贝奈斯^②、铁托^③的致敬电，以及写给什维尔尼克^④同志的致苏联工人书，邀请苏联工会代表参加波兰工会代表大会，致英国工党、致意大利社会党、致伦敦的波兰民主小组、致旅居美国的波兰人（写给朗格教授）、致在莫斯科的波兰爱国主义者联盟的电报。

代表会议选举了党的各级临时组织：以德罗布涅尔为主席、由30人组成的总委员会，以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为首、由5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选举反映了波兰社会党干部方面典型的状况。新的社会党的干部几乎都是老社会党党和工会机关的次要干部，其中许多人在德国占领时期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积极性。

除了著名活动家，如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德罗布涅尔、加涅曼之外，可以指出的比较积极的活动家有：

-
- ① 斯特凡·马图舍夫斯基，波兰社会党活动家。当过天主教教士，1939年后在苏联，是波兰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在本次会议上被选为新的波兰社会党总书记。
 - ② 流亡国外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 ③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 ④ 尼·米·什维尔尼克，苏联国务和工会活动家。1944年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拉贝教授（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波兰社会党教育组织（过去所谓的工人大学协会）的老活动家，在被占领时期没有表现出积极性，他只是在“自由、平等、独立”派与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随机应变；

马图舍夫斯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他实际领导波兰社会党主要的组织工作。马图舍夫斯基过去是天主教教士，走出教会，于1939年以前加入波兰社会党。拥护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波兰被占领时期在苏联，据同志们反映他在此期间对苏联态度良好。此人无远见，不是帅才。

曼图利博士^①——波兰社会党自由派知识分子，曾任社会主义律师组织的书记（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执委会的第五位成员是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加涅曼。

在总委员会成员中应指出：

卡杜鲁——卢布林市临时市长，过去是波兰社会党卢布林市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希德洛夫斯基——卢布林社会保险公司经理。

奥格罗德津斯基——波兰社会党利沃夫战区委员会书记。应当强调，波兰社会党中央机关的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马图舍夫斯基是坚定拥护与波兰工人党紧密合作的，而德罗布涅尔有背离与波兰工人党及农民党加强统一行动路线的苗头。

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建立波兰社会党青年组织及恢复“工人大学协会”的决议。

通过了有关党的组织结构问题的决议：党的最高机关是1) 总委员会及中央局；2) 省委会；3) 县委会；4) 地方委员会。

^① 应为曼杰利·菲利克斯，法学博士，在本次会议上被选为波兰社会党总委员会副书记。

省委会由县级组织的代表组成，县委会由地方组织、市及村的代表组成。

代表会议责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党的周刊性机关刊物。

芬克尔施坦因^①

1944年10月10日于莫斯科

^① 列翁·芬克尔施坦因，当时是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驻莫斯科代表。

№01790

捷尔任斯卡娅就卢布林的报刊及 广播情况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1944年10月20日)

绝密

季米特洛夫同志：

我应当请您注意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它证明波兰工人党对卢布林的报刊、广播的领导不够有力。

例如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机关报《民众之光》(1944年10月3日)被第五纵队^①利用来发表拉契凯维奇致波兰武装力量的号召书……这一事实，只能用波兰工人党领导的软弱来解释。这份号召书以伦敦来电的形式印在头版显著位置，未加任何说明。我援引一段译文：

“拉契凯维奇论布尔”

(路透社伦敦10月6日电)“波兰武装力量的士兵们！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塔杰乌什·布尔-科莫罗夫斯将军^②被德国监禁。作为

① 原是对西班牙内战期间潜伏在首都马德里支持叛军的奸细和破坏分子的称谓，因当时叛军有四支纵队向马德里进军，故把城里作内应的称为“第五纵队”。后用此通称叛徒和内奸。

② 塔杰乌什·科莫罗夫斯，化名布尔，波兰将军，1941～1944年任在波兰国内战斗的“国家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领导了1944年的华沙起义，起义失败后向德军投降。

国家军^① 总司令他始终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为此，我以《民众之光》的名义向他表示感谢。我相信，他重新获得自由来领导我们的日子不远了。”

在这个号召书之下，又未加任何评论，只是在“意见、建议与谎言”的标题下刊登了下述电报：

（路透社 10 月 6 日电）瑞典《新闻晨报》自柏林报道说，那里正在讨论有关修正与波兰的关系问题。从柏林政界的各种评论可以看出，柏林认为可以在新的基础上与波兰合作：“德国人允诺，他们将按照日内瓦公约来对待被俘的华沙保卫者。威廉街^② 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数千波兰群众在修筑对抗俄国人的工事。”特派记者补充说：“完全可能，得不到大不列颠支持的布尔将军还将在未来的欧洲发挥政治作用。”

第五纵队为了掩饰自己的破坏活动，把这两则电报与大字标题的编辑部文章“选择了德国人的布尔”刊登在同一版上。

1944 年 10 月 9 日《卢布林报》也未加任何评论在头版刊登了那篇拉契凯维奇的告波兰武装力量士兵书及那封来自斯德哥尔摩仿佛现在“希特勒分子修正对波兰关系”的电报。在《卢布林报》上敌人的攻击毫不掩饰。这里甚至没有“选择了德国人的布尔”那篇文章。

与敌人的这一厚颜无耻的攻击同时刊登的是比较隐晦的文章。

在卢布林的报纸上及广播中也有一些不正确的文章及措辞，有时很难断定这是由于不够了解情况，政治水平及政治素质差，还是由于心怀叵测。

① 波兰流亡政府组织并领导的国内武装力量。1942 年 2 月组建，分 6 个战区活动，1943~1944 年，兵力最多时达 35 万人。它对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持敌视态度，是 1944 年华沙起义的主要力量，起义失败后，力量削弱。

② 柏林的一条主要街道，德国政府机构所在地。

谈一些主要的情况。

1944年10月8日《卢布林报》发表了一篇客观上具有挑衅性质的小品文，题为“束手无策”。小品文仿佛旨在与希特勒占领5年期间引起的“道德与精神上的堕落”作斗争。但是并没有说明这种道德堕落的具体代表人和他们的丑恶勾当，没有指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为此要受到什么惩罚（如查有这种情况），小品文作者（“吉普”）笼统地把这道德堕落归咎于卢布林的大多数居民。“从数量上说，”他写道，“他们是居民的大多数，城市的精华，他们被薄弱的无产阶级和残余的知识分子阶层所包围……受德国人迫害最少使这类人现在生存下来的最多，是不足为奇的。”小品文作者把卢布林的“大部分居民称作人类中的野兽”、“一帮道德败类”、“野蛮的土著”、“国内的布须曼人”^①、“野蛮的城市动物群”。同时他还散布其种族主义观点，说：“由于消灭了犹太人，这些人在物质上强大了，他们至今还在公开地重复说：‘德国人不管怎么说，他们消灭了犹太人，他们干得好。’”

在文章末尾，作者认为自己完全无力与希特勒主义的思想影响作斗争。一方面寻求怎样找到与这帮“野蛮的城市动物”的“共同语言”，另一方面声称：“一旦人一走到街上……，他就束手无策。”

在同一天的《卢布林报》上，头版刊登署名“T”的题为“青年属于波兰”的文章说：“实利主义、追求轻松地挣钱及庸俗的娱乐，热衷于投机、不愿付出严肃的创造性的努力——这就是对广大青年群众影响很深的可悲的特点。”

1944年10月10日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机关报《民众之光》刊登了索菲娅·德鲁日德日（波兰游击队前领导人萨塔诺夫斯基的妻子，萨塔诺夫斯基当年曾经找过您。顺便说一句，关于他的妻

^① 南非的部落之一。

子，我们的同志们，如小图尔莱斯基，反映很不好）题为“为了新口号”的文章。这是一篇闻所未闻的语无伦次、文理不通的文章，其中谈到波兰的农民，谈到为城市供应农产品，谈到农民政党意识到自己是执政党的必要性，并在半通不通的字里行间，夹杂着一些极为含混的话，可以理解是在警告当心农民革命运动。文章说，“农民也许不是立即（在新的民主的波兰）感到（自己地位的）改变。他们积存的仇恨非要找到一个出口……”文章的结尾号召“形成新的原则，新的宣言，新的口号。改变群众运动的轨道，给农民和工人的活力以新的出路。如果各政党领导人不尽快认识到这一调整的必要性，那他们就会招致混乱，这种混乱可能阻碍波兰民主的发扬光大。工作已经开始了，但是它成了群众性的工作，才能保障胜利。”

号召形成“新的原则、新的宣言、新的口号”、“改变群众运动的轨道”，而又不指出作者所指的是什么样的口号，当现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制定并正在贯彻新的、民主的、亲苏的原则和宣言、口号，当群众运动已经走上为民主的、与苏联友好的波兰而奋斗的轨道时，号召要形成新的宣言，新的口号，这意味着——有意无意地——在为反动派张目。

1944年10月9日《卢布林报》刊登了题为“民主的最深刻含义”的文章，其中有这样意义含混不清的话：“如果在某个国家曾实施过一段时间议会民主制，但以后又被另一种专政形式所取代，那么预先就可以断定，那里不曾有过充分的民主，民主没有深深地扎下过根。”

这篇文章还说，国家政治生活的恢复表现在召开了“农村青年联盟代表大会”、农民党及波兰社会党的代表会议及代表大会、社

会主义青年大会等等，但却只字未提波兰工人党代表会议^①。

应当强调，卢布林的报章、广播中在列举各政党时，照例总是将波兰工人党置于最后，有时是第二位，也许从没放过第一位。有时（如上述文章）根本不提波兰工人党。例如1944年10月7日卢布林广播援引10月17日《勒热奇波斯波利塔》报谈土地改革问题的社论（这一期报纸我们还没有），其中谈到：“卢布林工会理事会代表会议的与会者，决定动员一切力量帮助农民实现土地改革法令。波兰社会党将和其他政党一道竭尽全力摧毁反动势力的抵抗，尽快实行土地改革。”关于波兰工人党这里只字未提。

1944年10月12日卢布林广播电台转播了在华沙阵亡的波兰游击队员追悼会，引用了文化艺术部领导人维根季亚·勒日莫夫斯基^②的讲话，他把德国人、芬兰人、保加利亚人相提并论。勒日莫夫斯基说：“法国、比利时、荷兰几乎已全部解放，保加利亚、芬兰——正如英国首相邱吉尔所说，与德国人同样出了最大战犯——重又获得了自由。”

署名“吉普”的小品文“光荣的缺席”说，波兰的山民（“古拉列”）“没有去为希特勒作战。其余的波兰人也没有去。”（这里对不少波兰人登记加入福利克斯杰切^③并参加反苏战争和加入国家军的所谓“民族武装力量”^④与德国人合作这些事实都避而不谈）。

由此“吉普”得出的结论与伦敦流亡政府成员的意思完全相

① 农村青年联盟代表大会、农民党代表大会、波兰社会党的代表会议、社会主义青年大会在1944年8月27日至9月9日举行，波兰工人党代表会议于同年10月10~11日举行。

②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文化艺术部领导人，民主党的核心人物。

③ 指被用各种手段日耳曼化的波兰人。

④ 反共的民族主义军事组织，成立于1942年秋。它的个别部队也曾与希特勒占领者进行斗争，但在红军进入波兰后，该组织组成专门部队对苏军和波兰新政权进行抵抗，从事地下恐怖活动，并在行动中与德军相勾结。

符：“波兰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光荣表现应大大加强其在欧洲会议桌上发言权。”

我还要指出，《民众之光》没有站在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机关报应有的高度上。此外，据我看，卢布林的报刊上有关红军及其为解放波兰而英勇斗争的报道过少。使波兰军队家喻户晓很重要，但是与红军的作用相比，有时过于强调前者的作用了。

我想特别提请您注意一个据我看是不正确的措辞，这出现在波兰工人党中央机关报《自由论坛》的社论（1944年9月26日）“进入新阶段”中。

文章开头指出，波兰工人党在解放了的领土上走出了地下状态，然后说：“这是波兰工人阶级斗争史上的转折时刻，是我们运动史上的转折时刻。自工人运动存在之初，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为社会主义斗争的红旗被社会革命党——无产阶级党^①的活动家高高举起的时刻起，社会主义左派在波兰就被赶入地下，进入秘密状态。在沙皇政府，然后是本国反动派的迫害中，它成功地把广大工农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当波兰人民生活中最困难的希特勒占领时期到来时，当波兰人民自身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当波兰人民在与德国占领者进行殊死斗争时，我们的运动，我们的党，波兰工人阶级的党在全国人民为争取自由、独立的波兰斗争中光荣的代表了无产阶级与农民。”

我理解波兰工人党利用波兰社会民主党^②及波兰共产党革命传统的困难，一个没有共产主义名称的党在措辞上的难处，但是我认为把自80年代起，包括1918~1939年这一时期的波兰工人阶级

① 波兰第一个正规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于1882年。缔造者和主要领导人卢·瓦林斯基。

② 此处指波兰社会民主党左派。

的革命运动冠以“社会主义左派”之名是不正确的（这里正是在这样做的）。这样的称谓会带来混乱不清，并会导致机会主义的结论。这样一来，波兰共产党就是“社会主义左派”了。

同时在我援引的这段引文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波兰社会党在沙皇时期就属于“社会主义左派”，因为它当时也处于地下。

波兰工人党党员索菲娅·卡明斯卡娅题为“穿过普瓦维的大地”（1944年10月2日《民众之光》报）的文章，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其中措辞不正确，抹杀了波兰工人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区别。文章从农民党党员热情支持波兰工人党党员作县长候选人这一可喜的事实得出结论：“党的差别在消失”。

在实行工人和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情况下，不排除存在机会主义歪曲的危险。所以，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密切注意波兰工人党的报刊上、宣传鼓动活动中措辞的准确性，也要注意，既不要把波兰工人党作为霸主来突出其作用，也不要把它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捷尔任斯卡娅^①

1944年10月20日

^① C.C. 捷尔任斯卡娅，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苏联已故的著名党和国务活动家费·捷尔任斯基的妻子。

№01791

**普里特茨基就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
1944年5~9月的活动给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944年11月20日)

莫斯科
绝密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巴拉诺夫同志

副本：交红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外国部队全权代表达维多夫^①同志

谨送上波兰游击运动司令部关于1944年5~9月所做工作的报告。

报告副本交布尔加宁^②同志、波兰军队总司令罗拉-日米尔斯基上将及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韦斯瓦夫同志。

自然，那些可以从党的角度对司令部工作进行评价的诸多方面没有包括在本报告中，因此为了更充分地评价我们的工作，我认为必须谈以下内容：

当然，波兰游击运动的条件比被占领的白俄罗斯或乌克兰领土

① C.П. 达维多夫，1944年，任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外国部队全权代表，后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驻波兰社会安全部顾问。

② 尼·亚·布尔加宁，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1944年起为国防委员会成员，副国防人民委员，苏联驻波兰解放区代表。

上的条件要差得多。

1. 战线的缩短，致使敌人后方兵力高度集中；
2. 没有森林，而铁路和公路网又比较稠密；
3. 存在国家军、“民族武装力量”和其他反游击队运动的波兰反动的民族主义匪帮；

最后，人民本身也无法与我们苏联人民相比。

所有这些原因无疑都给发展游击运动带来不良影响。但这不是主要的！基本问题在于波兰领导层并不真正从事游击运动。形成了一种印象，他们对在敌人后方开展积极的游击斗争根本不感兴趣，下述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

1. 自司令部归波兰军队总司令部领导时起，游击运动司令部的职能受到急剧限制，游击运动非但没有发展，反而走向削弱。

2. 早在今年7月末，司令部已被禁止向敌后投入兵力。此后下达了取消司令部人员基地的指示，即取消拥有1200人的游击运动学校（特别旅），当时学校已经培训并配齐了18个每组12人的组织小组，准备派往波兰各地。学校共培养了900名游击运动专家。这所学校已完全交给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国家安全机关管理。结果，近三个月司令部只向敌后空投了18人，而此前两个月共空投350人。

3. 越过战线的个别经过审查的游击运动组织者及游击队，未被准许返回司令部工作，而是立即被转交给了军队、民警局、国家安全机关，在今后的敌后工作中我们就不能再使用他们了。

4. 最后，司令部从罗夫诺市迁到卢布林以后，8月25日下达了波兰军队总司令的改组命令，实际上是取消了游击运动司令部。

司令部基地的大部分财产转交给了总军需部，75%的司令部人员到了波兰军队总司令部。只是在布尔加宁同志干预后，才留下一批人和无线电台和几架司令部配属的飞机，供司令部今后开展敌后

起作用。目前这个小组经过长时间拖延后，改名为波兰军队总司令部所属敌后游击队物资供应基地。

5. 基地无力对游击队及其战斗活动进行领导。对敌后的作战的所有指示都是由罗拉-日米尔斯基和韦斯瓦夫同志发出。这些指示不是扩大和活跃游击斗争，而是从敌后转移出积极分子，调出游击队。所有这些都是以环境艰难及对战线那边的积极分子生命有威胁为理由的。

6. 基地拥有的财物未按规定使用，也就是说不是用于游击运动。

7. 个别人对司令部及其工作表现出很不信任。以贝尔曼、明茨和韦尔布洛夫斯基为首的波兰共产党中央局，以及人民军代表斯佩哈利斯基和西多尔都企图指责司令部，说它的工作对波兰人民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有人还力图极力诋毁我们派到敌人后方的人。他们诬蔑萨塔诺夫斯基叛变，并建议司令部干掉他。诬蔑索别夏克，说他把武器给了“民族武装力量”。克列梅涅茨基被说成是个彻底腐化的人。

所有这些事实不能不影响到司令部的工作。目前基地的作用被缩小到仅仅是保障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民警局，从敌后把波兰工人党和人民军积极分子运送出来。

波兰军队总司令所属敌后游击队物资供应基地

主任、上校 普里特茨基

1944年11月10日于卢布林市

№01792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关于加入民主联盟的 波兰各政党相互关系的报告摘录

(不迟于1945年4月)

[……] 一、各民主政党的组织与人数

在由方面军一月进攻而解放的波兰西部地区，建立并仍在活动的有4个民主政党：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农民党及民主党。

波兰工人党的小组在德国占领期间处于地下，领导了地下民族委员会，他们的主要干部在游击队中活动。

波兰社会党在德国占领期间虽然党员数量比波兰工人党多，但实际上没有做任何的居民工作，没有与德国占领者进行斗争。

它的组织处于波兰社会党右翼“自由、平等、独立”派（右派反苏组织）的影响下，并且混进了国家军分子。

农民党在农业区是人数最多的党。在有些县拥有2000~3000名老党员，但在德国占领期间这个党的组织政治活动极少。

农民党党组织中的领导岗位基本上由米科拉伊奇克^①的追随者所占据。该党的左派组织得很差。

在组织上固定下来的民主党在德国占领期间在这些地区不存在。一些地方只有该党的个别代表（克拉科夫、琴斯托霍夫）。

波兰西部地区解放之初，波兰工人党的组织就开始在这里迅速发展。

^① 斯坦尼瓦夫·米科拉伊奇克，波兰政治家，自30年代起为波兰农民党领袖。1940年任波兰流亡政府副总理，1943~1944年任总理。

例如克拉科夫市解放时^①，波兰工人党组织拥有党员约 20 名，而到今年 4 月初已拥有党员 4000 名以上。

截至今年 2 月 16 日，在拉多姆斯科市的波兰工人党有党员 42 名，而到 3 月 1 日已经拥有党员 332 名。民主党组织在一些市、县的人数如下：

县或市	波兰社会党	波兰工人党	农民党	民主党
克拉科夫市	5000	4000	—	3000
凯尔采市	1000	1000	—	—
琴斯托霍瓦市	400	974	300	100
亚沃日诺市	103	156	—	—
奥斯特罗韦茨市	400	1000	—	—
梅斯罗韦茨市	200	500	—	—
切利亚德兹市	187	565	—	—
本津市	582	2200	—	—
塔尔努夫县	500	1200	4500	—
赫沙努夫县	820	3037	300	—
奥尔库什县	350	1500	3500	—
奥斯特鲁夫县	950	400	—	—
拉多姆斯科县	650	420	3603	—
延德热尤夫县	200	3500	2000	—
桑多梅日县	315	683	2000	—
布热斯科县	282	464	190	—

注：第 4、5 栏的空格线表示农民党及民主党在所指出市、县没有党组织。

由上表可见，波兰工人党在所有的市及县中是人数最多的党，克拉科夫市及拉多姆斯科县、奥斯特鲁夫县除外，那里波兰社会党

① 该市于 1945 年 1 月 18 日解放。

人数占优势。后一情况是由于波兰社会党无论是在克拉科夫、还是在奥斯特鲁夫县、拉多姆斯科县善于利用自己的老关系和长年工作的经验。

虽然波兰社会党的组织化已合法化了，并与原来的领导（“自由、平等、独立”派—右翼）断绝了关系，但是这种断绝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形式上的。

许多情况下波兰社会党组织混进了国家军分子和“福利克斯杰切分子”。大多数情况下波兰社会党组织对于国民生活问题袖手旁观。他们或是闭关自守，或是与波兰工人党争夺政权机关中的领导职位。

在这场旨在破坏民主政党联盟的争夺政权的争斗中，波兰社会党败坏了自己在本党优秀党员中的声誉，因此有的波兰社会党党员转而加入波兰工人党（亚沃日诺市、延德热尤夫县）。

农民党在农业地区拥有相当数量的党员，但组织得极为松散。它的领导干部软弱。在农民党的组织里，米科拉伊奇克追随者的影响很大，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党组织在推行治理国家措施时发挥积极性。

民主党人数最少。它的组织在红军解放了这些地区之后才开始建立，主要是在大的中心城市（克拉科夫、琴斯托霍瓦等）。

这些组织发展缓慢是由于其成员主要来自知识分子，他们不过问政治，或是处于流亡伦敦政府影响之下。

波兰社会党在一系列城市中有受其领导的青年工作组织——“工人大学协会”，波兰工人党有“青年斗争联盟”。

农民党没有自己已在组织上固定下来的青年“副手”。

二、民主政党参加政权机关

政权的行政机关，即省、庄园^①、地市、乡各级管理局，在波兰西部地区已经建立并进行着工作；所有村镇都任命或选举了负责人。

在乡、市及绝大多数的县里已建立了民族委员会。

省、县、市行政机关的领导职位仍然是在民主联盟的各政党之间分配。

由于波兰工人党是最有影响的政党，所以大部分领导职务由波兰工人党党员担任。

以下是大城市地方政权机关领导人员所属政党的资料：

县,市领导成员的党派	波兰工人党
村长	波兰社会党
县(市)社会安全机关负责人	波兰工人党
琴斯托霍瓦	波兰工人党
市长或县长	波兰工人党
市警察局负责人	波兰工人党
克拉科夫	波兰工人党
赫沙努夫	波兰工人党
凯尔采	波兰工人党
拉多姆斯科	农民党
卡托维兹	波兰工人党
无党派人士	平丘夫
孔斯凯	波兰工人党
东布罗瓦-塔尔努夫	波兰工人党
延德热尤夫	农民党

① 原指由波兰和立陶宛公国的最高统治者转给其在地方上的代表——大封建主终身使用的庄园。其所辖范围从几个至上百个村庄不等。

这样，在波兰西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地域内）最大的城市和许多较小的城市里，城市行政职务大部分由波兰工人党党员担任。

在凯尔采省及东布罗瓦-西里西亚省，行政权力掌握在波兰工人党手里，而在克拉科夫省，行政权力掌握在波兰社会党手里。

农民党党员在政权机关中的数量仅次于波兰社会党，居第三位。

一小部分行政职务由无党派人士担任。

民主党党员没有担任行政职务。

社会安全机关及民警局的领导权乎完全掌握在波兰工人党手中。

民族委员会的领导权不都掌握在波兰工人党手里，但其中的监督职能属于波兰工人党，因此在委员会成员中仍旧有许多波兰工人党党员。

奥斯特鲁夫市民族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例外，在32个成员中，波兰社会党员17名，波兰工人党员仅11名。

三、各民主政党的合作

为了组织民主联盟中各党的合作，在各省、庄园及城市中建立了各党之间的协调委员会，由各政党在该地区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工作的基本内容是：

1. 确定在民族委员会中各党的席位；
2. 协商最重要的国家或公众措施；
3. 党的相互监督。多数情况下党际间的委员会对联盟内各民主政党的合作产生良好影响。但是在波兰社会党或农民党内混进反动分子的地方，各党工作中的合作就遭到破坏，变成党与党争夺权力的斗争。

为巩固民主政党联盟，有些地方举行了各党之间的积极分子代

表会议，在会上讨论了民主政党联盟的作用及各党参加击溃敌人、建立强大、独立、民主波兰事业等问题（延德热尤夫、拉多姆斯科等地）。

在德国占领期间，在波兰工人党建立地下机关“民族委员会”的同时，反动派按照流亡政府的指示，也搞了一个自己的国家机构，该机构在波兰西部从德国人手中获得解放之后，立即开展了与民主机关争夺政权的斗争。

走出地下状态的民族委员会有力地掌握了政权，虽然大部分情况下其成员只有波兰工人党党员。

近来，其他民主政党登上了政治舞台，成立了工会，民族委员会也补充进这些党和工会的人员。

在波兰西部地区政治斗争尖锐、民族问题盘根错节的情况下，正式成立了政权机关——民族委员会的地方，民族委员会是各民主政党的联盟，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波兰工人党。以下是各党参加政权机关的材料：

	该地组织形式	来自波兰 工人党	来自波兰 民主党	来自 民主党	来自 社会党	来自 工会	来自无党 派人士
1	奥斯特鲁夫县民族委员会	3	10	-	-	-	32
2	奥斯特鲁夫市民族委员会	11	17	-	-	-	4
3	谢米亚诺维采市民族委员会	7	-	-	-	6	8
4	赫梅尔尼克市民族委员会	16	2	-	-	-	-
5	斯洛姆尼基市民族委员会	7	1	-	-	-	8

续表

	该地组织形式	来自波兰 工人党	来自波兰 民主党	来自 民主党	来自 社会党	来自 工会	来自无党 派人士
6	亚沃日诺市民族 委员会	13	7	4	-	-	-
7	赫沙努夫市民族 委员会	12	6	-	-	-	6
8	栋布罗瓦-古尔纳 市民族委员会	17	5	-	-	-	4
9	苏海德纽夫市民 族委员会	12	10	8	-	-	-
10	斯卡维纳县民族 委员会	4	4	9	-	-	4
11	斯卡维纳市民族 委员会	3	7	-	6	-	-
12	塔尔努夫县民族 委员会	7	4	4	-	-	2
13	塔尔努夫市民族 委员会	9	4	2	2	-	2
14	留布利涅茨市民 族委员会	9	6	-	-	-	-

注：空格号表示所指出的党、工会及无党派人士在政权机关中没有代表。

基于上述材料可以得出结论，波兰工人党党员在民族委员会中占压倒优势。

民主党作为联盟中最弱的党，在民族委员会中的代表最少。

波兰工人党在新解放的地区为争取工会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栋布罗瓦-西里西亚省（索斯诺维茨、本津、栋布罗瓦-古尔尼恰、卡托维兹、霍茹夫等及其他城市）它实现了对工会工作的完全控制。

在克拉科夫省及克拉科夫市，波兰工人党（争取）工会的工作受到来自波兰社会党的抵抗。

民主联盟中的波兰社会党与农民党在贯彻治理国家的措施时，是不够合作的。

实行土地改革时主要重担落在波兰工人党肩上。例如，克拉科夫省实行土改的 69 名全权代表及其副手中，波兰社会党只有 14 人，农民党 2 人。在动员工人积极分子进行土改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波兰社会党和农民党的领导（就不必谈民主党了），不采取认真的措施来动员自己的党员去完成国家的那些重要措施，如交公粮，进行春播，他们的协作只是形式上的。

由于波兰工人党在各党联盟中赢得了主导地位，并且实质上是争取民主波兰斗争的主要力量。反动派现正在采取措施以从内部破坏民主政党的联盟。

反动派为达到此目的而采取的主要方法，是通过钻到各党内的自己的代理人进行活动。

反动派试图把自己信任的人安插到政权机关，并通过他们进行破坏活动。

当然，在省中心城市——克拉科夫、卡托维兹和凯尔采，反动派为钻进政权机关不惜余力。

反动分子们很清楚，这些城市政治地位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些省。

大多数情况下，反动阵营尽力把波兰社会党党员中自己的代理人，及在一部分农民党党员中找到的代理人派往政权机关，将他们伪装成该党的左派代表。

与此同时，反动派以无党派人士的姿态钻进政权机关；有时他们还伪装成波兰工人党党员。

最近反动分子在克拉科夫市以极大的积极性进行了夺取政权的斗争。他们的主要力量埋伏在波兰社会党省组织里。

表面上，似乎是在为争取波兰社会党在民主联盟中的平等、独立等等进行斗争，实际上是在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激烈斗争。伪装成波兰社会党党员的反动分子抓住一些人的“思想性”及另一些人的“随机应变”来蛊惑人心、诽谤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人、叫嚷波兰工人党“专政”等等。

借助进入中央政权机关的波兰社会党党员，包括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波兰社会党在克拉科夫赢得了某些阵地，例如省长的职位，并急忙将此职位交给了民主的最为狡猾的敌人——流亡“政府”原驻利沃夫代表奥斯特洛夫斯基^①。

波兰社会党在克拉科夫还达到了败坏波兰工人党某些领导人员声誉的目的。其中包括波兰工人党中央做出撤消波兰工人党克拉科夫省委书记扎瓦茨基^②职务的决定，他在克拉科夫，以及此前在热舒夫表现出是一位政治上坚定和精力充沛的干部。

还有上述波兰机关关于撤消克拉科夫省国家安全局局长伊梅列克少校^③职务的决定，伊梅列克在克拉科夫及热舒夫担任这一职务时同样表现出是一位精力充沛而坚强的工作者。

波兰社会党中的反动分子在克拉科夫搞的破坏活动不是偶然的。克拉科夫省现在集聚了许多与流亡“政府”有联系的重要的反革命分子（扎连姆巴——反动组织“自由、平等、独立”派的领

① 阿塔姆·奥斯特洛夫斯基，原伦敦流亡政府驻利沃夫代表。1944年8月被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所属安全机关逮捕，后表示愿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合作而被释放，并进入国家机关工作。

② 扎瓦茨基在1944年8月至1945年4月先后任波兰工人党热舒夫和克拉科夫省委第一书记

③ 应为斯利瓦-伊梅列克·弗拉基斯拉夫，在1944年9月至1945年3月，先后任热舒夫和克拉科夫省社会安全局局长。

袖、茹拉夫斯基^①——老波兰社会党工会领袖，B. 维托斯^②——波兰政府前总理等）。

反动派还试图把在农民党里的自己的代理人推入政权。

例如，1945年3月7日经省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提议，来到克拉科夫的内务部长马斯良卡^③（他就是农民党的领袖）同意任命农民党党员马马克为克拉科夫省第一副省长，马马克原为利马诺瓦县县长。但是3月6日马马克已被社会安全机关逮捕，并承认他是伦敦流亡“政府”派驻克拉科夫战区的代表。在逮捕马马克时，在他那里搜出70万新兹罗提、几十份伪造的证明文件及与伦敦联络的工具。

反动派在波兰工人党中也有自己的代理人。例如波兰工人党卡特维兹省委书记维什涅夫斯基、波兰工人党索斯诺维茨市委书记克纳普奇克、波兰工人党霍茹夫市委书记马良达就是民主的敌人。他们已被社会安全机关逮捕。

被德国人空投来并被捕获的间谍、叛徒米罗诺维奇的供词证明，反动派不仅与伦敦流亡政府有关系，而且与德国法西斯也有联系。他招认德国人于3月17日把他空投到克拉科夫地区，以便与波兰反动派建立联系。

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波兰社会党中的反动分子为破坏民主政党联盟的出击。如延德热尤夫市市长斯坦尼斯拉夫·孔切夫斯基（波兰社会党老党员）进行反对波兰工人党的宣传，指责它是共产党。他还警告教师不要对孩子们讲斯大林是红军胜利的组织者，完全不要讲红军、而只谈波兰军队的胜利。

① 自1945年起任“自由、平等、独立”派总委员会主席。

② 维岑德·维托斯，波兰农民运动著名活动家和波兰政治家。为波兰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终身主席。

③ 尤素福·马斯良卡，1944年12月底起任波兰临时政府社会安全部长。

反动派还试图破坏联盟的一项重要措施——派遣采购工作队。在“什林卡”厂工人集会上讨论派人去为工人采购食品时，工人什普鲁克发言反对这项措施，他把工作队称为庶务官^①。据查，什普鲁克原来是“国家联合阵线（毕苏斯基分子的组织）”的成员^②。

反动派还在民警局机关里进行破坏活动。例如栋布罗瓦-古尔尼恰市警察局钻进了一个叫库哈尔斯基的波兰社会党党员。他混入了侦查科，把波兰工人党党员排挤出警察局，把国家军分子拉进去，国家军分子的勒索、违法行为败坏了民警机关的声誉。

被揭露出的库哈尔斯基原来是国家军的指挥官。

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反动派的敌对影响在波兰社会党内扩散的程度。对“你们组织里有没有人支持波兰社会党右翼？”这个问题，琴斯托霍瓦市波兰社会党市委及战区委书记格罗姆科维奇·扬，——一个有经验、善于分析情况的干部——回答说：“我们是统一的党——波兰社会党。”

波兰社会党琴斯托霍瓦市战区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久巴说得更加坦率：

“我们的统治者 1939 年以前做了蠢事，他们给了警察局许多钱，让他们镇压共产党。其实这钱应该付给我们，我们就会把这事干了。”

该战区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卡济米尔奇克也是坚持这种态度，指望撤换波兰社会党的领导。波兰工人党琴斯托霍瓦市委没有去孤立这些思想反动的波兰社会党领导人，而是给波兰社会党的委员会发去公函，表示他不能同这样的领导共事。这当然毫无结果。波兰社

^① 旧时负责机关总务的官员。

^② 国家联合阵线是由萨纳奇分子于 1937 年成立的波兰法西斯组织，与希特勒德国相勾结，从事反人民的活动。

会党的领导还是原班人马，而党与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紧张，互相戒备。

因此，反动派现在主要的策略是要合法化，取得信任，进入政权机关。

琴斯托霍瓦国家军的一个领导人，现在是波兰社会党党员，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国家军不再受誓言的约束，每个人都可以想什么就干什么。对于应征加入波兰军队态度要忠诚，但不必自愿参军。所有国家军人员要在机关和团体的合法工作岗位上任职，等待时机。”

该组织中的一个国家军分子证实，近来国家军分子受命与民主组织共事。

今年2月中旬在桑多梅日市出现了一份仿佛是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传单，说俄国共产党声称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思想、也包括波兰共产党思想的代表。这证明反动派正努力变化自己的策略。

这张挑拨性的传单多半是国家军分子印的，它向加入波兰工人党的原波兰共产党党员发出呼吁，目的是在波兰工人党阵营内播种对俄国共产党人的敌对情绪。

也有过这种情况，国家军组织的领导人亲自来见军事领导人或是到安全机关，谈判投降条件。比如，在延德热尤夫县就有约1800名国家军分子放下了武器。

但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保存干部，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国内会出现“转折”，发生对反动派有利的政治变化。

方面军政治部将召开（波兰领土上的）主管政工的副司令员会议，会上将做以下指示：

1. 全力巩固民主政党联盟——不是通过向反动分子让步，而是将他们从联盟的各政党中坚决驱逐出去。

其中包括采取措施清除波兰社会党中的反动分子，他们现在实

质上成了秘密活动的反动派的合法基础。

2. 不仅对波兰工人党的工作，而且对民主联盟中其他政党的工作给予帮助，保证波兰工人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

3. 帮助波兰工人党提高党内思想教育及宣传工作的水平，以便把相当多的波兰知识分子干部置于自己影响之下。

4. 帮助波兰工人党加强工会工作。

5. 促进在波兰城市知识分子中有影响的民主党尽快建立组织。

6. 加强波兰工人党对青年组织“青年斗争联盟”的领导。

7. 不容许剥夺已与工人大学协会建立联系的青年的自主权，波兰社会党领导企图把这些青年完全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干扰他们与“青年斗争联盟”接近。

№01793

哥穆尔卡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国际情报部谈波兰形势

（1945年5月10日）

潘友新^①：同志们，现在由韦斯瓦夫同志报告波兰形势。

韦斯瓦夫：同志们，我首先表示歉意，我的俄语不太好，所以我的发言可能会有些困难。

我只谈波兰现在存在的几个问题。各位都知道波兰是红军分两个阶段解放的。第一阶段解放了到维斯瓦河的波兰领土、卢布林波兰，以后解放了其余的波兰领土。当然波兰其余部分与第一部分有许多不同。首先，在这部分领土上有波兰的主要工业中心，其次在民族意义上也有不同。对波兰这部分领土上所谓福利克斯杰切分子，即已经被德国人日耳曼化了的波兰人的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由德国并入波兰的那部分领土上的问题也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些领土在政治意义上也有其特点。

1939年后波兰被分割。建立了所谓的总督区^②和被并入德国的另一部分波兰。在总督区，政治工作、一般的政治生活还是开展了，而在1939年以后并入德国的领土上，那里的情况当然就是另

① 亚·谢·潘友新，苏联外交家。1939～1944年任苏联驻华大使。1944年9月，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副主任。

② 根据希特勒1939年10月8日和12日的命令，波兰的波莫瑞、大波兰、西里西亚地区各省及罗兹、克拉科夫省的一部分等地区被称为德意志人省，并入德国版图；其余德国占领区组成所谓“波兰被占领区的总督管辖区”，后简称总督区。总督区下辖克拉科夫、华沙、卢布林、拉多姆4个行政区。

一个样子。那里的政治生活，各政党的政治活动很少。

波兰各地全部解放后，在这部分领土上我们遇到了这种差别。当然，波兰解放后我们也遇到了很大困难。首先，所有的企业主在德国的引导下逃离波兰，所有的工厂都没有了领导，没有了管理部门。我们需要立即建立对所有企业的领导，我们需要吸收、寻找新人。大家都明白，我们在交通运输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主要的铁路枢纽站，如华沙站，完全被破坏了。还有附带的困难。波兰政府应当实行统一的货币。在这些领土上^①有德国马克，在属于总督区的领土上有所谓的喀尔巴特斯兹罗提^②。需要实行一种新货币，并进行货币兑换。这是些附带的困难，它阻碍了工作与发展。

但是目前我们已经基本上了结了这一切，并已恢复重建了某种秩序。

我们对工业是怎么做的呢？全部工业基本上在国家管理下接管过来了。在那里我们的情况是，被占领时期除小工厂及手工业企业外，全部轻重工业都由德国人管理，而现在由波兰政府接管。在工业部下面我们为每个部门工业设立了总局。有多少部门工业，就设立了多少总局。当然，只是主要的工厂，不是全部工业都归工业部管。小厂归省里的所谓工业厅管理^③，这些工业厅从属于省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很小的企业从属于县人民代表会议下设的工业处。^④这只涉及小工业。基本上全部轻、重工业都直接从属于工业部。

现在，我们只有个别情况下小工厂才是私有的。基本上全都在

① 主要是卢布林省。

② 波兰证券银行发行的国库券。

③ 原文如此。

④ 实际上，波兰在1945~1950年组成的人民代表苏维埃并没有管理工业部门的权力和任务。只是在1950年进行地方机关行政改革后，才有了类似的职能。

国家管理下。当然，我们不想一直抓在我们手中，国家手中，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全部困难。我们将抓住重工业、非常大的工厂不放，而小工厂，甚至那些没有主的工厂及过去是私人的工厂，我们都移交给合作社，或者甚至在适当条件下，交给私人工业者。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工业。暂时国家还没有力量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工业方面我们有些什么困难呢？第一，我们刚刚开始较为有计划的经济。我们已经建立了工业管理机构，但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制定出所有工业部门的生产计划。是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些事，以便能有个计划，我们已经制定了主要行业——煤炭开采的计划。

我们在西部地区的工业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破坏不大。我们损失大的是在波兰过去的中心地区。在华沙、拉多姆斯科-凯尔采省主要是冶金业，而凯尔采省主要是军事工业。那里一切或者说字面上的一切全毁掉了，剩下的很少。而在红军迅速挺进的西部地区，德国人没有来得及摧毁工业。因此我们在上西里西亚及东布罗瓦煤田的煤炭工业、重工业，以及罗兹的纺织业，以及波兰各地的机械制造业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我们开始制定计划，已经制定了煤炭工业计划以满足全国的全部需要，以及铁路的需要，此外，也为了让我们有可能出口煤炭。

我们煤炭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了。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过去波兰平均每天每人开采 1800 公斤煤炭，现在（没有最近几天的确切数字），三周以前生产率是 440 公斤。这是很大的下降。

当然，我们很快就会提高生产率，但是我们暂时还不能很快提高到 1939 年以前的水平。我们想，在几周之内也许可以达到 1000 公斤，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说煤炭工业的状况是不缺原料，

只缺劳动力及其他工具，那其他工业部门中原料有时是开展工作的主要障碍，但是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在纺织工业方面我们得到了棉花，和苏联签订了合同。所以纺织工业开始干得不错。劳动生产率在这里也降低了。交通运输很影响工作。各工业部门首要问题是工人的供应问题。我们到今天还没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着手解决，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几个月前我们有些工人、有些厂矿举行了示威，甚至举行过几小时的罢工，因为我们没能完成按供应证供应工人的任务。这是由于国内没有粮食。主要的困难是组织工作和交通运输工具。当然，如果说有了脂油、肉这些国内短缺的东西，但这些东西还很少。

如果我们想从这个角度看看党的工业工作，那我们和政府都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当然还需要做许多工作，以使它按部就班，形成使工业正常发展的状态。可以说我们那里工作的工人是1939年的1/3多一点。在整个工业中约有35万工人在工作。

第二个我们已经干过的工作，就是实行了土地改革，它已经基本结束了。我想关于土地改革的详细情况从报上已经了解了。平分土地是怎么开始的，什么人分得多少，都提供了最新的确切数据。因此我就不谈了。

我只想从工人、农民的积极性角度谈谈土地改革，及它是如何进行的。应当说土地改革基本上是靠城市工人的力量与双手、党的力量来完成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的积极性是比较小的。我稍后再谈其原因。

毕竟我们的党在土地改革中很迅速地发展了，巩固了自己在农民中的力量。

如果谈到播种，应当说我们的处境很困难，问题就在于畜力。马剩下的很少。我们没有确切的数字来做比较，但是毕竟有些县剩下的马不超过1939年的10%。这个问题上的处境简直是灾难性

的。

除了这些困难，播种工作基本上进行的还比较不错。当然，我们有红军部队、波兰军队的帮助，他们提供了马匹帮助，地种上了，但毕竟还有些地没有种上。这首先是原来的战场，维斯瓦河流域地区，那里约有60万公顷土地没有种上。这是因为这片地域埋着地雷，而且至今没有清除。无法播种。

有时，有些农场没有主人（这种情况不多），因此地没种上。但是总的我们可以说，春播搞得不错，完成了90%。

当然，我现在谈的一切都涉及到1939年边界以前的波兰领土。现在从德国归并到波兰的领土上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刚刚在那里建立了波兰行政当局，那里的工业还没有完全接收。现在正是红军将工业转交给波兰行政当局的阶段。那里基本上是红军搞的春播。

我们这方面什么都没做，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那些领土，没有迁完居民。这里也有一个运输工具问题。你们知道，按照波兰政府和苏联政府的协议^①，我们把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全部波兰人撤走，并有把他们首先送到西部地区的想法，但是这解决得很慢。这里我很难说。有150万到200万人。截至今天迁走的不超过10万人。所有住在苏联的波兰人基本上都回波兰。困难只是运输工具。除了这些波兰人，我们还有许多人自愿移居到西边德国的领土上去。我们几千人志愿到西部领土去。我们还没有开展任何有组织的运动，还因为我们的机构尚未开始工作。我们刚刚建立政权机关。为了迁移几百万人，需要组织行政机关、民警机关等等。

移民问题和土地占有问题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没有红军的帮助我们不能掌有这些领土。这样的帮助是必要的。这种帮助今

^① 1944年9月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先后签订了迁移居民的协议。

天有，将来也还要有。对波兰，而且不仅是对波兰，掌有这些土地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对此我们现在给予充分的评价。战争结束后，运输工具应当容易解决一些，也许可以开展大规模移民和开发西部土地的工作了。

关于波兰军队我想谈几句。我们在这方面也在进行工作，并且在扩大波兰军队。我们有一项计划，准备今年就把波兰军队扩大到20个师。但最大的困难是军官队伍。我们没有军官，我们的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不足。我们可以很快拥有低级和中级军官，而我们无法在短期内解决高级军官问题。这需要许多年。当然，我们不能把波兰军队完全建立在旧波兰军队的军官队伍基础上。例如红军从德国集中营里解放出数千名早在1939年被德国俘虏的波兰军官，但我们由此得益甚微。经考核，确信这些人有10%，最多15%可以招收入军队，其余的从政治角度上看不合格——是些危险分子，所以我们不能用他们。

之后我们对学校给予了特别的注意。现在往军官学校派了工人，青年工人、农民，当然，将来会建成政治可靠的民主波兰的军官队伍的。

军队问题我们暂时也还没解决。一些很重要的机关，政府机构都在关心着军队，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重视。

军队的供应。如果谈到这支军队的供应，那么应当说，除武器外，军队的供应由波兰政府掌管。暂时我们还没有武器，因为我们不生产，但是我们已经在制定这方面的计划来重建军事工业，重建的意思是要组建军事工业，因为我们有基本的军工厂。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我想我们也能自己生产武器。

简单地说，我们的工业、经济、军队就是这种情况。

现在我谈谈主要的，政治和对波兰形势的政治评价。你们都知

道，波兰的临时政府^①是以所谓的民主阵线为基础的，民主阵线的基础由四个政党组成，首先是波兰工人党，还有波兰社会党、农民党和第四个党——民主党，但是我们这里的问题很复杂。如果谈到这几个党在人民中的地位，那可以说我们党——波兰工人党——在工人阶级中有很大影响，大于社会党的影响。我们党不仅在工人阶级中有影响，而且在农民中也有影响，尤其是进行土改以后。我们在农民中的基础巩固了，这有别于社会党，它在农民中，在农村根本没有影响。它只是在城市，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甚至在小资产阶级中有影响。我们党在国内是决定性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党已经拥有了人民中的大多数。我们党有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但是工人阶级在人口中只占比较小的一部分。我们的国家是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60~65%，而在农民中影响大的是农民党。于是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农民党与政府合法地共同工作，但是该党另一部分人暂时还持保留态度，暂时还不积极工作，不支持政府。不久前的情况是，大多数，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农民党处于米科拉伊奇克影响之下，处于1944年以前的伦敦影响之下。农民党内自1944年初形成了反对派，由一些与我们很接近的人组成^②，他们在农民党内活动，并且在农民党内部开始形成，现在这个反对派还存在。

同志们，在这里应当说，我们在对待农民党方面犯了一个小错误。1944年波兰一部分解放之后，在所谓的卢布林波兰的土地上，我们对农民党进行了很大的限制，我们不允许这些有时不完全和我们一致的人能合法地工作。我们想建设一个能完全和我们意见一致

① 1944年12月31日，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定，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波兰临时政府总理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第一副总理是哥穆尔卡。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农民党和民主党均参加了波兰临时政府。

② 指1944年2月在波兰工人党建议和支持下形成的农民党“人民意志”派。

的农民党。当然，这没成功。因为农民党的积极分子基本上没有加入我们建立的那个同盟，如果说有些人来了，那也不具备任何独立工作的条件。

在第一阶段，可能也很难实行其他政策，因为农民党在伦敦有自己的领导中心，所有的批示都来自伦敦，而伦敦的决定又都是抵制政府，反抗当时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所以实行其他政策很难。

而我们的错误主要在于，以后，当农民党内部已经发生变化时，我们没有考虑这一点。波兰解放后，民族委员会及波兰解放委员会工作几个月后，非法的农民党内部形成了反对派，他们不愿服从米科拉伊奇克，不愿进行非法工作，不愿和我们、和解放委员会斗争，他们开始寻求走出地下的途径。我们在这方面帮助他们。简而言之，在卢布林波兰的领土上，我们没有给予农民党作为在农民中有影响的独立伙伴的权利，因此我们没能把整个农民吸引来支持临时政府。

今年，在1、2月份新解放的领土上，我们也没有立即正确地开始工作。是的，新来了一些人，但这个农民政党的主要积极分子没有加入这个党，农民党。留下来。如果来了，那就开始合法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朝他们要求的半合法的工作方向进行。例如，我谈到过的土地改革。这项改革是我们搞的。农民和农民党参加得很少。在这里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得出结论，对农民来说，这些问题我们处理得不完全正确，我们对使农民激动不安的事情没有做出答复。失去土地的农民想达到的目的是生活和地主的土地，而当事情涉及平分这片土地时，他们的积极性不高。这怎么解释呢？这是由于波兰政府还没有向农民宣布把这块土地给他们。农民还处于反动宣传的影响之下。反动派说，平分地主土地这是集体化的第一阶段，平分土地后将要实行集体农庄，分到土地的人都得首

先加入集体农庄。波兰农民很怕搞集体农庄，不希望搞集体农庄，因此反动派得以使农民土改的积极性不高。积极性最高的是雇农，但我们宣传工作仍做得不够，对农民对集体农庄的不安、我们党对集体农庄问题的想法，基本上都没做回答。现在开始给予这个回答，并开展了宣传运动。我们的答复是这样的，在现阶段对波兰集体农庄还没有什么想法，我们将直截了当地对农民说，我们党反对集体农庄，我们党不会违背人民的意志。

季米特洛夫：如果有人想加入集体农庄，那怎么办？

韦斯瓦夫：如果有人想加入集体农庄，我们也不实行。我强调了：在现阶段，如果我们沉默不语，那是因为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我们需要同斯大林同志商量。我们要让波兰农民干的，只能是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去做。

季米特洛夫：你们反对强行实施集体农庄，可是如果有人愿意呢？

韦斯瓦夫：哦，我们那里暂时没有这种情况。再有，我们党内对待农民上有许多宗派的东西。我们不允许农民党独立的干。当然这导致它不能进行工作，无法发挥很大的影响，在现阶段这是很有害的。我们在农村还没拥有大多数，现阶段我们还需要农民党作为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伙伴，需要一个在民主的立场上，即承认临时政府，反对伦敦政府的立场上真诚工作的伙伴。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很多现在尚未积极工作的农民党党员吸引到这一立场上来。我们可以把他们吸引过来，并在他们的帮助下与为数不少的我们不能吸引过来的人进行斗争。

但是应当说，同志们，在农民党内正发生巨大的变化。例如农民党是个非法的党，米科拉伊奇克等人的力量还比较强大，该党已

通过决议，退出作为伦敦阿尔齐舍夫斯基^① 政府的基础的所谓的统一委员会。他们是在3月中旬通过这项决议的，尽管不是一致通过。那里有些人反对这项决议。这意味着农民党党员中的分化过程已经大大向前推进了。

如果谈到其他政党，社会党，那是另一种状况。不能说它不是个独立的政党。这是个真正独立的党，在它的队伍里也有各种派别。有的派别是真正真诚与我们党合作的，如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等人领导的一派和其他想诚实工作的人，他们像我们党一样，看到了需要建立一个工人政党的前景。有的派别还不确定，还处在阿尔齐舍夫斯基等反动分子影响之下，但是这些人也担心，甚至说他们不同意让波兰成为第17个苏维埃共和国^②，并将为此而奋斗。波兰社会党里有这样的派别。还有第三派，这是代表阿尔齐舍夫斯基等人的反动派别。当然，我认为这是很弱的一部分，最小的一部分。如果说到社会党人，他们所有的工作基本上全不合法。由这些已经完全败坏了自己的名声、不属于合法政党的人建立的只是小团体。波兰社会党的情况就是这样：首先它是独立的党，它正在经历相应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与我们、与政府合作的这部分，在不断强大。如果谈到第四个政党——民主党，那么当然，这个党很弱，没有多大影响。他们没有开展工作，没有建立比较牢固的基础。他们拥有少量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在民主党队伍中有不少过去的反动分子。但这对我们不是重要问题。

季米特洛夫：那是些资产阶级分子喽？

韦斯瓦夫：我也许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分子。这是个很没有影响

① 托马什·阿尔齐舍夫斯基，曾是波兰社会党“自由、平等、独立”派领导人之一，1944年秋接替米科拉伊奇克担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

② 苏联当时有16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这句的意思是不愿意让波兰被苏联吞并。

的党。人数很少，影响很小的党。因此，我们如果考虑在现阶段政府已经存在，那么没有民主党，国内也不会有任何变化。而如果谈到农民党，就不能这样说了。农民党现在进入政府，加入民主阵线，虽然，由于基本的积极分子不在这个党的队伍中，它还不强大，还不很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没有这个党我们是不行的。

季米特洛夫：他们有独立的行动纲领吗？

韦斯瓦夫：有独立的行动纲领。这个行动纲领我们可以同意，而且可以签字。同志们，我们很重要的问题是反革命分子问题，反动派问题。如果反动派来了，他们依靠谁，他们的基础在哪儿？可以说，首先，我国的反动派在波兰 1939 年前旧的行政机构中有影响，它保留了下来，我们当然清除了它的影响，并将它从政权中清除出去。但这个机构造就了一部分反动派。反动派无疑在富农中、在一部分农民中有影响。反动派用自己的影响掌握着一部分知识分子，一部分科学界人士，各种教授等等，他们处在反动派影响下，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在积极工作。反动派拥有天主教教堂、教会，拥有一部分青年，尤其是在城市。在德国占领时期，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秘密地学习。这是普遍现象。例如在华沙有 4000 多名各大学和高校的青年参加各类小组。约 4000 人秘密学习，干专业性的工作、挣钱等等。

反动派当然在这些城市青年中有影响。再有，反动派在各种投机分子中有影响。投机倒把在我们那里很普遍。我们甚至有一部分工人阶级在被占领时期和现在都不是靠工作，而是靠投机倒把来谋生的。在这些投机倒把分子中反动派也有影响。这是他们的基础，而且是不小的基础。我们应当回答什么呢，同志们？我们应当回答，反动派从不直接发表自己的纲领。我们没有一个党不谈民主波兰，不谈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党，反动派也在谈民主的党。所有反动集团也都说，他们不希望在波兰重新出现 1939 年以前的状况，并

且表示反对萨纳奇。他们口头和报刊上的宣传都总是强调这一点，可是他们主要反对谁呢？反对临时政府，反对我们党，他们总是说，波兰政府落入一个党——共产主义的工人党手中。其他的一切，按照他们说法，不过是从属于我们的附属物。他们主要的口号是说我们想在波兰建立苏维埃国家，而他们反对这一点，并且说，政府和工人党是苏联的代理人，他们反对这个代理人。在宣传中，他们引用来自生活的各种材料反对我们。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就是恐怖行动，就是游击斗争。反动分子早从去年7月份就一直在进行反对我们的斗争，而现在，尤其是最近他们加强了这一斗争。反动恐怖在加剧。从地理上看，这种恐怖行动类似游击斗争。这首先涉及卢布林省、比亚威斯托克省及德热舒沃、罗多姆斯科省^①。这些地区都属所谓的总督区，而在西部地区，那里反动分子暂时没有任何行动，不是因为他们不想，他们到处都想这样干，但是正如开头我所强调的，在西部地区恐怖活动的条件不同。总的来说，在总督区一直存在的党内斗争，在占领时期搞得规模更大了。这是一场自相残杀的斗争。西部地区没有这种情况，地理条件不利于此。

组织恐怖行动首先是针对我们党的。我现在没有确切数据，但是无论如何我可以这样说，在波兰存在期间，以各种手段，主要是突袭的手段，已经杀害了我们党数百名党员，绝大部分是在农村工作的积极分子，因为那里行动容易些，在城市里要困难些。有些地方对我们党组织的恐怖很残酷。我们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在农村，我们的积极分子被推举出以后，恐怖主义分子就到他们家里去，夜里就把人杀了。

季米特洛夫：这说明你们没有狠狠打击他们。你们是执政党

^① 后两个省应为热舒夫、凯尔采。

啊。

韦斯瓦夫：不，季米特洛夫同志，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不想要自相残杀的战斗。

季米特洛夫：不打击是不行的，应当进行清除。

韦斯瓦夫：我们也在清除。我们是这样做的。在那些发生恐怖活动的地区，我们武装了党员，可是党员武装起来之后，开始使用私刑。党员谁也不请示，就去杀人。有过这类情况，在城里把人打死，把尸体扔到街头示众。我们反对这样干，因为我们虽然是执政党，但是党员的行动应当受政府的约束。

季米特洛夫：应当和反动派斗争。

韦斯瓦夫：我谈的是反动派在做什么。至于我们在做什么，我暂时还没谈到。我们习惯于斗争，我们在被占领时期就曾和反动派斗争，并且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毫不留情。如果要统计我们斗争的对比表，那么我们的对比表是不错的。而且我们现在也在斗争。如果我谈到恐怖行动，那是为了使同志们明白，反动派在进行恐怖活动，因为他们感到这是最后阶段，需要全力以赴，才能把形式搞乱。我们的情况特别困难。我们的情况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不同，那里政府问题已经解决，政治上已经稳定。我们暂时还没能根据克里米亚会议解决政府问题，而此刻反动派正在努力制造一种好像人民真的反对政府的局面，以给英国人或是其他什么人提供根据。他们在这方面不惜余力。我们知道不只是他们在干，还有其他情报机关也在干，他们从这些情报机关获得援助、武器和钱。

谈到反动分子，我应当回忆一下所谓的乌克兰布利博夫分子^①，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这是在波兰的南部领土上。波兰领

^① 在西乌克兰和波兰活动的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

土上现在有各种残匪，他们在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没有被消灭掉，转移到波兰来了。我们与他们进行斗争。有时，布利博夫分子烧毁整座整座的村庄，朝波兰居民开枪。以前的情况是，当时所有这些人，从反动派到共产党人，建立起统一战线。虽然同他们仍在进行斗争，但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在波兰的领土上有从苏维埃乌克兰来的苏联讨伐队，在消灭他们。

季米特洛夫：这是对你们的援助。

韦斯瓦夫：这是帮助，但只持续了几个月。进行这样游击斗争的人知道，消灭这些分子不很容易，这是很艰巨的任务。

季米特洛夫：居民帮忙吗？

韦斯瓦夫：是的。现在我说几句我们为反对反动派的恐怖行动都做了些什么。在进行这些行动时有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可以说，由于不同原因，有，也没有。首先，一部分老百姓反对这种行动，支持政府，支持民主的波兰。其次，他们得不到农民的任何支持，因为他们劫掠农民，什么都抢。这些农民已经被德国人洗劫一空了。此外，他们还交纳粮食税。反动分子到他们那里去掠夺食品，所以这些农民都反对他们。总的说来，还没有出现这些队伍在老百姓中得到支持，使他们得以在农民中建立战斗基地的情况。

我们通过两条途径与他们斗争。第一，通过武装斗争。我在这里已经说过了，在他们开展活动、特别危险的地区，我们组建了游击队，他们与波兰当地政权机关合作。但是也有过我谈到的应当制止的那种情况，即应避免发生设立私刑。

第二，我们借助开展政治工作来进行斗争，在这些反动派进行恐怖活动的地区，我们与其他政党共同举行群众大会。我们的农民总是每周去一次县城赶集，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举行群众大会，我们讲反动分子直接与法西斯分子合作，这具有什么意义，他们不仅是波兰政府的敌人，而且是大家的敌人，这是法西斯分子与希特勒

分子的帮凶。例如，在有些情况下，他们杀害波兰军队的军官。众所周知，最近一名军官是妇女们在卢布林开枪打死的。

现在全国人民，甚至伦敦的支持者，和那些不赞成临时政府的人，都直接反对反动派。

我们的策略就在于此。我们力争从人民中孤立出那些现有的反动残余，那些用钱来眷养这批人，靠暴利和劫掠来眷养许多精神堕落分子的人，使他们不能在老百姓中建立基地，不能掀起自相残杀的战斗。此刻我们尤其不需要这些。这种广泛进行的反对那些现在明显不支持临时政府的人的斗争对我们是有害的，因为他们并不支持恐怖行动和反动派。

在我们党内甚至有这种情绪，我们有些同志试图以恐怖行动，以内务安全部队讨伐队的行动取代政治工作。某些领导同志有这样的追求，他们以为如果再办一座集中营，可以把这些地区数千名看起来不可靠的人抓起来，那时问题就解决了。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持另外一种观点。这种措施不会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我们不去办集中营，不在居民中搞大规模逮捕。

季米特洛夫：这是正确的，没有集中营不行。

韦斯瓦夫：我们有集中营。我想谈谈最近波兰政府与苏联签订的协议^①问题。签订协议后，我没有在国内，但是我了解在这之前对这个问题存在什么样的情绪。这是需要说的问题。应当说，与1939年以前相比，波兰人民对苏联的情绪确实有了一个转变。我们认为这是很大的成就。同志们，如果提醒一下，1939年以前反动政府的敌对宣传是针对苏联的，而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大部分人民拥护这项协议，拥护苏联。当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红军解放波兰这一事实，但是不仅是这一点促进了根本的变化。应当说，过去的政

^① 指1945年4月21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波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策是为了把波兰和西方强国，尤其是和德国联系在一起，而在这里是与苏联的合作问题，斯拉夫人的合作问题，有深刻意义。因此绝大多数人主张签订这个条约。

在人民中，在各阶层中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波兰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使苏联把波兰看做是平等的伙伴，不要强行实施这样或那样的政策。这个问题，当然，在波兰存在。

季米特洛夫：在党内呢？

韦斯瓦夫：我谈的不是党内，而是波兰国内。

季米特洛夫：谢天谢地，不是在党内。

韦斯瓦夫：为什么您这么说？我谈的是其他党的情绪，它们想利用现在我们在波兰有红军和有些同志认为可以以此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事实。我们对政治局和其他各党说，我们不能以此来解决问题。关于波兰问题我们希望解决，但将用增加党的政策的吸引力的办法来解决。

季米特洛夫：红军是波兰的解放者，而你们认为这是障碍。红军在波兰领土上是为了援助波兰人民。

韦斯瓦夫：谁说这不好了？您大概没理解我的意思。我谈的是波兰人民对条约的情绪。我说这是真正的转折。我们时时感觉到转折。我同时说，在人民中间有一种思潮，希望将来波兰与苏联的关系不要建立在一国或另一国的实力基础上，——当然，和苏联相比波兰有什么实力呢？——而只是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

季米特洛夫：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这就是苏联的政策。

韦斯瓦夫：我谈的是反动派怎么说的。与波苏协议相关的还有一个事实，这就是毫无疑问这个协议巩固了波兰临时政府的阵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成就。它从政治上巩固了波兰政府，同时巩固了

我们党的工作。

简要说，波兰现在的几方面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

谈一谈我们党的情况。当然我们党在成长。我们现在拥有差不多 14 万党员。这就是说，与被占领时期相比，我们增长了 20 倍。数量上增长了，尤其是在西部领土上。被占领期间我们在那里也没有大规模开展工作，但是现在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且迅速成长。

现在还缺少些什么呢？到处都缺少党的积极分子，我们尽可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办着一所中央党校。已经有第二批学员了。过去在卢布林建立了一所 150 人的学校。这所学校没有办完，因为红军来了，所有人都搬到西部去了^①。现在，6 周或是 1 个月以前，在罗兹开办了一所 500 人的党校，学校办的是短期班——8 至 10 周，不再多了，因为工作岗位上需要人。我们有意培养更多的积极分子，并让尽可能多的人——近 3000 人——在这所学校接受培养。可能以后我们将建立更大的学校。

在现阶段我们看到许多党组织在对待我们的盟友方面有一些宗派主义的危险性。甚至有这种情况，有些县、乡的党组织的书记，不经他们允许就不准开会。当然，我们反对这样做，大家都同意了，可是这类现象仍然有。总的说，最近我们党内存在这种宗派主义的危险。我们国内正好现在在讨论这些问题，同斯大林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我们党的工作中做些改变。

我们面临什么样任务呢？首先，巩固我们的民主阵线，巩固的意思就是吸引我们比较积极的伙伴——农民党，甚至波兰社会党进行合作。巩固的意思是使我们的伙伴——农民党，甚至波兰社会党更加积极起来，使我们与波兰社会党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在合作的土壤上创造将来建立统一工人党的条件。

^① 指 1944 年在卢布林办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党校。该校于 1945 年 2 月迁往罗兹。

在当前阶段的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主要的任务，就是加强民主阵线。

下面，关于议会选举问题，竞选活动问题，我们还没有开展什么工作。然而这个问题，尤其是现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已经充分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需要考虑，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进行选举和竞选活动。这方面我暂时还不能准确而肯定地说什么，因为有些问题党内还没有解决。我只是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形势已经把它推到我们面前。

接下去，谈谈经济工作。我们已经把党的积极分子、党的好干部派到工业工作岗位上去，经济工作岗位上去。这里的问题很重要，很关键，尤其是因为我已经谈到的问题涉及劳动生产率、涉及工人的供应。

我们暂时无意搞工业国有化，我们认为这还可以等一等，由于波兰有许多外国资本，英国的美国的，所以，提出工业全部国有化还不是时候。应当只是现在的临时管理。不仅如此，我们认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好地组织工作，必须使厂长、工程技术人员得到物质利益，如果工业干得好，就把一部分利润发给他们，作为他们工作的奖金。

关于向西部移民，我已经说过了。这也是主要任务之一。

下面，我们党内有一个党的思想巩固的问题，因为党已有14万党员，这是一个还不巩固的党，它还没有政治上的脊梁。因此需要给予思想意识上的导向，通过各种途径做工作。我们开始出版党的丛书、各种小册子等。接下来，我们在省委，甚至县委下附设学校。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比较坚强的党。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党在思想方面不强。我们还存在着有怀有敌意的分子混入党内的问题，清党的问题。也这么说不正确，然而需要实行某种清洗，因为在我们国家的岗位上有这种分子，他们任县长或是副县长。他们入

了党，我们对他们一审查，原来这是些萨纳奇分子，以前的国家民主派，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只是为了飞黄腾达，为了得到好工作。我们将要剔除这些人。有一个省，我们有9名担任负责职务的人需要剔除出党。有些是反动派的领导派到我们党内来工作的敌对分子。

谈几句关于不邀请波兰参加旧金山会议^①问题。波兰临时政府暂时没被西方大国承认。当然，这影响并加强了反动派的活动，促进了敌对情绪的形成。这种情绪广泛地笼罩着居民，他们说，现存的政府还不算数，还会有变化，有了克里米亚会议决议，也还要等以后的变化。这种情况对知识分子特别有影响，他们在等待，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因此政治形势不能促进政府国内阵地的巩固。

但是如果谈到人民的态度，那末阿尔齐舍夫斯基政府，伦敦的反动政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甚至得不到那些做过秘密工作，加入过所谓民族统一的党的支持。

我们手头有一些文件、材料，它们能够证明这些党对阿尔齐舍夫斯基政府所持的立场。这些文件说明，不是我们，而是他们承认波兰人民不理解阿尔舍夫斯基政府，而且不支持这个政府，因为阿尔齐舍夫斯基与反动分子、与被称为“民族武装力量”的分子有联系。这是法西斯组织，在波兰作为国家军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但却是独立的一部分，而阿尔齐舍夫斯基与他们联系上了。他们自己说，波兰人民对此不理解，也不支持阿尔齐舍夫斯基，所以他们要求（这些文件是两个月以前的）让农民党人、米科瓦伊奇克等加入阿尔齐舍夫斯基政府，以造成一种在伦敦它是人民支持的政府的局

^① 1945年4月25日，5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就成立联合国一事举行会议。由于美、英尚未承认波兰临时政府，因而苏联提出的邀请波兰临时政府代表出席会议的提议遭到西方国家拒绝。同年6月，按雅尔塔协议组成了波兰民族统一政府，美、英等国予以承认。10月16日，波兰政府代表在联合国宣言上签字，正式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面。关于阿尔齐舍夫斯基政府问题，这不是什么问题。波兰人民并不支持它。如果说过去还是个政府，能做出决定，那么现在这些都没有了。现在它不过是个波兰反动派的国外委员会。

—克里米亚会议解决了波兰问题之后，我们有了良好的条件。首先，已经可以形成政治稳定的局面。当然不是说没有引导人民会直接依附于临时政府。政局会像全党一样巩固起来，我们一定会更加巩固。

同志们，这几点，就是我想阐明的。如果有问题，我可以回答。

问题：农民党当前对米科拉伊奇克及米科拉伊奇克集团持什么态度？

问题：党领导的积极分子基本上是怎样更新的？

问题：是什么引起临时政府人员的变动，尤其是马斯良科退出政府？^①

问题：维托斯声望怎么样？

问题：天主教教会搞些什么活动，他们是什么立场，对临时政府实施的措施是什么态度？

问题：请接着这个问题顺便谈一下，梵蒂冈与教会的关系。

韦斯瓦夫：两个问题涉及到同一个事。米科拉伊奇克和维托斯，对米科拉伊奇克的态度和维托斯的声望。情况怎么样？同志们，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个事实，农民党是个包含从贫农到富农各种农民的政党。因此在农民党里有党内斗争，而且不只是现在有，过

① 从1945年3月底至5月初，波兰临时政府成员发生了一系列调整。其中主要有：波兰社会党的奥特洛夫斯基取代波兰工人党的什达赫尔斯基成为供应和交通部长，波兰农民党的利特文成为新组建的卫生部部长，波兰工人党的奥哈布取代波兰农民党的马斯良卡（文中误为马斯良科）成为民政部长，民主党的日莫夫斯基取代波兰社会党的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成为外交部长等。

去也有。关于米科拉伊奇克是怎么说的呢？米科拉伊奇克在农民党里没有很大影响，因为他是农民党右翼。他是波兹南人，人民民主在那里有很大影响。反动政府及所有反动分子推举米科拉伊奇克，因为他们期待这会有好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党及那些还没有和临时政府合作的人支持米科拉伊奇克。我本人曾经和一些农民党人交谈过。他们回想起 1938 年农民党人曾提出土地问题。他们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通过决议，说应当无偿地征收地主的土地。米科拉伊奇克反对这样做，并且同一些代表退出会场。^① 农民党人现在也在说，米科拉伊奇克总是和这些右派分子合作。因此他不是作为农民活动家，而是作为伦敦政府的代表，作为与临时政府对立的人、身边集中了所有敌对分子的人出名的。

维托斯和他的声望。当然，过去维托斯也总是在农民党的右翼，但是在萨纳奇时期他曾被毕苏斯基逮捕，并关进布列斯特监狱。在那里维托斯一直表现很好，没有屈服，对毕苏斯基及萨纳奇分子进行抵抗，表现出是一个坚强的农民。此后维托斯侨居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里不让他工作。早在战前维托斯就被推举为反萨纳奇政府的首脑。整个波兰民主阵营都说，维托斯应该反对萨纳奇。维托斯是个老人，他已经 72 岁，有病，不能行走。但是在被占领期间维托斯表现坚强。例如，德国人建议他写传单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红军，然而他拒绝了，甚至也没在为他准备好的传单上签名。可以说维托斯不是总同意伦敦政府的政策。这一点那些和他合作过的人是知道的。维托斯和米科拉伊奇克之间是有差别的。我们甚至有一份从国家军档案中拿到的文件，其中谈到不要造成维托斯在农民党中有影响的局面。

因此，维托斯在农民党的积极分子中，尤其是健康的积极分子

^① 此事发生在 1935 年农民党华沙代表会议上，而不是 1938 年的代表会议上。

中有声望。当然，关于他在流亡时的所作所为，关于他与米科拉伊奇克的分歧，关于这些，广大群众并不了解，然而农民党的积极分子了解这些。

现在维托斯的立场不确定。他说他赞成波兰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但是不赞成国内政策。他没有更详细地说，哪些他不赞成。他还说米科拉伊奇克做了蠢事，在被请到莫斯科去与民族委员会达成协议的时候，他却没有达成协议。^①——他服从了反动的流亡中心，在对待苏联方面没有实行独立的政策。

维托斯的问题不这么简单。如果回到这个问题上，可以在更广泛范围内来解决。维托斯是一个可以拉着手领到我们想去的地方的人。因此我们暂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维托斯自己没有积极工作，但是他当然有自己的人。

季米特洛夫：而且在碍事。

韦斯瓦夫：暂时还不能这么说，因为没有这样的证据。我们说，他赞成西方的政策，但不总是赞成国内政策。我们不能说他和占领者、和过去的萨纳奇分子合作过。萨纳奇也曾经迫害过他。^②

我们党的领导中有些新的积极分子进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不能活一二百岁，党的机构里，在省里，在县里等等有新的积极分子。我们追求什么呢？我们有很多人，但是有许多人没有考查过。我们把考查过的人放到党的岗位上，党领导中的积极分子大部分是曾被解散过的原波兰共产党党员。

马斯良科为什么退休了呢？有各种原因。基本上是因为人已经完全没有能力了，有结核病，搞两面派政策。基本原因是没有工作

① 指1944年7、8月间，米科拉伊奇克访问莫斯科时，拒绝与刚成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达成协议。

② 1932年，维托斯被华沙区法院判处1年零6个月徒刑。1933年10月，他流亡国外。

能力。

关于对天主教的政策问题，怎么对你们说呢？我过去已经对你们说过，教会是反动派的基地，是反动分子的支柱，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教会大多不支持临时政府。只有个别的教士积极参加民主波兰的工作。但是这只是个别情况。到今天我们拥有这样真正积极努力工作的教士不超过四五个人。然而由于教士在国内公开持天主教教会不问政治的观点，他们特别在青年中，在学校里开展活动。我们现时的情况是，教士像 1939 年以前一样每周有一小时讲道的时间。他们牢牢地抓住这一点，以免他们对青年的影响减弱。

已经提出了关于天主教与梵蒂冈的联系问题。各位都知道，正式的联系是没有的，但是非正式的联系大概有。我们甚至明确地知道，有。

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想和天主教著名活动家如萨佩加^①谈他们对政府的态度问题，他们会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要波兰承认与梵蒂冈的宗教协定^②。

① 萨佩加·阿达姆，波兰著名宗教界人士。1921 年起任主教，1925 年任都主教，1946 年任红衣主教。

② 天主教自公元 966 年传入波兰，1587 年被确定为国教。1925 年 2 月 10 日，波兰政府同梵蒂冈签订所谓“永久协定”，重申天主教会在波兰的独特地位。1945 年 9 月 14 日，波兰民族统一政府终止了该协定。

№01794

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就党内状况 给斯大林的信

(1945年5月15日)

致斯大林同志

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确认，党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尤其在对待政府联盟问题上，对污蔑临时政府、尤其是污蔑波兰工人党使波兰“苏维埃化”并在为在波兰推广集体农庄准备基础这类反宣传的态度上，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成分。

当前政治局势的特点是：一方面，在亲伦敦的团体中，在对待波兰反动派的流亡集团及国内集团的态度上产生动摇，同时在寻求与临时政府和解的途径；另一方面，法西斯反动派反对临时政府的宣传攻势和破坏、恐怖活动加强了。在这种形势下，党的日常工作中及立场上的宗派主义倾向变得特别危险。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向重视党内宗派主义的危险性，并与党的某些组织中的宗派主义实际表现进行了斗争，但是做得往往不够始终如一，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自己也表现出宗派主义倾向。

党的宗派主义错误大体可以归纳如下：

1. 如果说在中央，联盟政策是在各党间忠诚合作的原则上进行调整的，那么在地方，在省的范围内，尤其是在县的范围内，波兰工人党享有特权，地位特殊，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在各地形成一种看法，“波兰工人党震撼一切”，波兰工人党对任命国家职务（如县长）具有决定性影响，入了波兰工人

党就相当于在生活的各方面享有特权。

这引起波兰社会党、农民党、民主党地方领导和党员的屈辱感。波兰社会党为争取自己的影响而斗争，结果它赢得了很多，而在农民党党员中表现的是失望、积极性低落。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是波兰工人党许多党员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波兰工人党应该是居垄断地位的党，而其他党只是装饰门面。

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几个月来一直在与这种现象进行斗争，但是不够坚决和有效。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倡议下，几乎各地都成立了各党之间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无疑起了正面作用，减少了摩擦，消除了各党之间的争议。可是本应成为各党活动及在各方面共同努力工作的协调中心的各党的联合委员会，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变成了分配席位、组织节日活动等等的机关。更糟糕的是波兰工人党的一些代表在委员会里不是就有争议问题的各种观点进行讨论、协商，常常由于自己的宗派主义思想，而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发号施令等。

2. 党对农民党的策略过于强硬，没有考虑到农民党在波兰国内外形势影响下产生的变化过程。如果说在建立波兰国家组织基础的最初阶段，即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活动的最初时期，几乎农民党的所有组织都从事非法活动，服从米科拉伊奇克及伦敦流亡政府的批示，而农民党的军事组织——农民营——当时在解放了的波兰领土上几乎都服从于国家军领导，那么从1944年秋季起，在农民党内，尤其是各农民营中，解散和脱离国家军的进程加快了。这表现在许多县的农民营向国家政权机关缴械投降，不再进行颠覆性游击活动。由于国内民主阵营的成绩及流亡者中日益深化的混乱——其表现在米科拉伊奇克卸去流亡政府总理职务，农民党所有组织中断与反动派合作的趋势加强了。

党在对待农民党态度方面没有考虑该党内部这些根本性的变

化。如果在最初很难采取与农民党和解与合作的策略，那么在第二阶段，在相当的范围内出现了这种可能性。

红军解放了波兰全部国土后，党的方针是把称作“人民意志”的农民党团体吸收到波兰工人党中央领导机关，这个团体是我们在建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时期于被德国占领地区组织的。该团体的领导大多是波兰工人党党员或是支持者，这自然就使得各种动摇的民主活动家及对农民党感兴趣的人难以加入农民党的行列。党在实践中一直，直至最近几周都遵循对农民党内部事务进行一定干预的政策，这就使得加入政府联盟的农民党失去了独立性，我们党不但无法吸引那些政治上表现出动摇的人与临时政府积极合作，而且甚至无法吸引农民党的活动家和积极分子与临时政府积极合作。

党过分干预农民党内部事务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挑选农民党最高执行委员会——该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候选人。

该机关的12名成员有6名属于我们党，而其他成员中有2~3名不会拒绝加入我们党，如果向他们提出这样建议的话。

农民党最高执行委员会中属于我们党的某些成员，被机关的其他成员，以及农村青年联盟的成员、农民党的活动家及过去的积极分子看做是波兰工人党派到农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人。这种情况下农民党失去了自己的政治主动性及与政府联盟中其他政党平等的性质。

由于对这种领导持否定的态度，相当一部分原农民党活动家和积极分子没有积极参加创造性的工作及现在农民党的内部事务。这部分人指责党过分依赖波兰工人党，有些人甚至把现在的农民党说成是波兰工人党的一个分部。

从长远来看我们党过去对待农民党的策略，必须指出，在上述第二阶段的策略是不对的，因为它限制了把农民党党员中的所有民主人士团结到临时政府周围的可能，不能促进米科拉伊奇克和维托

斯的追随者中断与反动组织及伦敦流亡政府的合作，也就是说，这就是宗派主义的策略。

3. 相当一部分农民既不把当前的农民党主要领导机关看做自己的代表，也不把该党在临时政府中的代表看做是自己的代表（对这些和其他的东西，广大群众知之甚少或完全不知）。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甚至加入联盟的农民党的地方组织及农民民主活动家都认为，波兰工人党是国内拥有实权的惟一积极的政治力量。

对我们党有关这一任务及我们民主口号的真诚性的怀疑也深深地渗入到波兰社会党大部分党员之中。必须指出，我们有些党组织及某些党员对待政府联盟的态度为产生这种不信任提供了依据。例如，土地改革期间，我们有些党员，甚至有些乡党组织的领导人与农民谈话时说，土地改革是波兰农业集体化道路上的第一步。

4. 党的报刊以及组成政府政党联盟的出版物（口头上的或出版物上的）对无休止地反对土改、反对临时政府，向农民、向社会人士灌输临时政府进行土改是为了更容易实现集体化等等反动宣传保持沉默，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能产生，是由于我们党的所有组织都对反动宣传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没有勇气在这个对农民很重要的问题上阐明自己的立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沉默以及临时政府的沉默给了农民怀疑的根据，不仅如此，临时政府没能对无地农民给予应有的帮助，帮助他们在分得的土地上建立家业，至今没有研究给农民颁发土改分得土地的所有权证书。农民对反动派关于集体化危险的宣传，其反应可由这样的事实证明，他们怕买农业机器（反动派对他们说机器将归集体农庄），怕办拖拉机站，尽管他们没有牵引力。这一切都因为政府和党这方面没有开展认真的解释工作，说明政府把农机站看做是对个体农民经济的帮助。

5. 安全机关的日常实践是政治生活与国家生活的一个方面，

在这里宗派主义具有极大的威胁，而且往往具有讽刺意味。安全机关的领导岗位都安排的是波兰工人党党员，这与波兰工人党地方组织的宗派主义的规定有关。这在许多情况下导致有些人开始把安全机关与波兰工人党等同起来，为波兰工人党造成了特权，在安全机关滋生了对参加联盟的其他政党的不必要怀疑和轻视态度，阻碍了他们的发展，干预了他们的内部事务，同时表现出搞行政命令的倾向；还采取行政压制方法及逮捕不合心意、不愿退让的人的办法来克服各种难免的分歧与复杂化的事情。据记载，有这种情况，安全机关不经波兰工人党同意就不准许农民党召开会议，并且干预这个党的领导机关组建问题。他们不去监视打入联盟的各党敌对分子的活动，并在这些党的帮助下消除这一危险，以增进团结，反而常常实行个人冒险政策。

6. 某些党组织对我们运动已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倾向让步，也不善于抵制有些苏联同志不考虑波兰的特定情况，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的政治工作方式、方法，这加剧了我们党内的宗派主义倾向。可用以下的例子加以说明：

(1) 今年3月下半月，在克拉科夫举行了波兰社会党省委及积极分子会议，约有35人参加，在会有两位波兰社会党的活动家发言，发言中特别强调保持波兰主权的必要性。这些发言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波兰的主权受到了苏联的威胁。对这两篇发言，红军第四乌克兰方面军一位高级军官找到参加过上述会议的克拉科夫省省长，波兰社会党党员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位军官没有去消除波兰社会党中流传的各种苏联威胁波兰国家主权的蠢话，而只是简单地让他明白，最好波兰社会党根本别提波兰的主权问题。

有关波兰社会党代表会议进程的消息，红军机关是从波兰工人党克拉科夫省委书记那里得到的。红军代表和克拉科夫省长所做的声明，更加剧了克拉科夫省党的领导中原来已经根深蒂固的宗派主

义倾向。

（2）有少数军事指挥员大力支持波兰工人党各区委会的工作，同时按照联共（布）的模式给他们一些指导性指示，例如说波兰工人党的党委书记要比行政首长重要，在他掌管的地区一切都服从党的书记，党的书记要对一切负责等等。实质上这些正确的指示，在一些同志的概念中发生了具有讽刺性的扭曲。有这种情况，波兰工人党地方组织的书记要求自己拥有批准参加政府联盟的其他政党召开会议的权力，因为照他们的理解，波兰工人党是居垄断地位的党，而其他政党和团体是过渡性的短暂的附属品。这是最糟糕的宗派主义。

另一方面，这些事实证明党的领导机关在党员及基层党组织中进行的指导、组织及宣传工作存在很大的缺点。

鉴于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政治局决定本月 20 日召开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体会议，本月 27 日召开有党委代表参加的波兰工人党积极分子会议。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动员全党反对宗派主义，做出决议，并就党的工作及政治路线的下列基本点对党组织做出指示：

1. 给所有加入农民党的人创造在农民党中工作的可能，前提是他们承认两个基本条件，就是：承认临时政府是新生波兰的合法政权，并积极帮助贯彻国家的措施；不再与流亡政府有任何联系，并声明流亡政府的政策损害波兰人民的利益。

同时，党应当更坚决地反对任何利用农民党（以及其他党）来组织反临时政府斗争的企图，以及复辟农民党过去有害传统的企图。

2. 在这两项条件的范围内，对农民党采取能够使其拥有党的独立性的策略。承认直至目前党对农民党政治路线的影响形式是不正确的。

3. 坚决抵制党内任何宗派主义倾向，尤其是以安全机关的活

动取代党的政策的各种企图。通过巩固党的权威、积极性及主动性的方式，而不是特权与行政命令的方式来保证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对政府的决定性影响。在各联盟政党之间关系方面，必须遵循在各党联合委员会中平等地讨论、协商最重要的决定与建议的原则。只要不与联盟的基础及其团结背道而驰，就容许争论、批评以及反对。

4. 在党的报刊上，在党的一切言论中，需要表示坚决反对用似乎是临时政府和波兰工人党推行“苏维埃化”和“集体化”来恐吓波兰人民的反动宣传。同时应当强调，波兰工人党坚持波兰国家独立自主的观点，苏联也有同样的观点，这一点在1945年4月21日的苏联波兰条约中和波兰工人党对集体化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就是鲜明的反映。还必须指出反动派散布这类谎言的目的何在，同时用为农民们提供在土地上建房的优惠，发给他们土地改革所分到土地的所有权证来消除农民的恐惧与怀疑。应当具体规定农民互助活动的范围，以使农民对农民互助是为了巩固与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收益和提高农村文化生活的目的，不致产生怀疑。与此同时必须消除农民对从信用社付适当的钱得到农业机器在个体农业经济中使用的恐惧心理。还需要促进农产品在城市中的自由交易。

5. 借助用把企业转让或租借的形式、实际上容许小资本经济存在，来消除手工业者、小商贩、小企业主的不信任。

在对非工人阶级出身的厂长及工程技术人员充分保持警惕性的同时，必须开展斗争，反对日益增长的宗派主义，反对损害厂长、工程师在工厂里的威信，明确规定工厂委员会在劳动条件、工资、录用及辞退方面的职权范围。

6. 监狱中那些证据不足的犯人已被释放，从这个角度看，要通过国家机关对逮捕农民党员及其他人士进行监督。

7. 对社会安全机关的工作，尤其是对在安全管理机关处于领

导地位、负责岗位的党员的工作予以最大限度的关注。对于在国家机关中滥用职权的党员，要采取严厉措施，同时反对那些腐化堕落、实际上背离了党的人。

政治局认为，党在短期内能克服自己的错误及宗派主义倾向，从而巩固党在广大波兰人民群众中的阵地，并且扩大支持临时政府的基础。

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哥穆尔卡·韦斯瓦夫

1945年5月15日于华沙

№01795

北军队集群^① 政治部就波兰首席主教
赫隆德红衣主教在波兹南逗留情况的报告

(不晚于1945年8月23日)

关于红衣主教、波兰首席主教
阿夫古斯特·赫隆德^② 博士到达波兰的情况

7月21日 红衣主教波兰首席主教阿夫古斯特·赫隆德博士乘汽车从罗马抵达波兹南。

赫隆德直接过境抵达波兹南，没有顺路去华沙，没有去见波兰政府成员。他也没有去见省政权机关领导人，只是书面通知他们自己的到来。他以同样方式通知波兹南市苏军司令富尔特少将自己的到来。

这并不妨碍赫隆德向天主教教会代表声明，他是作为罗马教皇的使节到波兰来的。赫隆德是在正式接见天主教教会活动家时做的这一声明，但并没有在给省长及苏军司令员的书面通知中申明。

7月22日上午9时，赫隆德在波兹南天主教大教堂举行隆重的弥撒。他亲自在弥撒仪式上带领大家祈祷，祈祷结束后他向教民

① 根据1945年4月21日签订的苏波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组成的暂驻波兰的苏军部队，称北军队集群。第一任司令为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该集群所属部队除进行军政训练外，还对波兰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提供援助。

② 阿夫古斯特·赫隆德，自1926年成为波兰首席主教。

们布道。

省的行政单位及社会团体定于同一天上午 10 时举行纪念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发表一周年的全市群众大会。大会等待政府成员——斯塔赫尔斯基、斯瓦特科夫斯克和利特文部长的到来^①。群众大会的日期与时间是在赫隆德来之前很久就宣布了的。群众大会本身是由波兰政府确定的全波兰民族节日活动的一部分。节日的主题思想是波兰人民团结在民族统一政府周围。

波兹南的居民只好选择，或是去参加群众大会，或是去天主教大教堂参加赫隆德主持的祈祷。应当指出，聚集在天主教大教堂里、教堂的院子里及挤满教堂周围街道的居民人数是参加群众大会人数的数倍。到群众大会上的人不超过 3000 人（波兹南居民为 27.5 万人），参加祈祷的人数达 1.5 万人以上。来参加群众大会的是为数不多的党和工会组织的代表，而去参加祈祷的是无组织的市民群众及众多没有参加工会的行会组织。行会组织是举着自己的旗子，佩带着行会徽章来的。大量教皇颜色（白色和黄色）的旗子十分显眼。为迎接红衣主教，派出了一连波兰士兵。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举行群众大会的自由广场上，没有人想到要派仪仗队去欢迎前来的部长们——政府成员。的确，也没有正式发出派这样一支卫队来迎接红衣主教的命令。但是毕竟有某人的“关怀的手”保证了这次迎接。这只手还命令从自由广场上撤去铁路员工联盟的乐队，并把它派到赫隆德主持祈祷的天主教大教堂去。

尽管祈祷是在群众大会开始前就结束了，然而参加祈祷的人群并没有去开群众大会，而是各自回家了。

引人注意的事实是，波兹南广播电台 7 月 21 日多次广播赫隆德祈祷的通知，祈祷的时间、地点。与此同时却只宣布了一次即将

^① 三人分别为波兰民族统一政府供应和交通部长，司法部长，卫生部长。

召开的群众大会的时间和地点。

赫隆德在布道中说，“波兰人在长期战争与被占领之后，不要成为比1939年以前还不好的天主教徒。”说到背叛天主教的信条必定会招致“上帝的惩罚”时，赫隆德以犹太人为例，说他们出卖了基督，因此招来“上帝的惩治之手”。这个例子把杀死数百万犹太人的法西斯恶魔说成是上帝的工具，连教堂中的信徒都很反感。

虽然这次赫隆德布道是他多年流亡后第一次对波兰人发表讲话，而且虽然布道这一天是全波兰庆祝自己开始获得解放的周年纪念日，可是赫隆德对这些事实只字未提。

赫隆德的到来对广大居民阶层的影响已经显示出来。赫隆德履行义务后不到三天，波兹南省几个县（沙莫图韦、霍杰什）就试图重建战前的天主教青年联盟。这个联盟战前拥有几十万成员，是一个明确表现出反动性的组织。

指出下面这个很小，但是很典型的细节也很有意思。虽然赫隆德如上所述是乘汽车从罗马到波兹南来的，而波兹南省的半官方机关报《大波兰之声》报道说，赫隆德是乘飞机抵达波兹南的。能说明问题的是，尽管该报编辑看校样时两次将“飞机”这一词改为“汽车”，但是报纸出版时，刊登的简讯中还是说赫隆德乘飞机抵达。

№01796

乌克兰共产党（布）利沃夫州委书记
格鲁舍茨基就波兰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会议
副主席格拉布斯基在利沃夫
逗留情况写给马林科夫的情况通报

（1945年8月31日）

[……] 格拉布斯基^① 过去是法学教授，波兰民主党著名领导人之一。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利沃夫度过的，在这里曾多年领导被称作“天主教行动”的组织。该组织是以在东方广泛宣传天主教教会的准则为宗旨。格拉布斯基曾与天主教人士有密切联系。1939年以前曾领导利沃夫广播电台，是反苏宣传的狂热发起人之一。他在1939年以前的波兰报刊中及许多政治论文的前言中不止一次写道，苏联是波兰最凶恶的敌人，宣传大波兰沙文主义及帝国主义思想，宣传“从武力到武力的波兰”。他还不止一次地说，所谓的“东方的克利斯”^② 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波兰化。应当改变乌克兰部分居民的民族特征。

1939年9月，格拉布斯基留在利沃夫。同年他作为苏维埃政权的疯狂敌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并遣送到特别集中营。1941年大赦后，格拉布斯基迁居伦敦，在那里领导了所谓的

① 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民主党领导人之一。1941年后流亡伦敦。1945年起任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

② 克利斯（Крещ）是一种被叫做独行菜的植物。1920年苏波战争后，波兰统治阶级把被他们占领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称为“克利斯”。

“人民会议”，并长期赞同索斯恩科夫斯基、拉奇克维奇等人的反苏立场。

他于8月25日星期六抵达利沃夫。当天拜会了州执行委员会主席科济列夫同志。8月26日星期天，会晤了波兰政府遣送侨民事务的全权代表波德科莫尔斯基公民。根据各方面的资料来看，波德科莫尔斯基向格拉布斯基通报了利沃夫的波兰公民的情绪，对他讲了波兰爱国者联盟是个不值得联系的组织，因为这个组织中似乎“隐藏着共产党人”。当天波兰爱国主义者联盟的代表马祖尔教授和埃克施坦因^①到他的住所拜会了他。格拉布斯基极为冷淡地接待了波兰爱国者联盟的代表。马祖尔教授对格拉布斯基讲述了波兰爱国者联盟的路线。格拉布斯基也讲了来利沃夫的目的。谈话中他强调说：“我的基本任务是使在利沃夫的波兰人相信，必须尽快迁回波兰。”同时他还谈到1944年与米科拉伊奇克及罗默同去莫斯科及在莫斯科的谈判。他还声明说那时我们向斯大林提出利沃夫的地位问题。我尽力使利沃夫留在波兰国家之内。斯大林对我们提出的利沃夫问题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回过头来再谈，当前主要任务是要建立波兰民族统一政府。我当时对斯大林的话理解为，在利沃夫问题上他将做出让步；但是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主要是阿尔齐舍夫斯基—索斯恩科夫斯基，特别是当时在波兰（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奥库利茨基）的军方人士的过错，他们向流亡伦敦的波兰领导人报告说，爆发以苏联为一方和以英、美为另一方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如你们看到的，没有发生这种事。

当时在与马祖尔教授及埃克施坦因教授的私人谈话中，格拉布

^① 前者是利沃夫大学数学教授，波兰爱国者联盟在利沃夫的代表；后者是波兰爱国者联盟派驻利沃夫的指导员。

斯基讲述了他对第一次会见斯大林的印象。他说：“斯大林是一位很现实的伟大政治家，他理解，波兰应当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家，因为否则波兰就得不到美国和英国资本家的资助复兴自己的经济，尤其是在西里西亚。斯大林给我极好的印象。我想把他与克伦威尔^①相比较。斯大林是位伟大的军人，冷静、理智、有远见的政治家，善于解决国内外政治问题。”

在谈到波兰局势时，格拉布斯基谈到仿佛红军代表有时对波兰公民进行偷窃。“红军越早撤离波兰领土，波兰居民对苏联的态度就转得越快，因为鉴于上述情况，现在相当一部分波兰人对红军持否定态度。”格拉布斯基在发挥自己的论点时接着声称：“如果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不依靠，更确切地说是不反映人民之间相互友好的关系，那么它毫无价值。人民不支持的条约，稍遇考验就会垮掉。”

他在自己的住所对波兰爱国者联盟的代表们说了下面的内容：“布尔什维克在利沃夫这里干的最大蠢事就是1939年逮捕我。你们大概知道，在我自觉活动的几乎整个时期，我对俄国很有好感。1917年我曾是援助波兰人委员会主席，为促进俄国对奥匈帝国的胜利，我做了许多事。我在加里西亚是奥地利统治者的敌人，是奉行德国人政策的毕苏斯基的敌人。奥地利人想绞死我，我被迫逃离基辅。当时我亲自找过布鲁西洛夫将军^②，他按照我的请求，释放了400名被俄国当局无辜关押的波兰人。你们对我在利沃夫的工作很清楚。波兰国家由于‘萨纳奇’于1939年9月悲剧性地垮台时，尽管利沃夫省长比雷克邀请我去国外，我仍坚持拒绝离开故乡利沃夫。我估计我留在归属俄国人的利沃夫，不会妨碍他们，可是如你

①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英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缔造者，以英勇善战，对政敌残酷镇压闻名。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军著名将领。曾任西南方面军司令，1917年3~7月，任俄军最高总司令。后加入红军。

们所知，结果并非如此。”

8月26日，格拉布斯基拜访了利沃夫大主教巴贾克。根据一些情况看，在巴贾克那里讨论了有关天主教神职人员撤离问题。格拉布斯基提出神职人员带领教区的教民一起离开利沃夫的想法。同时还有材料说，格拉布斯基和巴贾克还多次谈到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机关逮捕的波兰人。谈到这样一些人，像原大学教授马卡列维奇、普希比利斯基等人。

格拉布斯基在利沃夫逗留期间，曾在波兰爱国者联盟驻地与各行各业的波兰人举行过几次会见。会见由波兰爱国者联盟组织。格拉布斯基和利沃夫高等党校教师工会的代表(20~25人出席)、律师(15~20人出席)、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人、动力部门的工人(25~30人出席)、波兰中小学教师、手工业者举行了座谈，出席了波兰爱国者联盟所属的社会援助委员会会议。在准备这些会议、座谈时，他要求邀请的人员范围不要大。

在与教授们座谈时，格拉布斯基述说了自己来利沃夫的目的，讲述了波兰国家的边界线已最终确定，“没有任何改变它的迹象”，并号召科学工作者在新的国界内创造波兰的文化。在谈到波兰的国外形势时，格拉布斯基指出，“人民的力量与道义立场是波兰独立的保障。”他对战前波兰的执政者提出一系列批评意见，指出，战前波兰每个人平均年收入不高于1913年的水平，看来这也是外国不重视波兰独立自主的原因之一。他谈到，他在英国期间，英国人问他有关战前波兰的镇压、民族压迫的情况。格拉布斯基明确表示，战前波兰有许多严重的内部矛盾。在这次会上他说，由于斯大林的严正要求，波兰西部领土得到显著扩大。“我们交给俄国180000平方公里领土和400万波兰居民，而得到10000平方公里，800万波兰居民。西部领土远比东部领土富庶，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快开发这片古老的波兰土地。”

格拉布斯基声称：“波兰目前将是民族单一的国家，经济上则是工业、农业、海洋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我们应给予斯大林大元帅应有的评价，他在波茨坦会议上对波兰的命运及其未来极为热忱。”

格拉布斯基讲述了高等学校的发展，并且说学者们的任务简而言之就是：“你们应当以真理为人民服务，虽然这个真理也可能对你们并不愉快。”

在教授会议上发言的有扎列夫斯基（大学）、巴金斯基（工学院）、西布策尔、舍瓦利斯基、艾卢克维奇、科拉尼（大学）、杰米亚诺夫斯基（医学院）、尼克利博尔（工学院）等教授。教授们回答了格拉布斯基的问题——他们想去哪里。扎列夫斯基在发言中指责波兰教育部似乎委派一些过于年轻的学者来主持教研室工作。他还请格拉布斯基运用他的威望对苏联政权机关施加影响，让他们允许教授们将家具和其他财产运出境。舍瓦利斯基教授表示了对波兰学者悲惨的物质状况等问题的担忧。其他一些发言的教授都抱怨迁往波兰的条件差。

格拉布斯基大体上从这样的角度与律师、法院及检察院工作人员进行座谈。格拉布斯基谈到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向西部地区移民。在谈到波兰人离开苏联领土时，他当即说：“我是在利沃夫长大的，离开这座堪称多年波兰历史与文化见证人的故乡城市，我很难过。我难过地看到利沃夫现在不再是波兰的代表。利沃夫是特殊的波兰民族，我们应把他们保留在自己的国度里。”

然后格拉布斯基谈到波兰的困难，他解释说，这些困难是由于没有适当地生产日用必需品。

8月27日格拉布斯基与工人举行了座谈。在与工人座谈中，他阐述的大致还是以上那些问题。座谈后波兰铁路工人瓦列涅维奇说：“主席先生建议我们去建设新波兰，我们不拒绝，不过我们还

记得，1918年也曾经号召我们建设新波兰，我们建设了，而后来剥夺了我们无产者的一切权利。现在会不会这样，主席先生。”

格拉布斯基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并没有仔细听这个工人讲话，但是作为回答他说“波兰得到杜鲁门^①关于美国资助的保证，表示美国的资本和波兰的工人很快就可以使波兰恢复，波兰工人将拥有福利与权利。”

工人们也提出希望改善从利沃夫启程的条件。

8月28日格拉布斯基参加了为波兰选择波兰文化珍品委员会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天主教教士斯乔帕，他在谈到天主教修道院的珍品时，进行了反苏攻击，他说仿佛苏联当局逮捕那些不登记出境的人。

格拉布斯基说他准备在华沙提出极有必要把奥索利涅乌姆图书馆从利沃夫迁移到波兰的问题（奥索利涅乌姆是一座很大的图书馆，藏有波兰及世界文学的珍本书）。

8月28日举行了中小学教师会议。格拉布斯基向教师们讲述了波兰人民学校的发展，声称，如果“你们不留在自己国家，你们作为文化力量就将毁了自己”。谈到儿童教育时，格拉布斯基号召教师向英国人学习教育青年一代的经验。声称未来的和平会议将是“三巨头的合唱”。

教师卡斯普罗夫斯基在教师会上发了言，他对波兰西部边界的稳定性提出怀疑。

8月29日召开了波兰爱国者联盟所属社会援助委员会会议。会上电车场职员布列哈尔斯基作了挑衅性发言，他说我们的委员会应当发展到德国人统治时期的社会保障水平。他还说必须请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波兰人。

^① 哈里·杜鲁门，1945年4月起任美国总统。

8月29日波兰爱国者联盟举行了格拉布斯基列席的联盟理事会会议。会上波兰爱国者联盟总管理委员会代表埃克施坦因作了完全不必要的声明，他大致说了以下的话：“我们准备向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呼吁，由它向苏联政府提出大赦被囚禁在苏联的波兰人的请求。”格拉布斯基对这一声明十分欣赏，他听了之后说：“目前战争已经结束，如果这里曾有过苏联的敌人，那么他们并不多，他们当前并不构成危险。我想，有许多人不该逮捕，如果这些人能够获释并平安地与家人一起返回波兰，这非常好。我们正在谋求与苏联人民的完全相互谅解和睦邻友好的生活。”

在所有会议上，格拉布斯基都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己拜访了科济列夫和格鲁舍茨基同志，“说这些人态度很好，真诚地希望波兰人作为苏联人民的朋友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8月30日格拉布斯基飞往波兰。利沃夫一些思想反动的波兰人对格拉布斯基的访问感到失望。他们说，格拉布斯基放弃了西乌克兰，败坏了自己的名声，说“他老糊涂了”。

必须指出，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断绝了与伦敦流亡集团的联系，并发表了批评它的活动的讲话，宣传民族统一政府的总的政治方针，是对利沃夫的反动分子的严重打击。

格拉布斯基在利沃夫的逗留加强了波兰知识分子返回波兰的愿望。

乌克兰共产党（布）利沃夫州委书记 格鲁舍茨基

1945年8月31日

№01797

苏联国家安全部关于波兰社会党政治活动的报告

(1946年7月2~3日)

绝密

我们就所获得的关于波兰社会党政治活动情况报告如下：

1. 受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主席、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什瓦利别的委托，科洛德泽斯基^①（曾参加关于成立民族统一政府问题的莫斯科谈判）最近与波兰农民党的领导成员进行了一系列会晤。会晤时讨论了建立5党统一的选举联盟问题。今年6月科洛德泽斯基两次会见了米科拉伊奇克，会见了一次克尔尼克^②。在与米科拉伊奇克的会谈中，科洛德泽斯基声称，苏联只信任波兰工人党，因此只有波兰工人党在国内起领导作用时，苏联才会支持波兰在其西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科洛德泽斯基建议米科拉伊奇克为此暂时承认波兰工人党的领袖地位，加入5党选举联盟，并就此发表相应的声明。

据科洛德泽斯基说，米科拉伊奇克同意了他的建议，但是他提出一个条件，只有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为一方，波兰农民党为另一方签订并实现暂时和解协议后，他，米科拉伊奇克才发表这样的声明。科洛德泽斯基就这个问题与波兰工人党员中央委员贝尔曼

① 赫里克·科洛德泽斯基，无党派人士，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成员。

② 符拉基斯拉夫·克尔尼克，波兰农民运动活动家，1945~1947年任波兰社会管理部部长，波兰农民党总委员会主席。

进行了会谈，但是贝尔曼似乎答复说波兰工人党不同意米科拉伊奇克的条件。

2. 近来波兰社会党领导的活动证明，波兰社会党谋求离开波兰工人党，并夺取国内领导地位。

3.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什瓦利别不久前从莫斯科回来之后，通知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委员们说，苏联领导人在与他们谈话时建议把波兰社会党的青年组织（工人大学协会）与波兰工人党的青年组织（青年斗争联盟）进行联合，以巩固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合作。

工人大学协会的领导人、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奥布伦奇卡在这个问题上持反对立场，他声称，青年组织的联合是导致不仅使波兰社会党失去独立地位，而且使波兰失去国家独立的第一步。

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包括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内，认为必须阻止青年组织的联合，但是由于认为不便公开行动，故决定在这一问题上暗中支持奥布伦奇卡。

今年6月13~14日，在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波兰社会党内左翼反对派代表马图舍夫斯基及斯科夫伦斯基^①知道奥布伦奇卡在青年组织联合问题上持反对立场，试图争取撤销其在工人大学协会的领导职务。但是主持会议的鲁西涅克^②撤销了这个问题的讨论。鲁西涅克这一行动事后受到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赞许。

① 马图舍夫斯基此时任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副书记，斯科夫伦斯基此时任波兰社会党凯尔采区委第一书记。

② 卡季梅克·鲁西涅克，波兰工人运动活动家，记者。1945~1948年为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成员。

斯坦奇克^① 同样反对青年组织联合，并且完全支持奥布伦奇卡。斯坦奇克担心波兰政府可能中断对工人大学协会的财政拨款，就与美国一些组织联系，争取到了对已得到的给工人大学协会的10万美元的资助再追加20万美元的拨款，其中10万美元是由美国劳工联合会拨款，10万美元是由产业工会联合会拨款^②。

鲁西涅克在密谈中说，波兰社会党领导正在采取措施清除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中那些被该党领导人认为是波兰工人党安插到波兰社会党里的委员，并且尽力推举自己信任的人取代他们。

预计会首先提出让马图舍夫斯基退出波兰社会党中央执委会的问题。

重要的政治问题似乎暂时只在波兰社会党中央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出席这种会议的人范围比较小，按鲁西涅夫的说法，没有波兰工人党安插的人。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不久前对斯坦奇克说的话很能说明问题：“我与波兰工人党在卢布林时期关系就不好。波兰工人党总是力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波兰社会党。在卢布林波兰社会党不可能与波兰工人党对抗，因为波兰社会党当时很弱。如今我们壮大了，我们可以希图得到国内的霸权。”

奥瓦基米扬^③

1946年7月2~3日

① 应为扬·斯坦恩奇克，曾任波兰流亡政府部长，战后返回波兰。1945~1946年7月任波兰临时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后到联合国工作。

② “劳联”成立于1886年，是美国全国性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产联”成立于1935年，系由“劳联”分裂而成，是以产业为系统组成的工会组织。1955年上述两个组织重新合并。

③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局局长。

№01798

加布洛夫就农民党最高委员会委员 科瓦尔斯基的文章给普赫洛夫的报告

（1946年8月13日）

普赫洛夫同志！

我不准备谈弗·科瓦尔斯基^①在其文章《为什么在波兰不会搞集体化》的许多观点，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两点，因为作者不止一次指出，他所陈述的论点不仅是农民党（他是该党领导人一）的观点，而且是工人政党及政府的观点。

这两点如下：

1. 在论述波兰推行集体化是不合理的理由时，科瓦尔斯基写道，向这种土地使用形式过渡就会注定使波兰农民多年遭受贫困，可能还会忍受饥饿（第5页，第2~3行），仿佛这些现象必然会伴随集体化而出现。

这难道不是为了使敌人更恶毒地诬蔑苏联集体化而交给敌人的一张王牌吗？

2. 在谈到美国的条件时，文章作者以极度赞扬的口吻介绍今天美国的现状，他特别指出，抛弃了土地的农民在城市里得到了优厚的工资。并且今天在8小时工作日的情况下，有可能乘坐自己私人汽车来往（第6页，第6~7行）。

① 弗·科瓦尔斯基，波兰农民运动活动家，农民党左翼派别“人民意志”的领袖之一。1944~1945年为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45~1947年任波兰文化艺术部部长。

这样一来，数百万失业工人和工人阶级因资本家的剥削而遭受的所有苦难，在科瓦尔斯基的文章里“消失了”。

附件：弗·科瓦尔斯基文章的译文——6页。

加布洛夫^①

1946年8月18日

^① П.И. 加布洛夫，原为波兰游击队特别支队指挥员，后为苏联科学院205研究所副主任，苏联斯拉夫委员会工作人员。

No01799

**北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会就波兰工人党与波兰
社会党之间的摩擦及其对波兰政局的影响
给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的报告**

（1946年9月10日）

机密

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副主任沙基洛夫中将

报 告

内容：关于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波兰一些省的政局。

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之间早在全民投票时就已形成的矛盾，近来更加尖锐化了，以下发生在今年7、8月间的事实和事件更是证明。

首先应归入这种情况的是波兰社会党及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在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及报刊上的正式言论。

8月5日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尤泽夫·西伦凯维兹在波兰社会党华沙积极分子会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竭力强调波兰社会党在领导战前波兰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巨大功绩。西伦凯维兹声称波兰社会党是，“当时波兰法西斯的主要敌人”，是抵

抗的核心，是国家联合阵线和国家激进阵线^①最强大的敌人。

在谈到波兰社会党在抗击1939年德寇入侵斗争中的作用时，西伦凯维兹肯定波兰社会党是组织波兰人民抗击德寇的惟一力量。“波兰社会党的这些功绩，”西伦凯维兹进而说，“赋予我们历史性的权力成为波兰人民在艰巨道路上前进的领导力量。”

在这个报告里，西伦凯维兹还指出，必须全力巩固波兰与苏联的友谊：“我们证明波兰社会党是构成当前与苏联同盟基础的主要部分。”西伦凯维兹断言，与苏联友好的思想因波兰社会党在工人阶级中获得了群众基础。他接着说，“波兰社会党为平等者与平等者之间的联盟，为波兰的和平、独立必不可少的联盟建立了广泛的基础，相信我们的苏联朋友对此会给予应有的评价。”

今年8月6日波兰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工作者》上发表了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文章，题为“通向民族统一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文中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不认为反动秘密组织与波兰农民党的活动是这样的障碍。他也闭口不谈为实现民族统一必须坚决与反动派斗争。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只谈在通向民族统一道路上的“心理因素”、“有害的宣传”、有关“波兰苏维埃化”谣言的传播，在波兰建立集体农庄等。但是他并没有指出敌人在哪里，也不提必须与他们斗争。相反，他断言所有党派，包括劳动党及波兰农民党都支持波兰政府的基本路线。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写道，“现在没有人公开表示反对我们社会与经济的大变革，反对土地改革及工业国有化。波兰所有的政党，从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到劳动党及波兰农民党，这些

^① 国家激进阵线成立于1934年4月，是由国家党极右翼分子组成的波兰法西斯组织，以反对革命运动为实际宗旨。在德国占领期间，成立“民族武装力量”，与占领者合作，与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为敌。

（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中的）政党代表都无一例外地一致批准土地改革法令及工业国有化法令”。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接着说：“在波兰的国内政策及对外政策基本问题方面，各政党之间其实没有原则分歧。”

这样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似乎看不到在民主政党与那些和反动派有联系的政党之间存在的严重矛盾。

8月7日《工作者》报上刊出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文章，题为“民族统一的基础”。他在这篇文章中肯定地说，工人阶级走向统一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一些人过分地利用先进党的口号（指波兰工人党），而另一些人过分宣扬过去的功绩及传统（指波兰社会党）”。作者接着说：“统一战线不是让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服从，让一些人提出条件，另一些人随声附和。统一战线在于使两党为了共同的利益，尽力协调自己的观点，使他们共同承担对我们全部生活的责任。每个工人政党都有自己的作用，自己的基础，只有相互理解才能带来协调一致，走向统一，有益于共同的事业。”

以上援引的几段摘录说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西伦凯维兹并不隐讳自己对波兰社会党在民主政党联盟中的地位及波兰工人党领导作用的不满。

波兰社会党企图对国家军也采取新的立场。8月12日《工作者》报发表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社会主义者农民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在谈到对国家军态度时，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声称：“过去对待国家军的态度是不对的，这种态度表现在经常重复这样的口号‘打倒来自民族武装力量和国家军的强盗们！’这种态度不符合国家军的政治本质，众所周知国家军是被占领时期的军事组织。在它的队伍中有波兰民众，尤其是爱国青年。目前官方人士并未对国家军提出任何指摘。”

以上所举出的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发言，说明他目前支持

与波兰农民党及国家军妥协。

原社会安全部副部长、今波兰社会党罗兹省委书记亨里希·瓦霍维奇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在8月11、12、13日《大众信使》报上刊登了瓦霍维奇的公开信“致波兰工人党一同志”。在信中瓦霍维奇指责波兰工人党“蔑视两党平等的原则。”瓦霍维奇引用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西伦凯维兹文章中的话，把统一战线称作政治婚姻。瓦霍维奇写道，“按照宗教婚姻，妻子向丈夫保证顺从。我们希望双方平等的现代婚姻。我们从新婚姻法典中知道，所谓的非宗教婚姻，即如一方侵犯了另一方的权利，欺负了另一方，那么检察官有权向法院提出要求解除婚约。为使婚姻牢固，双方应同等程度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享受同等利权并相互尊重。”瓦霍维奇反对似乎要把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合并成一党的倾向。瓦霍维奇抱怨说，波兰工人党追求领导权，限制波兰社会党的作用，夺取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要职位。瓦霍维奇认为，波兰工人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不符合波兰工人党对波兰人民的实际影响。瓦霍维奇写道：“请你向我，向波兰社会党党员以及全国人民解释一下，为什么工业部门中92%的领导职务由波兰工人党党员担当，而波兰社会党党员只占8%？这样的比例能反映我们两党对人民波兰建设事业的影响吗？在纺织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在各工业企业、在省社会安全局、在县社会安全局、在省警察局，缺少波兰社会党的代表，这是否应该证明波兰社会党的积极分子并不比波兰工人党的积极分子差？作为一名清醒的政治家，你应当确信，波兰社会党的积极分子胜任自己的职位，这些积极分子的道德品质是无可置疑的。”

在谈到各党之间的协调委员会合作问题时，瓦霍维奇证明：“几乎在两年期间我们开过多次的代表会及工作会议，但是我们没有解决基本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波兰工人党继续在罗兹省拥有6名县长，而波兰社会党只有3名。因为在省的管理局里是清一色的

波兰工人党党员，没有波兰社会党党员。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下任何一个经济部门，情况都是类似的。”

8月6日瓦霍维奇以同样的精神在罗兹市波兰社会党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卡-韦斯瓦夫发表了文章，题为“我们的立场”（1946年8月19日，《人民之声》），作为对上述文章及波兰社会党领导人声明的答复。他平静而克制地反驳了社会党对波兰工人党无根据的指责，并指出波兰社会党领导人的文章及讲话虽然谈到巩固工人阶级统一的必要性，但实际上只能给统一事业带来损害。

在谈到波兰社会党要求在工人阶级及人民中起领导作用时，哥穆尔卡写道，“每个政党都可以有自己的追求，波兰社会党自然也可以。”“……但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历史发展时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单独地举起民族统一的旗帜，并将它举下去。只有所有民主党派共同携手，才能做到这一点。”

哥穆尔卡提出：“波兰社会党的同志们想在什么基础上建立民族的统一？”，他接着写道：“我们党不同意做有利于反动派的任何让步……民族的统一、民主联盟、工人阶级的统一应当建立在与反动派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基础上。”

“近一个月来，首先是针对社会安全机关，反对波兰工人党的法西斯恐怖活动明显加剧。在这种条件下，对两党来说，没有比动员健康的人民力量去粉碎反动派更重要的任务。”

哥穆尔卡最后表示相信，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在自由独立派和“民族武装力量”中的伙伴，指望扩大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政治上的分歧，使工人阶级与民主联盟的统一战线破裂的算盘，毫无疑问必将破产。

波兰社会党著名活动家、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副主席、波兰

社会党克拉科夫省委书记德罗布涅尔博士也参加了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之间的辩论。波兰社会党克拉科夫省机关报《前进报》8月16日发表了德罗布涅尔致原社会安全部副部长瓦霍维奇的公开信和一篇标题很有特点的文章《我们的政治面目》。

德罗布涅尔写道，“如果天真的人们以为我们党不会发展，而只能是一个勉强跟上生活节奏的跛足的同路人，那他们就错了”。作者继续写道，波兰社会党在一天天发展，并且已经拥有30万党员。德罗布涅尔声称：“只要尽快建立自由、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波兰，我们准备为波兰的社会主义作出任何牺牲！它的领袖将是波兰社会党！”

《前进》报刊登了一系列旨在破坏波兰工人党声誉的文章。

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之间掀起的论战引起波兰农民党报刊兴高采烈的反响。波兰农民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于8月20、21、22日刊登了三篇社论，标题是“哥穆尔卡先生的回答。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公开辩论表面化”，“致亲爱的根里赫的一封信。在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的辩论中博列斯拉夫·德罗布涅尔发言了”，“前副部长瓦霍维奇在三封友好书信中写了什么？”在这些文章中，《人民报》毫不掩饰自己对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之间出现分歧的喜悦。

在评论哥穆尔卡的文章时，《人民报》指出，甚至在争论中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人对波兰社会党讲话也是用严厉的教训口吻。

《新解放》报（波兰农民党中分出来的左派机关报）、天主教周刊《今天与明天》都把社会党的主动精神视为建立以波兰社会党为领袖的民主政党联盟的尝试。

8月11日《工作者》报刊载了英国《泰晤士报》、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讲话的反响。

《泰晤士报》写道，总理的讲话“阐明了近几个月来波兰事态

的发展”。

《巴尔的摩太阳报》在评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讲话时断言：“波兰农民党中避免冲突的愿望在增长，并表现出加入联盟或寻求其他途径的倾向”。

波兰社会党领导人的声明和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卡的回答，加剧了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地方组织间的摩擦。例如，克拉科夫省青年斗争联盟主席在私人谈话中声称，波兰社会党暗中破坏克拉科夫进行全民投票，波兰社会党克拉科夫省委主席德罗布涅尔一有可能就在各种会议上反对波兰工人党，声称“波兰社会党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如果不是波兰工人党阻碍它，它就能使波兰人民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了。”

莱格尼察市波兰社会党组织几次向波兰社会党布列斯拉夫^①省委打报告，诽谤莱格尼察市市长、波兰工人党党员斯图帕克，并要求撤消他的职务。在核实所提出的对斯图帕克的指责时，发现这些都是杜撰的。

亚沃尔市波兰社会党党员打死了身为波兰工人党党员的市长。波兰社会党党员、莱格尼察市学校督学齐巴公民，在一些会上几次表示赞成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农民党建立联盟，但是波兰社会党领导机关并未对此采取措施。

绿山市波兰社会党组织联合其他党的组织，几次表示反对波兰工人党提出的措施。

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之间的分歧对青年组织有负面影响，波兰社会党青年组织与波兰工人党青年组织之间也在进行斗争。

在波兰社会党领导人讲话的影响下，波兰许多省里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之间的矛盾在激化，这些矛盾被秘密组织及波兰农民

^① 应为弗洛茨瓦夫。

党的反动分子所利用。

罗 兹 省

在准备进行全民投票期间，罗兹省参加民主联盟的各政党，尤其是波兰工人党及波兰社会党，显著扩大了自己的队伍，提高了自己在人民中的影响。

截至1946年4月1日，全省波兰工人党党员28000名，波兰社会党党员22000名，农民党有党员30000名，民主党党员2500名，波兰农民党党员40000，劳动党党员1000名。截至7月20日，波兰工人党有党员34373名，波兰社会党党员30259名，农民党党员30000名，民主党党员2273名，劳动党党员2273名，波兰农民党党员35000名。

可见波兰工人党党员人数显著增加，而米科拉伊奇克党的党员人数减少了5000人。

由于全民投票之前及全民投票期间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在城乡居民中做了宣传鼓动工作，也由于波兰农民党内部成立了反对派“新解放”^①，米科拉伊奇克党在省内的威信大大降低，不仅县一级组织的领导成员开始退党，而且整个整个的组织开始退党。

在拉瓦-马佐夫舍、维柳尼、布热济内、谢拉兹和拉多姆等县，波兰农民党县组织领导人声明不愿留在该党，并从中退出，走上支

^① 19世纪形成的波兰农民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分裂。其中成立于1915年的农民党“解放”是较大的一个农民政党。它主张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属于农民政党的左翼。1931年该党停止独立活动。1946年6月，波兰农民党中部分左翼活动家创办了“新解放”报，很快便从波兰农民党中分裂出来，组成新的政党——波兰农民党“新解放”，宣称在党的名称上与农民党“解放”有继承性。

持民主联盟的道路，而且提出解散县组织的问题。

但是由于全民投票后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大大减弱，有许多地方甚至完全停止了宣传鼓动工作，波兰农民党内刚刚出现的瓦解现象及波兰农民党中民主派脱党的事实，没有被利用来使波兰农民党的民主派进一步脱离党，更大程度削弱波兰农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尤其是在农民中的影响。

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省组织放松了群众宣传工作，有些情况下甚至停止了这项工作，这就使得省内的反动派喘了一口气，积极活动起来。反动派全力以赴地激起对犹太人的仇恨，千方百计地支持屠杀犹太人，组织恐怖行动等。

今年7月11日至15日期间，仅在罗兹市，工厂工人就举行了12次政治性罢工，要求撤消特别法庭对凯尔采犹太人大屠杀^①组织者判处的死刑。

省内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之间的关系近来明显恶化。波兰社会党省组织领导人推行破坏在全民投票时建立的与波兰工人党联盟的路线，拒绝与该党合作。波兰社会党竭力逃避积极参加贯彻政府措施，以此表示对措施的不满。

波兰社会党省委书记斯塔温斯基的行动激化了与波兰工人党的关系。这促使一些波兰社会党的县委领导人公开反对民主联盟中的政党，在波兰社会党中搞分裂活动，事实上走上反政府活动的道路，而这一切并未受到波兰社会党省委方面的任何阻挠。

这个反党、反政府的集团于1946年上半年靠吸收相当数量的原非法组织“自由、独立、平等”派成员扩大了自己的队伍。660

^① 1946年7月4日，右翼极端分子对犹太人进行屠杀，有37人被杀。波兰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同年7月9日至11日在凯尔采判处9名犯罪分子死刑并执行了枪决。

人加入了波兰社会党拉多姆的组织，彼得库夫加入了24人，拉斯科夫加入了28人，罗兹加入了67人，都是原非法组织成员。

今年8月初收到一些报告，说波兰社会党个别活动家公开走上破坏各政党民主联盟的道路，并急剧改变了自己对波兰工人党的行动方针。

在罗兹省波兰社会党一部分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受到前面提到过的波兰社会党省委书记瓦霍维奇的百般鼓励。这个瓦霍维奇早先曾任社会安全部副部长，现已退休。随着瓦霍维奇到罗兹，并被任命为波兰社会党省委书记，便采取了断绝与波兰工人党相互关系的方针。

今年8月份，在有近200人出席的波兰社会党罗兹省积极分子会议上，瓦霍维奇在发言中声称：“我作为社会安全部副部长退休时，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事会引起这么多议论，会在党与党之间产生涉及波兰社会党独立政策的摩擦。我们波兰社会党的老活动家，不能允许把我们当作波兰工人党的幌子。我作为社会安全部的副部长，只起科员的作用。对此我有许多根据……。”

同志们，你们要记住一点，尽管我们受到迫害，你们是波兰社会党人，而且将来也仍然是波兰社会党人。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当波兰工人党的幌子。波兰工人党过去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当我们举着一面旗帜前进时，他们却有一、两面旗帜，或许还有三面。他们各方面都有别人帮助，我不必指明是谁，因为你们自己清楚。所以我们不能允许波兰工人党这个少数来指挥多数。”

波兰社会党省委书记的这种行径鼓舞了地方组织中思想反动的波兰社会党人，怂恿他们去搞分裂活动，去破坏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的统一工作。

40名波兰社会党党员从科尔申茨村来到波兰社会党文奇察县委，他们交出了自己的党证，其理由是他们不愿意当波兰社会党党

员，因为这个党是为波兰工人党工作的。

1946年6~7月间，在罗兹省，社会安全机关揭露并剿灭了一个地下匪帮组织——“秘密波兰军团”。这个反政府地下组织是1945年在国家军一个营的基础上建立的。

这个组织由一个绰号叫“华申茨”的军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索钦斯基领导，此人现已被捕。这个组织的活动地区是以下各县：拉多姆、孔斯、佩特鲁科夫、沃林，^①后来几乎扩展到罗兹省所有的县，西里西亚-栋布罗瓦省的大部分县、凯尔采省的琴斯托霍瓦县、瓦利舍夫县及波兹南省科宁县。该组织的总人数达4000人。早在德国占领时期就有很好的装备。自1月至7月份，社会安全部缴获该匪帮机枪71挺、自动步枪203支、步枪452支、手枪210支、火箭筒1个、火炮1门、地雷20个、汽车2辆及18匹马。

“华申茨”的地下组织有分布广泛的秘密分队和小组，他们的活动包括通过散发由宣传小队印刷的报纸与传单，进行反政府和反苏宣传。出版了报纸《在真理的光芒中》，以后又出版了《情报简讯》，有自己的印刷厂。该组织的经济来源是靠抢掠机关与当地居民。在1946年的6个月中，“华申茨”匪徒从机关和私人手中抢了474.867万兹罗提和价值510.78万兹罗提的物品。该组织广泛采用恐怖手段。1946年1~7月中，它组织了423次武装袭击，有30名苏联军人被该匪帮打死。这期间社会安全机关逮捕了该组织883名匪徒，其中包括它的首领索钦斯基。

在审讯时索钦斯基供认，他通过专门军官与安德尔斯有联系。还揭发出该匪帮与波兰农民党的联系。在库特诺被捕的人供称，他们与国外领事馆及安德尔斯军队的代表有联系，为其提供有关波兰

^① 应为拉多姆斯科，科尼采，彼得科夫，韦伦。

地下运动及国内政治局势的材料。

西里西亚-栋布罗瓦省

近来，在省内一些地方，制止了一些反对政府的游行和敌视民族统一政府、苏联及苏联军队的言论。

今年8月2日，尼萨市砖厂举行罢工，有75名工人参加。罢工从早7时到中午11时。工人要求及时发放工资及改善供应。

省内许多地方反政府、反苏、反苏军的言论有所加剧，有以下事实为证。

今年8月1日，本津县斯津什采村的居民在与本村居民皮夏恰克、斯特里瓦谢谈到政治问题时说了下面一段话：“为什么俄国人不离开波兰，要知道战争早就结束了。俄国从波兰运走水泥及商品，让我们这被战争摧毁的地方一无所有……战争还要打。我们应当清理我们的国家。波兰东部的土地不能给俄国，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而我们收复的西部边界，自古就属于我们。”

今年8月2日，本津市王村区卫生科工作人员、波兰社会党党员济多夫斯基在与本科其他工作人员谈话时声称：“不久的将来波兰社会党将退出与波兰工人党的政治联盟。波兰社会党的政治任务是跟着波兰工人党走的工人、农民吸引开，在未来的大选举中获得75%的政府席位，并加入与波兰农民党的联盟。”谈话中还说了些仇视我国的话，声称：“去他的斯大林五年计划，我们应当从俄国手中夺回东部土地。”

波兰农民党党员皮亚斯科夫斯基公民，在波兰农民党学员杜娅、利萨等人面前说：“我们应当断绝与俄国的友谊。如果我们伸出右手，那么左手就应当握好左轮手枪。应当和俄国人彻底断绝关系，清算一下，从他们那里夺回我们的东部土地，把犹太人一个不

留地驱除出去。我国政府和苏联签订了贸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一个犹太人得用1吨煤来换，而这个犹太人从俄国来了之后，政府给每人35000兹罗提无偿贷款。这些时候用波兰的煤从俄国买来的犹太人就会占据政府重要岗位，而我们，波兰人，则将成为犹太人的囚徒……”

1946年8月7日，在尼萨县老雷奇科夫村，连钦斯基把伙伴们召集起来，就开始驱赶一个波兰复员军人，并说：“应当把你们这些带奖章的匪徒们打死，是你们给我们的争来红色波兰，你们掌权的日子不长了，把你们像条狗一样打死的时候就快到了。”

今年8月4日，和饭店老板一起从苏联遣送回国的诺瓦克声称：“短时间内一切都应改变，因为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行。波兰只是徒有其名，实际上这是俄国，而俄国意味着什么，我可知道，因为我从1939年就在那里生活……”。

1946年8月5日，雷布尼克县的矿工里梅尔·维克托在谈话中说：“在这样的波兰生活不行，只要俄国治理波兰，在波兰就永远不会好，波兰工人就总得为俄国工作。要是我找到两个像我这样的人，我就到林子里去了……”。

今年8月5日盖维茨县科兹拉村居民沃什克在与农民们谈话时说：“民族统一政府长不了，因为这是莫斯科来的政府，很快伦敦政府就来了，再有20周他们就到这儿了，那时我们就整顿好波兰的秩序……”。

今年8月2日克雷雷村的居民阿达姆奇克在火车上和旅客们说：“现在的民族统一政府对工人关心太差。发放的工资也很低，而市场上什么都很贵，工人再也无法忍受了……”。

女公民切霍维察·戈尼娅在寄往伦敦的信中写道：“亲爱的阿杰休，我们这里极力宣传民主。所有运到波兰来的东西，都说是从俄国运来的。可是俄国从波兰把什么都运走了：材料、食品、煤、机

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包裹，为了不让人看见这一切，在东西上面都撒上煤，仿佛运走的只是煤。”

西里西亚-栋布罗瓦省内武装匪帮十分活跃，他们抢劫国家、合作社机关团体和私人。

比亚威斯托克省

反动派和反民主派的秘密组织在比亚韦斯托克继续进行敌对活动，其目的是争取群众。在口头宣传及散发反政府传单的同时，继续对民主人士、警察局工作人员、波兰军队军人进行迫害和个别暗杀。7月份匪徒们进行了29次暗杀。

思想反动的宗教界人士在反对民族统一政府方面表现特别积极，他们和波兰农民党一道极力把群众从波兰工人党身旁拉开，使群众与政府对立，以使他们在当前的大选中不投波兰工人党和民主联盟的票。宗教界人士和波兰农民党在农民互助联盟中进行宣传，他们断言这个组织就是集体农庄。波兰农民党人钻进这个组织，千方百计设法从内部分裂它。然而，尽管如此，农民互助联盟还是在壮大，数量在增加。6月份有成员1万人，而7月份则拥有1.3万人。

敌对分子加强宣传，说什么比亚威斯托克将重新划归苏联^①，苏联好像是将把石油产区萨诺克划给波兰作为补偿。由于这种宣传，从西部地区来的波兰移民在从占领区回去时，都很不愿意到寇松线地区。

^① 1939~1941年期间，该地曾一度并入苏联。

卢布林省

在进行了全民投票、宣布了投票结果后，居民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大大放松或是完全停止。民主党派，其中包括波兰工人党，扔下这项工作，并且也不为大选做任何准备。这种情况使得省内波兰农民党便于开展工作了，他们采取一切措施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

米科拉伊奇克党（波兰农民党）当前做了一些旗子，这些旗子在天主教大教堂经过宗教仪式然后授予波兰农民党县委。根据初步资料，在省内的扎莫希奇、卢巴尔图夫、托马绍夫卡等县举行了授旗。授旗后，召开波兰农民党县代表大会。实质上民主党派将省内的群众工作拱手交给了波兰农民党。

结 论

1. 从众多的事实可以看出，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的关系近来日益尖锐。波兰社会党中央及州委领导人在发言中采取断绝与波兰工人党的关系、破坏民主联盟的方针，企图在领导工人阶级方面、在政府中波兰社会党起领导作用。这些言论鼓舞了波兰社会党地方组织中的右翼分子，怂恿他们去搞分裂活动、破坏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之间的统一。

2. 近来波兰社会党中右翼分子影响加强了，他们借口为争取“各党权利平等”而斗争，极力将波兰工人党挤到次要地位上去，并将其孤立起来，建立以波兰社会党为首、波兰农民党、国家军及天主教界人士参加的新的联盟。可见，他们要建立的联盟的目的不是与苏联友好而是使波兰的国内外政策屈从于英美要求。波兰的反

动分子及英美的代理人确信米科拉伊奇克党名声已急剧大降，信誉大大损坏之后，目前开始以波兰社会党右翼分子为目标，极力借助他们来改变波兰的国内外政策。

3. 进行全民公决后，民主党派及波兰政府的宣传部在各地都减弱了在居民中的群众宣传工作，有许多地方甚至完全停止了这一工作。非法地下组织及波兰农民党中的反动派共同采取措施分裂民主联盟，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企图在当前的大选中赢得大多数选民，保证自己胜利。

4. 在波兰许多省份反革命集团反对苏军军人的活动猖獗，而社会安全机关及波兰军队内务安全军^①却没有采取应有措施与之斗争。

此外，近来各类居民反苏、反对苏军的言论在加剧。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波兰政府、民主党派方面放松了群众宣传工作，并且几乎完全停止在人民中宣传苏联及苏军在把波兰从德寇手中解放出来，在巩固波兰共和国的经济及政治基础中的作用及意义。

北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将 鲁斯基赫

^① 内务安全军当时隶属于波兰社会安全部，并不在波兰军队编成之内。

№01800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就波兰 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在全民公决后 相互间关系恶化的报告

（1946年10月12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阿·亚·库兹涅佐夫同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尼·谢·帕托利切夫同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格·米·波波夫同志^①

关于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相互关系的情况

对外政策部近来收到一些有关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相互关系方面的新情况，我认为有必要向你们报告。

1. 波兰社会党在与波兰工人党合作问题上的政策及波兰工人

^① 安·亚·日丹诺夫，苏联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1939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194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意识形态工作；1946～194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阿·亚·库兹涅佐夫，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1939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45～194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1946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局长。尼·谢·帕托利切夫，1941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部长会议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主席。格·米·波波夫，1941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46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45～1949年任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党的立场。

今年6月30日波兰进行了全民公决^①，其结果证明当前波兰民主力量的阵地是牢固的。进步的民主阵营反对国内外反动派斗争的全部历史，尤其是全民公决的结果表明，民主联盟的两大政党——波兰工人党及波兰社会党——的紧密合作政策无疑是正确的。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的合作是巩固与发展国内民主基础的重要条件。两党的领导层及普通党员，尤其是在全民公决后，都强调工人阶级的统一对于新波兰的建设事业具有生死攸关的必要性。

但是尽管波兰社会党的领袖们承认这一明显事实，尽管广大工人群众拥护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之间保持与发展合作，但是全民公决后，波兰社会党领导层的实践活动中，却表现出了某种分裂工人阶级统一、使波兰社会党脱离与波兰工人党合作的倾向。这表现在：第一，在波兰社会党许多活动家的言论中及该党的报纸上对波兰工人党及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行激烈批评；第二，波兰社会党内的右派、中派分子及党的领导人对该党一贯拥护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合作的活动家们进行攻击。

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尤其是该党的右翼，在1946年7~8月间的言论中强调波兰社会党“过去的”与现在的功绩，并企图证明，波兰社会党是波兰民主的基本力量，因此工人阶级及民主联盟中起领导作用的应当是社会党。

今年8月5日，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西伦凯维兹在波兰社会党华沙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千方百计地努力强调

① 为进一步孤立反动势力和分清敌我，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于1946年6月30日举行全民公决。全体公民要对三个问题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即“一、你是否同意取消参议院？二、你是否同意在未来的宪法里写上有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基本部门国有化所建立的经济制度，同时保留私营企业的合法权利？三、你是否同意把波兰国家的西部边界定在波罗的海、奥得河和乌日茨-尼斯河？”

波兰社会党在战争前夕波兰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功绩。在谈到波兰社会党在 1939 年与德国的人侵做斗争的作用时，西伦凯维兹肯定波兰社会党是组织波兰人民抵抗德国占领者的惟一力量。

“波兰社会党的这些功绩，”西伦凯维兹接着说，“赋予我们历史性的权利成为波兰人民在其艰难道路上的领导力量。”

今年 8 月 7 日波兰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工作者》发表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题为“人民统一的基础”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肯定地说，工人阶级走向统一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一些人过分地利用先进党的口号（指波兰工人党——苏斯洛夫注），而另一些人过度宣扬过去的功绩及传统。”“统一战线，”作者继续说，“不是让一些人统治，而另一些人随声附和。每个工人政党都有自己的作用，自己的基础，只有相互理解才能带来协调一致，维护统一，对共同的事业有益。”

以上援引的摘要说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西伦凯维兹并不隐讳自己对波兰社会党在民主政党联盟中的地位及对波兰工人党领导作用的不满。

波兰社会党罗兹省委书记，原社会安全部副部长亨里希·瓦霍维奇在报刊上激烈抨击波兰工人党。在他们把一个有名的“自由、平等、独立”派（“自由、平等、独立”派是波兰社会党的一个反动民族主义集团，其领袖是阿尔齐舍夫斯基、克瓦宾斯基、茹拉夫斯基）活动家释放后，又按照社会安全部部长、波兰工人党党员拉德凯维奇的命令，被重新逮捕之后，瓦霍维奇提出辞呈以示抗议。今年 8 月 11、12、13 日的罗兹报纸《大众信使》连续刊登了瓦霍维奇的公开信“致波兰工人党一同志”。在信中瓦霍维奇指责波兰工人党“蔑视两党平等的原则”。瓦霍维奇引用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西伦凯维兹文章中的话，把统一战线称作政治婚姻，同时他表示拥护“两个工人政党平等。”瓦霍维奇在这封信中说：“请你向

我，向波兰社会党党员们以及全体社会人士解释一下，为什么存在这种状况，在工业部门中92%的领导职务由波兰工人党党员担当，而波兰社会党党员只占8%，这样的比例符合我们党对新波兰政府的影响与贡献吗？在纺织工业中央管理局、在省社会安全局、在县社会安全局、在省警察局等部门没有波兰社会党的代表，这是否应该证明波兰社会党的积极分子差呢？作为波兰社会党在罗兹的政治领导人，我有权肯定，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民主阵营的统一事业来说，一个有10~15年，或是20年党龄的社会党党员，要比一个只有几个月或1年党龄，对共同的建设事业贡献微乎其微的波兰工人党党员更加宝贵。”

瓦霍维奇自担任波兰社会党罗兹省的领导之初，就采取与波兰工人党断绝相互关系的方针。早在今年8月6日波兰社会党罗兹省积极分子会上，瓦霍维奇在发言中声称：“我们波兰社会党的老活动家，不能允许把我们当成波兰工人党的幌子。我作为社会安全部的副部长，只起低级科员的作用。对此我有许多根据……他们（指波兰工人党——苏斯洛夫注）各方面都靠别人帮助，我不指明是谁，因为你们自己清楚。所以我们不能允许波兰工人党这个少数指挥大多数。”

身为波兰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瓦霍维奇的这些及另一些发言，被该党地方组织中的反动分子理解为来自党的领导层的、旨在破坏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统一工作的号召。在波兰社会党领导人这类发言的影响下，在一部分波兰社会党党员中，尤其是在其左翼分子中，脱离与波兰工人党合作的倾向加剧了。就在罗兹省，不久前有40名党员从科尔申茨村来到波兰社会党文奇察县委员会，他们交出了自己的党证，理由是他们不愿做波兰社会党党员，因为这个党是为波兰工人党工作的。在本津市一个区卫生科的工作人员，波兰社会党党员济多夫斯基在与别的工作人员谈话时说，他们

的党在不久的将来会退出与波兰工人党的联盟，说波兰社会党的任务是使工人、农民脱离波兰工人党，在未来的选举中获得议会的大多数，然后加入与米科拉伊奇克党（波兰农民党）的联盟。

在宣传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断绝关系的同时，波兰社会党内部的右翼分子展开活动，反对那些持保持与扩大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合作范围立场上的党的活动家。尤其是今年8月26日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会议，在右翼反动分子压力下，把该党执行委员会第二副主席、一贯拥护同波兰工人党合作及紧密团结的斯特凡·马图舍夫斯基开除出党的最高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波兰解放后，马图舍夫斯基曾任重建的波兰社会党总书记约1年。也是在这些人的压力下，马图舍夫斯基辞去了情报宣传部部长职务。在将马图舍夫斯基开除出波兰社会党领导机关的同时，那里无疑在右翼分子压力下，又增加了许多新人（博布罗夫斯基、博索夫斯基、加德斯基、拉帕茨基、扎博尔斯基等）——他们都是波兰社会党“政治独立”的拥护者。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波兰社会党领导机关发生了上述人事变动的8月26日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党的执委会主席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做了关于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报告，他谈到了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的相互关系问题。报告人肯定，就两党合作问题的辩论（即批评）过去也存在，但“它对那些不大敏锐的政治家来说不像现在这样显眼。”报告人接下去说：“当前辩论活跃的秘密就在于，过去当我们是一个软弱无力被打败的党时，我们迫于形势应该在协商共同道路时做出比现在，即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党时更大的妥协。当前我们可以期待与波兰工人党完全平等，这才符合我们共同事业的切实利益。”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此企图证实，波兰社会党要求拥有更大的权利不是为了权力本身，而是为了使波兰社会党的党员及党的追随者，对一个完全参加国家管理的党

给予应有的充分尊重与信任。

但是波兰社会党领导层的真正目的和意图并非如此。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克拉科夫省委主席博利斯拉夫·德罗布涅尔于8月16日在该党克拉科夫市报纸《前进》上的言论便是一个证明，德罗布涅尔加入了对波兰工人党的进攻。德罗布涅尔发表了致瓦霍维奇的公开信和一篇标题很有特点的文章：“我们的政治面目”。他在文章中声称，“如果天真的人们以为我们党不会发展，而只能是一个勉强跟上生活节奏的跛足的同路人，那他们就错了”。他断定社会党在一天天发展，并且已经拥有30万党员。德罗布涅尔在文章最后写道：“只要尽快建立自由、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波兰，我们准备为波兰的社会主义作出任何牺牲！它的领袖将是波兰社会党！”在发表德罗布涅尔文章的同时，这家报刊还刊登了一系列旨在败坏波兰工人党声誉的文章。

基于上述事实与事件，波兰工人党的领导被迫参加与波兰社会党活动家及报刊的辩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哥穆尔卡-韦斯瓦夫同志在今年8月18日的《人民之声》报（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立场”的文章。哥穆尔卡同志驳斥了波兰社会党对波兰工人党无根据的指责，并指出波兰社会党领导人的文章与讲话，虽然谈到巩固工人阶级统一的必要性，但实际上只能给统一事业带来损害。

在反对指责波兰工人党在工业部门及国家机关中占据领导地位时，哥穆尔卡声明：

“波兰社会党的同志们应当明白，统一战线并不是由两个党的领导根据该党党员的增减来经常调整国家机关的人员。我们两党作为执政党要对国家负责……。”

“评价国家机关中工作人员惟一的标准应当是他的工作，而不取决于他属于哪个政党还是无党派人士。我们共同的追求应当是使

国家机关由最好的民主主义者、党员、无党派人士组成，他们诚心诚意地执行政府的指令及委托。仅此而已。谁感觉到对国家机关的责任，他就不会不这样对待这个问题……。

统一战线在实践中是对国家政治的基本问题统一的政治立场。根本问题就在于此，而不在于补足国家机关的编制。”

哥穆尔卡提出：“波兰社会党的同志们想在什么基础上建立民族的统一？”，他接着写道：“我们党不同意做任何有利于反动派的让步……民族统一、民主联盟、工人阶级统一应当建立在与反动派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基础上。”

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之间爆发的论战引起米科拉伊奇克党（波兰农民党）的报刊兴高采烈的反响。波兰农民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报》今年8月20、21、22日刊登了三篇社论，它在文章中毫不掩饰自己对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之间出现分歧的喜悦。

《新解放报》——波兰农民党中脱离出来的左派团体的机关报及天主教周刊《今天与明天》认为，波兰社会党的策略是企图建立新的、由波兰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党派的联盟。

2. 波兰社会党对待米科拉伊奇克党（波兰农民党）及反动地下组织成员的策略。

波兰社会党的领导层形式上与波兰工人党及其他民主党派一起反对蓄谋推翻波兰当今民主制度基础的国内反动派。波兰社会党形式上继续站在与波兰工人党共同反对米科拉伊奇克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证明这一点的是，今年9月13日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共同发表的给波兰农民党最高执行委员的公开信。公开信要求该党明

确回答它对贝尔奈斯^①关于波兰西部土地声明的立场。

然而，在保持表面上与反动地下组织不妥协的立场、不同意米科拉伊奇克观点的同时，波兰社会党的领导层近来开始公开宣传，有意识地过低估计波兰反动派及与之相联系的米科拉伊奇党（波兰农民党）破坏活动的意义。波兰社会党这一新的策略步骤，与反对波兰工人党和争取两党“平等”的言论在时间上是吻合的。仅此一点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波兰社会党这一策略的真正目的——在向波兰工人党进攻中捞取政治利益的同时，又从对反动派及波兰农民党的妥协的态度改变中捞取政治利益。应当认为，波兰社会党领导层指望在妥协的基础上得到与反动秘密组织有联系的波兰农民党，“自由、平等、独立”派分子的支持。

近来发生的下述事实与事件可以说明，波兰社会党的活动中运用的这些策略性手腕：

今年8月6日波兰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工作者》发表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文章，题为“通向民族统一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不认为反动地下组织及波兰农民党的活动，正是这样的障碍。他也闭口不谈为实现民族统一必须坚决与反动派斗争。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只谈在通向民族统一道路上的“心理因素”、“有害的宣传”、有关“波兰苏维埃化”谣言的传播、在波兰建立集体农庄等等。但是他并没有指出来这些人哪里，也不提与他们斗争的必要性。相反，他断言所有党派，包括“劳动党”及波兰农民党，都支持波兰政府的基本路线。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写道，“现在没有人公开反对我们社会与

^① 詹姆斯·贝尔奈斯，自1945年7月起任美国国务卿。1946年9月6日，他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说，称美国军队将无限期占领德国，德波边界需要待召开和会才能最后商定。这被视为是否定雅尔塔协议中关于波兰从德国获得领土让予的规定。

经济的大变革，反对土地改革及工业国有化。波兰所有的政党，从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到劳动党、波兰农民党，它们的代表都无一例外地一致批准了土地改革法令及工业国有化法令。”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接着说：“在波兰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上各政党之间其实没有原则分歧。”这样，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似乎看不到在民主政党与那些和反动派有联系的政党之间存在着严重矛盾。

波兰社会党企图对国家军采取新的立场。国家军是德国占领时期及波兰解放后一段时期波兰国内受伦敦流亡“政府”领导的地下武装组织。在波兰政府对国家军成员实行大赦后，^①大部分国家军成员走出了地下，而有一部分则参加了地下恐怖（“民族武装力量”“自由与独立”等）组织。

今年8月12日《工作者》报发表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社会主义者农民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在谈到对国家军的态度问题时，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声称：“过去对待国家军的态度是不对的，这种态度表现在经常重复这样的口号‘打倒来自民族武装力量和国家军的强盗们！’这种态度不符合国家军的政治本质，众所周知国家军是被占领时期的军事组织。在它的队伍中有波兰民众，尤其是爱国青年。目前官方人士并未对国家军提出任何指摘。”

以上所举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发言说明他目前支持与波兰农民党及国家军妥协。

处在右翼分子领导下的波兰社会党罗兹省及其他一些省的地方委员会走上了广泛吸收原反动地下组织“自由、平等、独立”派成员及国家军成员加入波兰社会党的道路。基中拉多姆有660名“自由、平等、独立”派成员加入党组织，罗兹有67名、拉斯科沃有

^① 指1946年8月2日宣布的大赦。

28名。

波兰工人党的领导没有忽视波兰社会党宣传和实际活动中的这些事实与事件。哥穆尔卡-韦斯瓦夫在上面指出的文章中，强调了波兰工人党继续为反对米科拉伊奇克党的政策而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决心。哥穆尔卡-韦斯瓦夫还指出：“人民统一的口号今天也仍是正确的，但是，今天人民统一的纲领不能不包括与反动派斗争的口号……政治理智告诉我们，与反动派、法西斯斗争的旗帜是波兰独立的旗帜。”在重申波兰工人党将坚定走与反动派斗争的道路时，哥穆尔卡在文中声明：“如果波兰农民党在大选时与反动派结盟，那么我们也将把它视为反动派。米科拉伊奇克先生及其在‘自由与独立’和‘民族武装力量’中的伙伴们指望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在政治上出现分歧，工人阶级与民主联盟的统一战线出现分裂的算盘，毫无疑问必将破产。”

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以此使波兰社会党领袖们明白，波兰工人党反对暗中与尚未出现的反动派妥协的任何意图。

同时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今年公布的关于政治形势问题的决议中声明：“波兰工人党把巩固与加深和波兰社会党在政治及国家生活方面的日常合作，当作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以后的事件表明波工人党的这一立场是正确的。今年9月26日四党——波兰社会党、波兰工人党及农民党、民主党——代表会议，由于米科拉伊奇克党拒绝在未来的大选中参加与这些党联合组成选举联盟（实际上这意味着把米科拉伊奇克与反对民主政党的反动派隔断了），决定停止与波兰农民党就此问题进一步谈判。会议声明，四党代表：“再次申明决定以四党选举联盟参加大选。”于是波兰社会党迫于事态的发展，不得不再次正式声明自己对米科拉伊奇克党、以及包括像当前的议会选举这样迫切问题的立场。

必须指出，波兰社会党领导人在与波兰工人党合作问题上的立

场，与波兰社会党对反革命阵营的策略有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在民主阵营某些其他党中是有支持者的。

其中这涉及到农民党的领导。今年7月3日在该党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全民公决后党的策略时，执委会主席巴拉诺夫斯基声称，农民党“由于同波兰工人党有一定联系而在农村没有威望”。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加强农民党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巴拉诺夫斯基提出他们党实行“独立的政治路线”及“农民党脱离波兰工人党的影响”问题。执行委员科瓦利斯基、米图拉等人支持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很典型的是，在讨论巴拉诺夫斯基的建议时，就是上面说的那个科瓦利斯基指出，波兰社会党想让农民党的领袖与他们接近，以通过这个党对农民群众给予影响。实际上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该党执行委员莫特卡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秘密谈话中说：“由于农民党内相当多的人拥护波兰社会党，西伦凯维兹采取措施使农民党内展开争取独立于波兰工人党的斗争。”还知道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其信赖的人中宣称“必须加强波兰社会党对农民党的影响”。

由于波兰社会党对波兰工人党、对反动阵营实行这样的政策，波兰工人党在地方，尤其是在波兰社会党的拥护者之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就具有很大意义。然而一些地方在全民公决后，波兰工人党的组织明显削弱了这项工作，同时没有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使还未认清米科拉伊奇克党政策的反动本质的民主人士进一步脱离与该党的联系，更大地削弱波兰农民党在群众中，尤其是在农民中的影响。

与此同时，有些材料证明，波兰工人党中央及地方的领导机关在与民主联盟中其他政党共事过程中，还不总是善于找到正确和策略的方式方法，来解决涉及到这些党利益的政治问题。其中包括在上面提到过的那次农民党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该党某些活动家对

波兰工人党提出以下的指摘：科瓦利斯基在发言中说：“如果波兰社会党提出什么问题，波兰工人党就会讨论，而如果我们对某个问题提出倡议，那么既没有人讨论也没有人支持。”农民党的另一位执行委员米图拉声称：“扎姆勃罗夫斯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组织书记，协调委员会主席之一）拒绝了农民党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科日茨基有关批准在农民党的报刊上发表取消特殊供应（定额）通知的请求，推说这将由各党的代表在农民节上直接宣布，而这个通知在其他报纸上却发表了。”那位米图拉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省长加尔察尔奇克（农民党党员）声称，他不喜欢波兰工人党党员们走到他身旁，拍拍他的肩膀说：“你是多亏我们才当上省长的。”加尔察尔奇克说，他再也不能让现在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了，他要辞职。

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相互关系中的一些新的重要因素，就是这样的。

我认为可否能在联共（布）中央情报局最近一期简报中就此问题刊登一篇内容与本报告大体一致的文章。

米·苏斯洛夫

1946年10月12日

№01801

北军队集群政治部关于 德罗布涅尔评价波兰政治局势的报告

（1946年10月25日）

绝密

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上将希金同志！

关于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博·德罗布涅尔的一些言论。

我报告关于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德罗布涅尔关于波兰形势、波兰社会党形势以及波兰社会党同其他政党间相互关系等问题的一些言论。

博·德罗布涅尔博士经常住在克拉科夫，是那里的波兰社会党省组织的名誉主席，但他利用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副主席的地位走遍波兰各地，同波兰社会党所有的省组织保持着联系。10月12日，德罗布涅尔去瑞典参加瑞典前首相汉森的葬礼。

在克拉科夫，在德罗布涅尔的影响之下，该省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之间的冲突表现得尖锐起来，这就使得克拉科夫省的民主党派联盟极大削弱了。

1946年10月2日，德罗布涅尔在克拉科夫民族委员会会议上建议通过决议，应就解放和保护克拉科夫城市没有遭到破坏向红军和斯大林大元帅表示感谢，另外，并就同意让出苏军战时警备司令

部在克拉科夫占用的大楼向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①表示感谢。

在民族委员会里波兰工人党的代表们反对德罗布涅尔说到有关警备司令部那一部分决议并指出，整个决议是想把苏军警备司令部撵出克拉科夫，因此，实际上是反对苏联的。

1946年10月12日，德罗布涅尔在离开华沙前往瑞典之前拜访了北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会驻华沙的代表，请求将克拉科夫警备司令部大楼转交给波兰社会党和工会，并试图驳斥波兰工人党克拉科夫省委员会对他的指责。

德罗布涅尔在试图证明自己立场的正确时涉及到许多有关波兰局势的问题，他着重说的是：第一，褒扬了波兰社会党右翼分子的活动，特别是他自己的个人活动；第二，证明波兰农民党的活动是正确的；第三，指责波兰社会的各种困难都是波兰工人党带来的。

德罗布涅尔的言论内容，可归纳如下：

1. 目前，在波兰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的是波兰农民党、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等三个党。其他一些党（农民党、民主党、劳动党）不起什么重要作用，只是波兰工人党的一些附庸。譬如，在克拉科夫省农民党可以认为不存在。

根据对群众的影响，占第一位的是波兰农民党，占第二位的是波兰社会党，占第三位的是波兰工人党。

2. 波兰农民党本应该加入六党联盟并可以加入这个联盟。之所以没能实现是因为波兰工人党在同其他党的相互关系上用了错误的方法。许多波兰农民党的成员参加该党不是因为喜欢米科拉伊奇克或者是赞成他的政治路线，而是因为他们同以维托斯为首的劳动农民运动有多年的联系，并认为波兰农民党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人。波兰农民党绝大多数党员拥护与政党联盟合作。

^① 康·康·罗科索夫斯基，苏联元帅。1945~1949年任苏军北军队集群总司令

3. 波兰农民党有在波兰发展的前途，全民公决结果和其他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这是波兰农民和城市居民持本能反对和不信任态度的结果。波兰农民党形成的新组织“新解放”是玩一种不严肃的把戏。这种组织没有什么前景。雷克和贝托尔德^①——都不是农民群众的领袖。

波兰农民党为了能自我发展和与政党联盟合作，必须在波兰农民党内组织大的分裂，分裂的结果米科拉伊奇克同一伙自己亲近的追随者独立出来，而克尔尼克和维齐赫就成了党的领导。

为了减轻波兰农民党分裂的负担，把米科拉伊奇克从副总理的职位上调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副总统的职位上是适宜的，使他失掉在地方的机构，同时任命克尔尼克为副总理，以此把地方机构交给他管理。

4. 波兰社会党拥有在波兰发展自己的巨大潜力，它已有 54 年的历史，党员数量的大发展达到了 30 万，以及波兰社会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波兰社会党是惟一能够促成波兰国内和平的党，能让居民安心，不是用警察，而是采取政治手段，让人们离开树林^②。

波兰社会党是波兰惟一能得到西方国家民主人士信任的党，因此，它才有能力为波兰解决重要的对外政策问题。而波兰工人党既不被西方了解，也不被西方所承认。

波兰社会党为了较顺利地发展自己，还需要苏联的信任，这种信任至今由波兰工人党所独享。

① 两人均为“新解放”领导人。雷克先后任“新解放”最高委员会主席和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贝托尔德任最高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② 波兰解放初期，一些对波兰临时政府和苏军不满和怀有敌意的组织及个人，纷纷躲进森林里进行破坏活动。波兰临时政府安全机关在苏联安全机构协助下，对这些组织和个人展开围剿。

5. 波兰工人党在波兰作为一个政党不具有发展前途，它既没有明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形成明确的政治目标。波兰工人党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人民没有明确的概念。

波兰工人党是什么，关于这一点甚至连西方国家都不了解。

在波兰共产党也许能够存在，它的纲领和目的人民都很清楚。

6. 目前，在波兰社会党内正进行着为党的独立斗争，反对试图把波兰社会党变成波兰工人党附庸的进程，争取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实际平等而斗争的进程（他强调的是整个进程，而不是阶段）。这一进程始于所谓的左派（马图舍夫斯基、别特鲁奇尼克、斯科夫伦斯基以及其他）被粉碎开始的，这些所谓的左派都是波兰工人党插在波兰社会党中的“楔子”（塞子），并力图在1946年8月25日召开的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使波兰社会党服从波兰工人党，而且现在在地方上（在省里和县里），在那些拥护波兰社会党独立当政的地方还在继续。据说，现在在波兰社会党当政的这些人都是“自由、平等、独立”派分子（即过去自由、平等、独立组织的成员，领导该组织的是来自伦敦的阿尔齐舍夫斯基、克瓦宾斯和其他人），不过，他们更确切地说应该称作为德罗布涅尔分子。无论如何，这是一些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波兰社会党员。

7. 德罗布涅尔断言，在波兰社会党内扮演左派角色的那些人，公开主张波兰社会党应同波兰工人党保持密切联系（马图舍夫斯基、斯温特科夫斯基等人）。

过去没有左派，也没有捍卫民主党派统一战线的立场。

马图舍夫斯基——是一个眼光短浅的人，过去是一个天主教教士，因为他结婚，被革去了教职。

斯温特科夫斯基1936年就公开反对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他过去从来就不是左派社会党人。

亚纳西克被免去波兰社会党波兹南省委书记的职务后，参加了“自由、平等、独立”派，也不是左派。

所谓波兰社会党内的左派，这是一些看风使舵的人。

8. 近一个时期，波兰社会党许多领导人都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德罗布涅尔说，以前，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就指责过他持反动、反苏的立场。

目前，按德罗布涅尔的说法，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并没有指责他反动，而是在明白了问题的必要性后，同他一起为波兰社会党的独立而斗争。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找到了同他们的共同语言。德罗布涅尔声明，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了原有的立场，而是因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开始纠正它。

关于什瓦利别，德罗布涅尔说，他以前从来也没有参加过波兰社会党^①，同这个党没有联系。可以认为，什瓦利别对波兰社会党历史和活动的了解，是通过随便在一个咖啡馆里看报纸得到的。什瓦利别以波兰社会党领袖之一的资格出现，对老一辈波兰社会党员来说却很突然。

什瓦利别在占领时期就加入了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而波兰解放以后，他就成了波兰社会党中的“左派”。德罗布涅尔说，曾经有过这样的時候，就是什瓦利别公开地称他是波兰社会党中右派的领袖。目前，什瓦利别就不这么说了，而是同他们一起为争取波兰社会党的独立而进行斗争。

按德罗布涅尔的说法，有组织地领导为波兰社会党独立而斗争全过程的是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西伦凯维兹。

^① 此说有誤。什瓦利别曾在1917~1933年加入过波兰社会党。从1944年起致力于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的工作。

采取积极参与领导这一过程的是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鲁西涅克。

德罗布涅尔认为，波兰社会党党员们试图拿掉鲁西涅克在波兰社会党内和工会里的领导职务，指控他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是被监禁人的监工，其中很多人被处死与他有关，但是，这些指控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证实。

可以认为，博·德罗布涅尔就上面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向苏军一名军官说明观点，虽然被用作移交大楼一事的正式借口，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爱说话，而是特意这样做的，他盘算着用什么办法让苏联政府领导人得到消息，以便使他们在评价波兰局势、波兰社会党的作用和他个人的作用上给予他所需要的影响。

北军队集群政治部主任、中将 A. 奥科罗科夫

1946年10月25日

№01802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 波兰立法议会选举准备工作的通报

（1947年1月16日）

呈给：

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沃兹涅辛斯基同志^①、日丹诺夫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贝利亚同志^②、帕托利切夫同志、米高扬同志、波波夫同志

关于波兰目前由立法选举而形成的局势的通报

今年1月19日，波兰举行立法议会选举。新立法议会将要制定和通过波兰国家新宪法以及组建新政府。

议会选举是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共同制定、1946年9月第十一次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所通过的选举法基础上进行的。新选举法在波兰的历史上首次充分保证人民享有普遍的、平等的、无记

① 尼·阿·沃兹涅辛斯基，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在1938～1952年期间，先后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副主席。

② 拉·巴·贝利亚，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1938～1945年起历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4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并晋升为苏联元帅。

名的、直接的和按比例选举权^①。新选举法也是第一次使波兰军队的现役军人拥有选举权。根据该法律，所有公民，不分性别，在颁布选举命令之日已年满21岁者都有选举权，而已年满25岁者都有被选举权。

根据选举法，凡曾同法西斯地下组织或匪帮合作的人，同德国占领军共事的人以及法院判决无选举权的人，均无权参加投票选举。

1946年6月30日在波兰进行全民公决的结果证明，当时有投票权的波兰公民共有1300万人。

应选出444名代表参加立法议会。

波兰的民主党派有：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波兰农民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早在选举日期公布之前，就已确定对当前议会选举的立场，并组成统一的选举联盟。

1946年2月18日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向波兰农民党（米科拉伊奇克党）建议，希望波兰农民党能同各民主党派结成选举联盟。

然而，波兰农民党的领导却蓄意提出，作为加入选举联盟的基本条件，它应在未来的议会中享有75%的席位，这实际上是拒绝了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建议，走上了在国内展开内部政治斗争的道路。

根据各民主党派领导的协议，民主政党联盟在选举中获得的代表席位计划分配如下：波兰工人党——31%，波兰社会党——31%，波兰农民党——27%，波兰社会民主党——11%。

在议会选举准备过程中，民主联盟各党大量开展了在广大人民

^① 这一说法不确切。在根据1921年宪法制定的选举法中（1922年），对人民享有的权利就有类似的规定。

群众中巩固与扩大自己影响的工作，以使本党党员数量有新增长。如波兰工人党 1946 年 9 月有 40 万党员，而目前该党及领导人已使其党员人数达到 50 万人。

波兰社会党 1946 年 8 月计有党员 30 万名左右。该党于 8 月底召开的最高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是到 1947 年 1 月 1 日使该党党员人数应达到 50 万人。联盟其他各党——波兰农民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等，也都加强了各自的活动。

在选举前的期间，民主政党联盟联合了大量的社会团体：波兰统一工会，其成员在 200 万以上；农民互助联盟，其成员约 100 万左右；以及武装斗争参加者协会、妇女民主联盟、青年民主团体以及国内其他进步社会团体等。

民主联盟的基本口号还得到其他一些党派的支持：波兰农民党“新解放”（脱离米科拉伊奇克党的一个新党）和劳动党。这两个党在回归的西部领土上从组织上加入了联盟，尽管它们在波兰的其他地区只是登记注册了。就波兰农民党“新解放”和劳动党的构成上看，还是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大。

为了在居民中进行广泛的选举前的宣传工作，波兰工人党（多数派）中央委员会所属中央党校从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党员中抽出 500 名宣传员。除此之外，各民主党派还组建了工人宣传队派往农村从事选举前的宣传工作。

在所有工业中心、县城以及农村居民点所举行的人数众多的集会和各种会议上，劳动群众都表示支持民主党派联盟。今年 1 月 2 日《人民之声》报——波兰工人党的机关报宣布，在波兰西里西亚圣诞节时进行了征集签名活动，对民主联盟很有利，当时就有 100 万以上的选民（即占有选举权人数的 70%）表示支持民主联盟。

站在民主政党联盟对立面的是波兰反动势力，它们聚集在波兰农民党（米科拉伊奇克党）内和法西斯地下恐怖组织——民族军事

力量、自由与独立——中。

带着单独的名单参加议会选举的并在很多省（克拉科夫省、华沙省等）同民主党派联盟公开对立的波兰农民党，与波兰社会党极右的反动分子茹拉夫斯基、兹达诺夫斯基等人结成联盟。

在52个选区中，波兰农民党参加其中42个选区的议会选举。但在10个选区里，因波兰农民党推举的候选人与反动的地下分子有联系，而没有被区选举委员会批准。这些区的波兰农民党决定抵制选举。

波兰农民党千方百计想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其目的是消灭波兰民主的成果，改变波兰的内外政策以利于英国人和美国人。

在广泛开展的选举运动中，波兰农民党不仅依靠反动地下活动的支持，而且，近来事件表明，他们还派这些地下人员为实现自己的目的搞恐怖和破坏活动。

在选举来临之际，反动活动的加强，从下述事实可以得到证明，仅1946年的近3个月期间，地下反动分子就干了近3000次强盗和恐怖行动、抢劫、破坏等。在此期间，恐怖分子抢杀了各民主党派成员、选举委员会和社会安全机构工作人员、民警等600名左右。

在同民主联盟进行斗争中，反动派还在居民各个阶层加强了反对民主制度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居民中散布对各民主党派的不信任，首先是对波兰工人党的不信任，反动派散布挑拨性的流言蜚语，似乎苏联侵害了波兰的独立，或者说在波兰根本就没有独立。

为对群众施加压力，反动派还千方百计地利用经济困难，人为地提高食品和其他一些商品的价格，加紧经济怠工。

波兰反动的天主教界人士以自己广泛开展与选举有关的一些活动来支持米科拉伊奇克党。

米科拉伊奇克党及其拥护者的全部行动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策

动起来的。

国外的反动报界，首先是英国和美国的反动报刊开展了广泛的反民主波兰运动。

在波兰反动的流亡者当中也广泛开展了反对议会选举的敌对行动。这一行动被称作“斯坦尼斯拉夫^①行动”（即米科拉伊奇克党运动），规定在各国的波兰外交代表机构及其他机关门前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在波兰“没有自由选举”。他们打算用这些游行引发各种冲突事件。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波兰的选举前斗争更加尖锐起来。政府和民主联盟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消除地下恐怖组织的活动以及揭露波兰农民党合法“反对立场”的反动活动。近3个月来，公安机关针对地下反动组织采取了2000多次行动。在这些行动中，逮捕了4000名左右的匪徒，缴获了各种武器3000多件。

最近一段时间，波兰所发生的自由与独立派和民族军事力量匪帮的行动，揭示出这些犯罪组织同米科拉伊奇克党——波兰农民党的密切联系。鉴于波兰农民党同匪帮有直接联系，政府禁止波兰农民党组织在22个县里开展活动。

由于波兰农民党反人民的反动活动被揭露，近来，波兰农民党各级大小组织退党并加入民主党派联盟的情况明显增多。

然而，波兰反动派的活动证明，它们仍然握有相当大的实力。波兰外交部出版局的领导格罗什将军前不久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根据政府公布的一些资料，地下匪帮的参加者人数已达1万人。

波兰农民党不仅得到地下反动势力的支持。支持它的还有波兰农村大量富裕的富农分子，部分城市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国家

^① 米科拉伊奇克的全称是米科拉伊奇克·斯坦尼斯拉夫，故名。

机关的官员等。根据波兰农民党领导人的声明，他们党的成员已达50万人左右。

在面临的选举中，波兰的民主派及其主导力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使选举结果有利于民主联盟。波兰沿着新的道路进一步发展的命运，将直接取决于，多大程度上能使联盟顺利克服反动派的阻力并使波兰人民的基本力量跟着它走。

苏斯洛夫

1947年1月16日

№01803

北军队集群政治部关于波兰国内 对与苏联经济关系不满情绪的报告

（1947年3月19日）

秘密

关于在波兰国内就波苏经济关系问题的某些情绪

由于在欧洲市场上对煤的需求量增大，波兰又缺少煤，加上铁路运输量在减少，结果在相当一部分波兰居民中又出现了关于波苏经济关系，包括向苏联出口波兰煤炭的议论。

内贸部格丁尼亚港全权代表优素福·利西茨基2月16日在同我方工作人员交谈时指出，在波兰人中间，特别是在小市民和知识分子之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因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支持波兰，支持归还给它西部领土，支持它的西部边界，波兰每年偿还给苏联1200万吨煤。利西茨基说，如果按国际市场上每吨煤10美元计算，那么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就是，波苏友谊使波兰每年要花费掉12000万美元。

我们工作人员说，作为煤的交换苏联可提供给波兰铁矿、羊毛、棉花等等，利西茨基反驳说：“如果我们把这些煤给瑞典，它也能给波兰铁矿”。按利西茨基的说法，瑞典同意买波兰的煤，并且不用送，甚至提出自己派人到波兰从矿井运煤。然而，利西茨基

接着说，波兰不能接受这些对它有利的条件，因为，苏联从但泽（格但斯克）港自己把波兰的煤运往瑞典。

至于说棉花和羊毛，按利西茨基提出的说法，作为交换，苏联用很低的价格拿走75%的成品，还不够支付波兰花在加工这些原料上的工资。

还是按利西茨基的说法，法国建议波兰用棉花交换它的煤，条件比苏联优越的多。然而，波兰仍然不得不拒绝这样做，因为同苏联有条约关系。

这些言论值得注意，因为它出自接近外贸部的人之口，代表了这个部某部分工作人员的情绪。

利西茨基本人是犹太人，他的原名叫利夫希茨，出生在维尔诺。利西茨基被疏散到苏联，整个战争时期是在斯大林纳巴德度过的，只是波兰解放之后才回到此地的。

北军队集群政治部主任、中将 奥科罗科夫

1947年3月19日

№01804

希金就在波兰军队中限制发行《自由报》 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7年3月29日）

秘密

联共（布）中央委员

苏斯洛夫同志

北军队集群政治部为波兰居民用波兰语出版《自由日报》。

许多波兰军队的军官和士兵与波兰公民同时在积极阅读《自由报》。到目前为止，在波兰军队中只发行了 25000 份，其中 20000 份是免费的。这种报纸对政工人员来说，是在军官和士兵中间谈论苏联、苏联军队、波苏友谊和做报告时最好的参考资料。

然而，目前波兰军队政治部^①的一些领导人想大量减少在波兰军队中发行《自由报》的份数。

波兰军队政治部主任扎日茨基将军向《自由报》的代表提出，4月份波兰军队集体订阅该报的份数要缩减到 500 份，而免费赠阅的，他只能允许不超过 4000 份。扎日茨基将军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他不允许在波兰军队中发行《自由报》的份数超过波兰工人党《人民之声报》的份数。

波兰军队政治部本着这一精神给各军区下达了指令。

① 应为波兰军队总政治教育部。

就这样，波兰军队政治部剥夺了他们政工人员和其他军队读者在波兰得到全面阐述有关苏联和苏联军队真理的基本资料。

请您通过有关机构给波兰军队政治部主任扎日茨基将军施加影响，以便取消在波兰军队各部队中限制发行《自由报》的决定。

希 金

1947年3月29日

№01805

萨波日尼科夫就波兰社会党内情况 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7年4月12日）

秘密

联共（布）中央委员

苏斯洛夫同志

从北军队集群政治部得到波兰社会党右翼分子进行分裂活动的消息。

1947年3月6日，波兰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劳动者》报发表尤利安·戈赫费尔德^①题为“是否应该出版‘劳动者’报？”的文章，抱怨波兰社会党出版物的用纸不足，不像波兰工人党似乎利用权力不受限制和不受监督地使用纸张。

同年3月17日波兰农民党中央机关《人民报》支持《劳动者》报所发表的意见，刊登了戈赫费尔德文章中“更具代表性的引文”。该说明的基本内容如下：

“波兰社会党中央机关以及其他定期刊物，‘维斯特’出版社^②的小册子和书籍，面临着特殊危机的幽灵：经常缺纸。然而，在缺纸的情况下大量多余的出版物（可以列出许多波兰工人党报纸的名

^① 应为尤利安·霍赫费尔德，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劳动者》报主编。

^② 由波兰社会党控制的出版社。

单)却在不断地增加。与此同时,像《劳动者》报却被迫减少出刊的份额,而其余的华沙刊物,只要不是‘维斯特’出版社和‘读者’出版社刊物,不论是规模或份数都在正常出版”。

报纸接着感叹地说,“在对待民主阵营的刊物上,不能有不公正和不公平:不能让一些特殊,而让另一些受欺。我们不能让自己受委屈,而在必要时可以向社会舆论发出呼吁。”

波兰工人党下西里西亚省委副书记古特曼宣布,3月6日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已到弗罗茨瓦夫,他在波兰社会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然后,在绿山波兰社会党积极分子会议上也发了言。

两个发言形式上论述的都是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之间的合作和统一行动。然而,实际上,却都在隐晦号召分裂联盟,而在有些地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则公开攻击波兰工人党,从而暴露出他自己波兰社会党右派的身份。

至于说促使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之间签订合作和统一行动协议^①的原因,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提出,波兰社会党人同波兰工人党人交朋友,就是因为后者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波兰工人党首先同波兰社会党交朋友,则是因为后者是工人阶级群众的历史悠久的政党。

在绿山波兰社会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发言中称,“在苏联军队开进波兰时,政权瘫倒在地,是波兰工人党把它扶了起来。但是,很快这就结束了,我们关闭了他们的各个部,然后我们自己掌握了政权。”

在这次发言中,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称米科拉伊奇克党人是

^① 该协议于1946年11月28日在莫斯科签订。协议承认两党是单独的、独立的、平等的政治组织;两党应共同为保证工人阶级团结而斗争。

蠢货，因为他们拒绝参加选举联盟。“如果这个蠢货，”他说，“不拒绝参加选举联盟，那么现在的局势会是另一个样：波兰农民党在议会上会获得更多的席位，然后，我们同他们一起就能组成我们自己的政府。”

戈赫费尔德在刊物上发表的意见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波兰社会党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演说都证明：波兰社会党的右派不仅没有放下武器，反而在波兰的民主阵营进一步巩固、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之间的合作与统一行动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加紧活动，试图对工人政党的统一阵线进行新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右派的策略同过去一样，即在波兰社会党广大党员群众中败坏波兰工人党的名声，使他们相信，好像波兰工人党在压制和排挤波兰社会党，使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对立，与波兰农民党、与波兰反动派结盟。

以上报告，供您参考。

萨波日尼科夫

1947年4月12日

№01806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就波兰
社会党同波兰工人党相互关系问题的斗争
给苏斯洛夫的通报

（1947年7月5日）

绝密

关于波兰社会党状况及其对波兰工人党策略的通报

西伦凯维兹组阁^①之后的几个月中，波兰社会党的领导在自己表面的政治路线上忠诚地对待同波兰工人党的关系，形式上遵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之间1946年11月签订的统一阵线协定的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像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和情报看到那样，波兰社会党的领导已秘密制定了向波兰工人党发动政治进攻并逐渐掌握国家机关、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关键岗位的计划。实现这些计划的准备工作，是在“为争取波兰社会党在统一阵线中的政治独立和波兰社会党同波兰工人党之间的平等而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实行的反对同波兰工人党合作的路线更

^① 1947年1月19日，波兰举行解放后第一次议会选举。2月6日，波兰社会党总书记西伦凯维兹受命组阁，次日新政府组成。

加公开和明显，而西伦凯维兹则更为小心谨慎。

因此，近几个月来同波兰工人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已成为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主席团和全会的所有会议上多方讨论的基本问题，就不是偶然的了。

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卡在今年4月30日在华沙召开的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党员联合会议上，就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组织联合发表的声明，是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之间相互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为了使两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基础上，思想意识相互靠近，并作为使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靠近的必要条件和建立统一的工人党，哥穆尔卡建议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举行多次联席会议，在会上讨论两党在组织上的联合问题。

对于哥穆尔卡的演说，波兰社会党的领导立即就此问题表明了态度。今年5月3日，西伦凯维兹给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茨维克^①下达了指示：秘密通知各地方组织，禁止用任何形式讨论波兰社会党同波兰工人党组织联合问题，开始准备召开波兰社会党年会，其口号是：“反对党的组织联合，支持同波兰工人党建立统一阵线”。

同年5月6日召开了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会议^②，会上讨论了霍赫费尔德就哥穆尔卡的建议而提出的波兰社会党采取具体措施计划。该计划规定，几天内在刊物上公布波兰社会党领导人论证波兰社会党同波兰工人党组织联合并不适宜的声明，还打算紧急收集在破坏统一阵线协议问题上会败坏波兰工人党名声

① 应为达德乌什·兹维克，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波兰社会党华沙省委书记。同时也是秘密的波兰工人党党员。

② 应为政治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即西伦凯维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什韦利别。

的具体资料，并把收集这些材料写成文章在刊物上发表。

在论证计划的同时，霍赫费尔德把哥穆尔卡演说后所形成的局势和波兰社会党的任务归纳如下：“哥穆尔卡演说之后，”戈赫费尔德声称，“我们党的处境困难。波兰社会党应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应坚持这一斗争，但是开展这一斗争应小心谨慎，巧妙应付”。

霍赫费尔德的计划得到赞同，决定把它作为决议草案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全会。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霍赫费尔德和鲁西涅克^①呼吁西伦凯维兹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之间和解^②。同时，他们强调，在哥穆尔卡演说后所形成的局势中，波兰社会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完全统一。经过热烈讨论后，西伦凯维兹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都承认，“在新的条件下不应该有个人分歧”。作为和解的标志，他们当众握手。政治局通过决议，要使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免受“来自波兰工人党方面的攻击”。

今年5月7日，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主席团会议。西伦凯维兹就哥穆尔卡发表演说后形成的政治形势作了报告。他描述哥穆尔卡演说的特点是“对波兰社会党的破坏”，是一种“策略，以便查清就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之间关系问题波兰社会党内真实的情绪。”他把哥穆尔卡发表的演说同共产党在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积极活动以及同发展苏美关系联系起来。西伦凯维兹号召继续为争取“波兰社会党的独立”而斗争，在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压力面前不退缩。

波兰社会党中央执委员会主席团赞同波兰社会党针对哥穆尔卡

① 此时任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波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② 1947年2月大选后组成的新政府，由西伦凯维兹取代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成为政府总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任不管部部长。两人在是否与波兰工人党合并问题上观点不一致。

演说而提出的实际措施计划并建议将其付诸实施。

今年5月10日，在波兰社会党省委书记会议上西伦凯维兹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他指出：

“目前，不应对群众说，我们反对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组织上的统一。我们支持组织上的统一，但不是现在。首先应该改善统一阵线的工作，到那时，才能开始准备有关联合的谈判。”

西伦凯维兹建议，不要在地方组织中开展反对波兰工人党的斗争，指出“开展这一斗争会对波兰社会党产生严重后果”。

虽然波兰社会党的领导对外指责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之间的斗争，但实际上其个别领导人却千方百计地企图激化这两党之间的关系。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工会领导机关的选举上。

今年5月底举行的部门工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是在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之间斗争紧张的环境下进行的。在华沙电车场的选举会上，当宣布波兰工人党人获得多数时，波兰社会党的党员们开始吵闹起来，然后，在波兰社会党党歌声中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歌词中的“刽子手们长年吸我们的血”，已被换成“新刽子手们正在吸我们的血”。

选举证明，波兰工人党在一些主要工会里，包括矿山、冶金和纺织等工业工人和印刷工人中都有很大影响，他们中投票支持波兰工人党名单的占绝大多数。在铁路工人、公用事业工人和建筑工人工会里波兰工人党获得的候选人数量与波兰社会党相同，而在邮递员、电报员和财务人员工会里获得多数票的是波兰社会党。

根据最近的资料，几乎波兰所有的工业地区都有暂短的罢工现象，这些都是由经济困难、营养食品不足以及波兰社会党某些领导人的挑拨引起的。

比如，6月5日、6日在罗兹省帕比亚尼采所发生的罢工，其原因就是没有发给工人5月份吃的土豆。然而，在调查罢工原因时

查明，在帕比亚尼采的商店和波兰社会党合作社组织“斯波莱姆”库房里有大量储备食品。通过调查还查明，参加组织罢工的有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瓦霍维奇。

对于国内形成的经济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方法，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之间出现严重分歧。

在今年5月12日举行的两党之间调解委员会会议上（波兰工人党参加会议的是：哥穆尔卡，明茨^①和贝尔曼；波兰社会党参加会议的是：西伦凯维兹，什瓦利别和莫特卡），这些分歧基本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同投机倒把做斗争：波兰工人党的代表提议由工业和商业部的机构牵头同投机倒把现象做斗争，而波兰社会党人则要求设立直属西伦凯维兹总理的专门机构；

——商业：波兰工人党的代表提议开办国营商店按零售价格出售商品，而波兰社会党人为了保持在商业机构中的地位，则提议所有商业活动都集中到波兰社会党掌握的合作联社“斯波莱姆”里；

——税收：波兰工人党的代表提议把现行的土地税换成粮食税。

波兰工人党的代表通知波兰社会党的代表，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将把这些问题提交部长会议和议会审查。

波兰社会党声明，他们在部长会议和议会里将投票反对波兰工人党的提议。对此哥穆尔卡答复说：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应退出政府和民主联盟”。

今年5月14日，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了两党间调解委员会会议的结果，什瓦利别作了报告，他谈了辩论过程，然后对辩论的结果做了如下的描述：

^① 当时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波兰工业和商业部部长。

“我们遇上了公开、尖锐的统一阵线危机。波兰工人党使用一切办法想打败波兰社会党。我们应该巧妙应付，但是我们的策略不应该超出波兰社会党党纲的范围。波兰社会党应该承担同波兰工人党进行斗争的全部重担，并在这一斗争中向人民表明我们的真实形象。”

他接着补充说，如果要通过“投降主义的决定”，波兰社会党当前的领导就应提出辞职。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支持什瓦利别并再次坚持成立“帮助与波兰工人党作斗争的受害者阵线”。他暗示波兰社会党有可能转入地下斗争。

西伦凯维兹企图用自己的演说使气氛缓和下来。他肯定，“无论是苏联，还是波兰工人党对消灭波兰社会党不感兴趣。”他说明波兰工人党的代表就经济问题提出的要求，都是“敲诈”，他号召要小心谨慎，继续坚持灵活的战术。

只有由于波兰工人党在实施拟定的同物价高涨和投机倒把作斗争的措施上的强硬政治路线得到波兰统一工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波兰社会党的领导才不得不对波兰工人党提出的要求作出让步。

波兰工人党提出反对投机倒把和物价高涨的斗争纲领，除波兰农民党外，在波兰议会的例会上得到所有党派的完全赞同。

由于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之间在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上述严重分歧，以及由于波兰社会党内部反动分子的积极活动，党内领导的个别成员之间的斗争明显地加强了。

5月21日召开了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西伦凯维兹、什瓦利别、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政治局候补委员霍赫费尔德、鲁西涅克、瓦霍维奇（最近被选上），会上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又重新提出了波兰社会党领导层

的危机问题。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又回到以前提出的建议上，说应该把党的领导转让给他，西伦凯维兹不能同时又是总理，又是党的总书记。他宣称，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还像原先那样抵制他，如果他的建议还不被接受并一切照旧的话，他就要辞职。什瓦利别支持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接换西伦凯维兹任总书记职务。霍赫费尔德和鲁西涅克徒劳地企图使他们妥协。

西伦凯维兹在与另一名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私人谈话中讲述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并在最后宣称：

“他们（奥苏布卡和什瓦利别）使我恼怒。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召开没有候补委员的政治局会议。什瓦利别总是耍花招。在决定原则问题时，他们总是投票压过我一个人。如果他们继续玩弄这一套，我就要打击什瓦利别和奥苏布卡。”

在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西伦凯维兹之间的斗争又重新激烈起来的情况下，西伦凯维兹想“把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赶出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撤消其不管部部长职务”。西伦凯维兹在同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亚布隆斯基谈话时用下面的话表示了走这一步的重要性：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从来也不是波兰社会党的著名领导者和理论家，而他那愚蠢的、蛊惑人心的、反波兰社会党的言论，导致了波兰工人党现在已经准备提出的组建统一工人党的建议。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联合问题也许几年才能出现。”

西伦凯维兹还对亚布隆斯基说，从最近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之间就经济和商业问题进行讨论的情况看，他“同意重新审查波兰社会党纲领中有关合作化的问题，奥苏布卡也反对这一点。奥苏布卡竭力想在波兰社会党党员群众中赢得威信，这种威信在那些不大聪明的、愚蠢的，就像奥苏布卡本人的波兰社会党党员中有所增长。”

由于准备今年即将到来的代表大会，根据来自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层的情报，党的领导中的右翼（什瓦利别、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准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搞分裂活动。

在斗争尖锐的情况下，在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中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主席什瓦利别的态度引人注意。

在波兰社会党普通党员和社会人士的眼里，什瓦利别把分裂党的责任归罪于西伦凯维兹的追随者身上。根据什瓦利别的指示，在波兰社会党著名积极分子中间开展相应的工作，目的是使他们相信，西伦凯维兹的政策是专门分裂党的，而什瓦利别仿佛是在为保持波兰社会党的统一而斗争。什瓦利别估计，在波兰不久的将来他将起到同勃卢姆在法国一样的作用，波兰形势的发展将会大大削弱波兰工人党的地位。

根据什瓦利别的计划，波兰对内和对外政策应朝以下方向改造：

1. 波兰应该同苏联保持友好和联盟关系，但是绝不允许这种关系影响国家的内部结构。波兰没有美国的援助将不能建设自己强大的经济基础。近期内能否获得美国的援助，则取决于波兰社会党。

2. 波兰社会党在国家内政上的力量在于波兰社会党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农民党米科拉伊奇克之间是起“决定性的中间力量”。如果波兰农民党被消灭，那么波兰社会党就成了右翼，因此，不能让波兰农民党消亡。

如果波兰社会党按波兰工人党的路线，其政策是进行“反对大多数人民和人民的创造力的战争”，那么将使自己与全体农民作对。在受到波兰工人党压力的情况下，波兰社会党的处境会更加恶化。鉴于这种情况，波兰社会党应立足于进攻的战略。

什瓦利别把波兰社会党里的反动分子（自由、平等、独立派的

追随者和以前的波兰农民党党员) 视为是实现自己计划的主要支柱。

在准备代表大会的同时,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近期也开始实行新的路线。在仍然与波兰工人党为敌的立场同时, 他企图把自己装扮成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合作的热烈支持者。同时他指责西伦凯维兹和许多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们反对波兰工人党的一些过激言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党的一些会议上的演说, 公开提出在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发生的斗争, 以及在党内孤立他的企图, 召全党回到在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时期所实施的政策上去。他用西伦凯维兹和一些中央委员对他施加的“压力”, 来为自己反对波兰工人党的一些言论开脱。

今年6月18日, 波兰总统贝鲁特接见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 在与他交谈时, 对他反波兰工人党情绪和对原自由、平等、独立派成员和波兰社会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的亲近, 表示不赞成。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回答贝鲁特说, 近一个时期以来, 他在对波兰工人党的态度上确实容忍了“政治流氓行为”, 还在当总理时, 他没有充分估价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时期民主联盟的政治路线并受到亲英分子——德罗布涅尔、多布罗沃利斯基^① 以及其他人的影响。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向总统保证, 在自己今后的工作中竭尽全力在波兰社会党内重新恢复1943~1944年时期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的传统并为巩固波兰社会党同波兰工人党的联盟而斗争, 直到他们联合成统一的工人政党。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把控制波兰社会党领导层里的局面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 并在近期开始采取新策略。

^① 斯坦尼斯拉夫·文森特·多布罗沃利斯基, 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书记, 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际部领导人。

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年会上巩固自己的地位，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同党的左翼反对派——马图舍夫斯基派等（早先被清除出波兰社会党领导层，是波兰社会党同波兰工人党合作的真诚支持者）举行了会谈，企图得到他们的支持。

今年6月19~20日召开的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紧急会议，邀请霍赫费尔德、鲁西涅克和库里洛维奇^①参加，会上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提出了关于改变党的总路线以及更换领导的问题。他说，就此问题想了很多，并得出如下结论：

党正处在深渊的边缘，在反对波兰工人党的斗争中走得太远了。

在说明这些结论的同时，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指出，还在讨论签订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之间协议时，他就“不同意西伦凯维兹走得过远的建议，并深信，这些建议将导致同波兰工人党发生冲突。但是他被迫服从了多数。”用他的话说，从此时起，在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中右派分子（自由、平等、独立派）占了上风，“伦敦分子开始领导党”。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建议改变波兰社会党的政策，以便能回到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时期的政策上来。他说，波兰社会党应该放弃很多要求，而对某些问题应同波兰工人党妥协，让马图舍夫斯基一派真诚支持统一阵线的人重新进入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和省委员会。

什瓦利别很谨慎地支持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西伦凯维兹、霍赫费尔德、鲁西涅克和库里洛维奇反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但是他们任何人都没有批评他关于改善同波兰工人党关系和吸收左派人士（马图舍夫斯基派）进党工作的建设。

^① 阿达姆·库里洛维奇，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成员，波兰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会议之后，西伦凯维兹立即给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书记们下达指示：“动员全党起来反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不允许他公开演讲（特别是谈同波兰工人党建立统一阵线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同波兰工人党签订协议的机会比奥苏布卡的更多”。列切克^①得到指示，让他通报波兰社会党省委书记，说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什瓦利别想在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搞政变、各省委组织准备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什瓦利别进行公开斗争。反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斗争的口号是：“我们——是波兰社会党的真正的左翼领导，而奥苏布卡的声明——是对党的欺骗和讹诈，其目的是要把波兰社会党的活动家小组——左翼反对派（马图舍夫斯基追随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来”。

贯彻西伦凯维兹的指示，列切克在下发省委书记的指示中称，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是一个力图在社会舆论面前洗刷自己的“挑拨者”。列切克建议书记们要积极准备反对什瓦利别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

今年6月29日，召开了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又重新提出波兰社会党的领导问题。全体与会者都发言反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通过了撤消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开除出主席团的决议。

临时任命西伦凯维兹的支持者鲁西涅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为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库里洛维奇（工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任第一副主席，斯温特科夫斯基（司法部部长）任第二副主席。

参加会议的左派代表建议更换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但是由于多数人投票反对，他们的建议没有通过。在波兰社会

^① 弗洛特吉姆·列切克，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书记。

党最高委员会的会议上也做出决议不提出更换波兰社会党的领导问题，到下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前，也不在刊物上公布这些决议（西伦凯维兹和霍赫费尔德计划从美国召回前任波兰大使，现任驻联合国的波兰代表奥斯卡·朗格，并提议他作为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候选人。）

立法议会选举结束之后，波兰的反动派把特殊的希望寄托在波兰社会党内部右翼反动分子身上，他们同英美反动集团有密切的联系并以自己的活动适应反动势力的总体要求。

什瓦利别在自己亲近的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①委员的小圈子内提出，“很多人都对我们说，美国将比苏联更先进，并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坚定地坚持竭尽全力去对抗波兰工人党的独裁，那么美国就会干预波兰的内部事务”。

来自波兰农民党（米科拉伊奇克党）的反动分子钻进了各民主政党，特别是波兰社会党，力图瓦解民主联盟，从内部攻破它。

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之间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产生的分歧以及波兰社会党领导中不同派别的内部关系的尖锐化都证明：波兰的反动派，虽然在议会选举中遭到严重的失败，最近却加强了反对波兰的民主制度和波兰工人党的斗争。

在这种斗争中，波兰社会党内反动的右翼分子面对声望和影响不断扩大，面对还在继续为国家的民主改革以及波兰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斗争的波兰工人党，感到恐惧。而且反动的右翼分子还遇到来自波兰社会党内渴望同波兰工人党真诚地合作的左翼的反抗。

今年6月30日，在华沙召开了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党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波兰社会党书记列切克在关

^① 从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的人员组成来看，这里指的不应是这一机构，而应是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是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

于党的近期任务的报告中说：“离开波兰工人党我们自己什么也做不成，所以，必须同其合作。”

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决定，对内的方针是缓和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相互关系上，以及波兰社会党领导中间就重要的内政问题和实现统一阵线战略问题上的严重矛盾。

在决议中指出，波兰社会党坚定地支持实现对内、对外的民主政策，支持巩固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的统一阵线。这些决议强调“在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之间的关系上不论有什么困难，无论阶级敌人的阵营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两党的统一阵线不能被看成是党的联合的可能形式之一。

波兰社会党的道路只能是靠左走。”

巴拉诺夫、莫舍托夫

1947年7月15日

No 01807

塔斯社记者关于计划在
波兰成立天主教党的报道：
关于在波兰建立天主教党的谈判

（1947年9月）

劳动党副主席维德-维尔斯基通知塔斯社记者说，从8月底起天主教党代表同维德-维尔斯基进行了多次会晤，目的是劳动党和天主教会为建立统一、大型并能得到支持的天主教党确定共同的行动纲领。

红衣主教赫隆德应允出席其中的一次会议，但他没来。座谈会是在天主教教士卡钦斯基的寓所里举行的，参加座谈会的有卡钦斯基，著名的天主教运动活动家、移居美国的波兰侨民比特纳和维德-维尔斯基。

在涉及到劳动党内的状况时，比特纳对他不能防止该党的分裂表示遗憾。比特纳说，当我从美国回来时，不幸就已经发生了：波佩尔^①已经退党。愚蠢而又毫无意义地分裂党就是因为不能把部长的职位一分为二。结果更令人失望。

维德-维尔斯基：事件的进程证明，我们做得很正确，没有把党的领导权交给波佩尔周围的冒险家。

卡钦斯基：我一直告诉波佩尔，让他尽力同你们达成协议。

^① 卡罗利·波佩尔，劳动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战时流亡西方，1945年回波兰后恢复了该党，并任主席至1947年。后流亡国外。

比特纳：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今天可以纠正很多问题。我们应当搞更多小活动，应该考虑国际局势。而局势正在紧张起来。美国总统选举之后可能面临美苏之间的公开冲突。无法预想这对我们波兰人是否意味着灾难。在美国，人们把波兰看成是未来军事冲突的桥头堡，不是偶然的。过去，就没任何人这样认为。很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我们还不能实行独立的政策。

有能力防止这种灾难的惟一力量就是天主教教会。不过，这种力量还没有利用起来。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是贝鲁特波兰的敌人。如果什么都不改变的话，上绞刑架的将是您，是我、是哥穆尔卡。

美国的共产党人没有实力。只有我们能够缓和包围波兰的气氛，然而，为此必须在国内建立另外一种国内政治关系。在法国的国际革命援助会告诉我们，在波兰，我们的问题在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之前，我们这里还没有建立天主教党之前，绝不能同共产党人搞任何的合作。

维德-维尔斯基：这应该如何实现呢？众所周知，劳动党正在扩大自己的活动。

卡钦斯基：这不行。应该使劳动党得到主教团的支持。

维德-维尔斯基：我们不能抱怨，因为在议会选举中主教团支持了我们。

比特纳：这是偶然现象。问题是长期合作。率领天主教运动的应该是这样的领导，它为波兰的利益可以对首都和外国的信徒施加影响。

维德-维尔斯基：这种影响应该有什么特点呢？党当前的路线，是巩固和平和同苏联友好的路线。我相信，波兰天主教徒希望和平，但是，我不相信，首都的信徒会同意进一步巩固苏联的影响。

比特纳：首都的信徒首先追求和平，可不希望共济会会员和基督教新教徒们壮大。

卡钦斯基：并不完全如此。一般教徒的利益接近我们更甚于接近社会主义。

比特纳：能得到波兰主教团信任的党，这首先是一个内政问题。一个大的天主教党在得到主教团的支持后，能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国家经济复兴问题，给予决定性的影响。可以用没有甘地的甘地主义^①来评定波兰当前的形势。难道你们没有看见那些对政府措施的怠工行为？离开天主教徒，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维德-维尔斯基：因此，才有了佛——米科拉伊奇克。

比特纳：他不算教。他搞了许多地下活动，这对他有很大影响。其实，现在地下活动也很猖獗。波兰农民党藏在教会保护之下，不过，我们也不能更多提供这种掩护，它的名声已经败坏了。米科拉伊奇克已经不是工具了。应该有另外一个。像现在这样如此信仰上帝的情况在波兰从来也没有过。这一点应该考虑，也应该利用。

维德-维尔斯基：对这一点您是怎么认为的？很难拥有比我们现在在波兰拥有的自由更多的自由了。

卡钦斯基：教会希望天主教徒有政治自由，应该给您指出的是，如果在波兰的天主教徒们组织起来共同保卫战后的现实和边界，对盎格鲁撒克逊的大使来说是个最沉重的打击。莫泽列夫斯基^②部长会很好地理解这一点。我同他交谈过，不过，这位欧洲人，看来他在自己的圈子里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那是奥尔谢夫斯基^③和格罗什活动的地盘。

① 默罕达斯·甘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和思想家。甘地主义是以宗教道德为核心的民主主义，以宗教泛爱观和人道主义为哲学基础，宣传印度自治和独立，经济平等和互助友爱社会的政治经济主张。

② 齐格蒙特·莫泽列夫斯基，1947年起任波兰外交部部长。

③ 尤素夫·奥尔谢夫斯基，波兰工人党活动家，外交部政治监察机关负责人。

比特纳：他们应该理解，为了波兰的利益，我们应该有像法国“共和人民运动”^①那样的党。事件发展得很快。维德-维尔斯基先生应该做出决定，是否实施这个草案。只有您能承担这一责任，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掌握在您的手里。

维德-维尔斯基：难道您让人们怀疑我们党纲基本思想的纯洁性或是党员信仰的真诚性吗？

比特纳：不是。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另外一件事。关于领导问题，这是天主教教会已经同意了。时机很重要。绝不能左顾右盼。应该做出决定。别争论什么百分比了。我们要建立小的，但应更坚强的领导班子，最多有五个人。我们不用投票决定重要问题，只是协商就行了。如果全国各地都没有自由选举，那我们也不能屈从群众的情绪。我们必须建一个诸如政治局一样的机构，其成员有维德-维尔斯基、波佩尔、卡钦斯基、哈钦斯基^②和我。这些人就足够了。我们不进入政府。这只能引起国外的混乱，不会有什么事。袖手旁观，我们能够更容易影响外部世界。

维德-维尔斯基：法国——是一种类型，波兰——是另一种类型。“劳动党”不能像共和人民运动那样。

卡钦斯基：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是热烈拥护同俄国友好的。这不偶然的。俄国客观上帮助我们。共产党人不触犯天主教教会，因为，俄国不允许这样做。同时，我们得到了巩固。我们只是对限制传教感到恼火。我们认为，天主教会能够巩固波苏联盟。

比特纳：现在我们反对大众化的党，我们拥护各省有强有力的干部，拥护各个方面的领导。这就足够了。只要我们有了必须的，

① 法国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成立于1944年春。其政治主张即反共产主义，也反对戴高乐，属于第三种力量的政党。

② 应为尤素夫·哈岑斯基，劳动党主席。1944~1945年是波兰民族统一政府成员。

我们就具有了群众性。

卡钦斯基：实质不在于形式。没有什么新的党可以取代“劳动党”。只要您，维德-维尔斯基脱离该党就行，今后它的命运如何，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的。我们想也许能听到这方面的什么情况。

维德-维尔斯基：已出现的事实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应该同其他党派协商。

比特纳：这是对的。波兰社会党了解这一点并支持我们。就此问题我们已经进行过谈判。目前，波兰工人党的情况更好。贝鲁特同意，贝尔曼倾向这一点，哥穆尔卡已经“被锯成两半了”。惟一对抗的是扎姆勃罗夫斯基^①。都是一些怪人。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利益。其实，如果哥穆尔卡干得更好一点，那么他更像波兰人，而不像共产党人。

天主教教士卡钦斯基请维德-维尔斯基就此问题同波兰工人党谈谈，然后声称，在主教团代表大会之后，他还决定同维德-维尔斯基会面，以便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他说，我想请波佩尔参加例行的座谈会。

最近一次座谈会于9月19日召开，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天主教教士卡钦斯基、波佩尔和维德-维尔斯基，但没有得出什么结果。天主教教士卡钦斯基猛烈攻击波兰社会党，特别是西伦凯维兹。他称，如果说“在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任总理职务期间是个人物的话，那么西伦凯维兹则什么也不是。遗憾的是，什瓦利别站在那边，而鲁西涅克被控制住了。”卡钦斯基说，如果考虑到和他们在同一个集中营里当牧师的那些天主教教士所叙述的情况，这就不是偶然了。

^① 扎姆勃罗夫斯基当时是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实际领导人、国会副议长。

涉及到“劳动党”，卡钦斯基声称，在亚斯诺古拉召开的主教代表大会已决定支持“劳动党”和维德-维尔斯基本人。^①

对维德-维尔斯基的问题，为什么主教代表大会决议的公布搁置了很长时间？卡钦斯基声称，红衣主教本人还在研究这个问题。

关于天主教教会的政治问题，卡钦斯基解释说，首都的信徒完全赞同波兰天主教教会的政策。正如国外政党的经验证明，天主教徒同共产党人兄弟般的友谊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因为共产党人并不兑现自己的诺言。所以，在波兰，天主教教会与国务活动家们完全隔离开来，同共产党人的联合就更加遥远了。实际上，所有的谈判都已结束。

谈到似乎教育部长斯克舍舍夫斯基和哥穆尔卡的谈话情况时，卡钦斯基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他们指出要保护学校免受自由、平等、独立派和自由独立派的影响，直到教会不会占据比政府更有力的地位。可是，他们忘了，假如在西班牙或是在波兰都有一个佛朗哥^②，天主教教会就任何时候都不会公开地不支持政府。至于说自由独立派和自由、平等、独立派，那么天主教教会从来也没有协助他们去控制学校。只要没有最基本的自由，政府就不能指望我们的合作。时间在为我们所用。天主教教会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没能利用在波兰社会中的影响。由于国家的独立受到威胁，甚至连反教权主义者都在讨好我们。”

天主教教士卡钦斯基对政府关于学校改革的模棱两可的决定持嘲讽态度。“他们还下不了决心现在就引发宗教风暴。”

至于美国记者李普曼作为客人访问波兰，卡钦斯基引用同他的

① 但从保存下的会议记录来看，会上并没有涉及支持“劳动党”，特别是维德-维尔斯基的问题。

② 巴蒙德·佛朗哥，自1939年起任西班牙国家首脑。

谈话说，美国不想保持东欧目前的局势。欧洲是统一的经济组织，所以，美国不会支持挑拨离间他们的铁幕。只是多少应该有些耐性。所有的立陶宛人几乎都从立陶宛迁离，这对西欧来说，是一种足够的“警告”。卡钦斯基提出，现在天主教教会已经不想处于受保护的地位。共产党人，他说，已教会我们怎样把权力掌握在手里，而不是放掉它。

维德-维尔斯基提出，没有党与党基之间广泛的协商，他不能到一个新党的组织里去。波佩尔同意他的观点，他说，卡钦斯基在制造幻想。

卡钦斯基应该直接同保护人谈。就此问题我已同雅科夫利夫^①建立了联系。他已搞清楚了总的局势。我们是独立的，没有承担国家职务，我们可以直接说，波佩尔没有耐性，应该从下面制造气氛，向群众解释，然后把他们团结起来。

维德-维尔斯基对塔斯社记者说，他意识到，他需要天主教教会只是为了从内部破坏“劳动党”以及帮助创建像“共和人民运动”那样的新党。然而，维德-维尔斯基说，我的处境极其复杂，我感到很难受。波兰社会党在打击我，正因为如此，从宣传和情报部的部长被撤职以后，我至今还没有接到任何任命^②。我得到来自波兰工人党方面的某些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也太无力了。我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从来也没有毫无根据地对波兰工人党提出过什么。而我带去的文件都是我自己的签了名的。这就能证明我的真诚和准备做有利于波兰工人党的工作。由于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我就给自己提出问题：一般说来，需要我在天主教教会和波兰工人党之间

① B.Г. 雅科夫利夫，苏联外交官，1945～1948年任苏联驻华沙大使馆参赞。

② 事实并非如此，维德-维尔斯基在1947年4月11日被免去宣传和情报部的部长职务后，当天被任命为文化教育部副部长。

做“缓冲”活动吗？我不得不自己解决。可有危险的是，我可能迈出错误的一步，而这种错误以后很难改正。我很希望，有人能指点我正确的行动路线。

(1947年9月塔斯社记者华沙报道)

华沙，9月

№01808

切尔诺夫和捷尔仁斯基就在波兰 创建天主教党计划给巴拉诺夫的报告

（1947年10月10日）

致巴拉诺夫同志

1947年10月5日塔斯社国外消息通讯（1~6页）上刊登了塔斯社驻华沙记者关于他同“劳动党”党的副主席维德-维尔斯基谈话的报道。

从这一报道中可以看出，最近，维德-维尔斯基同天主教教会代表卡钦斯基和比特纳举了数次会晤，他们想把“劳动党”变成统一的、大型的天主教党，就像法国的“共和人民运动”一样，得到梵蒂冈的支持。

典型的是，比特纳推荐哈钦斯基参加“劳动党”已改组后的领导层。哈钦斯基曾经是大战前该党的代表，1945年6月因奥库利茨基等人在红军后方组织和参加波兰地下活动一案^①，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判处剥夺自由4个月。

维德-维尔斯基反对天主教教会的代表们要把持“劳动党”领导的想法，支持同波兰工人党之间保持联系。同时维德-维尔斯基还向塔斯社记者发牢骚说，波兰工人党不给以他应有的支持，希望

^① 指对16名波兰地下活动领导人的审判，1945年6月18~20日在莫斯科进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在波兰、立陶宛、及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土上的红军后方组织、领导、参加波兰地下活动”罪，判处其中15名被告人期限不等的徒刑。

能暗示他正确的做法。

考虑到像在波兰这样的天主教的国家里同宗教界和梵蒂冈的反动影响作斗争的正确形式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让波兰工人党领导了解维德-维尔斯基的通报是适宜的。

同时还认为，把具有如此特别机密性质的通讯在塔斯社公务消息通讯上公布，是不正确的。

我们建议把1947年10月5日塔斯社的报道和维德-维尔斯基和卡钦斯基的简历资料制成复制件。

在通报中提到的波佩尔·卡罗尔是“劳动党”过去的反动领袖，1946年夏天被解除在该党的领导职务。

关于比特纳的资料我们尚未掌握。

切尔诺夫^①、捷尔任斯基

1947年10月10日

^① Л.Н. 切尔诺夫，自194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局副局长。

№01809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就波兰工人党领导 中的民族主义观点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8年4月5日）

绝密

就波兰工人党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问题致联共（布）中央
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同志

1. “波兰的马克思主义”是波兰民族主义的表现。

众所周知，很多世纪以来，波兰的统治阶级在俄国专制制度压迫条件下灌输和培养了反俄情缩。斯大林同志在1945年4月发表的演说中指出：“大家知道，在近500年来，我们两国关系中充满了相互疏远、不友好和时常发生公开军事冲突的事情”。战前波兰统治者，不仅大力灌输反俄、而且还有反苏情绪，在德国和苏联之间实行见风使舵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苏波两国关系发生了向联盟和友好方面的根本转变”（斯大林），其原因就在于，苏联作为解放者把波兰人民从德国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关系由于1945年4月苏联和波兰共和国之间签订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而得到加强。斯大林同志说：“这个条约的意义，就在于它结束和埋葬了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些旧关系，奠定了用苏波同盟和友好的关系来代替不友好的旧关系的真实基础。”众所周知，发展和全面加强波兰和苏联之间的同盟和友好关系对波兰人民的未来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在研究资料（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的报告、演说、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在波兰报刊和杂志上刊登的文章）的基础上，可得出在波兰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同苏联不友好的关系上，特别是表现在避而不谈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成绩上。

国内和党内的这种情况，就要求波兰工人党的领导应同波兰的各种民族主义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不仅没有进行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而且他们自己也站在不忠实而有害的主场上对待这一问题。

在1943年的四月全会上，哥穆尔卡在其报告提纲中指出：“部分波兰人民中间还没有完全消除对波兰工人党的不信任态度，特别是在我们对所谓的波兰独立和苏维埃化问题上”。

波兰工人党对被指责为在力图使波兰“苏维埃化”的担心，表现为波兰工人党的理论适合波兰的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主义的实践。

对波兰工人党领导来说，使党的思想路线适合民族主义的出发点，是提出波兰的发展同苏联有根本差别的问题。

哥穆尔卡在1946年11月30日召开的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华沙积极分子大会上的发言，把这一观点阐述得很清楚。

哥穆尔卡说：“第一个差别在于，社会政治变革在俄国是通过流血的革命完成的，而在我们这里则是用和平的方式进行的。

第二个差别表现在，苏联经历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而我们则没有，可以避免这样的阶段。

第三个差别，两个国家发展道路的特点在于，苏联的政权是通过各级代表苏维埃实现的，即苏维埃集立法与执法职能于一身，是社会主义管理方法的化身。而在我们这里立法同执法职能是分开的，国家政权靠的是议会民主制。”

从引文中看出，哥穆尔卡强调的是波兰的社会政治变革是“用和平的方式完成的”。他在指出和平方式特点的时，说到波兰地主、资本家的软弱性，他们在国内国家政权和军队的不足，在波兰的外国投资也很弱。只是在列举了所有这些论据之后，哥穆尔卡说：“除此之外，在法西斯主义失败和苏联红军胜利的影响下，所有的反动势力都感到恐惧，因此，都不敢同民主国家进行真正的斗争。”

为了尽力证明波兰和平演进的发展道路，哥穆尔卡肯定地说：“在波兰土地得到解放的时候，国家政权，可以说是躺在地上。”

从哥穆尔卡的论据中可以看出，他轻视了苏联和苏联军队为保障波兰的民主力量战胜反动势力和为加强波兰的民主制度提供有力前提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分析已发生过的一些事件证明，波兰的人民民主制度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情况下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而且只是由于有苏联军队在波兰的存在，才保证了民主力量同反动势力的斗争向有利于民主力量的方向发生决定性的转变。下述事实就可证明阶级斗争的激烈，在波兰已解放、民主力量已掌握政权的时候，国内仍有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大量反动武装力量（达 10 万人）在活动。

这些力量在国内有以奥库利茨基将军等人为首的领导中心。

在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中，波兰的民主力量牺牲了很多人。在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哥穆尔卡在报告中说：“在同匪帮的斗争中，法西斯杀人犯枪杀了我们 14876 人，其中多数都是我党党员。”

众所周知，苏联的武装力量在同波兰地下的反动活动进行斗争中也有很大的伤亡。下述事实证实了地下反动武装的活动情况：1947 年 5 月宣布大赦之后，走出地下状态的有 55000 多人。在 1947 年 9 月召开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哥穆尔卡在报告中说：“反动派的武装破坏活动基本上已被击垮，虽然我们还没有全部拔掉所有祸根。”

从上述举出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哥穆尔卡认定波兰的社会政治变革是通过“和平方式完成的”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波兰民主国家创立时期的这一特点，显然是哥穆尔卡为证明波兰向社会主义和平演进的发展道路所需要的。为此目的，他提出，对波兰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必须要经过的阶段。“民主阵营曾经有并仍然有的工人阶级专政不是必须的，因为反动势力的反抗并没有形成巨大的反革命浪潮。反革命势力并没有力量组织这样的反抗。”

哥穆尔卡不但醉心于论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而且还似乎出于战略考虑（害怕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会把波兰社会党弄糊涂）地说：“苏联的敌人和并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还继续肯定地认为，在俄国至今存在着专政。很自然，这是政治上的愚蠢举动……在苏联已经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了，原因很简单，随着阶级问题的解决，没有谁、也不需要谁采取阶级压迫了。”

从哥穆尔卡关于苏联苏维埃及其职能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是有意学院式地、不偏不倚地议论这一问题，避而不提苏联的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

在这些关于波兰和苏联发展的根本差别论述的基础上，产生了“波兰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来证明波兰工人党的领导在适应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上的正确性。

“波兰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就是代替在波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波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同现代波兰实际和波兰人民的历史相结合。“我们的党，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工人阶级和波兰人民的党。我们应该根据我国人民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如果简化这一问题，可以说，我们的党应该学会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哥穆尔卡在1949年4月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在所有党的文件上（波兰工人党中央代表大会和全会上的决议

和决议案)，在波兰工人党一些领导人的演说中以及在党的理论机关刊物《新道路》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都阐述了在思想理论上教育干部和党员问题，但只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有意识地避而不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列宁斯大林阶段的意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时代列宁、斯大林学说的作用。避而不谈布尔什维克党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丰富经验和贡献，以及这些事实对当代波兰的发展具有多么大的意义。

“波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在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统一的学说割裂为两部分，有意不去理会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对波兰的作用和意义。这就使我们可以说，波兰工人党的领导只是形式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没有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就没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波兰工人党的领导正沿着有意回避列宁-斯大林学说的意义和实际否定布尔什维克党在争取群众和建设社会主义斗争中的思想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的道路走下去，他们在思想上解除了党的武装。

弗·列宁在1902年就指出：“只有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才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行动。”波兰工人党没有用这种革命理论武装起来，而且波兰工人党的领导已明显地倒向民族主义，这就使人们对波兰工人党今后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极其担忧。“波兰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是证明波兰民族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甚至还给波兰和苏联人民密切关系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使得相互不是亲近，而是疏远起来。

波兰工人党领导在实际活动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当前的局势更加严重了。这在宣传苏联在解放波兰的作用以及在全面阐述苏联的成就问题上表现的特别明显。波兰工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在波兰解放后很长时间都千方百计地回避刊登有关苏联的文章。波兰工人党理论机关刊物《新路》杂志也采取了避而不谈苏联在社会

主义社会建设中取得的成就的路线。在该杂志的七期上（第6期献给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专刊除外）没有一篇文章反映苏联在粉碎希特勒侵略者和把波兰从法西斯奴役中解放出来所起的历史作用。在杂志中对苏联给波兰的经济援助阐述得更少。杂志《新路》的五期中刊登的有关苏联的文章简况如下（每期有12张印刷页）：（第一期）“五年计划中的科学——历史和哲学”，（第二期）C. 鲁宾施坦因：“苏联心理学的道路和成就”，（第四期）C. 茹拉维茨基：“摘自苏联报刊”，（第四期）3. 利萨：“苏联音乐风格的形成”，（第五期）H. 希德洛夫斯卡娅：“苏联年轻的舞台戏剧人才”等等。

《新路》杂志刊登在“苏联”专栏里的多数只是涉及到一些次要的、总是带有信息性的文章。

波兰其他机关刊物介绍的苏联生活也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波兰的一些省发行有20种日报。它们一次发行达250万份，是波兰日报总份数的72%。

在1947年期间，波兰各省的日报共刊登了486篇文章和苏联简讯（文章不超过75~80篇）。在每种省的日报里，一年平均刊登了24篇左右的文章和简讯。像“卢兹基同志”和“斯坦丁信使”等这样的报纸，全年各刊登了11篇苏联简讯。

波兰工人党领导的民族主义倾向还明显反映在波兰的军队里。这种倾向表现在尽力从波兰军队中撤掉苏联很多党员军官的职务，阻止传播有关苏联的消息和避而不谈在战争年代和解放波兰的过程中苏联军队伟大的解放使命。

战争结束之后，在各种借口下波兰军队指挥部解除了一些苏联共产党员军官的职务并被用未经军事培训的干部来顶替。如苏联将

军切尔尼亚夫斯基^① 被解除了波兰边防军司令员职务，而接替他的是未经军事培训的古塔克尔中校。军长苏联将军基涅维奇^② 同样也被未经军事培训、没有指挥经验的斯维特利克将军接替。波兰军队指挥部解除了苏联将军别夫久克卢布林省军区司令员职务，同时还解除了有 20 年边防军服役经验的苏联将军切尔文斯基边防军领导的职务。

这些事实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波兰工人党领导在波兰军队建设上的民族主义倾向，波兰军队领导人的公开声明也证实了这一点。

如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佩哈利斯基将军在 1946 年底向苏联政工人员德赖丘克少将提出：“在部队里最好完全不设政工人员，俄国政工人员有什么好的！米科拉伊奇克就因为俄国政工人员对我们恨得咬牙切齿”。波兰空军政治部主任米诺尔斯基上校（波兰工人党党员）也提出：“我们应该尽快地摆脱俄国人，即便对空军的军事训练有损害也应该这样干”。

另一位波兰国防副部长雅罗舍维奇将军（波兰工人党党员）于 1947 年 1 月，在明斯克-马佑夫舍选区（华沙省）选举前的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我们要巩固波兰东部边界，就像巩固西部边界一样。”

为了竭力阻止在波兰军队中传播有关苏联的消息，波兰军队总政治部主任扎日茨基将军（波兰工人党党员）于 1947 年 4 月下令限制订阅苏联军队为波兰居民编印并已发行达 500 份的《自由》报。他还限制在波兰军队里免费散发该报不得超过 4000 份（以前

① 此处有误。1945 年 9 月 13 日至 1947 年 2 月 14 日任波兰边防部队司令员的应为戈维顿·切尔文斯基上校（见下文）。而鲍利斯·恰尔尼亚夫斯基将军（文中误为切尔尼亚夫斯基）是苏军派到波兰军队的炮兵监察。

② 自 1945 年 5 月至 1946 年 9 月任内务安全军军长。

散发 20000 份)。扎日茨基说明采取其“措施”的理由是，他不能允许在波兰军队中散发与波兰工人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一样多的苏联报纸。

在给波兰军队现役军人颁发苏联“战胜德国”奖章问题上，也能证明波兰工人党采取的立场。波兰国防部故意不理睬苏联奖章的意义，当时给波兰寄来了 10 万枚苏联奖章，可是至今也没把它们交到波兰军队现役军人手里。

1946 年，波兰边防军指挥部制定了一份动员计划，其中的一切安排就好像波兰似乎受到了来自东方，即苏联方面的进攻，因此，该计划中就把苏联看成是可能出现的敌对国家。^①

这些例证说明，由波兰工人党一些领导人创造的、见风使舵式的、民族主义的“波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波兰工人党的实际活动中已有所反映。波兰工人党的理论与实践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给加强波苏人民间的同盟与友好事业带来了极大危害，而且在客观上有助于波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推行其政策。

2. 在工人阶级统一问题上波兰工人党的思想与波兰社会党的思想相适应。

从“工人统一阵线和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的合作——这是波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基本动力”（1947 年 9 月哥穆尔卡在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的前提出发，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于 1946 年 11 月向波兰社会党提出了关于在组织上实现统一的问题。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们正确认识到两党统一问题首先是党内问题，同时提出了党的思想理论同步的问题。哥穆尔卡在 1947 年波兰工人党中央四月全会的报告中说：“就组织统一的准备问题，我们应该从我们党开始，保证必要的思想上的同步，这种同步应与我们在数

^① 此消息不符合事实。

量上的增长相适应并加速这种增长。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培养党的干部：首先至少要有几千名党员，有全面、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能独立组织和从事县、市、区范围的政治工作，然后从中挑选出少数既能在中央、也能在州的党的机关里工作的活动家，这样就为保证党的质量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所有这些，一般抽象地提出问题还是正确的。但是，众所周知，问题的实质在于，在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上进行党的培养工作？从所有波兰领导人的演说中以及在波兰工人党机关刊物《新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都可看出，思想教育工作是本着“马克思主义精神”，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波兰的实际、同波兰人民的历史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新路》杂志第一期（1947年1月）的前言里，编辑部在阐述关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等思想理论原则时写到，“波兰工人党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波兰工人党理论家的任务就是“培养波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讲到党的思想的每一个地方，都写着和说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有意识地回避列宁-斯大林学说，回避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遗产和经验。

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人和《新路》杂志“理论家”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统一的革命理论的这种解释，不难看出波兰工人党的思想明显在适应波兰社会党的思想。

在这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出现了思想上的接近，这是“加强统一阵线和为创建波兰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准备条件最重要的因素”（哥穆尔卡）。在同《工作者》报展开争论并批驳它指责波兰工人党倾向于“机械的统一”时，哥穆尔卡说，“工人政党的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波兰工人党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以这一思想体系为指导，波兰社会党认为这一思想体系同样也是自己的思想体系，它并不是脱离生活

的、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在生活中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的抽象概念……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应该成为两个工人党行动的指南。”

这样的思想基础和这样的所谓“不依赖”于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及布尔什维克党思想理论遗产的“马克思主义”，除了波兰社会党的极右翼分子（自由、平等、独立派）外，完全符合波兰社会党的所有派别的意。在1946年11月召开的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哥穆尔卡说，“波兰工人党在波兰体制和发展道路问题上的这一立场，保证了我们同波兰社会党进行协商，并达成我们两党之间统一行动和合作的协议……”。^①

波兰工人党领导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竭力靠近波兰社会党。如哥穆尔卡在同《工作者》报进行辩论时写道：“对波兰社会党的同志们在每一个方便的场合都把社会主义口号作为该党主要努力方向来强调，我们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波兰工人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其党纲中追求的前景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发展的现阶段，基本重点放在巩固和深化作为波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体系。”

因此，作为波兰民族主义产物的“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服务于使波兰工人党的思想体系去适应波兰社会党思想体系的目的。毫无疑问，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们所培育起来的这种思想体系，可使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思想观点更快地趋同与接近。目前，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们提出：“建立思想上联合的工人政党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哥穆尔卡在“新阶段”一文中指出：“我们已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组织统一问题应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具体化”。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两党所有省委、县委和市委书记的联合指示（1948

^① 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统一行动和合作协议于1946年11月28日签订。

年3月)中说：“为了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并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精神教育他们，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遵守以下原则，广泛采取联合的形式来教育党员：统一工厂和地区学校里党的教育课，教学大纲要最大限度的一致，要全面地交流经验等等。”如上所述，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在思想上接近的过程，是在“波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现在，当最近要建立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时候，“波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危险性就更大了，因为，哥穆尔卡在四月全会上曾正面提出警告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即波兰工人党的一部分有可能溶入到统一的工人党中，这种被称为“波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体系，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各种反动派的代理人和加入工人运动中看风使舵的人，从事活动的最适合的土壤。这些人都在竭尽全力地削弱波兰工人党在民主党派联盟中的地位。

3. 波兰工人党在农民问题理论与实践中的“尾巴主义”。

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先就土地改革之后波兰总的农业状况作几点说明。如，耕地面积总共有2113.4万公顷，其中有760万公顷已分给农民（还有20万公顷左右待分配）。在150万有5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中只有90万户按土地改革得到了补充土地的增加部分，而在这部分农户（5公顷以下土地）中尚有60万户左右还根本没有得到土地改革的土地。实现土地改革之后，波兰农村开始出现了小、中农户。目前在波兰农村居住的人口占全国居民的69%。波兰农村的这种状况使波兰资本主义保持了强大的地位。列宁指出：小生产在经常不断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斯大林同志指出：“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老根的时候，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列宁主义问题》233页）。

针对波兰的现实，列宁和斯大林的这些原理看得就更清楚，因为在波兰的农村，除了富农之外，还继续保留了天主教教会和部分地主。目前，在国内有10万农户，每户拥有100公顷土地。这些农户，首先是富农，他们手里掌握着商品粮，并利用它使1945~1946年国家供应体系中断，而在1947年使食品价格急剧提高。1947年，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四月全会上明茨作的报告中说：“农村中的富户不愿意卖粮食，因为粮食被看成是最值钱的外汇。富农感到来自国家方面的税收压力不大，用出售肉类和技术作物的办法，就能补偿自己的支出，然后用储藏的粮食去搞投机倒把。”只有政府采取专门措施同投机倒把现象作斗争，加上苏联的援助，才使波兰政府稳定了价格，令人满意地解决了供给工人阶级和城市居民的粮食问题。

分析1947年工、农业发展指标，可以看出工农业的恢复在速度上差距很大，农业在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和提供工业原料上大大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如果说，1947年工业产品总指标是103%，那末居民人均粮食产量只有1938年的72.6%。波兰农村的这种状况，首先是因为波兰工人党的领导推行的是“巩固和全面支持个体农户的政策”（引自1945年5月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决议），党对富农危险不特别重视，对农村没有明确的远景规划。1947年波兰工人党中央四月全会上哥穆尔卡在报告中写到：“至今我们仍然还没有制定农村的具体规划。”

没有农业问题远景规划致使波兰工人党领导认定只有“国有化工业的生产规模达到能够消除市场上商品奇缺的程度”，国营商业得到组织并发展起来，所谓私营业发展和充实的主动性受到限制，与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经济困难才会得以解决。（引自哥穆尔卡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上的报告）。也有独特的关于紧随国有化工业之

后农业会自发发展起来的实践和理论。众所周知，斯大林同志在1928年就指出：“不能仅仅在工业方面建设社会主义，而听凭农村去自由地发展，以为农村‘自然会跟着’城市走”。他写到：“城市里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存在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因素。但是，这还不是说有了这个因素就足够了。

要使社会主义城市能够引导农民的乡村往前走到底，就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

斯大林同志的这段话是适合波兰现在的条件的，当然，不是无条件的完全相似（因为条件和实际的各种力量不同），应该指出的是，波兰城市的工业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虽然，在国家手里掌握着经济命脉，但在波兰现在还有私营工业企业 18474 家，它们的产品不低于总额的 15%，还有 159000 家私营商业企业，它们手里掌握有 87% 的商业零售额和 24% 的商业批发额。我们还可以引用明茨在 1947 年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所作报告中的一段文字，作为波兰资本主义实际力量特点的补充。他说：“争取控制市场，争取服从于市场的监督，争取控制资本主义市场成分的斗争是否意味着就是尽力消除这些成分？自然不是，我们不会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争取控制市场是否意味着尽力在行政上限制资本主义市场成分的发展？自然不是。如果我们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限制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可能性的任务，那么我们就要在农村禁止买卖土地，然而，众所周知，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我们在农村可以禁止或者限制雇用劳动力，然而，众所周知，我们也没有这么做。在城市里我们可以禁止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或者限制购买机器，扩大和建设修理厂，扩大雇用劳动力，建住房，开办或者扩大售货亭，库房和商店。”

因此，如果说在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城市里有社

会主义工业，正如在上述斯大林同志的引文中看到的，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让农村自发地跟在城市后面一直走到底的话，那末对现实的人民民主波兰就更是如此。斯大林同志在1929年就警告说：“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解决农业问题和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波兰工人党缺少明确的纲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波兰农村发展实践上的放任自流和自发性。其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农业严重落后于工业。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分析了苏联农业落后于工业的危害时说：

“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为以高度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体耕种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

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从否定列宁-斯大林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波兰的适用性出发，拒绝承认集体农庄，斯大林同志指出，集体农庄“基本上是农村发展的新路，是农村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完全不同于富农、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这并不是说要在波兰建设集体农庄。而是说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不承认列宁主义的合作化计划，又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农村远景规划。

1947年9月哥穆尔卡在波兰召开的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党长期拒绝在农村组织集体农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提供给农民另外一个在经济上改造农村的具体规划”。这种状态就导致了波兰工人党领导的尾巴主义，把农业问题的优先权让给了波兰社会党，而后者则提出了自己的合作制计划。由于波兰工人

党没有农村的远景规划，结果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们在合作化问题上同波兰社会党进行辩论时处于软弱的地位，除了提出一般的声明之外，没有什么具体东西能同波兰社会党相抗衡的了。为了说明波兰工人党领导们是使用什么论据同波兰社会党进行辩论的，我们可以摘录B.哥穆尔卡（1947年5月1日的发言）和明茨（1947年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上的报告）演说中的某些段落。哥穆尔卡驳斥波兰社会党报刊指责波兰工人党反对合作制时顺便说道：“我们只是对合作制中的坏东西展开斗争，这同合作化思想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是对合作化的歪曲和破坏。可以指责我们作为一个党直到目前对合作化问题研究得很少，但是，只能到此为止。我们拥护广泛发展健康的合作化，同样还要有众多的国营商业机构。因为，我们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如此重要的商业流通领域，国家应该拥有受其直接支配的商业机构，应该有非常有效的工具，控制着它并随时准备动用它。不能进行把‘田界’垄断转变收购粮食的试验（波兰社会党的建议——原编者注），因为，诸如此类的试验可能使对居民供应的严格规定面临被破坏的危险，这可能会招致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惨重后果。不过，为了国家供应的需要，必须也应该彻底地利用‘田界’机构收购粮食。我们对合作化的态度是积极的和实事求是的，而且对它永远是这样。然而，现在仍然没有合作化的社会制度，不论什么科学，或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或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创造出这种制度的理论。”

明茨说：“什么样的合作化制度都不可能存在，因此，就不能说在我们的经济体制里存在有这种制度的成分。我们的经济被分成三部分（国营的、资本主义的和合社的），这只是从法律和形式上而言是正确的。合作化的实际任务就在于把小商品生产者同国有化部门联合成一个由国家领导的经济体系。合作化形式对小生产者来说是更容易理解而且也更有利地向社会主义转化的一种形式。不

过，不应该忘记的是，在某些条件和一定的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下，合作化同样也可被小生产者、而且还可被资本主义成分用来反对国家的监督。这就是说，在合作化的幌子下，可以形成一种使人民民主经济退回到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形式。我们党应该坚决为反对企图把合作化转到以什么‘合作化制度’新阶段理论为伪装的这种轨道上而斗争。同时，我们党还应该坚决抵制对所谓国有化生产工具再合作化的企图和错误地把‘社会化’——“国有化”对立起来的各种企图。显然，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对合作化持否定态度。相反，我们党将在更广泛的合作化建设及其正确的发展中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

在分析哥穆尔卡和明茨演说中的两段引文内容同时，应指出的是，波兰工人党在同波兰社会党论战时，第一，他们处于防御地位；第二，在正确反对波兰社会党的合作化制度“理论”的同时，波兰工人党甚至放弃了在波兰建立集体农庄，没能提出任何为了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发展合作化的有力规划。这是波兰工人党领导们受反动势力的影响和自己在波兰社会党同盟者的压力下的结果，当时出于战略考虑放弃了集体农庄，并声称“对波兰来说集体农庄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害”，波兰工人党的领导（哥穆尔卡）现在还继续坚持这种立场。因此，在同波兰社会党论战时，他们提不出任何关于发展合作化前景及其在波兰农村社会改造的巨大作用的实质性的东西。所以，他们不能再进一步阐明，“合作化形式对小生产者来说是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最明确、最有利的形式。”（明茨）。

这样，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同合作化运动就被对立起来了，并把波兰工人党领导引向波兰农村发展远景问题的死胡同。1928年5月，斯大林同志说：“人们有时候把集体农庄运动同合作社运动对立起来，大概他们认为集体农庄是一回事，而合作社是另一回事。这当然是不对的。有些人甚至把集体农庄同列宁的合作社

计划对立起来。不用说，这样对立起来是毫无道理的。其实，集体农庄是合作社的一种形式，是最明显的生产合作社形式。有销售合作社，有供应合作社，也有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是整个合作社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就是把农民从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提高到所谓集体农庄合作社。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的集体农庄只是在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发展和加强之后，才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斯大林同志于1929年在另一个地方说：“把集体农庄同合作化对立起来，这是在嘲弄列宁主义，而且也证明了自己的无知。”

这样一来，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不承认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在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使用布尔什维克党经验，解除了波兰工人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武装。波兰工人党在农业问题上的这种状况，不仅给目前巩固党在农村的阵地已经造成严重困难，而且还给今后国内的民主制度带来严重的困难，而且还给今后国内的民主制度带来严重的损害。众所周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巩固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波兰工人党的领导在农业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远景规划，这就不仅导致政治上的衰弱，而且还会在组织上影响波兰工人党在农村的形象，使工农联盟中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软弱无力，使这一联盟前途无望。

综上所述，证明波兰工人党领导的思想理论方针是错误的，在党内存在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波兰工人党的领导暂时用“波兰的马克思主义”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的意向和波兰工人党某些活动家的民族主义实践（报刊、军队）都证明，民族主义已多么广泛地深入到党内。波兰工人党的领导故意不理睬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及其民族主义倾向，导致党在理论上被解除了武装。还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们使波兰工人党的

思想体系适应于波兰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在农业问题上的“尾巴主义”，其反映就是波兰工人党没有农村远景规划。

巴拉诺夫、普赫洛夫、奥夫恰罗夫

1948年4月5日

№01810

北军队集群政治部关于英国和美国 在波兰进行宣传的组织、形式和方法的报告

（1948年7月22日）

秘密

关于英美在波兰进行宣传的报告

近日来，英美大大加强了在波兰进行的宣传，并采取了极其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形式。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波兰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目的在于削弱苏联在波兰人民中不断增长的影响和破坏国内的民主秩序，千方百计地夸耀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及它在“援助”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较多灾难的国家事业中的作用。

在波兰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靠反苏宣传力图散布仇视和削弱波苏人民之间日益发展和巩固的友谊，以此来加强自己在波兰的影响。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英美帝国主义者不惜人力、物力。最近，英国和美国驻波兰使馆都在大规模扩大自己的宣传机构，美国和英国的书籍充斥波兰的市场，而波兰银幕上演的都是美国和英国的电影。同时在波兰增加了用波兰语出版的刊物份数。大量推销美国和英国的定期书刊，还加强了广播宣传等。

在波兰进行宣传的官方机构有：

- 1) 美国出版物代办处；
- 2) 英国外交部宣传委员会分会“不列

颠康塞尔公司”；3) 美国电影业代理处；4) 《英国之声》杂志编辑部；5) 《美国》波兰语版杂志编辑部；6) 基督教青年联盟盎格鲁撒克逊俱乐部；7) 宗教教派“循道派教徒学校”盎格鲁撒克逊俱乐部；8) 耶和华追随者教派机关；9) 天主教主教团机关（在格涅兹诺市中心）；10) 天主教出版社机关；11) 躲藏有波兰反动派的波兰各种科学协会（历史爱好者协会、艺术之友协会、波兰音乐家协会、波兰地方志协会等）；12) 波兰农民党的反动派别；13) 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西部地区的广播电台。

从上述英美的宣传机关中可以看出，英国人和美国人所利用的不仅是自己广泛的地方分支机构，而且还有一些波兰机关。在英美宣传机关工作的波兰人有数千人。还吸收了大量战时在英国和美国的波兰公民作宣传员。还吸收了嫁给波兰侨民、现在又随丈夫回到波兰来的英国妇女，在盎格鲁撒克逊俱乐部机构做宣传工作的。

在波兰组织和领导英美宣传工作的领导中心是英国和美国的大使馆，在华沙的美国图书馆和不列颠康塞尔公司。英国和美国的大使馆有大量领取高薪的工作人员和大量的小轿车、载重汽车和专门汽车，用来到波兰全国各地进行宣传。英美宣传的方式和方法各不相同。美国出版物代办处和“不列颠康塞尔公司”每天都用波兰语出版新闻通讯，分发给各波兰报纸编辑部和送到盎格鲁撒克逊俱乐部的阅览室。新闻通讯上报道英美生活消息，对波兰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些重要事件的评述，以及有关苏联生活的消息，通常采用的都是歪曲和反苏的。

例如，美国大使馆美国情报工作简报 1948 年 3 月 20 日第 12 期上，刊登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①的资料，以歪曲真相的方

^① 指 1948 年 2 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政府改组事件。2 月 20 日，12 名资产阶级党派的部长因对由捷共领导的政府不满而提出辞职，造成政府危机。捷共予以反击，动员群众支持政府。总统贝奈斯被迫接受了 12 人的辞职，同意了捷共领导人提出的新政府名单。此后捷共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式叙述了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件，传播了对苏联的诽谤。简报上大量引用了美国一些著名活动家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说法。

马歇尔^①说——“恐怖笼罩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并没有真正管理国家”。

埃尔贝特·托马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谈到关于马萨里克死因^②时说：“不难想象当克里姆林宫的铁环紧紧锁住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扬·马萨里克便陷入了绝望的万丈深渊……。马萨里克对同苏联合作、对他的那些不牺牲人民所依赖的自由就绝对不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们，深感绝望。”

帕潘涅克——原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代表，在评价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件时指出：“共产主义的变革只有在苏联代表的参与下才有可能，而它的参加则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造成威胁……。苏联人破坏了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不仅动摇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也动摇了欧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在这份简报上还有甘诺尔特将军^③提交给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的总结和建议。他是从美国到中国空运军用物资的领导人。在总结中他指出了在中国所发生的事件的特点并建议应该压制民族解放运动。

他指出，美国对在中国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因此就有危险，这种危险在威胁着他们在远东的利益。他写道：“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那么害怕欧洲的共产主义，而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又那么迁就和宽容……。我相信，在训练有素的中国军队帮

① 乔治·马歇尔，美国著名军事和国务活动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1947~1949年任国务卿。

② 扬·马萨里克，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于1948年二月事件后自杀。

③ 应为阿尔诺尔特·格里·哈尔文，美国将军。

助下以及不断提供军需物资的情况下，一年之内就能消灭满洲的共产党人。”他要求把给中国军事援助拨款增加到2000亿美元。

涉及到苏联，甘诺尔特指责它“违反了雅尔塔协议不把满洲交给人民政府的规定，应将军用物资运出满洲，因为苏联政府已将日军投降时留在满洲的大量军用物资储备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

除此之外，他还写道：“苏联至今还没有把大连港交给中国政府并且支持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反对公认的政府的公开暴动，这就破坏了苏中友好条约”。

在简报中引用了大量美国报刊上关于扬·马萨里克之死的言论。所有这些言论都是对我国和苏联政府具有煽动性的诽谤，这与战争时期法西斯的宣传没有任何差别。

在简报中说：“许多进步文章在评论捷克斯洛伐克时说，刚刚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拒绝莫斯科共产主义的新专政统治。”

“如果允许红色客人到任何地方去，就会发生类似于把猛兽引进家里，它却准备吃掉主人的情况。”（出处同上）。

在简报中还引用了杜鲁门于3月17日^①在美国两院（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演说稿。这次演说充满了反苏的主张。杜鲁门说：“从停战那一刻起，苏联及其代理人就消灭了许多东方国家和中欧国家的独立和民主制度……。”

“捷克斯洛伐克的悲惨结局震撼了整个文明世界。现在正对芬兰施加压力，因此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受到威胁”（第2页）。

接下来：“苏联及其仆从国曾被邀请参加巴黎会议以共同参与

^① 此处时间有误。杜鲁门是在3月12日在国会发表演说的。这篇演说后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

制定和通过复兴欧洲的纲领^①。但是，他们放弃了这种邀请，不但如此，还以敌视的态度对待这一计划，对它进行攻击，要消灭它。他们把它看成是他们阴谋控制自由欧洲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同上）

和简报同时，英国人和美国人还把指定该版专用的文章以及从英国和美国刊物上复制下来的某些文章一起寄给波兰各报刊杂志编辑部。波兰几个报刊杂志编辑部都被此类文章塞满了。譬如：《问题》科学杂志编辑部在1948年1月的第一周就收到美国出版物代办处寄来的21篇文章和推荐参考书目，这些参考书在该代办处华沙分处就有，还附有说明，强调编辑部所需要的图书在该代办处图书馆里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在书目上列举了1000册以上的图书和杂志。通常，波兰杂志刊登的文章是英国情报局寄给编辑部的，通过“读者出版社”在波兰发行13种不同名称的英文报纸和杂志。

近日来，在华沙开始出售《美国》杂志，有俄文版和波文版。卖这种杂志的都是个体推销员，美国大使馆给他们发报酬。

波兰带有图片的报纸和杂志编辑部都能收到从英美出版物代办处、“不列颠康塞尔公司”和美国电影业代理处寄来的很多照片，这些照片同样都在出版物上发表。（还多次组织摄影展览和照片陈列橱窗等。）

不久前，英国大使馆在克拉科夫和卡托维兹举行了三次大型的摄影展览——“大不列颠的生活”，而美国大使馆则举行了四次摄影展览——“美国工人的生活”。为了让更多的人观看，展览还搬进了大商店的橱窗里。

^① 这里指为研究“马歇尔计划”而于1947年6~7月间召开的欧洲国家会议。苏联和东欧国家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苏联因反对在接受美国援助时提供本国的经济情报而退出会议，东欧国家也随后中断了在这一问题上与西方国家的接触。

英国人和美国人发行的杂志售价很低。印刷精美、带有大量插图的杂志只卖15~20兹罗提，当时，波兰的杂志装订极差，价钱又很高，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发行上显然承受了很大损失，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对波兰人民的影响。美国人在大量散发用波文出版的秘密印刷品。美国驻华沙大使馆通过情报局“美国大使馆情报服务部”推销了大量印刷品。”

美国人在波兰是怎么散发印刷品的？譬如，他们在华沙皮尤萨街11~18号建立了隶属于情报部的读者阅览室和图书馆，这里能秘密为读者无偿借阅想读的图书，还附上一本一周的消息简报。《自由》报记者希尔金少校有一次参观了这个阅览室，他这样描述道：“当我刚进到第一个厅里，他们就马上递给我一份简报，把我当成波兰人。他们边用波兰语谈着话，边建议我，可能我会喜欢新一期的美国印刷品。然后，美国人领我到使馆的院子里并进入地下室，同时进来的还有两个波兰男孩，他给了我一些小册子和杂志，给男孩们很多好让他们去秘密散发。无论是给我的，还是给小孩的印刷品都用纸卷了起来并警告说，去街上，更准确地说，出使馆大门时，不能让人看见这些印刷品，并请我们不要在街上打开纸卷。然后，一名妇女用波兰语对我说，如果先生想要美国图书和杂志，在这一天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还走这个门进大使馆的院子。顺便说一句，下次我就不去那里了。应该找个办法，让别人拿到这些印刷品，跟踪追查，他们往波兰都乱发些什么。除外，这名妇女还告诉我，如果谁对这类印刷品感兴趣，同样可以让那个人顺便来找她。在美国领事馆里同样可以弄到印刷品。”

《美国》杂志是美国军事情报部出版的。在该杂志出第一期时，杂志里并没有指出地址和份数。杂志的封面上是艾森豪威尔的彩色肖像，第一页上是罗斯福的肖像，以后是哈里·杜鲁门的照片和对他的评论，文中描述了杜鲁门是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就任总统职务

的。杂志中还登了许多宣传美国工、农业的照片，还有加利福尼亚植物和资源的彩色照片。

《大西洋会战》小册子（美国的军事情报部出版）。小册子的开头说这次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因素，并且是最重要的战区。”

小册子千方百计颂扬英国特别是美国的海军，同时还配有相应的照片插图。

《杜鲁门》杂志由美国情报部出版，描写他获得政权，作为民主主义者他迈出的最初和随后的每一步。杂志里有很多杜鲁门童年时期及其家庭的照片，以及同福雷斯特尔、斯退丁纽斯、艾登、皮杜尔和其他反动分子照的照片。^①

带有自由女神雕像的《美国》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刊登了文章“锋芒外露的格拉尼茨”。在标题的上方画着国界的界标桩，上面挂着两块刻有美国和加拿大的牌子，这是两国老百姓结为兄弟的标志。文章的作者亚历山大描写了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紧接着的一篇文章是“发展美国的海军舰队”。该文最后以击溃日本和美国在其中起的决定性作用作结。杂志最后一篇文章是“美国的选举”，该文前言说，“美国的选举——这是体现在行动上的民主”。“人民的政府，来自于人民并为了人民”。

在照片上反映的是选举过程。这里正有一名工人和一名黑人妇女及其他人等在进行选举。在黑人妇女照片上方有题词：“根据宪法，凡年满 21 周岁的所有公民，不分种族和宗教信仰差别，都享

^① 詹姆斯·福雷斯特尔，1944～1947 年任美国海军部长。爱德华德·斯退丁纽斯，1944～1945 年任美国国务卿，后任美国驻联合国全权代表。安东尼·艾登，1940～1945 年任英国外交大臣。格热拉斯·皮杜尔，1944～1948 年任法国外交部长。

有选举权。”

《英国之声》报近日扩大了自己在波兰的活动，其办法就是编辑部扩大了雇用波兰人的数量，增加报纸的广告宣传，在反动势力的帮助下英国人得以将出版份数从4万份增加到8万份。

在出版宣传的同时，还加强了口头宣传。美国和美国大使馆以及代办处的工作人员都到波兰的大学、俱乐部和其他机关去讲课。在这些单位的邀请下，英国和美国的学者还以演员、音乐家和工程师的身份举办技术、医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问题的讲座。

今年4月14日，“不列颠康塞尔公司”总经理罗兰·亚当先生来华沙了解康塞尔公司分公司的活动，他访问了西里西亚省、克拉科夫以及波兰的其他城市。为了欢迎他的到来，“康塞尔公司”华沙分公司的领导比杜埃尔先生举行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有文化艺术部部长德博夫斯基、教育部副部长克拉索夫斯卡娅，外交部出版和情报司的代表、外交使团成员以及波兰首都科学和艺术界的代表等。

罗兰·亚当的演讲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他在演讲中谈到摆在“康塞尔公司”面前的任务并强调，大不列颠各族人民始终在追求，而现在仍渴望同波兰人民建立紧密的文化合作与交流。为了表示作为这种文化交流的开端，“康塞尔公司”转交给波兰14种英文丛书和图书。在英国大使馆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康塞尔公司”总经理罗兰·亚当向出版界代表宣布了波兰和大不列颠之间文化交流的远景规划。根据制订的计划，将有8位英国教授前来波兰，就建设、城市规划、合作化运动及其他英国经济发展问题举行一系列讲座和报告。

从威尔士请来了一个矿工合唱团。“康塞尔公司”邀请了在小学和寄宿学校教英语的波兰教师，与英国教育家们就改善波兰小学英语教学方式和方法问题举行研讨会。波兰教师在逗留英国期间的

所有费用均由“康塞尔公司”承担。在已开始的文化交流活动期间，英国加强了在波兰散发印刷品活动，同时，还加强了英国的电影宣传。

波苏友好协会主任符伦斯基宣布，波兰的电影普及部门同美国驻波兰的电影机构代表签订了为波兰提供美国影片的合同。根据合同，美国提供影片中的40%由波兰人选择发行，而60%的影片则由美国电影局本身指定，即强制配给。当向与美国电影局签订此合同的人士提出更改合同问题时，他们回答说什么“现在由我们这么办不明智”。

从事影片推广工作的是美国电影业代办处。它在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有自己的中心，它的任务就是专门在人民民主国家开展电影宣传工作。代办处按比尔恩斯发来的指示工作。代办处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波兹南和其他城市均有自己的办事处。在向波兰电影院提供影片的同时，代办处还将大量的影片无偿租给工人大学协会青年组织、世界基督教青年协会的俱乐部以及其他一些青年组织。为了加强宣传美国电影工作，他们还组织和邀请波兰出版界和电影院的代表来审看电影。在国内一些主要城市上演的多数都是美国和部分英国影片。

在比得卡什市上演的是美国影片，有的日子所有的影院里上演的全是美国影片。苏联影片在最差的影院“巴尔季克”上演，而同时的美国影片，就在最好的影院如“波莫然尼”、“奥若尔”和“秃鹫”上演。

在克拉科夫、罗兹、华沙及其他城市主要上演的都是美国影片。近来，美国影片已深入到波兰军队的剧场和俱乐部里上演。在克拉科夫军区近几个月内上演的都是美国影片。

苏联影片在波兰的深入显然很不够。虽然，波兰居民对苏联影片的兴趣很大，但是，上演的影片都是旧的，而且数量也很少。

“波兰电影”组织不要苏联的新闻片和纪录片，结果，在美国加强宣传的情况下，苏联在波兰的电影宣传就大大减弱了。

美国和英国的广播宣传同样也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英国和美国的广播电台每天数次用波兰语向波兰广播。而且，这种广播宣传都带有明显的反苏特点，蓄意破坏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威信。最重要的国际问题都加上歪曲的、敌视苏联的内容进行播报。

英国和美国的广播电台每天都用波兰语播送政治评论为报纸用记录稿，这些广播节目做得都相当干练。关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①以及其他苏联对外政策领导人的重要言论，波兰的报界通过英美的广播电台收到的消息，比从塔斯社得到的还早。波兰所有报纸使用的都是这种广播稿。英美的宣传还广泛利用了波兰的广播电台。“康塞尔公司”还把用波兰语和英语录制的唱片分寄给所有的波兰广播电台，唱片录制的是无线电实况广播，歌剧里的咏叹调、诗朗诵等。“康塞尔公司”供给波兰一些单位带英文原文的广播唱片。有些唱片系列是专门用来学英语的。目前，学英语的波兰人数比1939年前的几十倍还要多得多。

几天前，英国的“BBC”广播电台向克拉科夫广播电台和交响乐队提出通过“BBC”电台举行英国音乐会的建议。为此应录制波兰交响乐队演奏英国音乐的唱片。第一次这样的演奏会被定在5月份举行。英国人在波兰居民中开展了大规模宣传活动，保证要让全国都能听到这次演奏会。组织这次演奏会的目的是吸引新听众收听英国广播。

1947年底，英国指挥和奥地利钢琴家来到波兰，他们走遍全国，用的都是波兰的交响乐队，但却打着“英国交响乐队”的招牌

^① 安·扬·维辛斯基，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1941～1953年间，先后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副部长、部长。

举行演奏会。每到一个城市，英国指挥和奥地利钢琴家在 10~15 天内训练当地的交响乐队以便到演奏会上演出。这就给他们创造了同波兰音乐家建立密切联系的条件，因此，他们中有很多人应招去为英国服务。

除此之外，虽然演奏会的实际演奏人员都是波兰人，但这些演奏会的广告本身，却带有英国宣传的特点。

英国人和美国人通过各种体育、宗教、青年组织，大量开展宣传工作，这些组织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建立的，并由他们给予大量资助。

基督教青年组织协会“世界基督教青年协会”在青年人中间开展了特别广泛的活动。在华沙该协会的俱乐部里有设备齐全的大厅，游泳池、台球台、跳舞厅、及拥有大量英、美图书的中心图书馆。该俱乐部还组织免费学习英语。

这里还有送报童“训练班”，组织各种讲课。“世界基督教青年协会”还举办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参观以及其他在青年人中间进行的活动。加入该组织者买门票便宜，而部分青年还能免费就餐。所有与“世界基督教青年协会”的活动有关的费用都由美国大使馆支付。

“世界基督教青年协会”在波兹南和弗罗茨瓦夫都有设备上等的旅馆。“世界基督教青年协会”在波兰 16 个大城市里都有分部。

“循道派教徒学校”是设在华沙的第二座盎格鲁撒克逊俱乐部。在这个学校里组织了用先进方法学习的英语学习班。来俱乐部的人都能亲手领到一份英文原稿，然后，为了掌握正确的发音要大家一起多次地重复它。在这里还可以听用英语讲的课。

波兰宗教界的反动分子广泛招募青年人加入宗教组织“圣徒耶和华的目击者”。同意加入该组织的每个人都发给美元作津贴。在收到美国“教母”寄来的邮包里都装有一张小纸片，上面说，上帝

在召唤，应尽快地把波兰从反基督者手中解救出来。

在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和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同时，毫无疑问，这些组织为了他们英美主子的利益也在进行间谍活动。在这些俱乐部和组织里，以奖励体育成绩，给跳舞好的人授予奖金的形式，新诗人写诗付给稿酬的形式，收买青年人做侦察工作。

盎格鲁撒克逊人希望用钱腐蚀青年人，利用他们达到反波兰和反苏联的目的。

这些远不是英美在波兰进行宣传的全部事实。但是，它却能证明，英国人、特别是美国人近期大力加强了在波兰的宣传工作。所有的宣传提出的目的都是为了削弱苏联在波兰人民中间正在扩大的影响，以便巩固自己在波兰地位。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的宣传充斥着恶毒的反苏内容。如果英国人在自己的广播里有时企图“用客观事实”加以掩盖的话，那么美国人的宣传则是恶毒地攻击苏联，用拙劣的、挑衅性的口吻发泄大量诽谤之辞。

在自己的宣传工作中，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广泛地利用波兰反动的宗教界和其他在波兰的反动分子。

北军队集群政治部第7处处长、中校 扎巴什坦斯基

1948年7月22日

№01811

北军队集群政治部关于波兰工人党
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对《自由》报和
波苏友好协会持不友好态度事例的报告

（1948年8月30日）

秘密

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希金中将报告

内容：关于对《自由》报和对波苏友好协会不友好态度的几个事例。

在同《自由》报记者希尔金少校交谈中，波苏友好协会总书记符伦斯基转告了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个别工作人员对“自由”报和对波苏友好协会表现出不友好态度的一些事实。

据符伦斯基称，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宣传司司长万格罗夫斯基至今一直还在阻碍通过波苏友好协会发行报纸，他宣布，这不是协会的工作，办这种事的是“读者出版社”。

设置这类障碍的情况在波兰工人党省一级的单位里也有。比如，波苏友好协会的女工作人员兰科夫卡^①就推销《自由》报问题曾去找过波兰工人党格但斯克省委员会书记，可是他却拒绝帮助

^① 应为兰什科夫斯卡雅，1948～1949年任波苏友好协会总会地方部副主任。

她。符伦斯基推测，万格罗夫斯基给省委会下达了如果不是书面的，那就是口头的指示，让他们拒绝帮助推销《自由》报。

符伦斯基接着说，当他去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①，请求在波苏友好协会召开省代表大会期间派几名宣传干部协助时，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哈别尔和文泽尔回答他说，只有一个条件才能派出宣传员，那就是如果协会能付给他们报酬的话。

当符伦斯基说明，协会在资金上有困难时，文泽尔反驳他说：“怎么，朋友不帮助您吗？”——这里指的是苏联。

符伦斯基对此回答说，他不是苏联的代办，从苏联没有收到为苏联开展宣传的经费，并对听到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这种言论感到很气愤。

这些事实证明，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个别工作人员对苏联表现出隐蔽的不友好态度。

北军队集群政治部副主任、上校 普罗塔索夫

^① 从上下文看，应为宣传部。

No 01812

罗马尼亚驻华沙领事馆
关于波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报告^①

（1948年10月25日前）

波兰杂记

1948年的1月至9月在波兰停留期间，我在各个州观察到了一些社会和政治生活“现象”，一些与人民民主的原则内容相抵触的现象。

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九月全会揭露了哥穆尔卡同志及其支持者的错误之后^②，我才彻底地清楚了那些“奇怪”现象的根源。

遗憾的是，我不能把某些事实完全准确地复述出来并指出就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之交谈的人。不过，其中许多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任何时候都可以验证的。

1. 只要注意一下出版物，主要是党的刊物，观察波兰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很容易看到波兰工人党缺少一种主导作

① 这份报告是由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基什涅夫斯基以个人名义转交给巴拉诺夫的。1948年10月25日，后者把它呈报给了苏斯洛夫。

② 指1948年8月31日至9月3日举行的全会。全会认为哥穆尔卡犯了“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解除了他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此后，中央委员、主管党的教育工作的宾科夫斯基，中央委员、波兰军队总政治部主任斯彼哈尔斯基，中央委员克利什科和洛加-索文斯基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

用。

2. 在今年1月或是2月，以西伦凯维兹和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从莫斯科返回^①。众所周知，该代表团是在双方平等的条件下，从苏联获得粮食援助（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是借款）之后，带着对波兰来说多么了不起的成绩返回波兰的。

当代表团到达时，在华沙（是的，还有全国）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应该期待的是，工人、农民和职工群众欢迎代表团，街道上挂起标语、口号，出版物也应有所反映，应该让人民感觉到苏联的帮助。然而，诸如此类什么也没有。到车站来迎接代表团的不超过100人，都是来自各部和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西伦凯维兹和哥穆尔卡简短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几句话欢迎仪式就结束了。

3. 在五一节游行时，我只看见一张斯大林同志的画像，而且像的尺寸也不很大。游行进行得枯燥无味，游行者的面部表情似乎很拘谨。

4. 在4月末，26日，我有机会到波兹南机车制造厂去了一趟。既然是在五一节前夕，我希望能看到节前的气氛：口号、标语、生产和竞赛指标、墙报、与此相适应的工人的精神状态。然而，遗憾的是，除了全厂仅有的一万名工人、枯燥的产品品种和年度数字指标外，什么都没有看见。

5. 7月22日是法定的解放和新的自由波兰国庆日，再提关于苏联军队在把波兰人民从法西斯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事业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现在不需要了。

波兰人民或许比其他任何一个被战无不胜的苏联军队解放出来的民族更应该记住是谁把他们从法西斯野兽死亡的魔爪中，从麦达

^① 代表团于1948年1月15~26日访问莫斯科。双方签订了由苏联向波兰提供20万吨粮食及贷款的协定。

纽克、奥斯威辛死亡工厂中解救出来的。

这天，全国到处举行民间庆祝活动，但这天很少——出奇地少——讲到和写到苏联勇士，那些不惜抛洒热血，把波兰人民从死亡中、从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给波兰人民制造的毁灭中解救出来的勇士。很少有人提到伟大的斯大林的名字，提及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苏联把人类从奴役和死亡中拯救出来。相反，给人造成的一种印象，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放到脑后，变得模糊不清了。说什么“新波兰”，“自由的波兰”，“被解放的波兰”（被谁解放的不清楚）等等。

对我们所有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些日子，比如：苏联航空节，海军节，应该举行的活动，也都没有。

对为什么在上述提及的事件中没有给予苏联应有的重视的问题，人们给我一个“含义深刻”的回答：你没看见，在波兰很大程度上还有反俄的余孽，因此，避免提苏联似乎是为了不再引起敌对情绪。

实际上，这是挡箭牌，而不是别的什么。在它的掩护下，民族主义分子的确已经煽起了反苏的敌对情绪。

关于在波兰还留有反俄余孽，这并不是新鲜事。指出这一问题时，谁也没有把它当作发现新大陆。但是，糟糕的是看不出为了彻底铲除反俄情绪开展过什么工作，而把苏联在为和平而斗争的事业中、在解放波兰人民的事业中的主导作用弄得模糊不清，却又为反俄主义发展成反苏主义制造了有利的土壤。

6.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波兰享有过多的自由，所以，他们的报纸、杂志和图书都在紧张而全速地印刷，几乎在任何一个书报亭里都能买到美国和英国的杂志。它们在印数和种类上看来都超过了波兰的报刊杂志。譬如，在克拉科夫就用波兰语出版、向全国发行了8~12页的周刊《英国之声》。至于这本“刊物”里写些什么就没有必要说了。

同时，任何一种苏联杂志或报纸却只能在二个“俄罗斯书籍”商店（在华沙）里才能买到。

只是在9月全会之后才开始出现苏联报纸。

我回忆起在“波洛尼亚”旅馆书报亭里同卖报人进行过一次谈话：我——“为什么你这里没有苏联报纸？”

他——“如果我不都卖掉，我这里剩下的就不收回了，而且，我还得报告。”

我——“如果剩下了美国的刊物，你怎么跟美国人交涉？”

他——“中央局把我这里剩下的都拿走，然后返还给美国人（是从属于美国使馆的人）。”

你自己想一想，建立了什么“系统”。简直是纵容美国人，让他们肆无忌惮。外交使团更是厚颜无耻，用非法的办法占据了保加利亚使馆的房子，这是保加利亚的国家财产，而且拒绝腾房子。对这些不能容忍的行为，也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

拨给美国人和英国人十几处华沙最好和最大的房子安置各种“机关”。而同时许多外交代表机构，像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共和国、一部分保加利亚、瑞典、比利时等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都挤在一家旅馆的1~3层房间里。

在弗罗茨瓦夫的展览会上，在专门的展台上展有杜鲁门先生“买的”一些物品（主要是水晶玻璃器皿和瓷器）。并不是不做任何说明的简单展出，而是给参观者以相应的解说，说这些物品是杜鲁门先生买的。

美国、英国和法国影片都有大吹大擂的广告宣传。同时，苏联的影片只是通过演员的姓名才能分辨出来，只是偶尔用不大的标题写着：“苏联影片”或者类似的提示。

在伦敦举行的有波兰运动员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① 闭幕之后，电影院开始上演新闻短片，反映了几乎本次“奥运会”的全过程。新闻短片一开始是一伙法西斯君主制装束的希腊人举着“希腊”牌子进入运动场，然后，出现英国国王的形象并播送他的演说。这是一个简单的新闻片吗？让其他人去评论吧！

7. 文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苏联文学和小说翻译的数量极少。通常这类图书作为例外，在波兰工人党所属的两三个书店里和波苏友好协会的橱窗里才能见到。

8. 天主教会及其牧师都是梵蒂冈的代表，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代表。他们拥有极大的能量向民众施加反面影响。可悲的是，几乎完全看不到采取任何一点什么措施以消除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并向群众解释清楚，天主教会和它的黑乌鸦扮演着什么角色。

可以举几个例子：4月或是5月，我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华沙的胜利广场上有几百名运动员、汽车摩托俱乐部成员聚在一起迎接新赛季的开始。而且，多数都是青年人。一开始先是布道或是牧师祈祷，还有两个小童作助手，把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搬到专门装饰的载重汽车上。祈祷仪式结束之后，牧师围着一些听众转了一圈，并向他们身上洒“圣水”。在这之后，摩托车手们启动车子向新赛季迈出了第一步。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在牧师之前还是之后，谁都没有发表什么演说。

在弗罗茨瓦夫召开的小手工业者代表大会，开始和结束都是由牧师作祈祷。

经常能看见一些教徒在牧师的带领下做着宗教仪式，沿华沙的街道向琴斯托霍瓦小城附近的圣地走去。通常在这些人的队伍里也

^① 指 1948 年的伦敦奥运会。

有贫农参加。

我的一位同事热奥热斯库·约思有机会看见社会主义党基层组织会议一开始也作祈祷。

9. 在全世界的劳动者因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的死而悲伤的日子里^①，在波兰几乎不知道。可从报界对这一悲惨事件的态度来评判。他死后的第二天，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了简短的消息，消息中间登了一张日丹诺夫同志的照片，有6×9厘米大小，第二天在同一份报纸上刊出了波兰工人党的慰问信，还有两三篇小文章，就完了。

10. 在4月份，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代表中有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米库尼斯同志。对这位同志没有任何照顾，仅代表他个人。把他像一般人一样安排在旅馆里，与来往客人没有什么不同，不仅没有给他派汽车和保卫人员，甚至都没有派向导，让他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参观华沙。米库尼斯同志以私人身份自己在市内转，在饭馆吃饭、去看电影。

这一事实证明，对一位负责同志连最起码的同志感谢、关怀和警惕性都没有。

11. 在波兰有一位民主希腊的政治代表。这位同志作为一个人、一个代表简直过着有点可怜的生活。在旅馆里给他的是一个小房间，既是全家的住所（妻子和九岁的女儿），还要在这里工作。同所有来住旅馆的人一样，要自付房费。他靠在各种报上发表文章，同编辑部争夺一些栏目所得的稿费维持生活。他（按他的说法）没能广泛地开展有利于民主希腊的任何活动。他与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保持直接的联系。

12. 9月份签订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之间的经

^① 安·亚·日丹诺夫于1948年8月31日逝世。

济合作条约。当签订条约的有关工作结束时，双方都发表了祝词——一方代表罗马尼亚政府，另一方代表波兰政府。双方的祝词都指出该条约的重要性，都强调了人民民主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同西欧各国和美国间的“合作”有差别，并详细地论述了后者的代表“马歇尔计划”。

双方所指出的一切都刊登在波兰通讯社的公报上。《人民之声》报仅简单地说了几句关于条约的事，“省略”了现阶段斗争最本质的东西：双方代表论“马歇尔计划”。

这是简单的疏忽吗？未必，如果指出下述情况，《人民之声》报的否定（最低限度）立场，就更加明显了：波兰社会党的《职工》报，以及大众报纸《华沙生活》几乎整板全文刊登了波通社的公报。《人民之声》报不认为必须要像它们那样全文登出。

各报的错误的深刻性还在于，它们所刊登的东西都是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九月全会之后。

13. 关于这时期的阶级斗争，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听到。

上述列举的事实几乎都是在匆忙中得到的。对各种事件稍加分析就能获得成倍的东西。

在这一阶段里，在波兰召开了数次不同的大会和会议，参加会议的罗马尼亚代表团有：

- （1）以别尔库·费尔德曼同志为首的犹太民主组织代表团；
- （2）以建筑师蓬佩同志为首的华沙-布拉格、布拉格-华沙自行车竞赛的参加者；
- （3）以阿德日乌·康斯坦丁同志为首的合作制代表大会代表团；
- （4）以弗洛雷斯库和彼得列·卢普同志为首的国际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团；
- （5）出席小手工业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团员的姓名我不知道。

(6) 以莱乌图·利昂季同志为首的弗罗茨瓦夫科学代表会议的代表团；

(7) 罗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其成员有瓦西里基·别佳和霍多什等同志。

上述代表团成员都能提供极其丰富的情报资料。因为，他们有机会接触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

我想，列举的事实都是可靠的。为了今后的方向正确，希望批评和指正。

№01813

哥穆尔卡就拒绝选入波兰统一工人党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一事给斯大林的信

（1948年12月14日）

斯大林同志

由于波兰工人党政治局提出得到您，斯大林同志支持的建议，今年12月9日同我谈了关于让我参加统一工人党^①政治局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再次向您提出我所遵循的原则的理由，请您劝告波兰同志，让他们能接受我的愿望，放弃推荐我进入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候选人名单。

在同您直接交谈中，我尽量论述清楚我对上述问题的观点，当然由于俄语上的欠缺可能说得有点杂乱和不十分清楚。因此，根据今年12月10日莫洛托夫同志在电话里提出的想法，沿着这一思路，我想向您补充说明使我决定不进入统一党政治局的更合乎情理的原因。

毫无疑问，对我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时的近一时期所犯的错误，要求我接受各种批评和进行彻底地自我批评。我这样做了。

按我的意见，有两种方式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一种方式，我认为是最合乎实际，即本着这样的原则，就是

^① 1948年12月15日，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在华沙举行大会，正式合并两党，组成波兰统一工人党。贝鲁特当选为党中央主席。在波兰工人党九月全会上被解除总书记职务后，哥穆尔卡一直拒绝参加两党联合会议工作，也不同意进入新组建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

只在我发表错误观点或是在与同志们争论中就所讨论的一些问题不正确地阐述了自己想法的那一级党组织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限制在两级党组织里：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这种方法使我有可能在辞去党的总书记后仍然留在政治局里。正如所见到的，这种方式被否决了。

还有借助它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二种方式，也是政治局选择的方式。这就是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有明显夸大错误的倾向），尽管不正确和不真实的观点我只是在党的最高一级组织里说的，尽管我的错误原则上并没有破坏我们党的政治总路线，但仍作为被告把我摆在全党的面前，甚至政治局还允许党员用大量的诽谤之辞攻击我，这种方式导致了，而且也不能不导致对我精神上的伤害，同时还使我的威信被破坏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对我来说，再也不可能进入党的领导岗位了，至少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

我并不打算批评政治局做出了选择第二种方式的决定。可能这样会更容易地把党引向新的政治道路，并在统一党代表大会的前夕，在波兰完成社会政治的根本转变。但是，在选择了这种方式的同时，政治局应该意识到，用这种方式也就把我排除出了党的领导和活动家之列。这就是我不能同意推选我进入统一党政治局候选人的第一个原因。

在同您交谈中我已经提出，进一步说我不能同意我们党中央八月会上通过的决议第五条^①。我对决议的第五条持否定态度的理由已在上述全会的第一次作自我批评的发言中陈述过。这次自我批评应该承认是很不够的，而且很多同志对我对第五条决议的态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发言中我认识到，

^① 这条指责哥穆尔卡在对待波兰共和国的态度有投降主义和取消主义倾向，并且是混进民族统一委员会的敌视波兰共和国的伦敦阵营分子的同路人。

他们没有提醒自己应该客观地分析占领时期的局势，必须对当时党的领导的政治活动给予恰当的评价，相反他们却另有打算——想彻底损害我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威信。这也许是在选举党的新的总书记或者是统一党的主席之前所必须的吧。

在八月全会上，我实际面临下述的选择：或者我承认决议草案中第五条里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不承认这些错误，但这就证明了，我与党的意见不同并企图破坏党的统一。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明茨同志的发言里，在会议的第一天他就代表政治局定下了辩论的基调。遵照政治局的意图，我在八月全会上被剥夺了一切，甚至连占领时期的一点成绩都没有剩下。我不希望假人以口实，受人以柄，怀疑我力图分裂党，所以，我被迫承认决议第五条的指责是正确的。

这种状况的自然结果就是在八月全会后的几天举行的党积极分子的政治会议上提出反对我，指责我想把波兰政权交给伦敦的流亡政府，它的后果就是在波兰全国为共产党人树起如林的绞刑架。这种造谣中伤、蛊惑人心的攻击，在参加上述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并没有引起任何相应的反响。

作总结发言的贝鲁特同志也并不认为还有什么必要对我的活动的这种“评价”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样我也不作声，因为，任何一种反对意见都可能看做是我希望分裂党。就这样，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都相信所听到的指责的一切前提都具备了。在全国各地召开的党的基层组织会议上和党的代表会议上，在阐明八月全会决议涉及到我的问题时，人们纷纷指责我叛变，还要求逮捕我，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上面下达的一定的方针的后果，其目的是要从劳动人民群众眼里，抹去一切我在党、在工人阶级和我的祖国面前确实能够数得出的贡献。

当意识到对决议的第五条重新开始争论会给党的队伍造成混乱

时，我过去不想，现在也不想向党的政治局提出，今后我不会接受决议第五条对我提出的指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能同意推荐我当进入政治局的候选人。如果我同意，这就意味着我承认上述决议条款中提到的指责以及在八月全会上说的与此决议有关的和报告在全国传达过程中大家所议论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进入像政治局这样的机关里，其成员对政党的专心致志，因而对党的过去历史（占领时期）的评价，都要亲自承担重大责任，因此，对八月全会第五条决议，我不能不持否定态度，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混乱和给党及其领导的统一带来有害的后果。

这是我不能允许被选入统一党政治局的第二个原因。

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都了解在犹太同志问题上我对党的人事政策（原文如此——译者）的态度。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在同政治局委员个别的谈话中，我都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问题。用民族的观点去分析国家和党的机关的领导班子的人员组成，我认为现在仍是构成一种使用障碍，我们很难再扩大我们的基础，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以及农村，首先是在工人阶级中间。的确，可以认为我应该对犹太人在国家和党的机关的领导人员当中有如此高的比例负有责任，但是，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过错首先在犹太同志身上。作为党的总书记，我有关党应该实行什么样的人事政策的观点，在他们中间不仅没有得到理解和支持，而且相反，其自成体系的人事政策的实行，导致了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有种借口与事实不符，即仅仅波兰党的干部严重不足，就使与现行人事政策不同的其他政策无法实行。如果党不去创造适合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不把最有才干的同志从党安排的环境中推到负责的岗位上去，干部永远也不能成长起来。

在一系列观察的基础上，可以完全负责地说，部分犹太同志还没有意识到是什么纽带把自己同波兰人民、同波兰的工人阶级联结

在一起的，或者说也就是说仍在坚持可以称之为民族虚无主义的立场。所有这些情况，在选择中高级干部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

我认为许多文件涉及到无论是党还是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的现有状况，令人十分担忧和不能满意。与此同时，在党内，特别是八月全会之后形成一种局面，任何人都没有勇气针对当前的人事政策提出批评意见，不满情绪都在侧厅回廊上发泄。

我深信，很大程度上，我在党的人事政策问题上的观点，虽然并没有公开，却影响了解决党领导层近期危机的形式和方法。对我来说，毫无疑问，如果我在政治局的成员之列，一定会产生新的矛盾，在我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会就我对国家和党的领导机关里民族-人事构成观点产生争论。我认为，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党的机关里，犹太人的比重不仅要停止进一步的增加，而且还要减少这一比重，特别是要减少在高一层机构里的比重，是必须的。根据我履行党的总书记职务时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我在这个方向上向前迈出哪怕一小步，都会遇上各种各样公开或是隐蔽的旨在“终止”我在党内活动的行动。作为政治局委员我不能无动于衷地对待这一问题。

这就是我不能够，也不应该进入统一党政治局成员班子的第三个原因。

当注意到一种新的沉重之感——这是政治局为了解除我的党书记职务（应该提醒的是，我自己早在今年6月无论是向政治局，还是在同政治局成员的谈话里都提出了请求解除我的职务问题）采取一些方法结果给我造成的，我甚至很难想象在政治局里应有的那种经常的、协调一致的、直接合作的气氛。我回避政治局在选择批判我的错误上的方法和范围问题，但是，我很难理解和弄清楚的是政治局对我采取的一整套方针，譬如像这件事，今年8月上旬，以贝鲁特同志为首的三位政治局委员告诉我，建议我同政治局全体委员

一起去见您，斯大林同志。当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为此来到正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政治局委员们那里时，又建议我同他们一起审议为党中央八月全会准备的决议草案，并宣布没有必要再去见您了，因为，政治局委员们已经与您就解决党的领导危机问题达成了协议。诸如此类的事还很多。回想一下诸如这些情况就足够了：指责我玷污了蒙德尔“保尔”的名字；在占领时期贝鲁特同志寄给季米特洛夫同志一封信的事；贝尔曼说，还在1944年当他来到卢布林之后，他就得到贝鲁特提供的消息，在占领时期由于我作为总书记推行了虚伪的政策而使党面临分裂的危险；在八月全会之后、一般的政治会议之前，政治局告诉我，只公布我在党的一般积极分子政治会议上发表自我批评声明，而实际上在没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就在刊物上把我在八月全会上发表自我批评声明全部公布出来了。显然，对想努力同党进行斗争、想分裂其队伍统一的那些人是可以采用类似这样的方法的。而我并不想这样，党的政治局对此是十分了解的。

这样的方法不能不给我留下痛苦的感觉。事实既真实又十分新鲜，它迫使我直截了当地去对待政治局委员，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自由地阐述一些想法。我不希望把在审理各种问题到我可能产生的每一点疑问，我认为说“拥护”是不对时而说出来的每一个“反对”，都随时重新搬出来公开讨论。但是，我又做不到不管看法如何总是说“拥护”。

这是不允许我被选人统一党政治局的第四个原因。

除了以前的党务工作之外，尤其是最近的一些事情，已损害了我的神经系统。在我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下，我很重视最近一些事引起的我的自我感觉，我无能力从事党的领导工作。

这是补充理由，它也迫使我坚持这样的观点。

我出身于工人，整个生命都为劳动人民的事业而斗争，忠实地

为自己的阶级和自己的人民服务。

我过去一直把苏联视为并现在还视为是波兰最好的朋友，而把联共（布），特别是您，斯大林同志视为也是我们党的英明导师。

不论我在什么样的工作部门，我永远忠实于理想，为此我已奋斗了一生直到现在。

衷心地感谢您，您为我花费了那么多对您来说宝贵的时间，请求您能正确地理解我的观点，这些观点不论是在直接同您的交谈中，还是在此信中我都努力论证过了。

哥穆尔卡

1948年12月14日于华沙

№01814

塔斯社驻华沙记者潘丘欣关于
同维德-维尔斯基和马图舍夫斯基谈话的报告

(1949年3月5日)

秘密

莫斯科，塔斯社，帕利古诺夫同志收^①

3月5日，华沙

劳动党总书记维德-维尔斯基通知我，说他这几天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贝尔曼和中央委员会书记扎姆勃罗夫斯基谈过话。虽然谈话是同他们每个人单独进行的，但讨论的问题是一个。扎姆勃罗夫斯基和贝尔曼都问维德-维尔斯基，为什么劳动党削弱了，为了把劳动党变成一个强有力的党，能给宗教界以重要影响，需要做些什么。

维德-维尔斯基表示，这个问题使我措手不及，因为至今矛盾的倾向是，劳动党不只是削弱，而且是在逐渐消亡。现在扎姆勃罗夫斯基和贝尔曼却表示说，劳动党还有不小的力量能为使波兰教徒断绝与梵蒂冈的关系而斗争。

维德-维尔斯基说，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宗教市民之间建立一个中间党，有其优点，但也不能对危险估计不足。

维德-维尔斯基答应交给我一份他按扎姆勃罗夫斯基和贝尔曼

^① H. Г. 帕利古诺夫，苏联记者和外交家。1940~1960年为塔斯社负责人。

的要求制定的建党计划。

我应补充一点，维德－维尔斯基在讲述他同扎姆勃罗夫斯基和贝尔曼的谈话情况时，十分激动，不完全理解他们的路线。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马图舍夫斯基告知我，政治局委员贝尔曼、扎姆勃罗夫斯基和西伦凯维兹之间的友谊日益增长，这表现在政治局的工作中，三人中的每个人都认为支持另两人的工作是自己的义务。这种友谊在对待西伦凯维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但贝鲁特一般能不照顾个人小团体，而做出正确决定。

最近于3月4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扎姆勃罗夫斯基提出一个极其荒唐的想法，即取消农业工人协会，似乎该协会可由农民互助协会及其他农村组织取而代之。但是贝鲁特捍卫了农业工人协会。

马图舍夫斯基说，考虑到西伦凯维兹不久以前的行为，特别是他寄希望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贝尔曼、扎姆勃罗夫斯基和西伦凯维兹之间的密切的私人友谊，对许多人来说简直是莫名其妙。

马图舍夫斯基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对一些大的原则性政治问题没有进行讨论。连波兰农民代表团去乌克兰这样的问题，都未提交政治局讨论。

马图舍夫斯基说：“作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华沙省委员会的一名领导人，我曾受命挑选几个人去乌克兰。但名额很少，连今年组织集体经济的许多村的代表我们都无法派往乌克兰。”

比马图舍夫斯基的这一声明更令人奇怪的是，据我所知，波兰派往乌克兰的代表团里有1000名农民，但是仅仅派去200人，其原因似乎是各单位未能选出足够的审查合格的人。

关于天主教会问题，马图舍夫斯基说，在教会上层存在一定的分歧。据马图舍夫斯基说，“自由派”主教表示愿意与政府合作。他们是：克列帕奇（罗兹）、德麦克（波兹南）、斯维尔斯基（塞德利采）、马叶夫斯基（华沙主教辖区秘书）。

最反动的主教是：阿达姆斯基（卡托维茨）、库比纳（琴斯托霍夫）和赫罗曼斯基（华沙主教辖区秘书）。现在波兰首席主教维辛斯基想任命赫罗曼斯基为自己以前辖区卢布林的主教，但遭到极力反对。

德麦克和克列帕奇觉得受了委屈，因为他们都想当波兰首席主教。

现在首席主教维辛斯基在波兰各地游说，千方百计提高教徒的士气。

现在军事法庭正处理几名教士强盗行径的案子。教士与强盗合伙的事实有很多，但马图舍夫斯基认为，同反动教徒作斗争的重点不在于此。马图舍夫斯基说，最近有不少进步教士来访问我。他们认为，应当打击教会上层，如果准备好有关材料，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

潘丘欣

No01815

塔斯社驻华沙记者潘丘欣
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教会关系的报告

（1949年4月9日）

波兰民主力量和天主教会

华沙，4月4日（塔斯社）。最近国内恐怖事件、暗杀、工厂怠工剧增，美苏战争不可避免并已临近的谣言再次甚嚣尘上。

这些现象的根源尽人皆知，追根问底已无必要。从华沙普通公民那里可以听到具有讥讽意味的话：美国驻华沙大使馆拥有的汽车，比任何一家最大的建筑公司，比波兰任何一个部拥有的汽车都多。悬挂美国国旗的汽车到处可见，行驶在全国各地。波兰当局对此已有所察觉。

外交部新闻出版司司长格罗什，对我提出的问题只是耸耸肩而已。

他说：“我们有什么办法，民主嘛。美国不限制我们的人在其国内到处行驶。这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制造障碍。而您，则是一回事。苏联自己也允许这样做。”

所有这些，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同反动派斗争的莫名其妙的政治路线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众所周知，米科拉伊奇克被粉碎后，波兰国内反动派最大的堡垒现在是天主教教会。教会的行动狡猾巧妙，奉行“不战不和”路

线，战后年代它在居民中是一种灰心丧气和诚惶诚恐姿态。在红衣主教赫隆德任波兰首席主教期间，天主教教会有时被迫容忍一些教士的自由派情绪，有时甚至退让。

众所周知，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中，有些教士的言论在波兰民主界不受欢迎。在议会选举期间天主教保持中立，在同米科拉伊奇克的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无疑起了正面作用。在同劳动党接触中，天主教会感到已具备在波兰建立宗教党的基础，这个党应以法国“共和人民运动”为榜样，不仅可以制止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可以在波兰恢复资本主义。

考虑到红衣主教赫隆德关于德国的言论，他在群众中的不得人心，在这些方面还要继续起作用。

尽管如此，赫隆德在梵蒂冈的压力下最终还是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他笼络住自由派教士，派其中一些人，如库拉科夫斯基，到罗马去赎罪。赫隆德还派人到青年教徒中去，以后又借口星期日志愿劳动者问题，企图唆使教徒和居民反对政府。

波兰民主力量利用人民的爱国情绪，对天主教领导人的行径予以反击。但为了使天主教不挑起更大事端，民主力量让步了，暂时停止了组织星期日义务劳动。

赫隆德死后，政府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更加尖锐。如所周知，波兰有许多值得教皇信任的老主教。但是在选择赫隆德的副主教时，选中了年青的卢布林主教维辛斯基。维辛斯基的倔强和固执的性格、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良好的信誉、特殊的民主主义和对人民民主的不妥协态度，起了主要作用。他作为一个普通教士，在市内总是步行，到教堂比教徒早，有时比别的教士还早。经常到工厂同工人谈话。如果说赫隆德时期教会里有严格的纪律，那么现在纪律就更严了。维辛斯基控制了教会从低级神职人员到主教的12000名神职人员和天主教报刊，以及一切与天主教有关的事宜。甚

至像《天堂之声》和《德吉斯与尤特罗》这样的报刊，昨天还与民主力量合作，因而被认为是进步报刊，而今天却成了梵蒂冈的喉舌。

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维辛斯基为教士组织了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班，从教士中培养反人民民主的积极斗士。

波兰政治活动家把已形成的局势概括为“不战不和”，但却没有注意到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这一术语已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实际上天主教自维辛斯基任职以后，在进行着有预谋、有计划的反政府和反人民民主的战争。

维辛斯基不久前在辖区走了一圈，他向主教们和可靠的教士们宣称，梵蒂冈对波兰天主教及其神职人员评价很高。

他说：“但你们要记住，波兰天主教是在迎接苦难”。

他的讲话充分证明，天主教选择的道路不是和解，而是斗争。和赫隆德时期一样，青年被作为争夺的中心对象。

无论维辛斯基还是主教们（特别是卡托维茨的主教阿达姆斯基）都派人到青年人中去，企图（并不是毫无成就地）点燃他们的宗教狂热和青年人固有的自我牺牲精神。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上，教育部长斯克舍舍夫斯基说，有必要在学校里逐步取消宗教纪律课。在有些地方，这一意见被作为解除宗教纪律课的指示，被进步教师和青年所接受。于是这些课开始被安排在学日初或学日末。青年们开始从墙上摘下带有耶稣圣像的十字架。天主教会哗然。信教青年得到指示到只要可能的地方悬挂带耶稣圣像的十字架。由于如果摘下圣像，必定会在狂热的信徒中激起愤慨，因此，就可以减轻教会反动活动的罪过了。

许多地方贴出了反政府的标语，在一些青年的民主组织中发现了天主教建立的伪装支部。

波兰安全机关逮捕了明目张胆的天主教奸细，与此同时，政府机关不得不暂停反击，建议学校领导不让从墙上摘下圣像。

此外，当有的教师拒绝讲授宗教纪律课程时，建议他们继续讲授，直到接到特别命令。

比如，在省里发生了这样的事，那里有20多名教师声明拒绝讲授“神学”课。

但最令人不安的情况是，在教会反动人员和教会反对人民波兰的斗争日益尖锐化面前，波兰统一工人党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削弱了人民民主力量。

为了削弱天主教会并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来，波兰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对天主教会的态度。

这一声明使天主教会措手不及，瓦解了天主教会的宣传队伍，但并未引起居民的任何反对。此外，事实表明，在许多讨论过政府声明的村子里，农民往往批评教士的行为，说他们贪婪，欺骗上帝，同女管事过世俗生活。

在教士受欢迎的村子里，农民都说政府的谴责是正确的，但他们的教士是好的。

但在这一完全正确的和大有希望的行动之后，却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完全莫名其妙、对将来没有任何意义的策略。

波兰统一工人党一方面在天主教会领地组织农业工人罢工，甚至要取消天主教会领地，而另一方面又想建立天主教党。

一个月以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扎姆勃罗夫斯基请来劳动党总书记维德-维尔斯基，直言不讳地建议他考虑用吸收天主教徒主体的办法扩大劳动党，并在以后将它改造成为与梵蒂冈相对立的天主教党问题。

后来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贝尔曼也提出了这一问题。

维德-维尔斯基提出问题：

“为什么要这样？”回答说，应当让教徒有“一定的希望”。

在同我谈话时，维德-维尔斯基对这一措施表示了怀疑。他说：

“即使是现在，劳动党还不大时，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还接连不断。如果组成一个大的天主教党，争权斗争还将有，并不是到波兰统一工人党那儿，而是到教会那儿寻求支持。”

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这样的党带来的害处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如此，劳动党仍要研究建立天主教党是否可行的问题。

“研究”是不顺利的，甚至是危险的，以致维德-维尔斯基认为必须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写专门报告，分析劳动党的政治路线，坚决反对建立天主教党的企图，因为这个党从一开始就一定会成为波兰反动派的工具。

维德-维尔斯基写道：

1. 劳动党总委员会 2 月 5 日和 6 日的工作完全符合人民民主的利益，符合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提出的基本政治任务。

2. 所通过的决议巩固了领导机关，扩大了劳动党的社会基础，摆脱了一些反动的毒瘤。

尽管党的发展条件很好，但我认为大量吸收党员是不适宜的，因为在劳动党中，少数原“兹雷福”派^①老的革命干部不能发挥影响，而思想意识不够成熟的新干部，不能对反动分子给予反击，从而使他们有可能控制我们的党。

这个问题之所以很复杂，还由于国外有一个（在波兰侨民中成立的）天主教党，现在已经能够感觉到它的影响了。

3. 劳动党总执行委员会在同天主教会谈判问题上完全和政府的声明一致，并号召劳动党成员积极参加宣讲运动。

许多有意思的现象证明了对这一运动及其对教徒影响的分析。

^① 即“断绝”派，指 1942 年 11 月从劳动党中分裂出去的一派，该派支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纲领，并在 1945 年 7 月，在波兰工人党建议下，由这派中的十几名活动家，组建了新的劳动党。

第一，劳动党党员中的天主教徒没有人反对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劳动党党员一致赞成政府的声明，谴责了反动教士。群众在会上关于巩固同苏联的友谊，开展反对英美战争贩子斗争的口号，到处受到鼓掌欢迎。

相反，在会上提出改组劳动党为天主教党的问题，立即引起道义上和思想上与天主教有联系的党员的反应。

尽管不是领导的意愿，但有时是在领导的影响下，会议变成了反对人民政府的游行。

最明显的例子，是3月27日在波兹南市召开的劳动党党员大会。

得知开会目的之后，狂热的信徒坐满了会场。人们静静地听取了劳动党省委员会代表伊德季奥尔以总委员会决议为基础的报告，然后展开了讨论。讲话的性质说明，发言人的发言是事先准备好的。发言者千方百计败坏人民民主，唤起狂热的群众，并在这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

维德-维尔斯基说道：“应当指出，自颇有名望的波佩尔（现正领导着国外的劳动党）回国以后，在国内还没召开过这样的大会。”

一位来自沙莫图伊乡的发言者号召成立大家都能接受的天主教党。他说：“有马克思主义，也有基督教。波兰农民是基督教徒，因此都要加入天主教党”。

以前同波佩尔合作过的纳杰尔、马尔奇尼亚克等忧伤地说：“如果劳动党不脱离波佩尔的话，我们不知要再走多远。”

这种对劳动党的指责，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一些人指责政府，说市场上没有肉，在商店购物排队，另一些人强烈反对劳动党总执委会，似乎它支持取消手工业，允许“国家资本”……剥削劳动人民。

主持会议的劳动党波兹南省主席勃热金斯基对反政府的发言没

有任何反应。

维德-维尔斯基说：“我在自己的发言中全力批评那些进行蛊惑煽动的政客，并取得一定的效果，友好的掌声可以说明这一点。”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煽动者们受到劳动党老活动家多明斯基和主席勃热金斯基的有力支持。

这两位活动家玩弄保护宗教，保卫基督教伦理的口号和其他廉价的宣传论据，力图收回用多明斯基的话说已被维德-维尔斯基影响了讲坛。

勃热金斯基坚决拒绝维德-维尔斯基再次发言，出席会议的7位劳动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不得不退出会场。

勃热金斯基和多明斯基支持反动的天主教徒不是偶然的。自选举新的劳动党总执行委员会以来，领导党的“人民的”勃热金斯基省长，就同多明斯基和伊德季奥尔订立了同盟，千方百计高举天主教的“战斗旗帜”，拉拢忠实的教徒，对前“兹雷福”派活动家，总执行委员会中最进步的人士的贬斥和恫吓毫不退让。

为达到此目的，劳动党内的反动派勃热金斯基、多明斯基、伊德季奥尔制订了斗争计划。在同反动分子接触时，他们说“我们波兰人和天主教徒要防止伪装的共产党人的进攻”。

为了分裂同人民民主有密切联系的劳动党，他们在党员中散布谣言，说劳动党总执行委员会奉行反波兰统一工人党方针的政策，说社会安全部委托他们（勃热金斯基集团）消除这种有害的活动。

在格但斯克的劳动党省委委员伊格纳奇·塔巴科收到了由伊德季奥尔签署的有这种意思的指示。

维德-维尔斯基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贝尔曼报告了反动分子在劳动党内执行值得怀疑的策略，他在信中指出“如您所知，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支持勃热金斯基及其集团的有关指示”。

维德-维尔斯基写道：“我们，劳动党的民主活动家，已请求您弄清楚我们的情况。

如果波兰统一工人党承认我们离开领导岗位是合适的，我们立即执行其指示。但是我们认为作如下声明是我们的职责：由于我们离开领导岗位，劳动党一定会成为安全机关活动的广阔天地。

权衡波兰统一工人党所有这些策略，肯定会产生一个问题：两项对立的措施，没收天主教会的土地和建立天主教党如何能够并存。

难道应该消灭一个敌人（米科拉伊奇克），就是为了培养一个更强的敌人——天主教。

这些策略对波兰民主来说不是太危险了吗？”

№01816

索科洛夫斯基关于波兰统一工人 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工作缺点的报告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主任波诺马廖夫同志

报 告

—

1949年第一季度，在贯彻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关于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联合建立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决议的名义下，在波兰向群众解释新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在企业 and 乡村建立统一的党的机构，统一的党的委员会。在第一季度基本完成了党的出版机构的组织改革，关闭了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出版机关，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统一党的报纸和杂志出版机构。

由于消除了波兰工人运动中的分裂，工人党及其刊物的威信在国内大大提高。统一党定期出版物一次的总份数比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出版物的总和增加了50%以上，其中报纸由152万份增加到226.8万份，党的一般政治杂志由136万份增加到2775000万份。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统一党党员总数（统一党党员总数为135万人），因此证明，党的出版物不仅党员阅读，党外的广大读者也在阅读。

工人政党统一以前，超过10万份的大份数的报刊只有晚报，

而严肃的日报中只有《工人论坛》一种超过这一数目。现在，统一党委员会出版的10种报纸中有7种日报超过10万份。其中《工人论坛》（卡托维兹）53万份，“工人报”（弗洛茨瓦夫）27.5万份，《人民论坛》（华沙）27万份，“工人之声”（罗兹）18万份，《波兹南报》（波兹南）12万份，《波莫瑞报》（比德哥什）1.1万份，《维勃热日之声》（格但斯克）10.5万份。

以上列举的党的出版物份数增长的数字，仅能部分地反映出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统一后，党的出版物对群众日益增长的影响。随着份数的增长，一些报纸的内容也改善了，并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4种党报（《工人论坛》、《工人报》、《工人之声》和《波莫瑞报》）在出版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积极合作者，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的工人和农民通讯员。在这些积极分子帮助下，《工人论坛》报在西里西亚矿井和企业开展了大规模为利用内部资源、消灭旷工、节约原材料而斗争的运动。依靠工人和农民通讯员，《波莫瑞报》严厉批评了一些党组织和机关的缺点，揭露了敌人和游手好闲的人。比如，根据该报农村通讯员的报道，揭露并清除了一些隐藏在格鲁忠兹县农村党组织内部的富农集团。

工人政党统一后，编辑不受监督的现象及他们无视中央指示的态度不见了。与此同时，中央出版部的作用增强了。除了中央出版部，想要对党报施加影响已非常困难。

所有这些波兰工人出版生活中健康正常的现象，都为我们加强在波兰居民中的宣传创造了良好条件。我们在工作中尽力利用这些条件。但是统一党中央出版部工作中的一些严重政治错误降低了代表处^①工作的效率，妨碍了充分利用这些新的有利条件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① 指苏联情报局驻波兰代表处。

这些错误是什么呢？第一，害怕国内的资本主义成分，对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感到恐慌，想同富农和解，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中央出版部的方针——避而不谈国内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前景，避而不谈苏联社会主义农业取得的成就。

正如我在交谈中确信的那样，中央出版部领导人斯塔舍夫斯基和哈别尔^①某种程度上同领导农业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赫尔霍夫斯基一样，坚持认为党的出版物不应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他们认为这种宣传为时过早，只能使波兰农民感到害怕。他们期望农业合作化自发地出现，不需要党及其出版物起引导作用。

比如，赫尔霍夫斯基在同我谈话时说：“为什么驱赶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要让他们自己逐渐认识集体农庄道路的正确性，现在没有必要在报纸上过多地宣传苏联集体农庄的成就，因为这只能使农民害怕。”哈别尔也是这样说的。4月7日哈别尔同我谈话时说：“苏联情报局的作者们关于农业问题的文章不大适合我国的报刊，因为这些文章公开宣扬集体农庄的优越性。”

中央出版部这一机会主义政策，使许多编辑不能刊用我们有关苏联农业成就的文章。现在编辑只敢刊登谈技术本身或农业技术的文章，回避那些谈及集体农庄制度的实质，它比个体经济的优越性，集体农庄的组织原则及劳动报酬的材料。

1949年第一季度，我们代表处收到从莫斯科寄来的127篇有关农业问题的文章和报道。其中仅有37篇发表了。其余90篇至今仍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出版的报纸、杂志的编辑部。

代表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编辑直接联系，争取发表这些文

^① 斯特凡·斯塔舍夫斯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副主任，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哈别尔为他的助手。

章。我们多次提醒编辑，说他们手中存放的文章十分重要，我们访问编辑部，邀请编辑到代表处来。如果是有关其他题目的材料，这些措施一般来说是很有效的，但这回却未收到应有的效果。

于是我们把问题提交到中央出版部，说最好能让编辑特别重视发表有关农业的文章，并把存在编辑部的有关这一题目的文章目录交到部里。斯塔舍夫斯基和哈别尔答应下达指示。但至今已过去近一个月，中央出版部并未下达答应下达的指示。

省里的编辑到华沙来时，常来看我。就在今天，4月21日，写这份报告之前，我曾同一位党报编辑谈话，他叫诺维茨基，《波莫瑞报》的编辑。他向我证实，到今天为止出版部没有下达刊登有关苏联农业材料的指示。正如诺维茨基所说，不仅如此，而且中央出版部经常提醒不要发表有关苏联农业的文章，理由是，在发行该报的波莫瑞省富农的影响很大，所以不要刺激农民。

昨天，4月20日，我接待了一位农民报《波兰农民》的责任编辑、农民作家安东尼·米列克-奥利哈。在谈话中我向他提出：为什么报纸很少刊登有关苏联农业成就的文章（该报第一季度收到有关这一问题的16篇文章，仅发表了6篇）。编辑奥利哈回答说，他自己也知道应该多刊登这类文章，他收到农民读者许多来信，要求多谈谈集体农庄的生活，并提出集体农庄劳动组织问题和庄员个人经济的问题，他，奥利哈也想回答这些问题。

奥利哈说：“但我没有做到，因为我是非党人士，中央农业部派了一名工作人员格罗绍娃^①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她经常向我说，阐明这些问题为时尚早，这是微妙的政治问题，目前她不能解释。”

我还能举出其他例子，但我想上面的例子已能够说明，不仅在

^① 应为哥罗什·伊莲娜，《波兰农民》副主编。

中央出版部，而且在党的领导的其他环节，占统治地位的是机会主义政策——避而不谈苏联社会主义的农业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自中央政治局批准联合耕种土地和农作物互助组示范章程以来，已经两个月了。示范章程已印成专门的小册子，但中央不准散发，也不准在刊物上发表有关这些章程和苏联农业互助组合章程的任何文章。

农民对这些章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下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有几本示范章程小册子落到比得哥什市黑市上，立即被抢购一空，尽管一本小册子的价钱高到 5000~6000 兹罗提，而每公担小麦的市场价才 2100 兹罗提。由于农民已经知道有示范章程，但尚不能得到这些章程，敌人就乘机散布各种污蔑集体农庄的谣言。全波兰到处流传着谣言，说根据章程农民将变成雇工，他们将用铃声被召集去上工，全体妇女都要扔下孩子不管，为新地主（农庄主席）从早到晚工作。而统一党中央总是在等待什么，总是害怕把示范章程送到农村，总是害怕向农民讲苏联社会主义农业成就的实际情况及其优越性。^①

不能不指出，中央农业部和出版部做了不少工作，劝说不久前访问乌克兰的波兰农民尽可能少向同村人讲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代表团成员回自己的村庄以前，赫尔霍夫斯基专门指示他们不必大讲特讲他们见到了什么。中央出版部对我们收到的苏联记者给波兰报刊写的关于波兰农民访问乌克兰时同他们交谈的报道，很不友好。斯塔舍夫斯基和哈别尔对我说，让苏联记者写波兰农民的观感，感到很不好意思。他们不许《苏联专讯》编辑西维亚克刊登这些报道。根据他们的批示，工人通讯社在内部政治通报上刊登了这

^① 此说并不确切。在 1949 年上半年，波兰已经开始宣传波兰生产集体化的成绩和苏联集体农庄成就的运动。

些报道的摘录，而且删去了所有波兰农民强调集体农庄制度优于个体农民经济的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农业部工作人员、《波兰农民》报编辑部编辑、与代表团一起访问了乌克兰集体农庄的格罗绍娃，一直到现在，关于访问印象和乌克兰集体农庄的成就连一个字也没有给该报纸写过。正如该报编辑奥利哈对我讲的，她简直给编辑部丢人。她作为该报记者去乌克兰访问前，是谈好条件的，即访问归来后她要向编辑部交数篇关于集体农庄的文章。因此，波兰农民从乌克兰回到华沙后，编辑奥利哈本人没有亲自同他们谈话。自代表团归来后，一个多月过去了，而该报特派记者格罗绍娃竟没有给她所代表的报纸写一个字，也没有在其他报纸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任何见解。

二

中央出版部的第二个重大错误在于，害怕资本主义西方，容忍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思想意识进入波兰文学和出版物，不敢坚决反对一部分反党反苏、跟着西方转、卑恭屈膝地崇拜西方文化的波兰知识分子。

2月中旬，代表处收到苏联作者奥利格·莫申斯基的文章“世界主义者们已被揭露”。我们把这篇文章刊登在2月22日《苏联专讯》上，但没有一家党报转载这篇文章。我曾提请中央出版部副主任助手哈别尔对此予以注意。

哈别尔对此的回答是向我做了一番讲演，谈了波兰知识分子的特点，说在波兰同世界主义斗争会疏远知识分子，世界主义对波兰没有威胁，在波兰只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敌人才需要同世界主义做斗争，这种斗争会带来巨大害处。讲完以后哈别尔宣称，统一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波兰出版物不刊登有关苏联人民反对世界主义的材料是正确的。

要在3月末和4月上旬在波兰报纸上刊登第一批关于世界主义反动实质的文章，还需要做长时间的顽强的工作，来说明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同时应当指出，这类文章目前还很少，它们具有百科知识性质。这些文章应是不以党派面目出现的文章，最好能正确解释“世界主义”一词的本身，但有完全不从根本上触及具体的波兰资产阶级世界主义者，不揭露当地世界主义者给波兰人民带来的巨大害处。

应当指出，中央出版部一直在纵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者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仍在利用波兰报纸和出版物宣传英美科学文化的优越。党的出版社“书籍”不久前出版了鲍列斯拉夫·扎加利专为波兰青年写的书《走马观花看世界》。这本书以有趣的形式夸大英美科学技术成就，甚至用其中的技术力量吓唬青年读者。该书作者确认，航空领域所有重要发现，所有航空记录都属于英国人和美国人。作者写道：

“美国生产了15万架飞机。这差不多是战争前夕波兰汽车的3倍。美国飞机可从美国自由地飞往欧洲再返回而不需着陆。大型美国轰炸机可载10吨炸弹飞往德国”。

作者在描绘美国在汽车运输、通讯、原子能等方面的科技奇迹时，兴高采烈而忘乎所以。他肯定地说，美国人已经拥有的原子能可以毁灭地球。

在这本《走马观花看世界》中，作者无视苏联人民的强大力量及其科技成就。在苏联领土上，他所看到的只是一种神秘的自然力量——能征服苏联大地的严寒，它似乎决定了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德国战争的进程。作者在该书的第85页说：

“德国人相信自己的技术装备优于苏联，在1941年向苏联进攻时忘记了两件事。第一，这里冬天来得比常年早；第二，德军坦克和汽车使用的润滑油在严寒季节要凝冻。因此德军坦克在关键时刻停住了”。

3月中旬我在“书籍”出版社得到这本书。稍加浏览以后，我立即向中央出版部提出问题：党的出版社为青年出版如此有害的书是怎么回事？中央出版部领导人斯塔舍夫斯基和哈别尔编造了一种说法作为回答，好像这本书不是、也不可能是党的（波兰工人党）出版社出版的，好像他们确切地知道这本书是原波兰社会党出版社“知识”出版的。他们同意我的意见，说这本书是有害的，并保证中央将立即采取措施，停止销售该书。

过了几天，这本书确实不出售了。但后来我同“书籍”出版社责任秘书米利斯卡娅谈话时得知，没有收到统一党中央关于停止出售该书的任何指示，而是该书已被抢购完了。同时得知，实际上该书是党的出版社“书籍”出版的，而不是像中央出版部向我保证的那样，是“知识”出版社出版的。

在印刷这本坏书的时候，在波兰党报报社和杂志社积压着苏联作者关于苏联科学的优先地位和社会主义文化伟大成就的文章，直到现在仍未发表。其中有 M. 彼得洛夫的文章“俄罗斯人——航空业的先锋”、Л. 别尔金德的文章“变压器的发明者 И. 乌萨钦”、“俄罗斯院士 Б. 雅各比”和“天才的俄罗斯学者和设计师 П. 亚布洛奇科夫”，还有两篇关于荣誉院士加马列亚的文章。

苏联情报局驻波兰代表处不止一次地向中央出版部提出这些文章被束之高阁的问题。中央出版部工作人员装模作样地表示，这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一定做编辑的工作。而在这些保证之后，他们在报纸编辑会议上从未提出过他们应当不断地宣传先进的苏联科学问题，没有要求任何编辑刊登有关这一题目的被积压的文章。

三

最后，统一党中央出版部（是的，看来，不仅是出版部的）最大的错误，是害怕波兰居民中一些阶层的民族主义的反苏偏见，错

误地耽心有人指责他们，说他们（党及其出版物）是苏联的代理人，害怕对苏联及苏联政策的宣传过了头。

英美大使馆及其宣传中心丧失了波兰出版物公开刊登反苏文章的条件以后，现正在千方百计阻止在波兰报刊刊登苏联情报局的文章。近来波兰各编辑部经常收到英美宣传中心授意写的匿名信，信中表示反对报纸编辑部刊登苏联作者写的文章。在这些信中通常都把编辑称为莫斯科的代理人等等。

中央出版部不但不揭露英美敌人的这种欺骗手段，反而把这些信视为群众的真实意见，作为应当在此基础上研究群众情绪的材料，当成群众情绪独特的晴雨表。

出版部工作人员斯塔舍夫斯基和哈别尔已经数次向我引证这些信，指出中央不能不考虑这一点，因此如果有的报纸刊登苏联作者的文章少了，应该予以谅解。此外，出版部有时专门派收到此种信的编辑到我们这里来，让他们以这些信件作为自己不愿刊登我们文章的借口。比如《问题》杂志的编辑古尔维茨就是这样。他来向我们退还有关加马列亚院士的稿件，同时根据哈别尔的指示带来一封匿名信。

也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有的编辑开始或多或少地在自己的报纸上介绍苏联的生活及我党和政府的政策，但受到中央出版部的制止。

比如1月份，出版部专门从克拉科夫召来《泽尼克》报的编辑、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明科夫斯基，指责他定期刊登苏联作者的文章做得太过分了。

当得知我们代表处和工人通讯社共同出版的《苏联专讯》，被党的报刊，特别是各省的刊物大量引用时，出版部开始进行悄悄的遏制专讯的工作。根据出版部的指示，专讯的责任编辑奇维亚克被加上许多其他工作，以致他没有时间完成专讯的主要工作。让他兼

任工人通讯社国外部主任。即使这样，看到他还给专讯做一些工作，于是又给他增加负担，让他临时兼任《神圣波兰》周刊的责任编辑。

与此同时，出版部给报纸编辑部发来电报，必须刊登来自工人通讯社内部政治通报上的各种材料，却完全没有给他们发来强调来自《苏联专讯》的文章的必要性的电报。而且编辑们已事先得到通知：如果《苏联专讯》上有什么必须刊登的文章，出版部会预先提示。这样一来，报纸编辑处境相当困难：他们从华沙收到许多必须刊登的文章，以致有时他们甚至不知道在哪里刊登本报工人通讯员的来信，至于刊登《苏联专讯》上“不是必须刊登的”文章就更难了。

中央出版部用这些措施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框住了党的出版物，压缩了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篇幅，以下数据可以直观地说明在党的出版物上这一调整措施的结果：

像没有受到中央出版部调整的《读者》日报（无党派出版物）上，当时刊登苏联情报局作者的文章一个月比一个月多（1月份刊登他们的文章65篇，2月份91篇，3月份93篇），而同期在统一党的日报上苏联情报局作者的文章数却不断减少。1月份这些报纸登载了我国作者的文章181篇，2月份139篇，3月份仅111篇。

各党报利用我们在《苏联专讯》上的材料也能说明问题。直接用在无论哪种报纸上的专讯已发表的苏联作者的文章，1月份仅有8篇（占发表在专讯上文章总数的7.9%），2月份31篇（占26.7%），3月份40篇（占36.0%）

随着中央出版部对报刊影响的增长，苏联作者刊登在党报上文章的这种普遍减少，说明这种影响导向的是什么方向。

当我们看到党的出版物的作用及其份数迅速增长时，我们感到

高兴。但在2月份就已经很清楚，这种作用并非发挥在宣传苏联的成就及其政策上，而在党的报刊上，有一种不健康的、压缩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规模的倾向。

为了克服我们工作中的这些新困难，我们代表处在3月份和4月的上半月采取了以下措施。

我们加强了同党报党刊编辑部的联系，组织编辑们看苏联电影，以便借此同他们保持经常性接触，向必要的方向引导他们。我们加强了对采用苏联情报局文章情况的监督，常常到编辑部查询，为什么一些文章被束之高阁，不给刊登。为了加强同省报编辑和省党委会领导的联系，我和我的副手波波夫常常出差，并在省党报编辑来华沙开会时和他们一起组稿。

另一方面，我们代表处工作人员常去访问出版部和中央委员会其他工作人员，使他们积极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认识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立场。我们力争让斯塔舍夫斯基和哈别尔回答：问题何在，为什么党的出版物一味自信，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如此重要的问题放弃了职责。

但是，中央出版部至今不想找出党的出版物落后的真正原因，据我所知，也不想改正错误。该部工作人员斯塔舍夫斯基和哈别尔同我和波波夫同志见面时，总是用寒暄、许诺和杜撰的各种原因敷衍塞责，说什么党报没有篇幅刊登苏联作者的文章，说这些文章太深奥，落后的波兰读者读不懂等等。

问题当然不仅在出版部，尽管我在这个报告中，由于您所知道的原因只写了这个部。这个部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当前极为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中的机会主义动摇性。这些错误证明，在党镇压了一小撮右倾投降主义分子以后，在为统一工人运动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之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倾向依然十分严重。这些错误说明，在已形成的国际形势下，在农村日益

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在党内和其领导人中，机会主义的动摇性在加强。

为了让您了解这一情况，我写了这份报告。

苏联情报局驻波兰代表 弗·伊·索科洛夫斯基

1949年4月21日于华沙

№01817

《真理报》驻波兰记者马卡连科关于同
扎姆勃罗夫斯基就波兰统一工人党
农村政策的谈话报告

（1949年5月26日）

摘自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扎姆勃罗夫斯基的谈话

根据我的记录，我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扎姆勃罗夫斯基的谈话整理如下。

看来，您已注意我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中引用了您在中央4月全会上的报告中的一些数据，我说，并把“第一批垅沟”那篇通讯报道给扎姆勃罗夫斯基看。

“我想请您解释一下报告中我不明白的一点”。

扎姆勃罗夫斯基：“哪一点？”

“您建议农民将来吸收一部分‘自我消亡的’富农参加生产合作社，条件是：他们要把自己土地的一半交给合作社，并且能奉公守法，是这样吗？”（注释。我指的是扎姆勃罗夫斯基报告中的一段，他在报告中以农民的名义对富农说：“现在我们不吸收你加入合作社，因为我们不需要剥削者。但如果你不想当剥削者，如果这种阶级地位真的使你感到是一种沉重负担，那么你把现有的30公顷土地中的15公顷交给我们使用，你继续作个体农民。我们对你观察两三年，然后可能吸收你加入合作社”。）

扎姆勃罗夫斯基：“您没理解我。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

我们有事实，一些富农开始消亡了。这是由于国家对富农实行一些限制，还由于一些精神方面的原因”（扎姆勃罗夫斯基指的是富农上学的孩子和周围农民对富农的影响等）。

扎姆勃罗夫斯基解释说：“我们不能用自我消亡的办法消灭富农，这很危险，也是有害的。

第二，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分化富农，使一部分富农走上劳动发展道路，然后拉他参加生产合作社。我指的是乡村社会舆论认为是好人的那些富农?!”

接着，扎姆勃罗夫斯基论证了为什么波兰走这样的道路。

他说：“我们不能走苏联走过的消灭富农的道路。我们的国家虽然也很大，但我们没有可以把富农隔绝开来的地方。此外，应当注意，我们是在另外的条件下发展的，而且旁边有苏联这样强大的邻邦。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某一部分富农的问题。”

他又解释说：“当然，我们说的不是所有的富农都通过生产合作社自我消亡，而提的是‘好’富农”

我抓住最后一句话，请扎姆勃罗夫斯基看一下我最近到波兹南省出差时收到的一封关于富农凶恶地对待雇工的信。

在这封信中说（全文引了，未作修改）：

“奥斯威辛就在奥博尼基县的巴尔科沃。被占领期间在集中营度过艰苦年代的波兰劳动人民的创伤尚未愈合，新的罪行、新的侮辱在民主波兰已降临在波兰人斯塔尼斯拉夫·奥斯曼斯基头上。希特勒式的犯罪分子莫尔基克·沃伊捷克自1939年5月雇用公民斯塔尼斯拉夫·奥斯曼斯基为雇工。在被占领期间奥斯曼斯基每月收到5马克的工资和只有粗面包加黑苦咖啡的简单食物。1945年莫尔基克没有与奥斯曼斯基订保险契约。从1945年起，奥斯曼斯基同牲畜一起住在马厩里，睡在稻草上，盖着麻袋，结果得了病。从1948年，奥斯曼斯基丧失了劳动能力，躺在粪便中没人管。粘满

腐烂稻草和马粪的、重病的奥斯曼斯基不久前才被送进医院。病人的样子令人想起被送往奥斯威辛火葬场的人。这就是希特勒式的犯罪分子莫尔基克把人折磨的程度。奥博尼基县政论记者、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穆谢里亚克。”

读完信以后，扎姆勃罗夫斯基说：“这是极个别的事！”

我说：“我认为这样的富农不能允许他参加生产合作社。”

扎姆勃罗夫斯基对此回答道：

“我指的是其他人。”扎姆勃罗夫斯基就这样向我阐明了他的立场。谈话表明，扎姆勃罗夫斯基不仅发展了“富农自我消亡”的口号，而且为这一口号奠定了理论基础。

《真理报》驻波兰记者 马卡连科

1949年5月26日

№01818

纳塔松就波兰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情况 给波诺马廖夫的报告

(1949年6月10日)

我出访的报告

除了我所作的口头报告外，我想根据我的观察和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同志们的谈话，特别强调几点最重要的结论。

1. 与工人政党统一代表大会期间（1948年12月）相比，令人注目的是生活各方面的巨大进步（生产增长，华沙的建设速度加快，肉类、食油供应增加等），这表现在劳动人民供应的改善，工资改革取得良好结果，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提高了。无疑，这一切都使广大居民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对人民政府实施的政策更加信任。

当然，在工资体制中还存一些这次改革未能消除的不正常现象。改革未能充分照顾熟练技术工人的利益。依然保留着从战前时期沿袭下来的工人和职员工资之间的剪刀差，因此往往技术不熟练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所得工资比工人多。将来党和政府将逐步消除这种不正常现象，而且要像苏联那样特别照顾从事重体力和熟练技术劳动的工人。

2. 今年五一节庆祝活动，是广大群众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信任增长和对人民政府政策支持的最明显的标志。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

委员会书记扎姆勃罗夫斯基同志，在今年5月初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今年波兰的五一游行给予了很高评价。波兰的五一游行有以下特点：

1) 群众性。参加今年五一游行的有950多万人（去年600万人），这对2400万人口的波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五一游行，以及迎接五一的准备工作和工人的群众性劳动竞赛，显示了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巨大力量。

2) 五一游行是波兰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的标志。这表现在有300多万农民参加了五一游行（去年110万人）。其中80万农民来到各城市，参加了工农联合游行，而且与往年不同，农民举的主要是红旗，而不是绿旗。农民党和劳动党也参加了动员农民参加五一游行的工作。

波兰农民如此大规模地参加五一游行，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动员劳动农民反对富农剥削、争取对波兰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完全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证明。5月1日，也显示了工人支援农民、工业帮助农业的成果。

3) 五一游行显示了党在妇女和青年中的影响有了巨大增长。有180多万青年、230多万妇女参加了游行。

4) 游行比去年政治性鲜明、活跃。强调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首先是同苏联的友谊、对斯大林同志的热爱、联共（布）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与去年相比，游行队伍的外形也有所不同。比如有150多万人参加的西里西亚省的游行队伍中，有27000面旗子（去年7000面），几百幅反对英美战争贩子的漫画。

在所有的讲话中都突出了劳动人民的中心任务——为在波兰建设社会主义基础而奋斗，反对战争贩子，争取持久和平。

5) 五一游行队伍中很好的一点是，各地游行队伍里都有军人仪仗队，这说明“五一”不仅是人民的，也是国家的节日。

6) 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是，神职人员在五一节日里以宗教游行为幌子来破坏游行的企图彻底破灭了，这说明党和劳动人民的力量。

众所周知，波兰天主教人员已公开反对人民政府（24名牧师的传单），号召教徒在5月1日参加游行祈祷和宗教游行。来自波兰的资料证明，波兰反动派宗教头目的这种梦想彻底破灭了，除了少数例外，宗教游行差不多没有举行，五一游行期间去教堂的人比任何星期天都少，特别是城市里。

应当强调出，五一游行的进程和有军队参加的群众性游行，在反动分子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华沙。有人告知我已被华沙成千上万劳动人民参加五一游行的声势压倒的有反动情绪的人，流露着孤立和虚弱的表情，看着游行队伍和军人仪仗队。所有的人都承认，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华沙从未见过军容如此威严、装备如此精良的军队，这都是苏联帮助的结果。

扎姆勃罗夫斯基同志评价五一游行时强调，五一游行显示了两个工人政党统一的政治果实，肯定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政策的正确性及其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效果。

同时扎姆勃罗夫斯基同志也指出了五一游行的一些缺点：

1) 几个月前工人政党合并成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件事本身及其意义，在游行中不够突出。

2) 口号和标语在强调与以前波兰通行的民族文化节日的联系不够，如斯沃伐茨基节、肖邦节^①。

3) 基层党组织（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治和组织积极性，在

^① 尤里什·斯沃伐茨基，19世纪上半叶波兰著名诗人和剧作家，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他的作品大多从激进的立场阐释民族解放问题。弗里德里克·肖邦，享誉世界的波兰作曲家和钢琴家，他的作品富于人民性和爱国主义激情，是欧洲音乐史上民族学派的开创者。

游行以前和游行期间都发挥得不够，所以有些游行队伍表现不好，乱糟糟的。

4) 有的游行队伍拖的时间太长，从早晨直到傍晚，所以参加游行的人感到很疲倦。扎姆勃罗夫斯基同志及其他领导人认为，组织五一集会太费时间，因此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打算在明年不组织五一集会，只组织五一游行。

扎姆勃罗夫斯基同志指出，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五一运动成果，并把五一运动期间的劳动竞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3. 现在，天主教神职人员，特别是高级神职人员是波兰反动派的中心，波兰反动派各派别和所有地下恐怖组织都聚集在他们周围并与他们进行合作。

众所周知，今年初，波兰天主教会领导通过赫罗曼斯基主教向政府提出调整教会和国家的关系的建议。沃尔斯基部长代表政府在声明中所作的答复大家也都知道，他重申，在波兰天主教会在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方面享有完全自由，例如它们享受的优惠，就比在资本主义的法国还多，同时他要求天主教会要遵守人民波兰及其政府的起码的法规。

大家也知道，以首席主教维辛斯基为首的天主教会的头目们用24名主教的一封信回答了政府的声明，这封信实质上是对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的挑衅。这封信包含的意思是：

1) 天主教与波兰一样古老，根据古老的箴言“上帝和祖国”，波兰爱国主义和天主教密切联系在一起。

2) 对关于梵蒂冈和高级神职人员曾执行亲希特勒的政策和亲帝国主义的政策、反对波兰利益特别是西部边界利益等指责一概拒不接受。

3) 政府想捍卫波兰民主和人民国家利益免受神职人员的反动侵蚀的立场，被视为干涉天主教会的内部事务。

4) 主教们号召教徒在五一节举行实际上具有反国家性质的宗教游行。

天主教会的头目们并未到此止步。红衣主教维辛斯基还给在英国的反动波兰侨民写信，号召他们“高举侨民旗帜”，即继续反对人民波兰。5月份，我在波兰时，红衣主教维辛斯基以检查教区工作为由，走遍了波兹南省，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在各个城市和乡村的天主教堂布道，以或多或少隐蔽的形式进行反对人民国家、人民政府，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煽动宣传，赞扬西方的“民主”，等等。

天主教神职人员这种破坏活动同恐怖组织的反革命活动密切交织在一起。据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掌握的有关恐怖组织在波兰农村进行活动的资料，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5月15日，袭击农村合作社673次，袭击乡政府34次，其中打死3人，袭击民主农民活动家59次，死60人，恐怖纵火91次。

有大量证据证明，恐怖组织的活动和反动神职人员反国家活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的、税收的、经济的措施，反对反动神职人员的活动。

天主教会在波兰拥有自成系统的学校、幼儿园、“慈善”机构，以及医院、诊所等等，平均占波兰这类机构总数的5%，在收回的西部地区甚至占20%。所有这些机构和组织都被天主教会作为对群众进行政治欺骗，强拉他们到反人民的政策轨道上来的工具，有时还为地下恐怖组织的活动做掩护。

此外，波兰的神职人员到现在一直不纳税，教会的土地不参加土地改革。

有鉴于此，党和政府决定逐步取消教会对上述机构和单位的管理，把它们交给国家和民主的社会组织。

在这方面已经实行了初步措施。比如，最近几天在华沙近郊的涅波卡梁努夫镇查获了一个大的印刷所，它是波兰天主教反动派的据点之一。早在战前在涅波卡梁努夫就印刷像希特勒分子的“小泽尼克”这样的法西斯报纸和传单，还印刷了成千上万份宗教读物，进行非常反动的宣传。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政权代表来到涅波卡梁努夫查封印刷所时，在那里当印刷工人的教徒竟脱下长袍，要求允许他们在国营印刷厂工作。

神职人员要缴纳有关的赋税。此外，正准备在天主教会领地进行土地改革的方案。

当然，党和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以遏制反动神职人员干扰五一节的任何企图。如上所述，神职人员的五一梦想破灭了，宗教游行几乎在各地都没有举行。当然，一个较大的例外发生在琴斯托霍瓦，在著名的亚斯诺戈尔斯克寺院的恰伊卡主教在几千名教徒面前布道，力图激起反动的宗教狂热，高喊：“他们想玷污圣母，有我们在他们就休想”等等。然后，他亲自领导游行，散发反动传单。

但是大多数劳动人民，大多数教徒不支持神职人员滥用宗教信仰，达到反人民的政治目的。5月1日早晨，他们没有去教堂，而去参加五一游行。

也有下级神职人员不服从上级的情况。比如在一些地方，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教士拒绝在讲台上宣读24名主教的信，或者在宣读时不读反动的段落。所以主教团不得不派监督员去检查教士如何宣读24名主教的信。

在弗罗茨瓦夫省沃洛夫县有6名教士，卢布林县鲁德诺乡有1名教士参加了五一游行，在西里西亚省科兹梁县帕夫洛维奇基村，当地1名教士在天主教堂挂上了红旗，甚至挂上了“五一万岁！”

的标语，他想在群众集会上发言，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没有同意。

一些教士参加五一游行的情况在波兹南省、卢布林省、罗兹省、华沙省、波莫瑞省、热绍夫省的乡村和城镇都有。

当然，这些情况不是神职人员的共同行为，但它说明了人民运动的威力，在这种威力面前一些出身平民的教士后退了。

同神职人员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的问题，是我在上面已经提到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组织部会议上讨论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西伦凯维兹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西伦凯维兹根据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的方针对波兰神职人员的政策和策略做了全面分析，特别分析了24名主教的信。他强调指出，与宗教进行斗争不是现阶段党的目标，因为克服宗教迷信问题与消灭阶级和建立无阶级社会问题密不可分。党在现阶段的目标是动员各阶层广大人民反对波兰天主教会反民族、反人民的政策，使信教的劳动人民脱离反动的神职人员。

西伦凯维兹同志强调，在这一斗争中应当揭露：1) 执行梵蒂冈命令的波兰神职人员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旨在破坏波兰安全，破坏波兰领土完整、特别是收回地区完整，破坏波兰人民政治经济独立的计划，这是给波兰人民带来可怕灾难的战争贩子的政策，是民族背叛的世界主义政策。2) 同时应当一贯地、具体地揭露神职人员反人民的、亲资本主义的和亲富农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反对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破坏人民民主制度，恢复地主资本家的统治。

西伦凯维兹同志强调，一些同志想用行政镇压手段同神职人员作斗争，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这里主要是进行政治斗争，是提高信教的劳动人民的觉悟的斗争，是揭露教会的反动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教会的斗争。

报告人也注意到，需要在宗教节日、祈祷的时候组织游艺、体育比赛、放映有意义的电影，来直接影响人们，特别是青年，把青年的注意力引向另一方向，健康的方向。

西伦凯维兹同志还说，需要让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与之进行斗争的敌人，就是说要熟悉天主教的组织和礼仪。报告人还说，要利用敌人阵营中的裂痕，支持有民主思想的教士，使他们反抗天主教会里的反动头目。

在西伦凯维兹同志报告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言的同志有奥哈布、马图舍夫斯基、德沃拉科夫斯基、勃里斯季格尔、捷皮特、拉波特等。^①

在讨论中强调，不是要进行反对宗教的斗争，而是反对神职人员的反动政策的斗争。同时，同志们认为，要比现在更广泛地普及，特别是在青年中普及科学的世界观，使青年了解新的生物学和地质学成就，这样来消除伪造的、反科学的宗教宇宙观。

在讨论中还强调，如果党和政府要提出什么教会“民主化”的口号那就错了。现在谈的是反对神职人员的反动政策，全面揭露这种反动政策。在这一斗争中要鼓励神职人员中的民主分子。贝尔曼同志在党报编辑和其他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也提到了同天主教会作斗争的问题。贝尔曼同志也指出了一些同志具有的危險倾向，即用行政措施进行反对神职人员的政治斗争。

他还提到在斗争中，特别是在青年中，有一些不正常现象，表现为毁坏神像，党把它作为客观上的一种敌对的和奸细破坏行为，可以轻易地被阶级敌人所利用。贝尔曼同志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同反

^① 德沃拉科夫斯基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奥哈布、马图舍夫斯基、捷皮特、拉波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勃里斯季格尔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社会安全部第五局局长。

动神职人员作斗争的不同办法。在琴斯托霍瓦市主教的住宅里有几间属于不住在该市的教士的空房间。由于战争而失去住处的劳动人民占用了这些房间，党组织正确地支持了这一创举，这一举动在像琴斯托霍瓦市这样教权主义严重地方也得到了广大阶层的同情。

但我们的同志并未到此为止，而是让住在住宅里另一部分教士搬走，安排无房住的人居住。贝尔曼同志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在居民中不可能得到也没有得到同情。

党的宣传包括《新路》在内，还应广泛批判18、19、20世纪天主教会头目背叛民族历史的情况，并与一些进步的神职人员，如斯塔申茨、科纳尔斯基、科伦达雅、雅各宾派教士叶泽尔斯基、梅叶尔、农民革命者斯采根内教士等民主爱国活动相对照。

据我所知，5月末，天主教会首领认识到公开反对政府的斗争已经彻底失败，决定重新采取谈判手段，派上面提到的赫罗曼斯基主教向政府请求恢复与天主教会的谈判。

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的详情我们尚不知道。

4.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根据贝鲁特同志在最近的中央全会上作的关于党在争取和平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党组织在这一领域任务的决议。

组织部强调，这一斗争不能以运动的方式进行，要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组织工作中天天进行。

组织部指出，需要对巴黎和布拉格和平大会^①进行广泛的总结，广泛普及大会的宣言和决议，召开群众大会，用报刊、电台和俱乐部进行广泛宣传。总结已在5月份进行。

组织部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更深入细致地使大众知道，同苏联

^① 1949年4月20~26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同时在巴黎和布拉格举行，4月26日，大会发表了保卫和平宣言。

牢不可破的联盟和友谊，是波兰和平、安全与进步发展的基本保证。

组织部强调，要关心并在组织上加强波苏友好协会，增加新会员，全面活跃友协的活动。大量出版苏联文学译著，深入宣传苏联经济、国防力量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成就，更大胆在波兰剧院中上演优秀的苏联戏剧节目，加强波苏文化交流，交流经验，经常派青年、演员、科学工作者去苏联学习，等等。

因此，我想特别强调对苏联演员、音乐家的演奏，学者、作家的报告的极大兴趣。我在华沙交谈过的所有人，当说到近几个月奥勃拉兹佐夫剧院和莫斯科戏曲剧院的演出，都肯定了其巨大的良好印象。苏联演员的演出不仅受到劳动人民的热情欢迎，而且使保守的波兰知识分子转变了看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伊利亚·爱伦堡^① 5月7日和8日路经华沙去拉金基公园时，正在那里举行读书周人民游园的人立即认出了他，并自发地向作家鼓掌欢呼，然后排起长队等候作家的亲笔签名，为此他用了很长时间。

我到处都听到让苏联演员和苏联文艺代表经常或定期去波兰访问的请求。如果能让列宁共青团剧院、小剧院演出队去波兰演出，会有很大意义，就更不用说莫斯科艺术剧院了。

我发现（在波兰读书周期间），波兰各阶层居民对苏联书籍很感兴趣。我看到这些书一到，波兰学者和大学生、或是中学生、或是工人、或是职员就挑选和购买。因此，克服影响将苏联书籍大量、迅速地译成波兰文的组织工作上的障碍，具有重要意义。“书籍知识”出版社社长同我谈话时提到这一点，我在专门报告中也谈到这个问题。

^① 伊·格·爱伦堡，苏联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50年代中期发表的小说《解冻》，开始了苏联所谓“解冻文学”时期。

中央组织部在决议中强调，要加强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吸引他们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需要发展劳动竞赛，作为经济强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需要加强保护工业，同破坏、怠工及特务活动作斗争，保守国家和生产秘密，等等。

中央组织部强调，要更有力地揭露英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世界主义。

应当指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和我所接触过的党的积极分子，对同世界主义作斗争的态度是正确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在每天的宣传鼓动中，都揭露国内反动的世界主义分子，米科拉伊奇克集团、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头目，他们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词句作掩护，实际上起着英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作用，支持帝国主义的政策，反对波兰独立和波兰及其西部边界的安全。

中央组织部要求党的出版物，特别是党的理论刊物《新路》，要深入研究同世界主义斗争的问题，全面正确地评价波兰民主文化已有的成就，并与向资本主义的西方卑躬屈膝进行系统的斗争等等。

组织部指出，要更多地发表苏联揭露世界主义的材料，勇敢地、不断地与世界主义在波兰文学、科学、戏剧、电影和出版物（特别是教会出版物）中的表现进行斗争，更多的宣传波兰历史和文化的进步传统及其与俄罗斯过去的革命运动和进步文学的联系。

《新路》杂志最近一期将刊登几篇反世界主义的文章并评介苏联报刊揭露世界主义的材料。

5.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就近期党组织在宣传鼓动、党课学习以及改善组织工作作风方面的任务作了专门决议。

组织部指出，系统的个人宣传鼓动应成为全党、整个党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积极分子每天的事情。

组织部通过了建立鼓动员小组的决议，鼓动员要在工作岗位上同工人进行谈话，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

组织部委托党委领导和指导鼓动员小组。组织部还通过了在各省、县、市、工厂、大企业党委会建立常设宣传报告员小组的决定。

组织部决议十分重视加强和扩大党课制度。通过了扩大市党课训练班网的决议。现在党训班有 1300 个，听课人数为 8 万人，包括各大企业机关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

党课学习应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党员和预备党员短期训练班；第二阶段是党员积极分子的政策夜校。还决定扩大为农村党员积极分子开办的“星期日讲座”。这种训练班现在已在 750 个乡开办，到秋天准备在所有乡党组织中开办。

在 1949 年内要在最重要的省、市中心建立 20 个党课学习中心（相当于联共（布）的研究班），有图书馆、阅览室，进行系统的答疑和讲演。

组织部的决议还强调，党员积极分子，特别是骨干党员积极分子的责任，是学会独立地自己学习。

扩大党课学习体系，特别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力图把它发展成涵盖中层和基层的网，就日益迫切地提出一个问题，即用联共（布）党课学习班的有关书籍支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中中央党课学习部。

关于这个问题，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党课学习部主任科兹洛夫斯卡娅同志已多次向我提过。除了我从捷尔任斯基同志那里得到的、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党校学习部的极为珍贵和实用的“政治夜校学员辅导”材料外，非常希望再得到其他适用于这一目的材料。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在决议中也提出了几项改善

组织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措施，而且强调要加强工作计划，组织情况检查，采用个人负责制下的集体工作方法，增强县党委会的独立作用，改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帮助大工业企业党的组织，派中央和省的党的积极分子去支援它们。

组织部决议还包括加强同无党派人士联系问题，自今年5月15日开始更换党证问题，以及接受新党员入党问题。

组织部采取措施防范在可能导致党和非党性质界限不清的地方过分扩大党组织，并建议首先在党组织软弱的地方吸收优秀工人、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入党。

6.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大量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方面作了很大努力。

维尔费利同志^①曾告诉我，“书籍与知识”出版社在1949年以前就出版了250万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今年4个多月中又出版了150万本，总共400万本。到1949年底还应出版200万本，总计600万本。

除了100万册斯大林同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还大量出版了斯大林同志的《列宁主义问题》以及列宁和斯大林的其他著作，还有由12种马克思主义著作组成的丛书。

所有的同志都说，书卖得特别快，因此差不多没有储备书。

我曾多次同贝尔曼同志、扎姆勃罗夫斯基同志、中央机关刊物《人民论坛》报主编卡斯曼同志、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工作人员，就波兰统一工人党出版物问题谈过话。我还在中央记者学校就布尔什维克出版工作的性质和方法作过报告。

最近，波兰统一工人党出版物，首先是《人民论坛》报无论是

^① 罗曼·维尔费利，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书籍与知识”出版社社长。

在内容上、政治尖锐性上、介绍苏联生活和成就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比以前好了。但波兰统一工人党出版物仍存在一些严重缺点。

1) 虽然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报纸，特别是《人民论坛》报刊登了宣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文章，但这些报纸不像布尔什维克的报刊那样系统地不断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人民论坛》报还没有系统地刊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在波兰条件下具体应用的文章。

扎姆勃罗夫斯基和其他同志采纳了我的建议：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协助下，写了一批上述内容的文章，在党中央机关印好，发到各地供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市机关刊物刊登。这批文章应回答以下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什么？谁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什么？苏联是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等等。

2) 波兰统一工人党报纸还不是纯粹的党报，它最多是左翼革命工人的报纸，但还不是马克思-列宁党的机关报。

这表现在这些报纸还没有系统地介绍党的生活（大多数党报连党的生活栏也没有）。

党组织和党的领导还没有通过报纸同党员群众对话，领导他们的工作。

另一方面，报纸还不能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即不仅能以政治观点和党的利益观点阐明政治经济问题，而且能阐明科学、艺术、文化、体育问题。

因此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也可以议论这些问题，特别是文化问题，其中包括与党性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书刊评论。

同志们，包括扎姆勃罗夫斯基承认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也承认，无论中央的报纸，还是各省出版的报纸都应该在比至今为止更

大程度上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并在无论是中央还是各省感觉到这种领导。

3)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出版物，包括“人民论坛”报，还不完全是工人阶级劳动竞赛的组织者。报纸往往仅限于刊登某一位先进劳动者关于在某一方面开展竞赛的号召，而以后报纸自己就忘了这件事，没有靠报纸的帮助去吸引其他工人、其他企业、其他工业中心来参加竞赛，使报纸成为社会主义竞赛真正的组织者。

4) 虽然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报刊近来越来越好地介绍了苏联生活，但在这方面党报的工作应当加强，要更系统地介绍苏联人民的生活和成就，特别是在报纸的“苏联生活”栏里。

关于苏联情报局的材料在这方面能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我已写过专题报告。

* * *

波兰统一工人党现在注意加强思想意识战线的工作，贝尔曼同志在我上面提到的中央报纸编辑和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曾谈到这一点。贝尔曼同志强调指出，仅仅在报纸杂志上转载代表大会和全会的决议还不够，要创造性地——避免自作主张——发展这些决议并使之具体化，用实际中的新鲜材料丰富党的思想工作，总结党的实际工作。

贝尔曼同志号召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地方工作人员，要多给中央委员会写报告、提问题和建议，不要怕提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首倡性意见，这样才能给党的领导、政治局提供概括和总结的材料，要积极参加发展党的理论的工作。

我个人认为（关于这一点我同扎姆勃罗夫斯基、费德列尔^①等同志谈过），党的出版物，特别是党的理论刊物《新路》没有把彻底批判包含在哥穆尔卡过去的文章和讲话（包括在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1947年中央四月全会，在统一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里的伪民族主义理论工作进行到底。

在开展波兰统一工人党理论工作方面的一个严重障碍，是思想意识工作干部的分散。这是因为，一些有能力的宣传干部在行政单位、国家机关及其他岗位工作，还因为，思想意识工作干部很少集会在一起，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领导下讨论思想战线的问题。现在同志们认为，应定期召集思想意识工作和宣传工作积极分子，在党中央领导下讨论研究思想意识问题。

贝尔曼同志曾告知我，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已把芬克尔施坦因同志召回国内^②，委托他领导中央一个特别部负责提高党中央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

7. 两党合并过程已基本顺利结束。据我个人观察，除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组织部和书记处成员外，我没有看出两党合并后中央委员会机关重要的人事变动。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的基本还是合并前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的那些同志。

正如人们对我说的那样，哥穆尔卡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在最近的中央全会上他总是保持沉默。以前属于他那派的宾科夫斯基现在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反对哥穆尔卡的克利什科现任司法部副部长。

当然，还存在来自加入统一党的波兰社会党右翼分子的潜在危

① 弗兰茨晓克·费德列尔，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新路》杂志主编。

② 当时芬克尔施坦因在布加勒斯特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驻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代表。从1949年6月回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宣传部工作。

险，他们想利用哥穆尔卡的威望及他本人来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波兰开始开展反世界主义斗争时，克拉科夫省党委原第二书记、后任克拉科夫党报副编辑（原波兰社会党“自由、平等、独立”派分子）说，既然反对世界主义，那么赞成爱国主义的哥穆尔卡就没有错啦。这里显然是混淆了哥穆尔卡的民族主义和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的爱国主义，完全不明白只有在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上才能同世界主义进行斗争。

另一方面，这种现象说明，必须把对哥穆尔卡集团的批判进行到底，在党的刊物上，特别是在《新路》杂志上，更广泛地宣传反对世界主义斗争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爱国主义问题、国际主义问题。

8.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部向我谈到莫斯科历史委员会^①的工作。同志们赞扬了历史委员会的工作。他们强调说，波兰共产党、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主义党、第一“无产者”党的史料对他们具有重大意义。他们请求大量收集这些史料并寄给他们，而且请求委员会积极帮助整理史料并进行科学总结。

纳塔松^②

1949年6月10日

^① 指在莫斯科成立的为波兰工人党及以后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部收集材料的委员会。

^② 萨洛蒙·纳塔松，又名尤素福·科瓦尔斯基，当时任波兰通讯社莫斯科分社副社长，联共（布）党员。

№01819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关于 农民党党内斗争情况的报告

（不晚于 1949 年 6 月 25 日）

秘密

关于波兰农民党（农民党）领导的情况

根据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八月全会决议，对波兰民主联盟的其他党，其中包括农民党必须进行改造。

1948 年 8 月 17～18 日在华沙召开了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肯定了农村农民中发生阶级分化和农村中的富农、投机商人剥削下层农民的事实，并决定加快农村的合作化，清除私营商人，增加农村恢复和发展贷款，特别重要的是，承认了农村生产合作是必要的。

1948 年 10 月 2～3 日召开了农民党最高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一致通过决议，建议：

对越来越和国际国内反动派、天主教和法西斯地下活动者勾结在一起的阶级敌人、富农、资本家和投机商人，要提高警惕。

广泛开展改善工作的运动，巩固农村各种合作社，其中包括生产合作社的威信，尽可能吸收更多的人参加生产合作社。

关于这个问题决议写道：“……发展波兰农村惟一正确的道路，

是集体农业生产的道路……。”

在农村开展劳动竞赛。与民主联盟其他党派合作，开展消灭文盲，提高农村教育文化水平的运动。

在这次会议上批准了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关于把普捷克开除出农民党的决议。此前，普捷克是最高委员会主席，邮电部部长。开除他出党的原因，是在波兰工人党八月全会以后，他站在右翼立场，在党内执行敌对的政策，在邮电部内保护阶级异己分子。

一致选举议会议员科瓦尔斯基·弗拉基斯拉夫接替普捷克任农民党最高委员会主席。在被选任此职以前，科瓦尔斯基虽然也是农民党领导人，但在党内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也很少参加党的实际工作。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德列夫诺夫斯基被认为是科瓦尔斯基的代表和其思想的实际执行者。

要完成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会议和最高委员会会议提出的任务，要求领导人行动一致，集体决定重要的政治问题，不搞独裁和遵守党的基本路线。

而在实际上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科瓦尔斯基成为农民党最高委员会主席以后宣称，他将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将同一切右倾倾向作斗争。初期，科瓦尔斯基同右倾作斗争的路线执行得还算正确，以后，他完全委托德列夫诺夫斯基执行这一路线，而德列夫诺夫斯基以执行科瓦尔斯基的指示为借口推行极左的政策，犯了许多冒进的错误。这后来给农民党造成很大损失，为波兰农民党巩固在农村的阵地提供了条件。德列夫诺夫斯基及其支持者在党的基层所犯的冒进错误主要在于：农民党的工作者向农民群众提出了比波兰工人党还左的口号，从而使农民离开了自己；不仅把敌对分子、右倾分子清除出党，而且把老实的农民也清除出党，因为德列夫诺夫斯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作为是否有权留在农民党内的标准，尽管连他自己也不懂得马列主义。当提出按集体经济的实质和优越性在

农村进行工作问题以后，在德列夫诺夫斯基领导下，用威胁的办法组建了形式上的集体农庄，中农被登记成富农，这只能使农民愤愤不平并使他们脱离农民党。

后来，德列夫诺夫斯基因左倾冒进被清除出农民党，而科瓦尔斯基也受到波兰工人党^①中央委员会的批评。

农民党总书记科日茨基·安东尼，自1946年起，就在党内独断专行，利用哥穆尔卡的支持推行右倾政策，并在自己周围拼凑了一批右倾分子支持者。当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②公布后，科日茨基仍然支持哥穆尔卡并宣称，他拒绝推动波兰农村集体化问题的的工作。

科瓦尔斯基走上农民党领导岗位是不合科日茨基心愿的，因为科瓦尔斯基是全体农民都知道的左派活动家，是科日茨基的政治竞争对手。科瓦尔斯基无论威信还是党的工作经验，无疑都胜过科日茨基，使他不能在党内再独断专行了，妨碍他推行右倾路线，并对科日茨基的总书记职位造成威胁。科日茨基在波兰集体化问题上的动摇促进了他的下台。

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科日茨基决定通过亲信隐蔽地反对科瓦尔斯基，败坏他的名声，如果可能，就解除他党的工作职务，这无疑是最合科日茨基心愿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是农民党惟一的领导人了。

科日茨基收集了有关科瓦尔斯基战前反对苏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言论的材料（文章和小册子），并在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领导中散发。这些材料还附有评论，说科瓦尔斯基过去和现在一直是苏

^① 从时间上看，应为波兰统一工人党。

^② 指1948年6月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决议》，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

联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敌人，是萨纳奇的走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红军即将进入波兰并将战胜德国人时候，他为了个人利益才靠近民主阵营。他掩盖了自己的真面目，爬上议员的位子，并故意纵容农民党内的左倾冒进（指德列夫诺夫斯基犯的冒进错误），等等。科日茨基作为这些评论的作者，把它们通报给了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并声称它们来自于下边。

不久，科瓦尔斯基就知道了这一切。他面临的任务是无论如何要把科日茨基清除出农民党。为此科瓦尔斯基动员总执行委员会领导人、首先是主席巴拉诺夫斯基、部长什马诺夫斯基、多姆勃-科采尔、波杰德沃尔内、德鲍夫斯基和格鲁别茨基。^① 反对科日茨基。科瓦尔斯基在科日茨基年轻时就认识他，知道科日茨基的全部底细，于是就用这些材料反对他。

科瓦尔斯基逢人便说，科日茨基不能领导农民运动，因为他天生粗野、卑鄙，对政治一无所知。

为了证实这些话，科瓦尔斯基举了科日茨基生活中确实有的事实。比如他说，科日茨基年轻时偷过科瓦尔斯基的书和钱。在德军占领期间他和臭名昭著的利特文^② 一起把被德国人杀害的犹太人留下的财物占为己有或者卖掉，从而积累了成百万的钱和大量黄金。华沙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后，科日茨基占有了数座以前德国人的庄园，然后分给了自己的亲戚。最后科瓦尔斯基证明，科日茨基在农民党内领导右翼分子，进行敌对活动。

而实际情况是：到1948年底，科瓦尔斯基和科日茨基都衰弱

① 瓦茨拉夫·什马诺夫斯基，波兰物理学家，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委员，1948年任邮电和通讯部部长；扬·多姆勃-科采尔，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委员，农业部部长；鲍列斯拉夫·波杰德沃尔内，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林业部部长；扬·格鲁别茨基，国务委员会监察局局长。

② 据格鲁别茨基揭发，此人拥有大量不动产。

了，而从1949年1月起，便完全停止了在农民党内的实际工作，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搞内讧和争权夺利上。结果，总执行委员会召开的大小会议，无论谈什么，科瓦尔斯基和科日茨基都把争论引向个人关系，所以参加会议的人只好以听他们互相攻击取代接受工作指示，直到散会为止。

总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活动家，以自己的领袖为榜样，趁无人监督之机也停止了日常工作，把注意力转向科瓦尔斯基和科日茨基之间的斗争。当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积极开展组织生产合作社工作时，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家们还没有积极参加这一工作。基层组织瞒着总执行委员会，自己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支部进行接触，因为科瓦尔斯基1月份在农民党省积极分子的一次会议上曾说，农民党不应同工人党保持联系。由于总执行委员会无所事事，农民党基层组织工作受不到监督，所以犯了很多错误，尤其是在清党和发展合作社方面。

这样，农民党领导层中的危机已不可避免。总执行委员会的一些领导人，如尤什凯维奇、伊格纳尔、^①巴拉诺夫斯基，波杰德沃尔内和德鲍夫斯基想努力用自己的力量解决危机，使科瓦尔斯基和科日茨基和解，让他们为事业而工作，但没有成功。党内形势已令人不能容忍，需要外部干涉。

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扎姆勃罗夫斯基对农民党内的情况知道得很详细。他知道农民党内一团糟，1948年10月3日总书记处会议提出的任务，特别是生产合作社问题，在农村没有贯彻执行。但扎姆勃罗夫斯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克服这些缺点（扎姆勃罗夫斯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农民问

^① 阿列克山德尔·尤什凯维奇，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委员；斯特凡·伊格纳尔，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委员，农民互助协会总会会长。

题并监督农民党的工作)。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贝鲁特得知农民党的情况以后(不过不是从扎姆勃罗夫斯基那里知道的)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并着手进行研究。贝鲁特亲自找科瓦尔斯基、尤什凯维奇、波杰德沃尔内、多姆勃-科采尔、什马诺夫斯基、伊格纳尔和格鲁别茨基谈话。

应当指出,科瓦尔斯基事先知道贝鲁特要找农民党领导人谈话,并在他们去见贝鲁特之前力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他们。在这方面他特别劝说过什马诺夫斯基、多姆勃-科采尔和巴拉诺夫斯基。科瓦尔斯基对他们说,他们应向贝鲁特说科日茨基在农民党内做敌对的工作。因此他一天也不能再留在农民党内。科瓦尔斯基还说,贝鲁特已决定撤掉科日茨基,因此他们什么也不需要,只是表示同意决定并向贝鲁特证明,只有科瓦尔斯基是惟一正确的政治活动家,可以委托他领导农民运动(指未来的统一的农民党)。

实际上,贝鲁特想详细了解农民党事件的整个过程,上面提到的人不顾科瓦尔斯基的“指示”,如实地向贝鲁特讲了全部情况。

客观分析了情况以后,贝鲁特建议召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特别会议,会上讨论了科瓦尔斯基和科日茨基的行为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因为他们二人都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

这次会议是在1949年3月7日召开的。除贝鲁特外,出席会议的还有:明茨、扎姆勃罗夫斯基、贝尔曼、西伦凯维兹、斯温特科夫斯基和赫尔霍夫斯基,还有科瓦尔斯基、科日茨基和尤什凯维奇。出席会议的全体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都批评了科瓦尔斯基和科日茨基所犯的错误,指责他们辜负了党的信任,忘记了党委托他们领导农民运动,指引农民群众首先是农民党党员,去实现在波兰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纲领。由于忘记了这一点,科瓦尔斯基和科日茨基热衷于以独裁取代集体协商。农民党内的敌对分子和动摇分子

利用科瓦尔斯基和科日茨基之间的斗争和无人监督的情况，削弱了党的工作。由于造成了农民党内的危机，科瓦尔斯基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和有经验的农民政治活动家，在会上受到了严厉批评。科瓦尔斯基要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下帮助科日茨基改善农民党的工作，来取代同他的斗争。科瓦尔斯基还被指责为投降主义，因为他在1949年2月向贝鲁特提出申请，要求解除他议会议员的职务。贝鲁特批评科瓦尔斯基，说他这样做促使政府走向危机。

科日茨基受到了批评，除了反对科瓦尔斯基外，他在公布情报局决议时表现出了动摇，支持过哥穆尔卡，不想摆脱右翼的立场，没有动员农民群众支持扎姆勃罗夫斯基关于农村集体化的第一次讲话，指望在不改造农村情况下，在波兰建设社会主义。

科瓦尔斯基和科日茨基在发言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科瓦尔斯基说，他混淆了矛盾，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他感谢参加会议的人对他的帮助，使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最后会议通过决议，根据决议科瓦尔斯基和科日茨基要在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做自我批评，然后两人都不再做总执行委员会机关的日常工作，但暂时形式上保留科瓦尔斯基的最高委员会主席和科日茨基的总书记的职位。此事不正式公布，但主席团将被预先告知，科瓦尔斯基以后只监管党的出版物，科日茨基只当副总理。还决定，农民群众不必知道科瓦尔斯基和科日茨基争吵了、不能共事了，因此以后他们还可以发表文章并在全会和党的其他会议上发言，但他们的发言须经书记处检查。

为了领导日常工作，准备和研究各种问题，以及监督执行情况，决定建立农民党书记处，书记处成员有：

科日茨基——形式上的，无权参加工作；

尤什凯维奇——以前任（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副书记；

奥兹加-米哈尔斯基——前波兰青年联盟领导人。

格鲁别茨基——前监察局局长；

克利马舍夫斯基——教育部副部长；

伊格纳尔——农民互助协会（总会）会长。

在3月还召开了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上科瓦尔斯基和科日茨基本应做自我批评，但他们都没有这样做，只是说，他们之间以前有些分歧，现在没有了。在此次会上宣布建立了书记处。

从书记处开始工作（尽管还没有力量）和科瓦尔斯基、科日茨基退出党内实际工作后，农民党在完成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处会议提出的任务方面，显然积极起来了。

科日茨基表面上似乎满意波兰统一工人党书记处的决议，现在无论在党内还是在部长会议他什么都不干。

科瓦尔斯基离群索居在奥特沃茨克，有时来华沙的议会，但不去农民党。初期，由于害怕波兰统一工人党书记处对他作出的警告，根本不过问农民党的事情，而最近，从5月份起又开始散布谣言，说科日茨基继续在党内进行敌对活动，影响农民党书记处。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谈话时，他表示对农民党书记处不信任，说它工作右倾（没有证据），并力图说服大家，包括贝鲁特，把科日茨基一贬到底并重新让他（科瓦尔斯基）领导农民党的日常工作。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顾问 帕斯图霍夫

华沙，1949年6月

№01820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编写的波兰统一工人党 统一代表大会后波兰国内形势的概况

（1949年7月14日）

1949年上半年波兰政治形势概况

1. 为巩固波兰工人阶级的组织而斗争

1948年底，在波兰完成了波兰工人党同波兰社会党合并的过程。这说明，半个多世纪以前工人队伍中机会主义分子给工人运动造成的分裂局面已告结束。这说明，在工人运动中，在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的斗争中，革命倾向胜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了。这说明，我们的波兰朋友使右翼社会主义者遭到了彻底失败。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钻入了战后建立的波兰社会党，想在波兰工人运动中起米科拉伊奇克集团在农民运动中所起的那种作用。

波兰社会党内右倾分子已经感到继续分裂波兰工人运动，使波兰后退到资本主义的企图破灭了，便提出一种观点，说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合并，实际上不是两个平等党的合并，而是取消了波兰社会党。的确，这是取消，但取消的是工人运动中的右倾倾向，同时，这也是对波兰社会党健康成分的友好帮助，使他们靠近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这种帮助使这些人中的优秀人物走上了保卫波兰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道路，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工人政党合并本身不是一种人为的合并，它是战后波兰发展成熟的结果，是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团结发展的结果。因此，统一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和统一代表大会本身，是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队伍情绪绝对高涨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波兰工人阶级真正伟大的节日。

1949年已过去的半年证明，工人阶级以及全国都需要两党的合并。波兰的政治形势更加稳固了。工人阶级在跨入了更高一级的阶级组织，在建立了统一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后，1949年上半年开始着手准备改造自己的工会。

2月末、3月初，在波兰召开了冶金工人工会代表大会，4月召开了医务工作者代表大会，6月召开了公共设施工人代表大会。5月召开了两个全波兰的会议：煤炭工人工会会议和化学工业工人工会会议，会上，就提前完成三年计划和在本部门内节约资金问题进行了讨论。1月和3月召开了全波兰教师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其中一个会议进行了10天。这种在工会中明显增长的积极性，以1949年6月召开的全波兰工会代表会议而告结束。

问题在于，波兰工会由于工人运动的政治分散性仍带有分散性的烙印，实际上已不能适应在新的民主制度条件下已成为国家领导力量的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務。波兰工会具有严重的工联主义痕迹。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下面，在基层组织里，工会组织得不好，甚至有错误。在准备工会代表大会时发现，许多企业的行政组织，按上级工会机关的建议，向全体工人和职员按人头扣缴工会会费，不论他们是不是参加了工会。按照由与会者通过的章程组成的初级工会组织，实际上没有。就是说，在企业里还没有真正的工会工作，没有车间委员会，而工厂委员会也没有密切联系群众，没有关心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日常需要。

在6月初召开的波兰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建立了正确的马

克思主义的工会组织。在这次会议上制订并通过了波兰职业工会章程。这次会议将是波兰工人工会运动史上巨大的里程碑，将从上到下加强波兰的职业工会。这不能不在波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反映，不能不使工人阶级建设波兰社会主义基础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

工会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是在工人阶级积极性高涨的情况下进行的，为迎接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在工人队伍中展开了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竞赛。这一竞赛的成绩表现在工业上节约了十多亿资金。

5月1日，工人阶级举行游行，表示团结在政府和自己的工人政党周围。在波兰的城市里还从未见过情绪如此高涨并热情向领导人致敬的游行队伍。华沙的60万居民中就有30万人参加了游行，这说明许多在华沙工作，但住在城外的劳动人民（距华沙20~30公里）在那一天来参加游行了。

在华沙举行了阅兵式。与波兰以前的阅兵式不同的是：组织严密，服装整齐，纪律严明，武器精良。五一阅兵式甚至也让波兰首都的右翼分子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看到了国家现有武装力量的复兴。

因此，波兰工人阶级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进一步巩固是过去半年的第一个特点。

2. 准备对波兰农民实行集体化

波兰民主政府在1949年上半年为波兰农村集体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由于清党（基本在1948年下半年进行），从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农村组织中开除了将近15000名党员，其中75%是富农。当然，这一措施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农村组织的结构起了好的影响。但党在农村的组织依然不足。比如，1949年3月1日，波兰近4万个村庄中，仅17783个村庄有波兰统一工人党组织。

1359102名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中，农民党员为200973名，农业工人党员58054名，农村组织中共有党员259027名，即占党员总数的19.1%。

在农民互助协会领导机关中也清除了富农及其追随者。据今年4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公布的不完全统计，清除了8233名农民互助协会地方协会会员。此外，在该组织工作的人员中有6111人被免职。在地方政权机关中也进行了清除富农、投机商人及其追随者的工作。

这一措施显著提高了波兰农村贫农和中农的积极性。

1948年末和1949年初的农民互助协会和合作社领导机关的选举，是在“从领导机关清除富农及其追随者”的口号下进行的。选举结果表明：在2.9万个村庄中有14.1万农民被选进村管理委员会，其中：无地者占13%，有2公顷以内土地者占19.6%，有2~5公顷土地者占30%，有5~10公顷土地者占31%，有10~20公顷土地者占7.2%，有20公顷以上土地者占0.7%。

正如扎姆勃罗夫斯基同志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所说的，贫农和中农群众新的积极性的表现形式是社员委员会。附属于它的合作社分社已有1167个，机器拖拉机站已有1856个，各种生产单位已有1243个，收购和牲畜饲养及其他企业已有689个。这些委员会的数目肯定还要增加，但只有贫农、中农和农业工人协会的代表才能参加。对此不应忘记，在4万个波兰村镇中，农民互助协会的乡合作社仅在1.1万个村镇中有自己的分社。

伴随从农民互助协会和合作社清除富农运动而来的，是农民互助协会会员和乡合作社社员人数的增加。在选举期间，自1948年11月1日到1949年3月1日，农民互助协会会员增加了11.3万人，达到122.8万人。

根据党的领导的决定，波兰今年要在农村建立近300个生产合

作社（集体农庄）。在波兰的一些农村已经有了初级生产合作社，其中34个是根据章程的第三类建立的，6个是根据第二类建立的，^①首批集体农庄主要是在波兰新区建立的，只有9个建在波兰老区，而且全部都建在过去地主的土地上。这就是说，波兰本地农民正在考虑集体化，但尚未开始实际实行集体化。在许多村庄（100多个）已成立了集体农庄筹建委员会。

波兰党的领导很重视在农村的解释工作。波兰工人党于1948年下半年向群众传播集体化思想的，自那时起群众就考虑这个问题。这个工作是在国内形势平稳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波兰农村还是引起一片沸腾，人们积极讨论过渡到新的生活体制以后的前景。

在这6个月中，和上一年最后几个月一样，袭击、甚至杀害波兰农民运动领导人的恐怖活动有所增加。每个月都有近20名波兰工人党基层积极分子被夺去生命。但总的看来，在全国范围内还能镇压住阶级敌人的鼓动，在相对平稳的形势下准备实行集体化。

2月召开了波兰女工代表大会和全波兰青年联盟农村积极分子会议。

过去的半年里波兰农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是3个波兰农民代表团访问苏联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和苏联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团访问波兰。访问乌克兰两周后归来的波兰农民，对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留下了美好印象，这种制度使苏联农民找到了走向富裕、文明生活的道路。这些农民回到波兰各地，给波兰农村带来了有关集体农庄的真实情况。现在这一工作还在继续。前两批200人回来以后，第3批将近400人又去了乌克兰，其中有150多名女农民。以后还要有更多的人去参观。这样，苏联就变成了农民的大学，在那里可学到

^① 根据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决议，第一类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为耕种互助组，第二类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类为集体农庄。

大量有关使农民生活幸福的科学。这是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事情。

同时，这说明，波兰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在多么优越的条件下进行的。

20年前，苏联农民在任何地方也看不到农民在集体农庄的劳动成果，他们必须自己寻找这种道路，自己创建集体农庄，并做出牺牲等等。而波兰农民有时间和条件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筹划，并较容易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这就要重新提出一系列和集体化有关的问题。包括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的方法问题。

波兰农民现在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把苏联的经验及其支持视为自己坚强的后盾。

4月初召开的全波兰农民互助协会代表大会，有4000多名代表出席，好像是波兰农民的重大节日。波兰农民开始看到自己的未来并热烈欢迎它。代表大会是在准备波兰农村集体化（或者如这里所说的“生产合作化”）的气氛中进行的，与会代表的情绪非常高昂。我国代表团一直是整个代表大会注意的中心。我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对苏联和斯大林同志尊敬的掌声和欢呼声几乎接连不断。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共和国总统贝鲁特做了报告。数千农民代表热烈欢迎他的报告，多次用欢呼声打断了他的讲话。

波兰领导人坚持不急于实行集体化的路线，在波兰农民没有确信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优越性之前不催促他们进行这一极其重要的变革。因此按已建立的集体农庄的数量来判断波兰农村生产合作化的成绩是不正确的。

也应当注意到，波兰农村的物质技术基础很薄弱。截止到1948年1月1日，在波兰农民互助协会的乡合作社有405个机器拖拉机站。到1949年1月1日有2022个机器拖拉机站，到3月1日有2368个。1949年机器拖拉机站为13.5万农户服务，其中70%是贫农和中农。

到今年年底全国机器拖拉机站数应达到 3000 个，就是说一个乡要建一个机器拖拉机站。

但问题是，这些机器拖拉机站都很小，力量薄弱。绝大多数机器拖拉机站只有 1 台拖拉机，少数有 2 台，极少数机器拖拉机站有 3 台拖拉机。

1949 年 1 月 1 日已有的 2022 个拖拉机站中，823 个有全套的机器和拖拉机，616 个有全套的机器，但没有拖拉机，583 个机器不配套，即只有播种机和收割机。

建立每个站有 10~15 台拖拉机的国营机器拖拉机站，还是波兰领导同志的理想。

我们的波兰朋友通过支援农村的办法使工农接近，巩固工农联盟。比如，到 1949 年 4 月 1 日，有 1016 个企业同农村保持经常的联系。同农村的联系始于工厂对机器拖拉机站的支援。后来，这种支援又加上了文化联系。工人工作队在农村修理拖拉机、播种机和其他农业机械，帮助农村电气化，作报告和举行座谈会，组织体育竞赛等。工人工作队代表给农村妇女焊锅和茶壶，组建图书馆、俱乐部，安装收音机。这一运动本身就是对波兰农村改造事业的巨大贡献。

农民党和波兰农民党在这几个月内进一步准备两党的合并。两党都在清理自己的队伍，明确自己对工人政党提出的波兰农村集体化道路的态度，总之，力争符合这一巨大任务所要求的水平。留在国内的米科拉伊奇克集团的同路人班奇克和布伊奇克^①遭到彻底失败后，秘密逃往国外。

^① 斯坦尼斯拉夫·班奇克，波兰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波兰农民党右翼分子；斯坦尼斯拉夫·布伊奇克，波兰农民党总执行委员会书记，波兰农民党右翼分子。两人都于 1949 年 2 月被剥夺了议会议员及波兰公民资格。

在过去几个月中，农民党领导人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得到揭露，并基本解决了。但这个“病”使农民党处于比波兰农民党较为不利的地位。

不管怎样，这两个党都在春天，在合并前召开了最后的全会。两党的合并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情。这将是波兰农民运动沿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重大的一步。

民主党和（天主教的）劳动党在2月份表示支持工人政党通过的波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

6月初，全波兰欢度农民的传统春播节，这个节日是在我们的朋友领导下度过的，没有给波兰反动派提供发言的讲台。

因此，准备波兰农村生产合作化的条件是过去半年的第二个特点。

3. 巩固波兰知识分子中的进步倾向

过去半年波兰社会政治生活中再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波兰文化生活中，波兰知识分子中发生的变化。可以说，过去4年里，在波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重要转折。在这些充满反苏思想、一切崇拜西方、自觉不自觉地为波兰和国际反动派服务的反动“文化人”群众中，出现了尽管不是很强大、但显然是新的潮流。苏联政府坚定和始终如一争取和平的斗争，捍卫了波兰利益免遭英美帝国主义的侵害，使苏联在波兰的威望有了巨大增长。使波兰知识分子摆脱了在对苏联形势的认识上的完全无知状态，并使其最民主的分子开始向左转。特别是1947年和1948年，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由于苏联文化活动家访问波兰和波兰文化活动家访问苏联，证明了绝大多数波兰知识分子关于苏联的观念是荒谬的。我们的波兰朋友首先顺利地接近工人阶级的、以及在旧波兰不是处于特别优越地位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在这一工作中，像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苏联的巨大作用，它对其他国家人民的进步影响是显而

易见的。苏联提出的所有文化问题，这样或那样地成为国外社会，特别是波兰社会的财富。在这里，这些问题按自己的方式研究、讨论，并引发某种变革。这些变革不总是一样的，但毕竟是存在的，毕竟推动了进步知识分子前进，帮助他们坚定自己的立场。

1949年1月，在波兰召开了波兰文学家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近60名波兰文学家，几位外国作家作为来宾也出席了大会。苏联作家代表团迟到了。在代表大会闭幕前才赶到。代表大会揭示了波兰文学界现在存在的、反映当今波兰社会阶层的各种流派。当然，在波兰文学界现在还没有拥有强大力量的先锋队。这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当然，波兰文学界在这方面还落后于波兰的政治学界和经济学界。与此同时，反动的文学流派，包括天主教作家在波兰还有很强的力量。他们还高昂着头。他们还在试图嘲笑进步文学家代表的立场。但代表大会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坚冰已被打破，生活正在前进。何时在波兰诞生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还难以预料，但旧制度已经全线瓦解。

6月召开了波兰雕塑家代表大会，讨论了艺术的现实主义问题。

苏联米丘林学派教授格鲁先科同志在近3周内访问了华沙、比得哥什、波兹南、克拉科夫和其他几个波兰栽培中心并作了科学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在波兰生物学家和育种学家中，围绕着米丘林理论和李森科院士的学说存在着分歧，在波兰，除了站在莫尔根立场的一批老生物学家外，已有一大批站在米丘林立场的、工作颇有成效的生物学家和育种学家。可以看到，在波兰，对在苏联进行的有关生物学问题的讨论有很好地了解，这种讨论使波兰育种学家和生物学家划清了界限，并开始积极地确立新的进步的观点。

在过去半年中，以斯克舍舍夫斯基为首的波兰教育部领导人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带回来许多有用的资料。这些资料对国民教育的

改革很有帮助。

在波兰医学界也有这样的倾向。医学界领导人正争取像教育部代表一样访问苏联。波兰医学界与苏联医学界接近的要求已经成熟。

这样，过去半年里第三个重要事实，是波兰知识分子中的分化进一步加深，知识分子中先进部分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站到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来了。

4. 波兰民主和天主教会

在过去半年中，波兰社会政治生活的第四个最重要方面，是准备向天主教会进攻。

在过去巩固波兰新的民主制度的4年里，波兰天主教会没有遭受任何重大损失，当然，如果不把一个最重要的损失计算在内的话，这个最重要的损失是：在波兰依靠天主教并支持天主教的政治制度已不复存在，天主教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过去的4年波兰政府和波兰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和平”的。但把这种关系称为“和平”的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事情没有达到公开战争的地步：政府遵循需要首先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巩固波兰新的民主阵营的原则，而比政府更具有进攻性的波兰教会，仍然指望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帮助，指望尽快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它们主要是悄悄地行动，时时从讲经台上进行反政府的布道，在忏悔时作反对波兰民主制度的鼓动，而一些个别的地方波兰教士成了绿林恐怖匪帮的参加者，甚至头目。

在波兰民主阵营过去4年里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已创造了使波兰社会广大阶层转变对教会态度的前提条件。在波兰已有许多阶层看清了教会的反人民活动，不允许它干涉国家政治生活，有的阶层对教会同其外国中心的联系感到愤怒。

在匈牙利对明德森基和在保加利亚对福音派教徒的审判，显然对波兰政府和天主教之间的内部关系产生了影响。它们使教会明显放慢了一些已经准备就绪的行动，并把这些行动变成了在天主教主教与政府代表之间交换几乎不发表的信件。3月中旬，波兰政府公布了给天主教会的信，信中阐明了政府对宗教和天主教的原则态度并指出天主教会干涉国家政治生活的活动，这完全不合天主教会头目的胃口，因为问题已经提交群众讨论，并且在国家大的中心的工厂企业，以及农村还举行了集会。

波兰政府在过去的半年里对教会实行了一些限制：神学课改为非必修课；学生可以不参加星期天祈祷仪式；取消了在学校工作的教会护士；开始把一系列天主教会教育机构转交市政机关；系统地制止各种宗教游行，吸引青年参加体育、戏剧活动。

上半年末，天主教主教向政府递交了一封由红衣主教萨佩基和波兰首席主教维辛斯基签署的信，信中指责波兰政府有计划地反对波兰的宗教，并指出由此会给波兰青少年道德教育造成的损失。

我们的波兰朋友在反对天主教会方面尚处于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初阶段，但他们知道，现在应把这一任务提到首位。

这样，在1949年上半年实行了一系列限制波兰天主教对波兰社会生活和教育工作影响的措施，并在吸引广大城乡劳动群众反对天主教会干涉国家政治生活方面迈出了最初几步。

5. 经济成就和困难。为解决肉的问题而斗争

在波兰，1949年是以实行这样一些新措施开始的，如取消凭票供应制、实行新的工资制和在工业实行新的生产定额。取消了原工资制，在这种工资制中，实物支付与钱币并存，按低于零售价向工人出售食品等。

这些措施总的来看是实施顺利，但也暴露出波兰政府的一些失误。比如，在1949年1月最初几天，肉制品很快就从商店消失了。

政府不得不使用专用的肉票，即这种食品又回到了定量供应制。

这件事给国内经济形势带来明显的挫折，因为全体市民都感到了肉的不足。

波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意在根本解决肉供应问题的措施，包括签订供应 1125000 头肉畜的合同。合同已在 6 月份结束，而供应定购合同的肉将基本在 1949 年末和 1950 年初实行。

至于主要经济部门，波兰在 1949 年上半年取得了很大成绩。1949 年 5 月的生产计划，主要工业部门均已经完成，几种产品的产量大大超额完成计划。比如煤 5 个月完成年计划的 40.8%，铁—43%，钢—46.2%，轧钢—43.1%，锌—44.8%，车床—38.8%，棉布—41.1%，毛布—40.0%，水泥—45.4%，拖拉机—41.9%，机车—33.7%，货车车厢—45.9%。

在工业方面也存在严重困难。比如纺织工业感到原料、能源，以及劳动力不足。在最近两个月煤炭工业工作很紧张，因为部分矿井开始开采较深而且较薄的煤层。形势更为严重的是，5 月份部分工人去支援农业，在煤炭工业工作的德军战俘人数也减少了。

1949 年春播计划已全部完成，播种了 807.44 万公顷，其中小麦 49.41 万公顷，大麦—90.47 万公顷，燕麦—173.34 万公顷，土豆—237.06 万公顷。波兰 1949 年总播种面积为 1415 万公顷。

预计 1949 年主要谷类作物总收获量为 1056.1 万吨，这就能保证居民的全部粮食供应。

波兰牲畜总头数 1949 年底为：

马 255 万匹

牛 630 万头

猪 590 万口

羊 160 万只

这样，尽管肉有困难，但波兰经济仍在继续顺利发展。波兰国

民经济三年发展计划将顺利完成。

6. 为波兰党和劳动群众的团结、反对战争贩子而斗争

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斗争，对波兰人民群众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斗争进程，给予了并正在给予着重大影响。是的，2年以前英美战争贩子兜售反苏战争不可避免并已临近的谎言还比较顺利。但现在，在波兰国内政治形势日益稳固之后，英美在波兰的代理人不得不采用更复杂的手法进行战争恐吓。

这样一种说法在1949年上半年很流行，甚至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群众中也散布甚广，说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对美帝国主义十分有利，这一形势根本不同于以前任何时候帝国主义阵营的形势，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阵营中惟一的决定性力量，似乎没有竞争对手。

波兰党的领导提出一项任务，即向党和人民群众解释这种说法的错误。贝鲁特在4月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揭露了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和该阵营的弱点。贝鲁特指出，这些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而且越来越深刻，这在最近就看得很清楚。贝鲁特的报告在全会上宣读后，刊登在波兰的所有报刊上，成为全波兰的财富。报告成为我们波兰朋友反对战争贩子的重要步骤。

波兰报刊做了大量工作，解释北大西洋公约的侵略性质。1949年上半年，波兰积极参加了苏联在全世界进步组织支持下发动的在巴黎召开争取和平大会的斗争。在波兰成立了拥护和平者委员会，召开了保卫和平群众大会。在准备巴黎会议期间，劳动人民讨论了和平和反对战争贩子的问题，并作出了有关决议。波兰报刊经常报道巴黎和布拉格会议的准备情况和进程。应当指出，和平和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对战争贩子的思想在波兰得到强大的支持。只有那些主

要在地下进行活动的反动派，以及天主教会代表们，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英美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战争上。但他们不敢在波兰公众面前公开表态。

这样，争取和平、反对战争贩子、反对英美在波兰宣传的斗争，是过去的1949年上半年的又一个特点。

苏联驻波兰大使 列别杰夫^①

1949年7月14日于华沙

^① B.3. 列别杰夫，苏联外交家。1943～1944年为苏联驻伦敦各国流亡政府代表；1950～1951年任苏联驻波兰大使。

№01821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就所谓 “卢布林显圣”事件的调查

（1949年8月）

秘密

关于“卢布林显圣”的调查

7月3日，在卢布林市流传着在卢布林大教堂发生了显圣的谣言。有关圣母像“哭泣”的消息迅速在卢布林市传开，并传到波兰各地。朝圣的人开始从波兰各地向卢布林市涌来，要到发生“显圣”的大教堂亲眼看看。

在将近两周的时间内，该市成为数千渴望看到“显圣”的受蒙骗群众的聚集地。火车和汽车无法运载全部想去卢布林市的人。常有这样的情况，当僧人、教士和神学院学生在农民中作了宣传鼓动，并组织成批的朝圣者去参观时，配合事件发展的国家铁路局为朝圣者提供了专列。有几天卢布林的朝圣人数达到3万人。城里没有住处，人们就住在教堂广场和附近的大街上，在广场和大街上乱抛垃圾，污染了环境。利用朝圣者云集的机会，投机商人抬高日用品和食品的价格。有时城里甚至感到粮食短缺。教堂里经常有教士和所谓“教皇卫队”代表值班。还组织了捐献，因此，在大批朝圣者来卢布林期间，教堂收入200多万兹罗提。

为了对他们自己编造的“显圣”不承担责任，卢布林的神职人员成立了由教士和教民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应讲清显圣的真实情况。尽管委员会已在7月4日否认了有关显圣的事，而且在第二天委员们在给加林斯基主教的信中再次否认“显圣”的事存在，但直到7月10日，卡尔瓦主教在致教徒的信中才把这一情况告诉聚集在卢布林市的教徒。信中写道：“……至今进行工作的结果，不能提供根据认为，在我卢布林大教堂发生的事情是超自然的显圣……”这封信只能给讲歪理的人提供根据，并未能制止“显圣”的继续传播。但卡尔瓦利用这封信，强调发生的事件能加强居民的宗教感情。形式上号召停止朝圣，但未能阻止受蒙骗的人向卢布林涌来。因此，7月13日，在教堂入口处挤死了一名20岁的妇女，有19人受伤。

7月14日，波兰报刊发表了波兰通讯社关于卢布林事件的公报，公报要求7月13日惨案的祸首承担责任。

7月16日，教权主义者怀着挑拨离间的目的提出暂时关闭卢布林教堂的建议。但挑拨离间未能得逞。第二天，在报刊上发表了波兰通讯社关于卢布林省长不接受这一建议的报道。如果关闭教堂，反动的教权主义分子就可能鼓动信教的人对政府机关行动的不满，似乎在“驱赶”和“排挤”神职人员，这就会被反动的波兰教权主义分子所利用。

7月17日，在卢布林市举行了游行和集会，有2.5多万人参加。在群众集会上，民政部副部长伊季多尔奇克讲了话。他分析了卢布林事件并宣称，卢布林“显圣”的组织者和祸首，是同敌视波兰国家和人民政权的人勾结在一起的反动神职人员。

伊季多尔奇克着重分析了波兰宗教所处的地位，政府及波兰人民的进步力量对宗教的态度。

伊季多尔奇克说：“我们不划分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不划

分保护宗教的人和同宗教作斗争的人。现在不这样划分、将来也不会这样划分波兰人民。但是有这样的区别：有人不惜力量、不怕牺牲地建设波兰，有人却希望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干扰在我们伟大祖国建立正义的制度”。接着他说：“我们人民政权尊重宗教感情。我们同宗教作斗争，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良心。在波兰不禁止任何人信上帝、祈祷、去教堂、给孩子作洗礼、尊敬神像和参加宗教游行。在波兰不禁止任何人向儿童传教，而神职人员可自由地履行义务”。伊季多尔奇克继续说：“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信教人的感情，破坏信仰象征：十字架或神像。但同时也应指出，政府不允许用唆使教徒反对人民国家的政治宣教取代祈祷和布道”。

在谈到并非所有的教士都支持卢布林事件倡议者时，伊季多尔奇克举了霍尔姆教堂斯塔尼舍夫斯基教士的例子，他阻止了组织霍尔姆教堂的教民去卢布林朝圣。

在谈到群众集会那一天（7月17日）罗马教皇广播的告德国神职人员书时（他们支持修正波兰新的西部边界的倾向），伊季多尔奇克请集会的人注意德国修正主义者和帝国精神鼓舞者同想在波兰发动兄弟间互相残杀和宗教战争的人之间的联系。

群众集会通过了决议：坚决要求天主教头目停止反对人民国家的煽动活动，根据政府宣言协调同国家的关系。人民政府号召对卢布林事件的幕后教唆者和组织者进行详细调查并要求他们为正义和尊重波兰共和国的法律而承担责任。

集会和游行组织得很好，情绪很高。为了组织集会，波兰统一工人党派了卢布林市政府的500名积极分子去农村和城市。他们要在7月17日组织一定数量的人来参加集会。

群众集会后，教权主义分子组织了两千多名教徒参加的游行，要求释放7月13日为“信仰”和“上帝”被警察机关逮捕的“显圣”的积极组织者和各种教唆者。

游行队伍唱着宗教歌曲，前往市警察局大楼，要求释放被捕的人。由于政府机关有防范措施，冲散了游行队伍，近300名头目被逮捕。

就这件事进行的调查尚未结束，但现在已有材料可以证实，卢布林事件是教权主义分子预谋组织的。

自7月14日开始，在波兰各地召开了波兰社会各界反对卢布林事件的集会和大会。在报刊上发表了許多揭露卢布林“显圣”及类似事件的文章，党的积极分子下乡去做宣传解释工作。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发言中及群众集会上通过的决议中纷纷表示对卢布林事件的愤慨，谴责事件的祸首和倡议者，揭露卢布林事件的政治实质。

7月18日，波兰作家协会最高理事会主席团会议通过决议：“……波兰神职人员中的反动分子利用教民的宗教感情，组织了一场与信仰及基督教崇拜毫无共同之处的闹剧。在卢布林教堂前的广场上复活了中世纪的幽灵。‘卢布林显圣’是反对人民政权、反对国家复兴、反对人民群众渴求文化知识的示威。这次示威是在波兰人民正在摆脱落后与黑暗桎梏的时期组织的。这就暴露了其倡议者的险恶用心和‘显圣’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波兰作家协会最高理事会痛斥妨碍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人。”

在群众集会和大会上发言的人指出一个令人愤慨的情况：卢布林事件使成千的劳动者抛下了自己的工作，农民在最忙的收获季节丢掉了农活，工人在为提前完成计划时离开了工作岗位。

在波兹南，由农业工人职业协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反动的教权主义分子散布关于所谓卢布林“显圣”的谣言，已成为7月13日教堂入口发生灾难的罪魁祸首。

农业工人愤怒斥责这一应受到惩罚的事件的倡议者和组织者，他们利用狂热群众的不理智行动，妄图为人民波兰的敌人的利益挑

拨离间人民群众，破坏他们的创造性劳动。

在群众集会和大会上通过的许多决议中，都要求波兰当局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在波兰发生，惩办卢布林闹剧的祸首，还要求神职人员根据今年3月20日发表的政府公告同政府建立正常的相互关系。比如，在华沙剧院演员大会上通过决议：“……请求国家机关结束使波兰丢脸的卢布林闹剧，不允许以后利用信仰来达到反对人民国家的目的。”

决议中写道：“参加会议的人要求根据今年3月20日发表的政府公告协调天主教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

劳动人民举行的集会和会议，数量最多的是卢布林省。仅7月14日和15日在卢布林省就举行集会和会议2500次。

居里·斯克洛多夫斯卡娅大学的教师、科研人员 and 市内科学艺术界的代表们一起进行了讨论，并给主教和波兰社会各界发了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肯定，尽管“显圣”事件调查委员会确认教堂里的现象不能认为是超自然的现象，但卢布林的神职人员并没有制止朝圣。在科研人员的信中认为，卢布林事件是反动神职人员的政治把戏，同宗教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们认为，已经到了由精神和社会政权机关结束迷信气氛的时候了，这种气氛是不负责任的人暗示或凭空捏造出来的，其目的是破坏建设民主波兰的安心劳动。”值得注意的是，自7月14日起，全波兰的报刊都很重视卢布林事件，刊登揭露神职人员的文章，报道劳动人民反对中世纪迷信的群众集会和大会，而天主教会的报纸却保持沉默，对“显圣”表现出虚伪的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波兰公众反击反动派的群众集会和大会也置若罔闻（《斯洛瓦波夫舍赫涅报》只刊登了两篇不长的有关7月14日和15日情况的报道，其中两次引用了上面提到的卡尔瓦主教的信的摘录，就此为止了）。

好像是对波兰天主教会报纸沉默的补偿，国外的反动报刊对“显圣”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在“美国之音”和“BBC”的对波兰广播中，对卢布林事件作了片面的污蔑性的报道。正如波兰政府代表格罗什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那样，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卢布林，加剧狂热活动，延长闹剧演出的时间，并利用这些达到自己的目的。

“卢布林显圣”具有的规模和“显圣”消息传播的速度说明，这一事件是事先有准备的，而且是有一定目的的。从传出“显圣”消息到实际公开“显圣”的消息（在波兹南和波莫瑞省卢布林“显圣”的消息还在7月1日和2日就已经传开了），以及在此期间全波兰发生的“显圣现象”（仅在卢布林一个省就记录了68种“显圣现象”），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在庆祝人民民主国家成立5周年之前，在政府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开始更广泛地吸引城乡劳动群众反对天主教会干涉国家政治生活之际，上演“卢布林显圣”，按组织者的意图是要显示天主教会的力量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应当指出，神职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放过利用一些国家机关犯错误的机会。比如，增加火车这件事就被神职人员所利用了。为了吸引更多的朝圣者，他们放出谣言，说这（增加火车）是按政府的指示做的，说政府知道“显圣”的事，相信“显圣”，所以允许派专列去卢布林。

波兰政府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对卢布林事件的反应显然太迟钝了。7月13日（这天在教堂入口挤死1名妇女，数人受伤）以前，波兰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而是等着去卢布林的朝圣自行停止。只是在7月13日以后才采取一些措施消除卢布林神职人员的挑拨离间。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领导在居民中作解释工作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没有发生“显圣”的原因，圣母不可能哭泣，

因为在现在的和平时期（和德国人占领年代相比）没有哭泣的理由，这说明在消除卢布林神职人员挑拨离间的宣传工作中还存在着缺点。

尽管在卢布林事件中存在上述缺点，但根据在全国掀起的反对教权主义分子的进攻和其组织者的运动，以及波兰社会各界广泛参加这一运动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波兰政府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消除反面事件影响上做了大量工作，并利用这一事件进一步动员劳动群众同反动神职人员在波兰人民中的影响作斗争。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专员 斯捷潘诺夫

1949年8月于华沙

【专题说明】

1944 和 1945 年的饥荒

(1944 年 4 月至 1945 年 4 月)

1944 年春和 1945 年春，正当苏军在前线不断取得军事胜利之际，苏联后方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由于农业歉收，出现了严重的食品供应短缺。本专题汇集的材料反映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鞑靼苏维埃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粮食和食品供应的严峻情况。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1944 年第一季度肉、鱼、油脂、谷物的供应量平均下降了近 50%，马铃薯下降了 80%；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1944 年第二季度按配给证供应的鱼、肉、油脂的供应量也大幅度减少，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每人每天的面包供应定额只有 200~300 克。以狗、猫等动物尸体充饥的现象在各地也屡见不鲜。这都使居民的健康状况大大恶化。1944 年 4 月 1 日，据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20 个城市的不完全统计，有 2.2 万人患营养不良；1945 年第一季度，在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因身体虚弱致死的有 119 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一些工厂经常出现工人因饥饿昏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事情，比罗比詹市的儿童死亡率在 1944 年高达 87%。受此影响，这些地区的社会治安日趋恶化，刑事犯罪数量大幅度上升。比如，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95% 的凶杀是为占有配给证、少量食品和物品，而 84% 的杀人者是没有前科的

技术不熟练的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而一些军人家属的情况更令人堪忧，他们除了向当地政权机关施加压力外，还写信给前线的亲人，抱怨后方的艰难处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件都是直接呈报给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文件中反映的情况已经引起了苏联最高领导层的重视。

(本专题文件由吴伟编辑和校注，
赵晶旻翻译)

№06854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 波格丹诺夫就食品短缺及引发的社会问题 给贝利亚的报告

(1944 年 4 月 8 日)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贝利亚

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局的通报证实，1943 年歉收造成的食品供应困难正在波及共和国又一些地区和又一些居民群体。

1944 年第一季度，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区机关，或在这些机关工作人员的参与下，对共和国 50 个区的 100 多个居民点进行了调查。调查资料表明，居民食品供应十分艰难。

检查发现，有 1000 多个军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家庭（人口总数达 4000 人）因饥饿而身体虚弱、浮肿，急需帮助。

从检查资料看，食品供应最为紧张、饥饿造成浮肿人数相当多的是阿拉木图州。那里记录在案的因身体虚弱死亡的事故有 40 起。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的死亡事故有 47 起、阿克莫林斯克有 21 起、北哈萨克州有 10 起。

绝大多数死亡事故发生特殊移民即居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州恰尔斯克区、北哈萨克州红军区和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区的德意志人中间。

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州阿巴耶夫区的特殊移民即德意志人中间，发生多起以狗、猫、动物死尸为食的事例。

在检查中，前线战士家属的状况格外引人注目，其中许多人已陷入极度贫困，他们在战争期间穿破了衣服和鞋子，因此冬季无法出门工作，孩子们也无法上学。

集体农庄庄员菲多索娃（阿拉木图州安德列耶夫区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有两个儿子战死疆场，丈夫三次负伤，但仍继续留在前线，她一家人未得到任何帮助，以狗和猫代食。

在东哈萨克州济良诺夫斯克区的 23 个集体农庄，被调查的 110 个前线战士家庭中，多数人家长期未领到食品；在某些集体农庄，儿童普遍浮肿，部分儿童已陷入绝境。

由于食品供应困难，前线战士家属、集体农庄庄员和区中心居民已有消极表现。例如，集体要求发放食品，有时还伴以威胁；集体农庄庄员离开集体农庄并大规模迁往工业中心；集体农庄庄员及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和手工业合作社的工人拒不出工；军人家属给前线写信诉苦。

在西哈萨克州泰帕克斯克区“自己的劳动”集体农庄，以前线战士之妻舍尔斯坚基娜为首的几名妇女来到养鱼站要鱼。她们声称：“如不给鱼，我们就自杀，我们再也忍受不了饥饿了。”

前线战士之妻菲里莫诺娃在写给丈夫的信中说：“与其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集体农庄没有面包，口粮发不下来，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人们空着肚子睡下，又空着肚子起床。”

这种困境加上缺乏任何帮助，使自杀或自杀未遂事件时有发生。

在西哈萨克州乌拉尔山前地带“工农红军 15 年”集体农庄，女集体农庄庄员加斯特尔自杀身亡。她生前留下的字条写道：“我之所以自杀，是因为我已走投无路、求助无门。”

在东哈萨克州济良诺夫斯克区“新的道路”集体农庄，前线战士之妻、集体农庄庄员皮丘林娜自杀未遂。她的 4 个孩子因饥饿浮

肿，卧床不起。皮丘林娜的自杀被村苏维埃主席祖勃科娃制止。据查，皮丘林娜曾多次向集体农庄主席泽连科夫求助，但遭到粗暴拒绝（现这户人家已得到帮助，并将追究泽连科夫的刑事责任）。

检查中，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区分局通过党、苏维埃机构和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采取了紧急措施，向急需帮助的人提供救济。

对于已经查明的无情对待贫困户的所有事实，其材料已移交检察机关，以便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 波格丹诺夫

1944年4月8日

№06853

贝利亚就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食品供应短缺
给斯大林等人的报告

(1944 年 4 月 21 日)

国防委员会约·维·斯大林同志、
国防委员会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联共（布）中央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人民委员会阿·伊·米高扬同志^①

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局现将从地方机关得到的有关本州食品供应状况的材料报告如下：

从 1944 年初起，由于归中央基金供应的原定食品未能完全到位，本州食品供应的困难有所增大。

今年第一季度，本州从中央基金得到的肉类及其替代品为计划需求量的 67%，动物油为 51.3%，鱼产品为 37.8%，糖果点心类食品为 13.7%，食糖为 13.5%。

因此，在一些主要工业单位，食品配给证上的肉、鱼制品的供应仅能保证 45～70%，油脂为 36～60%，谷米、通心粉制品为 50～80%。

① 格·马·马林科夫，1939 年 3 月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1941～1945 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阿·伊·米高扬，1937～1946 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5 年任苏军粮食和物资供应委员会主席。

运往城内市场的食品数量减少、价格上升。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市场上，1943年第四季度马铃薯的运送量为6万公担，1944年第一季度仅为7000公担，动物油的运送量分别为85公担和242公担^①，牛奶分别为6400升和3500升。马铃薯的售价从每公斤50卢布涨至75卢布，肉价从每公斤200卢布涨至350卢布，动物油从每公斤900卢布涨至1000卢布。

下塔吉尔、伊尔比特、乌拉尔卡缅斯克及本州其他主要城市市场的农产品供应状况及价格状况大体相同。

据从20个城市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得到的不完全统计资料，截止到1944年4月1日，在市、区医疗机构就诊者中，记录在案的营养不良患者达2.24万人。绝大多数患者是城市居民，主要为企业工人。

仅1944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就有451人死于营养不良，下塔吉尔和谢罗夫死于营养不足的分别有428人和112人。

95%的凶杀是为占有配给证、少量食品和物品而为。84%的杀人者是技术不熟练的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这些人均无前科，同犯罪集团也无牵连。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1944年4月21日

^① 原文如此。

№ 06855

贝利亚就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食品供应短缺给斯大林等人的报告

(不晚于 1944 年 7 月 27 日)

国防委员会约·维·斯大林同志
苏联人民委员会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联共（布）中央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安·安·安德烈耶夫同志^①
苏联人民委员会阿·伊·米高扬同志

绝密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现将从地方机关得到的有关共和国食品供应状况的材料报告如下：

在克孜勒集团军区，有 200 多户人家，主要是军人之家，陷入特困状态。其中许多户只能以草果腹，曾发生以动物死尸充饥的事情。

由于食品供应困难，共和国发生两起杀害儿童案件和一起自杀事件。

许多区不断发生大规模偷窃窖藏食品和菜园蔬菜事件，就连尚

^① 安·安·安德烈耶夫，1935 年起先后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农业人民委员，1941～1945 年，担任军事运输和铁路运输的领导工作。

未成熟的白菜的叶子也遭偷窃。相当多的偷窃是因食品供应困难，行窃者中有一些是军属。

偷窃令受害人十分恼怒，施用私刑事件时有发生。

在阿克苏巴耶夫“康拜因”集体农庄，养马员努鲁季诺夫·伊斯马吉尔和甘纳图林·韦利阿江偷了一头牝牛。二人被受害人抓获并遭到殴打，努鲁季诺夫被殴打致死。

在同一区的卡利诺夫卡村，12岁的少女马克西莫娃·娜塔莎被人告发，说她曾7次偷窃少量食品。受害人——两位拖儿带女的前线战士的妻子，一起押着娜塔莎游村示众，在她脖子上挂上石头，推到河边溺水。二人还把她捆在大车上，长时间让雨淋，之后把她关入了地窖。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现已查明，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拨给共和国各食品供应困难区的基金有被挪用和挥霍的现象。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6857

贝利亚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食品供应短缺给斯大林等人的报告

(1944 年 10 月 14 日)

国防委员会约·维·斯大林同志

苏联人民委员会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苏联人民委员会阿·伊·米高扬同志

联共（布）中央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内务人民委员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局现将从地方机关得到的有关该边疆区各大工业城市食品供应状况的材料报告如下：

1943 年的粮食歉收对边疆区，特别是哈巴罗夫斯克、共青城和比罗比詹等大工业城市总的食品供应状况造成严重影响。

这些城市接受面包供应的有 360486 人，其中相当多的人，即 111544 人日常供应定额为 300 克和 200 克。

由于商业机构不能及时、充分地按优待证供给食品，那些应得到供应保证的人同样感受到了食品的短缺。

仅今年第二季度，边疆区商业机构减少的配给证供应就达：鱼产品——53 吨、肉食品——382 吨、动物油——195 吨。边疆区机构经常减少向各厂工人供应处供应的米、肉和鱼等食品，而且给工人供应处下发的食品基金不是按工人数额，而是按企业的生产计划发放。因此，工人供应处不断减少食堂的食品供应量，从而使工人的伙食变差。

在哈巴罗夫斯克市的莫洛托夫工厂，弹药人民委员部发现，经

常有工人因头晕昏倒在车间，一些人染上坏血病。全厂登记的因身体虚弱引发的病例相当多。

在哈巴罗夫斯克基洛夫造船厂，主要食品是腌制的绿白菜叶或葡萄叶，有时则是劣质鱼或60克谷类。工人当中经常发现营养不良和痢疾患者。

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小学教师的处境尤为艰难。600名教师中，获准到食堂就餐的只有130~150人，其余的教师领不到任何食品，其中包括口粮，全市没有一家教师专供店，教师因营养不足患病的情况时有发生。

大学生中也有人因身体虚弱而患病。1944年，医学院有两位助教因营养不足而被送入医院。

……在共青城，1944年8个月内，1265和199厂有559人开小差。在共青城其他军工厂（阿穆尔钢铁厂、364厂），大多数工人除公共饮食外，得不到任何食品。食堂里的食物质量低劣，而且不含卡路里。工人家属连食堂也吃不上。

1944年，在城市街道发现大量死尸和奄奄一息的人，后者虽被送往医院，但仍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列宁修船厂，每天误工者达50人。体检查明，工厂有20%以上的工人出现过饿晕的情况。

比罗比詹市儿童死亡率（1944年）增至86.9%。

对边疆区刑事犯罪状况的分析表明，刑事犯罪数量上升（特别是在1944年上半年）的主要原因，是物质条件恶化。绝大多数罪犯是哈巴罗夫斯克市和共青城工业企业的工人。

共青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606人中，有583人是军工厂和其他企业的工人，其中421人没有前科。

在刑事犯罪数量总体上升的同时，边疆区侵吞公物、盗窃、滥用职权案件数量，以及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数量也有增加。仅哈

巴罗夫斯克一市，1943 年和 1944 年上半年未成年人犯罪就达 420 起。1943 年和 1944 年上半年，共收留无家可归和无人照管的儿童 2717 名。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06856

贝利亚就乌兹别克和其他地区 食品供应短缺的报告

(1945年4月17日)

据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卡巴尔达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通报，因1944年粮食歉收及粮食制品供应不足，许多区的居民食品奇缺，因身体虚弱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

今年第一季度，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已发生119起因身体虚弱死亡的事故。

共和国刑事犯罪数量上升。

1945年2月13日，安集延州钦纳巴得区叶塔—卡什金村苏维埃莫洛托夫集体农庄庄员扎基罗夫、塔吉巴耶夫等5人，闯入女集体农庄庄员伊拉利耶娃·希兰比比家中，用刀将其刺伤，抢走100公斤小麦、30公斤稻子、10公斤面粉和1只绵羊。

1945年1月18日，布哈拉州卡甘区采石场工长阿尔塔耶夫、发动机管理工斯卡科夫和工人苏莱曼诺夫·努巴伊，对萨雷克斯村苏维埃伏龙芝集体农庄庄员霍贾尼亚佐夫和哈德罗夫进行了拦路抢劫，抢走高粱60公斤、黍50公斤、杏干10公斤。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1945年4月17日